

黑色文库 第十八集



张轶东 著

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

黑色文库



劳改基金会出版

黑色文库 第十八集

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

张轶东 著



劳改基金会

华盛顿

2007

目 录

出版缘起	11
张铁东的“一个人的遭遇”(序)	丁抒 15

上册

序幕	27
第一章 1956 年 青春作伴好还乡	33
第二章 1957 年 香饽饽不香了	51
第三章 1958 年 克拉娃	75
第四章 1959 年 第四类人员	109
第五章 1960 年 大饥荒	135
第六章 1961 年 参加建设大庆油田	157
第七章 1962 年 绥化县第一中学	179
第八章 1963 年 梦见克拉娃	203
第九章 1964 年 社教	215
第十章 1965 年 火山口	231

下册

第十一章 1966 年 黑帮室	249
第十二章 1967 年 逍遥一年	271
第十三章 1968 年 与家庭断绝关系	287
第十四章 1969 年 社会学习班	309
第十五章 1970 年 新肇监狱集训队	337
第十六章 1971 年 砖厂	377
第十七章 1972 年 严管犯人	401
第十八章 1973 年 绥化法院来人复查了	423
第十九章 1974 年 批林批孔中	437

第二十章	1975 年 严管队长	453
第二十一章	1976 年 一个时代在一瞬间就结束了	471
尾声		481



美丽的克拉娃，1960年。



与苏联前妻克拉娃的结婚照，1959年1月。



1958年的克拉娃。



1959年的克拉娃。



作者1980年代的照片。



作者近照，2001年。



左起：作者与妻子郭静静及学生合照，1993年夏。



1950年代列大首届中国留学生重聚首，右后二为作者，2004年春节。



毕 业 证 书



补证字第

0355

号

学生 張軼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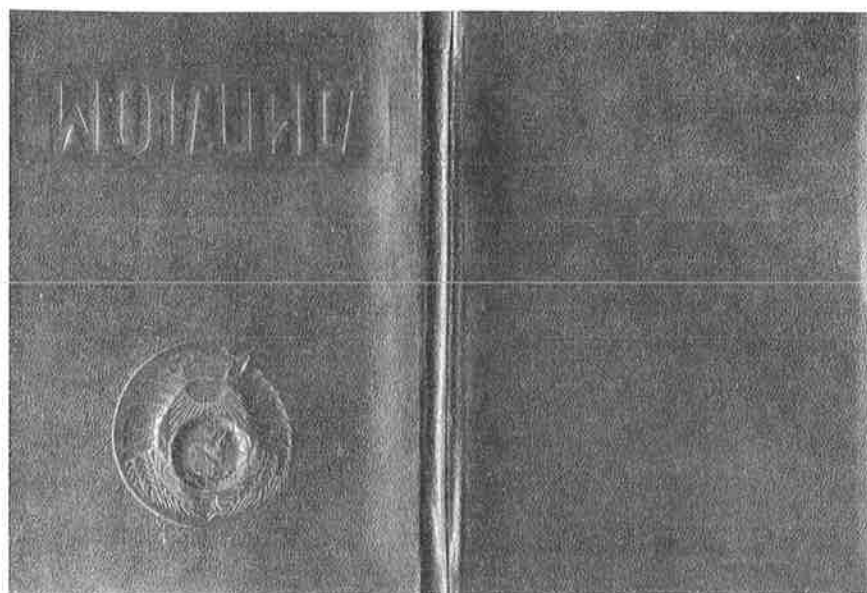
于一九四八年九月 入本校

历史系 专业学习，

学制四年，一九五二年七月毕业。



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证书。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ДИПЛОМУ №10192

ВЫПИСКА
ИЗ ЗАЧЕТНОЙ ВЕДОМОСТИ
(без диплома не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а)

作者的列宁格勒大学的优秀毕业证书（1）

Сдал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экзамены по
1. Основы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отлично
2. История средних веков отлично
3. Защитил дипломную работу на тему:
Открытие новых путей
мировой торговли и Китая



Лит. 23-V-56 г. Тип. ЛОМУ. Зак. 636-50.

ДИПЛОМ

С ОТЯНЧЕНИЕМ

и № 110222

Настоящий диплом выда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у студенту
в том, что он в 1954 году
поступил 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имени
А. А. Жданова и в 1956 году окончил
полный курс
на факультете Истории
по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и Истории

Решение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экзаменацион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от 25 июня 1956 г.
студенту Ивану И. дун
присвоена квалификация историк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школы
с отличием.
Ленинград 1956 г.
Регистрационный № 1006

г. Иван И. дун

во время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имени
А. А. Жданова с 1954 г. по 1956 г. сдал
экзамены и зачеты по следующим дисциплинам:

1. Основы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отлично
2.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отлично
3. Диалек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отлично
4.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изм отлично
5. История философии хорошо
6.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отлично
7. История первобыт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основы этно-
графии отлично
8.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го мира (древний Восток и Гре-
ция) отлично
9. История древнего Рима отлично
10. История средних веков отлично
11. История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отлично
12. История южных и западных славян отлично
13. История стран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Востока отлично
14. Педагогика отлично
15. Иностранная язык (русский) отлично
16.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отлично
17. Спецкурс на III курсе Развитие производст-
ва в странах Зап. Европы в 17-18 вв. отлично
18. Спецкурс на III курсе История Франции
в средние века отлично

19. Спецкурс по IV курсу История Англии
в 17-18 вв. отлично

20. Спецкурс на IV курсе

21.

22. Спецкурс на III курсе

23. Спецкурс на IV курсе Веховой строй и
товарное произв. в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хорошо

24. Ленинский язык отлично

25. Основы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библиографии хорошо

26. Архивоведение хорошо

27. 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дисциплины хорошо

28. Метод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истории хорошо

29.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ая практика отлично

30. Физ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и спорт хорошо

31. Палеография

32. Курсовая работа отлично

33.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нная практика отлично

34. История Византии хорошо

35.

36.

37.

38.

作者的列宁格勒大学的优秀毕业证书 (2)

绥化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79)刑监字第 272 号

被告张轶东，男，四十六岁，汉族，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学生，知识分子，原籍南京市，现住绥化县第一中学。

上列被告因反革命一案，于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五日被绥化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投入新肇监狱劳动改造。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由本院裁定释放待处。

原判认定：张轶东收听敌台，散布反动言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到边境地区了解警戒情况，企图叛国投敌等问题。经复查张轶东的言论虽有错误，但多属认识问题，不构成犯罪，到边境地区了解情况，是欲投奔苏联，但情节轻微，不应科刑。据此，原判张轶东反革命罪不当，故改判如下：

撤销原判，无罪释放。

如不服本判决，须于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提出上诉理由书两份，经由本院上诉到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绥化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员：魏焕信

书记员：吴殿玉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五日

张轶东因反革命罪入狱9年后获改判的判决书。

出版缘起

劳改作为中共专制统治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远在其建党未久，在其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革命根据地”已存在了。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参照了当时苏联的劳改制度，在斯大林派来的“古拉格”专家指导下，融合了毛泽东的“改造与生产结合”的思想，发展出这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狱制度。劳改是一套政治工具，一方面要消灭犯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剥夺其人身和思想的自由，并美其名为“改造”。另一方面要利用这项庞大的无偿劳动力，为共产政权创造财富。

早在五十年代，中国的劳改犯就被调动去筑路架桥，修河造坝，挖煤垦荒。这些无声无息的奴工为共产政府献出了健康、青春和生命，没有人记得他们。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生命价值的轻贱和蔑视，直接造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及文化的摧残。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原始疯狂的暴力行为和愚民式的政治运动逐渐式微，而邓小平为暴发户和拜金主义者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社会发展的金科玉律。二十年的开放政策使中国社会从粗暴进入俗媚，从暴戾走向糜烂。一个经过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批林批孔、四人帮、反精神污染这些颠倒黑白是非、绝灭人性、轻视知识和道德长达四五十年的社会，如果不经反省、忏悔、痛定思痛和惩恶抚善的过程，怎么可能就直接跨入现代化的社会呢？无可讳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毛泽东架构的极权政治制度，包括劳改制度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中国大陆的社会必须经过彻底的反思，对灾难的根源进行检

讨和思辨，重新认识知识和道德的重要性，中华文化中特有的人文主义精神才有复苏的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防止荒谬无知的悲剧重新上演。然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的毁灭性破坏，得有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初具成效。这样的净化过程只有在民主制度的体制内，自由和人权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开展。

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劳改犯，是制度中最大的牺牲者。以往共产党将人任意划成不同的阶级。以阶级分贵贱，以阶级区分天堂和地狱。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阶级出身、思想意识、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甚至因为微不足道的个人原因，被共产党政府送去劳改。劳改营里，在“强迫劳动”、“改造思想”、要求人人挖掘灵魂、脱胎换骨的严酷环境下，人被剥夺了意志、尊严、情感和良心，即使肉身 in 备受折磨后，幸能存活，心灵上和精神上所受到的蹂躏和残害也万难愈合。人们在寻求历史的真实面目时，那个时期里，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历史灾难，特别值得我们警惕。历史巨轮所辗过的苦难者的经历是一面忠实的镜子，幸存者的故事永远是最具有震撼力的。研究和整理劳改营幸存者的生活经历和资料就成为我们拂拭染上尘埃的历史镜子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尘拂。

劳改基金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一直锲而不舍地寻访及收集劳改幸存者的事迹和证据，迄今已达五百余份。在当前全球商业化的过程中，世界更倾向于资金财富的集中，文化事业的推动备为困难。虽然在重商业、轻文化的趋势下，不少幸存者非常艰苦地一字一行地把他们的亲身经历写了下来，却苦于无处出版。还有一些人不具备写作的能力，也有些人丧失了记忆的能力。那些来自劳改的呼声和呐喊，那些血泪记录的文字实在应该有一个机会被容纳及保存。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责任，也是对公正及自由的承诺。劳改基金会愿意，向散布在全球，特别是如今尚在

中国大陆的劳改幸存者继续征集资料，整理、编辑并出版这些文集，我们称之为《黑色文库》。

劳改营是中国畸形社会的缩影，它的幸存者就如但丁《神曲》里那些经过地狱炼火煎熬过的光怪陆离的众生。烙在这些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贱民身上的，是专制政权掌控下国家机器的铁的印记。劳改不仅对这些受难者摧筋断骨，残其躯体，还对他们洗脑换心。他们有些进去时是没有受过完整教育的青少年，出来时已是白发人；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一旦被投入这个大炼狱，也跟知识和信息长期绝缘。因此幸存的生还者中大智大勇者有之，圆滑机灵生命力特强者有之，至于心智消磨殆尽，看破红尘，苟延残喘者更占很大部分。《黑色文库》就是要保存这些人的声音，哪怕是文字粗糙，文体拙朴的记录，我们都愿保存其原始面貌。也有人身在囹圄，言不由衷，我们也都不加文饰，原文照登。相信读者自能判断。遇到当事人自己不能亲自执笔的情况，我们则尽量以接近原始叙述的语调和情感予以记录，以求传真。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经历了“失语”的时代，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又想把中国人变成一个“失忆”的民族。让我们来记录历史，为专制政权谱写挽歌，为民族丧失的记忆招魂。

《黑色文库》编辑委员会

2007 年于华盛顿

张轶东的“一个人的遭遇”（序）

丁 抒

读完张轶东的回忆录《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挥之不去是“一个人的遭遇”这几个字。

《一个人的遭遇》，这是四十多年前看过的一部苏联电影的名字。电影系由肖洛霍夫同名小说（又译《一个人的命运》）改编。主角索科洛夫在苏共革命后参加过红军。在后来的大饥荒中，亲人全都饿死。他和一个在孤儿院长大的姑娘结婚后，才有了一个家。1941年德军入侵苏联的第三天，他告别妻子和一子一女，上了前线。他是司机，一次往火线送弹药时军车被击中而成为战俘，被送往德国集中营服苦役。利用被指派给德军的一个工程师开车的机会，他冒着生命危险把车子连同德军工程师带回了苏联。回家探亲时他才知道，妻子和女儿已死于德军的轰炸。在战争胜利前夕攻克柏林的战斗中，儿子也牺牲了。战后，他给集体农庄开车，收养了一个战争孤儿万尼亚。只因开车撞了农庄的一头牛，他就被开除了公职，带着万尼亚四处流浪，犹如“被苦难的生活抛弃在路边的两粒沙子。”（肖洛霍夫语）

中共认为，这部电影渲染战争苦难，宣扬人性论，是毒草。先是禁演，后来作为反面教材在少数场合放映以批判苏共的“修正主义”。1963年春，清华校方为了对毕业生进行“服从祖国分配”的教育，也为了配合中共中央对苏共的批判，给毕业生免费放映了两部电影。我是一年级新生，被也是毕业生的哥哥带进礼堂，观看了那两部电影。一部是中国人拍的电影《昆仑山上一棵草》，意思是每个人都是一颗螺丝钉，党放在哪里就在那里生

根。即便到了昆仑山的兵站，也要像昆仑山上的一棵草，扎根在那里为党服务。另一部就是《一个人的遭遇》。

张轶东在他这部回忆录里写道：“1957年1月1日，我从《真理报》上读到了肖洛霍夫所写的《一个人的遭遇》。我还不知道我自己今后的遭遇不会比他笔下的那个索科洛夫更好。而我那‘苦难的历程’则将比阿里克赛·托尔斯泰小说主人公们的苦难历程更加漫长。”

的确，张轶东大半生的遭遇，比《一个人的遭遇》里的那个索科洛夫更为坎坷，苦难更甚。他的苦难不仅远比索科洛夫漫长，也远比阿·托尔斯泰的小说《苦难的历程》里的主人公的苦难历程更为漫长。

而张轶东的坎坷苦难，就是从1957年开始的。

他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张连科是一个留日归国的炼钢专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时任上海第三炼钢厂厂长。在抗日战争初期迁厂入川，与另一迁川的汉阳铁厂合组成非沦陷区最大的钢铁厂，重庆大渡口钢铁厂。因积劳成疾，他的父亲在抗战胜利前夕病逝。1948年，还是北京迁渝的清华中学高二学生的张轶东被北京大学破格录取，到了北京。那时他的哥哥已经是清华大学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哥哥的影响下，他也成了一名“进步学生”。1949年中共进城后，哥哥参军南下，大弟弟也参军去了朝鲜战场。张轶东开始学习俄语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1年7月，他一、二年级时的同班同学、已是北大党委专职干部的程贤策把他找到党委会，告诉他，党决定派他到苏联去学习。八月间，他进入了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

张轶东努力学习，成绩优秀。他二年级时写的论文《七至八世纪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已接近毕业论文的水平，他的照片也上了历史系的光荣榜。1956年毕业时，中国大使馆同意他留校做

研究生。回北京过了暑假后，又回到列宁格勒深造。

但是，1957 年中共主席毛泽东发动的“反右派”运动把他的命运拧了一个大折。对这场“反右派斗争”，毛泽东曾这样作总结：

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胜利，有人认为在 1956 年，我看实际是在 1957 年。

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1957 年右派进攻，反了右派，反造不起来了。

1957 年那一仗不得不打，打得很好，大胜仗啊！一个肃反，一个反右。

在那场比秦始皇焚书坑儒远为酷烈的运动中，全国计有一百万人被扣上“右派分子”、“中右分子”的“帽子”。还有成千上万的人被定为“右派言论分子”、“烂言分子”、“疑似右派”，或者“以所谓‘右派言论’戴上其它帽子”！这一百多万人，多数是知识分子。（六十万以上被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坏分子”的工人、店员、农民等，不计在内）

张轶东的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弟弟被划为“中右”分子，赶出军队，发配至广西十万大山的僻远山沟。留学生也不能置身于政治漩涡之外。1958 年国内各单位搞“反右补课”时，党也在留苏学生中进行组织“清洗”，连中共元老方志敏烈士的儿子都被打成“右派”遣送回国了。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里有四人被划为“右派”而遣送回国。

张轶东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善于独立思考的他，不盲目随从。党支部认定他“只专不红”、对党的政策“抱怀疑态度”，没收了史学前辈雷海宗、向达给他的信件，因为雷、向都是“大

右派”。

张轶东躲过了反右运动，可是紧接着毛泽东在 1958 年又搞起了“拔白旗”运动。张轶东成为留学生中的靶子。他被大字报围攻，并被强令“向党交心”。交了三次心均不获通过。留学生党支部将他的材料往大使馆一报，他就被“遣送回国”，从此成为一个贱民。

1959 年初，张轶东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上半年，政治气氛似乎不那么肃杀，他曾经希望可以凭借其苏联籍妻子还在列宁格勒的关系重回学校，完成其研究生论文。可是七月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又掀起了“反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南海里批斗彭德怀元帅的吼声虽然传不到红墙之外，反右倾却无远弗届，谁也躲不了。

张轶东的家与中南海仅一街之隔，距离不过百米。他再次成为“运动员”，被要求“向党交心”。这一回他铁了心，在党要他“交心”时斗胆回答了一个“不”字。自然，很快就有了后果。年终奖金分四类，最低的“四类人员”得零元。零元奖金获得者只有三人：两个右派，加上张轶东。

这个“四类人员”，论文也不能发表了。张轶东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他的妻子克拉娃积攒了一些钱，还收到了张轶东在苏联发表的论文的稿费，有了来中国的路费。可是政治原因使得她来不了中国。张轶东以为离开北京到哈尔滨去是一条出路。他希望调动到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分院继续研究历史，可是“组织上”却把他派到了黑龙江省安达市（今大庆市）的工业器材采购供应站。1962 年，他又被调到绥化，在县第一中学担任俄语教员。

他不在乎“大材小用”的闲话，卖力地教学生，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辅导学生，并帮助家境困难的学生。学生可以

随时到他的单身宿舍求教。他赢得了学生的尊敬，这使他欣慰，但是他更明白，“政治”上已入了“另册”的他，教学再好也白费！

中苏关系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他和妻子克拉娃团聚无望，终于在 1965 年离了婚。几乎同时，他被公安局传讯了。几位北京下放到黑龙江的友人被归纳进了“张轶东反动集团”。这时他才明白，长期以来他就是一个被监控的对象。苏籍妻子实际上是他的保护伞。离了婚，保护伞也就没了。

不过，要到 1966 年毛泽东搞起“文化革命”，张轶东才知道，过去的磨难都不算什么，真正的灾难还在后面呢。

“文化革命”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是注定跑不脱的。“老修”是他的外号，所有的大字报都称他“老修”。“黑帮”都被勒令将身份牌挂在胸前。他的牌子上写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六月中，毛泽东曾说“这次恐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其实，毛泽东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短时间内全国自杀者超过十万人。张轶东有一小瓶灭跳蚤用的毒药“敌敌畏”。他裤袋里藏着那只小瓶子，在头脑里进行生与死的斗争。他想起了家人。他知道，要是他“畏罪自杀”，弟弟妹妹将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他不能只考虑自己。

当张轶东在绥化放弃自杀时，并不知道他的同班同学、当年选拔他去苏联留学的那个北大党委委员程贤策，已经自杀，用的正是“敌敌畏”。他也不知道，他父亲张连科在重庆钢铁公司的墓地也被捣毁了。墓碑被砸碎，遗骨被毁弃。

绥化两个“革命群众”组织打派仗、顾不上批斗黑帮时，他的处境稍有改善。不敢收听苏联广播已达一年之久的张轶东又重新拧开了收音机。不过这使他以后被处置时罪行又增添了一条：

“偷听敌台”。

1968年至69年是恐怖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形形色色的“反革命犯”被枪决。在绥化县，一名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干部被枪毙，罪名是上书毛泽东，批评中共自1957年以来即走在了一条错误道路上。

全国死于“清理阶级队伍”者在五十万人以上。邻近绥化的海伦县，有一位小学校长投井自杀。十三年后张轶东再婚，妻子就是那位校长的女儿。

绥化一中的两派“大联合”之后，再度寻找“阶级敌人”。张轶东是学校第一号斗争对象。但是，即便在批斗会上他仍然坚持其“反动观点”。校园里到处是“强烈要求公安机关逮捕反革命分子张轶东”的大字报。他的收音机被没收，送到了绥化县阶级斗争展览展馆。

1969年9月底的一天，张轶东被荷枪实弹的士兵押着离开绥化一中校园，进了“社会学习班”。多年后他才知道，那是一次各地同时进行的大搜捕行动。1975年在辽宁省被处决的女烈士张志新，也是在这天晚上被捕的。

“学习班”实际是个准监狱。审讯张轶东的公安人员与各地监狱的管理人员一样自称“政府”。个人物品存放储藏室时，填写的单子是“犯人存物单”。“学员”排着队在街上走时，市民们都说是“劳改队”来了。搞防空演习时，管教员逼着学员跳下菜窖，大叫“都往里跳，摔死一个少一个！”

只有一点不那么像监狱：“学员”得按月交出自己的粮票，以及高出实际饭钱一倍的伙食费。

1970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说“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紧接着又是“反对

铺张浪费”、“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简称“一打三反”运动。

以思想言论定“反革命犯”，加以逮捕、关押、屠杀，并非始于文化革命。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规模最大的一次。1968至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主要打击对象是所谓“历史反革命”。“一打三反”的目标则集中于“现行的”，即“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也就是张轶东这样的人。

“一打三反”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国家机器正式登台，动用公检法机关，全国几乎同时进行的一次“依法”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司法程序，正式地将政治犯一一判处徒刑，其中大多判了死刑、无期徒刑和长期徒刑。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北大数学系青年助教任大熊、清华大学学生刘世广，就是在那时被枪决的。

张轶东这一回是在劫难逃了。他有“思想极端反动”、“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偷听敌台，预谋投（苏）修”等等大罪。二月间，也就是当了五个月准犯人后，他被“依法拘留”，戴上手铐，成了看守所的正式囚犯。

死刑的阴影笼罩着他。他知道中国的传统：死刑犯在被处死前可以提点要求。他打算到了那一天选择听音乐：他钟爱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以及乌拉尔民歌《山楂树》，或者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或约翰·斯特劳斯的《艺术家的生活》。他对自己说：“或许他们还是会同意的吧！”

1965年张轶东和苏联籍妻子克拉娃被迫离婚后，还保持着通信。文化革命后，他们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他最后的愿望是见到克拉娃一面。他打算在难友中找个可靠的人，写遗嘱说把自己的

一切遗物都送给他。交换条件是此人被释放后将他的骨灰带到中苏边境，洒入黑龙江。“黑龙江从哈巴罗夫斯克到鞑靼海峡的那一大段在苏联境内。”他这样想，“我的骨灰在这一江段中漂流，就离克拉娃最近了，而且不需要办理任何护照。这样我就能实现我这一生最后的愿望了。”

不过，他终于未被判处死刑。过了七个月，即九月间的一个星期天，他被绳子捆绑起来，挂上写着“反革命犯张轶东”的牌子，名字被划了叉，与另外十三名囚犯一起，被全副武装的士兵举到敞篷大卡车上，沿车边朝外跪着，拉到县中心广场，在群众大会上听取宣判。对他的判处是有期徒刑中最长的二十年。

从离开列宁格勒大学那天算起，历时十二年，他最终进了离他曾经工作过的安达市不远的新肇监狱。

中共的监狱劳改制度，本来是从苏联学来的。就是在张轶东入狱的 1970 年，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为其揭露苏联监狱制度的作品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张轶东不愿意在狱中虚度二十年。他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忍着饥饿，偷空着手写书，名为《中国与世界文明》。不幸当他写到阿拉伯征服和阿拉伯文化时被人发现，“著书梦”就此被打断。

他算过：二十年是 7300 天，漫长的 7300 天。但是他想：“这个暴政已经持续十二三年了，难道还能再维持二十年吗？”“如果这种暴政要维持到 1990 年的话，那么不仅我张轶东一人，整个中国都要完蛋了。”“毛泽东总不会活到 1990 年 97 岁时才死吧！”“不用等二十年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判我二十年不等于我要在监狱里呆上二十年！”

这个信念支持他活了下来。1976 年 3 月 8 日那天，张轶东站在监舍外目睹了世间罕见的陨石雨。读过许多历史小说的他，隐隐觉得此天文现象有些怪异。这时离他刑满的日子还有整整十四

年。他觉得说不定哪天形势改变，他将会提前出监。九月里，狱中突然公布了毛泽东死去的消息。张轶东一下子就明白了：

“一个历史时代说结束就结束了！”

不过，张轶东在新肇监狱又呆了两年多。直到 1979 年，他才被平反走出监狱，结束了九年多的牢狱生涯。

八十年代张轶东去海参崴时，遇到了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时的一位苏联同学。他委托老同学寻找前妻克拉娃。一九八九年，那位已是苏联著名远东考古学家的老同学给他送去了关于克拉娃的最后消息：几年前五十周岁生日时，她被证实得了癌症。几个月后便去世了。

张轶东说：“在巨大的历史运动中，一个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我可以把自己二十多年来受过的不公正待遇和苦难放在一边。可是虽然暴君死得比克拉娃早十年，我毕竟无法忘怀究竟是谁使我此生终于未能见到克拉娃。”

“结发为妻子，席不暖君床。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这是杜甫诗《新婚别》里的名句。苏联姑娘克拉娃 23 岁时嫁与中国留学生张轶东为妻，不日即开始了“远书归梦两悠悠”的痛苦生活。先是列宁格勒和北京，继而是列宁格勒和绥化。“人事多错迁，与君永相望。”克拉娃痛苦而又短暂的一生，以及张轶东的“一个人的遭遇”，涵盖了一个大时代中的三十年，小半个世纪。这部《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不仅记录了张轶东个人的苦难史，更是毛式“社会主义”的全景录像，为当代中国历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上册

序 幕

我 1931 年出生于南京。我的父亲于 20 世纪 20 年代留学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矿冶系，回国后当了国民党政府上海第三炼钢厂厂长。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工厂搬到重庆。1945 年父亲因患心脏病去世，遗下母亲陈素琳，四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生活的困难可想而知。可能正是家庭社会地位的下降反而促使了孩子们刻苦上进。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二，和大哥先后都进入了重庆清华中学高中。这所中学主要是由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们创办起来的。我在读书中对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比较感兴趣，英文也学得特别好。1947 年，哥哥从清华中学毕业，被免试保送进入清华大学。1948 年我在清华中学才念完高中二年级，就报考了北京大学，并因英语成绩特别优秀被录取入该校历史系。

我是在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垮台前夕来到北京的。这时在清华大学念书的哥哥已经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参加了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读书会。1949 年北京易主，哥哥参军南下，我留在北大，开始学习俄语并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生活是很艰苦的，我靠助学金生活以外，还要设法照顾家庭。因为重庆由中共接管后，母亲失去了在钢铁厂里的工作。弟弟张化声参军了，但是还有一个 8 岁的妹妹辉楠和 6 岁的毛弟（指最后一个）轴材。1950 年 9 月母亲只好把这两个孩子带到北京，住进堂兄因南下而去空着的三间平房里，房子就在故宫东北角旁沙滩一处。他们没有任何收入，只能靠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我的叔叔接济生活。我在学习之余，在中学兼俄语课，或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翻译一些苏联考古学杂志

上的资料以补贴家用。当朝鲜战争的战火燃到鸭绿江边时，许多同学都签名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弟弟张化声也跟随部队去了朝鲜。但是我由于顾虑到自己的家庭和想继续学习而没有签名参军。我在这以后的好几年中为此感到羞耻。

但是北京大学的党组织却注意到了我，因为我学习和社会工作都不错，尤其是俄语学得很好。在 1951 年 7 月已经是放暑假了的一天，一个名叫程贤策，曾经是我在一二年级时的同学，后因当选为北大党委委员而脱产作专职党务干部的，把我找到党委会对我说：

“如果我们要把你派到苏联去学习较长的一段时间，例如七、八年之久，你在家庭方面会有什么困难吗？”

我最初没有敢相信我听到的是怎么一回事，当我弄清楚这意思时就说：

“我当然愿意去了。关于我的母亲，我想我会找出办法的。”

8 月 5 日是星期日，当我早晨正在洗脸时，被通知说立即去党委会。到了党委会又告诉我立即去北京市西城区新皮库胡同教育部。在那里著名的历史学家翁独健和我谈了话，就算是口试了。我在教育部食堂吃过午饭，写了份简历交上去就回家了。第二天又去医院做了体格检查。8 月 9 日中午我又被通知立刻到西郊的燕京大学（即北京大学后来的所在地）报到集中。留学生们在燕京大学集训了几天，办了出国手续，在 8 月 19 日夜离开了北京，于 8 月 30 日早晨到达了莫斯科。1951 年 9 月我进入了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在一年级从头学起。

那时中国人民把苏联人民看作“老大哥”，相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因为俄语较好，就常常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出席各种集会。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在每个集会上，在每一个

发言中，每一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时就会爆发长时间的掌声。或者是全体与会者起立高喊“乌拉！”。在苏联所有高校第一、二年级都有一门最重要、课业负担也不轻的课，叫做“马列主义基础”，其实就是苏共党史。这门课教导我们，斯大林是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和列宁伟大事业的接班人。斯大林是永远正确的，而那些反对他的人都是叛徒。但还是有一些事情使人感到难于理解。例如为什么一批克里姆林宫的医生被作为谋杀者抓了起来，而在斯大林死后又被作为“受到不公正迫害的卓越的苏联科学家”而释放了呢？1953年6月，苏联第二个最有权势的领导人贝利亚突然被揭露为西方的雇佣间谍。当中国学生在自己内部政治学习中提出疑虑时，中国大使馆的党组织总是教导他们说“我们用不着去刨根问底，我们只能相信党”。后来苏联社会中紧张的政治气氛趋向和缓，商店中食品供应渐趋丰富，在报纸和广播中，经常强调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

我的确学习很努力，以为非此无法报答党的信任。有一次大使馆告诉我说，因我在国外学习期间无法照顾母亲，我可以向国内教育部为母亲申请一些生活补助。我很为党的关怀所感动，但是没有提出申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能终生从事于历史研究就是很理想的了。我在二年级的班级论文“7—8世纪中国和阿拉伯的关系”就被评价为接近于毕业论文的水平。我的照片也上了历史系的光荣榜。在大学五年中我共学过32门课程。得过30个五分。在1953年12月26日这一天我考“拜占庭史”这一门课时，第一次得了四分，这是由于那时我选修的专业课太多，几门考试紧挨在一起，造成复习时间不够之故。这一天正好是毛泽东的60岁寿辰，我没有能向领袖生日献礼，反而考了一个四分，为此难过了好几天。次年1月我考“哲学史”这门课时，又得了第二个四分。这是因为那时我已集中精力去写题为

“地理大发现与中国”这一毕业论文而忽视了课程学习之故。

但是周围的苏联人和中国人都承认我是一个学习尖子。我的导师亚历山德娜·狄米特里也芙娜·留布林斯卡娅教授和中国大使馆都在考虑将我留校做研究生。还在二、三年级时，我就是列宁格勒大学中国留学生团支部的负责人之一。1953 年我提出申请入党，列宁格勒大学中国留学生党支部也开始对我进行考察。但是 1954 年国内指示，为了让留学生们在国外期间集中精力于学习，故决定在国外停止发展党员工作。于是我入党的事就被搁置起来了。

在斯大林死后初期，苏联人强调“警惕性”，我这个外国人就得谨慎一些。我有时也参加一些班上苏联共青团员的小组活动，发现这些活动从政治上说还不如自己中国共青团的组织生活来得严肃。据说严肃的政治问题只在苏联党组织的秘密会议上讨论，而这些会议外国人是不能参加的。我听说曾有个叫叶若夫的人干过不少恐怖的事，而现在从监狱里放出了不少人。甚至我所属的历史系中世纪历史教研室，也出现了一个意大利和文艺复兴史专家古科夫斯基教授。我还选修了他所开的关于达芬奇的课程。据说古科夫斯基曾经由于政治原因而蹲了五年监狱。

从 1954 年 9 月起，我就与苏联研究生雅什金和诺维科夫同住一室。有时列宁格勒大学党委和团委会的人也到这间屋来聊天，其中有一位法律系的研究生还是当时列宁格勒大学的党委书记。来聊天的有时还有一些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研究社会科学的研究生。我从他们的谈吐中感觉到苏联的政治生活发生了一些不寻常的变化，尤其是自从苏共 20 大开幕以后。一次波里斯·诺维科夫意味深长地对我说：“第 20 次代表大会是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这是什么意思呢？另一次雅什金让我阅读《真理报》上所发表的南斯拉夫领导人卡德尔所写的关于苏共 20 大的

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强调说必须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学说的原貌，但是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斯大林。我突然间悟到了一些什么，就对雅什金说：

“这篇文章的确很重要！”

“是的”，雅什金点了一下头，然后补充说：

“列宁曾经留下过遗嘱，警告过不要神话一个人。列宁的秘书曾经想毁掉这个份遗嘱，被发现开除党籍了！”

我感到苏联人在开始从各方面把列宁和斯大林区别开来。例如，一次雅什金说列宁肯定了普希金的诗比马雅科夫斯基写得好，可“那一位”（雅什金指的是斯大林）却偏要说马雅科夫斯基是最伟大的诗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第一章 1956 年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在最北方的城市列宁格勒，三月份里还没有出现新绿。诗人普希金是这样描写这里的初春的：

涅瓦河击破冰层，
把冰块涌入大海
它感到春天的来临，
也高兴起来了。

伴随着 1956 年春天到这里的还有另外一种暖流。

列宁格勒大学党委会向全体党员传达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上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大会深夜才结束。东方系的两名研究生沉默无语地经过斯密特中尉桥回到梅特林斯卡娅堤岸街 5 号的学生宿舍。他们中一人是东方系党总支书记尼古拉·雅什金，另一个人则是大学团委书记波里斯·诺维科夫。这座宿舍楼位于涅瓦河将分二股入海处的一侧，与另一侧的冬宫遥遥相对，而在河两股的三角尖上，则有海军博物馆和普希金广场。三角州一面有冬宫桥与冬宫相连。另一面则有斯密特中尉桥与梅特林斯卡娅堤岸街相连接。这样冬宫、海军博物馆和学生宿舍楼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三个角尖。在这三个角尖中，学生宿舍楼可能是最不起眼的了。但是这座楼也有它自己的特点：即这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学生宿舍楼，所有来自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

生都住在这里。不过还有一条规矩是：每间寝室又必须住一名苏联学生，这名苏联学生可能是负有特殊任务的，因为听说有时市公安局外事科会把这样的苏联学生找去询问他同房的外国同学都作过或说过什么。雅什金和诺维科夫都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为了他们学习上的方便，我这个中国留苏学生就被安排在 5 层 136 室和他俩住在一起。

3 月份的这天晚上，我知道雅什金和诺维科夫上哪里和干什么去了，自己就故意睡得很晚，想等他们回来。当他们两个人进屋后雅什金却说：

“我实在是太累了…此外，我现在处于这么一种状态之中，在我的双手上曾有锁链，突然之间这锁链被拿掉了，以致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

这真是骇人听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将获得整个世界而失去的只不过是自己手上的锁链。而现在，在十月革命 39 年之后，一个苏联共产党的总支书记才失去自己手上的锁链！

第二天，这两个俄国人向我详述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那些可怕的事实。这时一位东德的研究生进屋。雅什金提到苏共中央曾劝告出席苏共 20 大的中共代表团团长朱德和法共代表团团长多列士在大会上不要提及斯大林的名字，但是这二人还是没有理解过来。这个德国人说：

“乌布利希可及时明白了事体，他把我党贺词的最后一句口号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学说万岁’，改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

“他可是一个明白人，”雅什金赞许地说道。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列宁格勒大学的所有外国学生都被召集到一个大讲堂里。一位教马列主义的讲师代表校党委走上讲台对

我们说：

“同学们，我们有一个共同任务，即宣读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 20 大上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这一报告的主要内容。”

这“主要内容”宣读不到 40 分钟，还不到报告全文的四分之一，而且主要只是从理论上阐述为什么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错误的等等。我从雅什金和诺维科夫口中已经得知的许多事实，在传达中却完全没有被提到。

一名捷克斯洛伐克的学生从座位上站起来说：

“我们不同意只向我们传达报告的主要内容，我们要听报告的全文！”

这一下就像炸开了锅，外国学生们都七嘴八舌地哄了起来。最后这位马列主义讲师只得说：

“同学们，归根结底，我们毕竟是代表不同国家呀！”

散会后，我在回到宿舍楼大门前对同行的一位本国同学咏诵了一句唐诗：“一将功成万骨枯”。

一些东欧国家的学生偷听“美国之音”，传言说 3 月 10 日《纽约时报》已经发表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全文。据说在斯大林的老家格鲁吉亚发生了暴动。格鲁吉亚人要脱离苏联加入中国。当朱德在特比里西时，格鲁吉亚人的代表要求见朱德，但是朱德拒绝接见他们。后来朱德到列宁格勒来了，并答应和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见面。但由于波兰的贝鲁特 3 月 12 日在参加苏共 20 大后猝然去世，朱德必须赶到华沙去参加贝鲁特的葬礼，于是这次见面又吹了。

4 月初的一天傍晚，当我坐在寝室里吃自己煮的面条晚餐时，一位女学生敲门送来了当天的《真理报》。我突然看见报上刊登了 4 月 5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

的历史经验”，又注释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文章后就把报纸递给雅什金。雅什金读完文章之后说：

“从文章的笔锋看，我感到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亲自执笔的”。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似乎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得到了澄清。在一次中国留学生的会议上，党支部书记传达说中国领导人的观点是：斯大林的贡献占 70%，而错误只占 30%，而毛泽东则从来没有搞过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但是我想起了一次那个东德研究生在他们寝室里说的话：

“问题是斯大林把自己放在了党的上面。”

到底是哪一种解释更确切一些呢？“我自问道。

(2)

7 月 15 日下午，一列“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从苏联后贝加尔车站开进中国边境的满洲里车站，我和另外的 8 名刚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都在这次列车上。我们这时的心情正如杜甫的诗句“青春作伴好还乡！”一样。

我终于被确定留在列宁格勒大学做研究生。我现在是回家过暑假，秋后还得回列宁格勒去。所有同车的中国同学情绪都很好。谁也不怀疑在国内正有一份很好的工作等待他们的到来。据说在北京，在一些单位之间为了争夺留苏回国学生还发生了争吵呢。当我们坐火车穿行于西伯利亚时，我们已经不再对铁路两旁的风光感到好奇，因为五年来我们已经熟悉苏联的风土人情了。我们在火车上还遇到几个刚刚从波兰回国的中国人，就向他们打听波兹南事件是怎么回事。这几个中国人说这是因为波兰矿工要

求增加工资，当局答应了又迟迟不兑现，于是导致了事件爆发。列车进入满洲里以后，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自己国家比苏联人口稠密得多，而且人们穿着得不太好也不太干净。铁路两旁的田野里则是郁郁葱葱的农作物，和西伯利亚的大片绿草大不一样。我对一个学生物的同学叫翟中和的说：

“我看中国过十年就能超过苏联！”

“不行，苏联在工业和科技方面都比我们强得多，而我们的人口又太多了。”翟中和说。

对呀，苏联领导人总是强调说战胜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是按人均收入超过美国，而我国领导人则始终不敢提及这一点。

当火车经过天津后，我的脸上显示出了微笑。我回想起五年前即 1951 年 8 月 30 日上午 9 时在离莫斯科 100 公里的地方，一台电力机车牵引着我们乘坐的列车以每小时 100 公里的速度前进，铁路两旁的房屋就像是一排接着一排倒下去似的情景。10 点正时，列车在“早上好啊，莫斯科城，你这美丽的古城”这一音乐声中，停在了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的月台旁。现在是一台蒸汽机车以每小时 80 公里的速度牵引着列车从天津向北京前进。当列车驶进北京前门车站时，我看见车库里有不少新的蒸汽机车，但是还没有内燃机车或电力机车。这时是 7 月 17 日下午 4 时整。

我透过车厢玻璃窗就看见三弟张化声领着妹妹和毛弟来接我。妹妹辉楠喊叫着跑过来迎接我，毛弟也长高了。当我们从月台走出车站时，我看见前门车站非常拥挤和肮脏，有些妇女坐在地上敞开胸脯给孩子喂奶。我感到心中有些难过。

这个暑假过得很好。我家的生活已经开始好转，但是还有困难。我的大哥 1955 年从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毕业，在中央军委政治学院当上了一名讲师，现在是主要养家糊口的人。弟弟化声从

朝鲜回国后随部队在广西工作。他这次是休假到北京来看他的二哥我和我的女朋友。我在苏联学习时，有时也搞一点写作和翻译寄回国发表，弄点稿费以补贴家用。母亲今年 51 岁，身体健康，还是街道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妹妹辉楠正好初中毕业升入高中，毛弟轴材去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化声的女朋友唐禹民是他中学时代的同学，现为辽宁省本溪一所医科大学的学生。正好到北京来过暑假并和化声见面。家人对我并不是彻底回家而是必须回苏联再学习三年这一情况感到既不高兴却又高兴。化声在结束休假回广西时对我说：“我想三年之后你最终回国时，好的变化将比过去五年大！”

我回家之后几天，母亲领我到沙滩派出所报了三个月的北京临时户口，然后就据此在沙滩粮店里购买了自己这三个月的口粮大米和白面。我对这一切都不熟悉，因为五年前离开北京出国时还没有这些规定。北京市中心这五年来变化似乎并不很大，但是在郊区却出现了不少新楼房，这一点和莫斯科列宁格勒的发展方式也很相似。1951 年时北京大学校本部也在沙滩，我从家到红楼去上课只需要步行五分钟就行了。现在北京大学已经搬到城外原来的燕京大学，即我出国前集训的那个地方。我从家到北大去看母校老师和留校的同学们就得坐公共汽车去了。这些老师和同学对我并非最终归来感到有些失望，因为北大历史系本来都计划好今年秋后就要我任课的。但是他们也承认我回列宁格勒去深造从长远看来是合理的。我的大哥提醒我在和人交谈时，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不要超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的范围发表议论。实际上只有两位教授和我谈到过这一点。杨人梗教授问我是否读到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回答说，只听过列宁格勒大学党委向外国学生所传达的报告的主要内容。另有一位朱庆永教授这时已从北大调到北师大。他在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曾

是国民党中央社驻莫斯科的记者。他告诉我说当他在莫斯科时就曾听说过许多外国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不明不白地失踪和死去。我和旧日师友见面，感觉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即中国的事情办得比苏联好。谁也没有对自己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有什么意见。朱庆永教授说：“我们的领袖是目光远大的。”一次我在北大门口一个饭馆里和齐思和教授一起吃饭时，遇见了当年选送我出国留学的老同学程贤策，他现在仍然是北大党委委员。我和程贤策只来得及互相问好而未能交谈，我没有料到这是我这一生中最后一次看到这个老同学了。

我利用回家期间为自己的副博士论文“地理大发现与中国”收集资料，和一些学者进行了广泛接触。有的教授请我去谈话和吃饭。一个列宁格勒大学的毕业生可是一个宝贝啊！甚至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都接见了，并和我讨论一些历史问题。那位在1956年8月曾经在教育部对我进行口试的翁独健教授，还把1956—1967年12年历史科学发展规划给我看了。我摘录了其中关于发展世界历史研究，尤其是中世纪历史研究的那一部分。我从这个规划中感到自己将在中国历史学，尤其中世纪史研究中起到重大作用，因此感到自己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7月末的一天早晨，我突然被召唤到教育部。到了教育部又告诉我立即到中南海去，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找一些刚从苏联回国的学生，了解苏联高校的现状。我和一位刚从莫斯科某工学院毕业的同学一起，来到府右街的中南海西门。一位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办公室。这办公室位于中南海西岸毛泽东所住丰泽园（当然我当时并不知道）附近大约一百米处。中宣部的有关同志和我们在办公室谈了一上午，他们询问了苏联高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并没有谈到苏共20大和斯大林。谈话后

我们两人在中宣部的食堂里吃了中饭，离开时，沿着碧波涟漪、岸柳依依的中海散了一会步。我回忆起我过去唯一一次的游中南海公园的情景。那是在 1948 年秋天，我从重庆来北京不久，和我的叔父以及堂兄来过一次。那次我们曾一直走到位于中海和南海之交，三面被湖水包围的瀛台。1898 年戊戌政变失败后，光绪皇帝就被囚禁在这里。那一次我们还参观了珍妃井，1900 年慈禧太后从北京逃出时，就是把珍妃推入这个井中淹死的。光绪和珍妃虽仍然是皇帝和妃子，但他们毕竟对旧势力进行了斗争，并为此失去了自己的自由甚至生命。他们还是应该被列入为中国的进步而斗争的人物名单的。相反的，即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但是后来所做的事情并不符合历史的要求，那就难免在自己的传记上留下值得遗憾的一段了。

(3)

我的毛弟轴材，这时正在北师大附中初中二年级，他每天早晨背着书包，先乘 103 路无轨电车从沙滩到府右街，再从府右街乘 14 路公共汽车，顺这条街一直往南到和平门学校所在地上学。放学后则按原路回家，一般下午 6 点钟就能到家。可是在 9 月 15 日这天，轴材差不多到下午将近 7 点钟才回到家，我和母亲都着急了。轴材解释说，当他回来坐 14 路公共汽车经过府右街时，府右街上塞满了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的汽车，14 公共汽车无法通行，以致他回家晚了。

我订的是 10 月 28 日星期天“莫斯科—北京”的车票。在上车前几天，我从报纸上连续读到一些不愉快的消息：在九龙发生反共示威，暴徒们甚至当街轮奸一名护士；英法联军集结于塞浦路斯岛准备攻击埃及。最令人不安的还是在匈牙利发生的事：先

是说伊姆莱·纳吉被任命为总理，匈牙利退出华沙公约，后来又设在布达佩斯发生了反革命暴乱。10月28日登车前吃早饭时，哥哥对我说：“东欧今后是多事之秋，你们在国外关于政治问题谈话要谨慎！”我点了点头。

母亲、叔叔、哥哥，还有妹妹辉楠和毛弟轴材都到前门车站给我送行。列车于10点正离开北京，30日离开满洲里。在每一节车厢里都有收音机喇叭，我能从这些喇叭听到新闻。新闻说匈牙利的情况“愈来愈暗淡。”当列车在西伯利亚穿行时，喇叭广播了“苏联政府关于苏联今后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发展的声明”。这是不是意味着苏联承认它过去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犯过错误呢？同时英法海军和空军也开始轰击埃及领土。当列车进入苏联欧洲部分并越来越接近莫斯科时，我听到匈牙利建立了以扬诺什·卡达尔为首的工农临时革命政府的消息，苏军被邀进入匈牙利。同时英法联军占领了埃及的塞得港。啊，真是祸不单行。

列车是在11月5日上午10时抵达莫斯科的。有一个名叫娜塔莎·吉列霍娃的俄罗斯姑娘在雅罗斯拉夫车站上等着我。娜塔莎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一个学中国考古的五年级学生。她是今年1月寒假期间去列宁格勒时认识我的。那时她到梅特林斯卡娅堤岸街5号的学生宿舍来，想找一个中国学生帮助她读懂一些中文的关于汉代墓葬风俗的资料。我帮助了她并和她混熟了。6月份，我回国在经过莫斯科时又和她见过面。娜塔莎收到我从北京寄来的信，得知我抵达莫斯科的时间，于是到车站来接我，并要求我在莫斯科停留几天，一起过十月革命节。

我们先一起去中国大使馆办了报到手续。我听见大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正和莫斯科某校中国学生会的负责人通话。并指示他们在和波兰以及匈牙利同学谈话时要谨慎些。娜塔莎帮助我获准

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之家”找到一个房间住一星期。接着又有一个俄罗斯姑娘连娜·彼得洛娃参加进来和我们一起玩。连娜和娜塔莎一班，但专业是印度尼西亚历史。她愿意和一个中国学生在一起玩，是因为她已故的父亲彼得洛夫在 1944—1948 年间曾是苏联驻重庆和南京的大使，因此她有一部分少年时代是在中国度过的。三个年青人在莫斯科游逛大街，在北京饭店吃过中国饭。我们参加了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晚会。我因为不会跳舞而不能邀请姑娘们跳而感到尴尬，决心回列宁格勒后学会跳舞。我们还去过莫斯科城外的娜塔莎哥哥那里，在娜塔莎的一个亲戚家吃过饭。但是有一点使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娜塔莎始终没有领我到她家去看自己的父母亲？也始终没有谈及到他们呢？不管怎样，这几天是过得愉快的。11 月 11 日晚上，我登上了去列宁格勒的火车。12 日清晨我回到列宁格勒，从车站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梅特林斯卡娅堤岸街 5 号的那一座老学生宿舍楼。

1951 年我初次来到列宁格勒大学时，全校总共只有 10 名中国学生。我们组成了列宁格勒中国学生会分会下属的一个小组，分会又属于莫斯科中国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指挥。当然各级学生会组织又都是处于同级相应党组织的直接指导之下的。但是到了今年 11 月时，全苏联一共有中国学生一万名以上。列宁格勒大学也有 300 多人，其中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占一半。我报到后被安排在历史系和经济系研究生支部。但是在住宿方面，由于另一个历史系研究生张弓长搬进 136 室，与雅什金和诺维科夫同住，我就被安排进了六楼的 167 号房间，与两名地理系的研究生同住。这两个人中一个是朝鲜人朴某，另一个是中国人黄锡畴。可能是苏共 20 大，尤其是匈牙利事件以后，苏联放松了对于外国人的控制，三个外国人住在一间屋里也行了。这时匈牙利事件已被镇

压下去，英法对埃及的干涉则以失败告终。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波兰姑娘在 6 层楼梯口和几个俄国人窃窃私语。我只听到那个波兰姑娘的最后一句话是：“这一切我一直到现在才能说”。

大使馆对于中国学生的管束方面也出现了两个变化。一个是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恢复了。有趣的是，同时有两个党支部要我在他们的那个党支部办理入党事宜。一个是我所属的支部，党小组长就是那个张弓长，于是党支部决定恢复从 1953 年开始对我的审查。但是历史系的本科学生支部的负责人张椿年却对我说：“我以为你的入党问题最好拿到我们支部来解决！”“啊，我变成一个香饽饽了！”我想道。

另一个变化就是允许和外国人谈恋爱了。当我 1951 年初次来到苏联时，留学生和本国人外国人谈恋爱都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和外国人谈恋爱的原因是，苏联法律不允许苏联公民和外国人结婚。不允许中国人之间谈恋爱的理由是，留学生在学习期间必须集中精力学习。但后来有人抗议说，不允许谈恋爱是违反自然的，于是 1954 年关于中国人之间谈恋爱的禁令被废除了。差不多同时苏联当局也废止了关于苏联公民和外国人结婚的禁令。不过中国方面仍然保持这一禁令，并解释说：这是由于两国生活水平差距大，这种婚姻往往结局不好。虽然如此，还是出现了不少中国学生和苏联学生谈恋爱的情况。于是今年秋天，正当我回国度假时，中国方面也废除了留学生和外国同学之间谈恋爱的禁令。但是大使馆向中国学生强调说，和外国同学谈恋爱的事，虽然不被禁止，但也不受鼓励。

我是在兄弟堆中长大的，只有一个妹妹。我从小很少和女同学接触，一接触女同学就脸红。我 17 岁时第一次读《红楼梦》，开始感到人间有一种什么叫爱情之类的东西。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同班的女同学都比我大，我却一心只想学得出色，毕业

后能有一份好的工作。1953 年秋在列宁格勒大学三年级时，国内来了一个名叫王小曼的女同学进了历史系一年级。这个姑娘也是 1931 年出生的，上海人。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念过一年，又被选派到苏联改学历史。王小曼是一个瘦弱的姑娘，戴着一副眼镜，拖着一对辫子。说话声音有些沙哑。她之所以吸引了我，是因为她在谈话中显出她的文学知识比较丰富。有一段时间，我心里老是想着这个王小曼，又害怕这样下去会影响自己的学习。后来我给王小曼写了一封表达自己感情的信却又不敢把信给她。我缺乏勇气的主要原因其实是：王小曼是一个党员而我却还是一个团员，如果是相反的情况，我或许就敢把这封信送给王小曼了。中国传统是男方应该比女方各方面高一些，我不愿意使自己成为笑料，于是这封求爱信就在抽屉里整整躺了两年。最后 1955 年秋天，我发现王小曼和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学生会主席来往频繁，而这个学生会主席又是一名党员。我自知不敌，决心停止一切这方面的活动。这场柏拉图式的恋爱的结束使我浑身无力地在床上躺了一天。但后来王小曼和那个党员之间的关系没有发展下去，而我这个学习尖子在 1956 年的形势下却很受重视，王小曼于是主动对我发动了进攻。但是到五月份时，王小曼因为患神经衰弱症到里加城外的一个疗养院养病去了。我回北京度假前曾经收到一封她从那里寄来的信。现在我再回到列宁格勒大学做研究生时，王小曼却又因神经衰弱加重，无法继续学习而退学回国了。我这时已有 25 岁，的确希望有个女朋友了，而且希望在三年的研究生学习期满后能有个家庭。现在和我接触的只有一个学中国考古的俄罗斯姑娘娜塔莎，她明年就要从莫斯科大学毕业了，或许……。

我是在 1956 年 10 月 30 日那天再次进入苏联领土的，我三年研究生的学习期就从这天算起，应该是在 1959 年 10 月 30 日

结束。我需要呈交一份三年学习计划。研究生的学习制度通常是：第一年有四门考试（哲学、外语和两门专业课），后两年就是写学位论文，论文需要在结业前在系学术委员会上答辩。如答辩通过则被授予副博士学位。我上交的计划也就是在 1957 年 11 月前完成四门考试，而我的学位论文则是我的毕业论文“地理大发现与中国”的继续，应该在 1959 年 10 月底以前答辩。中世纪历史研究室和我的导师留布林斯卡娅教授都同意了这个学习计划。外语考试我想考英语，但是学校研究生处认为我既然是一个外国人，外语考试就必须考俄语。我服从了这一要求，在新年之前轻而易举的考了一个五分。同时我开始听哲学系为研究生设的哲学讨论课和中世纪研究室开设的专业课。

在 12 月里，涅瓦河上的冰冻得很结实，从宿舍去上课不用在斯密勒中尉桥上走过，而是出宿舍楼大门过街后，直接下到涅瓦河的冰上，沿着人们踩出来的这条冰雪道直接过河。河对岸上岸后的第一所建筑物是一个经济研究所，据说在 20 世纪 30 年代，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在这里工作过。在这座楼后不远的一座黄色楼就是我上课的地方。这是一所正方而中空的三层楼。一楼是门厅、小食部和一些系的阅览室。有一面是学校医院门诊部，门朝外开。二楼是历史系、经济系和军训教研室，三楼是法律系和哲学系。据说早在 19 世纪末，列宁就是在三楼法律系考试并获得法学学士学位的。大约十多年后，未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这个系学习毕业。因此我可以因自己也算是两个世纪俄罗斯领导人的同学而自豪。我已经在这个楼里学习了五年，熟悉了自己系和教研室里的人们。这些人认为我是个高材生，也很看重我，有时还和我商量一些其他中国学生学习中出现的问题。历史系成了我的一个安乐窝，我觉得在这里很好办事。

但是我感到我和自己支部的那些中国研究生之间却不大好

处。这些人既不同于我的苏联同僚们，也不同于我做本科生时的那些中国学生们。在我所属的支部里，共有 12 名研究生。其中只有我一人是从苏联高校毕业留校的，其他的或是从中国某一高校毕业，或是在中国并没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杨光远、程西筠和张弓长三人是 1955 年 9 月来到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他们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在党组织内还各人负有一定的责任。张弓长是从辽宁大学来的，而另外两人是从中国人民大学来的。程西筠是一个 27 岁的女人，已经有三个孩子。他们的学习期限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张弓长老是强调他有病不能学习。杨光远和程西筠总算考完了俄语和一门专业课考试。程西筠考世界近代史的成绩是三分。

这一情况引起了学校当局的不满。我记得，当我和雅什金以及诺维科夫住在一间寝室里时，一次雅什金对我说：“你们怎么能把这样的研究生派到我们这里来呢？你们是在和我们的研究生教育开玩笑吗？”当时我因为还没有和这些研究生在一个支部，也就没有十分注意这件事。但是到 12 月时，从国内又派来了三名新的历史研究生，他们的情况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孙继志是个团员，甘肃师范学院毕业，竟说美国的首都是纽约！而瑞士的首都是日内瓦！杨增麒也是一个团员，上海师范大学毕业。一天大约只能读三页俄文教科书而毫不着急。孙继志和杨增麒二人在同一间寝室里。两人之间总是为一些琐事而不断争吵。曾宪廷是一个党员，已经 30 岁，出国前还是东北师范大学的马列主义讲师。这时国内只有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是五年制，而其他大学都是四年制。比苏联大学历史系普遍短一年。虽然国内大学毕业生出国做研究生给的是四年学习时间，比我多一年以便他们先学一年俄语，但苏联和中国大学在历史系课程结构上还有很大的不同。

在中国大学历史系中，有关中国历史的课程所占的比例很

大，而在苏联大学历史系中，当然是苏联历史的课程所占的比例大。因此，一个中国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到苏联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不刻苦努力是很难完成学习任务的。这和以自然科学为专业的研究生相比是不同的。例如：中国大学和苏联大学生物系的课程设置都差不多，一个中国大学生物系的毕业生到苏联大学生物系做研究生，只要俄语过关就行了。可是，杨增麒等人根本不刻苦学习，经常花去不少时间游逛或做中国饭吃。经济系也来了五个中国研究生，他们的情况比较那几个历史系研究生的情况好不了多少。我因为本校老生，熟悉情况，就被选举为（实际上是党组织所指定的）这 12 个研究生的学生会小组长。我的任务是按月收会费，管一些生活琐事，有时也得管一管他们的业务学习。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有效地帮助他们的学习，因为帮助学习并不是代替他们学习呀。

曾宪廷还对他被分派到列宁格勒大学而不是莫斯科大学感到不满。这个人在金钱上是锱铢必较的。在新年前夕，学生会要求每人交 5 个卢布筹备过除夕，我当时没有找到曾宪廷就代他交了 5 个卢布。曾宪廷事后不但不还钱，还责怪我没有事前和他商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真感到奇怪了。

中国学生中有两个人和我接触较多。一个是党小组长和我的入党联系人张弓长。张弓长告诉我说，十月份当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全会时，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不经邀请就飞到华沙，在机场无人接待，就灰溜溜的回莫斯科了。苏联人把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派去当波兰的国防部长，现在华西列夫斯基也只好辞职了。

南斯拉夫的铁托表现得最为有趣：五月份他在莫斯科参谒列宁和斯大林墓时，只给列宁送了一个花圈，给斯大林啥也没送。铁托最近发表了一篇演说，批评苏联武装干涉匈牙利。这篇演说使得苏联人非常恼火，我过去的同屋人雅什金也骂铁托是“政治

妓女”。张弓长也说，在中国同学中有人已经认为不能全面向苏联学习了。张弓长是东北人，他说 1945 年苏联军队占领东北期间的确干过不少抢劫和强奸的事。有一次，张弓长神秘地说：“现在有一个问题：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问题！”不过张弓长的确真的有病不能学习了，终于在 12 月底退学回国。他在临走时并没有告诉我谁继续担任我的入党联系人。

地理系研究生黄锡畴已经 30 岁了，但还是一个共青团员。他是 1954 年秋天来到列宁格勒大学的。今年夏天，他也曾回国度假暑假。和我不同的是我只在北京呆了三个月，而黄锡畴则是到了安徽的一个城市，因为他的爱人在那里是一名护士。他说他亲眼看到当地人民生活很困苦，而干部们则非常蛮横无知。有一个地方领导干部甚至弄不懂“八”和“第八”之间的区别，用教训的口吻对下属说：“你们一定要学好八个大文件，”其实是中共八大的文件。黄锡畴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个大问题，而领导人忽视人口问题是一件糟糕的事。他并不认为中国的事情办得比苏联好。

一天早晨，我被通知到斯莫尔尼宫去听彭真作报告。当我到达那里时，报告已经开始了。列宁格勒全市的中国学生都在那里。彭真是一个大高个，声音低沉。他是率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访问东欧诸国之后，回国途经列宁格勒的。我对彭真所说的关于东欧的事并没有注意，但对于他所说的国内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这一论点有较深的印象。啊，过去五年来国内运动不断，在中国学生中也是思想检查不断。今后生活总能轻松一些了吧！

12 月 30 日早晨，在考完俄语后，我到一处澡堂去洗澡。当我洗完澡正在穿衣服时，就听见澡堂更衣室的广播喇叭在大声播送一篇文章。一直到我回到宿舍时，寝室里的喇叭还在继续播送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强调说斯大林的错误完全是出于他个人的缺

点，而与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关系。文章好像在和铁托争论什么，并出现了“修正主义”这一名词。最后喇叭宣称：刚才播送的是中国《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这些天有趣的读物真多。在第二天 12 月 31 日和第三天，已经是 1957 年 1 月 1 日，我从《真理报》上读到了肖洛霍夫所写的“一个人的遭遇”。我还不知道他今后的遭遇也不会比他自己笔下的那个索科洛夫更好。而我那“苦难的历程”则将比阿里克赛·托尔斯泰小说主人公们的苦难历程更加漫长。

第二章 1957年 香饽饽不香了

(1)

新年以后，我从六楼的 167 室搬到五楼的 135 室，这间房里住的也是三个人：我、一个学生物的研究生姚德昌和一个即将毕业的学文学的东德研究生。这个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题目是关于阿历克赛·托尔斯泰的。有一次收音机广播说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参观列宁和斯大林墓，给斯大林花圈上的题词是“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这个东德研究生听后改正说“献给伟大的恶棍”。

1 月 7 日晚上，我在列宁格勒的莫斯科车站上接来了娜塔莎，娜塔莎再来列宁格勒是为她的毕业论文“汉代的丧葬习俗”收集资料。她在列宁格勒呆了一个寒假，三月初才回莫斯科。但是作为本国学生，娜塔莎不能住在梅特林斯卡娅堤岸街五号外国学生宿舍。这样娜塔莎就寄居在列宁格勒大学的另一处宿舍里，她几乎每天都到我这里请我帮她阅读和翻译一些中文资料。有时我们是在位于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旁的苏联科学院图书馆，或者是位于市中心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图书馆里见面。这两所图书馆都各有一处中文阅览室，这样逐渐就有许多中国学生知道我有一个苏联女朋友，并因此为我后来种下了祸根。

我们在一起工作几天后，娜塔莎就提出她毕业后的工作问题，她很想到中国去，并问我有没有办法帮助她。我当然理解她的这种愿望，就说：“我认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所长夏鼎，我可以写信给他试一试。”我真的立刻给夏鼎写了一封推荐

信，在信中叙述了娜塔莎的学历，并推荐她到考古研究所工作。我还说如果有一个苏联同志在该所工作，对于中国方面了解苏联考古学的发展也有帮助。

这时中苏之间的通讯非常方便，不到两周我就收到了夏鼎的回信。夏鼎说娜塔莎·吉列霍娃同志希望到中国来工作是一件好事，但是目前还没有这样做的办事渠道。因为中国的考古研究所无权向莫斯科大学指名索要一名毕业生，唯一的办法是让娜塔莎作为苏联派遣的研究生前来中国，一旦娜塔莎到了中国，考古研究所就可以向她提供协助。我口头上把夏鼎的信翻译给娜塔莎听了，并问娜塔莎有否可能作为研究生被派遣到中国。娜塔莎的脸色变得黯淡了，她自言自语地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之后就对我说：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告诉你，你记得 1937 年吗？”

1937 年！这不是抗日战争开始的那一年吗？但是这和苏联有什么关系呢？不，她说的不是这个，突然间我明白了“啊，布哈林和图哈切夫斯基案件！”

“是的”娜塔莎说道，接着她就告诉我自己的身世：她 1934 年出生于萨拉托夫市，她的父母都是党务工作者，后来全家搬到了莫斯科。在 1937 年的大镇压中她的父母都突然被捕，从此再也没有音信，当然随着父母被捕，她也失去了在莫斯科的住房。娜塔莎是被一位历史学者潘克拉托娃抚养长大的。许多人都知道这位潘克拉托娃院士，因为她编的三卷中学课本《苏联历史》在建国初期就被译成中文了。娜塔莎说斯大林死后她的父母亲被恢复了名誉，但是并没有归来，显然他们已经死了，可能已经死去多年了。苏共 20 大以后，她的“保护人”潘克拉托娃许愿说，如果今后由于她的家史给她的前途带来什么麻烦，就可以找她出来说话，但是要获得一个出国留学名额，毕竟太复杂了。

啊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现在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上万，每年继续派来的人也上千，我知道在中国留苏学生中有前国民党官员或者民族资本家的子女，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留学生的父母是被人民政权处决（哪怕是误斩）了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苏联每年最多只能派几百名留学生到中国，政治审查必然很严格。不行，根本不可能有娜塔莎的份儿！

我觉得娜塔莎在学习中对时间抓得不太紧，她老是依赖我的帮助，而我自己因为准备“欧洲资本主义萌芽”一课的考试也得读不少书，我们每次一起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时，大门一开我就赶到中文阅览室去占两个座位，而娜塔莎则匆匆忙忙地赶到期刊阅览室去借一本新出版的《新世界》杂志，如果晚一步杂志就被另一读者借走了。在中文阅览室里，每当我忙于自己的阅读时，娜塔莎不是独立的拿着字典阅读她的论文资料，而是全神贯注地阅读那本《新世界》。直到我腾出功夫，口头为她将中文的论文资料译成俄文，她才把俄文译文笔录下来，最后一次休息时间，我们一块儿在图书馆小吃部里喝茶时，我忍不住对娜塔莎说：

“我对你的帮助只能起辅助作用，你要写好毕业论文主要得靠自己努力干，在我忙的时候，你可以拿着字典先看看中文材料而不是老等着我嘛！”

娜塔莎说：“我懂得你的意思，但这本小说的确是太有趣了，我实在没法不去读它”。

“这是一本什么小说？”

“书名叫《不仅仅是为了面包》”。

后来我从同屋那个研究文学的东德研究生那里得知，作家弗拉基米尔·杜金斯基的《不仅仅是为了面包》一书，描写的是苏维埃社会中的官僚主义，并且引起了风波。在莫斯科大学的一个

讨论会上，学生们甚至对党务官员们起哄。我得知这一切之后，自己也想读读这一本书，但是因为我的时间太紧，书也不容易借到，终于没有读成。

娜塔莎在三月初回莫斯科去了。三月末，我感觉已准备好应试“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课程，就和留布林斯卡娅教授确定了考试时间，可是那一天当我来到教研室时，留布林斯卡娅教授却对我说：

“张轶东，你的考试只好延期了，因为潘克拉托娃院士去世了，我必须马上赶到莫斯科去参加她的葬礼。”

完了，“保护人”死了，娜塔莎去中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消失了。我给娜塔莎寄去了一封信表示哀悼，娜塔莎也给我来过几封信。四月末她来信说，她的毕业论文在答辩时引起了与会者很大的兴趣，并获得了五分，但是娜塔莎并没有说毕业后她将去哪里工作。

那位研究文学的东德研究生，也顺利地通过了论文答辩，获得副博士学位并回国了，于是另一个姓谭的研究生物的中国研究生搬进了第 135 号房间，一间屋住着三个中国人：我、姚德昌和谭。这几乎就是在中国过日子了！我还订了一份《人民日报》。一般是在北京出版三天之后就能到手，这三个人有时就能在一起谈谈国内形势。

从三月开始，我常常和历史系一个叫洪肇龙的中国学生一块去参加校内或市内的学生晚会，目的是学跳舞。他逐渐学会了跳狐步、探戈、华尔兹舞。我还买票去听系统的西欧音乐史讲座，这是由列宁格勒音乐学院主办的，一直延续到 1957 年底。每个星期三晚上，先是讲述从巴赫和莫扎特直至威尔第和格里格这些音乐家之一的生平 and 创作，然后就提供一个由该音乐家作品组成的音乐会。这个音乐系列讲座使西方古典音乐成为我一生中的主

要爱好。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这样的作品几乎成了我在困难时期的精神支柱。

历史、经济、语文和地理四个系的研究生总共有十名共青团员，组成一个团支部，这个团支部的书记是地理系的黄锡畴。在这个支部里我遇见两件事：一件愉快的事和一件不愉快的事。愉快的事是：这个团支部被分得一个出席 7—8 月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名额，我当选了。

但是接着我又遇到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根据团章，团员必须是年龄在 25 岁以下，超过这年龄团籍最多只能保留到 28 岁。现在这个团支部的绝大多数团员包括我自己年龄都已超过了 25 岁，而团支部书记黄锡畴则快 30 岁了，这样这些团员的政治前途就只可能是下述二者之一：要么是入党，要么是完全变成一个党外人士。当然每一个人都愿意选择前者，这就要求这个人在政治上更为进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这就成了三月末一天晚上一次团支部会上的议程。党支部组织委员学经济的研究生王启荣也参加了这个团支部会，在讨论中杨增麒、孙继志和 1956 年来到的一些研究生都强调说，要成为一名党员就必须背叛自己原来的阶级。这一说法使我感到困惑，于是我发言说：

“我不懂得我们应该背叛谁。我们现在是什么财产也没有的人。农民还有两亩土地，而我们连这个也没有。我们应该作什么是应该根据时代的要求而定。当前中国的历史任务是消除国家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落后。我们是被派来学习的。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自己专业方面的专家。”

这下引起了他们对于我的群起而攻之，人们都说学专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进步”。一个学文学的研究生何天成挖苦我说，你是在显耀自己“将成为一个科学家”。讨论结束时书记黄锡畴邀请列席的王启荣讲话，王启荣并没有说争论哪一方是正

确的，只是说这种讨论可以继续下去，接着王启荣又谈党支部关于吸收新党员的打算。他说党支部曾经考虑过这个共青团支部中的某一个同志，但是认为这个同志只是业务上学得好，政治上并不进步。所以…

啊，这说是不是我吗？这就是党支部对我的评价了！我这回明白了，为什么张弓长退学回国后党支部没有告诉我谁是我的入党联系人。在这次团支部会上的争论之后，我也感觉到新来的研究生们在窃窃私语，说是像我这种在苏联呆过几年的学生在政治上都比较落后，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这几年国内的政治运动，而且受到了苏联人自由主义的影响。

在 1949 年后的学生生活中我得出一个规律，即当同学在专业学习中无法和你竞争时，就要指责你在政治上落后了。但是这个“政治进步”到底是什么呢？那就是你必须不断地大喊大叫一些政治口号，你必须不断严厉谴责自己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就像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涕地忏悔一样。在前几年我真的以为这是一条使自己成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但是在 1956 年初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之后，尤其是苏共 20 大之后，这种衡量学生的标准似乎不太明显了，而在整个 1956 年中，我在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学生中都是一个香饽饽。现在王启荣在团部会上的讲话透露出这种衡量人的标准依然存在，我这个香饽饽还被咬了一口，已经变得不香了。

“难道中国人都是唐吉珂德先生吗？”我自问道。

但是我并没有注意到，在十六世纪时唐吉珂德只是单枪匹马地在和风车战斗，现在在列宁格勒大学，“风车”只有我一个，而唐吉珂德们则是成群结队的！他们其实也只不过是长期革命战争和社会运动所带来的那个巨大副产品中一个小小的切片而已。群众运动大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但也造出了大量只能靠“运

动”而生活的人们。马克思主义是根据一个人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他的阶级属性。巴甫洛夫也有一个相似的理论，即人的思维是由他如何取得生活资料而决定的。如果说在中国社会改革完成后，出现了一个新的“运动派”阶级，这个说法其实并非夸大。虽然把“运动派”阶级说成了社会阶级并不科学，但是这样说比较容易使人理解他们在 1956 年以后，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巨大影响和力量。只要是革命运动，就需要有一些人被推翻或被斗争。“运动派”们就是靠这些被斗争者而过活的。如果中共八大的政治路线得到认真执行，“运动派”的队伍就会经过竞争而不断地被削弱。但是作为一个在党内和社会上已取得地位和利益的势力，他们是不可能给客观的历史趋势让路的。这个势力的确是如此强大，以致能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达 20 年之久。中国共产党的后人总是在谈二十年左倾的作用时，列举一大堆现象，就是不谈社会根源，即这种中国式的“帕金森”症。

1953 年在《中世纪史》这门课中，留布林斯娅教授在 16 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一讲题中说，15 世纪末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由于在经济上没有准备好迎接伟大的地理发现，结果他们虽然是发现者，本身却未能得益于这些发现。真正得益于伟大的地理发现的国家都是在此前自身内部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因素的，例如荷兰，而尤其是英国。这就是说一个国家本身不具备一些主观因素，它也不能抓紧利用来自外部的发展机遇。我在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地理大发现与中国”写到结论部分时，也深刻地相信了这一道理。明朝时中国的经济与文化发展水平并不低于欧洲。虽然欧洲人实现了地理大发现，这些发现也给了中国可以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俄罗斯等欧洲国家先后接触的机会。许多华侨前往东南亚并在该处定居。传教士来到明朝皇帝的宫廷，并带来一些当时欧洲的科技成果。在东南沿海诸省出现了资

本主义萌芽。所以世界历史还是同样地给过中国一个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机会的，但是明帝国的统治者并不会利用这个机遇。17 世纪中叶的满族征服中国，又曾给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带来巨大破坏。清朝统治者执行的则是闭关政策。虽然到 18 世纪末中国经济得以恢复，清朝重新成为一个大帝国，封建的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英国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得无法消弥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把中国推上了长达一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

可能 1956 年以后的世界历史正在第二次给予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机会。过去的教训指出了反对中国人民实现现代化的那种势力有多大。这种反对势力在世界历史上从来都是不小的。任何人只要想想在 18 世纪初俄国实现现代化时彼得大帝甚至把自己那个反对改革的儿子阿历克赛处死，就会同意这点了。在 1957 年初时，我的周围虽然出现了一大批唐吉珂德先生，我仍然感到自己是处于上风的，因为中共八大已经确定了国家现代化的路线，那么党就会保护那些专心致志于学习专业的人。斯大林曾经说彼得大帝和列宁比起来只不过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毛主席则是一个中国的列宁加斯大林，谁会认为他不是站在现代化的一边呢？

四月份我不得不第二次推迟应试“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课程，因为我患了重感冒。我曾读过刊登于 3 月 24 日《人民日报》上费孝通所写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不过印象并不深刻。我迎接 1957 年春天的心情正如六世纪“邱迟致陈伯之书”中所描述的那样：“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蝇乱飞”，我身在异国，也有点“念故国之旗鼓”了。我忘记了冬天从来都不会是高高高兴兴地离去的，有时候春寒很厉害，于是一些盲目乐观的人就吃亏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在 1957 年中国的政治气候中，一股强大的寒流正在形成并即将来临。

(2)

一天下午我正在宿舍里躺在床上养病，听见走廊上一些中国学生说他们方才开完会回来。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晚上我所属的党支部书记杨光远来看我，向我简述了所听到传达的内容。我听后并不感觉新鲜，也不十分兴奋。我问杨光远说：“毛主席关于人口问题说了一些什么呢？”

“他提到了人口问题。”杨光远回答说，但是他却回答不出什么样具体的东西，因为他自己并不注意这个。

“我以为人口问题是我们国家的头号问题，”我说。杨光远笑了一下，也没有说什么。

五月中旬我顺利地考了“欧洲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课程，得了一个五分。下门考试是“葡萄牙中世纪史”。这一门课比前一门要容易些，留布林斯卡娅教授并且从我自拟的阅读书目中删去了一些读物。这样我估计只用一个月准备就能应试了，我的确在六月末就考完了这门课，并得了一个五分。

我从《人民日报》上得知国内开始了整风运动。我对于整风运动的理解只不过是党组织和党员提意见而已。的确有一天晚上我被找去参加一个座谈会，内容是对大使馆的工作提意见。我根本不知道大使馆的工作情况，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只能说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应该增加一些工作人员，这样就可以经常有人跑跑莫斯科以外的其他城市，帮助解决外城留学生中的问题。但是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对于党组织愈来愈尖锐的批评。使我感到惊吓的是北京人民大学一个叫葛佩琦的讲师竟声称人民会像在匈牙利事件中那样杀共产党人。另一个讲师王德周说：“闹事可以架机关枪，但这些机关枪也可以调过来打。”对

于储安平说的“党天下”、章伯钧说的“政治设计院”和罗隆基说的“平反委员会”、章乃器说的“定息二十年一次付清”等，我都没有很注意，因为我脱离中国社会的生活毕竟已经有六年之久了。不过我对于一些嘲讽不学无术的党员的文章却很感兴趣。例如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在一篇杂文中说，现在出现了两个诗歌的新流派，歌德派和但丁（但知盯住领导党员）派。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药眠说，有些党员“不甚读书，靠党吃饭”。我感觉即使在这里，在列宁格勒大学中国留学生中，也有一些像黄药眠描写的那种人。

从六月初起我从《人民日报》上读到“右派分子”这个名词，接着就有一篇接一篇发表的反对他们的社论。我感到腔调变了，不过我认为，批评五月份里出现过的一些胡言乱语还是应该的。六月末考完“葡萄牙中世纪史”以后，我开始准备最后一门考试——哲学。这门考试比较难，我打算准备到十月末再考。暑假已开始，有的留学生被允许回家度假，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对国内的家人进行一些经济上的帮助，而家中这时也的确有一些困难。从家信中得知妹妹辉楠因为用功过度而患了结核。正好在这时母亲、妹妹和弟弟在沙滩所住的房子被房主堂嫂（堂兄几年前去贵州省而故于当地）卖了，他们只好搬到北京东郊国棉二厂宿舍幺婶那里去住。我的三弟张化声在广西桂林市结婚了，爱人就是我在去年在北京见到的医学院学生唐禹民，她大学毕业后也被分配到广西工作。我的大哥是主要养家糊口的人，已经 27 岁了，却没钱交女朋友，更谈不上结婚了。我现在每月有七百卢布的助学金，比做本科大学生时要多二百卢布。如果我继续保持大学生的生活水平，每个月就可以省下二百卢布。我也的确是这么干的，因此也就攒下了一些钱。我用这些钱买了一台“记录”牌收音机和一些奶粉，并委托几位回国度假的同学带回家去了。

七月中旬，第六次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开幕。为了使自己跳舞能更熟练一些，我参加市内的大学生舞会就更频繁一些，更多的是到基洛夫中央文化休息公园去参加露天舞会。在这些舞会中我逐渐听熟了一些歌曲，像索罗维耶夫·谢多伊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乌拉尔民歌“山楂树”。许多年后我仍然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什么也不要，只要再听一听这些歌曲，希望在这些歌声中能忘记自己的一切不幸遭遇。

一天晚上我回到宿舍时，地理研究生黄锡畴走进我的房间问我说：

“你知道苏共最近发生了大事吗？”

“我不知道，我刚才跳舞回来。”我回答。

黄锡畴简略地说，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垮台了。

第二天早晨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了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关于马林科夫、卡岗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据说在赫鲁晓夫访问芬兰期间，他们想乘机推翻赫鲁晓夫，并推举莫洛托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但是他们失败了。

这的确是一个不平凡的夏天。在社会主义阵营两个最大的国家里，各自实现了一场伟大的演习：在苏联是推翻赫鲁晓夫的失败尝试，但是却为 1964 年做到这一点进行了演习；在中国是反右运动造成的大劫难，这也为 1966 年的“文化大革命”进行了预演。

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代表队于 7 月 10 日早晨抵达莫斯科，被安排在离农业展览馆不远的奥斯坦金诺旅馆里。整个中国青年代表团有将近 800 人，分成四个大队：管理服务大队、体育大队、文艺队和一般代表大队。一般代表大队大约有二百人，其中只有七名是直接来自中国的学生，其他的全是留苏学生。这样做的原因是可以节约旅费和服装费。这

些一般代表又分成四个大组，以便和来自世界各国的青年交往：社会主义国家组、西欧北美组、亚洲组和拉美非洲大洋洲组。我因为懂得英语就被分配到西欧北美组。

在西欧北美组的预备会议上，代表们被告知，在与来自资本主义国家青年相遇时，和他们主要是谈论生活习俗和文化，不要主动去谈政治方面的问题。另外还交代说对以色列的青年要适当冷淡一些。这显然是和去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有关。我参加了与法国、英国和挪威青年的三次会见，在会见中我根据上面的指示精神行事。一天下午我在街上遇见一位希腊姑娘迷路了，就送她回旅馆。这个希腊姑娘说：莫斯科只不过是一个大农村而已。一次我被派去参加世界各国大学历史系学生代表的总论坛，在这个集会上意外遇到了列娜·彼得洛娃。列娜告诉我，娜塔莎参加一个考古队到西伯利亚去了，现在不在莫斯科。我在莫斯科还遇到了 1952—1955 年间的同屋同学，苏共党员波里斯·波诺金。波诺金是学中国历史的，1955 年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毕业。他现在是莫斯科东北伊万诺沃州的共青团州委第一书记，这次率领伊万诺沃州青年代表团前来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波诺金邀请我在联欢节结束后随他到伊万诺沃州去。我说因为我是跟随列宁格勒中国学生代表队集体来到莫斯科的，就得跟随这个代表队集体回列宁格勒。我们商定了 1958 年我将到伊万诺沃市波诺金家去一趟。西欧北美组在与美国青年代表团会见前一天，开了一整天的预备会议，我这天正好和列娜去公园而未能参加预备会议，于是失去了这次与美国青年会见的机会，因而也不知道预备会议上告知的那些注意事项。联欢节结束后，有数十名美国青年被邀请访问中国，其中有一个因为在满洲里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交验护照而被拒绝入境。在北京，周恩来曾接见这数十名美国青年。这是 14 年后（1971 年）那场“乒乓外交”的预演。

外城留学生在莫斯科停留期间，听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国青年代表团团长胡耀邦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向他们作的谈话。胡耀邦和刘晓都说反右派斗争对每一个青年学生都是政治立场方面的考验。他们都说中国共产党拥护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决议。有些留学生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问题，胡耀邦反问道：“苏联有原子弹和氢弹。我们有什么呢？我们有……鸡蛋，鸭蛋！”这就是说，中国没有当这个头头的资本。刘晓在他的谈话末尾还提到一件事，即他不同意中苏学生之间婚姻，因为两国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一个中国学生领一个苏联老婆回家去，会遇到许多困难。

当我和其他外城学生代表登上火车返回所在的城市时，这些城市中国学生党支部的书记们也正好登上车朝莫斯科而来。他们是奉大使馆之召唤，集中于莫斯科进行一次预备性的政治学习，以便回到自己所在城市组织全体留学生进行这么一次学习。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的这次政治学习开始于八月初。这时新学年即将开始，回国度假的那些学生也都先后回来了。有一个学考古的名叫崔承瑶的本科学生对我描述了他暑假期间在北京大学看见的反右派斗争的情景：一个右派学生在讲台上一动不动地躺着，周围的学生们在大喊口号。一次我在厨房里煮面条时，听见一位进修数学的赵教授说什么忽视政治就会变成右派分子，这使我感到一种什么苗头正在出现。

八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早晨，列宁格勒的全体中国留学生都聚集在列宁格勒建筑学院礼堂，听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副处长钱其琛作政治报告。钱其琛在报告中问道：“留学生中有没有右派？”他自己回答说：“左、中、右三翼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接着他又问第二个问题：“留学生中有没有右派分子？”他自己又回答说：“这个我们没有进行了解，不敢说有，也不敢

说没有。”

学习的第二阶段就是在各个支部里进行讨论。在历史系和经济系研究生支部里，我感觉那些研究生在反右派斗争开始之后都变得活跃起来了。暑假曾经回家的曾宪廷说，成为右派分子的学生都是忽视政治的。有些人曾经因为忽视政治受过批评，就想利用整风运动来反击党组织，于是真的成为右派分子了。虽然这个学习不合乎我的口味，我这时还没有感到什么政治压力。但是也不得不批判一下右派分子的论点。我就选择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一个名叫谭天荣的右派学生作为批判对象，说：“我没有读到谭天荣文章的原文，但是我认为他的历史观点是肤浅和错误的。”

政治学习的第三阶段是决定性的，即每个人都要系统总结一下自己对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认识。这个总结必须经过支部会议讨论和通过，然后由党支部对于该人评价的基础上作出关于他（她）1956—1957 学年度政治与学习表现的鉴定。我对这种学年度鉴定制度是熟悉的，因为这已经是我来苏联后第六次了。

我几乎是支部里最后一个通过总结的。我说当反右派斗争刚开始时，以为像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只不过是一批资产阶级政客，不过他们的野心是不可能得逞的。后来我读《人民日报》的一些社论，才认识到这是政治和思想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又曾用陆定一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根本分歧”来对照自己，认为自己是坚定地站在党的一面的。但是有个情况使我感到有些困惑，为什么张弓长退学回国后党支部没有指定我的入党联系人。

我并没有遇到尖锐的批评。但王启荣的发言却流露出了党支部对我的看法。王启荣说：“你说你没有读过谭天荣的原作，这说明你对于右派分子抱的是纯客观主义的态度。作为一个共青团员，我们不管读没读过右派分子的文章，都应该对他们坚决进行

斗争。”这是说，我没有坚定地站在党的一边。没有一位党支部或党员向我解释支部是如何考虑我的入党申请的。在通过我的学年鉴定时，程西筠又要求给我加上一条“学习中不能理论联系实际”。我感觉自己和党之间的距离拉大了。在三月份时我感觉自己已是一个不再发香的饽饽，现在则干脆连一个饽饽都不是了。

(3)

九月份新学年开始重新安排宿舍时，我有幸被安排回六层167号房间。1956年底我曾经在这间屋住过。现在这间屋里只住了两个研究生。另一个人是学经济的罗马尼亚人马林。他是1956年本校毕业的，回国工作一年后又回来当研究生。马林有一个苏联老婆，是他的同班同学。而且还是一个列宁格勒人并在市内工作。这样马林就常常呆在市里他老婆家，并不一定每天晚上都回宿舍。这就使我就有了一个较为安静的学习环境。在十月革命节以前我很少参加舞会和看电影。我甚至很少和同学们聊天。有一次我遇见历史系五年级的一个苏联学生，苏共党员甘那。甘那说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之间的斗争不过是争权夺利而已。我自己虽然不是一个党员，却也对这个苏共党员的自由主义感到惊奇。因为一个中国人不管是否是党员，如果这样公开说话，那肯定是要被划为右派的。甘那说列宁格勒大学党委向他们传达朱可夫的问题，说朱可夫骄傲自大，出口伤人，甚至把一些政工人员赶出军队。但是难道这些是朱可夫丢官的根本原因吗？我回忆起历史上许多名将的悲惨遭遇，感觉不论是像斯大林那样的暴君，还是像赫鲁晓夫这样的“开明君主”，都不可能允许一个国防部长的威信和兵权膨胀到功高震主的程度。斯大林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朱可夫虽然先后在击败贝利亚和莫洛托夫两件事上有功，赫鲁晓

夫还是不得不罢了他的官。

反右派斗争的全天集中政治学习，夺去了我两个星期的时间。这样就只有一个半月的时间来准备应试哲学了。实际这也不是完整的一个半月，现在中国学生的日常的政治学习和会议变得更频繁了。过去每星期这种活动只占去一个晚上，现在就得占去两个甚至三个晚上了，既然新学年已经开始，我也得按期参加中世纪教研室的会议，我还不愿意放弃旁听一些专题课。这样剩给应付哲学考试的时间实在是太少了。但是我还是坚持要在十月革命节之前考完这门课，因为 10 月 30 日意味着研究生学习在第一年之内结束，后面的两年是用于写论文的。失去的时间是找不回来了，我只好减少一些读物，还有一些读物也是浏览而过。11 月 6 日我考了试。我口头回答了我所抽到的考签上的三个问题，但是教授就第二个问题，即社会阶级斗争，向我提出了补充问题。这些补充问题我回答得并不详细，因为关于这方面我阅读得不多。结果分数是“良好”，即 4 分！多么大的不愉快事件啊！在作大学生的五年里我总共修了 32 门课，得的是 30 个五分和两个四分，即四分只占全部成绩中的十六分之一。现在研究生学习的第一个年里，四门考试中我就拿了一个四分，即占全部成绩的四分之一。这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四分，会成为我所属支部那些研究生们向我进攻的一个题目。

当我无精打采地从考场走回宿舍时，屋中的收音机正在广播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 40 周年大会的实况。讲话的恰好是毛泽东！八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听见他用那浓重的湖南口音宣称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那时我是多么的高兴啊！现在离我不远，在莫斯科，这个浓重的湖南口音正在对俄国人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们是如何悲哀地失算了。这个浓重的湖南口音在最后喊道：“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接着是暴风雨一般

的掌声。

四年前，在毛泽东 62 岁生日那天，我考“拜占庭史”这一课得了第一个 4 分。我感觉自己在毛主席面前是多么的有愧啊！因为我的一切都是党和毛主席给予的，我应该是门门课都拿五分才对。今天，在得了一个 4 分之后而毛主席的声音还在我的房间里回响时，我却是既不悔恨也不兴奋了。我仍然相信自己的一切幸福来自于毛主席，我也正因此而要求自己学得最好。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也就不会有占去中国学生这么多时间的政治学习，我考哲学也就不会得这个四分了。

失去的就失去吧！我现在要开始写我的论文“地理大发现与中国”了。这篇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论组成。正文共分三章。第一章说的是 16 世纪葡萄牙人如何来到中国和如何占据了澳门。第二章说的是 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上半世纪明帝国与西班牙、尼德兰、英国和俄国等欧洲国家的接触。第三章说的是明朝末年耶稣会士渗入中国的经过。每一章分为四节，正文共 12 节。这个论文的内容引起一个问题，即我的外语知识问题。我只懂得俄语、英语和一点拉丁文。现在出现了葡萄牙文，西班牙文和荷兰文的问题。有的专家说法文和德文也是必须的。我当然不可能在两年之内掌握五门外语，但是只靠英文和俄文资料来写这篇副博士论文又太肤浅了。于是我决定先学一点葡萄牙文，同时开始写第二章关于 16—17 世纪中英和中俄关系的那两节。我设想当我写完这两节之后，我的葡萄牙语知识也就允许我开始写第一章了。留布林斯卡娅教授为我找到了一位葡萄牙语教师，是一个名叫法因娜·费拉内托夫娜的老太太。我每周到冬宫右面冬宫大街她家去学习两小时，不过每周自己还得花去不少于四小时时间进行预习和复习。由于我有英语和俄语方面的基础，我学习葡萄牙文的进展有些使法因娜·费娜内托夫娜老太太感到惊奇。她

常常课后让我坐一会儿并请我吃糖果。她说：“你是我教过的学生中极少数令人惊奇的！”她告诉我说她丈夫是一个教授，战争时期列宁格勒被围时饿死了。她没有孩子，孤单一人。我感觉这老太太对于我就像是一个姑姑或婶婶似的那样亲近。

我把其它时间都用于写论文，第二章第四节“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到年底时我已根据所有在列宁格勒图书馆中收集得到的材料写成了初稿。但是要写定稿就必须去一趟莫斯科，参考在莫斯科图书馆中收集到的材料进行修改。留布林斯卡教授批准了这件事，我计划1958年1月到莫斯科去一趟。

11月中旬，中国高等教育副部长黄松龄从莫斯科来到列宁格勒。他在对列宁格勒的全体中国留学生谈话时说：“所谓苏联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只不过是他们帮助我们而已。”他透露出现在在莫斯科正在进行许多关于苏联援助中国的谈判。两天之后，列宁格勒大学的外国留学生都被通知集中到大礼堂，听苏共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彼得洛夫向他们传达有关各国共产党与工人党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其实这以前我已经从《真理报》和《人民日报》上读到会议文件了。彼得洛夫只是加述了会议的一些细节，并解释了南斯拉夫代表卡德尔为什么没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宣言”上签字。这一切都使我感到中苏关系更紧密了，同时感到这是很自然的。然而，中国学生内部的气氛却不知不觉地变得紧张了。我从留学生小报《学习生活》中得知1956年从莫斯科某学院毕业、现在在北京国家计委工作的赵广有被划成了右派，根据是他曾说“人民不满是因为生活太苦”。据说莫斯科音乐院一个名叫吴祖强的学生已被遣送回国，因为他的哥哥、著名戏剧家吴祖光是一个右派分子。钱其琛在八月末所提出“留学生中有没有右派分子”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答案。既然从苏联毕业的留学生中有右派分子和右派分子

的亲属，那么正在苏联学习的学生中就一定有右派分子了。

但是最使我感到困惑的还是我从《人民日报》报导的消息中得知有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也被划成了右派。他们中间第一个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荣孟源。他被描画成“史学界的李万铭”，即一个骗子。1956年夏天在北京时。我曾经把自己的论文提纲寄给他一份并和他交谈过一次，但对他了解得并不多。第二个右派分子是南开大学教授雷海宗。1950—1951年度第一学期时，他作为一位清华大学教授曾到北大来兼课讲“欧洲中世纪史”。我那时作为系学生会的学习委员和他有过接触。1956年夏在北京时我也曾给他寄过一份自己的论文提纲，并和他通信交换意见。雷海宗被划为右派是因为在五月份曾说过“从1895年，即恩格斯去世那年开始，马克思主义就停止了发展。”第三个右派分子是北京大学教授向达，一位有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我因为自己的论文属于向达的研究范围，因此和他始终联系频繁。根据《人民日报》刊登的材料说，向达的老家在湖南省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在当地居民与地方官员之间发生争吵时他支持了当地居民。他还被指责说是想当选那个少数民族自治州的州长！

11月末时有三位研究元史的专家，翁独健、韩儒林和邵循正在莫斯科参加一个有关研究蒙古史的协作会议后来到列宁格勒。我问支部书记杨光远是否可以组织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与这三位历史学家见一次面，以便大家了解国内历史研究的情况。但是杨光远却不同意组织这么一次见面。看来党组织不愿意同学们和“资产阶级学者”之间接触，那怕这些学者是被批准出国的也不行。因为翁独健是1951年8月我应试留苏考试的主考官，我就到涅瓦大街上他们所下榻的“欧洲”旅馆去看望了他们。在谈话中我感到这三位历史学家也不愿意多说话，尤其不愿意谈关于反右派斗争的事。几天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

学学部的党委书记刘导生也来到列宁格勒，他是参加郭沫若领导下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之后来到这里的。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派我去陪他当翻译。他也是住在“欧洲”旅馆。一天晚上他在房间里说话时突然从嘴里冒出一句话：“现在历史学界的好人不多！”这句话使我心里感到很沉重。

从 11 月末起《人民日报》上开始出现了批评一些大学生“先专后红”倾向的材料，要求学生“又红又专”。该报也发表了陆定一的报告，说党计划要建立起一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大军。“那么我们是什么呢？”“难道我们这些留学生从现在起也不再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了吗？”一次当黄锡畴走进我的寝室时我问黄锡畴。

“可能现在共产党是要等他们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建立起来之后才在中国搞科学了。”黄锡畴估计说。

“又红又专”的问题变成了一个中国留学生党支部日常政治学习的主要讨论题目。在我所属的支部里，大多数研究生们好像是获得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虽然除了我以外这些研究生们都有四年的学习时间，他们得在前两年时考完所有的考试。程西筠和杨光远是 1955 年 9 月来到列宁格勒的，今年 9 月就已经过去两年时间了，但是他们每人都只才考完两门课。程西筠是列宁格勒大学中国留学生党总支委员，杨光远则是我所属这个支部的书记。他们的“政治地位”可谓不低了！但是这在他们的导师和苏联同学眼里却没有任何意义。其他研究生的学习时间也都过去一年，但是他们所有的人都只考完一门课即俄语。而且这些研究生中没有一个确定自己的论文题目，因此谁也不可能在限定的时限内完成学习任务。怎么办呢？他们不知道。我虽然愿帮助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个帮法。

生存斗争是大自然的一条规律。阶级斗争只是这种斗争在一

定历史阶级上的形式而已。但是从 1956 年初起竞争曾一度在中国社会重新出现，对所有的“运动派”构成威胁。如果这种竞争长期延续下去，务实的分子和“运动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就会沿着“优胜劣败”的方向变化下去。现在反右派斗争把这种力量对比推向了反方向。在大约 20 年的时间里，“优败劣胜”的趋势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全军覆没。“运动派”的队伍虽然经过几次改组，却得到了恶性的膨胀。

嫉妒是一种人类的天性。嫉妒并非不可避免地给被嫉妒者带来灾难。但是当许多人的嫉妒都集中到一个目标时，当环境容许嫉妒者对被嫉妒者干点什么时，就可能发生灾难了。对于我来说不幸的是：到 1957 年末时，上述两种条件都已具备了。

在我所属的支部里，我是唯一一个按时完成课程，并开始写论文的研究生。这使我变成了支部里的一只“丑小鸭”。不知为什么，我所说的话，总是被最革命的标准来衡量，被认为是错误思想而受到批评。经济学研究生鲁达在学习中的确有困难，正在考虑停学回家，他说他回国后找工作会有困难，因此想搞点翻译来维持生活。我说我自己过去搞过一些翻译工作，也得过一些稿费，但是根据我的经验，依靠稿费生活是不可能的。程西筠就批评我说一面搞翻译一面想拿稿费是错误的。在讨论“怎样才能专”这一问题时我引用了爱因斯坦的一段话“不要把你的学习看成是一个任务，而是把它看作是使人羡慕的机会。为了你自己的快乐，为了你和工作所属于的社会的利益而去学习。”于是王启荣说学习是党给予我们的任务，你张轶东却不喜欢这种态度，你只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学习，而且还拿一个资产阶级科学家的话来做根据。在讨论“怎样才能红”这一问题时我提到，斯大林曾经引用过著名作家伊里亚·爱伦堡的一个短篇小说《共产主义的完人》中的一断话——有一个人做出一切努力想使自己成为一个

“没有缺点的人”。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做出什么对于人民有益的事情，就“淹死”在这自我完善的工作中了。

我的发言受到了曾宪廷、程西筠、杨光远和许多其他研究生的一致反对，他们说这证明我是在厌烦和嘲笑“中国式的教育方法”，现在我开始不知道世界上什么是正确的了。“爱因斯坦是一个资产阶级科学家，你们不同意他也罢了。但是你们为什么连斯大林也不同意呢？”我对这一切都感到奇怪。乌云正在从遥远的北京往在国外学习的学生们的头上移动。我感觉到了这一点，但是对形势仍然估计不足。一次当团小组长要求我汇报思想时，我还说：“我在这里学习时间已经不到两年了，我估计在这段时间里我来不及入党了。我看在这段时间内我作一个党外积极分子就行了。”我的书呆子习气和对于一些细节不注意，也招致了一些人对我的不满。

列宁格勒大学中国学生会正在筹备迎接 1958 年的新年晚会，要求各个支部上报节目。我正好是我所属支部的行政小组长，程西筠就对我说她能表演节目，不像许多中国姑娘那么扭扭捏捏，还真不错。但是我几天特别忙，不知不觉地忘记了上报这一节目。

除夕来到了。这天下午我所属支部的研究生们，在一起做了一顿丰盛的中国饭并会了餐。天黑时我们来到历史系教学楼二楼大讲堂前的大厅，联欢晚会就在那里举行。晚会上文艺节目不多，还有一点交换礼品之类的项目，主要的还是跳舞。我和与会的一些苏联姑娘，还有一些中国女生跳过许多次。杨光远则老是和程西筠在一起跳。在一次间歇时他们来到我跟前，我想和他们谈点什么，但是一时却找不到话题。这时音乐又响了，这是格鲁宗诺夫的华尔兹“回忆”。我很喜欢这一曲音乐，也真想找一位姑娘一起跳。而这时站在我前面的正好是程西筠。

虽然程西筠和杨光远二人来到列宁格勒大学已经有两年多，我和他们二人在一个支部也有一年多，但是我对于他们俩还是知之不多。我从别人口中得知他们二人至少比我要大两岁。杨光远原是上海的一个工人，他是否受过正常的中等教育都不清楚。但后来他却成了人民大学的研究生！或许这是由于他的工人阶级出身，和他在五十年代前半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是积极分子的缘故吧！1955年秋当我和杨光远初次接触时，感觉杨光远对本国历史都不太熟悉。一次我在闲谈中提到鸦片战争前的一位改革派魏源，杨光远问到：“魏源是哪一个朝代的人，是宋朝的吗？”我只好默不做声。在支部会的讨论中杨光远总是慷慨激昂的。有一次他又透露说他的导师总是感觉他不行。当他得知导师的老婆正在和导师闹离婚时他感到高兴。程西筠曾经是河南省的一个中学生，1948年河南解放时参军。她在部队里遇到一位解放军的高级军官就嫁给了他，建国后她随丈夫来到北京。她的丈夫成为了著名的协和医院的党委书记，而她就成为了人民大学的马列主义研究生。她在不到五年里生了三个孩子，今年年初她回北京探亲时，曾经拜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人楩，杨教授了解她的情况后，就劝她当一个本科大学生从头念起，当然这个意见她是不能接受的。程西筠从外表上说是半老而非徐娘。她身高约一米六，短发、眼睛和鼻子有些平陷，嘴唇较宽，较大的缺陷是顺着她的左脸颊有一道长长的疤痕。我喜欢的姑娘并不是非常漂亮，中等水平即可，但要求有些才华而性格实在。像程西筠这样的对我的确一点吸引力也没有。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在50年代前半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曾经邀请钱伟长等专家在选拔留学生的事务上协助把关。但不久这些专家们却都从这个工作退出，因为他们抵挡不住那些想把自己亲属塞进留苏学生队伍的高级干部们的压力。这类“学生”到

苏联以后，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在苏联方面也很不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他（她）们迁怒于那些学得好的中国学生。这样像我这样的学生就要倒霉了！

从礼节上说，我怎么也得邀请程西筠跳一圈，总不能把她抛在一边另外去找一位姑娘跳吧！但是一种不愿意的情绪总使我不能向她伸出手来，于是我只好装作是在欣赏音乐，其实心中正在犹豫。音乐都过去四分之一了，杨光远看见我没有和程西筠共舞的意思，就把她拉回舞池，这个尴尬的局面就这样结束了。

到 1957 年末，我灾难的土壤已经准备好了，我自己甚至往这个土壤上撒了一些种子。在“大跃进”的第二年，我的确获得了“丰收”。

第三章 1958 年 克拉娃

(1)

我所属支部的人都知道我有个苏联女朋友在莫斯科。在我去莫斯科之前党支部书记杨光远一再追问我寒假去莫斯科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杨光远说我已经写完了论文的一节，需要在莫斯科的图书馆中为这一节的草稿补充材料。这个信息也使杨光远感到不愉快，他在列宁格勒已经呆了两年零四个月，但是还没有考完所有的课程，而我已经写完一部分论文了。

我于 1 月 10 日清晨抵达莫斯科，并在列宁山上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之家那里联系到一间寝室，为期两个月。我其实并不知道娜塔莎毕业之后是否仍住在莫斯科，于是给连娜·彼得洛娃打了电话，是通过她的帮助才找到娜塔莎的。原来娜塔莎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式工作。去年夏天她随苏联科学院的一支考古队去过西伯利亚，回到莫斯科以后她就作为一个临时工每天到研究所上班，帮助整理发掘出来的文物。她在莫斯科甚至还没有固定住所，目前只能暂住导师吉谢列夫教授家里。吉谢列夫是位西伯利亚考古专家。1950 年曾经访问过中国。她必须每天晚上十点钟以前回到吉谢列夫家里去住，为的是不惊扰主人。所以我在莫斯科停留的两个月里，只见过几次娜塔莎。在第一次我和娜塔莎谈话中，流露出自己不太喜欢中国现在的政治气氛，突然娜塔莎抓住我的手说：“啊！那你就不要走了！”我笑了一下，也没有在意这件事。在最后一次见面时，我们一起坐在无轨电车上，要到北京饭店去和连娜一起吃晚饭。当谈到我写完论文回国后可能的工

作时娜塔莎又问道：

“你愿意完全留下来吗？”

对她两次突然提出的同一个问题，我回答说：

“啊，这个……”往下我就不知道说啥好了。但是很快地我就理解过来了：娜塔莎希望我完全留在苏联，然后可能是……一个家庭……。

与娜塔莎和连娜的约会并没有占去我太多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呆在列宁图书馆里，从上午九时图书馆开馆，到夜间十一点图书馆闭馆。我在那里确是为自己论文关于 16-17 世纪中英关系的那一节补充了材料，也为论文的其他部分收集了一些材料。在中午休息或午餐之后我就来到报纸阅览室，从中国的报纸上愈来愈多地看到“大跃进”、“反浪费反保守”这样的字眼。我从这些报纸上也得知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例会已经召开，周恩来不再兼任外交部长，由陈毅取而代之。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八点以后不久，我正要走出学生之家大楼，发现大楼礼堂里面塞满了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显然不只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从礼堂的扩音器传出中国驻苏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主任李涛那熟悉的声音。晚上当我从图书馆回来时，看见莫斯科大学博物馆学的研究生罗歌，就问他大使馆在对莫斯科的中国学生做什么。罗歌说这是在进行关于“又红又专”的政治学习。并且反问道，“你们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不也在学习嘛？”我还不知道，这时国内各个单位正在搞“整风补课”，为的是多揪出几个右派分子，以凑足上级下达的指标。我更没有意识到在留苏中国学生中已经开始了“清洗”。

三月初我结束了在莫斯科图书馆中的工作，决定实现去年自己对过去同室老同学波里斯·波诺金的许诺，到伊万诺沃市去看他。这是一个宁静的中等城市，是苏联的纺织业中心。我在伊万

诺夫市住了三天，波里斯·波诺金的母亲对我很热情，并尽量做适合我口味的饭菜。我这几天过得很愉快。3月8日晚，我在伊万诺沃火车站登上从高尔基市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

1958年的三月不同于1956年的三月。我到达列宁格勒的时间是3月10日早上5点钟。我走下火车就感到寒风刺骨，风刮到脸上像刀片似的。但是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还有一股更凌厉的寒流。

我回到宿舍后，首先到六楼洗脸室洗漱。在这里，我遇见了团小组长、经济学研究生陈国锋。在打招呼后，我问陈国锋这些日子干什么了。

“我们反右派了。”陈国锋回答说。

我突然大吃一惊，又问道：

“谁是右派呢？”

“韩桂良，一个语文系的本科生。”

我不再向陈国锋打听什么了。洗完脸后我就到黄锡畴的房间去。黄锡畴说韩贵良是上海人，现在在语文系二年级。不知道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他所属的党支部找到了他的日记，上面有对苏联和国内某些情况不满意的言词。于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就开了几个整天的会来斗争他。

这时已经是早上七点了，大学旁边的科学院食堂已经开始卖饭了，我和黄锡畴就决定去吃早饭。这时天色还很暗，多数的人还在睡觉，在宿舍的门口，我们遇到一矮个子的中国学生低头走进来。他戴的皮帽子几乎直接压到他双眼的眼镜上。我和黄锡畴互相瞧了一眼——这个人正是韩桂良。

那天晚上，党支部书记杨光远又来找我。我向他汇报了这两个月在莫斯科都干了什么。但是杨光远对于我的论文并不感兴趣，只是一味追问我和娜塔莎之间搞得怎么样了。

“你有可能留在这里吗？”这是娜塔莎在莫斯科向我提出过的问题，但这次是从另一个中国同学口中提出来的，使我感到奇怪，我只能回答说：

“为什么呢？”

杨光远没有再说什么。他告诉我现在正在进行关于“又红又专”的政治学习，我已经错过几次讨论了。我对于中国留苏学生日常和定期的政治学习是熟悉的。但是在反右派斗争之后，这种学习变得愈来愈奇怪了：过去这种学习通常是在八月份进行，即在暑假之末和新学期之前，为的是给每个学生作出学年鉴定，并不干扰他们在新学年中的学习。但是在 1957 年这个年度的政治学习却被放到八月和九月上半月，即占去了学生们一部分的课余时间。现在更奇怪了：这是三月份，在 1957—1958 学年度第二学期开学之后，而不是在暑期中。而且这次是全天的政治学习，我就不能到教研室去听一些专业课了。至于本科学生们，他们除去上课以外的时间都被占用了，也就完全没有预习功课和复习的时间了。

我在参加讨论以后，的确感受到了与过去历次政治学习不同的紧张气氛。我并没有听到大使馆党委书记武长秀对全体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所作的学习动员报告，因为我那时还在莫斯科。我参加的第一次支部会已经是学习第二阶段——讨论报告的最后一次讨论会了。我发现杨光远、曾宪廷和其他所有人的发言都是慷慨激昂的。他们严厉地谴责那些“只专不红”或“先专后红”的人。我也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不红不专是最大的浪费”这一论点。我在自己的发言中只说由于自己耽误了一部分学习，就必须来一个跃进，以便赶上其他同志。

只有学习的第三阶段才暴露出这次政治学习的真实目的。这就是“人人都要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并不是通常的年度鉴

定，其实现在也不是干这件事的季节。不过过程是跟通常年度政治学习的第三阶段有些相似：每个人都要汇报他怎样理解“又红又专”。然后支部说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红的、专的、不红不专的、还是又红又专的。头两个过关者是经济学研究生，他们虽然因为自己做得不够的地方受到了一些严厉批评，但还是顺利过关了。第三个是我，对于我的批判持续了三天。只有这一次的批判，我才懂得什么是“突然袭击”，什么是精神折磨。

我知道自己早就被支部定为一个“只专不红”的人了。我也准备承认这个算了。但是在作完自我检查以后，杨光远、程西筠、杨增麒、孙继志、曾宪廷等全体一哄而上，给我增加了种种罪名，而且“水平愈来愈高”。我自己所作的解释只能被“分析为”反动观点。计开：

——张轶东不把自己在苏联学习看作是党所交给的任务，他引用一个资产阶级学者的话来为个人的兴趣作为辩护。他甚至懒得填写毕业留学生登记表，以为凭着他的本事“到哪里都可以打出一个天下来”；

——张轶东对中国式的思想教育方法感到厌烦，嘲笑说中国人是想把苍蝇变成大象；

——张轶东已经不是什么“先专后红”的问题，而是纯粹的“只专不红”的问题，他说：“一辈子只要在一两个历史问题的研究上有所成就就满足了，这较之右派分子费孝通的“一间房，两本书”，右派分子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没有什么不同；

——张轶东关于阶级斗争没有什么概念，他考哲学时就没能答出有关阶级斗争的问题，结果仅得了4分；

——张轶东和右派分子雷海宗、向达等人关系不清，他们经常通信；

——张轶东总在歌颂古代的中国，而不是共产党、毛主席领

导下的新中国。这足以证明他主张“今不如昔”。有一次他甚至说：“唐朝初年每年处死的犯人仅大约四百人，远远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处死的人数。”你们看看张轶东还在攻击我国的镇反运动！；

——张轶东对党大搞群众运动这一政策的每一项措施都抱怀疑态度。几天前北京市民搞了打麻雀运动。他却说什么“四百万人三天才打了四十万只麻雀。不值得！还不如把这个力量放在计划生育上……”你们看看，他对于群众运动一点热情也没有；

——张轶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他写作和搞翻译只想得稿费，他只想毕业后有个好工作，有个好生活……，他在向党伸手；

——最后，张轶东甚至丧失了民族立场。有一次他还说在中国史书《明史》上就没有找到明朝在台湾设置行政机构的材料。这就是说他没有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甚至是在作对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者有益的事。

可怕啊，可怕啊！我简直被说成了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了！我事前也知道自己在这次政治学习中是不会得到一个好评价的。但是列举我言行的实际过程对我来说还是一次雷击。杨光远到我的房间，取走了雷海宗和向达写给我的信件。但是没有发现什么我搞右派活动的证据。最后杨光远代表党支部向我提出警告说：你必须“悬崖勒马”，因为你思想发展的方向是与党的要求背道而驰的。

这个支部里再也没有一个人过“社会主义关”过得像我这样长了。在对杨增麒学习不够勤奋作出轻微批评时，杨光远“顺便提到”这次学习是结合整顿留苏学生队伍的。我开始感到自己的脚下有点地震了！

这个可怕的政治学习结束后，一天晚上，黄锡畴来到我的房

间，问我是怎样过“社会主义关”的？我说我挨了三天“整”。黄锡畴幽默地说：“这下子你可尝到滋味了吧！”黄锡畴说他也挨了“整”，他被指责为想成为自然地理方面的权威。因此是极端个人主义者！

四月里高教部部长杨秀峰和该部留学生管理司司长艾大炎先后到列宁格勒对中国留学生作报告，两次报告都是在高尔基文化宫举行的。杨秀峰传达了一月末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这次讲话是向党外人士发出信号，即已经制订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包括我在内，谁也不会不同意让自己的国家发展得快一些。但是有一条毛泽东的论点让我感到很困惑：中国经济、文化如此落后，毛泽东竟然说成是好事，因为在这张白纸上可以写出最好的文章、画出最美丽的画来！我想到俄罗斯民间的一句谚语：“量七次，裁一次”。这就是说：一个裁缝在剪裁衣料之前必须非常仔细，认真从事。如果这块衣料被裁坏了，上哪儿去找另外一块呢？

毛泽东的另一个论点使我非常反感，他说：“人多是好事，再多两亿怕什么？人多，少吃一点就是了！”那么按人均的国民经济产值赶上资本主义国家又如何办得到呢？

杨秀峰和艾大炎都提到要警惕苏联和东欧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们还列举了好几个例子：著名烈士方志敏的两个儿子方英、方明，都被遣送回国了。因为一个是右派，另一个是因为和太多的苏联女人发生性关系的缘故。在波兰学习钢琴的傅聪（罗曼罗兰名著《约翰·克里斯多夫》译者傅雷之子）也正在接受审查。因为他“瞧不起党”。艾大炎在报告中还提出留学生不允许有助学金以外的额外收入，如稿费等。如有，必须上缴给大使馆。所有留苏学生自己购买的收音机、照相机等在回国后都得上缴给高教部。艾大炎还说如果中国人在国内有个苏联老婆那太

困难了。他向留苏学生建议“没有外国的异性朋友就坚决没有吧！如果已经有了，能断的就断！”中间休息时，我一个人坐在文化宫的木椅上，看到众多身穿蓝色中山装的中国留学生来回走过，感到自己不是处在本国同胞之间，而是无意之中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里。我在沉思，这样沉闷的政治空气中我将如何生活。

也是在四月里，《真理报》发表了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期间，在匈牙利科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他说，十月革命后初期许多帝俄时代留下的知识分子对革命、对布尔什维克不理解，但是苏维埃政权对这些知识分子采取了耐心的态度。逐渐地这些知识分子就开始和苏维埃政权合作了，其中有些人还成了共产党人。这篇演说在我内心引起强烈反响：中苏两党对待知识分子原来如此不一样。我天真地期待中国的《人民日报》转载赫鲁晓夫这篇讲话。但是这篇演说始终没有在《人民日报》上出现。

一天，我在科学院图书馆里读书，休息时间在走廊里遇到我在大学生时期的苏联同学叶戈罗夫和西马罗夫。这两人都在市里工作。西马洛夫说他哥哥是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汉语专业毕业生。不久前他曾经作为翻译去过中国。他哥哥说现在中国正在流行对知识分子新型压迫的政治风气。他哥哥说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像中国这样的气氛他一天也呆不下去！叶戈罗夫说，你们中国如此对待知识分子无异于自杀。然后他轻声的对我说：“我看，你娶个苏联老婆留在这里吧！”

苏共 20 大以后苏联的政治气氛，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地对我的确是有吸引力的。四月末，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组织了古科夫斯基教授六十寿辰和科学工作三十周年纪念活动。这位古科夫斯基教授在斯大林时代曾被投入监狱达五年之久。古科夫斯基教授在答词中说：“我为我生活在这个国家感到骄傲。它的人民走在全人类的最前列。”事实证明他错了。祝寿活动后我沿着涅

瓦河步行回宿舍。望着被春风吹皱的水面和动摇的树梢，又想起在国内的老师们，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正在受批判，我不由自主产生一种悲戚之感：“如果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就这样继续下去，我能活到六十岁吗？”

来到苏联留学的目的是为了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我记得当国家花巨资送我进入苏联学习时，包括我弟弟张化声在内的志愿军战士们，正在朝鲜一把炒面一把雪地对美军作战。我不想当逃兵或作对祖国忘恩负义的事。但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我即使回到祖国去，又能有什么作为呢？我又想起娜塔莎和我谈的问题，我为当时反应迟钝没有立即回答而后悔。我从莫斯科回来两个多月了，娜塔莎没有来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你在关键问题上态度不明确，人家还和你联系什么呢？

然而论文还必需继续写下去。我把第二章第三节“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定稿并上交给留布林斯卡亚教授，同时又把这一节的中文稿投寄给国内的《历史研究》杂志。然后我就开始写第二章的第四节“16 世纪末和 17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人的向东推进与中国”。正好在这时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陈伯达的一篇讲话，内容是社会科学研究应沿着“厚今薄古”的方向发展。我想：“我是搞中世纪的，这篇谈话对我有什么影响呢？”

(2)

“十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生产上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口号也给我带来了好处。我的论文的第二章第三节“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一文很快地在中国重要的历史杂志《历史研究》月刊五月号发表了。根据苏联的研究生学制，副博士论文必须在某部分公开发表后才能进入答辩程序。这样我在学业上就跨进了一大

步。许多苏联朋友向我祝贺。但是这对于我所属的支部的那些研究生们又是一个刺激。因为虽然他们已经在这里呆了两年多了，有的已经接近三年了，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选定了论文课题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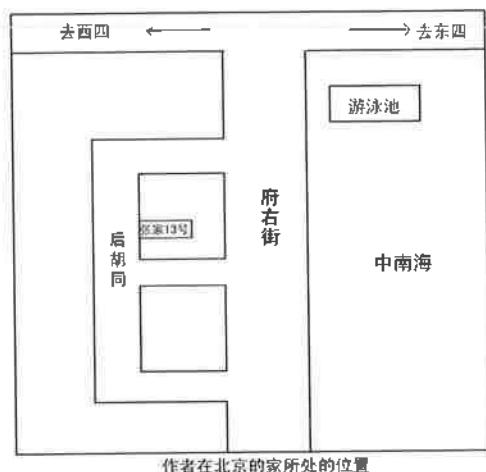
发表文章也给我带来物质利益——稿费 260 元。当时这笔钱不能寄给在列宁格勒的我，而是邮寄到我母亲那里。从妹妹辉楠的来信中得知，这

笔钱在家庭生活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母亲用 600 元买下了府右街后胡同 13 号的一座四间的旧房子。

13 号在基督教国家是个不吉利的数字。这是否预示着我将要面临不幸的遭遇呢？我当

时并不知道，这座房子离我家直线距离仅仅不到 200 米处的地方就是毛泽东的住所——菊香书屋。

从离我家 200 米之遥的中南海发出来的每一项政策、每一个决定都影响着住在 960 万平方公里领土上的七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我还不知道到弟弟张化声曾因在一个会议上谈到本单位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被划为“中右”分子，受到党内处分。他现在和他的爱人唐禹民，正在被迫复员，并被发配（下放）到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十万大山的偏僻地方去工作。即便是在国外，远在苏联列宁格勒、由中国政府派出留学的张轶东的命运，也由这个离我家 200 米距离的处所制定的政策所左右！虽然毛泽东和我都是北



作者在北京的家所处的位置

京市府右街的居民，两个人都不是常年居住在这里，毛泽东经常外出到全国各地“考察”，我的一生也很少在这 200 米以内的旧房子里居住。但是，一位“伟大领袖”的命运，和一名极其普通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之间却有着微妙的联系。四月末“又红又专”政治学习所引起的热浪结束了。据我所知，列宁格勒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里面有四名被划入“右派分子”遣送回国。他们是：语文系二年级的韩桂良和他的女朋友周智颖、历史系三年级的唐元昌和李清琦（女）。这四人中唐元昌和李清琦因为和我是同系的学生，我比较了解。他们都是勤奋学习、沉默寡言的人，是怎么被划成“右派”的呢！？他们今后将怎么生活？据说他们回国后不准许在学校读书，也不准许找工作，他们的行动由当地的派出所管制。我想如果自己的命运也同那四个“右派”一样，自己将如何生活呢？我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和一个年迈的母亲，他们都需要我抚养呢！我知道自己虽然没有被划为“右派”，仍然意识到命运是不会让我安安静静地过下去的。但无论如何，在五月里，气氛总算是相对地平静了。我写完第二章第四节“16 世纪下半纪和 17 世纪上半纪俄罗斯人的向东推进与中国”的初稿。苏联历史教研室的马夫罗金教授审阅并认可了这份初稿。

六月份是列宁格勒一年中最好的时光，即所谓“白夜”时期，就像诗人普希金所描写的那样：

不可以让夜晚的黑暗
挡住了天空，
一道霞光紧追着另一道霞光，
只许黑夜占去半小时的时光。

6 月 22 日那天白昼最长，黑夜最短，这就是中国农历中的夏

至。当我正准备就寝时，党支部委员王启荣来到了我的寝室。因为我还是这个支部全体研究生的学生会小组长，王启荣就需要找我商量支部中全体研究生暑期中的活动安排。根据党关于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政策和大使馆的指示，所有研究生都应于七月份在大学内参加体力劳动，除个别经批准回国的人例外，王启荣本人属于“例外”的人。在谈完社会工作以后，我按惯例向王启荣问还有没有别的事情？这时王启荣的语调变了，脸也拉长了。他说：“还有一件事情：在上次‘又红又专’的政治学习中你暴露出的思想问题是严重的。我们向留学生党委做了汇报。党委认为你的思想这样发展下去对国家不利。简单地说，这些问题足以作为把你遣送回国的理由了。但是党组织还是准备给你一次检查的机会。然而党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此你必须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这件事对于我来说不是什么轻微地震，而是五级地震了。我已经预感到警报器迟早是要对我响起的。但是长达半年多的挨整经历已经在我内心里培养起了一种反抗本能。我不愿意对“运动派”人物说什么告饶的话，只是说：“我好好地想想吧！”

如果说白夜还有半个小时的“夜”，那么对于我来说连这半个小时的“夜”也不存在了，因为一宿都没有睡觉。当然我没有那个雅兴去欣赏什么“白夜”而不去睡觉。我整夜都在6楼167号寝室对过的厨房里来回踱步，想着该“怎么办？”不知不觉地白夜已经变成6月23日清晨了。我就到黄锡畴的房间告诉他王启荣昨天说什么。我说：“如果他们要把我遣送回国，我就逃到俄国南方去作短工……”黄锡畴说：“你真傻，你在这里是一个外国人，只被允许在列宁格勒居住，如果你不经过本地公安局的允许就擅自离开列宁格勒到另一个地方去，你就违反了苏联法律。再说这会给你的家庭带来什么后果呢？”黄锡畴也因我得到

的警告而受到刺激，他说：“现在，在中国是毛泽东在整知识分子，谁也没有办法。那些吃整人饭的人整知识分子，是因为知识分子瞧不起他们。但知识分子即便是挨了‘整’也还是瞧不起他们。”

十天过去了，暑假也开始了，但党支部还没有叫我作第二次检查。看来这件事要在暑假以后才办了。此外我还被指定为参加大学内体力劳动的全体中国留学生（即不只是我这个支部的）的头头。这是因为我熟悉大学的情况，和校方联系较方便的缘故。要干的活是翻修沿着大学主楼的一条长约 200 米的沥青路面，在远离主楼的一侧还需要挖一条暖气沟。包括我在内的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干得还很卖力。我们仅用铁镐和双手（不带手套）干了五天就掀掉了凹凸不平的沥青路面。下一项工程因为缺翻斗汽车等运输工具而窝工。我总是往有关的苏联工作人员那里跑，催促他们快些送来机械，有时甚至为此和他们争吵。看来党支部在七月份还不准备动我，而是让我作为这次参加劳动的中国留学生头头放手工作的。我也相信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的政策是正确的，对我也有帮助。但是有两个相互尖锐矛盾的事实使我困惑：我从《人民日报》看到中国粮食大丰收，有的地方“亩产万斤以上”的惊人消息。另一方面黄锡畴给我看了一封他妻子的信，信上的消息却是截然相反，信中写道：中国有些地方，如安徽省一些地方的农民已经开始吃树皮了！

一个月的体力劳动结束了，为了表扬中国学生们的劳动奉献（中国学生根据中国大使馆的指示没有领取劳动工资），校方在主楼举行了一次表扬会。会上我被校方邀请坐上了主席台，但是中方却没有安排我代表中国学生发言，而是另外安排了列宁格勒大学中国留学生党总支部委员、语文系研究生信德麟代表中国学生发言。这一点提醒了我：你还是一个不被信任的人。我记得：

在我还是本科大学生的时候，我经常被指定为中国学生的代表在列宁格勒大学内外发言的。

人生中常有几个互相矛盾的事件同时发生的情况：在六月末，也是我从王启荣口中得到警告通知后不几天，我收到了王小曼的来信。王小曼说她病好了，现在北京高教出版社工作。王小曼来信的用意是明显的，但却使我感到很尴尬。我给王小曼回了一封回信，我们之间通信也就开始了。但王小曼第二封信却直截了当地问我，她是否适合做我的爱人。啊！王小曼，你是一名党员，你还不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什么人物哩！我现在处在朝不保夕的境地。再说，当王小曼患病有困难时候，我也没有作过对她有过任何帮助的事。当然我不能告诉她，我在“又红又专”的政治学习中有过什么“问题”。我对王小曼信中的那些政治言辞也感到别扭。我只能回信给她说明我们需要进一步互相了解！

体力劳动结束后。8月4日，当我刚开始修改那篇有关中俄关系的文章时，我接到一封北京大学时的同学王仲殊从莫斯科拍来的电报：“我们已经到达莫斯科，大使馆和苏联科学院已同意你作为我们的翻译。请速来莫斯科”。王仲殊在北大历史系时比我高两个年级。他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开始在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工作。五月里他曾给我一封信，说根据中苏科学合作计划，他和另外一位考古学家王伯洪将来苏联作三个月访问，并参加对花刺子模的发掘工作。他们问能否在这次访问中陪伴他们。我回信说我只在八月份里陪伴他们，因为七月份我需要参加体力劳动，而九月新学年已经开学了。现在他们真的来了。我拿这份电报给杨光远看。既然电报都说明大使馆同意此事，党支部也就不能说什么了。经过几天准备。我于8月9日夜来到莫斯科，在农业展览馆附近的苏联科学院招待所找到了王仲殊和王伯洪。

我协同二王会同苏联科学院工作人员米克拉谢夫斯基制订了

在苏联三个月（8、9、10）的访问计划。八月上旬他们将在莫斯科各地参观。8月15日他们将飞往中亚细亚，参加托尔斯托夫通讯院士领导下的考古队对于花刺子模的发掘。九月上半月他们将要返回莫斯科，再去乌克兰、高加索和列宁格勒。我说我只能在这个计划的前半部，即到九月中以前为止陪伴他们。苏联科学院还得为他们访问的下半段另外聘请一位翻译。米克拉谢夫斯基同意了计划，就让我到财务处去领取我这四十天的工资。但是根据大使馆的规定，我却不能领取工资，只能领取四十天的伙食费一千卢布（每天25卢布）。这件事使我很不高兴：我前几天正好收到在十万大山地区劳动的弟弟张化声的信，他说：他在农村非常寂寞，希望有个手风琴。我想积攒点钱帮助一下弟弟。这个规定使我的计划泡了汤。“不要紧，我还可以从这次的旅行中省出一点钱来。”我想道。不过总的说来，我认为有机会参观苏联中亚细亚的历史古迹对我是个好机会，因为我研究的是中世纪。我对于中世纪中国与中亚细亚的交往很感兴趣。

8月15日我和二王乘图-104客机从莫斯科飞往塔什干市。第二天我们改乘一架较小型客机飞到乌尔根奇市。我们在乌尔根奇市参观了一些阿拉伯人时代留下的历史遗迹。8月18日我们又乘一架小型的邮政飞机来到沙漠中一个名叫亚克-帕尔山的地方。这个地方属于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下属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

通讯院士谢尔盖·巴夫诺维奇·托尔斯托夫所率领的考古队共有20人。他们之中大约有四、五位是具有中级职称的专家，十名学生和几位行政管理员分住在几个帐篷里，但是一起在一个大帐篷里吃饭。此外，还有二、三十名工人是从附近农民中雇来的。他们住在两个大帐篷里，单独起伙而集中吃饭，考古队还“发明”了两套淋浴装置，考古队自己和工人各一套。水是由一

辆载重汽车从离此地大约十公里处的一个湖泊中运来的。考古队的任务是发掘一处新石器时代的农村，二王也被分配到一块发掘地段。每天的工作时间是清晨 6 时～10 时和下午 16 时～20 时。午休时间长是因为这里的沙漠气温过高阳光过强而决定的。午休时考古队的大多数年轻人爬上大卡车到湖边去游泳和洗衣服。我很快就和考古队所有的人混熟了。高尔基大学历史系的两个三年级女学生的性格很不一样。舒娜个子高头发短，经常穿颜色鲜艳的衣服和戴着一顶圆帽子，喜欢唱歌，动不动就开怀大笑。吕达·叶丽萨诺娃则身材苗条，有点清瘦，经常穿浅色衣裙，头发披散在衣领上。吕达性格文静，工作仔细。她告诉我说，她喜欢古典音乐，并不很喜欢流行歌曲。吕达很关心我，每次大卡车要去湖边时她都来我的帐篷里告诉我，然后一同去湖边。虽然吕达不是搞考古的甚至完全不懂中文，我却觉得她较之娜塔莎更投合自己的性格。一天吕达因有点小病而没有来工地工作，我没有看到她就感到若有所失似的。此外我还喜欢和莫斯科教师学校的两名女学生安妮娅和斯维塔说笑。总之这十多天中我是生活在友谊的气氛中，似乎忘记三月份在列宁格勒挨整的日子了。

二王和考古队关系也处得很好。他们工作认真，不以客人自居。托尔斯托夫通讯院士常常通过我的口头翻译向他们介绍研究古代花刺子摸的计划和现状。苏联人分不清这个王和那个王，就称王伯洪为王老大，王仲殊为王老二。一次在挖掘时，掘土民工因故没在场，我和二王就自己动手挖掘，并将残土扬到坑上面。苏联考古队副队长安德列看到后立即制止，他说这些工作不是专业人员的活计，这件工作是工人的事。专业人员只允许作专业工作，不得作非专业的活计。这件事使我深思，现在中国专业人员都被派去从事体力劳动。虽然中国留学生的时间非常宝贵，但每年还得挤出相当时间来从事笨重的体力劳动。苏联则规定专业人

员禁止作那些与他们的专业无关的体力劳动。到底谁对呢？

8月31日晚上考古队为欢送二王而举行一次篝火晚会。第二天二王和我又乘小邮政飞机到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首府努库斯市，在那里我们参观了几个地方。经过在沙漠里的十多天没有收音机和报纸的孤立生活后，我们才从当地人那儿知道台湾海峡出现了紧张局势，解放军炮轰金门，而美国军舰则不断地闯入中国水域。有一个老华侨来到努库斯我们居住的旅馆看望我们，这个老华侨自称是“大清国民”，因为他是在清朝末年为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来到俄国的。他有一个俄国妻子，他的家庭是俄式的，但因为在这里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他的俄语说得并不比我好。9月5日二王和我三人从努库斯飞回塔什干市。在这里我们从《真理报》上面了解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的《纪要》。《纪要》中提到正在全国各地建立的人民公社将是引导中国农村通往共产主义的桥梁。我感到很兴奋，但是同时我也想起在大学二年级时学到的“马列主义基础”一课里，教师曾经讲到，苏联在农业集体化时出现过“公社”，但是由于这些公社不符合当时苏联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更不符合苏联农民的思想觉悟水平，因此“公社”在苏联没有存在多久。

乌兹别克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古里亚莫夫教授先安排我们在塔什干市内参观浏览，然后到乌兹别克的其他城市——撒马尔罕、布哈拉和费尔甘纳访问。古里亚莫夫的一个研究生、苏共党员乌斯曼诺夫来陪伴我们一同去访问这些城市。这次旅行使我大饱眼福，看遍了中亚细亚的历史古迹。尤其是那些反映中国和中亚细亚之间传统和文化联系的胜地。例如在距中国新疆很近的费尔甘纳市我看到那里的马匹的确很大，正如古“汉书”中所描写的“大宛马”那样。

在这次旅行中，我也遇到了苏联一些地方机关工作效率底下

的现象。有一次我们与苏方约定好了，但送我们到火车站的汽车竟然没有准时来到。我很着急，问乌斯曼诺夫：“汽车什么时候来？”乌斯曼诺夫说：“快了！”，我开玩笑地说：“快了，快了！什么都快了！连共产主义都快了！”不想乌斯曼诺夫却接着说：“从物质生产上来看共产主义是快了，但是从人们的思想觉悟来看却不一定很快。”或许中国人的思想水平比苏联人高？苏联人在 30 年代停留在“公社”面前举足未进，反而退了回去。而中国人现在却在办“人民公社”！

但毕竟可以看出的一点是：1958 年赫鲁晓夫发动经济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一年，布尔什维克们还是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的前景，而仅仅四年时间，就宣告失败了。

1950 年王仲殊和我同在北京大学学习时，作为一名普通群众，我已经是历史系的团支部委员兼团小组长，也就是说那时我在政治上比起王仲殊要进步一些。但八年后我们在莫斯科会晤时，王仲殊已经在“反右斗争”以后入党了！王伯洪则从 1950 年起就是中共党员了。当然，二王并不知道我挨整的事，但我感觉到和二王之间不存在那种老同学相见时那种应有的温暖。王仲殊以领导干部自居，我在他眼里仅仅是下属的一个翻译，他们没有向我介绍当时的国内形势，我也从来不向他们打听国内的事，我们之间只谈论一些考古上的问题。二王之间也很少谈论自己的私生活。当他们谈到“大跃进”时，说的话和领导干部作报告或《人民日报》上的话差不多。难道国内的人现在都变成政治家了吗？他们说的话真是内心里想的东西吗？我感到有些奇怪。一次二王之间为了一件小事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为什么他们在国外不懂得语言的情况下还不能和睦相处呢？”我意识到这不是因为二王有什么奇怪的性格，而是反右派斗争使得人们之间失去了

真情实感。不管怎样，我答应为他们服务的期限也快结束了，没有意思和他们一起干下去了。

9月12日二王和我又乘图-104客机从塔什干返回莫斯科。我向苏联科学院的米克拉谢夫斯基交代了工作，得知苏联科学院已经为二王雇用了另外一名翻译。9月14日我返回列宁格勒。这个夏天我虽然没有休息，还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但是这次中亚细亚之行对我还是一笔学识和生活经验方面的丰富积累。

列车于9月15日清晨抵达列宁格勒的莫斯科站。冷飕飕的风刮着我的脸。我走出站台，坐上公共汽车向梅特林斯卡娅堤岸街5号驶去。突然间我感到大块大块的阴云落到我的面前：三月份我从莫斯科回来就挨整。现在我从中亚细亚回来，在列宁格勒究竟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呢？

(3)

中国有句谚语：“三春不如一秋忙”。对于我说来，1958的秋天的确是比1956、1957和1958年的三个春天加在一起还要“忙”的。这个“忙”指的不是肉体负荷，而是精神压力。1956年的春天对于我是愉快的，1957年则不大愉快，1958年的春天已经给我带来地震了。现在，1958年的秋天，我则是处于自己整个生活和希望大厦倾覆前的忙乱之中。

当我走进宿舍门厅时，首先想的是信箱里有没有我的信件。在门厅值班的苏联老太太说，今后所有中国人的信件是由中国学生会统一领取分发给每个人。“有什么必要这么办呢？”我感到有些奇怪。我在走廊上遇到的中国人对我或是有一种微妙的面部表情，或是装着不知道我是刚从外地回来的。没有人和我打招呼。我有一些不祥之感。当然我对此还不是十分惊奇的，因为一

年多挨整的经验已经使我有了一点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现在在中国学生中是一个什么“人物”。但是我还是不知道，现在已经不只是支部的研究生们，而是列宁格勒大学的所有中国留学生们都磨拳擦掌地等待着我呢。

我把旅行袋放在自己 167 号房间后就立即去找杨光远。新学年已经开始，但我这个支部的研究生们却没有忙于学业，而是聚集在一间小小的烫衣室里阅读一份什么材料。杨光远一看到我，脸上就显出一种高兴劲，好像是猎人终于在树下遇见了他所等待的那只兔子似的。他勉强打过招呼后，就和我一起来到我的房间。他告诉我关于北戴河会议后的三大战役，其实这些我旅途中已经得知了。现在开始了年度的政治学习（这学习其实侵犯了中国学生的校内学习时间）以配合国内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我们必须“向党交心”，为此必须首先“控诉个人主义的罪恶”。

什么是“向党交心”和“控诉个人主义”呢？第二天我被通知去参加在四楼自修室举行的一次“控诉个人主义”大会。这不是一个支部会议，而是列宁格勒大学的几个中国留学生支部联合举行的。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副主任钱其琛也来了。我一生从没有去过基督教教堂，但是我听说在那种地方每逢星期天就是一片哭声，因为人们正在向上帝忏悔自己的罪恶哩。现在我突然掉进了一种特殊的做礼拜的情景之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和青年团员们正在向他们的上帝——伟大领袖毛泽东忏悔哩！不过我奇怪的是，他们的“罪行”都是什么呢？有的人说他老是在想他毕业后的工作，有的人谈自己的恋爱问题，有人说他老想挣钱，有一个学生物的研究生坦白说他受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因为他曾经亲吻和拥抱过一个苏联女学生。最后钱其琛总结说，如果我们对于个人主义恨不起来，就是因为我们心中对党没有感情。每个同志经过控诉之后，就向党靠近了一步。但是我却觉得我离党

更远了一步了。

第二天我回去参加自己支部的政治学习。这又是一个控诉会，不过规模小些罢了。每个人都要“向党交心”，即控诉自己的个人主义。这些“控诉”内容都和我昨天下午听到的差不多。但是有一件事却使我大出意外：杨光远说，他想在留苏联期间让程西筠做他的情人。程西筠则承认她对杨光远有些好感，而杨光远对她也有些行为不够检点。会议中间休息时，程西筠嚎啕大哭，而我却在一旁叹气。我并不因为知道此事而高兴，我完全不需要知道此种事情。即使是正在整我的人，我也没有往其伤口上撒盐的习惯。这并不是说我把发生在杨光远和程西筠之间的事情看作是好事，我也没因为这件事把这两个人看得比以前更好些或更坏些。我主要是对这种的“向党交心”和“控诉个人主义”感到愤怒。这就是更靠近党的途径吗？那我能拿什么来控诉呢？好吧，我“无心可交”，你们想拿我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我是列宁格勒大学全体中国学生这次政治学习的压轴戏。不仅是杨光远、程西筠和我那个支部的研究生们，还有别的支部的某些人也懂得，他们能通过批判我来显示自己的“政治进步”。

《人民日报》说现在国内除了三大运动以外，还有一个“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所谓“白旗”指的几乎就是所有对群众运动表示怀疑的专家。在北京大学里，几乎所有不是右派分子的教授们在“学术批判运动”中都成了批判对象。所以当全民性的疯狂越出国境后，在中国留学生组织中发动一个“拔白旗”运动也就不可避免了。宿舍四楼的自习室变成了大字报室。每个人都可以写大字报指责另外任何一个人。不仅我所属支部的研究生们，还有一些其它支部的“积极分子”们都写了不少大字报，把我描写成十恶不赦的恶魔：极端个人主义、骄傲自大、不问政治、对党的每一项政策都表示怀疑等。所以在三月份那次“学习”里我受到

指控的那些罪名这次被重复了一遍。甚至我用台灯看书也是我不问政治的表现之一。我因为近视，走路时没有注意到别人向自己打招呼，这又是自高自大。但是最严重的指控还是我的“反动奴才思想”，因我一时没有找到明朝在台湾建立中国行政机构的材料，便诬陷我认为“台湾从历史上看不是中国领土”。并由此无限上纲说，现在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正在炮轰金门，或许将要解放台湾，张轶东说的不是“帮助美帝国主义”吗？

这个政治学习的最后和第三阶段在过去，就给每个人作总结鉴定。在三月份这一阶段叫做“过社会主义关”，这一次叫“向党交心”，就是检验每个人向党交心真心假心还是半个心，我那个支部的其他研究生们向党交的心都被认为是真心，他们也就被认为是向党“更靠近了”。最后只剩下了我了。

9月23日、27日和10月4日，我反复交的三次心都没有被通过。其实我即使交十次心也不会被通过的。我的命运早就被预先决定了。现在所进行的过程实际上就像一场戏：一群人在岸上把一个人推到水里，当这个人游泳快到岸边时，他们又把这个人推往深处，如此反复，直到这个人筋疲力尽而淹死。这一切只能使我从反感走向反抗。我清楚已无力挽救自己的状况，我承认自己是个人主义者。第二次交心又承认自己是“极端个人主义者”。第一次交心时，我说我专心学习是因为想在毕业后有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第二次交心我说我想成为中国中世纪历史方面的权威。但是两次交心我都没有承认我认为历史上台湾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我知道个人主义只能算是思想落后的表现，我准备接受一这方面的指控。最后一次交心使我甚至说我想成为历史学界的学阀。我说：“我知道自己在学习上超过别人太多，许多同志对我心怀嫉妒。我的存在对他们就是威胁。这种感觉使我把周围的同志看作是一群狼似的。”这种自我检讨的方式却又给了曾

宪廷把柄。他说，既然张轶东把周围的同志看成狼，即比敌人还坏，他反动的政治立场就清楚了。还有一个参加会议的本科大学生尖刻地对我说：“你不是没有立场，而是立场坚定。你不是不问政治，你的政治也很多，但是和我们的不一样。”王启荣说：“对于张轶东来说，写一两篇论文是不重要的，张轶东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在劳动中彻底改造思想。”每个人都懂得这意味着什么。我感到已陷入俗语所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了，再辩下去也没有用了。最后我说：“我同意这个意见：写论文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方法有利于我的思想改造就用什么方法。”这就是说：送回去就送回去吧！主持会议的支部书记杨光远总结说：“把关于张轶东的情况整理成材料上报大使馆，大使馆的决定将通知张轶东同志。”

谁都懂得“决定”将是什么。我对于险恶处境和暗淡前途不是麻木不仁，但是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我已经预感到，这种情况将在中国存在 10 至 15 年（其实是延续 20 年之久）。我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而在这列宁格勒大学，即使这次不被遣送回国，我那个支部的“群狼们”也不会让我安安静静地继续写论文的。

到目前为止，我只写完论文的两节。我开始写第三章“耶稣会士渗入中国”。我一面写，一面又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写完这一章。现在抓紧时间写论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于是我更多地去看电影和参加晚会。

10 月 10 日晚上，我参加了列宁格勒大学生在基洛夫宫举行的舞会。在几轮舞后响起了音乐“在满洲的山岗上”，我就邀请一位坐在我旁边的苏联姑娘共舞。这个姑娘高约 1.7 米，比较苗条。她穿的是一条带彩色花纹的浅色连衣裙。她的头发卷曲正好垂到后颈，脸呈圆形，下方稍长一些。她五官端正，眼睛是黑色

的。除去白色的皮肤和黄色的头发以外，她很像是一个东方人。她不算非常漂亮，但是显得单纯和招人喜欢。跳了一会儿舞后，我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字叫克拉娃。”

一直到晚会结束，我都是和克拉娃跳舞谈话。我知道了克拉娃的全名是克拉芙迪娅·巴夫洛夫娜·波莉萨科娃。她 1935 年生，如今 23 岁，在做会计工作，同时是列宁格勒财经学院三年级的函授生。晚会结束后，我征得克拉娃的同意送她回家。但是她的住处太远，我只能送她到莫斯科车站，在那里她乘 4 路有轨电车回去。我们约定次日晚上九时在财经学院大门旁见面。因为这个时间克拉娃正好上完课出来，对于我来说也很方便。因为财经学院和萨尔特科夫-谢得林公共图书馆正好都位于涅瓦大街莎多瓦娅那一段的两侧，而这个图书馆正好是我阅读和写作的主要地方。于是从 10 月 11 日起，我每天晚上大约在 8 点结束在图书馆里的工作，步行到财经学院大门口，这时克拉娃也就快下课了。我们一起沿着涅瓦河大街散步到莫斯科车站，然后吻别。克拉娃本不是列宁格勒本地人，她出生在梁赞州，父母现在仍在那里。她是大约十年前来到列宁格勒投奔她的哥哥，读完了一所中等专业学校。目前在列宁格勒州新萨拉托夫卡的一处国营农场当会计，现在又在列宁格勒财经学院继续接受高等教育，大约要 1961 年才能毕业。克拉娃也知道了我是列宁格勒大学的一个研究生。她当然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和我个人的情况。我们之间愈来愈亲密，在克拉娃的新萨拉托夫卡的住处一起度过了十月革命节。克拉娃也两次来过我的 167 号房间，幸好来时 in 门厅和走廊里并没有遇到中国人。中国学生只有黄锡畴知道我有了一个新的苏联女朋友，他认为我在决定自己的大事方面不能再拖延了。

从开始等待决定时起，我即着手处理我和几个姑娘之间的关

系问题。第一个是王小曼。我在塔什干、莫斯科和回到列宁格勒以后都收到王小曼的一再来信，但是始终没有回信，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这信该怎么回。后来我想起“纸包不住火”的道理，还是早些结束为好。我终于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说由于两人之间“政治觉悟差别较大”，还是结束一切关系好些，这样我们之间的通信也就停止了。在十一月份，我又收到娜塔莎从莫斯科寄来的一封信，娜塔莎说她刚从西伯利亚考古发掘回来，并问我为什么不写信给她。我给她写了一封问候信，但也无法向娜塔莎叙述自己现在的处境。我回到列宁格勒后还与高尔基大学的吕达·叶莉莎诺娃通信。吕达说她寒假里要到列宁格勒来探亲。

在十一月里我还收到国内大哥的来信，说他已经结婚，新娘是他所在军委政治学院附近新华书店的一个店员。大哥信中表示希望我能提前回国，说在国外呆久了容易脱离国内实际。我在回信中也顺水推舟地说我正在“设法”提前回国。其实是让国内家庭对我的即将被遣送回国有些思想准备。张家老大和老三化声都结婚了，老二我的婚姻问题也就提到日程上来了。可是，一个被遣送回国的留学生回国后怎么找对象呢？再也没有选择的时间了。与娜塔莎或吕达·叶莉莎诺娃相比，克拉娃不过文化暂时低一些，和我不属于同一专业。但专业又不是找对象的标准呀！最主要的是我们已经相爱了。现实问题是我们今后将在哪里工作生活，在中国还是在苏联？几个月前，我是无法想象我怎么能不在那个养育自己的国家工作的。但现在，我想如果中国将沿着现在的道路长期走下去，我在中国是什么也干不出来的，我的一生也就将被浪费了。但是如果大使馆命令我回国，我也不能赖着不走，那样就会被认为是叛国，并危及我国内的家庭。而且我的妹妹和弟弟现在正在念高中，为进入大学而奋斗呢。唯一的出路是和苏联公民有婚姻关系，这样才可以东山再起。克拉娃表示愿意

和我一起去中国几年。我们计划一起在中国工作几年，还清我因受培养而欠的“债务”。几年之后，我们再一起通过合法途径返回苏联，或许就返回列宁格勒定居。那时，我还可以继续自己的历史研究工作。

10 月下半月时，全国性的疯狂在留苏学生中仍然掀起了一股热浪。张春桥关于废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又向那些写不出论文的研究生们扔出了一根救命稻草。当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因公途经列宁格勒时，杨光远、程西筠和曾宪廷到周扬所在的宾馆去看他。谈话中他们把资产阶级法权与学位联系了起来。周扬并不主管教育，无意中说了一句：“论文并不是非写不可，主要的是要学到一点东西”。于是杨光远、程西筠和曾宪廷三人就以周扬的这句话为遮羞布，公开宣布他们不写论文了。黄锡畴已经写好了论文正等着答辩，却被他那个支部的研究生们催逼，不经过答辩就立即回国，因为“学位是资产阶级法权”，双方僵持着哩！苏联一些高校里的中国留学生们组织起了人民公社，他们把助学金放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等。号召所有中国学生把他们的余钱都捐献出来支援炮轰金门。我也被迫把我在参加考古发掘中从自己嘴边节省出来的一千卢布也捐献了出去。我不得不写信向三弟张化声解释说为什么他想要的那把手风琴泡汤了。中国学生门不认真地学课程，有时甚至不去上课，却凑在一起搞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翻译或编写工作，说是要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周年（1959 年 10 月 1 日）献礼。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能不能够待到那个时候，却也被分派了一定的“献礼”任务。这样，即使我这次不被遣送回国，也不可能按期，即在 1959 年 10 月 30 日前完成自己的论文了。我感到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我的导师留布林斯卡娅教授说明自己的处境。于是在 11 月初的一次教研室会议后我走到她面前说：“亚力山德拉·狄米特里也夫娜，我觉

得我的时间不够用了。所以是否能让我把论文范围缩小一些？”

“为什么呢？”——留布林斯卡娅教授感到奇怪，“你不是还有整整一年时间吗？”

于是我只好向教授说了我被分派给“献礼”任务的事，这使得她哭笑不得。她说：“张轶东，你最大而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论文呀！”

11月时王仲殊和王伯洪二人去乌克兰和高加索后，曾来列宁格勒参观几天，我还陪他们参观了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11月下半月大跃进的热浪开始退却了。一天晚上，黄锡畴到我的房间说：“叶留金（前苏联高教部长）已经下令说中国学生不许另搞一套，必须遵守校规。”中国留学生们在苏联高校里办的人民公社无声息地消失了。在12月里，中国学生们过着正规的学习生活，和其他国家的学生一样，不同点只是日常的政治学习多些，大约每周占去两个晚上。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处境，还是按时到教室或图书馆去，晚上到财经学院门口去等克拉娃。但是在12月17日下午，我在萨尔特科夫——谢德林图书馆里突然遇到也在这里看书的王启荣。王启荣看见我就上半身往后一仰，眼睛睁得大大的，嘴也张开了。“这是什么意思？”——我莫名其妙。

这就是大地震发生前的那一道蓝光。第二天下午，当我在历史系的自修室里看书并等待参加欢送科瓦涅夫教授退休的会议时，杨光远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并说道：

“我一直在找你。”

“有事情吗？我们到走廊上去说。”

“不，我们需要专门谈谈”。

“好的”。

于是在晚上九点钟，杨光远来到我的寝室。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党支部委员法律系研究生肖蔚云。杨光远坐在我书桌的对面，

肖蔚云则坐在床上。杨光远对肖蔚云说：“我们先一起扯一扯吧！”

肖蔚云却用一种很含糊的低声说：“你就把大使馆的决定告诉他吧！”

杨光远说：“我们接到大使馆的一个通知，”然后他就把通知递给我。上面是：

驻苏大使馆 遣字第 124 号

留学生管理处

通知：

列宁格勒大学党总支：

你校研究生张轶东遣送回国一事，已经使馆领导批准。

已通知苏联高教部。请通知其本人前来我处办理回国手续。

1958 年 12 月 9 日

26 年后，当我所在的黑龙江省绥化师专中共党委着手改正这一历史错案时，从国家教委外事局档案室取出了驻苏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呈送来的关于遣送张轶东一事的报告复印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关于遣送张轶东回国事”。全文如下：

（58）苏留处字第 55 号

教育部：

张轶东，男，团员，1951 年来苏，在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1956 年毕业后又作研究生。

张轶东在留苏期间政治上一贯表现落后，日益发展着整

套资产阶级思想观点，一直在政治上有动摇的表现。他对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一贯抱消极对抗态度，自己说是“逆来顺受”。因此每次思想运动中都应付敷衍过关。国内整风反右时期，他立场模糊，对右派抱同情惋惜的态度，并说：“右派不右派我们不要去管，主要是研究学术”。他怕自己被划为右派，思想上的阴暗情绪日益发展，认为“周围的人都是一群狼”，“党员之间不团结对自己有利，这样就不会来纠缠自己的问题”等。

在学术研究上他采取的一套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观点。他说：“唐朝杀人少，现在还不如唐朝”，“文化繁荣要在经济衰落的时候到来，现在中国不会有文化繁荣”。最严重的是在台湾问题上，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在明朝史料不足，不能随便说台湾是中国的。”因为作为“将来的世界历史学家”不能没有足够的材料就随便说。而且认为说了也难以得到“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的承认”。对待历史，对待党的各项政策，他都有极其荒谬的看法。他宣传要“站在20年后看时代”，“三百年前的事情才算历史”，他是站在高山之上，时代之外看问题”。对党的各项政策，他一概称之为“时代精神”，马上要过去的。因此站在怀疑立场上，“要过几十年来看”。但在政治上则表示要“学会拥护”，“逆来顺受”，怕被划为右派。

张轶东的名利思想个人主义也是极其严重的，自己承认“狂妄自大、已经发展成为学阀思想”。觉得毕业生登记表也懒得填，认为在那行也可以打出一个天下来。认为自己无疑是中国欧洲中古史研究的奠基人，在中西交通史上也是“唯我独尊”。他还宣传“生平无大志、愿搞1、2题”，企图搞出一点东西来，别人就打不倒自己，幻想自己成为世

界史学史上一个有转折点意义的人。他讨厌“学习任务”一词，不愿把自己的学习服从于党的要求，只是从个人兴趣和名利出发来搞学习。

根据以上情况，张轶东在国外7、8年来一直在走一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并发展到在政治上动摇，虽然经过支部多次教育，仍然没有彻底改造自己的决心。支部认为根据他的情况，不宜再继续学习下去，应立即遣送回国。经我处研究后，经请示使馆领导，决定取消张轶东留学生资格，遣送回国。附去材料参考，本人档案另转。

1958年11月20日（印章）

决定一个月前就做出了，通知也是九天以前就发出的，但直到现在才正式通知我。

到目前为止，我有生以来还没有经历过外科手术，但是拔过一次牙。我记得拔牙前医生先在要拔的牙周围注射麻醉剂，在真正拔牙时你并不觉得疼痛，只觉得是某样东西从你的身体上掉下来了。只有当麻醉剂完全失效后疼痛才会来到。其他的一切外科手术大概也是这样的。现在恰好一样重要的东西从我的生活中被切割出去了，但是我从今年春天起就被注射过不少的麻醉剂。所以我在读了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的通知后并没有立刻感到痛苦。杨光远向我说：

“你对于使馆的决定怎么想的？”

“我才知道，我的头脑对这个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

于是杨光远和肖蔚云就开始解释为什么我继续在这里学习下去是不适合了等等。现在听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我只是说：

“既然这是大使馆的决定，我就执行这个决定。”

然后杨光远又问我与那个苏联姑娘之间的事情怎么样了。他

指的是娜塔莎。我告诉杨光远说娜塔莎并不是我的未婚妻，我现在在列宁格勒有个叫克拉娃的苏联女朋友，我打算和她结婚。这确是个突然的问题，当然党支部对此事无权作任何决定。最后杨光远说：

“你什么时候走？”

“大约十天后”，我回答说。

杨光远和肖蔚云走后，我刚坐到桌前开始发呆，黄锡畴就走进了我的房间。他起初没有注意到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只是快活地告诉我说：

“今天，我的论文答辩通过了！”

然后他谈到了答辩会上的气氛。他说由于想到自己的答辩曾经受到自己支部其他研究生的阻碍，他在致答词时甚至流泪了。突然他看见放在桌子上的通知，说道：“这是什么？”就抓过来看，然后叫了出来：“啊，把你送回国去！”

“所以今天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说。

我们谈论以后怎么办。黄锡畴也理解我必须在离开前和卡拉娃结婚的想法。

“你的家庭对你没有完成任务就被遣送回去，会不会有意见呢？”黄锡畴问到。

“当然是会有意见的，但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说

“这种情况在中国至少将存在十年，你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忍耐。”黄锡畴说。我痛苦地点了点头。

黄锡畴走后，麻醉剂的效果也过去了。已经快到夜里 12 点了，上床睡觉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又到房间对面的厨房里，在那里来回踱步。半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度过夏至的白夜的，现在又快要过冬至了。大约在早上 5 点钟我回到房间，穿上大衣戴上

皮帽子，从宿舍出来坐上四路有轨电车赶紧找克拉娃去了。

克拉娃刚起床正要上班，对我这个时候的到来感到吃惊。我就陪她去上班，在路上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情。克拉娃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我突然会被“召回”，我自己也总是解释不清楚自己的情况以及当前中国的情况。但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我即将回国，我们必须马上决定怎么办。最后，我们决定向中方提出结婚申请。我回到宿舍以后就起草了一份申请报告交给了杨光远。杨光远则向我重复了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司长艾大炎四月间在对中国留学生作报告时，关于和外国人结婚问题说过的那些话。他强调说：“你要好好考虑！”

我其实早就彻底“考虑”好了。我看出和党支部之间谈不出什么来，就和克拉娃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大使馆领事处寄往莫斯科。杨光远已经代替我办好了退学手续，每天晚上都来催我走，于是我决定 1959 年 1 月 1 日晚离开列宁格勒。离开前必须向导师留布林斯卡娅教授告别，这是我最后一次来到教研室了。留布林斯卡娅教授哭着说：

“上次当你说你要缩小论文范围时，我并没有理解是怎么回事。后来我知道真相提出要把你留下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张轶东，你是一个天才。今后不论你在哪里或者做什么工作，你都不要抛弃科学。”

亚历山德拉·狄米特里耶夫娜向我伸出了自己的手，我吻了一下她的手，就永远地离开了这个自己曾经多年学习的教研室。

1958 年 12 月 18 日，这一天其实不只对我和黄锡畴两个人是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也是在这天发表的。不过毛泽东不再担任国家主席，苏联公布七年计划控制数字，和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一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风波等事件，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注意的只是我和克拉娃给大使馆的

信能否收到答复。可是直到除夕，我们没有收到回信。我每天把不准带回国的东西拿到克拉娃那里去，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晚上才回宿舍。我把我和王小曼、娜塔莎和吕达之间的故事告诉了克拉娃。我写信告诉吕达我即将回国，吕达寒假来列宁格勒时可以找到克拉娃，克拉娃就可以告诉吕达我八月末离开雅克——帕尔山之后的情况。我把克拉娃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写给了吕达。克拉娃许愿说只要吕达来找她，她就会照办。

12月31日早晨，我拎着准备带回国的两只箱子永远地离开了宿舍。我把两只箱子送到莫斯科车站的寄存处后，就直接从那里前往克拉娃的住处，这是在涅瓦河岸上，离她的办公室约两公里远，是一所两室一厅的小木屋。克拉娃同室的瓦丽娅到父母家去了，另一间屋住的是一对中年夫妇瓦夏与安尼娅。傍晚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吃饭，喝伏特加酒，唱俄罗斯歌曲。这些歌曲中有一首是著名作曲家杜纳耶夫斯基写的：“不要忘记”。歌词中说“……不要忘记了你的女朋友！你的命运，你的爱情……不要忘记！”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始终在哭。这是自从宣布我回国以来，我唯一一次能尽情地哭一场。晚饭后，我和克拉娃一起回到她的房间。我们找来一个空花盆放在地板中央，就把所有王小曼和娜塔莎寄给我的信放在里面烧掉。我想把王小曼的照片也烧掉，却被克拉娃一把抢过去。我们把吕达寄给我的那几封信也烧了。

花盆里的火焰随着1958年一块儿离去了。

第四章 1959年 第四类人员

(1)

我和克拉娃于1月1日晚7点来到列宁格勒的莫斯科车站。克拉娃来是为了送我去莫斯科。我们从行李房取出那两只箱子就走向车厢。正当我要上车时，杨光远和程西筠在月台上出现了。他们两人都喊叫道：“我们找了你一个晚上，你去哪里了？”我回答说，我和克拉娃在一起迎接新年了。于是这两个人又神秘地低声问道：

“没有出什么问题吗？”

“没有。”我回答说，心里感觉这两个人真是讨厌极了。

接着他们又责备我忘记了在离开宿舍以前领取自己的团关系。杨光远说：“如果你忘了这件事，你就会把团籍丢了。”于是把团关系给我递过来。我心想：“脑袋都丢了，还要头发干什么？”我接过团关系放进衣袋。

黄锡畴在12月末就离开列宁格勒要经莫斯科回国，我和他约定1月2日晨在莫斯科的列宁格勒车站见面，清晨我下火车不久就见到了黄锡畴。黄锡畴看见我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傅聪逃走了！”在我们一起提着箱子从列宁格勒车站走向雅罗斯拉夫车站的路上，黄锡畴向我简述了傅聪逃走的经过。傅聪的父亲傅雷是右派，傅聪自己也“犯了错误”，于是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就要把傅聪遣送回国。但是波兰校方出面说情，说让傅聪念到（1958年）暑假毕业再回国。可是暑假毕业后，傅聪参加学校去英国的演出就一去不复返了。我对于造成傅聪出走的原因并不奇怪，我

自己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我对于国内搞的这些运动导致如此严重的事件也是感到惊骇的。在把两只箱子存入雅罗斯拉夫车站的行李房之后，我和黄锡畴就各忙各的去了。80年代初，我得知黄锡畴在长春，我们通过信和电话，但是没有见过面。

我来到克鲁泡特金胡同的中国驻苏大使馆领事处时，那里已经开始正式上班了。我对坐在办公室前的苏联看门老太太说我要见一位领事处的同志。

于是先被领进一间接待室，接着就来了一个穿得很整齐的中年工作人员。他得知我是一个即将回国并想和一个苏联姑娘结婚的留学生以后，冷酷地说：

“我们收到你们的来信了。苏联公民想去中国，必须先向本地公安局外事科提出申请。结婚不是我们的事，而是当地苏维埃的事。想和外国人结婚的留学生必须得到他所在支部的批准。”

我想解释，但是这个官员什么也不想再听了，他站起来说：

“我们怎么能随便让一个苏联人到中国来呢？”于是他就立刻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显然，领事处已经从留学生管理处方面得知了我的情况。

但是我抓住了“结婚是当地苏维埃的事”这句话。我立刻到邮局去给在列宁格勒的克拉娃打长途电话。克拉娃一听到我的声音就说：

“我收到你们大使馆的来信了。信上说关于我去中国的问题我应该向市公安局外事科提出申请。”

我则告诉她领事馆说了，结婚登记是地方苏维埃的事情，和大使馆无关。因此我决定立刻回列宁格勒来办理结婚登记手续。

于是在1月3日早晨，我又出现在克拉娃的面前。我们已经来不及去看住在梁赞州的克拉娃的父母并和他们商量结婚事宜，就在1月4日那天到克拉娃的哥哥家去。他哥哥在列宁格勒城郊

与芬兰交界处的一个消防队工作。我们在她哥哥米沙家住了一个晚上。米沙同意了我们结婚，但是要求我尽快回到苏联来。于是1月5日，我们就在新萨拉托夫卡村苏维埃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又拍了照片。我们没有钱搞婚宴，只是给克拉娃的邻居和同事们散发了一些喜糖。

每天克拉娃，瓦夏和安东尼亚去上班，我就留在屋子里。我可做的事只是洗涮碗碟，打扫房间和拎着一个桶到涅瓦河边提水回来。这以后，我只能呆呆地坐在屋子里，我也不知道这几天我在想些什么。只有到晚上，克拉娃、瓦夏和安东尼亚回来了，气氛才热烈起来。克拉娃曾经两次陪同我去看电影。但是这样的生活是不能持久的。我没有钱拖下去了。我们也不能让克拉娃同屋的瓦丽娅在别处住得太久。哪怕只当一个工人，我也愿意在这里混下去的。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因为这就是意味着对抗大使馆的决定，后果将是严重的。

不久，我收到波里斯·波诺金从伊万诺夫寄来的一封信。波里斯说1月14日至18日之间，他将在莫斯科开会。他说在莫斯科期间，他将住在莫斯科市委党校宿舍。他希望在我路过莫斯科时能最后见到一面。

我知道1月18日夜将有一班“莫斯科——北京”的国际列车离开莫斯科。我决定坐这列车回国。16日晚是我最后离开新萨拉托夫卡和列宁格勒的时间。在去莫斯科车站之前，我在一个纸条上写道：“克拉娃，你记住，我疯狂地爱你！”然后偷偷地把纸条放到克拉娃的枕头下。在去往莫斯科车站的公共汽车上，克拉娃说1月1日晚上那次她送我去莫斯科时，她并不感到难过。因为那时她有一种预感，即我还会回来，但是这次却不同。我对她说：“你回屋后，摸一摸枕头下面，看看有什么东西。”我登上车后，从车窗上看见克拉娃在月台上不断地擦眼泪。

1月17日早晨抵达莫斯科车站以后，我立刻奔向大使馆留学生管理处，为的是把遣送通知换成去北京教育部报到的介绍信。那个女秘书填写好了介绍信交给我。她的平静使我有点惊奇，好象对于遣送留学生回国一事她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似的。看样子留学生管理处还不知道我已经和一个苏联姑娘结婚了。拿到介绍信后，我也不再换团关系介绍信，就飞速离开那里，奔向国际旅行社。冬天是旅游淡季，我很容易地就买到了一张第二天的“莫斯科——北京”的车票。接着我就去了邮局，给在列宁格勒的克拉娃打电话。我问克拉娃：“你看见枕头下面的东西了吗？”

“看见了，”克拉娃低声回答道。当她知道我离开莫斯科的时间以后就说：“祝你一路平安！”于是两人就都挂断了电话。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互听到对方的声音。

我也在邮局里给北京的家寄了一封航空信，在信中告知我将在1月25日上午10时到达北京，并且告诉他们我所在的车厢号。这时已经是下午了，我在街上一个食堂里吃完午饭，就前往莫斯科市委党校去了。波里斯·波诺金一看见我就问：“你出什么事了？”

我在那里呆了一夜，告诉波诺金说这是我在1958年里不断挨整的结果。但是我不能告诉波诺金一切细节，因为我们两个人毕竟分属于不同的国家。然而波诺金作为一个苏共党员，似乎已经通过自己的党组织知道了一些关于中国的情况。他很快地就了解到：我是因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抱怀疑态度而被遣送的。他面带困惑和微怒地说：

“中国共产党一贯是伟大光明的，怎么搞出了这些事情呢？”

从这句话里，我感到在牢不可破的中苏友谊里，有了一点什么可破的东西。

第二天，波诺金去开会，我则留在他的客房里。我其实有时间去看娜塔莎和列娜·彼得洛娃，但是也没有心情去了。晚上波诺金回来，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就到雅罗斯拉夫车站去了。列车在夜里十点准时离开莫斯科。车厢不满，空位子很多。列车在西伯利亚雪原里穿行了五天，车厢里的气氛很沉闷。在我所在的这节车厢里，还有两个终止学习回国的留学生，我没有想和他们说话，也不想打听他们为什么中途回国。

1月23日下午，列车来到边境站——后贝加尔斯克。在办理离开苏联国境的手续时，我的感情很复杂。我在俄已经生活了七年多了，而且是我20岁到27岁的时候，是我最重要的青年岁月。在这些年里，我在这里得到过教育、知识、友谊和爱情。现在我要离开这个国家了，但不是正常离开，而是“犯了错误”被遣送回国的。什么时候我还能回来看看俄罗斯？我不知道。

列车离开满洲里驶向北京时已经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钟。有一个苏联工程师被安排住进了我所在的这个小间。在中国领土上，餐车也是中国的了。在吃晚饭时，我碰巧和同车厢的那两个学生坐在一张桌上。服务员算帐时只收了我们菜钱，没有要主食米饭的钱，说饭是不要钱的。这是不是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生活”的一个标志呢？但是那两个中国学生中的一个在吃饭时却说：

“回来以后，我们一举一动都必须小心翼翼。不然的话……”

我本来就对自己回国之后前途如何心中没有底，听了这句话之后，我感觉自己简直是掉进了一个恐怖世界里。

第二天早晨，我和同住一小间的那位苏联工程师一起吃早饭。我们通过车窗看见铁路两旁有许多土高炉废墟。那位苏联工程师指着这些废墟对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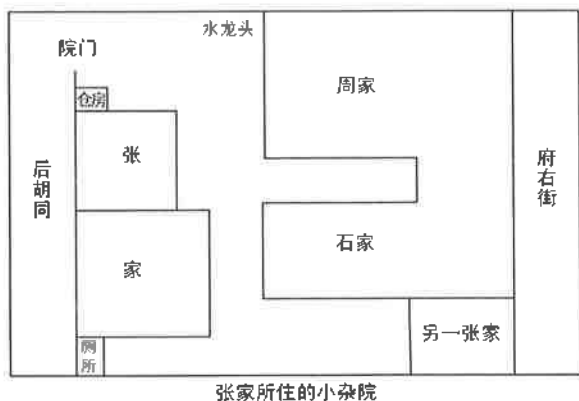
“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们不是有自己的钢铁企业吗？”

列车在 1 月 25 日上午 10 时准时到达北京。我通过车窗看见大哥、妹妹辉楠和毛弟轴材来接我了。他们帮助我把两只箱子提下火车，走出车站，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到了府右街我们的新家。

(2)

我现在看见了我们新的家园。我必须在这里度过我一生中最艰难而且尴尬的两年。

这不能算是一个四合院，只能算是一个由四家人组成的小杂院。水管和厕所则是共同使用的。住在第一排北屋的石家曾经是整个杂院的所有者。据说这家人过去很有钱，后来坐吃山空，就开始卖房子。这个杂院其他三家都是石家房子的买主，张家则是最后一个买家。石先生的妻子是一个家庭妇女。他们总共有十个儿女，其中最大



的是一个姑娘，去年刚进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常常从他们家发出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而引起的争吵声。周家住在第二行北屋，总共只有三口人。老周也大约 40 岁，是一个工人。他的妻子在大跃进时由街道建立起来的鞋厂工作。他们的儿子周文生才 6 岁。东屋住着的一家也姓张。主人大约 30 岁，是一所中学的历史教员，因此和我是同行。他的妻子是一名护士。他们有一个女孩才

两岁。我家住的是四间西屋，总共 52 平方米。北面的两间非常小，每间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把椅子。南面的两间之间并没有间隔墙，因此实际上是一间大屋。妈妈和辉楠睡在一张单人床上。有一张桌子既用于吃饭，也用于辉楠和轴材做功课。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蜂窝煤炉，在冬天既用于取暖，也用于做饭。全家人也是在这间大屋里吃饭。因此，大南屋是整个张家活动的中心。我被安排进了最北面的小屋，还加上一个蜂窝煤炉。另一间北屋里也有一张床，那是准备大哥有时留在这里过夜用的。大哥在军委政治学院工作，他和妻子在那儿的集体宿舍里有一间屋子。妈妈和周大娘一样，也是从去年开始在街道办的鞋厂工作。她一个月能拿到 20 至 30 元钱。这对于全家的经济状况也能起点缓和作用。

全家团聚的欢乐暂时掩盖了我提前回国的阴影。没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提前回来了？”第二天早晨，我来到新皮库胡同教育部。三年前，当我进入留学生管理司的那间屋时，那里的工作人员对待我是热情友好的，因为那时我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现在他们脸都变了。他们看见我递上的介绍信后，都互相瞧了一眼，然后一个女干部把我领到另一间接待室，收去了我的护照。当她得知我的家庭就在北京时，就温和地说：

“关于你的事情，大使馆已有材料寄来了。我想你和亲属住在一起，在家里是很好的，因为他们可以帮助你了解国内的情况。”

然后，她发给我一张我家所属派出所的介绍信，让我能把户口落下。她又给了我她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又向我要去府右街后胡同的公用传呼电话号码。

这就是说我要等待教育部来决定我的工作问题。最后，我被打发到会计室领取我一月份下半月的生活费 12 元 5 角。我记得

三年前我在北京过暑假时，每个月的生活费是 50 元。现在只剩一点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天下午，我就到派出所落下了北京户口。这以后，我又在我所属的粮店报上了粮食关系。这样我每月就有口粮了：粮食 31 斤、肉 1 斤、植物油半斤。这些都是凭证在指定的地点购买的。不过在饭馆吃饭和买糖果糕点还是不要粮票的。因此，如果善于节约又不买其他贵重物品，是可以靠每月给的这 25 元钱和定量口粮度日的。

第三天，我收到了克拉娃从列宁格勒寄来的信。克拉娃说 1 月 18 日晚上，当火车开出以后，她无法控制自己，就躲到火车站的厕所里大哭了一场。回到住处后，她从枕头底下拿出我写的纸条，然后又哭了一场。她向妈妈、辉楠和轴材问好。她说她将来到北京，要帮助妈妈做家务。妈妈对此也感到很高兴，她让辉楠，轴材各写了一张纸，经过我翻译成俄文，再加上一张全家福，附在我的回信里寄往列宁格勒了。

下午，我给教育部的那个女干部打了电话。她说我的材料已经转到国家科委专家局，并告诉我到那里去找一个名叫李崇修的人。于是 1 月 29 日早晨，我就坐 103 路无轨电车来到三里河国家科委。门房告诉我到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去，那里一个中等身材、面色黝黑并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接待了我。他询问了一些情况，然后把我领到另一间屋子坐下。当他拿着装着我的材料档案袋再次走进这间屋子时，脸变长了，说话声音也拉长了。

“你在学习中途被调回来了。你在那里都干了些什么？”

我低声说应该有大使馆的材料送来。

“材料当然是有的。但是你还得自己谈谈。”

于是，我只好重复一些在去年政治学习中说过的话。

“关于整风反右你都说了什么？”

我说这都是 1957 年的事，我是拥护这些运动的。

这个人接着就询问我的生活和家庭情况。当他得知我和一个苏联姑娘结婚了时，他把手中的钢笔略微举起，口张得大大的。

“啊？你结婚了！你所属的党支部批准了吗？”

“他们说我应该慎重考虑。”

“于是你就‘慎重考虑’并决定了？”

这个人告诉我明天早上再来一趟。他给了我他的办公室的电话号码和姓名。他叫丁森。他不是李崇修。

第二天早上，我按时来到这里。丁森领来一个瘦瘦的中年人并向我介绍说：“这位是李处长！”原来这才是李崇修。

李处长和我进行了很温和的谈话。但谈话的重点并不是去年我在政治学习中发生了什么问题，而是我不经过批准就和苏联人结婚的问题。他说我必须交代清楚我关于结婚的想法，不然的话……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到反正已经结婚了，还顾忌什么呢？第二天，我又去找李崇修，说由于自己被遣送回国，在前途和生活都没有希望的情况下，就想“另谋出路”。李处长听了以后说：

“春节快要来了。你可以先在家里过春节，春节以后交一份关于你的想法的书面材料来！”

春节期间，在呼和浩特市工作的一个叔叔和在长辛店工作的堂兄来到府右街。他们都问我为什么提前回国。我母亲抢着说：

“参加大跃进嘛！”

我只好保持一种沉默和含糊的姿态。

我从报纸上得知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进展情况。对于赫鲁晓夫关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将大致同时进入共产主义的论点，以及斯捷潘年院士关于这一问题的文章感到高兴。我想自己现在虽然遇到了一些挫折，但是从整个看，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我不敢让家里人看见我现在在写一份什么材料，于是就到邮局或府右街旁的北京图书馆阅览室去写。春节过后，我立刻去国家科委把这份材料交给了李处长。李崇修看了这份材料说：

“其实你自己不说，人们也能看出你的目的是什么。”于是他让我回家等着。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街道传呼电话通知我第二天早上到国家科委去。当我到达那里时，看见办公室里有六七个工作人员。李处长说这些人都是来“帮助”我，即批判我的。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次批判进行得比较缓和，我只被指责为个人主义严重。但是他们说我的问题目前还只是思想问题。但是如果进一步发展，就是政治问题了。

我中午回到家时，大哥正躺在床上等我。我一看妈妈不在家，就告诉他从1958年以后我所遇到的事情。我也说了我关于台湾历史的一些想法受到歪曲的事情。大哥听了这些以后说：

“这样看来，我没有受到其他处分就算是不错的了！”接着他又告诉了我三弟化声被下放到十万大山地区的真正原因：他因为发言批评单位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而被划为“中右”，在党内也受到了处分。

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我将在哪里工作了。我又去过几次中国专家局，但那里每次都告诉我说尚未决定。直到三月初才让我到中国科学院去工作。我来到中国专家局时，李崇修和一位正要出发到列宁格勒去学习的女同志谈话。丁森给这个女同志的临别赠言是：“注意，不要翘尾巴！”他说这句话时用一只眼睛看着我，实际上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我心中想到：“我都挨整一年半了，还有什么尾巴可翘？”

李崇修说我对党只有“半条心”。我感觉中国专家局似乎并不赞同驻苏使馆对于我的处理办法。“但是有什么用呢？我被遣送回国木已成舟，而我和克拉娃结婚则是生米煮成熟饭了！”我

又想到。

中国科学院的行政大楼离府右街北口不远，在北京图书馆旁边。于是我当天下午就到那里去了。科学院干部局的一位女干部告诉我说，我被分配到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我知道早在 1954 年中国科学院就建立了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中国古代史）和第二所（研究中国中世纪史），原有的近代史研究所改成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实际上历史研究所第一和第二所共有一套行政机构，因此一般称为历史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目前还没有世界历史研究所。

历史研究所位于建国门内，即北京城内东南角上。据说过去这里是人民解放军的海军司令部。1958 年底，海军司令部有了新楼，就把这里的旧楼让给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占据旧海军大楼后面的三小栋两层楼房。门房告诉我先到二楼二层的学术秘书处去。研究所的学术秘书骊家驹礼貌地接待了我，说干部局已经来过电话告知我要来。他说历史所几年来就听说有个张轶东在苏联学世界历史。显然关于我的材料还没有从干部局或国家科委转过来，这使我感到尴尬。骊家驹告诉我研究所的全部人员有一百多人，表面上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的所长是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第二所的所长是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兼，但实际上他们两人都完全不到所里来。现在主持所务的是副所长尹达，他也是研究所党支部的第一书记。另一位副所长是著名学者侯外庐，他主管科研工作。第三位副所长熊德基则主管行政后勤事务。全所共分五组 1. 秦汉史组 2. 隋唐史组 3. 元蒙史组 4. 明清史组 5. 思想史组。

《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部也附属于这个研究所。根据我的专业和论文题目，我应该到明清史组去。明清史组的组长是王毓铨教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大学毕业生，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学习，1950 年回国。骊家驹把我领到第一栋楼二层明清史组所在地。这一组大约有 15 人，主要是解放后从国内不同大学毕业的。他们听说分来了一个从苏联回来的研究生，就对我很热情。他们往办公室里加了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我就能上班了。

于是从 1959 年 3 月起，我结束了十一年的大学生活，开始了作为一名干部的工作。上班的第一天，组里的学术秘书常绍温给了我明清组 1959 年的研究项目表，我可以在这个项目表的范围内选题。我看见表内的许多项目都牵涉到他那篇没有完成的论文，但是又不完全重合，于是交出一份自己的论文提纲，建议最好让我先把自己的论文中关于耶稣会士的那部分写完。这个建议很快就被所领导批准了。我感觉这样一来不过是把自己的论文从苏联搬回中国来写而已。

每天早晨，我六点钟起床，到府右街北口西侧一个名叫“华安居”的小饭店喝点豆浆，吃点烧饼油条之类的早点，然后就凭那张三元五角钱买来的月票乘车去上班。我先坐 103 路无轨电车到王府井南口，然后乘 9 路公共汽车到研究所。这一般得用去从七点到八点的整整一个小时，因为这是正值上班高峰时刻，路上极端拥挤。工作时间是上午 8 点到 12 点和下午 1 点到 5 点。9 点 50 分到 10 点 10 分和下午 2 点 50 分到 3 点 10 分是工间操，这时大家都得出来做操。这个大院的四个单位共有一所食堂，我一般在这个食堂吃中饭，有时在这里吃完晚饭才回家。这样我就得预先把自己的北京市粮票换成食堂粮票。有时我在“华安居”或家里吃晚饭。只有星期日，我是三顿饭都在家里吃，那时我的那一斤肉票就派上用场了。由于在“华安居”吃饭和卖糕点不要粮票，我感到我的那 31 斤定量还是够吃的。

研究所的人事科长肖锋向我要去照片并为我办了工作证和公费医疗证。一天早晨工间操之后，我回办公室在走廊里遇见肖

锋。肖锋一看见我，脸上的笑容就消失了，脸也向另一旁微微一偏。这意味着关于我的材料已经转到所里来了。

但是这并没有立刻给我带来什么坏事。三月末我被通知说我的月工资是 66.5 元。这个标准不高，但是也不算太低。我每月大约用 40 元吃饭、购买日用品和书籍，还用 10—15 元供应妹妹念书。此外，和我多年来有来往的考古研究所有时也找我翻译一些东西，因此也给我一些稿费。这样，我每月大约能节约 20 元左右。我把这些钱存入储蓄所，以备克拉娃来时好用。我的生活过得稳定了。

我听妈妈和同事们说过一些去年大跃进中出现的疯狂和胡闹的事情。但是现在在北京市是平静的，只不过街墙上还有一些大跃进遗留下来的大标语。我在苏联生活多年所形成的思想方法和生活习惯，也遇到一些和现在所处环境不协调的东西。一个星期天早晨我出去买肉时，我不知不觉地用俄语对那个卖肉的说：“我要这块肉”。我对政治口号太多的中国广播不习惯，就把 1957 年带回国的那台“记录”牌收音机放在自己床边，收听海参崴或哈巴罗夫斯克的广播。于是每个晚上，这个小杂院里就飘出了俄语与苏联音乐的声音。我在上下班时注意到，无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售票员都是一些漂亮的姑娘，但可怜的是她们整天在拥挤的车厢里工作，也真够累。有一天晚上我在家里说：“这些小姑娘挺有意思的，哪天我得逗逗她们。”妈妈一听就正色地说：“这可不行！这是中国，你这样做人们会把你当成流氓的！”

最后一个迫切的问题是克拉娃怎么办？我每周收到她一封信，也每周寄给她一封信。我们互相之间非常想念，现在得想办法团聚了！我最后一次去国家科委中国专家局时，丁森告诉我，关于我的苏联爱人问题不归中国专家局管，我应该找外事部门。我虽然告诉了历史研究所我有一个苏联籍爱人，却不打算和

历史研究所讨论这个问题。我去过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北京市公安局的外事科。这两个地方的官员都对我说：中国公民的外国亲属来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长住，一种是短期探亲。短期探亲时能住三个月。在这两种情况下邀请者都必须向被邀请者所在地公安局的外事科致函，说他能保证被邀请者居留期间内的生活与住宿没问题。我回家和亲属们研究了这个问题，全家一致的意见是：克拉娃现在就抛弃学业到中国来长住不是明智的，全家为此负担也会很重。较为适宜的办法是克拉娃来临时探亲。北京市公安局曾经告诉我说：我所寄出的邀请信必须附有我工作单位的公章。我感觉我才开始在所里工作就提出这个问题不大方便，决定晚一些，工作一两个月以后再提。

我和留布林斯卡娅教授以及波里斯·波诺金也保持着联系。他们对我有了一份好工作，而且生活稳定感到欣慰，希望我在中国的条件下能很好地继续研究历史。我上班以后才知道有《参考消息》这份小报。据说右派分子不能读这份小报，但我不是右派分子，因此可以读它。我从《参考消息》上得知在西藏发生动乱的消息。在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我从《参考消息》上读到西方观察家评论说刘少奇当国家主席后，中苏关系将更为紧密。我对此感到欣慰。

(3)

“干部参加劳动”这项政策在历史研究所执行起来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长期下放，即每五年中一个干部就得到国内某地的一个公社和农民一起从事体力劳动一年。历史研究所在山东省有一个关系公社，每年大约有 20 人，即全所人员的五分之一到那里劳动一年。每年去那里人员的名单在春节前公布。他们过完春

节就走，明年春节前回来。当我开始在所里工作时，1959 年的下放名单已经确定，这些人已经走了。因此我没有“来得及”被安排进去。第二种形式则是每个工作人员每年得到北京市郊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所属的一个劳动站去劳动一个月。因此全所五分之四的人员大约 8—10 人，每年的 $1/12$ 时间是在那个劳动站劳动的。这些人的名单在前一个月公布，他们大约在该月 8 日那天乘坐一辆学部的大卡车到这个劳动站，在这里劳动一个月，又乘这汽车返回。第三种形式是：在科研所院内参加临时体力劳动，大概每周两三次，每次两小时。这样算一算就可以看出，即使不算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一个研究人员在五年之内只能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从事专业工作，而整个研究所也经常最多只有三分之二的人在从事专业工作。

四月份的一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从事体力劳动，为维修暖气管而挖地沟，突然被通知停止劳动，到小会议室去。当我来到小会议室时，看见那里坐着副所长尹达和其他十多个人，其中包括明清史组长王毓铨教授。尹达宣布说作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十大建筑之一的中国历史博物馆请求，让这十多个人去参加历史博物馆的建馆工作，为的是使该博物馆在 10 月 1 日能正式开馆。

中国历史博物馆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它占据广场东侧的南段，北段则是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两个博物馆的房子占据从长安街南侧到前门东侧的一段，与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东西对称。当然，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是来参加盖房子的，我们是来设计 10 月 1 日起在博物馆内的陈设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之间的分工类似历史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之间的分工，即历史博物馆展示从古代到 1840 年的中国历史，而中国革命博物馆则展示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历史。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单位派人来参加建馆，使得历史博物馆成为

了中国历史学界的“鞍钢”，即重中之重。历史博物馆的领导不分内外，把全部人员主要按照历史时期顺序分了组。此外还有一个美工组和一个地图组。于是这里也有一个由十多个人组成的明清史组。组里大约有一半是从历史研究所来的人，还有三个人来自人民大学。剩下几个是历史博物馆本单位的人，主要是讲解员。王毓铨教授被指定为明清史组组长。另有两个副组长，一个是人民大学讲师李华，另一个是我！这有点使我感到莫名其妙。“他们应该已经知道我是从苏联被遣送回国的了，为什么还让我当副组长呢？”

有一点使我感到更为方便了：历史博物馆离我家更近一些。我可以每天早晨七点钟才离开府右街，步行 20—30 分钟，经过北海大桥和西华门到博物馆上班。我一天三顿饭都在博物馆的食堂里吃。这当然得先换粮票和钱票。我主要的工作内容是设计陈列明清（鸦片战争以前）两朝的对外关系史料。这个任务和我的论文题目是吻合的。我还有个方便，可以为此从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图书馆借出书籍。但是作为副组长，我还得经常与王毓铨、李华等人讨论整个明清组的陈列工作。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和邓拓，还有周扬都来过这里，并且谈过他们对于陈列工作的意见。邓拓个子瘦小，说话声音和气。他精通明清史，1957 年以前是《人民日报》社长，现在则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之一。一天下午，突然所有工作人员都从办公室向院里冲去。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也走出办公室。我看见周恩来总理站在那里，指着一个木制的模型在说些什么，旁边是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他拿着一个拐杖站在那里。人们围着周恩来没有说话。当他登上小车离去时，大家对他鼓掌！

我上班有时在北长安街或西华门遇到乞丐向我伸手要钱。这使我感到困惑了：为什么呢？不是说过大跃进，特大丰收和吃饭

不要钱吗？可我遇到的却是乞丐！一天下午下班前，也是团小组长的副组长李华要求团员和包括我在内的青年留下一小会儿。然后他宣布说：“从六月份开始，北京市民的口粮中大米和白面占40%，其他的是粗粮。原因是：1. 去年有些地方减产 2. 粮食出口任务没有完成。人们说现在市场上买不到肥皂、火柴和许多其他商品。我感到更为困惑了。

我并没有读到郭沫若那篇关于为曹操翻案的文章，不过常常听到人们谈论它。一次文化部文物局长王冶秋来到历史博物馆，在全体人员大会上说郭老在重新评价历史人物方面贡献很大。他也同意郭沫若说的应该为殷纣王翻案。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明清史组从博物馆的仓库里找出来两幅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的最大画像，准备把他们陈列出来。虽然我还没有来得及参加历史研究所的工会，工会还是送给了我一张戏票，让我去看郭沫若编的历史剧《蔡文姬》。这个剧本把曹操描绘成一个很仁慈的人，他把被匈奴人掳到沙漠里去的才女蔡文姬接回中原，并让她有了稳定的家庭生活。据说有一位解放军的将军在看完这部戏后开玩笑地说：“如果曹操真的有这么好，我就要介绍他入党了。”我虽然承认曹操的一些历史功绩，但认为他的形象仍然不能和诸葛亮一样，因为诸葛亮是智慧和忠诚两者兼有的化身。

我开始感到从苏联被遣送回国一事对我有影响。我把论文的一节“16 世纪后半叶和 17 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人的向东推进与中国”写成一篇独立的文章，交给了《历史研究》编辑部，这是我同一研究所的一个兄弟组。但是两个月过去了也没有消息。和克拉娃的通信正常进行，克拉娃在信中表现非常思念我。于是五月末，我把我写的邀请信交给了历史研究所的行政办公室，希望研究所能在上面盖章。可也是两个月过去了，仍没有答复。我感到不便于催促这些事情，只好耐心等待。

一个下午，我和同事们被召回历史研究所去开了一个会。在研究所的大会议室里，我突然看见了程西筠。我对程西筠也在这里工作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许多留苏学生回国后是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或北京大学工作的。但程西筠的学习期限是四年，即使写不完论文，也应等到9月份才回国。虽然这是一个整过我的人，但毕竟是老同学。于是我会后就去和她见面。程西筠并没有告诉我她为什么提前回国了。她告诉我的是：我离开列宁格勒大学之后，我所属的那个支部里发生了两件丑事：一是杨增骐虽然已婚，却与一个苏联姑娘相好，使那个姑娘怀了孕。大使馆开除了杨增骐，杨增骐却拒绝回国，申言要申请加入苏联国籍。另一件事是曾宪廷偷了一套孙继志的中山装，送到寄卖商店想卖得一点卢布。孙继志发现他的衣服丢了，就向公安机关报案。于是公安机关在寄卖商店里找到了中山装，卖主是曾宪廷。根据苏联法律，这种盗窃罪是要判五年徒刑的，于是大使馆也只好把曾宪廷遣送回国了。这就是发生在苏联领土上一个中国研究生盗窃另一个中国研究生财物的事件。杨增骐和曾宪廷过去都是“进步”的，他们还曾经批判和整过我这个“落后分子”呢。

已经是8月下旬了。历史博物馆的新址即将建成，人们开始往那里移动并布置展览了。8月27日上班后，我在收发室从当天的《人民日报》头版上看到大幅标语：“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毛主席万岁！”然后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和《人民日报》社论：《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我还没有来得及阅读这份材料就被通知去参加全馆大会。会上宣读了这些材料。最后馆长在会上说全体人员要掀起一个新的跃进，保证新的历史博物馆在国庆十周年时胜利建成。他批评了工作中的缺点和一切纪律松弛的现象，说这些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在整个会

议期间，临时参加博物馆工作的美术专科学校的学生们不断地从会场后部喊口号。我感到我好像是又回到去年 9 月政治学习时的疯狂气氛中了。第二天，我从报上读到关于大跃进的定义，即工业增长率 20% 以上是跃进，25% 是大跃进。农业中 20% 的增长率就是特大跃进了。1959 年将是 大跃进年，因为钢产量将为 1200 万吨，是 1958 年产量的 150%。这样一来，1958 年的钢产量就不是 1070 万吨而是 800 万吨了，因为 270 万吨用土法生产出来的“钢”不能被算进去。但生产这些“钢”的成本也就被扔到水里去了。接着，我又从报纸上读到政府变动的情况，尤其彭德怀已不是国防部长了。莫非他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吗？

我感到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博物馆和历史研究所的人对我的态度都有了微妙的变化。窃窃私语地说我在苏联呆得太久，言行不太符合中国国情。一次，他们对我的这种评论公开化了：明清组想要陈列出一套清朝咸丰皇帝（1851—1862）年间的木制纺织机械，用以显示清代的技术进步和毛泽东的下述论点：“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我说我不同意陈列这一套木制机械，说这种木质机械在 19 世纪 的世界上已经不能够算是先进的了，因为早在 18 世纪英国已经发生了工业革命。此外，这套机械的出现时间既不属于明清组的陈列范围也不属于整个历史博物馆的陈列范围，这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东西，应该归革命博物馆收藏。但组内所有其他人都坚持要陈列这套机械。组长王毓铨教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这是领导上的意见！”他后来又对我解释说：“来参观的人又不懂历史，他们跑一趟，走马观花地看看就走了。何必那么认真呢！”我只好保持沉默了。

在布置展览的同时，也在装修历史博物馆建筑物的内部。一

天，我看见工人们在用边长 30 公分的正方形橡皮地板块铺底。工人们告诉我说这样一块橡皮地板的价格是 12 元五角。因此像我这样有一个研究生留学学历的人的月工资 66.5 元也大约只能买五块这种地板块。那这整幢楼能值多少钱呢？对面的人民大会堂就更贵了。国庆前总共有十大建筑，总共得花多少钱啊？如果把这笔钱用于工农业生产呢？我想起两年前在列宁格勒的时候，苏联人也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但是他们也没有花这么多钱去搞庆祝呀！我们解放才十年。“是不是搞早了呢？”我想道。

但不久，我从报纸上看到“一切搞早了的观点都是右倾机会主义论调”，于是我也不敢公开地这么说了。9 月 15 日，我有事回历史研究所，中午从那里回历史博物馆路过闹市口的十字路口时，忽然听到十字路口南路末端大放鞭炮。我走过去看看，才知道是新建的铁路北京站落成交付使用了。我并不知道，就在前一天的晚上，毛泽东还来过这里呢。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猛然醒悟到：原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对于我自己今后的命运也是有不利影响的：我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希望了。如果 1959 年上半年的那种政治气氛能够继续下去，1958 年我被遣送回国的不公正性就可能被承认。那时即使没有政府派遣，我也可以凭着亲属关系重回列宁格勒，并完成自己的论文。现在这个可能性变得渺茫了。

我从苏联回国已经半年多了，但是和 1956 年回国度假不一样。我一次也没有去北京大学看自己过去的老师和同学，因为我实在无法解释自己提前回国的原因。但是人们还是逐渐地知道了这一点。一个星期天下午，现在已经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的朱庆永突然到府右街后胡同来看我。朱庆永教授一看见我就叫道：“你怎么搞的？”

我估计到自己的母亲现在也不清楚我提前回国的原因，就把

朱庆永教授拉到华安居去吃饭。我在饭桌上简略含糊地告诉了朱庆永去年对我发生的事情以及我和克拉娃结婚的情况。

其实我的遭遇和彭德怀元帅的遭遇比较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那可是经过几十年枪林弹雨的革命家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大元帅里，也只有他率兵在恶劣条件下和现代化武装的美国军队作战过的！我还不知道，就是在这些日子里，在府右街另一侧中南海的怀仁堂里，彭德怀元帅正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接受残酷的斗争哩！

(4)

国庆十周年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回到历史研究所上班。我才得知在这段时间里，历史研究所里建立起了世界历史组。这个组有十多个人，主要是今年夏天从列宁格勒大学毕业回来的本科生。因此他们都认识我，有些人去年还整过我。不久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最后一名研究生孙继志也不写论文回到历史研究所来工作。因此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的全部六名中国研究生都因为不同原因未能达到完成研究生毕业的标准而回国了。国家为培养他们花了不少钱。程西筠被指定为世界史组的组长。我真有一点“冤家路窄”的感觉。但是世界史组在第三栋楼而明清史组在第一栋楼，因此我和他们打照面的机会并不多。

有一件好事所里告诉了我，上面已经同意我的妻子克拉娃到中国来探亲三个月，也就是说给我的邀请信上盖了章。我把邀请信寄往列宁格勒去了。我一面感到宽慰，另一面又感到不安，因为这时北京肉食和奶类的供应已经愈来愈紧张了，克拉娃能过得惯这里的生活吗？工作半年来，我也没有攒下多少钱。

我回到所里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被通知去从事一年一月的体力

劳动，地点是学部在居庸关的劳动站。于是 11 月 8 日那天，我就和几个研究所的大约 40 人（其中历史研究所约 10 人）乘学部的大汽车来到这里。居庸关位于万里长城与著名工程师詹天佑所建的京张铁路交叉处。劳动站位于山脚旁，一侧是铁路，另一侧是山。这里景色阴暗，不时地刮着寒风。“劳动者们”都住在一间大长屋子里，靠墙三分之二宽的地带是一个大板铺，每人在这上面可以获得一米宽的地方睡觉，剩下沿着门一方的外墙约三分之一宽的地方则是通道。大家每天三顿饭都在一块吃。劳动时间和在所里上班一样，但是早饭前晚饭后都有政治学习，要谈自己“劳动中的思想收获”和读报等。劳动内容是用草绳包裹种在山腰的苹果树干，好让苹果树度过冬天。应该说劳动并不很重。

一天，这些“劳动者”正在吃中午饭时，学部的大汽车来了，说是要接我们回城参加一个全学部的党外人员大会。这会在东单附近的一个俱乐部里举行的。报告人是学部党委书记刘导生，1957 年 11 月在列宁格勒时我曾见过他。刘导生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一件决定中国和世界命运的大事。”他说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系统内共清查出了十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中唐棣华是文学研究所所长，我后来得知她是黄克诚的爱人。历史研究所下属《历史研究》杂志的编辑刘浩然也是一个。虽然这场斗争限于党内，但是也号召一切愿意跟着党的党外干部积极参加斗争，对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狠狠地斗！

开完会回到劳动站以后，这些“劳动者”们有两天没有出工，而是被要求写大字报，批判那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本单位的右倾现象。第二天下午，他们又到附近外交部的劳动站去阅读那里的“劳动者”们写的大字报。我读到一个名叫郭城的人写的大字报。上面说：1958 年他在国外工作，因为右倾思想严重而被调回国了。“这个人和我一样倒霉。”我想道。

在居庸关最后的十天劳动已经是 11 月末和 12 月初，天气愈来愈冷。包扎苹果树的活已经干完了，就改为到山里去打柴禾。12 月 8 日，学部大汽车送来 12 月份的劳动者，并把 11 月份的劳动者接回家去。当我再来到历史研究所上班时，发现所里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正处于高潮，一切研究工作都停顿下来了。据说刘浩然之所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因为对去年在大学生中发动的学术批判运动“有不同看法”，向北京大学学生们写过信，劝他们对教授们进行学术批判时不要太走极端。当他得知自己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之后，曾经想投河自杀，但因为家室之累而没有这样做。在 1959 年剩下的二十多天里，所里的每个工作人员都被要求写一定数量的大字报，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我也勉强地写了几张大字报来批判刘浩然和所里的“右倾思想表现”。所有三位副所长都在全所大会上作了检查。我通常带着一本小说或杂志去开会，开会时就看这些东西。我知道这样做不好，但是浪费时间去听那些空洞的发言实在是太可惜了。

虽然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是党内的事，运动后期却安排了让所有的党外工作人员“自愿向党交心”。这使我想起了去年的“向党交心”，我交了三次心，每一次都没有被通过，我说的话只能一次一次地被分析为更严重的问题，最后被遣送回国了。我决定这回啥也不说。明清史组的人一个一个地都“向党交心”。每个人都说一开始他对去年的大跃进不理解，后来经过“学习”、体力劳动以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懂得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伟大意义。当他们“交心”时，团小组长一再“提醒”那些还没有“报名”的人（其实全组只有我一个）快点交心。最后他在一次小组会上，直接问我说：

“你要交心吗？”

“不。”我回答说。

这个答复太令人惊奇了。但是团小组长还是保持着克制，休会时他把我拉到走廊上和气地对我说：“你用不着什么事情都谈，只谈一些你想谈的事就行了，例如你在学术研究方面的想法等。”

但是我坚持说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事。我不是党员，也不是团员，因为我没有转团关系，而且我的年龄已经超过 28 岁，即能留在团内的最高年龄，所以我可以不交心。

这种事例在明清史组或历史研究所独一无二。在其他研究所也几乎没有这样的事情。我在领导那里出名了，不过反应也来得很快。

这是我脱离学生生活后第一年参加工作，我不知道每年年终时有奖金发给每一职工。12 月末的一天下午，我在一次全所大会上才得知这一点。人事科长在会上宣布说：1959 年度的年终奖金叫“跃进奖金”，每人 30 元。但并不是每一个职工都平等地得到 30 元，而是分四等：一等 45—50 元，是发给先进工作者的；二等是 30 元，发给一般的工作人员；三等 20 元，发给一些今年在工作中有一定缺点和错误的人员。四等零元，少数在政治上有严重立场错误的人，尤其是在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表现恶劣的人。因此，“先进工作者”们所得的多余的部分，来自第四类人的那一份额和第三类人物的被扣除部分。每个组可以提名研究所内哪些人可被列入第一、三、四类人物，这三类人员的名单经所领导批准后，其他的所有人都是第二类，并拿那 30 元。

于是各组就分头去制定第一、二、三、四类人物的名单了。当我上完厕所，来到明清史组的会场并坐下时，看样子似乎提名已经结束了。组长王毓铨教授问道：“我们组有没有在第三类和第四类里的人？”

“有的。”团小组长回答说，并把名单递给王毓铨教授。王

毓铨看了后点了一下头。

于是团小组长开始宣读名单了。明清史组里没有人在第一类和第三类人物里，现在开始宣读第四类人物名单了：

“…郝镇华、张铁东、阮于葵…”。大约 6—7 人，为全所人员的约百分之五。

我听说过郝镇华和阮于葵这两个右派分子的名字，虽然并不认识他们本人。全组都同意了这一名单。我自己什么也没说，开完会就回家了。第二天早晨上班后，我被通知再去会议室。这是组里一次专门批评我和向我“解释”我为什么被列入第四类人物的会议。理由是：我在苏联学习期间“可能”犯过错误，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和在居庸关劳动时“表现消极”。但主要的原因还是我抵制了伟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我在开会时不是读小说就是看杂志，甚至公开拒绝向党交心。最后问我有什么意见时，我说没有什么意见，我今年干得不够好，争取在即将到来的 1960 年干得好些，要至少拿到二等奖金。下班后在回家的无轨电车上，我听见两个坐在后排的妇女在议论她们那个单位“跃进奖金”的情况。一个说，每个单位都有几个什么也拿不到的，因为他们有政治问题。

30 元钱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工资。拿不到这些钱对我并不是完全无所谓的，何况克拉娃要来了。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困难，问题是怎么对家里说这件事呢？最后我只好撒谎了。一天晚上我“顺便”对妈妈说：“我们单位发了年终跃进奖金。我因为没有干满一年，所以没有拿到。”

从理智上来说，我懂得拒绝向党交心是愚蠢的，也太僵硬了。我也看得出来在明清组的这些同事们还是愿意做学问的人，不是像程西筠和杨光远那样的“运动派”人物。他们不过是不得不这样做而已。但是去年“向党交心”的经历太痛苦了，一听到

这几个字我就怒不可遏，无法克制自己去坚决拒绝此事。对于拒绝所引起的结果也毫不后悔。

不仅是 1959 年，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都结束了。1958 年以前，我的生涯是沿着一条上升线而伸沿的。从 1958 年起，我的命运开始下滑了。在 1958 年底和 1959 年底，我连着向下滑了两大步。在即将到来的 20 世纪的 60 年代里，我还将沿着这条下滑线下坠，但还是没有到达我命运的最低点哩！

第五章 1960 年 大饥荒

(1)

新年之前，我收到和克拉娃一起住在列宁格勒新萨拉托夫卡那房屋中的瓦夏与安妮娅的贺年信。他们说我在离开列宁格勒后留给他们很好的印象。他们说克拉娃现在变得比较瘦了，这可能是因为想念我的缘故。这使得我又重新回味 1959 年 1 月在新萨拉托夫卡时和普通苏联人之间的那种友情了。

但是在克拉娃的来信里却有一个坏消息：她的父亲去世了。她去梁赞葬父之后，将母亲领回列宁格勒和她一起住了一段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她就不能立刻离开母亲到北京来看我了。这虽然不好，但对我又起了一点缓解作用：北京市肉类和奶类食品的供应情况变得更糟糕了。每人每月的肉票从一斤减到六两。虽然妹妹辉楠身体还很弱，而且今年夏天将参加高考，却订不到牛奶了。定量减少了，不用证购买的食品价格却上涨了。例如现在在华安居吃饭更贵了，我每个月能攒下的钱就很少了，大概也就是十块钱左右吧。面对日益高涨的物价，这根本不算什么。如果克拉娃现在到北京来，我将怎样养活她呢？

我主要的困难其实还不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1959 年末分配“跃进奖金”之后，我已被定为历史研究所中的第四类人员。克拉娃来了之后，如果遇到一些问题，我这个“四类人员”怎么好去向自己的单位求助呢？目前形势是我不仅在历史研究所内成为一个落后分子，而且在社会上也是一个落后分子。

一些“大跃进”的气氛又重新出现了。据说北大校园内贴满了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大字报，但马寅初还是没有投降。又掀起了建立城市人民公社的运动，在府右街后胡同也办起了居民食堂。我曾经有几次从这居民食堂买包子当作晚饭。这里的包子比学部食堂的包子卖得贵些，比华安居的包子卖得便宜些，是要粮票的。因此我感觉这街道食堂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报纸上大肆宣传工业中的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和半自动化运动。关于赫鲁晓夫流行着一些窃窃私语。还议论说苏联电影《一个人的遭遇》和《第四十一》等都是散发和平主义气氛和敌我不分的。这种对于苏联态度上微妙变化，也使我感到自己在府右街后胡同的生活有些尴尬。这个胡同的人都知道我有一个苏联妻子，而且不久就要来。我习惯于听苏联广播，于是每天晚上就出现了俄文声音。有一次，妈妈对我说：“你只听苏联广播，不听中国广播不好。”我则认为，关于中国的情况我每天可以阅读《人民日报》，而关于苏联的情况，却只有通过广播才能马上知道。此外，我已经醉心于苏联音乐，把这当作是我唯一的娱乐方式。在国内政治气氛如此沉重的情况下，我这个“落后分子”和“四类人员”听中国广播是感觉不到轻松的，那里只有政治上的大喊大叫。而苏联的抒情音乐则能使我感到宽慰。只要有一晚上听到“山楂树”这样的一首乌拉尔民歌，我就感觉自己所遭遇的那些不幸都会像烟云一样散去了。我怎么能放弃这个呢？

于是我有了一个想法：即以为我在北京生活下去，在历史研究所继续工作下去只会愈来愈困难，克拉娃来后将更困难。现在我当然不可能再去苏联和克拉娃生活在一起。因此我需要寻找一个“过渡时期”的栖身之地。我从报纸上看到黑龙江省的省会哈尔滨市近年来发展得很快。哈尔滨过去被称为“东方莫斯科”，那么可能克拉娃对那里的环境更能适应一些。哈尔滨离苏联较

近，来往路费也能少一些。而最重要的是在哈尔滨我或许会更为易于寻找出一条再去苏联的途径。

2 月份春节后，历史研究所里进行了一些改组。新成立了一个八个人组成的学术情报组，这八人中有三个人，即我，常绍温和吴光耀（1959 年被分配来的广州中山大学毕业生）是从明清史组调过来的。组长则是那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刘浩然。情报组的办公地点在第二栋楼的第一层。我的工作任务是阅读苏联的历史刊物并观察苏联历史科学的发展趋势。我对这个工作其实是很满意的，但从生活情况看，我感觉自己已经不能长期在这里呆下去了。于是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就向所领导递交了一份报告。我在报告中首先承认去年我在所里的确工作得不太好，但可能我的具体情况使我不适于在北京历史研究所呆下去。可能国内有些地方，比如哈尔滨市更适合于我。我说在哈尔滨有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分院，说不定历史研究所的领导能帮助我调往那里。这对于科学院和我都是好事。

3 月 1 日早晨，我刚上班就被肖锋叫去。肖锋对我说：“所领导正在考虑你的建议，说不定这是可以接受的。不过现在政府正在集中归国留学生进行政治学习。你必须马上到那里去！”

这次学习的地点在北京西郊外语学院。还没有走进这学院，我就看见三五成群、穿着同样衣服的人，这情景和我在苏联时所看到的很相似。突然我遇到了在列宁格勒大学同一支部的经济学研究生陈国锋。当我走进报到处时，看见在一张办公桌后坐着李涛，即当时的驻苏使馆留学生管理处主任和现在的教育部留学生管理司副司长。李涛和我互相之间惊奇地看了一眼。李涛站起来并伸出右手，但不是伸向我，而是伸向我之后走进报到处的几个女学生。我当然也没有兴趣去和他说话，更谈不上和他握手了。我马上转向坐在另一张桌子后的女秘书，把历史研究所开的介绍

信交给她，并忍不住说：

“我已经回国一年多了。我现在是一个普通的干部，和留学生系统已经没有关系了。为什么还要把我叫到这里来呢？”

那个女秘书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说这次学习需要占用两个月的时间，即3月份和4月份。而且除周末外，每天晚上也要讨论。因此要求所有人都住在外语学院宿舍里。我在府右街的家虽然离魏公村不远，也不能在家住。

于是那天晚上，我就带上我的牙具袋来到外语学院，并开始住在那里。和我住在一间屋的有陈国锋、莫斯科经济学院的研究员秦国翹。陈国锋和秦国翹二人现在都在中国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工作。同屋的第四个人叫杨军，是莫斯科某一工业学院的本科毕业生，现在在沈阳的一家工厂工作。他们三人都是从苏联回国不到半年，而我则是已经回国一年多了。有什么必要非得把我找回来参加这次学习呢？这是什么意思呢？

据说是教育部委托外语学院党委组织这次学习的，并为此建立了一个办公室。学习的第一阶段是所有归国学生都要到学院附近的四季青人民公社去劳动几天。在四季青人民公社的劳动，其实和去年冬天在居庸关的劳动差不多，而且春天在户外劳动比冬天在居庸关劳动更惬意一些。四季青公社的农民给他们吃得还可以，每天都有一顿面条。一天晚饭后讨论前，我在乡间小路上散步时，信步走进一个小饭店，在这里才得知现在在北京城郊的饭店里吃饭都已经要粮票了。

劳动结束回到外语学院宿舍，这次政治学习就正式开始了。第一个节目是教育部副部长蒋南翔所作的动员报告。蒋南翔说从去年开始，所有留学生回国后必须先经过一段集中训练才给分配工作。这是因为1958年以后回国的留学生常有说话做事不符合国情的现象。他们还自以为是，其实他们错了。也就是说，留苏

学生的政治废品率高。在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有不少归国留学生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党员还被开除了党籍。因此这次政治学习就是给你们这些才回国的学生打预防针。你们在这里可以谈出你们一切对于国内形势不理解的东西，并把自己的认识提高到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公报的水平上来。但是在这次学习结束和你们离开外语学院以后，你们就要自己对自己说的话和做的事负责任了。最后，蒋南翔提到在中苏之间的确存在着一些观点分歧，例如对于“和平过渡”等。又如中央领导同志认为苏联影片《一个人的遭遇》有问题（据陈国锋说，此片在国内已经停演）。你们在与苏联朋友和周围其他人接触时，关于这些要好自为之。

这一天是星期六，所以我可以回家过夜。我向大哥讲述了蒋南翔报告的内容。大哥说：“这一切都是明白的。但是你都回国一年多了，为什么还要把你召回去参加这次学习呢？”接着他想起了一些什么又说：“通常这种学习一般都是有重点的批判对象。”他不无顾虑地看着我。我也感觉自己心口上的压力在加大。但是我还是没有意识到我现在就像是 1937 年平型关战役中的那个日本板垣师团，已经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了。

后来，我还得知，去年夏天第一批归国留学生在这里学习时，康生曾经训斥他们说：“你们这些留学生是欠了共产党的债的！”其实留学生们欠的不是共产党的债，而是中国人民的债，他们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生产物质财富或精神财富，而不是跟着毛泽东到处瞎折腾。而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搞大跃进，糟蹋了 1200 个亿，又是欠了谁的债呢？

到星期一早晨时，据说集中起来的归国留学生已有约二百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正在工作的地方，一般都工作了几个月或半年，但却没有一个人是像我这样已经回国工作

一年多的人。另外有一小部分人则是刚从苏联回来，在这里学习等分配。这 200 个左右的学生被编成五个支部，每个支部大约 40 人。我在第五支部，支部书记曹英是从保加利亚一所经济学院毕业回国的本科大学生。支部又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约 10 人。我在第三小组，组长林方刚从莫斯科一所工学院毕业回来。

这次政治学习的程序，与留学生们过去在苏联所经历的那些政治学习大同小异。一开始时由一位官员作政治报告。第二步就是讨论，伴随着阅读一些报纸上登载的材料或文件。在过去的政治学习中，讨论这一阶段的气氛还是宽松的。而这次，每一个归国留学生在讨论阶段就感觉到了一定的压力，因为他们被要求的不是说出他们同意国内的什么东西，而是说出他们不同意什么。此外，每个人还必须写出几张大字报。什么都不说是不行的。但是谁知道，你要是说点什么后果又会如何呢？不过在宿舍走廊的墙上大字报还是出现了。有的人说土法炼钢练出来的实际不是钢，有的人对 1958 年的粮食产量表示怀疑。我现在则是处于极度尴尬之中。我既然回国较早，就应该显得比别人多懂一点什么似的，但是我也得通过发言或写大字报表达对于一些事物的怀疑态度。我寻找出的一条出路是表达我对一些理论观点的不同解释。我把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了一个比较。我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 1925 年联共第 14 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即“把我国从农业国转变成一个能生产自己的机械设备的工业国，这就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实质与基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则是 1958 年中共 8 大 2 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说苏联的那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比较具体一些，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则似乎太抽象了一些。因为在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上，人们都是愿意多快好省的。例如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不是同样可

以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吗？

在讨论我们对与群众运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时，我对“气可鼓而不可泄”这一论点提出了不同看法。我引用了中国古代春秋时期的一个故事：鲁国军队面对齐国军队时，第一鼓和第二鼓冲锋时坚守阵地不动。在第三鼓时，齐国军队实际上已经泄气了，鲁国军队于是擂鼓出击，大获全胜。鲁国军队将领曹刿解释说：胜利的秘诀在于“一鼓作气”。因此“气可鼓而不可泄”其实是不可能有效的。

够了，我用外国的例子来否定总路线，又用古代的例子来否定群众运动。其实即使我没有说这些话，我也早已被内定为要杀来给猴子们看的那只小鸡了。我感觉学习办公室的支部书记曹英和小组长林方始终注意着我。虽然没有宣布学习的第三步是干什么，所有学生都知道在每一个支部里，都物色出了几个重点批判对象。这些批判对象之所以被找出，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学习中说了一些什么，还主要是由于他们在苏联学习最后一时期的“落后表现”。而对于我来说，就是算一次 1958 年以来的“总账”了。其实关于我的材料已经传达给支部内的党员们了。在小组会上开始有人批评我学习态度不严肃，发言中观点有错误。接着曹英和林方又和我作了个别谈话，要我在支部大会上作检查。第五支部有三个重点批判对象，“轰击”他们的大字报已经贴满了宿舍走廊。批判前两个人的支部会已进行过，其中有一个竟是秦国翘。原来他也有个苏联妻子，他是在 1959 年 10 被勒令退学回国的。

明天该轮到我只唱“压轴戏”了。但是这天下午曹英突然把我找去。在谈论我的检查材料时，曹英“顺便”叹了一口气说：

“其实，我们也不好说，只要你的态度好一点，我们也可以不开明天的批判会。此外，或许我说得早了一些，我们对与你的

希望还是很大的……。”

他说的“我们”是谁？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但是我立刻就懂得了：如我能够结束和克拉娃的婚姻关系，我就不仅可以不被批斗，而且还能够得到一些什么好处。于是我回答说：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

对我的轰击并不是在第二天的会议上，而是当天晚上就开始了。有几个人在我所住的寝室门前贴上了大字报，并大声朗读起来。在支部批判会上，有人说不能称我为同志，因为我已经不革命了，再往下走一步，就是反革命了。我自己经过 1958 年以来杨光远、程西筠之类的“运动派”一再收拾，也“锻炼”成了一名“战士”。我宣读完自己的检查材料后，就坐下来记录对我的批判发言，不作任何答复。我感觉轰击的火力并不像 1958 年在列宁格勒受到的轰击那么厉害。其实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时杨光远和程西筠对我是又妒忌又恨，欲置我于死地而后快。现在周围的人临时凑在一起的，我们之间没有利害冲突，虽然这批判是经过精心组织的，人们也只是“奉命出击”。有的批判不过是朝天开炮而已。1958 年 10 月时，我是处于被遣送回国的前夕，现在我已经“死猪不怕开水烫”，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批判会结束，对我的轰击也就过去了。

学习的最后阶段是通过每个人的学习总结。这时大约是 4 月 20 日，看样子学习就要结束了。但恰好在这时发表了《人民日报》的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接着又是另外两篇。为了讨论这三篇文章，这次政治学习又延长了几天。讨论中没有一个人同意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大家都颂扬说这三篇文章有巨大的威力。和我同屋的泰国翹说，这是给苏联贴了三张大字报。一天晚上，全体留学生被组织到首都剧场去看话剧《同志，你走错了路！》这是一出老话

剧，批判抗日战争初期王明和国民党打交道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看完戏在从剧场返回外语学院的大汽车上，一个学生开始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顷刻之间所有的学生都唱起来了。我也放开喉咙唱这首歌。整个汽车都充满了歌声。学生们经历两个月的精神压抑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许多学生懂得今后他们将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了。我感觉这两个月的政治学习其实并没有给它的组织者带来什么。

在解散之前的最后几天里，学生们才有点时间和自由，互相谈论自己的生活。秦国翘悄悄地告诉我说，在 1959 年，有许多留学生被遣送回国的情况，原因只不过是这些人有或可能有苏联的异性朋友而已。而且遣送的方式很紧迫，往往是事先为你买好了火车票，然后就是通知你走！

4 月 29 日那天，我们参观了北京大学的教育革命。这虽然是我的母校，我却很怕在那里遇见熟人，自始至终把自己放在参观人群中心部分。北大党委的一位委员在向留学生们介绍北大大跃进的情况时说，该校的前校长马寅初是一个带有花岗岩脑袋的人，于是他被免职了。“那么说和马寅初比较起来，我只不过是有一个小小的花岗岩脑袋而已。

参观结束回到外语学院以后，学习办公室通知我可以回原单位了。于是午饭后，我手里拎着牙具带，肩上扛着我那小小的花岗岩脑袋，离开了魏公村外语学院。

(2)

在从魏公村回府右街途中，我看见西四一家食品店门前人们排起了长队。我也不等问清是怎么回事就排了进去。排队后我才知道是在卖鸡鸭的头、脖子和爪子，而且是不要肉票的！据说这

这些东西来自人民大会堂。不久前刚开过二届人大第二次大会。这些鸡鸭的肉都进了人大代表们的肚子，而它们的头、脖子和爪子就到这里来了。我总算是买到了两斤。当我正走出商店时，听见里面喊叫道“没有了，没有了。”这些东西使得我的家人过了一个比较好的“五·一”节。因为这东西上面虽然没有什么肉，用他们熬出来的汤还是蛮不错的。

5月2日我又回到了历史研究所上班。我先到人事科向肖锋报到，并问关于我调往哈尔滨的事办得怎样了。肖锋拉长脸含糊其辞地说：“我们已经把材料寄出去了，但还没有收到答复。”

可是直到5月末，肖锋也没有给我什么消息。我开始怀疑所里到底是真的在为我办理调转，还是不过是在糊弄我而已。联系到我在外语学院挨了两个月的整，我心想，这不过是一种逼迫我和克拉娃离婚的尝试而已。

克拉娃的来信中说她母亲已适应了她父亲去世后的现实，因此她现在可以离开母亲来看我了。但是我上次的邀请信已经过期失效了，我应该办一份新的邀请信寄过去。这一下我可犯难了：新的邀请信应该从那里发出呢“克拉娃应该到哪里来呢？是北京呢？还是来哈尔滨呢？”我自己真的不久就会被调往哈尔滨吗？怎么办呢？

我想最好还是自己去一趟哈尔滨，找科学院黑龙江分院直接联系工作。但是这就得向历史研究所请假。可是如果所里不给假怎么办呢？我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决定先斩后奏。

6月7日，我从永定门车站等车先去天津，然后又从天津转乘另一列车去哈尔滨。我没有从北京站走，是因为北京站离历史研究所太近，有可能被同事看见。这是我解放后在国内第一次乘火车旅行，此前多数是在苏联坐火车或乘坐国际列车。也正是这一次旅行，才使我知道国家是处于多么严重的局面之中。列车异

常拥挤而肮脏，因为有不少逃荒的人，主要来自山东省。他们的行李挤满了车厢的每一个角落。在天津时，我才知道现在除北京以外，在中国所有的城市饭店里吃饭都要粮票了。在火车上每个乘客可以凭车票买两个面包，卖面包的人用红铅笔在你的车票上划上一道红线之后，你就不能用它再买一次面包了。

6月9日清晨，我来到哈尔滨。在道外16道街的春升旅社要了一张床位。第二天早晨，我找到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分院。我对分院管人事的那位同志说，北京历史研究所是否曾经与他们联系，将一个名叫张轶东的人调来这里，我了解这件事进行得怎么样了。那个人说他完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我回到春升旅社给历史研究所写了一封信。我首先为自己的未经允许离开而表示道歉，接着就叙述了我在黑龙江分院遇到的情况。我建议所里把我的材料寄来，自己则在这里等材料到后直接与分院交谈。

等待历史研究所答复的几天里，我在哈尔滨市内闲逛。这个城市比北京小而脏。在南岗区的中心有一所东正教教堂和一些俄罗斯式建筑，但是住在这里的俄罗斯人已经不像我所想象的那么多了。我看见几个俄罗斯妇女也站在食品店前的长队里等着买什么。车站附近盲流很多。有一次，我碰巧买到一个不要粮票的面包。一个怀中抱着孩子的妇女走过来对我说孩子饿得直哭。我就掰下半个面包递给这孩子。不想这孩子没有拿稳，半个面包落到脚下的污泥里了。这个妇女给了孩子一巴掌，蹲下捡起面包，撕下沾着污泥的一部分塞进自己嘴里，把干净的一块给了孩子。一天，我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图书馆去看报，在学校门旁，我用两元钱买了一小包（仅仅四两）不要粮票的饼干。阅览室是不许带书包进去的，我就把自己的手提袋放在阅览室门前的一张长条桌子上。当我看完报从阅览室出来时，发现手提袋里的那一小包饼

干不翼而飞了。显然这是一个挨饿的穷大学生干的。

6月18日，我收到北京历史研究所发来的电报：“回所处理工作，立即返京！”于是我的这趟哈尔滨之行是一无所获了。但是我总算是更多地知道了黑龙江省的情况，我想早晚自己还是要到这里来，这更为合适一些。我想起克拉娃说过，她在苏联远东的布拉格维申斯克市有一家亲属，而该市正好与黑龙江的黑河市隔江相望。我从历史上也知道，布拉格维申斯克中文名海兰泡，即“江东 64 屯”，1900 年被沙皇俄国侵占，曾有三千中国人被赶到黑龙江中淹死。于是我想在回北京之前也去看一看这个地方。我在黑河港口呆了一下午和一夜，看见苏联船只在黑龙江上航行，有时船上的人还向中国岸边招手，也看见对岸俄罗斯建筑物灯光闪闪。如果不是国境线的限制，我真想游泳到对岸去，再从那里到列宁格勒去找克拉娃。不过我还得回北京去上班。在回程一路上我看见的只是贫穷、饥饿、盲流和他们之间的争吵。

我在 6 月 26 日下午回到北京。在回家之前，我先到历史研究所去找肖锋说明情况。不想肖锋只给了我一个轻微的批评。我回家后给克拉娃写了一封信，说明我这次哈尔滨之行的情况，并说由于自己去向不明，给她第二封邀请信的事只好稍晚一些。

从 5 月份起，我每天下班以后从历史研究所回家走的路和我来时上班走的路就不一样了。我上班时是从府右街坐 103 路无轨电车到王府井南口，再从那里坐 9 路公共汽车到建国门。下班时我却是先坐 10 路公共汽车到六部口，然后再从那里坐 14 路公共汽车到府右街。我之所以这样走，是因为在六部口电报大楼对面的邮局里有一个书报摊卖苏联报纸，因此我可以在每天下班回家路过时买一份《真理报》。有一天下午下班后，在所里耽误了一会，来到这个报摊也晚了一点，所有的《真理报》都被卖光了。卖报员说这里每天只来 50 份《真理报》，卖得很快。我在读

《真理报》之后感觉在布加勒斯特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在北京有流传出了批评赫鲁晓夫“三和平”的窃窃私语。一天，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所属各所的工作人员都到东单附近的一个俱乐部去听关于“三和平”的报告。报告后，学部党委书记宣布说：每一个研究所都要组织几天讨论和辩论。关于一些“国外的观点”，实际上已经翻译出来并发表了，每一个讨论组在讨论中也可以找出一些报纸让人进行口头翻译。

在历史研究所，情报组与《历史研究》编辑部合并成一个讨论组，也有人找来《真理报》请我将其中关于苏联的三和平观点进行口头翻译。下一步就要组织全所的辩论了。这样就需要安排一些人出来为赫鲁晓夫的观点辩护。刘浩然转身对我说：

“或许你可以代表一方发言！”

“我不发言！”我斩钉截铁地说，甚至带有一些愤怒。我心想：“你们把我作弄够了，我可不愿意让你们当猴子耍了。”

于是他们找出了一个陈守仁来为赫鲁晓夫辩护。当然他受到了群起而攻之。有趣的是那些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毕业的，现在世界史组的成员们也起来反对陈守仁。他们甚至举出苏联历史上的例子来证明陈守仁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有趣现象”的根源很快地就明白了：到处都在寻找同意赫鲁晓夫观点的人。一天下午，我在 103 路无轨电车上偶尔遇到我过去的老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庆永，于是下车一起进北海公园散了一会步。朱庆永是进城去同仁医院看病后，在回家的路上坐上 103 路车的。朱庆永教授告诉我说他最近心情不太好，原因是在他们学校历史系教师讨论“三和平”时，他曾发言说赫鲁晓夫的观点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现在的世界形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不一样了。不想他的这一发言却受到全系党员教师的围攻。又过了几天，我的大哥告诉我说：有一个去年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

毕业，现在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助教（我知道这个人），在讨论三和平问题时，他完全同意“老赫的一套”。这一情况已经直接被反映到党中央去了。

到八月份时，我才得知所有在中国的苏联专家都被召回国了。所有跟随苏联专家的翻译们都被集中起来进行秘密的政治学习去了。历史研究所一名专门翻译苏联资料的人也被召去参加这一学习。我还听说作家巴人，现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真名为王任叔的，因为宣扬“人性论”而受到了批判。可能巴人的“人性论”被看作是赫鲁晓夫“三和平”的共鸣，于是他也倒霉了吧！

(3)

暑假以后，妹妹辉楠进入了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师范生是有助学金的，这对于家庭的经济情况也能起一点缓解的作用。现在只剩一个毛弟轴材在念高中了。9月里我又得去参加一年一月的体力劳动，劳动地点是北京城南23公里处的大兴县庞各庄公社张各庄大队。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这里买了好几顷土地并建立了一个劳动站，想生产出一些农产品来支持学部食堂和部分职工的生活。我在9月8日那天坐上学部的大汽车来到这里。同车的共约40人，其中五人是历史研究所的：组长陆峻岑、还有刘永成、孙达人，阮于葵和我。这五个人“争取干重活”，于是成立了基建组，伺候一个姓曾的瓦匠修猪舍，为他提供砖泥和挪动脚手架等。秋天在户外干活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干这些活必须吃得多吃，我很快地感到粮票不够用了。于是我只好每顿少吃饭多吃菜。所谓菜只是一样茄子，我每一顿都得吃它两盘三盘的。但是这样一顿饭只能坚持两小时劳动，这以后就没有劲了。不过瓦匠

老曾头是一个盲流，他几乎一点粮票也没有，完全依靠吃茄子生存。这样曾瓦匠每次在干两小时活以后也没有劲了。于是彼此彼此，大工小匠们都一起磨蹭地等着收工。

梨子和枣上市了。我每次遇见梨就最少买十斤。这能略有小补。星期天历史所的这五个人一起去逛大兴县城，看见那里一片萧条。我们只能在街上唯一的一家饭馆里，每人花二两粮票吃了一碗面片。一次劳动中间休息时，我回到暂住的农舍里取毛巾，看见那家的农妇正把一只死小猪放到锅里。这只猪并不是她家的，而是劳动站的，因死于某种疾病而被埋掉，现在却被这农妇偷偷地挖出来放进自家锅里。其实我的惊骇也没有持续多久，不久之后我自己也吃死猪肉了：国庆节期间，这些“劳动者”们有了一次吃肉的机会，因为又死了一头小猪。其实每个人分到的那盘肉也不过大约二三两而已！

10月8日，我结束劳动回家，发现城里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的口粮已经从每月31斤下降到27斤，肉则从6两下降到4两。包括华安居在内的所有饭馆吃饭都要粮票了，而且不供应肉菜。毛弟轴材在北师大的同学中，有些人家住中南海。据那些同学说，现在在中南海的食堂里，高干家属也不许买肉菜了。

我有一个表侄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有一次他到府右街来看我的母亲。他说清华大学党委教育他们说“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有两个学生叫嚷说粮食不够吃，就狠狠地挨整了。许多学生用酱油冲开水喝，结果闹浮肿了。其实报上到处也在宣传“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这一说法。谁敢怀疑这种说法？试试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前苏联农业集体化引起大饥荒时期，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拉·阿利卢耶娃在莫斯科农学院的一个同学，因为反映农村实情就立即被枪毙了。最近听说有两名解放军军官，在回农村老家探亲再回部队时，说在农村吃不饱饭，就被立

刻被送去劳动改造了！

当我 10 月 9 日回到历史研究所上班时，我得知现在又开始了一场新的干部下放运动。这次运动的名称比较直截了当：精简机构。据说历史研究所的大约 20% 的人员将被调离，其中大多数人将离开北京。每个人无论对自己的命运如何惴惴不安，只要是想在政治上表现得“积极”，就得报名，有的人还写了大字报或决心书。我觉得这一次对我来说要表现得“政治上积极”是很容易的，而且还是不装模作样的。我从哈尔滨回来已有三个多月了，而关于我的调转问题却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考虑到如果我是只想调往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分院工作，这条路子可能也太窄了。于是我马上报了名，并递上了一个报告，说我可以黑龙江省的任何一个单位中工作。至于关于我的苏联妻子问题，我可以当自己到达黑龙江之后就地解决。

我的这一行动不仅是由于经济情况，而且是由于我的家内情况促成的。妈妈和大哥已经开始劝我和克拉娃离婚。大哥作为中央军委政治学院的一名教师，显然对于当前中苏关系的情况知道得更多一些。他还“劝告”我停止和我过去的导师布林斯卡娅教授以及过去的同学波里斯·波诺金通信。每当他们提出这种要求时，我就设法更改话题。但是这种拖延战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如果克拉娃现在真的来了，那么我不仅在家庭内部，而且在整个府右街后胡同里都会非常尴尬。如果克拉娃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找我，例如说哈尔滨吧，我就可以单独地承担着一切不方便，对家庭的影响也较小。于是我在这次下放运动中变成一个真正的“积极分子”了。

纪念十月革命 43 周年的活动暂时掩盖了中苏之间的争吵。北京正举办苏联电影节。这些苏联电影使我重温过去我在苏联的那些岁月。有一部名叫《在荒凉的河岸上》的影片使我受到了触

动。这部影片描写的是一群在哈萨克斯坦建设水电站的人的劳动和生活。影片最后是总工程师、女党委书记和站长之间的谈话：

“‘我羡慕未来的年青人，他们将生活在蔚蓝色的天空下’，这是契柯夫说的话。”总工程师说。

“我不羡慕他们，年轻的一代将生活在共产主义里，而我们建设它！”女党委书记说。

“是的，让年轻的一代羡慕我们吧！”站长说，同时把他的双手放在这两个人的肩上。

我感觉自己既是“羡慕者”，又是“被羡慕者”。我刚年满29岁，还算是个年青人，但是也正在为自己的国家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事业忍受困难和做出牺牲哩！

在这部电影之后，我又在报上看到关于另外一部电影的广告：《以革命名义》。我在列宁格勒时就听说这是一出著名的话剧，不过因为戏票贵而未曾看过。我仅仅知道这部话剧反映的是十月革命后初期，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切卡”（非常委员会，即后来克格勃的前身）活动的一个侧面。现在这部话剧被改编成电影，票价就便宜了。我把这部电影的上映理解为苏联电影节的一部分。我买的是星期四晚上十点钟大华电影院最后一场的票。在电影开演前，我碰巧在影院门口的一个小贩手里买到二两重的一包的炒瓜子。这样我就可以一边看电影，一边嗑瓜子了。这些瓜子还可以起到大约一两粮食的作用哩！电影说的是1918年在莫斯科市内流浪的两个孤儿的故事。他们帮助切卡破获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影片的最后是列宁说的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

我一面看电影，一面感到有些莫名其妙。这真是我想要看的那出苏联名剧《以革命名义》吗？甚至演员们的身材，化妆和动

作都不像是俄罗斯人。只有在电影上映完我才明白真相：这完全是一部中国电影，不过使用一段苏联历史作为题材而已。我真有点受骗的感觉。但是为什么不上映《以革命名义》的原剧，而是要花巨资把它拍成这样一部电影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快地就来到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进入高峰。历史研究所的领导决定全所停止研究工作一个多月，全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在学习动员会上，副所长侯外庐大声说：“个人崇拜，崇拜领袖有什么不好呢？只是不要迷信就行了。”不知不觉地，报刊上“个人崇拜”这个词被改成了“个人迷信”。随着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报刊上出现许多回忆旧社会苦难的生活文章，文章中往往伴随着列宁的一句话“忘记就是背叛”！在历史研究所干部下放的动员大会上，发言者们经常慷慨激昂地引用道：列宁同志说“忘记就是背叛！”我感到困惑了：在列宁的哪一篇文章中，在列宁全集那一卷，哪一页，哪一行真的有“忘记就是背叛”这么一句话呢？在《以革命名义》的原剧中，列宁真的对捷尔任斯基说过“忘记就是背叛”这一句话吗？捷尔任斯基已经死去多年了，他怎么能出来证实列宁说过这句话没有呢？不管怎样，如果人为地把一句话硬装到伟大革命领袖的嘴上，然后又大肆引用，这就是很不严肃的了。而且“忘记就是背叛”的字面意义也太笼统了：如果我上街买东西而“忘记”了带钱包，那也是“背叛”吗？我“背叛”了谁呢？

“钱包”又引起了新的故事。我在每个星期五下班回家前都在学部大院的澡堂洗一个澡。11月中旬这个星期五，下班后我照样来到澡堂。在脱衣服时，我把眼镜和手表放进装钱包的口袋。洗完澡时我伸手进那个口袋取眼镜戴上。我感觉这个衣袋怎么是空空的呢？于是又摸了一次，随即大喊道：“我的手表和钱包哪里去了？”澡堂里的人都跑出来帮助我找，他们几乎找遍了每一

个角落。突然间门外有个人喊道：“门外水沟里有个钱包！”钱包被捡回来了，的确是我的，但已经是一个空钱包了，里面的12斤粮票和13元5角钱都不翼而飞了。手表也是毫无踪影。于是这件事被汇报到学部保卫处。学部保卫处结合院内最近发生的几起盗窃案件进行了调查，可是没有结果。

妈妈和大哥从自己的口粮中省出5斤粮票给我，让我能维持到11月底。我一日三餐在学部食堂或华安居用餐，每餐只敢用二两粮票。但现在学部食堂和华安居都是每顿饭只允许一个顾客买一碟菜了，于是我的晚饭有时只好一顿饭分两处吃：先在学部食堂吃一两饭和一碟菜，然后到华安居或别的饭馆再吃一两饭和一碟菜。即使如此，我还是老感觉饿，于是我就像一头野兽在山里到处觅食一样，在整个北京城里到处乱逛寻找可以吃的东西。每天从中饭后到下午上班前，我就凭着手上的那张月票坐着公共汽车或无轨电车在东城乱跑，今天跑王府井，明天就跑北京站，后天又去崇文门，大后天又去建国门。大多数情况我都是下午一点两手空空地赶回所里上班。我看见在所有食品店的货架上都只有一样商品：8角钱一瓶的橘子汁。一次，我看见在一家商店前面排了好多人，就立即排了进去。排队后我才知道卖的不是食品，而是饭碗，而且一人只能买两只。我不甘心白排队，就也买了两个饭碗。此外，也有极少数获得成功的情况：一次我花7角钱买到一瓶西红柿罐头，罐头里只有几个生西红柿，连盐都没有。另一次我则是买到了满满一饭盒的枣酱，于是第二天早晨就可以喝茶吃枣酱作早餐了而不用耗费粮票了。

我终于捱到了12月初，拿到了12月份的口粮，即粮票27斤，另有糕点饼干票（用半斤粮票卖7两糕点或饼干），糖票二两和肉票四两。糕点饼干票和糖票我马上就花掉了。我想把肉票留到星期天在家里用。可一天下午在王府井的一家食品店里正在

卖酱猪肉，当然是要肉票的。我因为 12 月份的肉票正在身上，也就买了四两。我想“就尝一口吧”，就捡起一小块塞进嘴里。可是一旦“尝”起来，就无法制止住了。还没有等我走出食品店的大门，这 4 两酱猪肉就已经荡然无存了。“哎呀，这个星期天可怎么办呢？”

在澡堂被偷一次使我有了一条经验，即不能把自己所有的钱和粮票都放在钱包里随身带着。但是我总得带着少许的钱和粮票以备眼下之需呀！12 月第一个星期五下午，我又来洗澡了。洗完澡穿衣服时，我摸一摸衣袋检查一下。我的钱包还在衣袋里，但是似乎有些空。我就把钱包掏出来检查。钱包里的 4 斤 6 两粮票，5 斤食堂钱票和人民币 3 元 4 角又不翼而飞了。我气得骂了起来：“这小偷太可恨了，我还能怎么保护自己呢？”

第二天早晨上班后，我刚坐下来要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时，肖锋进来对我说：“学部保卫处要你去一下！”我心里有点高兴：“大概是抓住小偷了！”当我走进保卫处办公室时，保卫处长也不请我坐下，直接问我说：

“你昨晚真的又在澡堂丢粮票了吗？”

“是的，”我回答说，并简述了昨晚发生的事情经过。

这一下保卫处长的脸可拉长了，他说：

“你第一次丢粮票时我们没有说你什么，但是难道你自己就不懂得应该吸取教训吗？现在这类事情到处都在发生。你这样大咧咧的不等于纵容小偷吗？回去写一份检讨，星期一上班时交给我！”

我认为对我的批评是正确的，于是星期日我在家里写出了检讨。星期一上班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学部保卫处送检讨，有几个同事向我跑过来说：

“张轶东，你丢的表找到了。有通知要你马上到东城区公安

分局去一趟！”

于是我马上去了东城区公安分局。在分局的收发室里，一个民警向我询问了丢表的经过，最后从衣袋里掏出表来问道：

“这块表是你的吗？”

“是的，”我回答说。

我在谈话记录上签字后，民警把表还给了我。我带着表回到学部大院后，先去了保卫处。处长不在那里，那里只有一个女干部。这个女干部好像是什么都已经知道了。她也不向我要检讨材料了，只是说：“以后可要注意了！”我回到历史所后，才从同事们口中得知，这个小偷是文学研究所的。这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今年夏天才分配来的。此人从小就有劣迹，现在因遇到困难，就旧病复发了。他的盗窃行为不是在学部大院里被抓到的，而是昨天星期日他去王府井百货大楼行窃，将手伸向一位妇女的口袋时被抓住的。后来在搜查他的宿舍时发现了一块表，于是人们想起了我在澡堂丢表的事。看样子这小子得判几年徒刑了。我为找回自己的手表而高兴，也有一点为这个饥饿的大学生感到悲哀！

表是回来了，可丢失在澡堂里的粮票和钱却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又得依靠大约 22 斤粮票过到年底了。我还得在城里到处乱跑找可吃的东西。有时花 5 角钱买一块高价月饼吃，偶尔还去诸如西四的同和居，西单的砂锅居或灯市口的翠华楼吃一顿“高级饭”。所谓的“高级饭”只不过包括一碗大米饭（要三两粮票），一碗菜汤，里面有三四块罐头猪肉而已。这种“高级饭”的价格是每份 5 元，即几乎我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于是又引起一个问题，即我几乎把积蓄都吃光了！工作两年以后，我总共攒了也不过二百元左右。经过去一趟哈尔滨和这个冬天，我的存折几乎空了。除了吃以外，穿也有问题：买一双袜子除了花钱之外，

还要6寸布票，我和妹妹辉楠，毛弟轴材都是将袜子的破脚跟一面穿在脚背上，把袜子的正面穿在脚下，然后将双脚塞进鞋里，这就叫“鞋和袜子共同完成包脚的任务”。

在1959年，我也挣到一些稿费。在1960年，我虽然寄出过一些文章，却是连一分钱的稿费也没有得到。实际上从这年8月份起，许多杂志已经由于缺乏纸张而停刊了。另外还有一些政治因素。例如我曾经写了一篇赞扬兰新铁路通车的文章“大丝道的复活”。我将这篇文章寄给《新疆日报》，却被该报退回了。

《新疆日报》的解释是关于兰新铁路今后用稿不会太多。从这种解释中，我感到当前的中苏关系的确有些微妙。一些历史杂志的编辑部已经知道了我1958年以来的历史，当然也就不会发表我的文章了。例如我的那篇“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俄罗斯人的向东推进与中国”已经在《历史研究》的编辑部里躺了两年而没有任何答复。

没有粮票，没有钱，什么也没有。要是克拉娃来了，可怎么办呢？

我想起了一个办法。既然在中国不可能发表文章，那就用俄文写文章把它们寄给苏联的杂志吧。如果有些文章在苏联发表了，给的稿费是卢布，克拉娃可以领了这些钱用作来中国的旅费。她还可以买一些如照相机或收音机之类的东西带来。这些东西在北京卖出之后，她在北京的生活费用和回程费用也就基本解决了。我于是开始这么办，向苏联的一些杂志投寄了几篇文章。

又到年底了，按例是应该给年终奖金的。如果还是“跃进奖金”的话，我是不是还是“四类人员”呢？但是直到12月31日那天，也没有听说有1960年度奖金这么一回事。我从经济上说是一分钱也没有捞着，从政治上说我那“四类人员”的身份也就保持不变了。我是在半饥饿状态中步入1961年的。

(1)

“屋漏又逢连夜雨”。年初我在健康方面连续遇到两场灾难。1 月中旬的一个下午，我突然咳嗽得很厉害，有时甚至喘不过气来。第二天我去同仁医院检查，被诊断是患了肺炎。这样我就有两个星期不能上班，每天都要到医院去打针。感谢上帝，春节前我总算是痊愈了。春节期间，我总算能吃到了两顿饱饭。第一顿是除夕那天中午在学部大院食堂，每个工作人员可以买到四小盘带肉的菜。第二顿饭是大年初一我去军委政治学院看大哥时，在那里吃的。大嫂这时刚好生下一个女孩，取名为爱衣。我在这里吃到了一点带鱼，还喝了一点啤酒。在这几天里，我还有了一点消遣，即读了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初四那天，我到北京师范大学去看我的老师朱庆永教授。朱先生对于他去年因为同意赫鲁晓夫的“三和平”受到群起而攻之一事仍然耿耿于怀。他说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他是国民党中央社驻莫斯科的记者。当时他曾经有可能去英国，也有可能留在苏联。但是他回国了，因为想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现在他却为自己当时的这个选择感到后悔了。

一般居室里的蜂窝煤炉都连有白铁皮的烟筒通往室外。在烟筒与炉子的连接处有一块可转动的小铁片用以打开或关闭煤烟进入烟筒的出口。人们在晚间就寝前总是将这块小铁片拨到半开半闭状态，这样炉子里的煤既可以继续燃烧，也不会导致很快烧尽。这样第二天早晨，炉子里还有一点火，只需要掏尽炉灰再加

上一两块煤，火就上来，免去了重新引火的麻烦。3月4日晚上就寝前，我不小心地把那块小铁片拨到几乎完全关闭状态，这样我在睡着之后屋子里就积累了不少一氧化碳。半夜里我起来小解，接着就拿了一根细铁筷子想透一透炉子内蜂窝煤的那些眼。可是当我打开炉盖想干这件事的时候，我突然失去知觉倒在地上，右脚裸正好贴在燃烧着的炉子外壁上。当我恢复知觉时，发现自己正躺在小杂院冰凉的地上，毛弟轴材正对我进行人工呼吸。这已经是3月5日的早晨了。这一天是斯大林逝世八周年纪念日。我没有去斯大林那里报到，却又回到了府右街东侧自己邻居毛泽东的统治之下。

右脚裸上的烧伤使我跛了一个多月。我必须每天用开水洗伤口，每两三天到学部大院的医务室去换药。既然春天来了，那个惹祸的蜂窝煤炉也就被撤除了。然而在家庭内部又形成一种感觉，即真正找麻烦的并不是煤炉而是我自己。煤气中毒是一次危险事件，但是全家在整个府右街胡同里感到尴尬的还是我有个苏联老婆。妈妈和大哥愈来愈频繁地提出我和克拉娃离婚的要求。另一方面，克拉娃在信中却是愈来愈焦急了，想快点看到我。我真是走投无路了。

吃的问题还是很困难。杂院里邻居石家的小男孩一次哭着要他妈给他做一顿干饭吃，而不是老给他喝稀粥。石大妈只好答应了。正当大妈做干饭时，这孩子却哭着睡着了。每名高级知识分子（教授，高级工程师等）每个月能补助三斤黄豆，有时还有点肉和鸡蛋等。但是对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来说也仅是杯水车薪，因为他们通常都有一大家人口。有一次，我在学部大院门口看见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他看起来似乎比一般人要胖一些，走起路来也有劲一些。“他一定吃得很好，因为他有稿费。”我想道。不久前我在报上读到何其芳写的关于不怕鬼的文章。我还听到文

学研究所的一些人说，何其芳去年年底曾有机会去莫斯科出席一次学术会议，带回来几公斤香肠。但是他一家人吃得很省，现在还剩一些。

政治上受歧视，对于克拉娃的思念，在家庭内部不被理解，饥饿和疾病。我会不会被压垮呢？

但是欢乐出现了。这欢乐是这样的巨大，它来得又是这样的突然。

这是4月12日下午，我下班后乘103路无轨电车回家。当这无轨电车经过王府井时，我发现百货大楼前聚集着一群人。那里还有一块大标语牌，上面写道：“人类飞向宇宙终于成功实现，加加林少校遨游太空情况良好！”我全身像触电了一样，就在这一站下车买了一份号外。在读完这份号外以后，我感到我这些年所遭遇的倒霉事全都烟消云散了。

我研究过好几年地理发现史，懂得人类对于宇宙的探索是地理发现的新纪元。不久前正好出现一个问题，即谁将是新纪元中的哥伦布呢？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就是俄罗斯人齐奥科夫斯基和加加林。俄罗斯是克拉娃的祖国和我的第二个祖国。我记得1958年当我在中国学生中不断挨整时，是苏联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我的学业给予正确评价。我的导师留布林斯卡娅教授要我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抛弃学术研究工作。正是这种理解给予了我力量，使得我为着自己的生存斗争，而且也没有放弃在历史研究上搞出点什么的念头。不过我这时还没有意识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积极方面到此已发挥到了极限，往后就得走下坡路了。

第三天下午，我在电报大楼对面的邮局报摊上买到了4月13日的《真理报》。我从报上得知，在4月12日的狂欢之夜，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们在列宁山上竖起了一块大标语牌，上面题有马雅科夫斯基“护照”一诗中的几句：

你读吧！你嫉妒吧！

我是一苏联公民！

我不是苏联公民，也就没有马雅科夫斯基那样的骄傲。虽然我现在生活在首都城市北京，我这时的心情却像一个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刚刚收到普希金寄来的诗句：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你们要保持高度的忍耐。

痛苦的劳作决不会白费，

高洁的理想不会化尘埃！

右脚裸上的烧伤不那么疼了，肚子也不那么饿了。不过面前如果有两张不要粮票的烧饼的话，我还是能够几口把它们吞下去的。

从《真理报》上，我还读到一封一个美国公民的来信。这个美国公民说 4 月 12 日这一天，他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完全处于狂喜之中。我的心情其实和这个美国人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作为“牢不可破的兄弟国家”的一个公民，我却不能像那个作为苏联“对头”国家的美国公民那样向《真理报》写信祝贺。这时在北京，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中国运动员在第 26 届国际乒乓球锦标赛上所取得的成绩。这虽然也是值得高兴的事，但毕竟不能和加加林的宇宙飞行相比拟。我看得出中国人不愿意多提加加林的宇宙飞行，并不是由于他们不懂得这件事的意义，而是出于政治形势。我现在是处于一种高兴也不能笑，伤心也不能哭的环境之中。如果我公开地对加加林的宇宙飞行表示喜悦，我就有可能被

看作是一个卖国贼。不要紧啊，既然我能把自己的悲伤深藏于心，单独享受自己的快乐又有什么困难呢！

“我这一生已经没有要求了，”我想道：“因为所有我的不幸已经得到了绰绰有余的报偿。以后即使有更多的困难我也能承受了！”

此后，我再没有遇到比 1961 年 4 月 12 日使我更为高兴的一天。

(2)

去年秋后掀起的干部下放运动现在已开始落实。在我所属的学术情报组，常绍温被安排前往太原市山西师范学院。她的丈夫王守义是明清史组的一个助理研究员，也被决定下放到山西省，不过具体单位尚未决定。虽然去年在历史研究所的干部下放动员大会上常绍温的确是慷慨激昂地要求下放，我对下放这一对夫妇仍然有些感到愤愤不平。王守义患有肺结核，经常吐血。他们有三个孩子。这样的一家人即使在北京生活也是困难的，更不要说举家迁往太原了。我认为这一家人不能在北京巩固住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是党员。现在全历史研究所已决定下放的人共有十人左右，大多数是非党员。他们中除个别几个单身汉已经离京以外，其他的人却泡着不走，天天还到历史所来，从一间屋串到另一间屋，看样是想向历史所的领导提出什么要求。

我也感到不安了，但却是从反面感到不安：为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我的事呢？我可是这次下放运动中表现最积极的呀！克拉娃还在来信催促我设法解决团聚问题，在北京呆下去是愈来愈困难了。我这时真正有点坐立不安。正好在这时出路出现了。

4 月 20 日下午，肖锋把我找到人事科。一位新来的行政办公

室李主任（显然是从某一更高级单位下放来的）向我宣布说：

“组织上决定你去支援地方，你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安达市。有什么意见吗？”

肖锋还补充说这是我一再请求以后才决定的。

这种解释是不需要的。我感觉是从我的肩上卸下千斤重担。我马上表示了同意调动。

“你估计需要准备几天能出发呢？我们将为你买车票。”肖锋问道。

“我想有两三天就够了。”我说。

学术情报组的组长刘浩然其实在我之前就知道了这件事，于是在我从人事科直接到他这里来时就向我“贺喜”。我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到北京师范大学向朱庆永教授告知此事。第二天早晨，我就开始办理离开历史研究所与北京的手续，直到下午大哥回家时，才向全家宣布了这件事。

肖锋给我买的是4月25日离开北京前往安达的车票，中间需要在哈尔滨换车。在离开北京前的晚饭桌上，大哥对我说：

“你已经在北京生活两年多，你能用一两句话总结你这两年多来在北京的生活吗？”

“我目前还没有找出这一两句话。”我说。

但不久之后，我就找到这样的一句话：这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两年。这里的艰难主要并不是指物质上的艰难，而是说在这两年中，我总是处于极端复杂而尴尬的境况之中。从现在起我将孤单地进行斗争，没有人来帮助我，我也没有后顾之忧了。

4月25日早上，我离开北京时的气氛是轻松的，不像两年多前我离开列宁格勒时那样凄凉。全体学术情报组的同事们都来车站给我送行。叮嘱我到安达后来信。那个党员吴光耀还对我说：

“你是一个好同志。”

在离开府右街之前大嫂给了我两个熟鸡蛋。她的意思是要我将它们带到路上去吃，但我却立刻将这两个鸡蛋剥了皮塞进嘴里了。列车开出北京站以后，我就又感到饿了。不过每一个去哈尔滨的旅客可以在车上吃到两顿不要粮票的饭：早上是一块面包，下午是在餐车上有一顿热饭，即一碗大米饭和一盘蔬菜。虽然肚子没有填满，我还是满意的。另外由于坐的是硬卧，也就不太拥挤，我能休息得很好。

列车于4月26日上午到达哈尔滨。这时在另一股轨道上停着一辆即将发往齐齐哈尔的列车，我当即挤了上去。这列车拥挤不堪，我只能手拎着提包在过道上站着。车厢内外的景色和去年6月我走这一路时相似，即到处都是肮脏、混乱、饥饿和贫穷。

大约是中午一点时，列车在安达站停了一下。一大群人吵吵嚷嚷地下了车并挤出了车站。当我发现自己已处在站外时，看见有几个也是从这班车上下来的的人争向路旁行人打听市委组织部怎么去。我也自然地跟着这几个人走了。市委组织部其实离火车站不远，那里的一名工作人员收下了我们的介绍信，打发我们到第三旅社暂住。第三旅社位于中央街二道街和三道街之间一段的南侧。这个旅社不过是一间带一大火炕的大屋子，沿屋子北墙隔出几间每间只有3至4平方米的小屋，是供女客或整家人住的。单身男客们则毫无例外地睡到那个大炕上去。据说在安达市内能够达到这种水平的旅店只有几家，其他的就是统铺一扬的大车店了。

第三旅店的投宿者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北京干部”，即从中央各部委下放来的。因为都是被从北京排挤出来的人，我们在这个小旅社里相处得倒是比较和睦。第二天我找到澡堂洗了澡，回来又洗了衣服，下面的问题就是我将到什么单位工作了。这个问题将由市委组织部决定。但显然“五一”节之前第三旅社的这

些投宿者中是很少有人会被分往具体单位的。于是我取出离开北京前买到的那几份《真理报》，坐在大炕自己的铺头上安静地读起来。这使得睡在我旁边的一位年轻人感到了兴趣，他问我：

“你能看懂这个？”

“能看懂的。”我回答说。同时我也注意到这个年轻人拿着的不是小说，而是一本关于量子力学的英文版书籍。我也对他感兴趣起来，于是开始了我们之间无休止的交谈。我得知这个青年人名叫孙礼煌，1935年生，现在26岁。他是从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下放来的。他曾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两处学习，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当然我也把自己的历史告诉了孙礼煌。于是第三旅社的投宿者们逐渐知道了在他们中间还有一名留苏学生。

我和孙礼煌关系愈来愈密切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我们都来自中国科学院，而是由于我们之间交谈深入后，发现彼此的观点颇有相似之处。二人对于1957年以后国内所发生的事件的看法是相同的。我来到黑龙江省是自愿的，而孙礼煌则不然。他之所以被下放是因为他在原子能研究所里不大听话。我们互相告诉了自己的经历，也说到我们听到或见到的有关反右斗争和大跃进的种种“奇闻”。有时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旅社里的人开玩笑说我们二人是在“相互交心”。

我和孙礼煌也在城里闲逛。一年前来黑龙江时，我就了解这个省内铁路沿线一般中小城市的格局：有一条中央大街与火车站垂直一直延伸到城区边缘。然后又是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等与火车站平行而与中央大街成直角交叉。安达几乎位于哈尔滨至齐齐哈尔铁路的中心点上，过去只是黑龙江省的一个三等县。因此我在城区内看见的只是干打垒房屋或用拉合瓣盖成的房屋。1959年在安达城以南约40公里处的大同发现了石油，于是国家

准备在这里建一处大油田。这是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战，尤其是在苏联断绝援助之后。于是从北京调来了大批干部，据说仅仅从中国科学院系统就调来了一万多人，其中也包括我和孙礼煌。安达从三等县上升成了市，辖有十三个县市的松花江专区也打算把它的党政机关从哈尔滨搬到安达来。于是出现了几座楼房，另外还有几处楼房正在建筑之中。不过安达城区只是一个行政中心，石油大会战的主战场在萨尔图，沿铁路去齐齐哈尔方向大约 50 公里处。因此每天有不少人来往于安达和萨尔图之间。

所有住宿在第三旅社和其他旅社的“北京干部们”，都在离此不远的市人委招待所食堂吃饭。但这里的饭菜并不怎么样，即清一色的苞米面窝窝头和白水煮冻白菜。只有在“五一”节那天“北京干部”们吃到一顿好饭，即每人有一碗大米饭和两小盘带肉的菜。其实在这食堂里吃饭从钱和粮票上看都不便宜。于是我和孙礼煌就常常到街上的小饭馆吃饭，那里供应的也一样是窝窝头和冻白菜。街上盲流很多。一次正当我和孙礼煌在一个小饭馆里吃饭时，一个背上背了行李的盲流走了进来。这个盲流看见饭店里没有人在注意到他，就急速地将他的双手伸向门后桌上装满窝窝头的大箩筐，每一只手抓了一个窝窝头就飞快地跑了出去。一个饭店服务员发现了，就抓起一把扫帚叫喊着追了出去。这个盲流看见有人追他，干脆从每个窝窝头上咬下一口。这样一来，即使抢回这两个窝头也不能卖了。于是服务员放弃了追赶。那个盲流则背着行李拿着窝头大摇大摆地走了。

五一节以后，逐渐有一些本地单位的代表到第三旅社来接走市委组织部分配给他们的干部。但又有一些新来的“北京干部”充实了这个旅社。5 月 6 日下午，一个约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骑着自行车来到第三旅社，在自行车后座上驮着几个档案袋。这个青年人说他名叫杨青士，是工业器材采购供应站管人事的。他是

来接走市委组织部分派给他们站的几个干部的。这几个干部的名字就在他自行车后座的档案袋上：王文能、孙礼煌、张轶东和肖长杰。于是我新的栖息之地也就这样决定下来了。这四个人跟着杨青士到火车站行李房去取他们在那里已经躺了几乎半个月行李，然后又跟着一辆拉行李的大车来到工业器材采购供应站。

工业器材采购供应站位于南三道街南端的东侧。这是一个正方形的大院，每边长约 30—40 米，有一些砖房或拉合办房屋组成。当我们来到这里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于是就被安排去宿舍里休息。这个宿舍并不比第三旅社强，其实更差。这间屋子约 10 米长 5 米宽。北墙的窗户通向院内，整个北半间屋子是一个双层的大木板铺，顺着屋子的西墙和南墙各放了一张双人床。因此这间大约 50 平米的屋子将住下至少 10 人。我睡到大板铺上层的西端，孙礼煌在我的东面。我们的一应什物也就摊放在每人铺头的旁边。

这个单位的经理苏元德这时到本地区各县市搞调查去了。于是第二天这四个新来的人就和副经理姜建新见了面。姜建新也是一名“北京干部”，是从中央商业部下放来的。我从姜建新的谈话里才得知：这个工业器材采购站简称工器站，是一个商业单位。在松花江专区和安达市的商业系统都各有一个工器站，不过地区属的工器站是一个二级站，而市属的是一个三级站。我来到的是一个二级站。这个单位有 50 多名职工，其中一半是“北京干部”。这 50 多人又分属不同的科室：最大的是业务科，然后是行政方面的人事科，计财科和秘书科。最近又建立起了一个业务指导科。这四个新来的人中王文能原是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一个干部，懂一点电工，就被分配到业务科去了。当姜建新得知孙礼煌和我来自中国科学院，肖长杰原是文化部搞戏剧创作的时候，最初像是有点哭笑不得，接着又现实地像是对这一类问题

胸有成竹似的。他说：“你们都到业务指导科去吧！”

“业务指导科”是干什么的？它的任务是“调查研究”。最近“伟大领袖”提出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于是一些基层单位也建立起了这一类的机构。这些单位就用这种方式解决了一个尴尬的问题：来了不少科研工作者，高校教师和文艺工作者。他们对于工业生产和商业一窍不通，把他们往哪里放呀？好了，都搞“调查研究”去吧！

孙礼煌告诉我说：在北京当他被告知前来安达的那个晚上，他失眠了：他是研究原子能的，到安达来能干什么呢？他这一辈子完了！我对他只能进行一些空洞的安慰，说有时间时可以看看专业书，等有新的机会时再回去干好本行。我对自己从北京来到安达，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来到这个工业器材采购站则毫不在意。我并没有放弃自己要在历史研究方面搞出一点什么名堂的想法。但是研究历史毕竟不像孙礼煌那样依赖物资装备。而且在官方的研究机构里研究历史只能听命于官方的需要。当我离开北京之前，历史研究所里已经在强调研究历史要服务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对于曾经多年留苏并有一个苏联老婆的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19世纪俄国的伟大革命民主主义者柏林斯基曾经说过：“不幸是一所最好的大学。”我一生已经在北京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这两所名牌大学里受过教育。现在我进了第三个大学，即不幸大学。我在这所大学里的学习年限将是很长的。我在这所大学里受到的教育较之在前两所大学里所获的意义将更为重大。

我在工器站里的日常生活开始了。这个大院南边的一排房是整个工器站的中心，全站的各科室和单身职工宿舍（两间男宿舍和一间女宿舍）都在这里。一条走廊从中将它们分为东西两趟屋子。我住的这间男宿舍是从西楼数的第二间北屋。屋内大板铺的

上铺从西往东睡着四个人：我、孙礼煌、高序志和王文能。高序志来自北京中央广播局。他只受过中等教育，但是善于修理收音机，于是就被分配到业务科去了。他说中央广播局局长就是《人民日报》前社长邓拓的妻子。但是这个局长在 1959 年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受到严厉批评。大板铺的下面目前只住了两个人，都是“北京干部”。一个叫张志起，现为仓库保管员；另一个叫周延令，已被站里派到沈阳当驻地员。睡在南墙双人床上铺的那人叫吴洪迈，也是“北京干部”，年约三十而尚未结婚。他每个星期六晚上都去跳舞，平常也老是谈有关跳舞的事。这张床的下铺睡的是我的顶头上司，业务指导科科长雷特。但是现在雷特陪同全站的总经理苏元德正在本地区各地搞“调查研究”，因此我没有看见他。据说雷特原来是《大公报》的一名记者，一个十四级干部。睡在西端双人床上的那个人叫刘鑑谨，是一名泰国归国华侨，年龄也是三十岁左右而仍未结婚。人们有时窃窃私语，说他为什么不回泰国而到这里来遭这份罪。我下铺睡的是一个名叫胡仲英的老头，年约五十岁。他是从中央商业部和他的爱人张义儒一起下放来的。张义儒就住在这所房子最西端的单身女职工宿舍里。他们有七个孩子，全都留在北京没带来，此次下放给这一家人带来的麻烦就可想而知了。胡仲英这个人很圆滑的，他经常跑自由市场或从街上的零星小贩那里买到点什么吃的。例如买点玉米面用开水烫了吃。同屋的人都喜欢和他开玩笑。

肖长杰住在寝室东墙房屋入口过道对面的那间男寝室里。除去这三间单身宿舍以外，这所房的其他各屋就是办公室了。不过在一些科室里也放得有一张床并住着一个人，这就算是住得比较好的了。我所属的业务指导科办公室位于这所房子的东南角。在这办公室里也有一张单人床，睡在这里的人叫沈迪凯，原来也是《大公报》的一名记者，现年 40 岁左右。此外业务指导科还有

一名成员叫吴明墀，原为《民族画报》的编辑。吴明墀不住在工器站，因为他是从北京带家来的。他的爱人是铁道西侧安达市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员，他们的家也就住在那里。吴明墀每隔两三天才到工器站来“上一次班”。于是业务指导科就共有六名成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雷特、吴明墀、沈迪凯、肖长杰、张轶东和孙礼煌。

我只不过把在工器站的工作看作是自己生活中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而已。我写信告诉克拉娃最近发生的一切变化。我说既然中国科学院能够不要我了，中国政府也就可能允许我出境了。现在我们应该尝试的已经不是我邀请克拉娃来中国，而是克拉娃邀请我去苏联了。因此，克拉娃应该在列宁格勒公安局办一份邀请信给我寄来。我还写信给留布林斯卡娅教授和波里斯·波诺金，告知他自己的情况变化和新地址。在寄回北京的家信中，我说对自己被派往工业器材采购站这么一个单位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

落下户口和粮食关系之后，我就正式成为安达市民了。工器站的食堂在大院北面的那一趟房里。但是那里的饭菜也不比市人委招待所食堂好，也是窝窝头和冻白菜，从花钱和粮票上看也不便宜。所以我和孙礼煌还是常常跑到街上的小饭馆去吃饭。此外，我在物质生活上还有另一种困难：我的布票早就用光了。在离开北京前我必须有一套被褥，两套衬衣背心裤衩等。其实我自己 1961 年的布票根本就不够办置这些东西，妈妈还给了我几尺。这以后，我再也没有布票买袜子和手绢之类的东西了，虽然买一双袜子只要六寸布票，买一块手绢只要四寸布票，我也拿不出来了。我最后的一双袜子和最后的一条手绢都和克拉娃有关：手绢是克拉娃给的纪念，而袜子上则有克拉娃缝过的补丁。我好长时间都没有舍得使用这条手绢和这双袜子，现在也只好拿出来使用了。可是一双袜子毕竟不够。正好孙礼煌有两双袜子，于是

找出了一种两人穿三双的办法：两人经常总共有一双待用的干净袜子。当我需要换时，我洗完脚换上那双干净袜子，把换下来的袜子洗干净晾干。于是孙礼煌洗脚换上这双干净袜子，再把自己换下的洗净晾干，如此反复。我还没有洗脸用的脸盆。在第三旅社时，我有旅店的脸盆可用，现在没有自己的脸盆不行了。好在工器站是商业系统的一个单位，还有一点“近水楼台”的味道哩！于是我跑了几趟安达市商业局，找到管理日用百货的人磨蹭了一番，总算获得允许花四元钱买到了一个脸盆。

在精神生活方面我有个很好的条件。我把我的那台苏联“记录”牌收音机带到安达来了。我睡上铺，脑袋离灯很近。高序志为我从站仓库弄来一个分灯头，把这个分灯头接上灯，再插上收音机就响了。我这时发现听苏联远东的海参崴、伯力和海兰泡等城市的广播比在北京市清楚多了。于是除去必须呆在业务指导科办公室的时间以外，我都躺在寝室内自己的铺头上听苏联的新闻广播和苏联音乐。我感觉真是比在北京时轻松多了。

但是我没轻松几天就有了任务：到海伦县去调查即将到来的夏锄时期对小木农具的需求情况。和我一起去的有孙礼煌和两名业务科的干部肖振荣和肖俊峰，他们都是本地人。我们一行四人于5月15日下午到达海伦，投宿于海伦县商业招待所。所谓的“调查”也不过是和海伦县商业局和海伦工器站（三级站）的有关人员谈话，并记录下一些数字而已。几天后，二肖和孙礼煌又去海伦所属的伦河公社和东边井搞调查，把我留在商业招待所看守他们所登记的房间以防别人来占住。这样我就有几天时间在海伦县城里闲逛，甚至去县图书馆看了报纸。我看见这里也是一片贫穷，但有时在街角旁也有个别农民在卖什么辣椒和大蒜之类的东西，有时还有土豆和玉米面，不过价钱很贵。

几天之后，不仅是孙礼煌和二肖回来了，还突然出现了他们

安达工器站的经理苏元德，以及我所属的业务指导科科长雷特，还有一个叫李梦华的人与他们在一起。海伦县是他们一行在全松花江专区巡回“调查研究”的最后一站。于是这里聚集了工器站的七名人员，他们将一起从这里回到安达去。我不理解派出这么多人、花这么多差旅费到这里来有什么意义？不过还是看到了当前社会生活一些别的方面：现在到处都是官多如牛毛，例如在海伦县一个商业局就有五个局长。而且干部之间等级森严。我现在才知道全中国的行政干部共分 25 级：从第一级到第六级是高级领导人，从第七级到第十三级是高级干部，从第十四级到第十七级是中级干部，十八级以后的就是一般干部了。我这个一般干部并不知道属于哪一级，不过有一次听见一名一般干部发牢骚说：“十七级以上的干部是人，十七级以下的干部是王八蛋！”每一级干部的待遇都得与他的级别相符合。毛主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后，各级干部满天飞。每一个干部到一处都得受到与其级别相适应的接待。我听说不久前，一位十三级干部来到海伦，县委由于没有及时接到通知就没有派小汽车去接他，这位十三级干部就从车站步行到县委会。为此县委的主要领导人都作了检讨。干部之间待遇尚且如此等级森严，“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这句话只不过是一种笑料而已。“调查研究之风”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吃喝风”。“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发布已有半年多，农村的情况确有一些好转。有一个说法是现在大城市不如中小城市，中小城市不如农村。甚至有过城市姑娘嫁到农村的情况。现在“调查研究之风”是很容易兴起来的，因为一般干部可以到下面去混几顿饱饭，而中级干部则可以吃肉喝酒了，而且是在“调查研究”的大旗下进行的。中南海那几个组“小整风”的作用可是被强大的“调查研究之风”或“吃喝风”刮得无影无踪了。

苏元德作为上级单位工器二级站的经理到海伦来了，海伦县工器三级站的领导就得好好地接待他。此外，雷特还是一个十四级干部，也得受到相应的接待。像我和孙礼煌这样的“随行人员”也就可以借一点光了。5月25日下午，海伦工器三级站的领导邀请工器二级站的工作人员吃晚饭。他们摆上了黄酒，还有猪肉和猪肝炒的菜。我在喝两碗酒之后呕吐了。第二天我仍然感到不舒服，就到海伦县医院去看病。那里的大夫说我患的是感冒，随便给了一些药。可是情况却愈来愈糟糕，最后衰弱得一点东西也吃不进去了。孙礼煌帮助我随同工器二级站的人们登上火车，在5月末回到安达去看病。这里的医生也是“北京干部”，诊断出我患的是斑疹伤寒！于是我被立即用大车送往铁道西侧的传染病院。经过两天治疗后，我开始吃东西了。而且是喝带有一点鸡蛋花的面条汤，每天一斤面（早晚各三两，中午四两）。在这个病院住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完全恢复了。

当我回到工器站时，发现克拉娃、波诺金、留布林斯卡娅和妹妹辉楠的信都在那里等待着我，克拉娃说她已对列宁格勒公安局外事科提出要邀请我去探亲。但是问题在于她在列宁格勒没有自己的住房，而在邀请书上必须表明邀请人是能保证被邀请人在探亲期间的居住条件的。但是克拉娃在列宁格勒显然没有自己的住房，她自己现在还是住在宿舍哩！她也不知道她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自己的住房。她也理解我才从北京到安达，因此没有条件邀请她来探亲。此外，克拉娃还有两年才能从那个财经学院毕业，这段时期还是让她集中精力学习吧。我们再慢慢地想办法。

夏天来到了，粮食的状况似乎好了一些。出现一些所谓的“代食品”。有一次从乳品厂弄来一些用乳渣作的糕点。每人能买二斤，当然不用粮票。我买来自己的二斤马上就吃完了。我其实过去是不吃牛羊肉和奶类的，因为嫌膻。这次吃完这些东西

后，我打的嗝就有一种橡皮和牛奶的混合味道。又一次从市粮食局弄来一些用高粱糠作的糕点，也是每人二斤不要粮票。我吃完自己的二斤“饼干”到城北工器站的仓库去办事。在半路上我就感觉饿而没劲，拉了两次大便。我拉出来的大便和两小时以前吃的“饼干”一摸一样。哦，身体什麼也没有吸收，而肠胃却白白地被这“饼干”磨损了！

据说夏秋时节在草原上有不少可食的野生植物。于是我们单位就组织采集些野生植物。最先采集的是黄花菜。我同屋的多数人，包刮孙礼煌，都被派到草原上去干这好活儿了。他们是6月末去的。7月末才回来。孙礼煌刚刚回来，我就被派进第二个采集队：采集野韭菜花。据说野韭菜花可以被当作大酱食用。

干这活儿的大约80人，来自安达市的粮食、商业和服务系统。7月26日，“采集者们”乘汽车离开安达市区，傍晚才到达一个叫兴隆泉公社的地方。我们住在一所废弃的仓库里，在地上铺上稻草而卧。每系统的20—30人为一个中队，其中有一人专职作饭。韭菜花是在七月末韭菜长老了时才出现的。这是一种绿白色的圆形花，直径约2—3公分。你可以一只手拿住一条开口的口袋，另一只手折花放入口袋。这活儿并不太累，但是从住地到草原需要走很远的路来回。这样我又感到粮票不够用了。虽然单位每天补助二两粮（即一月6斤），但是这6斤加上我自己的27斤月口粮也只是33斤。那麼我每天只能消耗1.1斤粮食。于是我感觉很饿而没劲。只有在八月初的一天，这些人不去采集韭菜花而是帮助本地农民收割小麦，才吃到了一顿饱饭。我吃了两碗土豆熬茄子和一个半玉米面窝窝头（每个一斤玉米面）。我把第二个窝窝头剩下的一半藏在上衣里带了回去。香瓜下来了，我一次买10斤而且立即吃光。这稍许能有一些帮助。

八月中旬时，兴隆泉公社附近的韭菜花都被采光了。“采集

者”们就转移到另一个叫国兴牧场的地方。我们还是住在废弃的房子里。在我们住地不远处有一个牧民的集体食堂，在那里可以用半斤粮票买七两玉米面作的窝窝头。但是我不是牧场职工，因此不能买这种窝窝头。然而，附近有一所小学刚刚开学。这小学的年青教师们在这所食堂吃饭。他们听说在“采集者”中间有一个留苏学生，就很感兴趣，好几次为我买了这种窝窝头。他们还给我送来一些辣椒和大酱。有一次我用辣椒和大酱一顿吃了两个这样的窝窝头（一斤四两玉米面），感觉自己从来没有吃得这样饱和香。最后国兴牧场附近的韭菜花都采完了，天气也愈来愈冷。9月11日，从安达市内来的汽车把我们带回城里。我以为把自己的饭盒带回去没有必要，就留给了一位小学教师。而那位小学教师则送给我一个二斤重的玉米面窝窝头。

(3)

当我回到工器站时，又有几封信在等待着我了。克拉娃在信中说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得到住房，因此也不可能邀请我去。她也不催促我邀请她。从北京来的最重要消息是毛弟轴材顺利地考入了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系。我感到轻松了不少。这轻松并不是经济方面的，因为轴材在大学念书并没有助学金，家庭还得供给他。我现在每月寄回家 15 元（月工资的四分之一）。这轻松是政治方面的，意味着我的“政治落后”没有给妹妹辉楠，尤其是弟弟轴材的前途带来不利影响。我现在没有后顾之忧了。

另一个好消息则来自波里斯·波诺金：我写的文章“大丝道的复活”在苏联杂志《今日亚非》1961 年第七期上发表了。波诺金还告诉我，我评论美国学者 Allen S. Whiting 所写的 *Xinjiang: pawn or pivot?* (只是一笔赌注还是枢轴中心?)—

书 (Sinkiang: Pawn or Pivot? by Sheng Shih-Ts' Ai, Allen S. Whit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8。) 的评论也将在苏联杂志《东方学问题》1961 年第五期 (11 月) 上发表。这消息使我极为兴奋。

孙礼煌被派到哈尔滨香坊区去看守工器站在那里的仓库。所以大板铺上铺的这一条是空空的。现在是秋收季节, 从工器站在升平公社的生产基地运来了蔬菜。每个职工可以分得 40 斤土豆, 十斤圆白菜和十斤大葱。我几乎是发财了, 因为孙礼煌不在安达, 他的一份都由我“代理”。这样我就很少去食堂吃饭而是集中消灭那一堆菜: 土豆在邻居家的炉子上煮熟了吃, 每次二斤; 圆白菜切成小块用盐腌了吃, 大葱剥了皮就吃。这样吃当然胃会不大舒服, 但这是节约粮票的唯一办法。到九月末时我才“消灭”了这一堆菜, 可是也只节约了十斤粮票。不过我的粮票情况总算是改善了。

在这个业务指导科无事可作。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躺在双层木板床的上铺听那台“记录”牌苏联收音机。从苏联广播中我得知下个月, 即十月, 将要召开苏共第 22 大。既然在苏联念过书, 我就懂得苏共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但是我如何能知道这个大会的细节呢? 于是我就写信给波里斯·波诺金, 要求波里斯把他读过的代表大会开会时期每一天的《真理报》给我寄过来。

国庆节后我和萧长杰被派在雷特的手下, 先去哈尔滨, 然后去肇东县搞调查。我注意到在哈尔滨和安达车站都有了私营小摊贩在那里卖一些食品。例如, 一个用一斤玉米面作的窝窝头卖一元, 一斤烩土豆卖九毛。在哈尔滨我们住在黑龙江省商业调运办事处。在这里我遇到孙礼煌并给他带来他那一份土豆的残余部分 (约十斤)。我们决定把这些土豆都烩了并消灭之。孙礼煌说他认识一家这里的住户, 可以用他们的炉子来烩土豆。这家人的男

主人叫沈大伦，女主人叫冯宾。他们都是北京俄语学院的毕业生，曾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但是 1958 年他们被下放到哈尔滨。现在沈大伦在哈尔滨商业局而冯宾在省人民出版社工作。他们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叫冯小玲。冯宾和沈大伦不是简单地把土豆糊了而是它作成几道好吃的菜。于是我、孙礼煌和这家人一起享用了一顿美味的晚餐，并有一次很愉快的交谈。沈大伦和冯宾既然是学俄语的，也就懂得一些关于个人崇拜的事。在这方面他们也有一些自己的经历。谈话深入后大家发现对于许多问题的观点是一致的。沈大伦得知我的苏联朋友将给我寄来苏共 22 大召开时期的《真理报》，就要求我看完后也给他看。我答应了。

在哈尔滨呆了几天后我和萧长杰以及雷特来到肇东县。这时正值收割大白菜。在他们所住的旅店食堂里，就餐者买几盘熬白菜都行。这又帮助了我，因为我在哈尔滨的那几天又几乎把粮票都花光了。在肇东呆几天之后雷特先回安达，派我和萧长杰到宋站公社去调查。当我和萧长杰来到宋站公社时已经天黑了。我们就被安排到一个生产小队长家去住宿。根据规定，干部在农民家吃一餐饭应交三两粮票和一毛钱。这个生产小队长给我和萧长杰晚饭吃的是苞米渣子粥和咸菜。我一气喝了五碗粥（一斤多苞米！）。第二天的午饭我也没有少吃：我们吃的是土豆作粉条之后晾晒掉下来的粉头子或粉耗子。这些东西加一点盐和葱花熬熟了吃，不要粮票，只交一毛钱。我又吃了四碗，而且觉得很好吃。当我们走时穿过小米地，我摘下一些小米穗放进衣袋。在宋站的调查结束后我和萧长杰立刻回到安达。这时已是十月，宿舍里安起了炉子。我从住家的人那里借来一口锅，把从宋站公社地里折的小米穗上的小米搓下来，洗了放入锅中煮熟就吃了。但是在吃这东西时，我感觉这小米很硬，而且磨胃。我不明白是怎麼回事，就去问萧长杰。萧长杰问道：“你去掉小米粒上的糠壳了

吗？”

“原来如此！”我这才想起一切谷粒的表面都有一层糠壳。但是这些小米粒的糠壳现在已经在我的胃里了！

不久后孙礼煌也从哈尔滨回来了。我躺在宿舍大木板床的上铺，从苏联广播中知道了在莫斯科苏共 22 大进行的情况。不久之后波里斯·波诺金寄的《真理报》也不断地到达我手中。在收听广播和阅读《真理报》之后，我对于个人崇拜越来越感到气愤。同时在单位和全国关于赫鲁晓夫的议论则越来越公开化。在政治学习中任河人都可以毫无限制地大骂赫鲁晓夫，但是决没有人敢同意赫鲁晓夫。

形势变得对我别扭了：一个留学生，还有一个苏联老婆。在十月以前我经常收到从苏联寄来的信是正常情况，现在则“受到注意”了。尤其现在我还经常收到从苏联寄来的报纸。在 11 月我还收到波里斯·波罗金寄来的我在苏联刊物《今日亚非》和《东方学问题》上发表的文章的抽印本。波诺金在信中还说：“你在苏联越来越有名了。我为你感到骄傲！”我很为此感到鼓舞。但是在单位里却出现了一个微妙的情况：从现在起我不被派出安达办事了。12 月许多人包括孙礼煌都被派到本省各地出差，而我则被留在单位守电话，接听本地区各县关于小木农具供求情况的报告。这样我就得整天待在办公室电话旁。同时，我的大哥在从北京的来信中大骂赫鲁晓夫并强烈要求我和克拉娃离婚。

我只能保持沉默。然而，我并不是孤立的。躺在宿舍大木板铺上铺西面那一半的王文能和高序志都从工器站的仓库买了一个“美多”牌收音机。他们也听苏联的华语广播并完全同意我。高序志现在经常为工器站和在哈尔滨的地区商业局送材料，他也就为我给在哈尔滨的沈大伦送《真理报》。

经过听广播，读《真理报》和独立思考后，我有了新的理

解：个人崇拜（在中国的报纸上它被偷偷地改称为“个人迷信”）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东西。个人崇拜与现在大跃进之后的灾难之间的联系是明显的。是在中国结束个人崇拜的时候了。但是谁来作这件事呢？还得是中国共产党。我还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我不应该太多地想自己的不幸，而应该等待中国共产党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必要时我也愿意为这斗争作一点什么。

(1)

我躺在工器二级站双层床上层自己的铺头上收听《人民日报》1962年元旦社论。这篇社论特别强调“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工器站职工的政治学习会上。党支部的贾书记也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中心是集中统一领导。几天之后业务科的李梦华从哈尔滨回来，说省直机关正在大搞“反分散主义”。中央向省里派了政治委员，有些重要物资没有政治委员的签字就不能进行分配。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起在唐朝末年时，朝廷担心各地节度使尾大不掉，就给他们派去宦官做为监军，这些监军拥有比节度使更大的权力。那么唐朝的宦官监军和今天由党中央派下来的政治委员之间有何区别呢？我仔细思索一下，啊！原来今天的政治委员比昔日的宦官监军只不过是裤裆里多了个“家什儿”而已！

对于工器站的北京下放干部来说，新年后最大的问题是春节期间能否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因为他们在这里都是单身汉。但是贾书记却宣布说北京来了指示，说北京最近将要举行一次七千人大会，因此前往北京的交通和北京市的食品供应非常紧张。中央要求各地限制人们在一、二月份前往北京，鼓励各地来自北京的下放干部都就地过春节，特殊情况必须经单位领导批准才能成行。在整个工器二级站里仅有一个雷特作为十四级干部，属于唯一的“特殊情况”。我对于回北京过春节并不感兴趣。其中路费是一个问题，但主要的原因是大哥不断要求我和克拉娃离婚这一

件事情，我可以在来往信件中避开这件事，但如果回到北京和大哥面对面时，就不好说了。现在粮食、副食问题有所好转，工器站的职工可以从工器站的副食生产基地的产品中每人分得四斤猪肉、二十斤苞米和二十斤黄豆。我缝了一个布袋，将二十斤苞米和二十斤黄豆装到里面，委托给雷带到北京稍给妈妈。

我不仅收到了克拉娃的信，还收到了 1958 年夏天我在苏联中亚细亚沙漠中遇到的那个高尔基大学学生吕达的来信。克拉娃和吕达都告诉我说吕达去年夏天大学毕业了。这个冬天到列宁格勒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她们两人曾一起在列宁格勒逛过几次大街。这又使我回忆起我在苏联学习时的那些美好时光。

春耕已经开始了，因此我用不着总是坐在电话机旁接电话，记录各县关于小型铁、木农具的需求情况的汇报了。但是我仍然不被派出安达办事，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躺在铺头上收听苏联的广播了。王文伦和高序志两人也躺在那里听广播，他们不仅收听苏联的华语广播，还收听美国之音以及台湾的广播。一次他们从台湾的广播中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一名叫做刘承司的中国空军飞行员驾驶着一架苏制米格战机投向台湾去了。

孙礼煌公出回来了。他说当他在伊春林区靠近中苏边境的一些地区时，看见那里对过路人的检查和盘问突然变得非常严厉。这意味着什么呢？过去中苏边境一向是友好的地区呀！孙礼煌还收到过去在北京时一个同事的来信，信中说最近中央在广州召开了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改善知识分子现状。这位同事说如果现在孙礼煌给中央写信，他就有可能被调到一个更接近于他的专业的工作岗位上去。孙礼煌和我商量了一番后，认为这种尝试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当前国家的经济形势很清楚。我们估计只有少数的几个著名“科学家”、“大”知识分子才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以此来装装门面而已。大多数知

识分子的处境不会有丝毫改变的。

我自己则对于广州会议更不抱有任何幻想，我是搞社会科学的，又是留苏学生，还有一个苏联老婆，我来安达还是“自愿”的。我现在也不想回去搞中世纪研究，因为当前的历史进展已经占据了我整个的思维。中、苏关系的进展方向将决定我下半生的命运。我还认为如果不解决个人迷信问题，中国是一步也不可能前进的。但是中共和中国人民将怎样才能结束个人迷信问题呢？是从上而下的改革，还是从下而上的革命？过去我在学马列主义基础这门课时并未重视这些问题，现在却迫使我注意了。虽然自己不是一名中共党员，我还是懂得党章的法律地位，并且知道党的代表大会是任何一个政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我想起自从中共八大召开到现在已经五年过去了。中共的九大早就应当在一年前召开了。九大延迟到什么时候召开呢？即便是召开了九大，这个九大能够找到一个解决个人迷信的方法吗？

(2)

由于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所造成的“自然”灾害和困扰中国大陆的粮食问题，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的努力纠正，在 1962 年春以后开始逐渐缓和。在播种土豆时剩余的土豆栽子出现在工器站食堂的饭桌上。在市面上，餐馆里也开始看到白面馒头、糖三角等食品了。但是每个人还得小心地掌握各自的定量供应的粮票。我收到一位当年从历史研究所回江苏农村务农的同事的信，他说，当地农民都要求分田到户。

五月份商业系统内进行改组。所有属于松花江地区的二级站都被撤销并入安达市所属的三级站。工业器材采购供应二级站和三级站合并后，原有二级站的房屋就变成新工器站的办公地点，

原有的三级站的房屋则变为仓库。一次我到仓库去办事，那里的保管员给了我一大块工业用的葡萄糖。我不知道吃了这种糖对身体有没有坏处，但因为这是糖，就把他吃了。吃后倒也未见有什么不良反应。前工器站的业务指导科被撤销了。这个科的知识分子们都抱有一种希望，即趁着这次改组的机会，更换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但是没有后台的人则难以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他们干瞪眼看着前工器站的经理苏元德调到哈尔滨去，他们自己则进入新工器站的业务科。仅仅一个雷特在生活条件上有所改善。他被安排到一所工器站所属的商店任经理。在那里他得到了一间住房，空闲时可以在室内写作。沈迪凯穷极无聊，一次在办公室里看到《参考消息》报道的一则关于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的消遣娱乐情况的消息，就说：“当英国女皇的丈夫多么好啊！”这句话使我和孙礼煌相互一愣，中午我们在寝室休息时对沈迪凯的这种思想不禁大笑不已。

经理换了。主要经理就是前三级站的经理，名叫陈浩。陈浩年近五十岁，曾一度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在 1960 年当讨论“列宁主义万岁”一文时，陈浩因同意赫鲁晓夫的论点而被开除出党，同时下放到安达。他一直在申诉，但党籍问题一直未能解决。另一名称做王亚生的副经理也是来自北京的下放干部，年约 35 岁。据说他曾一度在著名外交家陈家康手下工作，后来到《中国青年报》编辑部工作。1957 年王亚生被打成“右派”，1959 年摘帽。

新工器站成立后，包括我在内的几名工作人员在王亚生的领导下承担了一项任务：清理积压库存达三年以上的残、次品，并编造成册。这些东西主要是一些电气零件，数额巨大，但销售不出去，成了急需处理的压库废品，必须编造成册以便上报申请报废。我们日夜加班一直忙了两个星期。夜间加班仅仅是每人一碗

面条，充当加班费。在一起工作的老于头，工作时喃喃地说：“这都是 1958 年大跃进的产品啊！”我面对这堆积如山的废品也感到惊异。这得耗费多少原材料和多少人力呀！这就是大跃进的伟大成果！

这件工作完成后，我轻松了几天，曾几次去市俱乐部和铁路工人俱乐部跳舞。自从离开苏联后三年多没有跳舞，我对舞步已经有些生疏了。有一部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朵斯托耶夫斯基的《白夜》改编的电影片上映。我也去看了。后来高序志告诉我说这里的石油学校不允许该校学生观看这部电影。有些学生要求校方组织一个专场观看《白夜》，校方恶狠狠地地质问学生说：“你们看这场电影有什么好处呢？说！”学生们吓得不敢出声了。后来改看电影《罗汉钱》。这件事令我大为不解，为什么不准许学生观看这部电影呢？朵斯托耶夫斯基是一位十九世纪的俄国作家。《白夜》和赫鲁晓夫根本不沾边，难道凡是俄罗斯的东西都不准许看吗？

我自己是无法摆脱这些“讨厌的东西”的。我仍然处于双重压力之下。大哥一再来信敦促我与克拉娃离婚，克拉娃来信则说她将在 1963 年从列宁格勒财经学院毕业，因此我现在就应该做好我们未来团聚的准备了。克拉娃说她最近一段时间积攒了一些钱，另外她还收到从波里斯·波诺金那里寄来的一些钱，这后者显然是我在苏联发表的两篇文章的稿费。克拉娃现在倒是有来一次中国的路费了。我考虑到自己和国家经济状况都已经有了一些好转，对在安达的生活条件也有所熟悉，就准备采取一些步骤。六月中旬的一天我来到安达市公安局，找到那里的外事干部，提出邀请自己的苏联籍妻子来这里探亲三个月的申请问题。那位干部冷冷地对我说：“你可以提出申请，我这里只能将你的申请报告转报到省里，由省公安厅批示。”我凭过去在北京办这

件事的经验就知道这件事不会很顺利的办成。我知道大哥竭尽全力反对这门婚事，因此在寄往北京的信中，对此事只字不提。我也没有向工器站领导汇报此事，但估计到站里的领导会从我最亲近的同事们那里以及公安局方面得知此事的。

这时全国范围内又发起了一个动员城市员工下乡的运动。据说一名职工下乡，就可以领到 13 个月的工资。另外再为每一年的工龄追加一个月的工资。我想到：“难道我还要搞一辈子商业吗？虽然我不懂得农业，但是一个人不管到哪里要养活自己总是不难的。此外，如果我能到和苏联交界的地区务农，就有机会到那边去了。”于是我给省城市人口下乡动员办公室写了一封信，说我有一名苏联籍的妻子，我志愿下放到黑河地区农村去。我考虑到这可能引起一些对我的怀疑，但想道：“我还怕什么呢？在这里一直呆下去，还有什么希望呢？”但是我的信没有得到答复。

单身职工每年有二十天的探亲假。我和孙礼煌在安达已经是第二年了，因此我们各自积攒了四十天的假期。我无法去列宁格勒去看望克拉娃，也不愿回到北京探亲，以免大哥纠缠我与克拉娃离婚的事。因此这四十天的假期对于我毫无价值。孙礼煌则利用这个假期回到江西吉安探望他的父亲。我托他在北京换车时，顺便带回一袋黄豆给母亲。

我留在安达也不寂寞，临时被派往安达市政府的“清仓办公室”工作。我才得知我要做的工作是继续不久前在本单位干的那个清理残次品的工作。我从中得知原来残次品积压不仅仅是我所在的一个单位的事，而是全国所有单位都出现的事。清仓工作由安达市的一位姓周的副市长主持，他在动员大会上说：“我们面临两个敌人，一个是蒋介石，他现在要反攻大陆。第二个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经济。我们违反了经济规律，现在经济规律正在惩

罚我们。现在的清仓工作就是对第二个敌人进行斗争……！”

清仓办公室的人通常每天去两个单位核查残次品，上午去一处，下午去另一处。7月份天气很热，到处走真的也很累。使我感到惊奇的是我看到每个仓库都有大批的卖不出去的产品，而各个仓库保管员都说这些是1958年大跃进的产品，如果把所有单位的这些产品放在一起，就可以堆成一座小山。1958年的安达市仅仅是中国的一个三等县，在这个小小的县份里就清理出积压废品达一座小山那么多！全国两千多个县，可想而知，大跃进造成的浪费有多么大。1958年大跃进时期我还在苏联，没有亲自体验那时的情景，但这次打扫大跃进的战场，我则是亲自参加了的。我这回可亲眼目睹了大跃进的“丰功伟绩”了！原来是两千多座废品堆集成的小“山”啊！

八月份的一天清晨，我正要去市清仓办上班，工器站人事科的小朱叫住了我说：“张轶东，你今天不必去市清仓办公室了，你的工作调动了。你现在就到市委组织部去取介绍信！”。安达市委组织部一名姓潘的科长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开了一封到哈尔滨松花江地委组织部的介绍信。翌日我乘火车来到哈尔滨找到松花江地委组织部，那里的一位科长接待了我。这位科长对我说：“你提出了你今后的去向问题，并要求邀请你的苏联籍妻子前来探亲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为你和你的苏联妻子安排一个较为适于你们生活的地方。在我们地区最好的地方是绥化。因此我们决定将你调往绥化工作”。这位科长给我开了一封到绥化县委组织部的介绍信。

我回到安达办调转手续时，雷特偷偷地对我说，市委组织部的潘科长说，张轶东太好说话了，如果他再坚持一下，还可以调到哈尔滨去工作。我觉得这也无所谓，我连北京都不留恋，什么哈尔滨、绥化更不在话下了。雷特给我买了一张到达绥化的车

票，而且还是软卧车票。登车日期是8月8日凌晨零点30分。可是，8月7日下午人事股的小朱跑来对我讲市公安局来电话找我，叫我马上到公安局一趟。

我到了公安局，接待我的还是六月份的那位冷冰冰的外事科干部。可是这次他的态度却来个180度的大转变，非常热情地向我打招呼，一句一个“老张”。“老张，我们听说你要调到绥化去了。六月份你曾经把你的邀请信和结婚证书交到我们这里。我们认为苏联是友好国家，你的爱人来探亲一定会受到欢迎的。但是你已经要到绥化去了，你将在绥化落户口，是绥化居民了。你的事情只好到绥化公安局那里申请。现在将你的证件和提出的申请一并交还给你。保留好以便到了绥化再向绥化公安局申请。”

我在从安达市公安局回到工器站的路上，边走边在想，为什么这位外事干部在六月份还那么冷若冰霜，今天又那么热情了呢？为什么小朱、潘科长和松花江地委的那位干部也都对我如此热情？雷特还主动为我买了一张软卧车票呢？这一连串的为什么，使我恍然大悟：原来蒋介石正在筹划反攻大陆，赫鲁晓夫重申“苏联政府认为任何对中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中国政府必须对苏联有点友好的表示。这些家伙之所以对我那么“热情”，我张轶东不过是借了克拉娃的光罢了！

我在工器站食堂吃完了在安达的最后一顿晚餐。经理陈浩走进我的寝室，请我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很客气地请我坐下，直截了当地说：“大家说和你交换观点不大容易。但现在你要走了，所以我想和你谈谈你对赫鲁晓夫抱什么态度？”我感到很突然，所以也就直截了当地说：“这个问题和工器站的工作毫无关系，还是不谈为好。”陈浩说：“但是大家都知道你一直在收听苏联的广播，因此你对于这方面一定是有看法的。”我无法再讲礼貌了，只得说：“对不起，陈经理，我今夜就得上火车，时间

很紧，我必须回去收拾一下行李，并小睡一下。”我就这样走出陈浩的办公室。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思索这件事。我知道陈浩两年前就因为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而被开除党籍的。但他还是一名经理，还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是不敢从我那里寻求共鸣的。会不会是什么机关单位想通过他来试探我的思想呢？

(3)

绥化与哈尔滨之间的距离和哈尔滨与安达之间的距离几乎相等，即都是一百多公里或坐三个小时的火车。不过绥化是位于哈尔滨的正北方而安达则是位于绥化的西北方向。绥化还是从哈尔滨通往佳木斯和通往北安的铁路分叉之处。我所乘的列车在哈尔滨车站停留一个小时。

我在半夜登上火车，在软席车厢里美美地睡上了一宿，清晨八时列车到达绥化。绥化车站距市中心还有三公里之遙，但有公共汽车相通。公共汽车的行车路线是在火车站到市中心百货公司之间。我下了火车登上公共汽车，一路上观看绥化市容，觉得这里比安达要整齐得多。下汽车后很顺利地找到了绥化县委大院并见到了县委组织部负责人，那位负责人说：“我们已经收到关于你的材料。请你先到县委招待所休息，然后再谈工作。”那位负责人自我介绍说：他的名字叫郑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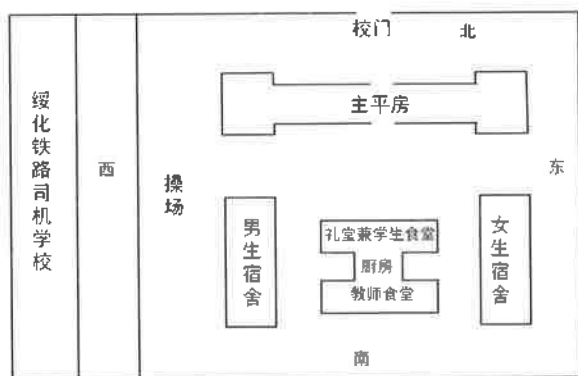
比较起一年前我刚从北京到安达时住的那个安达第三旅社说来，绥化县委招待所的条件的好得多。我被安排到一间两人客房里。食堂卖的是糖精芸豆馅白面豆包。下午我逛了一下绥化的大街，感到绥化比安达优越一些。回到招待所，和我同一房间的房客告诉我说绥化长期以来就是一等县。在招待所里我还从报

纸上看到关于苏联第三和第四架宇宙飞船实现编组飞行的消息。

第二天下午我再去找郑敏谈了我自己的情况。郑敏说：“关于这一切我们已经从转来的材料中了解了。为你的工作和你的苏联爱人来后的生活着想，我县里只有第一中学条件较好。因此你还需要到县教育局去取介绍信。关于你的苏联爱人的问题，你应该和县公安局联系。”

县教育局的两位管人事的干部很礼貌地接待了我。为我开出了到县第一中学报到的介绍信。8月10日早饭后我从县招待所出来就打听到县一中如何走。本地人告诉我应该顺着南北正大街一直向南走，走过南门（南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一直到南大街的尽头。那里有一条东西向的路，我则应沿东路往东走。最初我看见这路的南侧有一处大院，但大门木牌上却是写着《黑龙江省绥化司机学校》，于是我继续往东走。在这个司机学校的东墙外

有一条土路与这条路东西相交，并向南通往农村。在这条路的东侧有一个面积大约6-7公顷的大院。院子的土墙不高，院墙外面有一条宽约二



绥化县第一中学(1962年)

米、深约一米的壕沟。我看见院的西部有一个长、宽约70米×60米的空旷场地，显然这是一所学校的操场。院内还有一所与北墙平行的大平房北墙，中央的大门木牌上写着“绥化县第一中学”。

我离开学校生活已经有四年多了，而离开中学已经有14

年。我完全忘记了学校是有寒暑假期的，八月上旬正值暑假期间。因此当我来到绥化一中校园时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学校里如此安静呢？

我进入了那座北朝南的大平房，这座平房里就是学校的各个年级的学生教室和各个教研组以及各行政机构的办公室，平房的中间有一个中厅，中厅的四个角，正好是四间办公室，东南角的一间是校长室，西南角是党支部办公室。这两间房门都是上了锁的。东北角那间是值班室，室内有几名十六、七岁的男学生，正在值班护校。我告诉他们说，我是来报到的新老师。有一名学生就沿着中间的走廊向东跑去，不久就领来一名年近六十岁戴眼镜的老头。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叫贾钧衡，是本校的教导主任。现在是暑假期间，书记、校长都在休假，他正在领班护校。他向我表示欢迎，并说我来得正是时候，因为8月20日就要开学了，休假的老师们应在那天返校报到了。接着学校的总务主任也来了，他自我介绍说：他名叫李云飞，原是历史教师，因工作需要当上了总务主任兼工会主席。李云飞领着我穿过大厅走出平房，再穿过一个篮球场，来到一座南北方向的另一座平房。这座平房里是男生宿舍，和单身男教职员工的宿舍。我被安排在一间有三张床位的单身宿舍里，房间里已经有一名老师住在这里，现在不在室内。我将行李托运票据交给李云飞，由李云飞安排护校学生到火车站将行李取回。我回到县委招待所。

在县委招待所吃了午饭，结清住宿费回到绥化一中的宿舍里，看见自己的行李已经放在床上。对面床上有一位年轻老师正在睡午觉，当我正在整理行李时，那位年轻老师醒来了。两人互相做了自我介绍，那位年轻老师名叫孙永桢，黑龙江省海轮县人，毕业于海轮师范学校，是本校的政治教师。我将行李安置好后，将收音机放在窗台上，接上窗台和桌子上的灯头，然后打

开收音机收听苏联广播。

第二天下午 我在党支部办公室见到了绥化一中的党支部书记徐成。徐成自我介绍说他自己也是一名来自北京的下放干部，曾在一机部工作，1960 年下放来到绥化。他代表学校欢迎我的到来，他说学校正缺少俄语教师。我既然是苏联留学生，在语言知识方面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应当注意教学方法。徐成的谈话说明我在这里是担任俄语教师，而不是教历史。我对此并无异议。经验告诉我即使在中学里教历史也没有什么好处。我可以在空闲时间继续从事自己的历史研究。徐成对我说：“绥化一中是根据苏联农村中学的规划标准建立起来的，也是绥化县的一所重点中学，是全县少数带有高中的完全中学。他估计到我将易于适应这里的条件。

第二天早晨学校的俄语教研组长蒋洪达到我的寝室看望我。蒋洪达说他过去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为苏联专家当翻译，1958 年下放到这里的。他向我介绍了一下这里的俄语教学的情况。他说过去高考不考俄语，因此，学生和校领导都不重视外语教学。但从今年开始外语学科也列入高考科目之一，因此俄语教学的重要性也提高了。但是现在全校仅有三名俄语教师。我来了增加到四名。因此非常欢迎我的到来。他准备安排我教高中二年级两个班的俄语课。每班每周五节课时，共计每周十节课。

蒋洪达离去后，同室的孙永桢告诉我说，1957 年蒋洪达在哈军工时，因为在整风运动中说了一些话，被开除了军籍和团籍，下放到绥化一中。他的爱人也离婚了。现在他在本地又找了一个爱人，是绥化第三百货公司的一名售货员。他们准备在今年国庆节结婚。

经学校总务处协助，我的户口很快落了下来。我现在才给克拉娃以及在北京的亲属、哈尔滨的沈大伦、和在苏联的老师留布

林斯卡娅教授和波里斯·波罗金写信，通告一下我工作变动的情况。在给沈大伦的信中我还请他转告孙礼煌，当他从江西返回安达路过哈尔滨时，先到绥化来一趟。我不等克拉娃回信就去了绥化县公安局。县公安局的外事干事叫王亚君，他收下了我写的邀请信和结婚证书，告诉我先回学校等候答复。

8月15日教师们开始上班了。开学第一天照例得由校长召开本学期的第一次全校教师大会。绥化一中的校长名叫孙玉生，30多岁，修长的个头。孙玉生原任绥化县委宣传部部长，1958年调到本校任校长。在这次大会上孙校长一再强调要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孙校长在会议上还透露出党中央现在正在制订《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这个条例是全国中学教育工作的指导原则。我敏感地觉察到，在“大跃进”时期，全国各个学校的一切教学秩序都被搞乱了，学生没能很好的上课也没有能够正常地学习，因此从现在开始得整顿教学秩序了。“大跃进”的后果不仅仅是造成两千多座由废品堆成的“山”，而且波及全国各个战线，把所有的正常秩序都搞乱了，不仅损失极大，而且影响极端恶劣！

教师大会结束后，教师们回到各自的教研组备课。我回到俄语组，在俄语组办公室我认识了俄语组的其他教师。一位叫冯伯文的老师，年近40岁，他准备担任高中一年级三个班的俄语教学。另一位是年纪和我相近的女教师名叫张玉荣，她担任初中一年级的三个班的俄语教学。组长蒋洪达则每年都教高中三年级的那几个班的俄语课。而初中二年级的俄语课至今还没有教师呢！蒋洪达向我交代教学工作时说：这个年级的高一学年的俄语课本还有四节课书未能完成，所以我必须将这四课书补齐，才能教高二的课本。

绥化一中的高中学生不仅来自县城城区，也来自全县各个农村，学校的学生宿舍只能容纳县城以外的学生，城区的学生一律

走读。8月20日前居住在农村的学生陆续来校报到，学校的学生宿舍里逐渐热闹起来，我的寝室位于学生宿舍的南段东侧，靠近食堂的那一间。我可以从寝室的窗口窥视到学生食堂兼礼堂。由于我的工种已经改为教师了，我的粮食定量标准也就从29斤/月增到31斤/月。虽然主食供应都是以高粱米苞米面为主，细粮和豆油仍按统一标准供应，但是我感觉到在教师食堂里吃饭时，细粮、豆油等的供应标准远远超过了学生食堂的学生伙食标准。我过去在安达时的那种饿肚皮的感觉没有了。一次我和同一寝室的孙永桢老师无意中谈起伙食问题。孙永桢说：教工食堂是占了学生的便宜，学生的细粮、豆油供应指标一部分被教工食堂占用了。所以教工食堂的伙食标准就比起学生食堂要好得多。但当孙永桢发现我表示惊讶时，他立即补充说：农村的学生根本吃不起按照城镇的供应标准供应的伙食，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钱去消费那些细粮和豆油。教工食堂是以钱票支付每顿饭的费用，平均每人每月需十五元伙食费，而学生只能吃固定伙食，每人每月仅八元伙食费。

我注意到，许多学生来校时都从家里捎带来一小袋炒熟的苞米面，家境稍好一些的，还捎带一点炒黄豆，当他们感到肚子饿时就用白开水冲一些炒苞米面糊糊，捏几粒炒黄豆吃。我注意到学生的生活那么艰苦，内心非常同情，觉得正在长身体、长知识的年纪，学习又如此紧张，营养却如此之差。如何得了？但是这些话也只得藏在心里不能流露出来。

8月19日，也就是开始上课的前一天，一名值班学生来到我的寝室说：“县公安局来电话，要你去一趟。”我来到县公安局找到王亚君，王亚君却让我到另一间办公室去找一个名叫吴德如的人。吴德如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并对我说：“你要邀请你的苏联爱人来探亲。省里已经有了一定表示，现在请你填写这张表

格。”我填写完表格后回到绥化一中和孙永桢谈及此事，孙永桢对我说吴德如是管政治案件的！我感到很惊奇，“怎么？我的这件事竟然扯到政治案件中来了！”

第二天，8月20日，我开始给高中二年级的38、39两个班的学生上课，这是根据建校以来所有的高中班级入校的前后顺序排列得来的班号。每班40人左右，女生只占班级人数的1/5，而初中则是女生人数略多于男生人数。此外这两个班学生年龄约在20岁左右。而我当年在重庆读清华高中二年级时年纪不过十六周岁，这里的学生的年纪显然是大了一些。但是这些学生很朴实，听课也很用心。虽然对我来说，教中学俄语并非难事，但我认为还需要在教学方法上下一番功夫。我决定利用两周的时间，完成他们在高一学年时所拉下的课程。课后我总是给学生留下较多的作业，而且批改得很及时。当我完成了高中一年的课程后，组织了一次小考。我发现学生的成绩很不理想，仅有1/3的学生较好，而且我还发现不仅只是高一课本最后几课的知识有问题，而且以前的俄语知识基础缺欠也很多。俄语组教研组长蒋洪达对我解释说：“这不只是以前的任课教师的问题，主要的是过去高考不考外语，学校和学生对外语都不重视的缘故。但从现在起，只要教师做出一定的努力，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扭转的！”

八月末的一天下午，孙礼煌突然出现在俄语组办公室的门口。他说他是从江西老家回到哈尔滨时看见我给沈大伦的信以后才赶来的。孙礼煌在我这里停留了两天。他告诉我南方各省这几年的情况非常混乱。许多人跑到香港或国外去了，其中还有的人去了台湾。他还告诉我说新疆的一个专区由区委书记领着那里的居民集体逃跑到苏联那里去了。我听到后觉得如果那年（1961年）自己不是下放到黑龙江而是下放到新疆多好啊！孙礼煌离开绥化时又给我留下了五十斤粮票。

我决定再用两个星期的时间，领着学生把高一学年的俄语知识做一次系统、全面的复习。显然仅用课堂时间是不够的，我就利用学生自习时间，到教室里就地、当面批改学生的作业。同时做个别学生的辅导工作。由于将近多一半的学生住校，于是我就利用星期天、节假日甚至是晚自习时间进行个别辅导。经过努力，学生俄语知识的缺欠终于补上了。我也受到学生的称赞。

八月末九月初又有一部分新教师来到绥化一中参加工作。他们主要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学院和黑龙江大学的当年毕业生。包括我在内，这一时期内总共来了 13 名新教师。我和孙永桢的寝室的那个空着的床位现在也来了一位新教师，他的名字叫杜成林。杜成林今年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学院数学系。他来到这里自然是教数学了。杜成林告诉我说他的父亲曾经留学日本，曾经是哈尔滨师范学院化学系的一名讲师。他父亲在 1957 年的那场“运动”中，不小心说了几句话，被打入“右派”行列，下放到呼兰县农村老家劳动。1958 年高考时，凭杜成林的成绩是足以考进清华大学的，但由于他的父亲是“右派”，按照中共的内部“阶级”政策，他的那种家庭情况，高校是不准许录取的。但由于成绩特别优秀，因此被哈师院“破格”录取。我所在的外语组也来了一位新教师，名字叫刘生林，他是黑龙江大学生物系毕业生。由于本校生物教师已经满员，于是刘生林就调到俄语组任俄语教师。蒋洪达安排他教初中二年级四个班的俄语课。但是初中三年级的那三个班的俄语课还是没有人教。

我领着学生复习完高一俄语课之后，就开始教高中二年级的俄语课程了。这时已经是九月中旬，本学期仅剩余十五个星期了，高中俄语总共有二十课。我计划本学期完成十二课，剩下的课留给下学期。十二节课，每周进行一节课，第一堂课先讲语法，并布置作业，第二堂课领着学生做本课的口语练习，第三堂

课进行讲评，第四堂课才讲解课文，第五堂课则是复习和作一些补充。这种教法和其他老师不一样，一般的教法则是先讲课文。在课堂上我总是尽量地多用俄语，少用汉语。我尽量用俄语提问，要求学生也用俄语回答，并让其他学生用俄语纠正错误，我把教学重点放在中下等学生。对于优等生则组织一个课外学习小组帮助他们多学习一些东西。我仍然坚持在自习时间深入学生中间进行个别辅导，以及叫学生到办公室、寝室进行个别辅导。和其他教师比较起来，我有两个有利条件，首先我的俄语底子厚，中学课程对于我来说是居高临下。此外我是一名单身汉，因此有更多的时间和学生接触，便于辅导学生。经过我的不断的努力，高中第 38、39 班的俄语学习终于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也因此很受学生的欢迎，在绥化一中以及在绥化县也小有名气了。

绥化一中全校共有教职员五十人，其中教师三十五名，行政人员十五名。教师中只有三人年纪在五十岁以上。教导主任贾钧衡和一位数学教师王善超是满洲国时期的国高教师，多年的社会磨练使他们老于世故。还有一名语文教师名叫龙雨田，他家在呼兰县农村，自己单身在绥化，住在单身宿舍里。孙玉生在一次给新来的教师开会时告诉大家说，龙雨田在解放前是一名国民党的中统特务，不过他的中国语文功底很厚，现在任教高中三年级的语文课。孙玉生告诫新老教师们尽量少和龙雨田交往。龙雨田似乎也很明白他的处境、很有自知之明、他也很少和别人说话和交往。他不戴眼镜，面部表情很阴沉。

所有的其他教师年纪都在 40 岁以下。我得知校长和校党支部委员孙玉生也曾在伪满洲国的国高念过书，五十年代时曾在省委党校学习一年。据说还有一名非党员校长，名字叫石俊杰，本学期因病在家休养，没有上班，我没有看见过他。剩下的教师几乎全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内各大学的毕业生了。据说在 1957

年的“反右斗争”中，绥化一中的教师中也出现过几名“右派”分子，但是他们有的被打发到县城的其他中学或被赶到农村去了。所以这个重点中学里一名“右”派分子也没有。龙雨田虽然历史复杂，但还不是右派分子。全校共有党员十名，另外还有十名党的积极分子，其中就有孙永楨。而我所在的俄语组则一名党员和积极分子都没有。

身在一所中学之中，我也总是不知不觉地将绥化一中与我自己在这四十年代读中学时的重庆清华中学做比较。我认为在物质条件上和师资方面，绥化一中并不比清华中学差，这也显示出中共在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总觉得绥化一中似乎还是差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就是一种文明传统。

我并不怀疑学校党支部书记徐成和校长孙玉生已经从我的人事档案中得知我的历史情况。即使是没有这点，人们也能猜出：一个留苏研究生被打发到一所普通中学来教中学，他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但是没有人对我说破这一点，反之，在那些新来的大学毕业生中倒是有一些人在议论，他们甚至对我说：“你是一名专家！你这么努力教中学生值得吗？这不是浪费人才吗？”我对此只是付诸一笑。经验告诉我，即使在中科院历史研究所里，我又能有什么作为呢？中科院历史所、安达工器站、绥化一中这三个地方，相比之下我认为还是在这里干了一点实际的事情。我有一种观点：学外语必须抓住年龄段。我自己就是因为中学时代抓紧了外语学习而受益的。因此我才像傻瓜一样卖力地教学生。但这种傻劲还是换来学生的尊敬。一天我在街上一个小餐馆里吃面条，正好有一名学生坐在我的邻座。饭后我们一同返校的路上，这名学生向我诉说了他们农村里的艰苦生活，还谈到在那艰苦的年代，他家里也时常因为吃饭问题发生争吵。我听到后感到很难受。

我收到了克拉娃和北京的亲人的来信。克拉娃说：她明年将在列宁格勒财经学院毕业，因此希望能够在那时来到我身边。我还收到波里斯·波诺金和留布林斯卡娅教授的信。波里斯这时正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党校读研究生。而大哥的信则是催促与克拉娃离婚。包括校长孙玉生在内的许多教师对我有一名苏联国籍的爱人和她即将来绥化都非常感兴趣。他们常常到我的寝室里来，向我索要克拉娃的照片看看。工会主席兼总务主任李云飞表示如果克拉娃来了他就杀一口猪，保证你们的肉食供应。蒋洪达还表示说：当她（克拉娃）来时只须通知我一下就行了，一切事情由我去找校方办理。这些事情使我感到周围的人们都愿意帮助我与克拉娃相团聚，我感到了一种温暖的气氛。

但是风向不知不觉地变过来了。

9月15日下午，全校教师、学生被召集到篮球场集合，收听北京正在召开的一场群众大会，庆祝不久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击落一架来自台湾的美制U-2型高空侦察机。在这个大会上御用文人郭沫若发言讲了话，讲话中用讽刺的词藻讥笑赫鲁晓夫，讥笑他竟然轻信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和平意愿和其他许诺等。郭沫若是在证实毛泽东对于美国总统的论断：“他们（指美国总统）是一个比一个更坏！”我感觉到郭沫若根本不像一名学者，而像一名滑稽剧中的小丑。

几天后，一篇充满浓浓的火药味道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公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里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似乎是处处都有阶级敌人在捣乱。在九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所有住校的教师都被要求到县影剧院集合，参加全县召开的一次审判大会。会上宣判了一批刑事犯，其中一名叫王若武的杀人犯，他因抢劫了两角钱而杀了人，从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次大会在公判之前，主持会场的人宣读了《八

届十中全会公报》，而且特别强调阶级敌人在处心积虑地要推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我感到难以理解，觉得如果中国大陆上的刑事罪犯都是在帮助“阶级敌人”进行推翻无产阶级政权，那么世界上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刑事罪犯岂不都成了“共产党”了吗？因为他们在那里也在威胁着那里的资产阶级政权呀！他们也在和资产阶级“斗争”呀！我认为即便是一个县级机关也应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呀！毛泽东自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过：“人民犯了法，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是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整个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现在搞的这一套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国庆节那天的《黑龙江日报》上刊登着一条消息：“苏联政府决定关闭驻哈尔滨领事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感到有些困惑了。俄语组的女教师张玉荣曾在国庆节期间回双城老家度假，回来后，她偷偷地告诉我说哈尔滨的苏联人曾企图暴动。这个消息使我大为惊奇，觉得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谣言也好、不是谣言也好，总之这都是为阶级斗争理论服务的。关闭苏联领事馆，这件事说明了中苏关系在收缩。

十月末十一月初，古巴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期间，我注意到一些和党支部接近的教师在他们的教研组里公开大骂赫鲁晓夫。在一次全体教师学习会上，主持人是党支部委员、教导主任赵禹勤（他1957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鼓励教师们就当前国内外形势谈谈个人的看法。“不要怕”！——他说：“怕什么呢？”——我感到赵禹勤很奇怪，但正在这时赵禹勤点名了：“张轶东老师是研究历史的，可以谈点什么吧！”我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反映。而那位数学教师王善超却抢先发言了，他直接批评赫鲁晓夫，并且说中国这几年的一切困难都是苏联造成的。讨论结束时赵禹勤特别表扬王善超政治学习积极。我则感到周围的那

股温暖气氛突然被这股“阶级斗争”的冷风给吹得冰冰凉。

十一月我出了一次公差：到哈尔滨为学校图书馆买书。我在哈市见到了沈大伦和孙礼煌。孙礼煌现在是安达市工器站在哈市的驻在员。雷特这时已被调到黑龙江文艺出版社工作，我也去看了他。雷特告诉我说现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批判苏联的高潮。据说印度的尼赫鲁敢于和中国打仗也是因为他得到了苏联的援助。

我向公安局提出的申请报告已经三个月了。我特意打电话给绥化公安局询问一下，接电话的还是那个吴德如。但这一次他的声音非常冷淡，他说：“我们已经把你的申请报到省公安厅了，但是现在还没有答复。此外，你可以提出申请，但是批准不批准则是我们的事。”我似乎从中懂得了一些什么。但我给克拉娃的信中没有提及此事，还希望形势到明年秋天时可能有所好转。

我曾经留学于苏联，还有一名苏联国籍的老婆，还经常收听苏联的广播等等，在这个政治气氛中自然的就成为人们的注意对象。同屋的孙永桢总是问我：“你如何看待中、苏关系问题？”我感到这不是孙永桢在问，而是党支部通过孙永桢（党的积极分子）来打探我的思想动向。我在1961年夏天在北京中科院历史所时，就已经多次面临这种局面了。因此关于如何看待中、苏关系，如何看待赫鲁晓夫等问题我必须拿出一套应付办法。我当然不能公开赞成赫鲁晓夫的观点，如果公开表示赞成赫鲁晓夫的观点，那么就成为这场政治运动的“靶子”。1960年中科院历史所的陈守仁的遭遇就是我的前车之鉴。当然我也不可能违背良心，大骂赫鲁晓夫，这样做不但人们不相信，我自己更不愿这样做。我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套“滑头”的言辞：“任何一个政党的代表大会是这个党的最高机关。苏共二十大的决议和观点不管对不对总是那个党的决定。赫鲁晓夫个人和苏共中央任何人都不能改变这些决定，只有苏共的代表大会才有权改变这些决定。”我

的这种说法，表面上是回避直接评论赫鲁晓夫的观点，人们最多说我是个“滑头”，或者是对于批判赫鲁晓夫立场不明确而已。但对于善于思索的人来说，很容易就联想到，中国共产党自身就不尊重自己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不经党代表大会的讨论，就擅自修改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路线、方针、政策。可是以后的事实却发现，所有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以及党的干部都是些不善于思索的平庸之辈，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我这段话的“恶毒”之处！这样我无论是和孙永桢闲“唠嗑”，还是孙玉生在星期天偶尔到我的寝室里“闲聊”，顺便问及中苏关系时，我都是重复这一套说法。

其实我已经感觉到评论毛泽东、赫鲁晓夫两者之间谁是谁非并不重要。对于毛泽东来说如果不制造这种“分歧”就无法在中、苏联两党之间建造一道万里长城。苏共的反对个人迷信，反对斯大林专断独裁的思潮就会传播到中国党内、传播到中国人民当中。

不知不觉冬天来临了。绥化一中没有安装暖气设备，无论是教室还是宿舍都有火炉取暖，宿舍取暖的办法就是相邻房屋的间壁墙是中空的。这个中空的墙壁和一个火炉相连接，另一端通向烟囱，这座中空墙实际上就是火炉的排烟道，因此这个墙壁是热的，所以叫做火墙，一座火墙就向相邻的两个房间散热，我的寝室位于平房的北头，所以这间房只有一边有火墙，另一面墙则是直接与室外相隔，不可能搭建火炉。还不仅是冷山，还因为旁边是大门过道，因此房间里的温度就有很大差异，临近火墙的那边温度就高一些，而靠近“冷山”的那部分气温就较低。我和杜成林的床位靠近“冷墙”，温度就非常低，孙永桢的床位因为靠近“火墙”温度还算勉强。漫长的冬天使我寝室的那面“冷墙”厚厚地结了一层霜，霜愈攒愈厚，于是就结成了一层将近数厘米厚

的霜。我一面躺在床上听收音机，一面在霜上用手划字。

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仍觉得满足。国家每年冬季发给每名职工 30 元采暖费，学校仅扣六元钱煤款，余款 24 元发还给职工。因为黑龙江最近从四类地区改为五类地区，我的工资就从 66.5 元/月增至 68.5 元/月。我的工资在全校可能是属于前十名之列，此外我还是单身汉，无需养家糊口，每月只需给母亲寄去 15 元生活费就可以了。每月的伙食费，包括每周一次上街去洗澡、下一次小餐馆，也只需 25-30 元，此外我在服装上的化费几乎等于零，因此我每月可以积攒 30 元钱。我想在 1963 年秋天克拉娃来时的花费是足够的了。

我又忘记了年终要发奖金这一惯例了。1959 年在中科院历史所，我因为是“四类人员”而什么都捞不到，1960-1961 年在安达时又因为是“困难”时期奖金一律停发。但在今年 12 月中旬的一次教研组会议上，蒋洪达传达校党支部的意见，要求各教研组评选出 1962 年年终奖励的名单。在俄语组内蒋洪达和我两人被提名为本组受奖人。几天后，全校教职工大会宣布了本年度获奖后选人名单，提供各组讨论，第一类是全面优秀的先进工作者，其中有孙永楨。第二类是单项奖授奖人，其中有蒋洪达、杜成林和我。我真的不太关心此事，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奖给什么？是现金还是实物？我都无所谓。过了一些时候，正式宣布了授奖人名单，孙永楨列入先进工作者行列，单项奖的的授奖人名单中有蒋洪达、杜成林，唯独没有我。我感到木然。我本能地明白，一个人如果在“政治”上“不好”！他干得再好也全都白费！

除夕那天正当全校员工会餐之前，蒋洪达来到我寝室说：“徐书记找你谈话。”于是我来到党支部，徐成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在谈话中一再赞扬我的教学工作如何认真、负责、努力。我本无意向他打听为什么自己没有获奖这件事，但徐书记却主动

的向我解释说，因为我“来晚了”所以没能评上。这种解释显然不聪明，因为谁都知道杜成林来校的时间比我还要晚半个多月呢！在谈到我的生活时，徐成顺便提醒我说：“有些住校老师反映说你的收音机只用来收听苏联电台的广播，他们借不着光。”我觉得徐成这句话，才是句实话，因为这句话点明了我之所以没有受到奖励的真正原因。

于是在 1962 年末，我在那螺旋状的生活道路上兜了一个圈子之后，又回到了一个低点。

第八章 1963 年 梦见克拉娃

(1)

我躺在床上，一面用右手在墙的霜面上划字，一面从左面的桌子上的收音机里听苏联的广播。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显然是在批评中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观点。几天后我从《人民日报》上得知：当中共代表伍修权在大会上致词时，大会代表们还向他起哄。

1 月 20 日到 2 月 20 日是寒假，但是这次寒假校方要求所有的教师必须在 2 月 10 日前返校，参加绥化县全体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学习。我当然可以回北京去探望母亲。但是随着中共与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之间的争论日益激烈，大哥愈来愈强烈地催促我和克拉娃离婚。我为了避免和他见面，也就不回北京了。我留在绥化，在一个同事家里过了春节。2 月 6 日我到哈尔滨去看望孙礼煌。孙礼煌这时是安达工器站在哈的驻在员（看仓库），他在香坊区的民主旅社包租了一间两张床位的房间。我就在他那里住下。白天我到省图书馆去阅读中国和苏联的报刊、杂志，甚至还利用这几天时间整理一下我过去的副博士论文中的第三章，即关于 16 和 17 世纪耶稣会士渗入中国的那一部分。直到图书馆关门时，我才回到民主旅社，和孙礼煌一起吃晚饭、散步。我和孙礼煌还到沈大伦家里去过两次。

2 月 13 日我返回绥化，14 日才开始参加政治学习，按规定时间我迟到了三天。我是故意迟到的，并非是为了在省图书馆里多看几天书，而是为了避开在讨论国际局势时的发言。因为不论

在何处参加那种政治学习，第一单元都是国际形势。当我向校党支部书记徐成报到时，徐成惊愕地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含含糊糊地说我有些事情在哈市多逗留两天。我还见到了那位去年因病休息的非党员校长石俊杰。俄语组和史、地组的教师合并为一个讨论组，石俊杰也参加这个组的讨论。这说明他以后将主抓这两个教研组的工作。2月14日上午是关于国际形势讨论学习的最后一次分组讨论。讨论中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既然苏联已经变‘修’了，那么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是否还成立呢？”“苏联现在是‘东风’还是‘西风’？”我借口来晚了对于学习内容不熟悉，所以暂时保持沉默。

下午全县的中、小学教师都到县电影院集合听取第二单元即关于国内形势的报告。报告人强调当前国内形势“大好”！但是这个报告的主要内容则是在全国，以及在绥化县，当前都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然而，我从这个报告中得到的主要信息则是：中央决定1963、1964、1965这三年仍将是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第三个五年计划将从1966年才开始。如此说来第二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用了八年的时间才能完成！阶级斗争还很激烈、五年计划八年才完成！这怎么能说是形势“大好”呢？

在讨论国内形势时有的教师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八届十中全会所说的阶级斗争和斯大林所说的‘社会主义愈是发展，阶级斗争就愈加尖锐’，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现在国际形势那一段单元已经过去了，我也不再尴尬了。我也得发言了。我说我在哈尔滨吃早餐时看见在同一条街上私营摊点的油条每斤一元二角。而国营餐馆则是每斤一元一角，由此我相信私营经济肯定是不可能战胜国营经济的。

这次政治学习的最后一个单元是关于党的教育方针。我从报告中得知《全日制中学暂行条例》（简称50条）将从1963-1964

学年度开始实施。届时绥化一中就是一所“条例式”中学了。

1月20日，1962-1963学年度第二学期开学了。我还是教高中38、39班的俄语课，每周十节课。现在课本上只剩八课书了，可以用每两周一课书的进度进行教学了。我在上个学期中做出的努力，使我的教学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我和同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更为密切。我感到宽慰。

一个星期三的早晨，学校通知所有没有课的教师都到县电影院去听一个报告。我恰好头两堂有课，当我下了两堂课后再来到县电影院时，报告已经进行了一大半。这个报告是由解放军某部的一名干部所做的，讲的是该部的一名先进战士名字叫雷锋的事迹。我已经在报纸上和广播上知道他的事迹。但这个报告人的一句话却引起我的注意。报告人说雷锋成为一名先进战士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和最根本的则是他始终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

这次报告后不久，在全校师生中迅速开展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俄语组教师也被要求有所行动。于是我就把雷锋的几句话：“对同志要像春天一样温暖，对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热情，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翻译成俄文，写在黑板上陈列在学校的中厅里。我还专门为这几句俄文给学生上了一堂课。我对雷锋在部队里、在社会上一贯做好事，是尊敬的。我也在默默地学习雷锋，时常帮助家境困难的学生，为他们垫付伙食费，为他们购买文具、笔记本等等。但唯有那个被认为是最根本的“方面”——听毛主席的话……我不但不能学，而且反对！因为我反对个人崇拜！

随着中、苏分歧愈演愈烈，愈来愈公开化。我在这方面的态度也愈来愈引人注目。孙永桢以及孙玉生也愈加频繁地询问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还是重复早已准备好的那一套“滑头”论调：“任何一个政党的代表大会是这个党的最高机关。苏共二十

大的决议和观点不管对不对总是那个党的决定。赫鲁晓夫个人和苏共中央都不能改变这些决定，只有苏共后的代表大会才有权改变这些决定。”我通过中国电台的广播得知毛泽东会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就对孙永桢说：“我估计最近中共和苏共之间将有一次双边会谈。果然几天后宣布：七月份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以苏斯洛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将在莫斯科会谈。六月中共发表了一篇《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文章，即所谓的 25 条。孙玉生对我说：“你可以给你的苏联朋友寄几份俄文材料去，邮费可以报销。”我回答说：“我估计他们是收不到的”。这件事就没办成。但这引起我的思考：为什么一个地方中学的校长对国际事务竟然如此感兴趣？莫非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任务吧！果然几天后中国电台广播几段消息说：苏联驱逐中国大使馆人员和留学生，理由是他们散发“25 条”；一列从北京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驶到中苏边境站时被迫驶返北京，理由也是列车中携带有“25 条”。

(2)

我在六月末就教完了高中二年级俄语课本上的课程，并在“七一”前夕指导学生组织了一次俄语演讲比赛。7 月 20 日到 8 月 19 日是暑假。我如果还是不去探亲，那就有点不近人情了。于是我决定这个暑假回北京看望母亲。在如何应付大哥方面，我决定不论他说什么，一律保持沉默，或“同意”，回到绥化后依然我行我素罢了。

我于 7 月 21 日离开绥化到达哈尔滨，我在哈尔滨看望了孙礼煌和沈大伦一家，并买到了 7 月 22 日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在车厢里坐在我的对面的是一名 40 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他说他姓

林，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他是广东人，这次是利用暑假期间回广东探亲。我们两人在车上聊天时林某提到列宁格勒的街道如何如何等等。我感到很奇怪，不禁问道：“你到过列宁格勒？”林某点点头。我也就没有再深入地问下去了。

傍晚当火车行驶到打虎山车站时因为前方被大水淹没，火车不能前进了，于是只好退回沈阳，我和那位林某半夜里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旅社住下。在旅客登记时服务员询问林某的工作单位时，林某说他是哈尔滨公安局的。我不禁一愣，想到他不是对我说过是哈军工的吗？怎么又变成了哈市公安局的了？

第二天（8月23日），我和林某一同到车站了解车次问题，只见站内人山人海，拥挤得很，原因是大量的旅客被滞留在这里。我们两人只好在车站附近闲踱达，每隔两个小时到车站打听一下。经过这样的交往，我得知林某的身世：原来他毕业于国内某一著名工业大学，1947年有机会赴美国留学，他是乘飞机经过莫斯科、列宁格勒到纽约的。他在美国学的是原子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一股爱国热情，想报效祖国而回国。回国后，被分配到哈军工从事教学工作。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于是他就从一名大学教师变成了一名“清洁工”，每月只有25元的生活费。他是哈市公安局重点管制的对象，因此他回广东必须经过哈市公安局的批准才能成行，他手中的介绍信是哈尔滨公安局的，所以他只能说他是哈尔滨公安局的。他在哈市已经有了妻室。据他说他妻子是一名普通工人，工资比他的每月25元要高得多！一名留美的原子能专家，只允许当一名清洁工，每月工资25元！远远不及一名普通工人的收入。我也向林某介绍了我的个人历史。两个“特殊人物”当然谈得很投机。

傍晚得知列车在当晚20时开车。不过这列车只能绕道四平、通辽、山海关到达北京。由于滞留的旅客非常多，乘坐这节

列车的不仅是原来车次上的旅客，别的车次上的旅客也挤了进来，因此车里面拥挤得很。我和林某在拥挤的车上被挤散了。我也没有寻找到适当的座位，只得来到两节车厢交界的空间把行李放在地上坐在上面打瞌睡。因为这里距离车内的厕所很近，所以气味很难闻。但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能有休息的地方就是万幸了。挤在我对面的是一位大约 40 多岁的妇女。她是四川人，现在要回四川看望她的儿子。她一路上对我倾诉着这些年所经历的苦难。她说她曾经是中央某机关的干部，1958 年下放到辽宁朝阳地区农村。几年来她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骨肉分离的痛苦。她们中有些人甚至想到北京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集体自杀！这时旁边有一名瘦高个穿干部服装的中年男子对她说：“这方面的事情我知道的比你多。相比之下你的遭遇还是较好的了，还是不说的为好！”那位妇女听到这话后，就默不作声了。

列车是在 7 月 25 日 17 时到达北京的。在离开两年多以后，我又看见了拥挤的北京街道。我熟悉地登上 103 路无轨电车。虽然七月份是炎热的夏天，但我却感觉到一种肃杀的政治气氛。当我走进府右街后胡同 13 号这个小杂院时，我看到妹妹辉楠抱着侄女在院中的一个小板凳上面坐着。妈妈和毛弟这时都在屋里，他们听见我的声音就都从屋里面出来了。

妈妈是在我躺在床上时才开始问我离开北京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的生活情况。她只是顺便地问了一下我现在还和克拉娃通信吗？我回答说：“不太多”。

大哥在第二天下午来到府右街，这以后就几乎天天下午都回来一趟。因为他们的孩子现在由奶奶照应，所以大嫂也跟着一起来。我们饭后一起出去散步，主要是沿着府右街往南走。他们主要是利用这段时间向我做“思想工作”。我看得出来大哥和大嫂之间还有一定分工。大哥主要是向我讲当前中苏分歧的形势，说

苏联是如何变“修”了。他还建议我不要再和过去的老师留布斯卡娅，以及我的同学波里斯·波诺金继续通信了，因为这可能会引起麻烦的。我多半时间是沉默不语，有时只是“嗯”了一声。我只说过一句话：“我们可以召开我们的九大来讨论这个问题嘛！”关于催促我和克拉娃离婚的事则是交给大嫂来做了。每当她和我并行时，她就不断列出不少理由劝说我和克拉娃离婚，显然这些话都是大哥教她说的。虽然我始终保持沉默。但我觉得大嫂说的一部分话，还是有道理的；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下显然我和克拉娃是不可能生活在一起的了。克拉娃在苏联有一个中国丈夫会不会给她带来麻烦？你一个男人不大在乎年龄的影响，而她今年已经 28 岁了，很快就是 30 岁的人了，你难道不应该为她的青春想一想吗！

在从沈阳到北京的列车上，我回想起从林某和那位女干部那里听到的那些悲惨的事情，可是一到了北京城里，京城人则是万口一声，赞扬之声不绝于耳，而且都和报纸上的宣传、广播里的声音一个调子，一点都不走调。他们总是说苏联如何不好、如何变“修”了……在苏联吃不到西红柿。而在北京西红柿有的是……在黑龙江仅一江之北的苏联就很难吃到西红柿，而江南的中国则是西红柿有的是，只一分钱一斤，而且每天还有不少西红柿吃不了烂掉了。北京人似乎不知道仅三年前中国曾发生过因饥饿而死的人就数以千万计的事了。我感觉到北京人不见得是想什么就敢说什么。看来做一名北京人很不容易，得处处小心谨慎，尤其是说话，句句都必须和党中央合拍、对口！以免飞来横祸！

我来到北京的第二天就被要求到府右街派出所登记临时户口，随后派出所的人就来到府右街后胡同 13 号查对户口，并对我进行询问。我没有任何愿望去看望我旧日的熟人。我只是逛大街、溜书店、坐图书馆，这样我在北京老家呆了十天，觉得再呆

下去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来北京时坐火车并不顺利，就想换个路线返回绥化。我先到天津乘船到大连，再乘火车到哈尔滨，在孙礼煌、沈大伦那里住几天。我觉得在孙礼煌、沈大伦那里的三天，比我在北京的那些天要轻松愉快得多。8月15日我回到绥化一中。到了校园就开始下起大雨来了。我很幸运，如果再迟到一天，通往北京的铁路又会被大水淹没了。

(3)

我从北京回到绥化时，已经有两封克拉娃的来信在等着我了。她在信中说她已经从财经学院毕业了。现在没有一种学习束缚着她，她就非常渴望家庭生活了。我感到现在是处在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之下！

一年前当我听到绥化公安局的吴德如冷冷的声音时，对于中、苏关系还抱着幻想，幻想能有好转的趋势。现在我感觉到我是失算了。在北京时大嫂所说的话对我也起着作用。残酷的现实，迫使我开始思考我不情愿思考的事情。

对于绥化一中来说，1963-1964 学年度就是试行《全日制中学暂行条例》（即：五十条）的第一个学年。这种实验是从初中一年级开始的。初中一年级只招了两个班，每班 40 名学生。这两个班共 80 名学生，是从全绥化县应届小学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的。杜成林被任命为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

本学期学校的人事也发生了一些变动。校党支部书记徐成调往县计划委员会工作。新调来一位名叫于文的女书记，她是绥化驻军某部的一名首长的妻子。另外还有一些教师也进行了一些人事调动，俄语组来了一名叫刘少平的老师，他刚新从黑龙江大学

俄语系毕业。原在俄语组任教的那位学生物的刘生林老师被调往绥化二中任生物教师去了。另外还从绥化四方台镇调来一位年约二十七、八岁、名叫王宇哗的女俄语教师。教师的单身宿舍也进行了调整，我就有了机会搬进原居室南面相邻的那间房屋去住了。和我同室的两个人是杜成林和刘少平。我睡的仍然是房间东北角的那张床。这张床是顺着火墙放置的，我这个冬天是不会挨冻了。我在这个学年的教学任务是继续教高中 38、39 班的俄语。高中阶段最后一个学年将决定学生一生命运：即能否考上大学。这也关系着曾经教过他们的老师的荣誉和威信。这两个班经过我过去一年的努力，俄语基础还是不错的。高中三年级俄语课本共计 17 课书，我计划本学期完成十课书，留下七课在下学期完成，他们还可以剩余较多的时间进行总复习。我计划用两周（十课时）的时间完成一节俄语课，这样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不会感到紧张。我勉励学生把俄语掌握得更好一些，争取在明年高考时能得到 90 分以上的好成绩！争取考入重点高校。如果在高考中俄语分数在 80 分以上，那起码也可考入一般高校的本科班。这两个班级每个班都有一至二名学生俄语成绩已无法跟上一般进度，我就劝说他们抓紧其他课程的学习，以弥补俄语课的缺欠，争取能取得较好的总分。我感到我的教学工作已经得心应手，和学生之间的感情也很融洽。因此我在工作上感到很舒心。

然而，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分歧却使我感到很尴尬。每个星期三的下午都进行所谓的“政治学习”，而且学习内容就是反复地讨论康生那个“制砖厂”所炮制的那些无聊的“文章”。我所属的那个学习组包括俄语、政治、历史、地理四个教研组的教师。主持人是政治组的一名朝鲜族教师，名叫朴昌镇。他虽然不是中共党员，但是一名党的积极分子。有时副校长石俊杰也来参加这个组的讨论。我懂得自己在会上的任何一次发言都会引起

大家的注意。我还不得不发言，我也不愿装腔作势地“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于是我试图在讨论会上涉及到的一些常识性问题做一些插话，例如：在这些文章中引用了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一句话：“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有些教师不知道这两句诗词的出处，我就讲了一通《长恨歌》。许多教师不懂得俄罗斯人的姓名结构，我就大讲特讲俄罗斯人的名字、姓氏、父名、爱称和尊称等等。其实我的这一套“障眼法”根本难以蒙混那些紧紧盯着我的人的“政治嗅觉”。组长朴昌镇瞅着石俊杰喃喃自语：“有的人只是谈谈唐诗和姓氏”。我的这种表现无疑被反映到学校党支部那里去了。现在孙永桢已经把家属从海伦县接了来，在校外租房另住。党支部不可能再用他来刺探我的动向了。于是校长兼党支部委员孙玉生就频频地来到我的寝室，和我“闲谈”中、苏分歧问题。我还是用那一套“滑头”语句来应付一番。但是我也明白用这一套办法不可能抵挡很长时间了。

12月份新的校党支部书记于文在一次会上说：现在全国都在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我校教师也应当投入到这个高潮之中去。她又说：本学期评选“先进”首先就是看一个人在这一年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如何！我很清楚知道今年的“先进”是与我无缘的了。但是我对于教学工作仍然是那么执著、认真。在我的心中，只要能够得到学生的亲切对待就绰绰有余了。作为一个学历史出身的人，我读到周扬10月26日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这一讲话后，心想：“你说的这是什么社会科学呢？”我真想写一篇反面文章，题为：“伪科学是假革命的儿子”。

但是克拉娃的问题却是愈来愈紧迫了。她在来信中一再倾诉内心的孤独和对我的思念！她说她每次收到我的来信都像过节日

那样感到欣慰！我只好从两个方面寻找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我计划利用这次寒假期间，亲自到哈尔滨去找黑龙江省公安厅的有关人员，直接交谈一下关于邀请克拉娃来中国探亲的事情。我对此事还抱有幻想，以为省里高一级机关也许能解决问题。事实上，我也只有这一条路了，试试看！另一方面我在给克拉娃的信中暗示克拉娃，叫她明白当前的中苏关系的现状，这个残酷的现实是阻碍我们团聚的一座无法逾越的大山。在这种情况下她是否应当理智地考虑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我们未来的生活问题？

不知不觉中我和克拉娃已经分开五年时间了。这天下午我从苏联的广播中听到《山楂树》这首乌拉尔民歌。我能够分辨出乌拉尔民歌和伏尔加民歌之间的不同：虽然这两首歌都是由俄罗斯姑娘演唱的，但是伏尔加民歌总是充满了欢乐，而乌拉尔民歌则是充满了少女的幽怨和痴情。相比之下我更喜欢乌拉尔民歌，因为乌拉尔民歌更接近于我当前的处境。那夜我躺在床上发现自己又来到了列宁格勒新萨拉托夫卡那间木屋跟前，克拉娃的同屋瓦莉娅站在门口对我说克拉娃正在屋里哩！我冲进屋内，看见克拉娃正躺在床上，眼睛半闭着。我走近克拉娃跟前对她喊道：克拉娃！克拉娃！但是克拉娃没有回答。出了什么事了呢？是病了？还是生我的气呢？我突然醒过来了。这时已经是后半夜，走廊里的火炉已经压上了煤，室内气温已经降低了，我感到有些寒冷，把被子提了提，重新盖好被子。我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枕巾，原来枕巾已经被眼泪浸湿了。

第九章 1964 年 社教

(1)

新年前后，我过去的导师留布林斯卡娅教授寄来两本俄文的1964年日历作为新年礼物。我把这两本日历送给了我所教的高中38班和39班，在每班教室的墙上各挂上一本，为的是造成一种学习俄语的气氛。我没有想到这件事后来给我带来麻烦。

寒假还是按惯例从1月20日开始。我在1月21日那天就到哈尔滨去，见到了孙礼煌。孙礼煌现在仍然是安达工业器材采购供应站的哈尔滨驻在员，不过住在道外区的黑龙江省商业调运办事处，即沈大伦一家人所住那栋楼里。1月22日上午，我直接来到中山路的省公安厅。这是一座四层大楼，与马路对面的省政府相峙。我进入中厅，看见传达室位于中厅的右侧，开着一个小窗，小窗里面的桌后面坐着一名女警察。我走近窗口，对那位女警察说：“我需要见一位外事处的同志！”那位女警察往楼上打了一个电话，然后让我站在传达室外的窗口旁等着。不大一会儿我看见一名胖胖的中等身材的警官从楼梯下来，嘴上还叼着一支烟。他先和那个女警察喃喃低语了一番，扫了我一眼，然后用一只手向我挥了一下，把我领进收发室旁的一间接待室。进入接待室后，他往沙发上一坐，再指着一个椅子示意我坐下，最后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说吧！”

我感觉他的态度就像是一名警察在审问犯人似的。然而，我只有通过他才能弄清楚克拉娃前来中国的可能性呀！于是我向他简单地叙述了自己的历史，并且询问是否可以就在这里办理邀请

克拉娃来中国探亲的申请。

这名警官吸了几口烟说：“你当然可以申请邀请你的妻子来。但是这里是省级机关，我们不能直接受理你的申请。你是绥化县的居民，就得把你的申请递交给绥化县公安局。此外，你在1962年申请过一次，但是现在已经是1964年了，因此你的那一次申请已经失效了，你必须重新向绥化县公安局提出申请。我们将在收到绥化县公安局转呈你的申请后再行审阅！”这位警官在说完这些话后就站起来走出接待室，把我一个人扔在接待室里。

于是我为争取克拉娃来中国探亲的最后努力以毫无结果而告终。我留在哈尔滨与孙礼煌、沈大伦一家人一起过了几天，到黑龙江省图书馆里看看书报。我注意到所有的苏联报刊都从公开的书架上消失了，于是向阅览室的管理员询问有没有苏联报刊？那位管理员喃喃地说“那些都是修正主义的东西！读者必须持有本单位的介绍信才能借阅！”

我是在一月末春节前夕从哈尔滨回到绥化的。我又写了一份关于邀请克拉娃来中国探亲的申请，提交给绥化县公安局。还是那个叫做吴德如的接过了这份申请。我对此事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我开始考虑另一条解决克拉娃问题的途径了。

二月初春节刚过，离下一个学期开学还有十多天的时间，小院内突然热闹起来了。许多穿着农民服装的人扛着行李卷来到这里。他们住在学生寝室，在学生食堂吃饭。我发现这些人的伙食标准比本校教师还要好些。渐渐地我了解到这些人是在这里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即：县、公社、生产大队三级干部会议）。这些干部每天到县委礼堂，或到市里的一个俱乐部里听报告，下午在他们的寝室里开小组讨论会。晚上到街上看电影或参加其他文娱活动。据说农村已经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1964年本地区的社教点是庆安县，全地区的社教工作团都到那里

去了。现在松花江地区已经更名为绥化地区，所有地区级的机关都要搬到绥化县来。我还是有幸两次住在一个地区的中心，1961-1962年是在安达，从1964年起又是在绥化。

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苏斯洛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所作的报告的全文。以后我又经常收听到苏联报刊上发表的那些“揭露中国领导人的教条主义”的文章或摘要。中国报纸尤其是《人民日报》有时也转载一些苏联文章的摘要，以加强论战气氛，并以此造成一种中共不怕发表对方的观点的印象。双方的文章主要是围绕关于所谓“三和平问题”（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的争论，我对此并不感兴趣。认为这些争论不过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已。然而，有一篇题为《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的苏方文章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文章指出中共领导人已经多年不根据自己的党章规定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了。许多有关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其中包括对苏联的政策的变化，都是没有经过自己党的代表大会或中央全会的认可就发生的。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确打中了中共的要害。我关注着中方的报纸、广播，看看中方是否会发表有关这篇文章的摘要或评论。观察的结果是，中国方面的确从来没敢在任何报刊或广播上透露有关这篇文章的蛛丝马迹。

我与克拉娃的团聚前景是非常渺茫的事了。从现在起我在给克拉娃的信中无可奈何地婉言相劝，劝说克拉娃采用另一种方式解决问题。我不能直接向法院提出离婚。因为我是男方，这在道义上是说不通的。此外，如果男方提出离婚就得承担一定的经济责任，而我现在已经是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因此我只好等待女方明白当时的实际现实，由女方提出离婚的要求，这样问题就会变得容易一些了。这场异国婚恋就以双方国家各自当政者的政治需要而被扼杀。

校园里始终很热闹。2月18日，驻在这里的农村干部门开完会走了。第二天住校学生们返校回来了，因为新学期在第二天2月20日开学。我仍然是每周只有十节课时（高中38、39两班各有五节课时）。现在课本上仅剩下七课书了，可以用每周一个课时的进度进行教学活动。而且大多数学生经过我一年半的俄语教学，基础较好。因此我感到教学时间比较充裕，可以抽出一定时间继续搞我的历史研究了。

然而情况却不容许我得到宽裕。开学第二周的星期一早晨就接到通知，从即日起两周内每天下午都是政治学习，全校教职员工一律参加，这是全绥化县教育系统的统一部署。学习内容是中共中央的三个重要报告。先是用一个下午在县委礼堂听一个报告，然后用三个下午进行讨论。现在我才知道要听的报告是《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农村工作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另一个报告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问题（草案）》——即后十条，在这一个多星期中我还没有感到什么尴尬之处。因为这两个报告说的都是当前的农村形势，我在讨论时可以随便谈谈自己的观点。但是在听和讨论第三个报告时尴尬情况就接踵而来了。第三个报告题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据说有的人是不被允许听这个报告的，可是我还是被允许进入县委礼堂听这个报告，并没有受到什么阻拦。在听这前两个报告时（即关于农村问题的报告）要求大家注意听、并认真记笔记。可是在宣讲这个反修报告时却通知说只允许听，不许记笔记，我在听这个报告时，感觉到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不过是在社会上早已流传的关于苏联问题的一些传言而已。从表面上看，这个报告好像是在论述苏联变“修”的过程，其实这些只不过是赫鲁晓夫进行个人攻击的大杂烩而已。例如：报告中说赫鲁晓夫曾经管斯大林叫做“亲生父亲”。在讨论这个报告时，我的表现

又和去年在讨论那些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时一样了，即避免正式发言，而是在涉及一些知识问题时作一些插言。

这种尴尬场面还得再重复一次。因为在职工学完这三个文件之后，又要由学校党支部向全体学生重新传达一遍那三个文件。于是接连两个星期的下午被占用来搞这种学习。此外，每一个班级都要求配置一名副班主任，因此每一位科任教师都被分配到一个班级去充当副班主任。于是我就被分配到高中 39 班当副班主任。这个班级的班主任是一名叫做王希朴的中共党员。在讨论第三个报告时我注意到在王希朴手中拿着一份这个报告。我趁王希朴如厕时翻阅了一下这份文件。我对报告的内容并不感兴趣，因为已经听过两遍了。但有一个因素使我感到惊奇，在这个报告的封面上只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宣传提纲》几个字，但是没有署名。我回想起在 1956 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那两篇文章的标题后面都署名是“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在标题后还有一句带括号的话：“本文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的”。从 1960 年的“列宁主义万岁”开始到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那些文章为止，那些“经过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字眼没有了，但毕竟还有《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署名。这篇宣传材料的封皮上却是“白版”，有点像在厕所的墙壁上辱骂人的下流话那样，“作者”是从不署名的。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大约在六点多钟醒来了，躺在床上，打开收音机想听听莫斯科的新闻。突然有三四个穿干部服装的人没有敲门就闯进了我们的寝室。我不知出了什么事，急忙关闭了收音机，这些人进来环顾了一下问道：“龙雨田老师住在这间房吗？”同室内的人回答说：“龙雨田老师不住在这个房间。”并指明龙雨田的住处。这时杜成林正好洗完脸，跟着这些人出屋沿着走廊向着龙雨田的住屋走去，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

大一会儿，他就回来说：“出大事了，龙雨田昨天夜间上吊自杀了！这些人是公安局的。”虽然今天是星期天，还是在十点钟召开了一次全校教职员工的紧急会议。学校党支部书记于文宣称龙雨田是昨天晚上在一家饭店里吃了一顿饺子之后，就在离校园不远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的。几天后在另一次全校教职员工会议上，校长孙玉生在提到龙雨田自杀事件时说，龙雨田流的血不是革命的血，而是反革命的血。看来学校党支部和绥化县公安局还是掌握龙雨田自杀的细节的。我感觉到龙雨田的自杀与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间肯定有着某种联系。

一天当我走进高 38 班教室后，发现我送的挂在墙上的俄文日历不见了。下一节在高 39 班上课时，那本日历也是被摘了。我感觉到一些不良的征兆。一次在俄语教研会议之后，组长蒋洪达说：“还有一件事要补充一下：校领导要求全体教师只在教室里辅导学生，而不要在寝室里辅导学生！”我觉得这几句话就是针对我说的。所有俄语教师中只有我和刘少平住校，而且住在一间寝室里。但是刘少平所教的初中学生很少来寝室找他，而来寝室找我的则很多。由于我所教的学生俄语基础已经较好，来寝室找我的学生就不一定只是问有关俄语知识的问题了。高考正在临近，学生们的目的可能是来找我询问如何准备高考，以及如何填写报考志愿的等问题。但是如果话说多了，也可能谈到苏联问题。的确，三十多年后我遇到一位学生时，他告诉我说：“当时他们的班主任（38 班的孙俊阳、39 班的王希朴）都曾经打过招呼，不要和我过于接近！”

我还得到一个对我可能有利的消息：哈尔滨正在计划在一些学校里开设英语课来取代俄语，现在已经建立一所培训中学英语教师的专科学校。我和孙礼煌有一个在安达时期认识的朋友，名叫罗宝建，曾经当过《大公报》的记者，已经被调到那专科学校

任教了。我想 1949 年以后，十五年来因为执行“一边倒”的政策，全国中学的外语课都是俄语，而英语人才早已停止培训。现在看来苏联变“修”了，就转过来要开英语课，上哪里寻找英语教师啊？我有很好的英语基础，或许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调到哈尔滨去工作。于是我起草了一封给黑龙江省教育厅的信，信中介绍了自己在英语方面的能力，最少能够胜任中学的英语教师并愿到哈尔滨工作。4 月 30 日我再次来到哈尔滨，见到了孙礼煌和沈大伦一家，和孙礼煌一起去看望罗宝建，并参观了罗宝建所任职的专科学校。我们一起讨论了我给省教育厅的那封信稿。5 月 4 日我返回绥化，孙礼煌到车站送行时对我说：“你的那封信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难道你还不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什么人物吗？即便是哈尔滨的英语教师都死光了，他们也不会要你的。”我回到绥化后，还是把那封信邮寄给省教育厅。还是孙礼煌有远见，果然那封信是石沉大海，无任何回音。

(2)

我的教学任务在五月末就已经完成了。毕业考试以后，高中 38、39 班学生就进入了准备高考的总复习阶段，由于我的学生的俄语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我也就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从新整理一下我过去的历史研究论文。但我很快就发现现在所处的环境，无法接触到有关的资料，更难以接触到什么最新的信息。于是我认识到不如进行更广泛的阅读较为合理些。另外有些老师告诉我说，英国的 BBC、日本的 NHK 广播电台也经常报道有关中苏论战的消息，而且比较客观。我很快就从自己的那台苏联收音机里收到 BBC、NHK 等电台的播音，并且还意外地听到了美国之音电台的播音。于是我的信息来源就更为广泛了，哪里想到以后在自己

的“罪行”里又添加了一条偷听敌台的“罪状”！

高考是在每年的七月初旬举行的。考试结束后，我所教的学生半数以上对俄语考试成绩都很满意，他们估计俄语考分可能在80分左右。许多学生给我留下了笔记本作为纪念品，并向我索要照片。为此，我冲洗了不少照片分赠给学生。我感到自己的教学工作收到了一定成绩，心理感到满足。暑假照例是在7月20日开始。由于和大哥之间关于与克拉娃的离婚问题的分歧已经无形中消失了，我感到回北京看望母亲没有什么不方便了。于是就在7月20日那天离开绥化来到哈尔滨，在这里与孙礼煌、沈大伦一起度过了一天。第二天，我就从哈尔滨乘特快列车奔赴北京。

在火车上，与我邻座的几名旅客从言谈和气质看来也是知识分子，可能是高校教师趁暑假期间外出探亲、访友的吧！和我对面的那位旅客拿着一张报纸仔细地阅读了很久，从他和他的同伴的交谈中我得知这位旅客读的是一篇有关历史的文章，讨论的问题是上一个世纪中国满清王朝时代太平天国起义军的领袖李秀成是不是叛徒的问题。他们还谈到现在还有一个哲学问题也正在讨论得很尖锐，那就是“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的问题。

7月22日中午我到达北京回到家里，看到家里的庭院静悄悄的。我进到母亲的寝室里，看到母亲正躺在大床上午睡，旁边还躺着大哥的大女儿爱农，那时已经是三周岁了。母亲告诉我说几天前大嫂又生了一个女儿，大哥夫妇感到无力照料两个孩子，就把大的一个女儿留在奶奶身旁。

晚饭后大哥来了。但他不是为了看我而来的，因为我事先并没有写信说我要回来。他是来看他的大女儿来的，偶尔遇到我而已。大哥向我说明了一下当前的政治形势，说中苏关系已经不可能好转了。当他得知我正在劝告克拉娃离婚的事时说：“当然如果女方提出离婚更好一些，不过不能无限期等下去，必要时你还

得主动提出离婚。”

7月23日按照规定我来到府右街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当天下午派出所的一名警察就来到我家进行盘问，而且盘问得比去年夏天的那一次要详细得多。我感到北京市的居民所受到控制更为严厉了。

由于现在已经不需要催促我与克拉娃离婚，自己又忙于照料第二个女儿，大哥对我这次回家度假就不像在1963年夏天时那么热情了。因此他也不是每天晚上都到府右街家中来。第二天（7月23日）晚饭后，我想沿着府右街做一次散步。我抱着侄女爱农走出了后胡同南口与府右街西侧的人行道交叉口，正好与国务院的西偏门隔街相对。不知什么原因，这里的街上一辆车都没有，就连公交车也没有了。我抱着爱农沿着府右街西侧人行道向南散步，看见沿府右街两旁每隔十余步就有一名警卫。当我走到府右街与灵镜胡同交叉口时（府右街的东侧就是中南海的西大门），看到这里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任何人都不允许再往南行走了。我只好让侄女站在人行道上，自己蹲在地上用手抱着侄女。我看见有许多油光锃亮的黑色小轿车从中南海的西大门鱼贯驶出，沿着府右街往南驶去。这些车的窗上都挂着深色的窗帘，外面的人无法看见车内坐的是什么人物。这时一名警卫走到我面前说：“这里不准逗留，请你立即离开这里！”我只好抱着侄女回家了。我想起1956年9月的一天，毛弟轴材在放学回家的途中，也是在府右街的路口曾经因为当时召开中共八大的车辆通过而被阻挡了很长时间。我想是不是现在正在召开九大呢？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新闻，道明了真相。原来昨天晚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其它中央领导同志观看了革命现代京剧《芦荡火种》，即后来的《沙家浜》。

妹妹张辉楠今年夏天正好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她正在入党

并将被录取为外交学院的研究生。这样她在学校里就很忙，只是在一个星期天回到府右街的家中看了一次我和妈妈。毛弟轴材暑假期间在清华大学里也有不少活动，在我逗留在北京期间也只回过府右街家中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带着侄女去过一次中央军委政治学院去看大哥和大嫂，还有他们刚刚出生的第二个女儿。我感到全家人对我的第二次回家不像去年夏天那样热情了，感到自己在北京好像是一个外国人似的。在北京我没有什么朋友可以去拜访，也没有什么地方想去玩玩。于是我在8月4日就乘17次特快列车回到哈尔滨。我没有想到再一次来到北京已经是十五年以后的事了。

我在哈尔滨与孙礼煌、沈大伦一家一起度过的那三天使我感到更自在。8月9日下午我回到绥化一中校园时，离开学还有十天的时间。我在这十天里就阅读自己从北京买的书籍，还听了几个外国电台的播音。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个“北京科学讨论会”有什么意义呢？在制定政治斗争战略或组织体育比赛时，区域划分或许能提供一些方便。难道世界上的每一个大洲都有它自己的“自然科学规律”吗？后来从报纸上读到颂扬毛泽东关于论述基本粒子的观点后，我联想到在本世纪40年代末，斯大林在苏联曾经发动过一个清除西方资产阶级科学的运动，要将来自西方的影响从苏联的科学中排除出去。这时在斯大林内心里，将西方在苏联的任何影响都被看作是对他的政权的潜在威胁。现在毛泽东不惜大量花钱搞这个区域性的“科学讨论会”，主要是要排除苏联科学在中国的影响，因为在毛泽东的内心中，任何苏联的影响都是对他的政权的潜在威胁。关于日本对北方四岛的要求一事，毛泽东甚至说整个千岛群岛都应当属于日本，而且苏联占有领土过广等等。毛泽东的这些话使我感到惊奇。在另外两个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问题上，毛泽东怎么如此随意？毛泽东虽然不担任政

府职务，但确实是执政党的领袖，他讲的话经过政治局讨论批准了吗？向外交部打过招呼了吗？毛泽东在反对苏联的问题上似乎已经失去了理智。我同时也注意到 11 月份上台的日本新内阁，并没有向毛泽东表示一点好感，就连“谢谢”的字眼儿都没有。

(3)

新学年开始前教师宿舍又进行一次调整，我搬到这趟宿舍的东侧从南往北的第二间房。同房的是刘少平和政治教师杜连富（1963 年哈师院政治教育系毕业）。这个房间就是今年春天上吊自杀的龙雨田死前住过的房间，而我的铺位又恰恰就是龙雨田生前的床位。这对我是否是一个不好的预兆呢？我却是满不在乎。

1964-1965 年新学年的教学工作给我带来了矛盾。这一学年分给我的教学任务多了起来：我得教初中一年级的 26、27 两个班，以及高中二年级的 45 班。高中二年级共有四个班，其余三个班由女教师张玉荣任课，我只起辅助作用。26、27 班是由绥化全县的小学中选拔出来的“尖子”学生组成的。这两个班学额都已经达到每班 55 名左右，超出了规定学额（每班 45 名）。向这么大的班级讲课的确费点劲。我几乎将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辅导学生了。在这两个所谓的“条例班级”同时出现了另一个声调。据说从今年起，“伟大”领袖忽然变成教育专家了，他不断批评各级学校的“智育第一”、“升学率挂帅”、“学生的课业负担过重”等等。于是所有学校领导根据毛泽东在 1964 年春节教育座谈会的指示精神要求所有教师注意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事实上学生的过重负担，来源于学生未来的出路问题，中共所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杜绝了人们自由谋生的出路。人民公社限制了农民自己务农的自主性，农村基本上没能摆脱饥寒交迫的

局面。农村的青年要想“脱贫”，最简便的捷径就是设法考上高等学校。只要高考后榜上有名，户口就从农村转到城市，就再也不是二等公民了。高校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就端上了铁饭碗。城市里的青年的出路更是只此一条阳关大道。不断膨胀的人口，如此狭窄的生活出路，可就苦了第一线的教师。上面发下来的教学大纲、教材必须完成，规定的考试必须考好，而且还得考出好成绩来。还要你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不搞“智育第一”、不搞“升学率挂帅”。你如果真的遵照“伟大”领袖的旨意去办，学生家长就非得把你吃了不可，最低限度也得落个“误人子弟”“千刀万剐”的罪名。你若不想违心，认真搞好教学工作，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你戴上个“抗旨不遵”、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叫你吃不了兜着走！我就是处在这个非常尴尬的局面里面的众多教师的一名。

有些小事对于我来说既是正常的、又是微妙的“小事”。有一次接连两天（周五、周六）全校停课，因为教师们要到县委礼堂听报告，但却将我留下“值班护校”。“十一”国庆节前夕，正当我准备去哈尔滨度假，校长孙玉生闯进我的宿舍，劝告我参加完国庆典礼后再动身去哈尔滨。我说我已通知友人我在十一上午到达哈尔滨。现在更动已经来不及了。孙玉生不愉快地离开了我的宿舍。第二天正当我坐在绥化站的候车室里面候车时，一名警察走到我面前问道：“你去哪儿？”我答：“哈尔滨”。警察：“你有证件吗？”我答：“有！”那位警察拿着我的证件对照了一下照片，将证件还给了我。我感到此事“莫名其妙”。

我在哈市与孙礼煌、沈大伦一家度过了国庆节返回绥化后，不久就收到孙礼煌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已经调回安达工作，并说由于某种原因，今后一段较长时间里他和我之间的联系还是暂停为宜。并通知我不要再给他来信了！谁知这段时间竟然长达 15

年之久。15年后（1979年）我们再次见面时，才知道孙礼煌回到安达后，立即以反动分子的罪名被揪斗。

接着克拉娃也来信了。这封信也非同寻常：克拉娃信中说：她同意作为女方向法院申请离婚。还附一份由她起草的、呈送列宁格勒法院的离婚起诉草稿。我将《起诉书》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准备给克拉娃邮回。

10月15日晨，我到教师食堂吃饭时，听到人们正在谈论一个好消息！赫鲁晓夫下台了！我突然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回到宿舍后立刻打开收音机，听到莫斯科电台每相隔一小时就全文广播一次苏共中央全会公报。公布赫鲁晓夫因年迈和健康原因辞职，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柯希金任苏联政府总理。我对赫鲁晓夫的确有些同情。我记得在苏联留学时，最初两年苏联还是在斯大林统治时代，政治气氛非常窒息、紧张。赫鲁晓夫上台后，我的确呼吸了几年自由的空气。我非常赞赏赫鲁晓夫敢于批判对于斯大林以及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下台后会不会缩小中苏之间的分歧呢？赫鲁晓夫下台后两天，中国起爆了第一颗原子弹。中苏之间关于部分禁止核试验的条约的争吵是否就此结束了呢？如果中苏关系有所转变，我与克拉娃能否有重新团聚的可能呢？于是我给克拉娃一封信，信中含混地说，目前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关于我们之间有关离婚的问题是否可以暂缓一下？克拉娃回信也同意这个意见。

但是以后一段时间，我从NHK、BBC、以及美国之音电台听到了苏共中央下发给苏联各级党组织的文件，里面列举了赫鲁晓夫的29条错误。然而，这些都是赫鲁晓夫个人和他工作方法方面的问题。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方面没有错误。那就是说斯大林还得反！个人崇拜还要反！这些都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拿毛泽东的话来说，苏联还是老“修”！11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纪念

十月革命 47 周年返回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是批评所谓的“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文章告诉读者，周恩来在莫斯科时，苏共领导人对他讲，在对苏共二十大和对中共的态度方面，他们和赫鲁晓夫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区别。

看到中苏两党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可能有所好转，我终于把克拉娃起草的并经过我略加修改的离婚起诉书给克拉娃寄了回去，让她送交列宁格勒法院。

我这时也停止了和当年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的同学沙爱计的通信。沙爱计 1955 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后到海参威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部历史所工作。他专攻苏联远东考古。由于他的研究领域涉及黑龙江流域的历史，我就和他有了通信关系，并且和他的导师奥克拉得尼科夫院士也通过几封信。他们曾将一些有关苏联远东古代史的资料寄给我。但今年年末，沙爱计写信给我说：由于（中国方面）对待苏联的态度，他们不便于再寄资料给了。只是在 25 年后的 1988 年我才能在海参威与沙爱计见面，沙爱计还为我打听到克拉娃去世于 1986 年的消息。这是后话。

阶级斗争的气氛经过毛泽东的精心炒作，愈来愈紧张。在一次全县中、小学教师大会上，县委的某一领导人在大会上宣布在本县四方台人民公社也挖出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学校党支部也在强调在教育战线上也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在争夺本阶级的接班人。这种斗争就反映在一名教师是否拥护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上！

我这时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初中一年级 26、27 班的本学期教学计划。我认为初中学生能否掌握好第一学期的俄语课的全部知识，是决定这些学生今后能否学好这门课程的关键。因此，我不理睬那些莫名其妙的舆论，还是本着作为一名教师的责任，我行

我素，一如既往，还是努力认真地辅导初中一年的学生们。但是在一次教师大会上，初中 27 班的班主任齐国君（语文教师，中共党外的积极分子）首先向我发难，他说：“学生们现在感到压力最大的就是俄语课”。又一次在全校教职员大会上，校党支部书记于文在谈到毛泽东的在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对教师们说：“你工作得愈辛苦，国家就愈倒霉！”我感到这些话简直就是对我说的。其实我并没有超出教材的规定给学生多讲一个俄语单词。我完全是按照国家教育部颁布的教学大纲、以及课本所规定的教学内容教学的。此外。初一 26、27 班人数太多。大大超出了国家规定的法定学额（每个班级 45 人），我只不过是按计划完成教学任务而已。根据前几年的教学经验，我感到外语教学工作初期，付出的劳动愈多，以后学生的学习就会愈轻松。已经毕业的高中 38、39 班的学生在大学里时常给我来信。他们在信中异口同声地说，现在才感到我的严格要求给他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们在大学的俄语学习中尝到了甜头。这些信件使我更加坚信自己在教学中严格要求是完全正确的。尤其是当前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正当开始学习外语的最佳年龄段，在这时打下坚实的基础，事关他们一生的前途。初中学生与高中学生不同之处是他们更活泼、更富于感情。辅导这些学生时常是在说笑打闹的气氛中进行的，这些学生时常到我的宿舍来玩闹。学生们相处得如此和谐使我很感欣慰，同时也很受鼓舞。与学生在一起，使孤身一人的我感到其乐无穷，也是我感情上的寄托。因此我完全不去理睬别人（包括校党支部）对我的无理的批评。

但是每当假日，孤身一人，既不能与挚友推心置腹地交谈，也不能与自己的异国妻子团聚。如此窒息的政治气氛，使我感到无比的压抑，无比的孤独，心理上感到空荡荡的。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情送走了 1964 年走进 1965 年。

第十章 1965 年 火山口

(1)

克拉娃在给我的新年祝贺信中同时告诉我，她已经将离婚起诉书递交给列宁格勒法院了。为了把事情处理得简单些，我就自己直接给列宁格勒法院寄去一封信，表明我同意离婚。

寒假仍然开始于 1 月 20 日，我无处可去，只好孤身一人留在自己的寝室里。不过我并不寂寞，我利用了这个寒假辅导初中 26、27 班的那些落后生的俄语学习。由于初中生几乎全部都是县城里的居民，因此他们就可以随时到我宿舍来。初中 26 班有一名叫王治国的学生，他家就在学校比邻，王治国几乎整天都到我的宿舍，我不仅帮助他补上俄语课，而且还帮助他在代数、几何两门课程弥补了学习上的缺欠，使他在学习上大有进步。王治国也为我做了不少事情，如：打水、上街买东西之类的服务。29、27 班的学生们都开玩笑说王治国是我的“干儿子”。

春节前两天，一名值班护校的学生来通知我说：“今天下午三点钟开会。”我想不过是什么春节座谈会而已。当我准时到达会场后，我看到几乎全校教职员工都出席了。主持会议的校党支部书记于文在会上关于春节的事只字未提，只谈了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需要立刻向基层干部传达。接着她就把“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从头到尾念了两遍。在讲解这篇文件时，于文特别强调两点。第一点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点是：这次运动要解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

矛盾。其他的一切解释，例如：“四清与四不清之间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等都是不正确的。我思索为什么如此急于将这文件传达给基层干部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春节后院里又热闹起来了，因为又在这里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据说 1965 年度绥化地区的社教工作团是到海伦县去搞点。三级干部会议开完后新学期就开始了。由于我在寒假里辅导过落后生，我的教学工作也就顺利多了。那种关于我使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议论也就自消自灭了。三月末克拉娃给我寄来了列宁格勒法院关于我们离婚的判决书。我感觉到一种难以叙说的心情。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现在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单身汉了。

四月初的一个星期天早晨，我来到俄语教研组的办公室，正在准备给初中 26 班学生上课。俄语教研组长蒋洪达对我说：“张老师，你今天不用上课了！有别的老师代你上课了。现在校长找你有事！”

我来到校长办公室对校长孙玉生说：“我们不能换个时间谈吗？我今天有课！”校长说：“如果是我们之间的谈话，我们的确可以另找一个时间谈谈。但是这次是县公安局找你去谈话。”接着，他告诉我马上到县公安局的看守所去找一位姓冯的科长。

我从第一中学到看守所步行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我边走边想：“这是什么回事呢？不是那个和我打交道的吴德如找我，而是要我去找什么冯科长！为什么不直接去公安局大院而是去看看守所呢？难道他们要逮捕我吗？那么为什么又不到学校来直接抓我呢？”当我来到看守所门口时，那位冯科长已经在传达室里等着我了。冯科长是一个细高身材的人，长长的头发往后梳着。他一言不发地把我领到看守所内的一间办公室，后来在谈话过程中我才知道这间房屋就是审讯室。在这间屋里还有另外一名中年

人，这个人身材比冯科长矮一些，剃的是平头。这两人指了指房门口的一张椅子叫我坐下。他们把一些材料放在对面墙前的一张办公桌上。那个剃平头的人就坐在桌后面，而冯科长则拿着纸和笔坐在桌子的一侧充当记录员。然后剃平头的人就拉长了脸用严厉的声音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答：“张轶东”。

剃平头的人：“公安机关根据法律对你进行传讯！现在你在传讯单上签字！”

我走到办公桌前。当我低下头在传讯单上签字时，看到在剃平头人前面的那份材料袋上有一个标题：《关于张轶东反动集团……》。我感到有一些奇怪和愤怒，但是似乎又懂得了一点什么东西似的，心情平静下来。签完字后就回到座位上坐下。

谈话进行了一整天，午休时间让我出去在街上的饭馆里吃午饭。谈的是 1961 年以来我与孙礼煌、沈大伦一家的关系。我承认他们过去曾经批评过“大跃进”，以及曾经相信苏共二十大的观点，不过在学习了那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以后，也开始懂得中共的正确观点了。最后那个剃平头的人批评我的观点是反动的！并要求我尽快的写一份书面材料送交公安局。

我在街上的一家饭馆里吃过晚饭。在返回学校的路上正好遇见校长孙玉生下班回家。我毫不怀疑在公安局和学校当局之间关于我的问题是通过气的。我只简单地告诉孙玉生在公安局的一些情况，还说我在后天下午还得给公安局送去一份书面材料，因此这个星期三下午的政治学习就不能参加了。于是我就利用这段令人厌恶的政治学习的星期三下午再次来到公安局。不过这次我不是来到看守所，而是来到县公安局大院，把材料交给大院的收发室。下个星期一早晨，正当我给初中 26 班上完课，在办公室里批改学生作业时，副校长石俊杰来找我：“县法院来了两个

人，他们想找你谈谈！”于是又来到校长室，看见两个中年人递给我一张打印好的俄文材料。我一看，原来是克拉娃呈送给列宁格勒法院的离婚起诉书！于是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已经解决了的问题”。我说早在今年一月，我就给列宁格勒法院寄去了一份同意离婚的信。三月末克拉娃曾经邮寄给我一份列宁格勒法院的离婚判决书。这两个人互相瞅了一下，其中一个说：“那也好！但是既然我们收到了列宁格勒法院托我们办的事，我们也应该给人家一个答复呀！因此你是否可以再写一份你同意离婚的信，好让我们转寄给他们。”我很痛快地答应再写一份材料交给法院。

我还是选择星期三下午那个令人厌烦的政治学习的时间到法院去递交那份材料。当我把材料送到法院的收发室时，时间还不到下午两点。如果这时就直接返校，那么我还得参加那个讨厌的政治学习。于是我就信马由缰，满街蹒跚，最后走进了一家小饭馆。我要了一瓶啤酒、半斤饺子、和一盘熘肉段。我一面品尝酒菜一面思索近两个星期以来在我身边所发生的一系列“怪”事。我突然明白了，原来长期以来我就是个被监控的对象。但是克拉娃实际上对我形成了一个保护伞。现在公安机关从法院那里得知我已经和克拉娃离婚的消息，于是就认为可以向我提出警告了。表面上是公安局先找我，然后是法院随后再找我。而信息上的顺序则是先是法院，然后才是公安局！我还联想到去年10月1日发生在绥化火车站的那件“莫名其妙”的事情：为什么那个警察盘问我，还用我的证件上的照片和我本人核对等等的事情的前因后果。我突然明白了，原来如此！

我本来没有酒量，一瓶啤酒进肚就有些晃晃悠悠的了。我吃过饭后，在返回学校的路上——一面走，一面想：“随他们去吧！看他们能拿我怎么办？反正现在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棍汉，一个人吃饱了，连狗都一块喂饱了！怕什么！？”

当我回到宿舍时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照例说应当下班了。但是和我同一个宿舍里的刘少平和杜连富都不在屋里，其他的宿舍也如此，都没有人。这就是说政治学习还没有完。直到六点多钟人们才陆陆续续地回来。从他们的谈论中得知，今天的政治学习无非是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广播喇叭里天天在叫唤的东西：什么“突出政治”、“四个第一”、“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解放军”、“大学大庆”、“大学大寨”、以及那个甚嚣尘上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等东西。我感到很欣慰，这回又躲了个清闲！没有把时间白白浪费在那个毫无意义的政治学习上！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我虽然没有和周围的人说我和克拉娃离婚的事。但是不知怎的，这件事很快就传了出去。人们对离婚的政治因素并不感兴趣。感兴趣的则是我是否还得再婚？其实早在我要离婚之前，绥化一中的两位已经离婚的女性干部就对我表示好感，虽然她们知道我是一名“落后”分子还有一些“政治问题”，但毕竟是一名留学生啊！还有过去的高中 38、39 班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大学生的姑娘，也常给我来信。她们比我至少要小十余岁，但对我却抱有较好的感情，总希望和我更接近一些。另外一些老师直接对我说愿为我介绍对象。

一个中年人对婚姻不感兴趣总是不正常的。人们会猜测我为什么如此反常呢？当然对克拉娃的怀念是妨碍我再婚的一个原因，但这决不会保持得那么长久。真正阻碍我考虑婚姻问题的则是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这些年来我始终担心自己的“政治落后”会影响自己的弟弟、妹妹的前程。我感到如果一个人被绳子捆住了手脚，他可以挣断或用刀子将绳索砍断。但是这根绳索却是自己亲人的肉做成的啊！我考虑到：如果中国当今的政治局势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所改变，那么如果我结婚生子有了家庭，我的家人和我的孩子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我自己在政治上的“落

后”已经给自己造成那么多的麻烦，万幸的是我是孤身一人，一切厄运都由我一人承当，何必还拽着另外的人陷进这个政治火坑里呢？特别是我的后代——孩子，无辜的孩童也会遭此厄运呢。因此我一直理智地克制自己的情欲。坚持不谈婚姻问题！对自己后代的爱护，对家人的责任心，这不仅仅是人类的本质属性，同时也是整个生物界的共同属性。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只能采取不结婚、不要后代的决策，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马太福音》！

不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和中国的众多善良而无辜的人们一样陷入这场空前的大灾难之中。值得庆幸的是，自己没有连累任何人！更没有牵连自己的“后代”！只身一人勇敢地、昂首阔步走向毛泽东设定的“天堂”？！至今我对此感到骄傲！

这时还发生过一件趣事：一个星期一的早晨，一名学生来到俄语教研室，将一封信交给我并说，“这是第三中学的宋老师托我交给你的信。”说完话后，这名学生就走了。我打开信后看到一封用俄文写的信，内中写到：

“张轶东老师：请在星期六下午六点半到绥化影院大门前来，我们谈谈。”

宋兰芬（日期）

宋兰芬是绥化县第三中学的一名女教师，和我年纪相差不多，绥化本地人，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黑龙江大学前身）。但不幸的是她在毕业前夕被划为“右派分子”，分配到绥化县第三中学教俄语至今。因为当上了右派，至今没有对象。我是在全绥化县俄语教师教学研讨会上认识她的，但无深交。她可能是在得知我离婚的消息后才送来此信的。但我也无法确认她是否有那

意思。问题是这封信仅用俄文写成而送信学生又看不懂信上写的是什么，因此延误了送信时间。当我拿到这封信时，已经是星期一了。于是我将这封信和我收到的那些从苏联寄来的信放到一起了。不料这封信在几年后竟导致了一场小小的闹剧！

(2)

暑假之前我收到大哥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北京的家人都很好，这个夏天他们都很忙，你用不着惦记等等。我立即看出这封信的含义：由于某些原因，他们希望这个暑假我不要到北京探亲。于是我给母亲汇去六月份 15 元的生活费。汇款单上加了一句附言：“今夏不返京！”

暑假开始，我感到非常茫然，自己有家不能回，推心置腹的友人孙礼煌、沈大伦一家人都受到公安部门的监控，也不能聚在一起谈心。一个单身教师，寒假、暑假都无处可去显得有些不正常。有一天当我正在学校收发室里闲坐，一位名叫刘忠的化学老师向我建议：两人结伴一同到本省的五大连池或者镜泊湖去旅游。他这一提议引起了我的一些想法，我和刘忠商议，两人一起到五大连池旅游。

刘忠，1958 年毕业于吉林省某高校化学系，毕业时正值大跃进年代，中国科学院在黑龙江省建立了原子能研究所，刘忠毕业后就分配到该所工作。大跃进失败后，这个所下马了，刘忠就被分配到绥化一中任化学教师。刘忠来这里的时间和我几乎是同时。据说刘忠口才不怎样，但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知识面很广阔，而且喜欢游山玩水。

7 月 1 日早晨，我和刘忠登上绥化至北安的火车。中午时分列车到达北安站。北安市所属的黑河地区是与苏联交界地区。在

日本占领期间曾经有一条铁路从北安通向黑龙江江畔的黑河镇，黑河的对岸就是苏联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市。日本战败后，苏联红军将这条铁路拆除。1960年我通过齐齐哈尔到黑河时，曾听说当时正在修建一条北安至黑河的公路。现在这条公路已经建成通车了。不过在1960年时我还可以随便前往黑河，现在则不行了，所有前往临近苏联边境的地区的人都必须事先向当地的公安机关申请边境通行证。据说当一个人在获得边境通行证后，批准通行证的公安机关就向该地的公安机关发通知，使当地公安机关了解何时、何地、何人将前往该地区。我是一名受控人员，又没有充分理由去黑河，自然也就不去自找麻烦办这个申请了。五大连池地区虽然已经接近边境地区，但还不属于边境地带之内。

我和刘忠出了火车站，正好遇见一辆从北安开往德都县的公共汽车（五大连池在德都县境内）。我和刘忠登上这辆汽车，一个多小时就到达德都县城。当我们在德都县城的一个小饭馆里吃饭时才知道，五大连池离德都县城还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于是我们就沿着公路往北步行，将近黄昏时来到一个叫做双泉公社的地方。我们想找一个旅店过夜，但是这一带没有旅店。不过一个农民告诉我们说德都县第三中学就在附近。当我们找到这所学校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这是一所半农半读的学校，现在已是暑假期间，只有一名值班教师在这里。我和刘忠向他自我介绍说：“我们是绥化一中的老师，暑假期间想到五大连池去旅游，路经这里，希望投宿一夜，明天清晨继续上路。”这位值班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安排我们在收发室睡了一夜，翌日清晨这位老师还请我们吃烙饼油条作为早餐。我们谢过这位老师上路，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这一片湖光山色的地方，开始了游山玩水的活动。

五大连池形成于公元1719年（清康熙58年），是由于这一带火山爆发引起的地下熔岩喷发造成的。这个火山群位于大、小

兴安岭之间的台地上，共有 14 个火山口，这些火山称为药泉山、老黑山、火烧山和卧虎山。其中最北面的那座火山靠近孙吴县，叫做尾山。据说从尾山再往北走就需要边境证了。火山群的山脚旁相连接的五个湖泊，从南往北依次称为一湖、二湖、三湖、四湖和五湖，所以称为五大连池。

我们首先到达的是药泉山，这里有一股矿泉喷泉。据说这股矿泉水能治疗胃病，于是在山脚就建了一所疗养院。这里聚集着许多人，手里拿着杯子从喷泉里接矿泉水喝。我们也向人借了个杯子喝了不少矿泉水。但是在撒了两泡尿后，我们就感觉有些饿了。而这一带一个饭馆也没有。我们在药泉山与老黑山之间找到了一个食杂店，在这个店里买了两瓶啤酒和几根麻花，在食杂店里边吃边商量怎么去考察这些火山。显然，老黑山是这些火山群中最高、也是最有趣的一座山。许多人已经爬过这座山，并参观了火山口。然而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钟了。如果我们现在开始爬山，当爬到山顶时天就黑了。这里除了疗养院以外一处旅店也没有，今晚在那里过夜呢？食杂店老板插话说：“你们根本不用找什么旅店，当你们爬上山时天已经黑了，摸黑下山是很困难的，你们可以收集一些干树枝，在山上点起篝火取暖对付一夜，等到天亮时再下山就是了。

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在这所食杂店里买了一些饼干和啤酒就向老黑山去了。这里其实没有什么路，从湖岸到山脚之间遍地铺满了褐色的火山灰，坑坑包包的，根本不可能形成什么路。从山脚往上才开始有了绿色的树。我们从老黑山的南山脚开始爬山时已经是下午四点钟了。山非常陡，爬起来很危险。山坡上到处都是黑桦树，我们得用手抓住黑桦树的树枝才能往上爬一步。这种爬山方式使我想起一次我在北京爬景山的情况，那一次我不是顺着景山东西的石级走上景山顶，而是从北坡直接爬上去的。

但是这一次爬老黑山就要比爬景山山坡长好几倍了。

我们爬到山的顶端海拔 515.9 米高处的火山口时已经是下午六点多钟了。从老黑山顶俯览整个五大连池地区，其他十三座火山的山顶排成一串，有点像站在北京的景山顶上看故宫里面的宫殿的屋顶一样，也是排列成串。五大连池的湖面反射着即将夕阳的光辉，这也有点像在景山顶上观看北海、中南海、什刹海相似，但那些都是人工景致，这里是自然形成的景观，当然要比北京城里的人工景观壮丽得多！然而，使我们更感兴趣的还是火山口。火山口是漏斗型，内壁是陡峭的悬崖，深约 130 米，直径约 500 米。在黄昏时刻的微弱光线中站在漏斗边上向里面探视，只觉得里面黑洞洞的。我们不敢冒险下去探秘，只得站在火山口的边缘欣赏这里的景色，直到晚上七点多钟阳光完全消失为止。

我们从火山口边缘顺着北坡往下走了几步，找到了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采集了一些干树枝燃起了篝火。我们在这里休息、喝啤酒、吃饼干和一边闲聊。有时轮流打一下盹。我们不用担心会有什么野兽来侵扰，因为那位食杂店老板说在火山上什么野兽都没有，奇怪的是这里连蚊子都没有。这里是高纬度地区，夏天的黑夜很短，大约在清晨四点多钟，天就开始亮了。因此山上的这一夜过得很快。我们顺着老黑山的北坡往下走，到老黑山坡脚靠近二湖与三湖之间的那个狭窄的水道时已是早上七点多了。我们又渴、又饿、又累、又困。令人着急的则是这里竟然连一家食杂店都没有。而我们已经将昨天买的啤酒、饼干等食品都吃光了。幸而在那个狭窄的水道边有一个打鱼的窝棚，有位渔民住在这个窝棚里。这位渔民姓王，他在两湖之间的接口处安放了一张渔网。这个渔民每隔二三个小时检查一下网，捡一些捕获的鱼。他把大部分鱼拿到生产队，还剩下一些留在窝棚里自己食用。我们称这位渔民为“王大哥”，对他说：“我们昨天晚上在老黑山

上待了一宿，现在想弄一些吃喝的东西。”这位王大哥年约 30 多岁，他说这里粮食没有，但是有小鱼。窝棚里还有一个烧炕的火炉。你们可以在这里熬一锅鱼汤喝，然后就在炕上睡觉。

我们喝了一顿鱼汤，感觉真是一次最大的享受。两人吃喝完毕后，倒在炕上就睡着了。当我们醒来后已经是下午两点多钟了。王大哥说：“你们现在走已经晚了。还不如在窝棚里住一宿，明早再走！我可以回到家里去住。”王大哥的想法正中我们的下怀，因为我们还想再欣赏一下五大连池的风光。另外，我们还想去买点食品对王大哥表示感谢。于是我们走上了公路，在公路旁找到一家食杂店，在那里买了一些面包、香肠、啤酒，回到窝棚里和王大哥一起会餐。王大哥也烤了一些鱼片来丰富会餐的内容。在漫长的会餐后，王大哥就回到他所在的生产队的家里过夜，我们留在窝棚里过夜。

这里与老黑山顶恰好相反。到了夜晚，蚊虫、小咬向着我们群起而攻之，我们几乎整夜未能入睡。清晨王大哥回来后，我们在一起仍然是以鱼汤、面包、香肠做早餐。早餐后，我们向王大哥告别踏上归程。在公路上我们遇到一辆驶向南方的大货车，向司机打了一下手势，热心的司机将我们带到北安市。我们在北安市里找了一家旅馆休息了一宿，在 8 月 5 日下午就回到绥化了。

我这一个挨好几年整的人居然有闲心游山玩水达五天之久！老黑山与其它火山是被地质学家定性为休眠火山。当我站在火山口的边缘时，我并不知道下一次火山爆发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在本世纪？还是几个世纪以后？然而，我离开老黑山火山口并不意味着远离了一切火山。当前中国是一座比老黑山大了不知多少倍的超级火山！所有中国人，其中自然也包括我在内，都站在这座火山口的山坡上，而火山的岩浆已经积累到快要溢出火山口了。这座火山很快的就要爆发了。

(3)

大自然在一场大灾难之前往往有一段短期的平静。在社会生活中也是如此。不过这种平静反而使人们觉得有一种窒息的感觉。1965年的最后四个月里，我就觉察到了这种窒息。

新的 1965-1966 学年开始了，我的教学任务是教初中二年级的第 26、27 班每班每星期四个课时，以及高中三年级的第 45、47 班每星期五个课时。总共每周授课 18 节课，两套教材。虽然课时增加了，但由于这四个班中的三个班已经由我教过一年了，基础较好，所以可以花较少的时间去辅导学生。仅仅是其中的高中三年级 47 班的学习较差一些。我得花费一些时间辅导这个班的学习，以使这个班的学习与 45 班能并驾齐驱。因为这个班过去两年的俄语课是由女教师张玉荣教的，他们对于我的教学方法不太适应。高中三年级的其余两个班级仍由张玉荣老师任课。这样两位张老师就得配合好，目的不仅是完成教学计划，而且要在明年的高考时得到好的成绩。这样我的教学重心就转移到高中三年级这方面来了。

我知道在日常的教学中，俄语的语法知识是分散在教科书的各个课时中的，因此在总复习时如果将分散在各个课时中的辞章、词条按照俄语的语法系统整理出来，对于学生总复习就方便的多了。于是我就决定抓一抓这件事。编写复习参考资料几乎占去了我本学期的全部业余时间。我也有自己的打算：我认为与克拉娃离婚后，看样子得在绥化一中当许多年的俄语教师了。编出一本参考资料对于我今后的教学工作也有所帮助。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这项工作有了一些眉目，就会有一些空余时间来继续进行历史研究了。

由于在这个时期中共中央调整了国民经济，中国的经济稍有好转，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善。从5月起还有一件有趣的事，那就是号召职工吃“爱国肉”。原来仓库里库存了不少猪肉，说是由于国内、国际对猪肉的需求很小，所以仓储爆满（据说这些猪肉是为偿还苏联的债务而准备的，但由于苏联故意挑剔，因而积压在仓库里。），因此上头号召职工吃肉。食堂顿顿有肉菜，而且价钱便宜还无需付现钱，肉钱可以从工资中扣除。市场上肉价一斤仅0.6-0.7元。一斤酱肉也不过一元钱左右，一瓶啤酒不过五角二分钱。我是单身汉，工资又较高，在食堂总是选最好的菜吃，而且几乎每天晚饭都喝一瓶啤酒。这样不知不觉肚子就凸了起来。我喜欢吃面条，有时宁可吃上顿剩下的面条也不肯吃新焖的大米饭。同事们给我取个绰号叫“张胖子”或“面条大王”。他们几乎忘记我是一个“落后分子”了！

有一件事使我积攒下了一条“罪恶”。一天学校里发给全校教职员工人手一套两册装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书费每套五角二分钱，由工资中扣除。我对此事不感兴趣，认为我又不是什么毛泽东著作学习积极分子，再说我已经有了四卷本装的《毛泽东选集》，而那本《选读》里面的文章差不多都包含在这四卷里面了。何必重复买那套《选读》呢？这时和我同一寝室的教政治的杜连富老师要为学生买一些两卷本的《毛泽东著作选读》。我就趁机将我这套交给了杜老师代卖。杜老师付给了我五角二分钱。我拿着这五角二分钱说这正好是一瓶啤酒钱！我竟然把毛泽东的这本“圣书”换了一瓶啤酒！罪过！罪过！

署名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发表以来，我从日本的NHK、英国的BBC、美国的“美国之音”收听到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评论。尤其是对于五十个越南、世界农村、世界城市等等“天方夜谭”国外电台评论甚多。而且有些外国电台已经预见到

毛泽东的后继人选已经不是刘少奇而是林彪了！此外还有陈毅在9月2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的发言，国外的评论也引起我的注意。

《人民日报》也转载了一些外国报刊关于陈毅发言的评论。这些评论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红色权利报》的一句话：

“陈毅的发言是否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政困难呢？”我并不知道到底国内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我是学历史的，知道往往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当国内遇到困难时就寄望于战争，例如：1870年普法战争之前的拿破仑第三和1904年日俄战争以前的沙皇俄国政府。

我和克拉娃之间继续通信。我在信中向克拉娃表示希望克拉娃能够找到一个好丈夫。克拉娃说她曾经遇到过一个人，但仅仅相处几天之后就 and 这个人“吹”了。克拉娃在给我同一封信中表示了前后相互矛盾的感情。信的前半截希望我能够找到一个好姑娘，可是信的后半截克拉娃却又写道：“啊！轶东，你可不要结婚，我可不愿意看见你结婚，我还想等着你呢！”我看了这封信，感觉心情非常沉重。

12月我那本中学俄语教学参考书已经编写完毕。这本书估计有三百多页。下面的问题是如何将这本书印发给学生。我特为此事去了一趟哈尔滨，想联系一个印刷厂印刷这本书。我在哈尔滨呆了三天两夜，了解到如果这本书采用铅印成本太高，最后我决定采用誊写的方式。我找到了一家誊写社订印了五百份。晚上我回到旅店阅读白天在街上买到的一本最新出版的《红旗》杂志。这本杂志刊载了一篇署名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研究历史》。我不知道戚本禹是何许人也。我离开北京已经五年了，但从未听说过这位名叫戚本禹的“著名历史学家”。我读了这篇《为革命研究历史》，感觉非常奇怪，更无从理解为什么这样的一篇胡说八道的文章，竟然能够发表在中共中央的党刊上？难道

不怕丢人吗？真令人莫名其妙！听说不久前还有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关于吴晗和海瑞的文章，可惜我没有机会拜读那篇“大作”。因为绥化一中的图书官收藏的图书、报刊很有限。

在自然界的大地震发生之前，总会出现一些震前预兆，什么井水水位异常、蚂蚁搬家、老鼠出洞等等。人类社会在大动荡之前也同样，也会有一些人有预感，甚至是一些文化水平不甚高的人也会预感到要出大事。18 世纪中叶，法国一个农村老妇对一个外国旅游者说：“要出大事了，我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但我知道一定要出大事！”前苏联一名作家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中有这么一段插曲：流放到西伯利亚叶尼塞河畔的一名政治犯听说基洛夫被暗杀之后说：“一个黑暗时代开始了”。蜃居在北京王府井不远处的小院内、曾经在 1957 年被划成头号大右派的章伯钧，看到御用文痞姚文元写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后就说：中国历史上的最黑暗的时代即将来临了！

好几种预感在我的脑海里交融着。我想起了法国大革命前那个农村老太太说的话。陈毅在国庆节前夕记者招待会的发言可能暴露出，现在的领导集团已经不能用旧的方式统治国家了。而根据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的论述，上层不能用旧的方式进行统治是构成革命形势（其实也是一切政治动乱）的主要因素之一。即将到来的 1966 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而从历史上看每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期总要出一点什么事情。例如：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初期出现了高岗、饶漱石集团，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初期出现了彭德怀。现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了。

是的，我确信明年一定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而且是大事情。我和那位法国老太太一样，无法具体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我

也不知道这件“大事”将会给我自己带来什么影响，是好的影响或是坏的影响？我只是确信明年一定会出现“大事情”。

下 册

第十一章 1966 年 黑帮室

(1)

寒假还是和通常一样从 1 月 20 日放到 2 月 20 日。春节前我留在校内忙着修改我所编的那本《中学俄语复习手册》以便交给哈尔滨的那家誊写社代为印刷。我每天下午都要在学校大门后的收发室待上一小时，和收发员老张头聊天。老张头的全名叫张文延，是一个“老单公子”，左脚有点跛。他就住在这间小屋里，自己做饭吃，充当学校的门卫兼收发员。这两个“老张”在一起待得愈来愈熟。当邮差送来信件和报纸时，我就有了对报纸先睹为快的方便。在读报中我感到火药味愈来愈浓了。一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田汉的《谢瑶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知道田汉是一个老革命文艺工作者，我们国歌的歌词还是他写的呢，怎么田汉也会被定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呢？我觉得 1965 年底在我头脑里形成的那种预感，现在正在不知不觉地转变为现实。

春节后我去了一趟哈尔滨把《中学俄语复习手册》的手稿交给誊写社誊写印刷。当我从哈尔滨回来时，校园里又热闹起来了，因为又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议之后就开始了新学期，但是气氛却更为复杂了。这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第三年，继庆安和海伦之后，绥化县成为绥化地区 1966 年的点了。地区社教工作团已经在地委大院安营扎寨，有一个工作组也被派驻到绥化一中。工作组组长叫王喜贵，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男人。然后有四名组员，两男两女。两个男组员都姓刘，和我年龄差不

多。他们中的第一个叫刘宝泰，是肇东师范学校的语文教员。他总是用烟斗抽烟。第二个姓刘的叫刘金福，是一个很健谈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从哪个单位来的，反正所有社教工作团的人都不能是绥化本县的人。那两个女孩子都大约比我要年轻五六岁。她们中间的一个姓王，沉默寡言，我也不知道她是从哪一个单位来的。看来她是负责整理资料，照料工作组成员们的生活和财务事项的。另一位女同志则是一个活泼的人。她的名字叫付波，未婚，是肇源县第三中学的政治教员。这些工作组成员使得全校职工和学生有一种神秘感。他们自己则是竭力和大家打成一片，在教师食堂的饭桌上和教师们边吃边谈，晚上到单身教师寝室去看望他们等。一次我看见刘宝泰和孙玉生在校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谈话。孙玉生看样子心事重重，但却强作欢笑似的。

生活中常常发生怕什么就来什么的情况。三月份我去哈尔滨取回我所编的《中学俄语复习手册》，以便分发给学生。当我从哈尔滨回到学校时，得知我外出期间学校发生了一些大事：一天晚上学生食堂兼礼堂着了火，县公安局就派人来调查这火是不是“阶级敌人”放的。在调查过程中一个公安人员把他带来的那部进口照相机的镜头丢失了。这样一个“双重案件”使得校园的“阶级斗争”气氛变得非常浓厚了。

通过床头左侧窗前桌上的那台收音机，我从莫斯科的广播得知苏联共产党将在3月末召开第23次代表大会。3月初我给克拉娃和波里斯·波诺金一家寄去了贺卡，向他们祝贺三八妇女节。我还要求波里斯·波诺金在苏共二十三大召开的那些天里，把他自己读过的那份《真理报》寄给我，就像他在1961年苏共22大召开期间为我所作的那样。五一节时我只收到了克拉娃和波诺金寄来的贺卡，但是始终没有收到有关苏共二十三大的材料。我以为这是因为波诺金现在给我寄材料已经不大方便了。只在三个月

之后我才从一张大字报上得知，波里斯·波诺金寄给我的《真理报》在哈尔滨被某一机关扣留了。在苏共二十三大召开的那些天里的所有业余时间，我都躺在寝室里的床上从莫斯科广播收听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和有关消息。我从这些材料里感觉不出中苏关系会有变化的迹象。我感觉苏联关于共产主义的调子也唱得很低了。然而，我继续与已经离婚的苏联妻子通信，以及我对于苏共二十三大的关心，都为自己在今后积累了“罪行”。

在教学方面我现在负担不重了。课本上只剩下七课书要教，到4月末就全部教完了。然后就是毕业考试。毕业考试以后还剩下的两个月就是用来准备高考了。高中45和47班在俄语方面已经有了较好的基础，我就没有多少工作可做了。此外，我所编的那本《中学俄语复习手册》也使学生们在俄语课总复习方面有了一些方便。我还需要对初中26班和27班进行正规教学，但这个问题也不大，因为这两个班学生的俄语学习也有了较好的基础。然而，报纸上和广播中关于“阶级斗争”的叫声不断地渗入校园，叫得愈来愈响。有一种声音叫道：“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个‘念念不忘’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可只是‘念念不忘’一日三餐啊！”我自嘲道。

4月份报纸和广播大肆宣扬全国工业和交通系统职工给林彪的信，信中说他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导思想。

“为什么他们不是给周恩来总理或中共中央写信而是给林彪写信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感到奇怪。学者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变成了批判对象：周谷城、翦伯赞和周予同等。我甚至有点庆幸自己在1961年离开了历史学界。然而，姚文元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一文的发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邓拓、吴晗和廖沫沙“三家村札记”的声讨却使我震惊了。

1959 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时，我曾看见过邓拓。我不能想象这么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者怎么能够成为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的头头。我开始感到邓拓和“三家村”并不是真正的攻击对象。真正的攻击对象还在邓拓后面。果然，出现了关于彭真的议论。

5 月 14 日——15 日两天，我最后一次去哈尔滨，为的是找那个誊写社为那本《中学俄语复习手册》结清帐目。在去哈尔滨之前，那个女的社教工作队队员付波找我谈话。付波对我强调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重要性，向我询问对于学校领导人于文、孙玉生等有什么意见等。我担心社教工作组会不同意我在这个时候去哈尔滨，就说我要带着毛主席著作上路，在哈尔滨停留期间抽空学习。出乎意料的是我这种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竟使付波大为高兴，好像是她发现了一个社教运动积极分子似的。

我当然并没有带着毛主席著作去哈尔滨。5 月 15 日上午，在与誊写社结完帐和上火车回绥化之前，我信步来到道里区外文书店，看看这里有什么从苏联来的新书。在书店里我偶然地遇到两个过去我教过的绥化一中的学生。其中一个男生姓李，是高中 39 班的，现在在黑龙江大学俄语系学习。黑龙江大学是在 1958 年建立起来的，它的前身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最早则是哈尔滨俄文专科学校。因此俄语系应该是黑龙江大学的重点系。可是这个姓李的学生说现在黑龙江大学俄语系每年只招收 15 名学生，为的只是在俄语方面保持“传宗接代”而已。另一个学生是一名女生，姓陈，是我教高中 38 班时的俄语课代表。这个学生很勤奋，现在在哈尔滨电工学院二年级学习。她来书店也是为了看看有什么新俄文书，当然不像我那样是找历史和政治方面的新书，而是电工学方面的新书。她告诉我说她不敢在教室里读俄文书，那怕是电工学方面的也不行。因为只要有教师见到她读俄文书，

就会劝告她别读了。“难道关于电工学方面的俄文书也是修正主义吗？”我真的感到奇怪了。这两个学生告诉我说现在学校对学生们的思想控制很严厉。

我是在“五一六通知”被通过的那一天回到绥化的。当然在这次哈尔滨之行中我一页毛泽东著作也没有读过。但是俄语教研组长蒋洪达却告诉我说，社教工作组的付波大肆表扬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甚至出差到哈尔滨也随身带着毛主席著作学习。我心中暗笑，却不知道巨大的灾难正在向我一步一步地逼近哩！

(2)

“五一六通知”以后从混乱的北京掀起的波浪，到达绥化一中这么一个县城中学时，也就没有多大的劲了。教学工作和所谓的“社教”还在照常进行着。在小组学习中社教工作组成员们仍旧向老师们征求对于学校领导的意见。刘金福是负责联系我所属的那个政治学习小组的，每次来时都是夸夸其谈。只是在5月末的一个下午，社教工作组邀请一些老师开会，座谈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我也被邀请去了。我说1957年我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时，曾经见到过邓拓，还说在1959年时我曾听说毛主席曾高度赞扬海瑞的耿直，但是不知道吴晗的《海瑞罢官》还有别的含义。参加座谈的人们对于我的这一段经历很感兴趣，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随着温度逐渐升高，人们开始感觉即便是绥化一中这么一个县城中学，早晚也是要着火的。一次与我同在俄文组的冯伯文老师在教研室里说：“看来早晚还得打近战！”

聂元梓因为在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而在全中国出了名。现在在全中国的每一所高校或中学里都有那么几个人企图成为本校的聂

元梓。谁在这方面犹豫得少谁就能摘此桂冠。于是在 6 月中旬的一天，中午绥化一中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学校主平房中厅的南墙上。这张大字报是我过去的同寝室人，政治教师孙永楨写的。大字报的题目是：“校领导为谁服务？”大字报的火力是集中攻击孙玉生的，批评他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以后主平房中厅的四墙上就贴满了大字报，接着在中厅里拉起了绳索以供贴大字报之用。后来在礼堂（亦即学生食堂）也拉起了绳索来挂大字报。这些大字报主要是批判校长孙玉生，教务主任赵禹勤和朴昌镇的修正主义办学方向。但是朴昌镇还有偷听外国广播和在教政治课中散布修正主义观点的问题。例如朴昌镇曾经说，一个人如要成名需要具备三个因素，即德、才、机。“机”者，机会也。这两条罪状就有可能把朴昌镇从“十六条”所划定的第三种人“提升”为第四种人了。

在针对学校领导的大字报之后，也就有了针对教师们的大字报，但谈的主要还是关于他们的教学工作。针对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初中第 26 班的班长郑殿富写的。初中 26 班的学生曾经告诉我说郑殿富是一个孤儿，比同班同学的年龄要大两三岁，即现在已经快 20 岁了。在初中一年级时郑殿富在俄语课上是一名落后生，经过我的特别辅导赶上了功课。我的印象是郑殿富有一些好出风头的倾向。他的同班同学说他为自己没有成为本校的聂元梓而沮丧。但是他现在总算成为第一个给张轶东写大字报的人了。然而郑殿富的大字报还只限于批评我的教学方法，即搞“智育第一”，“升学率挂帅”、“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和甚至对学生搞物质刺激等。这是大多数老师的共同倾向，我只不过是搞得更明显一些而已。不过郑殿富的大字报提醒了大家校园里还有这么一条“大鱼。”于是关于我的大字报就一张接一张地出现了，揭发出愈来愈多的我的“修正主义言行”：我在苏联学习的那一段历

史，我和苏联人结过婚；我其实是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的，我把俄文的苏联日历赠送给学生，那日历上甚至还有赫鲁晓夫的照片；我一直在听苏联广播，还继续和在苏联的前妻以及一些身份不明的苏联人（指的是波里斯·波诺金）通信；1965年我还因为什么问题被绥化县公安局传讯过。最后还有一张大字报说苏联寄给我的“真理报”被省委扣留了。这些都是“政治问题”了！我可能就将属于“十六条”所划定的“第四种人”了！

6月末的一天晚上广播宣布了国家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延期的决定。这一决定把所有高三年级学生从一种“双重生活”（即一面准备高考，另一面还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了。高三学生是比较世故的。他们很快地懂得了他们的前途主要取决于他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而不是那个未来不确定的高考。既然我教过他们两年俄语，他们从我身上找一点写大字报的材料也就不难了。但是使我感到奇怪的是：那些过去在俄语课上学习落后，受到我的批评和课堂提问多的学生，在写我大字报方面并不积极，并没有把这看作是一个自己“报复”的机会。他们通常是几个人联合给我写一张大字报，批评的也只是我“教书不教人”。他们是不得不这么作的，否则他们就会被认为是在政治上落后了。相反地，批判我最积极的是几个过去俄语课方面的优秀生。有一个高三学生过去学习俄语很努力，总是想和我接近。在校园里刚出现大字报的几天里，他还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地准备高考。而一当宣布高考延期之后，他的面目马上就改变了。他的大字报并不批评我的教学工作，而是说我的生活方式明显地反映了我的政治倾向。他指责我老是听床边的收音机放的苏联音乐，有一次新年前夕晚会上我甚至为学生们唱起了苏联的修正主义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但是我却从来不听中国音乐。绥化电影院放映苏联影片时，我一场也不放过。但是学校

为全体师生包场看中国电影时，我却不来看了。毛主席说：“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绝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的爱和恨证明了我是一个“老修”，从此“老修”就成了我的外号，所有的大字报在提到我时都称我“老修”。

所有的课都自动停了。7月中旬一天上午11点时，礼堂兼学生食堂里的大字报突然着了火。县公安局又来人调查这一案件。每一个职工都要说明这天上午10点至12点之间在哪里和干什么，并为此找到证人。这个“纵火犯”始终未被查出，但是校园内的“阶级斗争”气氛却是更浓烈得多了。

接着，绥化县的学校之间开始了“交流”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所有县二中、三中、职业中学和师范学校的校长和书记都被作为“走资派”揪出来了。绥化县第三中学的张校长不知逃跑到哪里去了。绥化一中的校长孙玉生因为是走资派而靠边站。校党支部书记于文挨了几张大字报，称病不出，大约每两个星期才来学校“点卯”一次。于文的丈夫是解放军驻绥化部队的徐政委。既然解放军是忠于毛主席的，于文也就有恃无恐了。既然学校的党政领导都已瘫痪，于是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应运而生，组长是年约30岁的体育教师刘瑞杰。社教工作组更名为文化革命工作组，地区文化革命工作团（即前社教工作团）还派来了一名叫李兰田的工作组长。这两个小组都在收集和核对大字报上的材料，最后将决定本校有几个“黑帮”（即“十六条”所指的第四类人）以及都是谁。

不同单位人员之间的相互揭发也开始了。这事给我带来了致命的一击。绥化县朝鲜中学的俄语教师贾发贵给绥化一中送来一张有关我的大字报。他揭发我过去向他说过的两条“反革命言论”：1）一次在谈及1962年夏天在新疆有约两万人逃入苏联境内时我说：“我当时如果在新疆也会跑到苏联那边去的”；2）

我曾说毛主席带头破坏党章，不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

仅仅这两条言论就够份量了，现在即使没有其它大字报，我也无疑是“第四种人”了。任何辩解已经没有用处。我只能等待下一步。我的同寝室人刘少平和杜连富对我却是一如既往。他们对我说：“接受群众批判和转变立场，就一切都会过去了。”刘少平来自农民家庭，杜连富来自伊春林区工人家庭，所以文化大革命冲击不到他们。我只能自嘲了。当时有一首解放军战士歌曲，唱的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祖国要我守边疆，我打起背包就出发！”

我把这首歌的词改了唱道：“党要我上长发呀，我打起背包就出发呀！”

长发是绥化县所属与呼兰县交界的一个人民公社。我认为如果被下放到那里劳动，那就不错了。

8月11日广播报导了毛泽东在中南海西门接见革命群众的消息。“这应该是在府右街的东侧，那么多的人怎么容得下呢？我妈妈在那里怎么了？”我想道。正好在第二天我收到母亲的来信。母亲说她曾到内蒙呼和浩特市我叔父家住了几天，由于呼和浩特的情况也很混乱，就刚从那里回北京来了。许多年后我才知道妈妈之所以未能在呼和浩特呆下去是因为：我叔父张计舒，一个兽医药厂的厂长，被作为走资派揪出来了。叔父还因为建国前曾加入国民党被看成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妈妈在回到北京后在府右街的街道上也挨斗了，因为她自己和家庭成员（包括我）有“问题”。

8月12日晚上在收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我注意到在“决定”的标题后面紧接着一句话：“8月12日通过”。谁通过的呢？应该是正在召开一次

中共中央新的第十一次全会了。不管这全会合法与否，这总意味着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又重新稳定了。那么，我往哪儿去的问题是不是也快要解决了呢？

其实连文化革命工作组的组员们也是这样想的。工作组组长李兰田找我谈了一次话。我承认贾发贵所写大字报上几条言论确有其事：既然想念自己在苏联的妻子，我自然想去看她，听说1962年有人经过新疆去苏联，我自然也就这么想了。至于毛主席破坏党章的问题，我这样讲的确不好，不过党章的确规定了党的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党的中央全会每六个月召开一次，党章并没有给予中央委员会到时候不召集会议的权力。李兰田并没有过多地批判我，也只是鼓励我接受群众批判和转变立场。一个星期天早晨，甚至地区文化革命工作团的副团长石明，一个40岁左右的女人，也来到绥化一中找我谈话。我把我对李兰田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石明也和李兰田的反应一样，只不过更为强调转变立场的重要性罢了。她还说：“你看，连前国民党的代总统李宗仁都回到大陆来了哩！”

然而，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消息则是令人震惊的：据说在北京红卫兵已经开始了打人，对资产阶级家庭进行抄家和没收财产。哈尔滨高校的学生则来到绥化煽风点火。在绥化师范学校已经建立起红卫兵组织。在绥化一中这火是在8月23日晚上点起来的。那是在晚上9点钟，我已经躺下睡觉了，听见宿舍走廊上有连绵不断的脚步声。突然大喇叭宣布说：“革命师生们，请到主平房南面的场地上来开革命造反大会”。我同屋的刘少平和杜连富也去了，可能整个宿舍只剩下我一个，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革命教师了。”接着我通过扩音器听见造反大会的过程，看来主要的发言人都是高中三年级的学生，他们在发言中都“控诉”以孙玉生为首的学校领导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还谴责

孙玉生包庇诸如朴昌镇和张轶东这样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还谴责文化革命工作组不对学校领导进行斗争。所有这个工作组的成员都被揪了出来，站在主平房中厅南门外台阶上的一个侧面，面对群众。接着就有几个人喊道：“派人去把孙玉生、朴昌镇、张轶东和其它黑帮揪来斗争吧！”我听到后心里想道：“与其等他们到这间屋子来揪我，还不如我自己主动到会场上去吧！”我穿好衣服来到主平房南面台阶前的平地上。这里聚集了大约三四百人，在台阶上主持会议的是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刘瑞杰，旁边站着几个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这时场地上很昏暗，人们没有注意到我已经出现了。台阶上和场地上的人们众口混杂，在争论着第一个应该先斗谁，有一个人喊道：“既然孙玉生住在家里，去揪他的人还没有来到，我们就先斗张轶东吧”但是另外又有一个人喊道：“这样会转移革命大方向。十六条规定斗争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台阶上会议主持人之一，高三学生李魁说：“让张轶东先到台上来站着吧！”这时他们在黑压压的人群发现了我，就向我喊道：“张轶东，上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走向台阶，站在台阶的左侧。在淡淡的灯光下，我看见对面台阶右侧还一排儿站着李兰田、刘金福、付波等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全体组员们。群众这时已经看见了我这个“老修”，但是没有人开始斗争我。群众还在争论着什么，我懵懵懂懂的也听不出什么来了。突然之间群众开始喊口号：“打倒孙玉生！”这就是说孙玉生已经被从家里揪到会场上来了。于是对这个学校主要“走资派”的斗争就开始了。虽然对孙玉生提问题的人都是恶狠狠的，我却感觉不出有哪一个是重要的，或者和修正主义有什么联系。例如有一个女教师质问孙玉生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听党课？”人们根本不让孙玉生作任何解释，总是不断地喊诸如“抗拒从严！”这一类的口号，在斗争进行期间，朴昌镇和其它

黑帮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揪到会场上来。每当一个黑帮被揪来时，会场上就喊起一阵打倒 XXX 的口号，我不知不觉地感觉困了。就尝试站着打盹儿，但是一个高中二年级名叫戴淑华的女生却用一个长矛尖指着我喊道：“不许睡觉！”斗争会一直开到 8 月 24 日清晨才结束。黑帮总共七人，被押送到主平房的一间空教室里面对墙站着。每个黑帮被带离会场时群众就喊一阵打倒他的口号带头喊“打倒老修张轶东”的正是高三当年那个优等生，第一个赠送给我“老修”头衔的人。

大约在早晨 6 点钟时，七个黑帮中有三人被通知可以回家了。而另外四个人，即我、孙玉生、朴昌镇、和王复中，则必须留住在校内。孙玉生、朴昌镇和张轶东的“罪行”是众所周知的。可王复中，那么一个年约 30 岁的物理教师，又是怎么回事呢？从大字报上我只知道王复中在课堂上对学生生气时说了一句对毛主席不怎么尊敬的话。此外，在 1961 年困难时期每人只发了三尺布票，王复中说：“三尺布能干什么呢？作一个大裤衩到处走么？”这四个人被安排住进男生宿舍走廊东侧北端的那间寝室，即我来绥化一中工作的第一年所住的那间寝室，每人给了一张床。我很轻易地从这栋房的南头把自己的被褥搬过来了，而孙玉生、朴昌镇和王复中的家属则被通知往这里送被褥。早晨 7 点钟时，我们在值班学生的监控下到学生食堂去吃早饭。这时我才知道，昨天晚上开造反大会时，学生们把教师食堂也查封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特权的表现，现在所有的职工都得到学生食堂去吃饭了。我还不知道昨天是全国的造反日。在北京著名作家老舍被斗并挨了毒打。在哈尔滨红卫兵摧毁了尼古拉教堂。这是 20 世纪中国的“巴尔托罗米奥之夜”或“水晶之夜”。但是和那两个“夜”比起来，中国 1966 年 8 月 23 日之夜在规模上和受害者的人数上都要大得多。例如，在 1938 年 11 月德国的“水

晶之夜”只有 36 个人死亡，36 个人受伤，7500 个犹太人商店被毁，约三万犹太人被送往集中营，经济破坏约六百万马克。然而，这和中国 1966 年 8 月 23 日之夜比，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对于那些力图阻挡客观历史趋势的势力来说，搞一次突然的大规模的暴行以摧毁相当一部分进步力量，使自己取得暂时优势，可能是一个共性。

每天除去吃饭时间，这四个黑帮都得坐在自己的床上反省。有几个值班学生坐在门旁监视着他们。第二天下午来了几个学生领这四个黑帮去劳动，即拔校园内的杂草。在出屋劳动之前，每个黑帮被发给一个带绳子的牌子，挂在自己的胸前。孙玉生的牌子上写的是“走资派”，朴昌镇的牌子上写的是“反动学术权威”，王复中的牌子上写的是“反革命分子”，我的牌子上写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我们在校园内拔杂草时，许多学生，主要是初中生，在旁边围观闹笑，好像是要猴子似的。

1958 年以来，我遇到过不少的不公正待遇和歧视，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但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受到过这样大的侮辱。“如果从现在起我一生都要在这样的侮辱中生活下去，活着有什么意思呢？”我想道。莎士比亚的“生还是死”这一问题在头脑里出现了。过去由于寝室里在夏天有许多跳蚤，我总是买一些敌敌畏喷洒在地面上。现在在我原寝室的抽屉里还剩一小瓶敌敌畏。晚饭后在从食堂回到“黑帮室”的路上，我对值班学生说，我需要去一次这栋房南头的原寝室取毛主席著作。值班学生没有紧跟着我，只是站在黑帮室门口的走廊上注视着。我的原寝室没有锁门，但是杜连富和刘少平都不在屋内，可能是他们上厕所或者打开水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我抓紧机会从抽屉里取出那一小瓶敌敌畏放进了自己的裤袋里，然后手上拿着毛主席著作回到了自己的“黑帮室”。晚上八点钟时，值班学生命令四个黑帮睡觉。

我并没有脱掉长裤就躺下了，只盖了一层薄被。值班学生把黑帮室内的灯闭了，开着门坐在走廊上聊天。黑帮室里又黑又静。我用一只手摸着裤袋里的那一小瓶敌敌畏想到：“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只要把这个小瓶子放进嘴里嚼碎咽下，我就摆脱一切不公正待遇、歧视和侮辱了”。生与死的斗争在我的头脑里进行得很激烈。我想起了母亲、几个兄弟和一个妹妹。突然间我想起了文化革命工作组的人在一次会议上作过的一个解释：“杀害了我们的人（指共产党）的子弟叫做血债子弟，被我们（指共产党）杀害的人的子弟叫血仇子弟”。“不行！”我想道：“我不能死！我如果这样死了，我的弟弟妹妹们就成了血仇子弟了！他们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我不能只考虑自己！”

生终于战胜了死！我松开那只捏着敌敌畏瓶子的手，把手从裤袋里抽回。这时我听到走廊上那几个值班学生正在谈论绥化县其它学校的斗争情况。在那些学校里折磨黑帮的方式比在绥化一中要残酷得多。例如在绥化县第二中学斗争一个俄语老师时，学生们让他弯腰，往脖子上挂一个铁丝联结的砖托子，然后在斗争过程中不断地往这个砖托子上放砖头。最后砖托子上共有八块砖，铁丝则压进这个教师脖子肉里有三四厘米深！“啊！我们还得忍受一些什么呢？但是即使这样我也得活下去！”第二天早饭后，我又找借口对值班学生说，我还得回自己的原来寝室去拿几张纸。在原寝室我偷偷地把那一小瓶敌敌畏放回抽屉，手上拿着几张纸又回到了“黑帮室”。

就是当生死斗争在我内心激烈斗争的那一天，8月24日，著名作家老舍自溺于北京太平湖。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的人数是可以统计出来的，但是无法统计还有多少人是经过内心的生死斗争而选择活下来的，也无法说生者与死者中哪一种人多一些。但无论如何，生者在命运的前面终于成为了强者，他们最后终于看

到了隧道尽头的曙光。可惜的是有那么多人没有承受住那雷霆万钧的压力，成为了毛泽东与历史斗争的祭坛上的牺牲品。

当我在绥化放弃自杀时，我当年在北京大学的同班同学程贤策，即在 1951 年选拔我去苏联留学的那个北大党委委员，却自杀了，而且用的也是敌敌畏。程贤策的爱人潘乃穆也是我在北京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潘乃穆的父亲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潘光旦。潘光旦教授早在 1957 年就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现在当然也就被当作黑帮分子揪出来了。中央民族学院的红卫兵们命令潘光旦拔校园内的杂草，和我在绥化一所中所干的活一样。众所周知，潘光旦只有一只脚，他只好坐在一个折叠凳子上拔杂草。但是红卫兵们踢掉他的折叠凳子，命令他直接坐在地上拔草。这样潘光旦很快就得病死去了。潘乃穆几乎差不多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爱人和父亲。

(3)

孙玉生、朴昌镇、王复中和我在男生宿舍东北角的“黑帮室”共住了 11 天，从 8 月 24 日到 9 月 3 日。在这 11 天中，我们没有挨斗，体力劳动也不多。值班学生命令我们学习《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一天一个值班学生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份清华大学红卫兵编印的“黑帮守则”，要求我们学习并背熟。这“黑帮守则”要求所有的黑帮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自觉地接受批斗并积极从事体力劳动。一天上午，我们四个黑帮被值班学生押解到绥化县朝鲜中学广场旁听全县斗争县委宣传部长王烈的大会。另有一天下午，孙玉生和朴昌镇又被押解到朝鲜中学广场听另一个全县斗争大会，我和王复中则被留在黑帮室里。到下午五点钟左右时，我和王复中听

见房外有一片呼口号声。我们从黑帮室的窗户往外看，才知道是红卫兵把孙玉生和朴昌镇从全县斗争大会上押送回来了。孙玉生和朴昌镇低头猫腰，满脸抹上了墨汁。有一个初中 26 班的女学生，名字叫王淑梅，用矛尖指着孙玉生说：“你必须老老实实交待问题，不然的话我对你不客气！”

9 月 3 日，四个黑帮都被押到校园西部的大操场上劳动，劳动的内容是帮助学校的林木匠在大操场的南端搭起一座主席台。显然是要开一个大会了。现在除了斗争会还能有什么会呢？而在这个学校里，除去我们几个人还能斗谁呢？的确，主席台搭好后就装上扩音器，并拉上了电线。整个下午，我们都从扩音器里听到关于今晚召开斗争大会的通知。晚饭后从六点钟开始，大操场上就人声嘈杂了。六点多十分时，几个红卫兵拿着长矛来到黑帮室对我们说：“走吧！”。在“打倒孙玉生”、“打倒朴昌镇”、“打倒王复中”和“打倒张轶东”的口号中，我们被押解到大操场的主席台前，面对群众站着。于是斗争会就开始了。这个斗争大会主要还是针对走资派孙玉生的。所有的发言者都是“革命教师”。没有被打倒的学校党支部书记于文也在会上发言了。所有发言都是批判孙玉生的“修正主义办学路线”。我只是作为被孙玉生包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被提及，但并不是斗争的主要目标。

斗争大会大约在九点半结束。我们四个黑帮又在一片“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声中被押回黑帮室。使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一个学生来通知说：从现在起，你们可以回家了，每天上班时间来黑帮室听候安排。

孙玉生、朴昌镇和王复中三人都回家住去了。我则认为没有必要搬回原来的寝室，就继续留在黑帮室过夜。从 9 月 4 日起，孙玉生、朴昌镇和王复中在七点半钟来到黑帮室“上班”。从现

在起没有学生值班监督我们了。我们主要做的事是在校园的东南部盖起一处 8x20 平米的平房。这平房是三月份学生食堂着火后就着手盖的，准备用作新食堂，但工程因为运动开始而中止了。

经过十一天的反省和开始劳动，我和另外几个黑帮才知道自从 8 月 23 日夜“造反”以来学校里所发生的变化。社教工作组或文化革命工作组已被赶出学校。现在管理学校的是以刘瑞杰为首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表面上学生是以班级为单位“干革命”。实际上自从国务院发布关于学生可以去北京和全国各地“串联”和“点火”的措施以后，相当一部分学生都出去溜达去了。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经风雨，见世面”呢！另外相当一部分的教工和学生则乘机待在家里，扒炕抹墙，储存秋菜，然后就开始猫冬了。只有很小一部分的教工和学生偶尔到学校来一趟，在校园里到处闲逛。因此在这一年的最后四个月里，黑帮们很少受到触及。最使我们感到放心的是：9 月 7 日那天，学校会计室召我们去领当月的工资。我还是领到了 68.5 元的全部工资，还有 7 角 8 分钱粮煤补助。我并没有因为当上黑帮而少领一分钱。我的物质生活水平并没有降低。我还是和平常一样给母亲寄去 15 元，存入储蓄所 15 元，剩下的 39.28 元完全够生活了。

黑帮组扩大了，不只限于 9 月 3 日以前的四人了。学校文化革命小组又送来了五名黑帮：刘明新、杜连富、孙俊阳、冯伯文和赵勇令。现在是一共九人的黑帮小组了。

刘明新是学校的瓦匠。他之所以成为黑帮，是因为在满洲国时期他当过绥化看守所（即 1965 年我被绥化县公安局传讯去的那个地方）的看守。大字报揭发说他好谈论满洲国时代的生活情况。有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还怀疑 7 月中旬的那一次大字报被烧事件是他干的，不过没有证据。然而刘明新既然是一个瓦匠，他就自然成了黑帮组劳动方面的带头人。在建造那所平房的劳动

中，大家都得服从他的分工。10月里平房建成了，而取暖季节也开始了。于是又开始了无休止的搭炉子、烧炉子和修炉子的活儿。我不会搭炉子，只能当小工，给瓦匠供砖稀泥什么的。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也请刘明新在自己所住的黑帮室里搭上了一个炉子，而且全烧好煤，把黑帮室弄得很暖和。

有趣的是第二个“新黑帮”是我同寝室的杜连富，那个政治教师。他的个人历史和家庭成分都没有什么问题。他之所以成为黑帮是因为两年前他当高中50班班主任时，在和—个女生谈话中，对她有过—些亲密的举动。显然在九个黑帮中，他的问题是最轻微的。于是杜连富就被指定带领整个黑帮小组的学习。正常学习规定在每天早晨八点到九点之间，在我们刚盖起来的那间平房里进行。学习的主要形式是读报纸上新近发表的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材料。通常读报的人就是杜连富，其他人则听他读。要是杜连富读累了，就指定另—个黑帮代替他读。九点学习结束开始劳动。但当没有什么活儿可干时，大家还得聚集到这间平房来“学习”。我们作为黑帮是不能组织讨论的，但我们之间逐渐也谈论起国内、省内、县内和校内的文化革命形势。孙玉生家住在县城的北部，每天上下班都要在街道上走—段长路，也就看到了贴在街上的许多大字报。他通常把自己所看到的大字报的内容告诉我。有趣的是杜连富在谈论中总是强调十六条中的—项规定：“作风问题，后期处理”。

赵勇令是—位年约50岁的语文老师。1957年以前他是中共克东县（嫩江地区）委宣传部长，可是在1957年被划成了右派。经过几年劳动改造之后，他在1964年被送回老家绥化县，分配到绥化—中作语文教师。1964—1965学年度结束，在全体教师会议上宣布下一学年的教学分工时，赵勇令未被分配跟随他教过的高中二年级班级进入高三继续授课，而是派去教高中—年级

新生。我当时看到赵勇令脸上的变化，也感受到一个人不受信任的滋味。但是在共同劳动中我感到赵勇令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一次我在谈论中不小心地说了一句“红卫兵的行动是狂热的”，马上引起了孙玉生和杜连富的批评，我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后来当在那间平房里围着炉子搓苞米时，赵勇令看见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在屋里，就对我说：“你放心，不会有人举报的！”

冯伯文是我在俄语教研组的同事。他也没有任何个人历史问题或家庭成份问题。学生在大字报中指责他在上课时好开一些庸俗的玩笑。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教俄语的“士兵”一词时，他把这个俄语 солдаты 音译为“搔鞑子”。这么一来冯伯文的罪名就成立了：他诬蔑中国人民解放军！

孙俊阳也是一个老语文教师。在 1963—1964 学年度，他教高中 38 班的语文课，因此是和我教同样的学生的同事。我完全不清楚他为什么当上了“黑帮”。

在 10 月份和 11 月上半月，我过得比较轻松。每天我干那点活和学习，下班后就回到黑帮室。我一个人住在黑帮室里很清静，还有一个炉子。有时黄昏时到街上饭馆里吃一顿饭还买几斤猪肉或一只鸡回来，放在炉子上炖了吃。有时在大街上挂起幕布，放映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实况。有时我在街上还遇到一些学生，这些学生仍然称呼我为“张老师”！但是有一次在街上有几个小孩在黑暗中指着我喊道：“就是他！就是他！”我赶紧低下头，加快脚步回学校去了。

11 月末，去北京和全国各地串联的教师和学生们陆续返回学校。学校出现了一些打破班级界限建立起来的造反组织，而每一个造反组织都需要有一间屋来作为它的“总部”。于是有一个组织看上了我所住的黑帮室，命令我搬回原来寝室和刘少平以及杜连富同住，把黑帮室让给他们。有时孙玉生和朴昌镇早晨上班时

来得早了一些，也到我和杜连富的这间寝室来呆一会儿。一次朴昌镇在我的抽屉里发现了那一小瓶敌敌畏，就对我说：“我家里跳蚤很多，把这药给我用吧！”他给了我五角钱，就把这一小瓶敌敌畏拿走了。我心里明白朴昌镇这么做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但是什么也没有说。

他们又开始对这九个黑帮进行批判、斗争和审查了，不过都进行得比较温和。并没有召开全校性的要求九个黑帮全部出场的斗争大会，只是个别班级、造反组织或教师会议把个别的黑帮找去批斗。孙玉生是被找得最勤的一个。我被高中 45 班的学生找去过两次。第一次几个学生恶狠狠地问了我几个问题，也不容我回答就高喊：“让张轶东滚蛋！”我莫名其妙地走向宿舍。第二天晚上高中 45 班学生又把我找去。这一次他们让我坐在椅子上，慢慢地叙述自己是如何“受到苏联修正主义影响”的。谈完之后他们就和气地让我回寝室。“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还是感到困惑。第三次则是教师会议把我找去接受批判。发言的人都是宣读预先写好的发言稿，批判我的修正主义观点，不许我在会上讲话。一位老师在发言中提及 1965 年我把自己的那一份“毛泽东著作选读”以五角二分钱卖给了杜连富，还说：“这正好是一瓶啤酒！”这时在会场上引起了一阵哄笑声。

但是对于其他黑帮的批斗却导致了一定的结果。在一次批判和检讨会议之后，杜连富被“解放”了，就是说：他已经不是黑帮，可以回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干革命了”。接着孙俊阳、冯伯文和赵勇令也被“解放”了。最后朴昌镇和王复中，即最初的四个黑帮中的两个也被解放了！现在绥化一中只剩下三个黑帮了：孙玉生，刘明新和我。

三个黑帮呆在那一间平房里，即使有一个炉子，也是显得空旷和寒冷。于是三人就搬到校园东南角上的温室里。这温室约为

十米长五米宽，有一个向南倾斜的玻璃屋顶。每天下班前，这三个黑帮必须把玻璃屋顶用谷草编成的帘子盖上，第二天早上再把帘子卷起来。我们还得经常给温室东墙下连接火墙的炉子加煤和掏炉灰等。温室东面的门连接着一个小走廊，小走廊的东边则是一间小屋，里面呆着的是为学校喂那四匹马的李洪升老头。马厩就在这小屋南面十来米不到之处。不过李洪升老头的家就在校园外北面不远处，因此他不在这里住，喂完马就回家。在这间小屋里经常住着的是一个名叫路全的年约 40 岁的单身汉，是学生食堂的一个炊事员。孙玉生、刘明新和我三人在干完活后也常常呆在这间小屋里，和老李头以及老路聊天。

在那另外六名“前黑帮”被解放后的最初几天里，孙玉生和刘明新都愁得吃不下饭了，后来逐渐地接受既成形势。我有过短暂的沉重的感觉，但很快地就过去了。我对一切都不在意了。相反地，体力劳动使得我饭量大增。我恢复了每星期六下班后先上澡堂洗澡，然后到饭店喝一瓶啤酒并美餐一顿的生活规律。在街上我读到不少关于北京和全国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的大字报。在绥化县第一百货公司正面的墙上，我看见贴着四排大字块：

“谁反对毛主席， 就砸烂谁的狗头！”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但是，我心中自问道：

“如果是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或者是林副主席反对毛主席，那又应该谁砸烂谁的……呢？”

第十二章 1967 年 逍遥一年

(1)

当对自己当上黑帮这一境遇已经适应后，我就想起了自己在北京的家庭。我差不多半年没有和家里通信了。春节即将到来，这是传统中全家团聚的日子。虽然自 1961 年离开北京之后我一次也不曾回家过春节，我却可以利用这个春节作为一个借口，去打探北京家里的现状。于是我给母亲寄去一封信，问我是否可以回北京过春节。其实我的真意并不是打算回北京过节，学校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刘瑞杰去年 9 月份就向我们宣布过：黑帮只能在绥化县城内自由活动，未经允许不得离开绥化。即使文革领导小组批准了我回北京过节，他们必然会提前将这一情况通知北京府右街的派出所。这将给我在北京的家属带来多大的麻烦啊！

我很快地就收到了回信。妈妈说现在北京很混乱，家中北边的两间小屋已经被外地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居住了，如果我来北京，家里住不下。我反而为妈妈的平安和健康感到放心了。

只是在 12 年后的 1979 年，当我真正回到北京探亲时，我才得知这时母亲并不平安，也不健康。1966 年 8 月，母亲从呼和浩特市探亲回来，一次在洗完衣服后，当她在院内站在一个凳子上要往一根铁丝上晾衣服时，突然凳子歪倒了，母亲的左腿骨被摔断。当腿骨刚刚接好，母亲躺在床上养伤时，北京的暴行发展到高潮了。一天下午，突然有几个红卫兵冲进府后街后胡同 13 号来斗争我的母亲，这么一个 61 岁的家庭主妇当时还躺在床上。他们说我母亲有三大罪恶：1) 她已故的丈夫是国民党少将，重

庆钢铁厂的厂长。抗日战争期间母亲还当过搞抗日宣传的“妇女工作队”队长。这个工作队是钢铁厂职工的家属们组织起来的。在担任这个队长期间；母亲还有一次去过国民党第二把手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家里，并见到他的老婆；2）她的小叔子，即我的叔叔张计舒，曾经加入国民党，现在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兽医药厂的厂长，已被定为走资派和国民党残渣余孽；3）她的第二个儿子我，曾经留学苏联多年，还娶了一个苏联老婆，后又因为怀疑三面红旗被遣送回国。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年，张家的人始终不知道这几个红卫兵来自何处，他们又是从哪里得知张家的这些情况的。这些人把我的母亲折腾了三个下午，后来，由于发现更为重要的斗争对象，就不知去向了。

当母亲收到我的来信时，她的断腿已经康复了，生活上能够自理了。但是她还得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住在府右街后胡同 13 号。我的大哥是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学院的一名讲师，在文革爆发后第一年极少回家来看母亲。妹妹辉楠刚从外交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现在正忙于“干革命”，不敢常常回家来看妈妈。毛弟张轴材现在是清华大学自动化控制系六年级即将毕业的学生。清华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之一，现在正处在著名造反派蒯大富的控制之下，因此轴材也是忙于“干革命”而不便于回家看妈妈。我的三弟张化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兴县工作，这时正好到北京来串连。他和一个同事来到府右街西侧，在后胡同北口提心吊胆地犹豫一番之后，才敢进入 13 号看母亲。他在北京只住了四五天，见到大哥辉楠和轴材就赶紧回广西去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家第一次没有我的团聚。这时府右街上仍是人声嘈杂，经常在这里有游行或黑帮游街的情况。家人估计我必然“有问题”，但并不知道我的确已经是黑帮了，反正他们是不敢让我回北京来过春节的。

春节前夕占住我家北面两间小屋的红卫兵回家过年去了，但是我家却没能收回这两间小屋。府右街的居民委强行把这两间小屋租给了别人，我家对此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许多年，我家才收回了这两间小屋。

还有一件很不愉快的事，而且是我们许多年后才得知的：父亲张连科的墓地被重庆钢铁公司的造反派捣毁了。父亲是一个炼钢专家，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任上海第三炼钢厂厂长。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把上海第三炼钢厂从上海搬到了重庆。上钢三厂在这里与汉阳铁厂合并，组成重庆大渡口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这是当时非沦陷区最大的钢铁厂，属国民党政府军政部管辖，曾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一定贡献。父亲作为副主任委员主持工厂的日常管理（主任委员由军政部兵工署长杨继曾兼任，但是杨继曾很少到工厂来）。父亲因为积劳而患心脏病，于 1945 年 5 月去世，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国民党政府厚葬父亲于厂区内，并竖立了一块三米高一米宽、由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题词的墓碑。1946 年重庆解放后，人民政府承认了父亲的历史功绩并保留了这块墓地。但不知道是在 1966 年还是 1967 年，重庆钢铁公司的造反派捣毁了这个墓地，砸碎了由何应钦题词的石碑。许多年以后，家人曾多次到重钢寻找父亲的遗骨，但是什么也没有找到。一直到 21 世纪初，中共重庆钢铁公司党委才根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直接指示，在工厂烈士墓地父亲立碑纪念。

人都是有父母的。你毛泽东可以在 1959 年和 1966 年到韶山和滴水洞探访自己先人的坟墓。而我们张家是普通老百姓，也是你在府右街另一侧的邻居，却不能保留自己先人的遗骨！

从新年到春节的这段时间里，绥化县的形势还是比较平静的。孙玉生、刘明新和我这三个黑帮上班时间就来到校园东南角

的温室，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没有活儿干时他们就呆在温室对面的小屋里，和老李头、老路还有那个年约 45 岁的为学校赶大车的刘尚有聊天。这时有传单建议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就是春节期间不放假，继续“干革命”。其实学校里早已处于放假状态了，大多数农村学生都已回家，只有少数学生和通校学生偶尔到学校来呆一会儿。春节前我曾两次被革命群众找去批斗。第一次是被一个学生组织找去开批斗会。当这些造反派来到我的寝室找我时，我正把刚从街上买回的一只鸡放进锅里，并将这锅放在寝室外宿舍走廊上的炉子上。在会上挨批斗时，我想的却是炉子上的那只锅子，生怕如果批斗会时间太长，锅中水干，鸡就烧糊了。谢天谢地，这场批斗持续不到两个小时。当我在学生们高喊“让张轶东滚蛋”的口号中走出会场时，我心中想的却是：“我要吃鸡去了！”第二次则是教师们开会叫我去挨批斗。这一次教师们并没有宣读批判我的发言稿，而是问我如何对待劳动改造和自己的“问题”的。他们主要是问另外两个黑帮即孙玉生和刘明新现在在干些什么，尤其是说了些什么（意指是否说了什么“反动言论”）我说孙玉生通常把他每天上下班路过大街时看见的大字报内容说给我听。这个批斗会结束后也正好到了下班时间，于是我不回寝室就直接上街了。我在一个饭店里喝了一瓶啤酒，吃了一盘溜肉段和一碗面条。第二天早晨我在温室里遇见孙玉生时，孙玉生问我昨天下午的批斗会情况如何。我告诉孙玉生说老师们只是要求我汇报自己现在的思想情况，会后我就直接上街“吃面条”去了。不料当天下午教师们又把孙玉生叫去开批斗会。教师们也是问孙玉生现在在干什么和想什么等，但主要还是问另外两个黑帮刘明新和我都干了和说了一些什么，尤其是关于昨天下午的批斗会，我都对他孙玉生说了些什么。孙玉生在批斗会上汇报道：“张轶东告诉我批斗会后他就上街吃面条去了！”

这又在老师中间引起了一阵哄笑，因为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全校职工就已经知道我是一个“面条大王”。

我对自己当上黑帮的这种漫不经心的态度为自己种下了祸根。我忘记了自己现在的身分，低估了形势的严重性，变得愈来愈不小心了。这样一来，“罪行”不仅将要在数量上增加了，还要在“质量”上升级了。

一些造反派学生注意到我经常上饭店，就要从我身上打主意了。这样的学生有两个。第一是学校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员之一的李魁，高中第 48 班的班长。李魁经常到我的寝室来，询问我的“思想情况”，劝告我“积极接受改造”，最后就向我开口要借钱了。我借给他 60 元钱，三个月后他还给我 30 元钱，另外的 30 元钱则永远也没有归还。第二个学生就是那个去年运动开始时，第一个写我大字报的初中第 26 班班长郑殿富。郑殿富的行为方式颇有意思：他总是趁另外两个黑帮孙玉生和刘明新不在温室时到这里来看我。他告诉我初中第 26 班的全体同学都同意“解放”我，然后就开口向我借钱了。这完全是诈骗和勒索。就算郑殿富说的情况是真的吧！仅仅一个初中第 26 班的学生同意就能解放我吗？我心里明白自己的“问题”不仅比去年年底被“解放的”冯伯文和王复中等人麻烦，而且比现在另外的两个黑帮孙玉生和刘明新也要麻烦得多。但是为避免郑殿富找麻烦，我还是借给了他 35 元钱，但他没把这钱还给我。

不时有些悲惨消息传入我的耳里。据说哈尔滨师范学院的院长杜若牧上吊自杀了。而更使我感到惊心的还是绥化县儿童福利院院长吴健春节前上吊自杀这件事。文化大革命前吴健以管理绥化县儿童福利院有方而出名。据说吴健对孤儿们非常好，他有时甚至与病孩晚上睡在一张床上，以便于照顾他们。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吴健就被打成走资派并因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而

挨斗。他的妻子也和他离婚了。吴健见不到出路就在儿童福利院的马厩里上吊自杀了。吴健一死，儿童福利院无人管理，孤儿们在绥化县城里到处乱串。据说有些小女孩甚至在偷偷地卖淫。有人形容在儿童福利院的宿舍里有这么一个情景：一个仅仅 12 岁或 13 岁的小女孩躺在床上，叉开双腿喊道：“谁给我两根麻花就可以干！”最初我不相信这些东西，但后来我亲身遇到的一个情况却使我相信了。一天晚上我来到一个饭馆，要了一瓶啤酒，一盘猪头肉和五张馅饼。正好这时三个 12—13 岁的小女孩冲进了饭馆。她们衣服肮脏，头发散乱，脸上黑黑的。一个小女孩直接冲我走过来，静静地站在饭桌前，眼睛死盯住盛着馅饼的那个盘子。我这时才吃完一张馅饼，再也吃不下去了。于是我站起身来，把还盛有四张馅饼的盘子往小女孩方面一推，走出了饭店。

在回校的路上我想起当时街上放映的《列宁在 1918 年》。电影中有一个情节：列宁的卫兵领来一个小女孩，她的父母都饿死了。列宁命令卫兵想出一切办法给这个小女孩弄一点吃的，并命令捷尔任斯基收容莫斯科街上所有流浪的孤儿。“我们搞的这是什么革命呢？把好端端的一所孤儿院给毁掉了！”我想道。

(2)

黑龙江省是继上海“二月风暴”之后最早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之一。《人民日报》还就此事发表一篇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是中共前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主任是省军区司令员汪家道。前省级领导人，包括前省委第二书记兼省长李范五在内的都被打倒了。然而，这只是使省内两大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斗争变得更尖锐化。

这两大造反派组织是：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为主体的八八

团和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生为主体的红色造反团。以潘复生为主任的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是在红色造反团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或许因为红色造反团的头头之一、哈军工学生毛远新是毛泽东的侄儿的原故。但是八八团却不承认这个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他们要求打倒潘复生、汪家道和前省公安厅厅长赵去非。于是八八团这一边的人被称为“炮轰派”。

哈尔滨红色造反团和炮轰派之间的斗争也引起了全省各地的两派斗争。在绥化县也建立起了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前县委领导人之一刘显廷，副主任是前县武装部长张永志。前县委书记朱重然和前县长张成国则都被打倒了。这个县革委会也是在县里的红色造反团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是在绥化县也有一个强大的炮轰派。绥化炮轰派的主要巢穴是绥化地区木材加工厂，或称 41 厂。这个厂的绝大多数工人建立起了一个名为“联合造反总部”或称“联总”。只有少数工人在红色造反团一边，他们建立了一个“红色造反团总部”，简称“红总”。位于绥化一中西面的铁路司机学校也是绥化县炮轰派的主要基地之一。绥化一中的教职工和学生则分裂成大致上势均力敌的两大派：红色造反团仍然称红色造反团，而所有的炮轰派则组织起了一个称之为“兵团”的组织。既然没有一方拥有绝对优势，学校文化革命小组的成员们也各自属于两派组织之一，例如组长刘瑞杰就属于“兵团”。

我的两个同室人杜连富和刘少平也是兵团的人。杜连富尤其积极，几乎扮演起了兵团顾问的角色。往往当我劳动之余回到寝室时，总看见几个在兵团当头头的教师或学生与杜连富以及刘少平谈话。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怎么和红色造反团斗争，以及如何夺取学校的权力。红色造反团的人和兵团的人在校内不断辩论甚至动手打架，其结果之一就是主平房的那些教室一块好玻璃也没有剩下。好在天气已经变暖了，也没有人关心此事。

然而事情还不止于此。对立两派的人还经常在校外大街上吵架和打架。4月份里的一天，绥化一中红色造反团的人和绥化铁路司机学校的人在大街上发生了严重冲突，引起了一场灾难。这天晚上大约10点钟时，几乎西宿舍里所有的人都就寝以后，突然宿舍西墙外的大操场上响起了一片打声，接着砖头石块就不断地飞向西墙的所有窗户。这是铁路司机学校的学生们搞夜袭来了。大约有一百多个该校学生跨过一中校园西面的土墙摸进来的。他们并不知道西宿舍里每间屋里住的是一中兵团即炮轰派还是红色造反团的人，于是通过西宿舍东面南北两端的门冲进西宿舍的走廊，用大木头方子撞每间宿舍的门，为的是找到那些白天在街上和他们吵过架和打过架的人。我的寝室是宿舍东面从南往北数的第二间。虽然房门是从里面插上的，几个铁路技校的学生用木头方子只一下就给撞开并冲了进来。杜连富和刘少平连忙从床上起来并向他们解释说：“我们是兵团的！”意即是炮轰派。这几个铁路技校学生看出这是教师住的小寝室而不是学生住的大寝室，就退出去接着撞其它的屋门去了。杜连富和刘少平躺回床上接着睡觉，而我则想道：“他们两人是兵团的，当然可以没事了。可是如果这些铁路技校的学生再来并发现我是一个黑帮，不就会想怎么收拾我就怎么收拾我了吗？”我感觉在中间走廊南段里已经没有人声，就穿上衣服，迅速地从东面南端的门走出宿舍，奔向温室。这时住在温室对面小屋里的那个老路到海伦县去医痔疮去了，我有这间小屋的钥匙，就在这小屋的炕上躺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我回到自己的寝室时，得知这男生宿舍西墙的窗户玻璃被打碎得几乎一块不剩了。从那时起大约有两个月的时间，我每天晚上都是睡在温室对面的小屋里，只是白天劳动之余才回自己的寝室来。一直持续到六月末老路从海伦县回来为止。

绥化一中内部红色造反团和兵团的人之间不断干仗，也给孙

玉生、刘明新和我这三个黑帮带来了无休止的活儿：教室里的桌凳不断地被损坏。于是三个黑帮就得把被损坏的桌凳搬到温室旁那间废弃的食堂，将它们修理好送回教室，又从教室运回新被损坏的桌凳，如此循环不止。不过于这种无休止的活儿总比挨斗强。两派的人忙于互斗，似乎忘记了三个黑帮的存在。没有人关心三个黑帮劳动表现如何，干得多还是干得少等。我们三个黑帮也发现既然没有上课，也就没有人查点每间教室里应该有多少桌凳了。这样就用不着把每一条被损坏的桌凳都修理好了。于是就把许多坏桌凳靠墙叠放在这间废弃的饭厅里，只是把一部分易于修理的桌凳修理好送回教室去。

现在我每天只需干两三小时的体力劳动就行了。那么我应该怎样利用余下的时间呢？我想出了一个避免浪费时间的办法：以俄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为基础编出一本《俄语语法》。这工作和我在 1965 年编的那一本《中学俄语自学手册》相似，语法系统和那本书完全一样，只不过所有举例都取自《毛主席语录》而已，还附了一个“老三篇”的俄语单词表。干这活儿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我的情况。一个造反派组织还向我提供了我所需要的纸张。一个头头对我说：“可惜你还没有被解放，不然我们就可以把这份材料印出来了”。

孙玉生继续把每天上下班经过大街时所见大字报的内容讲给我听。和 1966 年末的情况不同，现在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两派互相攻击了，现在各省都有互相对立的不同名称的两大派组织。孙玉生告诉我说，安徽省有两大派的名称最为有趣：一派称为“好派”，因为他们估计该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而另一派则称为“屁派”，因为他们估计该省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个屁”！而且两派都派了代表去北京找江青寻求支持。在绥化县，红色造反团逐渐取得优势。7 月里一天下午，红色造反团

包围了绥化铁路司机学校，前绥化县孤儿院的小男孩们充当先锋，爬上该校的屋顶，揭开瓦往下摔，整个学校几乎被捣毁了。几天之后，全绥化县的红色造反派又集中包围绥化县炮轰派的主要巢穴第 41 厂。在围攻的第二天黄昏，我感觉晚餐只喝两碗苞米楂子粥不够饱，就上街想买点面包或糕点什么的。我一无所获，因为食杂店的老板们说，所有的面包糕点都被征用供应围攻第 41 厂的红色造反派了。再下一天黄昏时，传来第 41 厂被攻陷的消息。大约有四百多名炮轰派被俘，关押两天之后都被释放了。但是炮轰派的主要头头王德兰（女）却逃脱了，跑到北京找江青告状去了。

不知不觉地我从一个黑帮变成了一个逍遥派。在 8 月份，我们三个黑帮负责掏空连结学校厨房和食堂的马葫芦。这个活儿很脏，我每天下午干完活都到校园外东南方向不远的生产队水库去洗澡和游泳。在这里我遇见许多也是每天来游泳的学生，既有兵团的，也有红色造反团的。这些学生并不拿我当作黑帮对待，和我一起游泳并谈论县内和校内的形势。学生们常常问我：“张老师，你看这情况多咋是个头呢？”高中学生们尤其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不安。农村学生说现在父母都不愿意给他们钱了，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啥也没有学到，整天瞎胡混。

我的确也常常在想这时的国内形势。今年我自己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俄语电讯》。虽然这两份报纸充满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叫嚣，但也报导了一些国外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评论，并对这些评论进行反驳。有一条外国评论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条评论说：中国本来应该转向一种温和软化的政策，但是强硬分子力争扭转这一客观的历史趋势。这一评论和我对于国内形势的看法相吻合。

这段时期我最危险的一种行为是又重新听苏联广播了。我已

有一年之久不敢听苏联广播了。但有些学生告诉我说现在有一个苏联电台叫“和平与进步广播站”。这个“和平与进步广播站”称呼毛泽东和林彪为“毛林集团”等。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最初我只是白天时在自己寝室里趁杜连富和刘少平不在屋时偷偷地听苏联广播，后来我把收音机搬到温室对面的小屋，每天晚上听苏联广播，既听俄文的也听中文的。通常莫斯科电台在报导一个处于动乱之中的国家的形势时总是先提示一下：“××国形势：……”，例如在 1965 年，我听它报导“阿尔及利亚形势……”，“印度尼西亚形势……”等等，现在莫斯科电台则是每天在报导“中国形势……”了。至于所谓的毛林集团，我无需莫斯科广播也自己达到了这种理解。该电台报导了这时遍及全中国的两派武斗中的一些细节，例如发生在河北省保定市的大屠杀等，并干脆把红卫兵称之为匪徒。莫斯科电台还说早在延安时期康生就曾拥有“党内刽子手”这一绰号，现在他又得到重用了。我感觉莫斯科的广播还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并不纯粹是造谣污蔑。但是我在已经当了黑帮的情况下还偷听敌台，这个“罪行”就实在是太严重了，不久我的“罪行”大大地“高升”了！

(3)

在红色造反派攻陷第 41 厂以后，绥化县的炮轰派并没有被压倒。在 9 月份里他们又恢复了活动，而且愈来愈嚣张。不过他们的大本营已经移到绥化一中西面的铁路司机学校了。国庆节那天，全绥化县的炮轰派在绥化铁路司机学校操场上举行了誓师大会。有近万名绥化县的炮轰派出席了这个大会。我在绥化一中的校园里从西面会场的扩大器听到了整个会议的实况。那边响起了震耳的口号声：“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潘复

生！”“打倒汪家道！”“打倒刘显廷！”“打倒张永志！”绥化一中的老收发员张文廷是炮轰派的同情者，他虽然左脚跛了，也拄着一根拐杖到铁路司机学校去看会议的进程，回来还津津有味地谈论他所看到的盛况。绥化一中的炮轰派，包括同屋的杜连富与刘少平，也又积极起来了。绥化铁路司机学校的炮轰派和绥化一中红色造反派之间在大街上吵架打架的事件又有所发生了。

又到了贮备秋菜的时候。于是在国庆日之后，孙玉生和我，每天都得到绥化县西门外新华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去干活，任务是从大田里已砍下的白菜堆里挑出好的加以修理，单独地归拢成堆。等学校的车老板刘尚友和跟车的刘明新赶大车来时，就一齐把这些白菜装上大车，让他们运回学校。孙玉生和我每天大约早上七点钟就得到生产队，大约下午四点离开这里。孙玉生的家离绥化县西门不远，他在离开生产队之后不久就到家了。我往往是在街上找一个饭馆吃一顿晚饭，大约要五点以后才回到学校。10月9日那天，这档活儿就算是全干完了。大约在下午五点钟时我沿着南大街往南走。我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头，许多人站在自己家门口向南方看并在议论什么，愈往南走愈是这样。在南大街与东西道交叉后，东西道东段的北面有两排平房。我沿着第二排平房北面的小路向东走去。这排平房的最后一家就是为学校喂马的老李头李洪升的家。我来到这十字路口，这路口引出向南的一条是通往从东西两面隔开绥化一中和铁路司机学校之间的土路。正在这时，绥化一中校园内闪动了火光，接着又听见爆炸声，不知道是枪声呢，还是鞭炮声。当我正站在那里发愣时，身后右侧响起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张轶东，不能去学校了，那里正在打仗！”我回头一看，看出这正是李洪升的老婆。她比李洪升小18岁，现在才40多岁。这个女人把我请进她家里，告诉我说，刚才铁路司机学校的学生们带着枪和刀子冲进了绥化一中校园，他

们开枪了。当他们正在谈话时，李洪升也回家来了。他一见我就喊叫道：“可不得了，铁路司机学校的学生们冲进了我们学校见人就打，见人就开枪。可能现在已经死人了。你不能去学校，今晚就在我们家住一宿吧！”

于是我在老李头家的炕上躺了一宿。第二天10月10日一清早，大约5点钟时，我起来悄悄地走进绥化一中校园。校园内一片狼藉，一个人也没有。我来到寝室门口，寝室门是锁着的，这就是说同屋的杜连富和刘少平也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开门进屋一看，谢天谢地，什么也没有丢，什么也没有被损坏。我不敢在寝室里停留很久就到校园东南角的温室去了。这时老李头已来到学校开始喂马。他告诉我昨天铁路司机学校的学生开枪打死了两个本校的学生，但是他说不出这两个学生的名字。不管出了什么事，我总得吃饭呀！于是我拿着饭盆向食堂走去。整个食堂里只有我一个就餐者，而且没有热饭供应，厨房大锅里盛满了凉面条。三个炊事员坐在厨房里说话，召我过去，指着凉面条对我说：“这些面条都是你的了，要吃多少盛多少，不要钱！”

从这三个炊事员的口中我才得知：昨天下午5点钟时，面条刚刚煮好要开晚饭时，绥化铁路司机学校的学生们冲了进来，见人就打，见人就开枪，也不分谁是兵团的，谁是红色造反团的人。高中第55班的两个学生，韩柏忠和孙启奎当时就被枪打死了，其他人四散逃走，有几个人受了伤。谁也谈不上吃晚饭了，已经煮好的50斤面条就一直留在锅里。

这以后大约十天的时间里，全校几乎只有孙玉生、刘明新和我这三个黑帮每天到学校来上班。有时学校管总务的杨清和也来一下，告诉我们应该干些什么。活儿倒有的是，因为在这“一〇九事件”之后就需要打扫战场嘛！我的寝室虽然没有被损坏，但也不敢继续在那里住了。我把自己的箱子和其它一些东西寄存到

李洪升家去。现在老路已经从海伦县回来了，我也就不便于住到温室对面的小屋去。在发生事件之后，在东边的女生宿舍里也出现了几间空小屋，于是我就把自己的被褥搬到东宿舍东南角上的一间空小屋里。不久之后刘少平从农村家中回来也搬进了这间小屋，天冷了还搭上了炉子。杜连富则已结婚，在校外另租房住。

到 10 月末，学生和职工陆续在校园里出现。绥化县的炮轰派因为杀害了两名绥化一中的学生而惹下大祸，从此一蹶不振。据说开枪打死韩柏忠和孙启奎的那名铁路司机学校的学生，在外逃两年后被抓获并判了十年刑。绥化一中红色造反团为韩柏忠和孙启奎组织了隆重的葬礼，把他们葬在绥化县人民公园的烈士墓地里。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后，韩柏忠和孙启奎因为不被承认为革命烈士，遗骨被迁出墓地。这些都是后话了。

冬天又来到了，又需要在每间屋子里砌炉子和点炉子了。与去年不同的是去年有九名黑帮承担这件事，而今年则只有三个黑帮了。然而在“一〇九事件”之后，来到学校的学生和职工毕竟不多，在校内呆的时间也不长，因此也不需要搭这么多炉子，搭好的炉子也不需要整天烧。有时学生们自己引炉子，只不过是到温室来找我们要煤要木柴什么的。我们还能对付这个情况。

绥化一中在新华公社的管家大队拥有一处生产基地。这基地位于绥化县西门外约 8 公里处，有一片约 15 公顷的地，今年种的是黄豆。今年夏天我们三个黑帮曾经到那里为豆苗除过三天草。现在黄豆已经收割下来，堆放在基地平房前的场地上，等着脱粒后运回学校。于是为此组织了一个临时劳动组，包括三名黑帮，学校管总务的杨清和，生物教师朱方蓝，大车老板刘尚有以及学校的四匹马，前往管家打场三天，吃住也就在生产基地的平房里。俗话说：“马盼打场，人盼闹忙”，这些人和马这几天在这里的确吃得很好。晚上六人一齐躺在生产基地平房的大炕上唠

喘，也不分谁是黑帮谁不是。有一次孙玉生说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孙玉生说我当上黑帮是因为我思想中有自由竞争的倾向，而他自己则因为家庭人口众多而对自由竞争反感。“一个社会没有竞争怎么能够前进呢？连这个被打成走资派的孙玉生都反对自由竞争，可见中国社会的落后是多么顽固啊！”我想道。

直到年底三个黑帮倒是没有挨过斗。干的活儿主要是搭炉子、修炉子、烧炉子或向学生提供煤和样子等。这段时期学校的大车都忙于去煤木站拉回煤和木头，有时也去管家大队的生产基地运回黄豆，还有黄豆萁作为烧炉子的引柴。每次出车时，三个黑帮中就得有一人跟车，以便帮助车老板刘尚有装车和卸车。我也有过几次跟车的机会，在跟车的过程中逐渐熟悉了一台大车的构造：这其实不过是一块大的长方形木板排，前面有两根辕。木板排的四边用小木条钉起了边，有四块（两长两短）与这四个边长度相适应的沙板。当要运送散装的东西如煤或沙子时，就把这四块沙板竖立在木排的四个边上，再用绳子绑紧。关键的东西还是在这大木排的下面联结着的轴。车轴的两端各有一个轮子。出车时根据车载的重量酌情往车辕上套上一、二或三匹马。马决定的是车速。而承担整个车的重量的则仍然是车轴和那两个轮子。当大车回到学校并卸完车后，马被拉回马厩，而车篷则肚皮朝天式地靠在废弃食堂的东墙上，那根轴和两个车轮则被晾在外面。

“一根车轴和两个轮子！”我站在温室门口，瞅着倒竖在废弃食堂东墙上的大车篷。突然间我头脑中把这大车的结构与当前国家的形势对照起来了：我们国家就像是一台大车的木板排，下面靠一根轴和两个轮子支撑着。这根轴和两个轮子就是毛泽东——林彪联盟，这个联盟正随着当前国内外形势面临不断增加的压力。而这台大车则正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不知往什么方向走去。任何一根轴的负荷都是有一定限度的，超过限度这根轴就会

断裂。那么，毛泽东——林彪联盟的这根轴所承受的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会不会超过它的负荷呢？

第十三章 1968 年 与家庭断绝关系

(1)

从新年到春节的这段时间里，我过了大约有两个月的逍遥派生活。这时与我同屋的刘少平回农村家里去了，很少有学生和职工到学校来。只要有一些煤和样子就够烧炉子用了。活儿不多、空闲较多。于是我就把我的收音机从温室搬到宿舍东南角上我暂时一人单住的那间小寝室里。从莫斯科广播中我得知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企图摆脱苏联控制的运动。我还得知苏联宇宙飞行员余里·加加林在一次飞行事故中牺牲了。“七年前加加林的宇宙飞行曾经给我带来巨大的欢乐。加加林应该比我还小四岁。为什么他死得这么早呢？”我甚至为此有些伤感。

春节以后对于黑帮们来说，绥化县的气氛就变得愈来愈紧张了。一天早晨孙玉生到温室上班后告诉我说，他在从家里来上班的路上看见许多墙上贴着这样的大字块：“深挖三特一叛！”

我心里感到惶惑。我问孙玉生：“三特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苏修特务、美蒋特务和日伪特务，”孙玉生解释说。

“那么一叛呢？”

“就是指叛徒嘛！”

我一生中和美蒋、日伪的确没有过任何关系。我和苏联的确有过许多关系，但是这和充当那个国家的特务还是相距很远的。

自从前院长吴健上吊自杀后，那个被毁了的绥化县儿童福利院就再也没有恢复重建。在其旧址上新办了绥化县第四中学。刘

少平从农村的家回校后不久，就被调到这所新成立的绥化县第四中学去了。但是我也不能继续单人占据东宿舍东南角的那间小寝室了，因为常常有农村的学生来学校就把这间屋当作临时住处。这里面主要是三名高中 47 班的学生：兵团一方的洪庆峰和王品么，红色造反团一方的彭德山。实际上现在他们之间已经不存在什么分歧了。他们现在已经不是高三的学生，而是“高五”的学生了，但是他们仍然不知道他们的未来在哪里。洪庆峰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因此他显然前途暗淡，曾经悲观地说：“我只能在东北平原上作一个农民吧！”王品么的老家在安徽省。他是因为他的哥哥是绥化铁路车站的一名工人而到黑龙江省来念书的。他曾利用革命大串连的机会回过一趟老家。他告诉我说老家的农民们对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既不想前，也不想后，想的只是土改以后，合作化以前的那一段时间。在 1965—1966 学年度我教高中 47 班的俄语时，我感到王品么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交出作业及时又利索。我以为王品么一定会考上一个好大学的。可是现在……。

3 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中午，洪庆峰上街回来告诉我说：“郝文英被枪毙了！”郝文英原是绥化县百货公司的干部，在 1957 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据说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直接上书毛泽东批评 1957 年以来的政策。为此他被逮捕，现在则干脆枪毙了。目击者说郝文英在被押赴刑场的路上骂不绝口，以致押解他的士兵必须用刺刀把他的嘴叉住。他身后留下妻子和两个孩子。

其实这时在全国各地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残害黑帮的运动。到处都有人因折磨而死或自杀而死的新闻。春节前夕，在邻近绥化县的海伦县，一位名叫郭耀东的小学校长因不堪迫害而投井自杀。13 年后，郭耀东的女儿郭静珍，黑龙江省绥化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师，成了我的妻子。因此我不论从自己，我的家庭以及我妻

子的家庭来说，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有大帐可算的。

在绥化一中的革命群众大联合之后，我就成为他们发动更强更大更猛烈的进攻的第一名“阶级敌人”了。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正在床上躺着和洪庆峰、王品么聊天，走廊上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就有人敲寝定的门并大喊道：“张轶东，出来！”

我打开门，看见门边站着几个学生。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知道这主要是高四 51 班的学生。这个班在 1966 年是高二，现在应该是“高四”了！后来这批学生的头头和我打了不少交道，我得知他的名字叫赵兴国。赵兴国对我说：“跟我们走！”

我被领进主平房的一间空教室里。这里坐着大约有 20 名学生。我被命令站到一张凳子上，斗争会就开始了。我感觉这些学生们对我的态度较之于 1967 年初斗我的那些要凶狠得多。学生们并没有对我在 1966 年以前所犯下的“罪行”进行系统批判，而是狠狠地斥责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使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们揭出我在成为黑帮后仍然收听苏联广播的事。我不知道这是由于有人告了密呢？还是由于我自己不小心的原故。最后学生们要求我交代自己当前的思想，尤其是我对于当前国内形势的看法。不料我的交代引起了学生们的兴趣，同时也向我的“罪行仓库”里添加了一大批“存货。”

学生问道：“你是怎么看两派斗争的？”

交代：“历史上有这么一个常见的现象：推翻前一个朝代并不困难，但是谁来取而代之的问题则较难于解决。于是群雄并起。现在每一个省的旧省委和政府都被推翻了，自然就出现了不少想取而代之的派别，它们之间的斗争也就发生了。”

问：“你对江青同志有什么看法？”

交代：“据我所知，江青并不是党中央委员，更不是政治局委员。她是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秘书，这并不是经过选举而产生

的职务。但是江青现在实际上是继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后全国的第三号人物。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现在是制定国家政策的三个人物。江青是毛主席的爱人。让江青在公开场合出现对毛主席并不方便。但是现在毛主席能相信的人太少了，因此也只好让江青公开出面。”

问：“你对周总理是怎么看的呢？”

交代：“周总理现在是全国第四号人物。他是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制定的政策付诸实施的主要执行者，但是他本人却不能参与制定政策。周总理现在已经是七十岁的人了，他关于自己不见得会有什么想法了。”

我感到教室里逐渐变得寂静了，好像我不是在挨斗，而是在讲一堂什么课似的。

突然间批斗会抑或“上课”结束了。这二十多个学生高喊“打倒张铁东！”“让张铁东滚蛋！”几个学生沉默无言地把我押送回寝室。

我的收音机被没收送到绥化县阶级斗争展览展馆，赶大车的刘尚有的老婆参观回家问刘尚有：“那收音机里还藏有发报机吗？”在校园里的墙壁上到处贴出了标语：“打倒反革命修正义分子张铁东！”“张铁东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接着就在主平房以南的西面篮球场接连组织了两次大型的批斗我的会。第一次批斗会的目的仍然是要我“交代罪行。”我被命令站在一张课桌上，周围大约有二百名学生坐在地面上。最初群众想给我扣上“苏修特务”的帽子。虽然大家知道我在历史上和苏联有过不少关系，但是由于没有证据，扣这么一顶帽子没有意义。于是会议内容就转向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观点”上面来了。他们先是命令我重复在上个星期天小型批斗会上说过的那些话，接着又命令我坦白交代对其它一些问题的看法：

问：“你对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粉碎是怎么看的？”

交代：“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和邓小平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机器。毛主席只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表，并不具体掌握这些机器。于是毛主席就和掌握军队的林彪结成联盟就打败了刘邓！”

问：“你对林副主席是什么态度？”

交代：“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间的联盟就像是一台大车的那一根轴，这根轴的两端各有一个轮子。这根轴的作用是承担整个大车的重量。但是每根轴的负荷都有一定的限度。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之间的联盟承担着整个国内外形势的压力。这个压力正在继续加大，是否会超过这根轴的负荷就不得而知了。”

问：“关于人民解放军你是怎么想的？”

交代：“人民解放军也不是铁板一块。所有社会上的矛盾也会在解放军中得到反映。像杨成武、陈再道这样的事件，今后说不定还会周期性地出现。”

问：“你是苏修特务吗？”

交代：“据我所知，苏联的间谍机关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我和它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问：“你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派吗？”

交代：“我是反革命一面派，我没有假面具，我说的都是我的真实思想！”

绥化一中的学生毕竟是从全县选出来的，毕竟比较文明。那几个主持会议的学生低声商量了几分钟，然后那个赵兴国喊道：“你这是在放毒！滚蛋！”会议就在“打倒张轶东！”等口号声中结束了。几个学生把我押送回温室。其中一个学生在离开温室前还给了我几拳头。

几天之后还是在这篮球场上又进行了第二次对于我的批斗

会。这一次已经不是要我进行坦白交代，而是对我进行系统批判了，会场上安装了扩音器。学生们宣读事前写好的发言稿，批判我的历史和现行“罪恶”，尤其是在最近两次批斗会上说出的“反动谬论”。绥化一中的人们对于这些东西已经熟悉了，因此并不感到兴趣。可是在会议末尾里，出现了一个我“罪行”的主要揭发者，这就是原校长兼难友孙玉生。孙玉生的揭发包括几条有份量的“新罪行”：

1) 张轶东在劳动中还常常讲述苏联人的生活方式，可见他的崇修思想是很严重的。他说苏联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为的是要使人均产值赶上美国。因此苏联不愿意耗费力量和中国共产党争论。张轶东还说过中国对于越南人民的援助并没有苏联多。张轶东说中国共产党拒绝出席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是自我孤立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张轶东说中国共产党现在的国际性已经很小了，甚至较之一般的民族主义政党也很少有区别了。可见张轶东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是多么疯狂。

2) 张轶东把他自己离开北京到黑龙江来工作说成是他的一种“北进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在 1965 年夏天他曾去过一趟离中苏边境不远的五大连池。他是不是在预谋投修呢？

3) 张轶东还在坚持他的反动立场。他曾对孙玉生说他只不过以为中国共产党在 1957 年以后走上了一条错误道路。但是他无权进行平等的辩论。张轶东说只要能进行平等辩论，哪怕是全绥化一中的一千多名师生在一方，他张轶东一个人在一方，他也不会被辩倒的。可见张轶东是多么的疯狂和反动。

这次批斗会后，校园里到处贴出了这样的大字块：“强烈要求公安机关逮捕反革命分子张轶东！”“强烈要求校方停发老修张轶东的工资，只发给他少量生活费！”等等。我对于第一条要求并不在意，因为这是县公安机关的事，可是县公检法早在去年

就被砸烂了。对于第二条要求，即停发工资，我还是有些在意，因为这是学校就能决定的事，而且这能立刻影响到我的生活。

(2)

除去孙玉生，刘明新和我这三个原有的黑帮以外，到 5 月末时，绥化一中又揪出七个黑帮：

原副校长石俊杰。据说在 1945 年—1964 年间，即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年，石俊杰曾参加过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但后来他不知何故又离开了军队。于是他作为叛徒逃兵而被揪了出来。

原副教务主任朱文渊，约 40 岁，湖南人。他解放前曾参加国民党和一贯道，因此被揪出。

蒋存善，体育教师，约 40 岁。他的哥哥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现在还在台湾。他本人解放前也参加过国民党军队。因此他显然是一个“国民党残渣余孽”！

钟琳，语文教师，约 40 岁。他是绥化本地人。但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一年，他跑到长春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并对人民解放军作过战。后来不知何故又回到绥化县，当上中学教员。这样把他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揪出来的原因就很明显了。

朱方蓝，生物教师，约 40 岁，湖南人。他在解放前曾加入国民党，因此作为“国民党残渣余孽”而被揪了出来。

刘兴兰，女，地理教师，约 38 岁。据说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在老家辽宁省曾经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且曾经为国民党军队站岗放哨。显然她也是一个“国民党残渣余孽”了。

王培明，化学教师，约 35 岁。他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一年的 1965 从绥化县第三中学调到一中来的。据说在档案中有关

于他在 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中的表现的记载。他被定为“中右分子”并规定对他要“控制使用”。于是王培明就被作为一个“漏网右派”而揪出来了。

这已经是绥化一中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第二个黑帮队了，共计十人，1966 年末的那个第一个黑帮队则是九个人。不同的是第二个黑帮队的成员主要是过去的历史上有过些什么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解放后经过多次调查弄清楚了，根本不能成为他们是什么“特务”或“叛徒”的根据。但是如果不揪斗他们，“革命群众”又有什么可以干的呢？

这些黑帮被集中在西宿舍东侧的一间学生大寝室里。刘兴兰因为不久前生下小孩，必须每天给孩子喂几次奶，因此被允许回家去住。其他的九个男黑帮则必需住在这里。所有学生大寝室靠窗户的一面都是一溜双层的大木板铺，所有男黑帮都被安排睡在上铺。在寝室未被大板铺占据的那一半地面中央用六张课桌拼成一张长桌，周围放着十几张课凳，是给黑帮们吃饭和学习用的。学生们被组织起来看管黑帮，每个班级一个星期，白天是女生，晚上是男生。每天早晨五点钟值班的男生们唤醒黑帮，给他们“放风”，监督他们洗漱和打扫校园。七点钟时黑帮们排成单行，在学生们的押陪下拿着饭盆到食堂买早饭。黑帮们在将早饭拿回黑帮室后，必需在毛主席的肖像前面请罪三次才能坐下吃饭。吃完早饭，值班的女生们就来接替男生了，那个女黑帮刘兴兰也来上班了。在白天这十名黑帮都得劳动。在任何时候某一个黑帮都可能被某一个班级的学生找去批斗或“交代罪行”。这种批斗可能是温和的，也可能伴随着拳打脚踢。有时某一个黑帮可以不去劳动，留在黑帮室写某一班级学生急用的交代材料，留一两女生监督着他。这一两女生闲极无聊，就抓起这个黑帮正在写的材料看，再挑剔地说你交代得不老实，认识不深刻等。到

中午时黑帮们又重新排成单行，在值班学生的押陪下，拿着饭盆到食堂去买午饭，将午饭拿回黑帮室，在毛主席肖像前请罪三次才坐下吃饭。午饭后黑帮们可以有一小时的午睡。到下午五点钟时，“女黑帮”刘兴兰回家，这九个男黑帮又按照早午饭那样的程序买晚饭和吃晚饭。晚饭后值班的男生们就来接替女生。这九名黑帮就围着长桌“学习”了。学习内容一般的是读报，但也可能是“黑帮斗黑帮”，即让一名黑帮站在长桌面前，其他黑帮在值班学生的“指导”下对他进行批斗。

在6月份的约两个星期中，学校还临时成立了一支“候补黑帮队”。队员有原俄语教研组组长蒋鸿达、数学教师黄建贞和收发员张文廷。蒋洪达成为候补黑帮是因为在1965年曾经在教研室用党旗作抹布擦桌子。黄建贞成为后补黑帮是因为解放前曾加入国民党。张文廷成为候补黑帮则完全是去年两派斗争的结果：他过于同情炮轰派。“兵团”（即绥化一中的炮轰派）一边的学生们常常聚集在收发室谈天说地。张文廷说过在绥化铁路机务段的越南实习生们参加中国员工的集会时，只跟着喊“打倒美帝！”这一口号，却不跟着喊“打倒苏修！”，这的确也是事实。但是张文廷的收发室却被红色造反团一方称之为“裴多菲俱乐部”了。另外还有两名兵团一方的高中生因为写了反对红色造反团的标语也被送进了这个“候补黑帮队”。这五名候补黑帮被安排住在西宿舍西侧与黑帮室斜对面的一间寝室里。一天夜里我躺在黑帮室的上铺，听见对面屋里值班学生批判蒋洪达把党旗作抹布，并且用皮带打蒋洪达的声音。不过两周之后，这个“候补黑帮队”就被解散了，没有一个候补黑帮获得“转正”。于是革命群众，即过去兵团和红色造反团双方的人，都集中力量来收拾这个十个黑帮了。

兵团的人和红色造反团的人都想显得比对方更革命一些，都

不敢对“阶级敌人”显得温情。在五月里石俊杰与蒋存善就因为曾经站在红色造反团一方而被兵团的人吊打了整整一宿，而红色造反团一方却无法解救他们。刘明新也被整整斗了一宿，清晨又被命令胸前挂着一块大牌子站在校门边示众，不过这九个黑帮中最遭罪的还得数校内走资派孙玉生，其他的那九个人都被认为是他的黑干将，例如在一次开孙玉生的批斗会时，其他陪斗的黑帮都被命令和孙玉生进行如下的一次对话，就拿我作例子吧：

我问道：“孙玉生，我是你的什么人？”

孙玉生回答说：“你是我的黑干将！”

7 月份在学校大礼堂召开了一次全校师生员工批斗全体黑帮的大会。十个黑帮排成一行，走向大礼堂，一面走还被命令不停地叫喊：

“群众专政好！

群众专政就是好！

牛鬼蛇神跑不了！

张轶东（每个黑帮报自己的名字）也跑不了！”

于是这一列黑帮就站在礼堂大门外等待批斗会开始。学生们坐在礼堂里唱“打狼歌”！主持会议的数学教师王忠厚向会议通报说，现在全绥化县已揪出共约一千二百名阶级敌人。在动员学生向校内的阶级敌人进攻时，王忠厚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轶东直到现在还很猖狂，竟宣称我们绥化一中全体一千多革命师生不能辩论过他。这时押解黑帮们的学生在礼堂外则拿这些黑帮们取乐。他们命令这黑帮都蹶身成 90 度，双手朝后向上呈喷气式，每一个黑帮的头都必需紧紧地顶住前一个黑帮的屁股。在这个单列摆好之后，一个学生就朝最后这个黑帮的屁股上猛踢一脚。连锁反应，整个黑帮单列就像一条长蛇似地倒在地上。在学生们的吼叫声中，黑帮们还得爬起来，一个顶一个地蹶着。于是

另一个学生又往最后一个黑帮的屁股上狠狠地踢了一脚……。如此反复，直到批斗会正式开始。批斗会对于这些黑帮们已经不那么可怕了，他们对于那些口号声也习以为常了。他们只是面对听众站在那里，听不听批判发言就随便了。这次批斗会其实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每一个黑帮在打倒自己的口号声中被押送出礼堂，然后他们又排成一行走回黑帮室，一路喊叫道：

“群众专政好！

群众专政就是好！

牛鬼蛇神跑不了！

张轶东（孙玉生等）也跑不了！”

孙玉生不仅自己遭罪，他的家庭也跟着倒霉。据说孙玉生的阶级成分是“漏划富农”，而且他的富农父亲现在正在绥化和孙玉生一家住在一起。于是一天下午，几个住在黑帮室南面一间寝室里的高中 54 班学生就去到孙玉生家，把孙父抓到那间寝室里批斗和痛打了一下午。下午 5 点钟当我们干完活回到黑帮室时，我们还听见了从那间寝室传来的叫喊声和打人身。后来一个 54 班的学生来黑帮室对孙玉生说：“孙玉生，来把你父亲背回家去！”晚上约 8 点钟，当黑帮们围坐在长桌旁读报时，孙玉生一声不吱地回来了。第二天劳动中钟琳悄悄地告诉我说，昨天下午当孙玉生把他的父亲背到家时，他的父亲因为伤重而死去了。

建立黑帮队反而缓解了一些我的处境。在这次以前我是受到集中进攻的唯一对象，现在这一进攻则是分散在十个黑帮的身上了。但还是有一些班级的学生对我感到兴趣。他们的兴趣不在于我是否是一名“苏修特务”（他们还曾经没收了所有克拉娃和其他苏联人寄给我的信以进行调查），而在于我有许多“谬论”。于是有时候我也被一些班级的学生找去批斗。在这些批斗会上学生们主要是命令我交代对于一些问题的“真实思想”。例如：

问：“你关于两派武斗是怎么想的？”

交代：“我认为根子还是在于经济。1958年的大跃进是‘欲速则不达’。从那时起到文化大革命的时间里我国经济发展得慢，而人口却增加了很多，所以人均收入减少了。两派斗争从实质上是人们为重新分配已减少了的产品和发展机会而斗争。例如在我校，学生进入高校的机会减少了。每一个学生想把自己显得比别人更为革命一些，其实就是为了增加自己进入高校的机会。因此两派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问：“你对于毛主席著作到底是什么态度？”

交代：“据我所知，到现在为止毛主席著作只出版了前四卷，而这四卷包括的是到1949年为止的毛主席著作，即关于民主革命的著作。但是现在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此外，现在世界上和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是不能用毛主席的这四本著作来解决的。”

问：“那么关于毛泽东思想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交代：“我以为最好不要用一个活着的人的名字作为一种学说的名称。当马克思在世时并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一名称，而只有‘科学社会主义’这一名称。当列宁在世时并没有‘列宁主义’这一名称而只有‘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名称。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一个人既然还活着，他的思想就在继续发展和变化，可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变化，也可能朝着错误的方向发展变化。因此用活着的人的思想来命名一种学说可能不妥。”

学生们在批斗会上呼口号，会后贴大字报批判我，说我是马尔萨斯余孽等。我感到反对我的火药味其实并不很浓。我现在是处于这么一种状态：如果我啥也不说，我就要被认为是“不老实”。如果我想啥说啥，那就是“新罪行”。但是现在我总的情况已经是“债多不愁，虱子多不痒”了。俗话说：“好汉不吃眼

前亏”。我倒是没有吃眼前亏，然而后来算我的总账时这些谬论可就有份量了。

另一个问题却立刻成为我的麻烦了：根据绥化县革命委员会的规定，所有黑帮停发工资。他们的工资都保存在学校的会计室，要等他们的问题搞清楚了，他们都被“解放”了以后才发给。在“被审查期间”，黑帮家庭按每人每月 8 元发给生活费，单身的黑帮每个月发给 20 元生活费。我是这 10 名黑帮中唯一的单身汉，因此每月可领取 20 元生活费，干瞅着其它的钱被截留在学校会计室里。这 20 元钱还是够我吃饭的。但是我还需要每月给母亲 15 元生活费呀！幸好我在储蓄所里还有 300 元活期存款。于是我每月一次将存折交给李洪升，请他取出 15 元钱代我给母亲寄去。我不知道这种状况能维持多久。

另一个物质问题就更为紧迫了：由于干体力活，我食量大增。我的口粮是每月 31 斤，而现在每天大约得吃一斤半粮食。有一次中午我五分钟之内将一斤面条吃下肚子。到 7 月末时，眼看过去节约的粮票都快要吃光了。怎么办呢？我想起自己在北京的家，于是给母亲寄去一封信，请她给自己寄一点粮票来。8 月初我就收到了北京的回信，信中附有 20 斤全国粮票。这封信是我的侄女，即大哥的女儿爱农写的。爱农在信中说她现在已经七岁并开始上学了。我真不明白在目前形势中爱农在学校里能学到什么。爱农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我的母亲眼患白内障。

“啊！”我自问道：“我这一辈子还能再看见妈妈吗？就算我再看见妈妈，妈妈的眼睛还能看见我吗？”

(3)

7 月末 8 月初时，绥化一中的生活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校

革命委员会建立起来了，主任是由县革委会指定的刘玉书。刘玉书过去从未来过绥化一中，他是一个 40 多岁的矮个子，以前在绥化地区教育局工作。

同时工人农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进入了绥化一中校园。8 月初的一个正午时分，我看见七八个中年人排成一列从主平房的南门出来，穿过西南篮球场进入西宿舍。他们每人胸前挂着一面小镜子，右手拿着一本红皮的《毛主席语录》。有趣的是走在队列最前端的是一个年约 12 至 13 岁的农村小孩。这小孩每走四五步就举起一次小红书高喊：“毛主席万岁！”接着整个队列就回应道：“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些工宣队员也被安排住在西宿舍的一间学生大寝室里，即在黑帮室以南。

然而，变化得最大的还是学校的主体——学生。根据“中央精神”，凡是在 1963、1964 和 1965 年入校的高、初中学生，都被认为已经毕业，并被限令在 9 月底前离校。这“离校”首先是针对家在农村的高中生的，他们必需立即回家就地当农民。国庆节前不久的一个晚上，最后的几名高中生在街上的一家小酒馆花光了自己口袋中的钱，回到西宿舍黑帮室斜对面他们的寝室，坐在那里连哭带唱地过了一夜，天亮时最后离开了校园。我躺在黑帮室的上铺听着他们唱和哭时，不由自主地想起十年前，即 1958 年除夕，我在列宁格勒新萨拉托夫卡和克拉娃共同度过的那一夜。

下面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动员街道上的学生下乡了，似乎这才是被派到学校来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第一任务。我感觉工宣队员们并不忙于过问我们这些黑帮的事，而是忙于和通校生们谈话。谈话之后他们就被确定派往某一公社的某一生产队去插队了。到年末时，即早在毛泽东关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最新指示”发表之前，几乎全部通校的高中生和大部分初中生

都被打发到农村去了。只有极少数的人是例外，他们或者是由于有亲属在部队而当兵去了，或者是由于这家庭有强大的背景而留在县城的某个工厂当上了工人。一个名叫崔宝治的前红色造反团头头甚至被作为校革委会成员而留校了，后来还当上了校革委会副主任。一部分城东南区而家庭成分较好的初中生有幸作为新生而进入了本校高中。

同时，新招的学生来到了学校，六个高一班（高 57 至 62 班）和六个初一班（初 32 至 37 班）。每个班级有学生 60 至 70 名，全校共有 12 班级或约 700 名学生，比文化大革命前的 20 个班级和 1000 多名学生要少多了。此外，由于绥化一中现在已经不是绥化县的重点中学，所有的学生都是通校生，再也没有住校生了。全绥化各中学是按区分佈招生的，绥化一中负责招收绥化县城东南区的学生。

不当重点学校这一情况也使得这十个黑帮要多遭一些罪了。过去的老学生们，不管是兵团的还是红色造反团的，毕竟是从全县学生中挑选出来的，素质较高。他们还记得这十个黑帮毕竟是他们熟悉的学校领导和教师。除了少数人和他们中间某人有个个人恩怨和有些人想依靠折磨黑帮来出人头地以外，多数老学生对这十名黑帮还是采取“板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态度的。现在他们走了，新学生来了，情况也就变了。来自县城东南区的学生们素质参差不齐，除去升入高中的那一部原本校初中生以外，他们对这几个本校原来的领导干部和教师毫无了解。他们入学后的第一门课就是“阶级斗争课”，即对校内现有的十名“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然后就是跳忠字舞和在操场操练等，根本没有任何文化课程。这样一来，这十名黑帮就要倒大霉了。

这六个高一班（高 57 至 62 班）被编成第一连，连长张杰是原初中第 27 班的学生，我教过他。六个初一班（初 32 至 37

班)被编成第二连。每个班级被看作是一个排。每个班级(或排)被分成几个班(即小组),每个小组(班)都仅由男生或女生所组成。每个排轮流负责看管这十个黑帮一周。在高中 57 班学生开始负责看管黑帮的第一个晚上,黑帮们就尝到了这些新学生的下马威了。这些学生下午五点钟一接班时,就严厉地喝令这九个男黑帮排成一列呈喷气式蹶着,每个黑帮自报“罪恶”。这以后他们拿饭盆去买晚饭,回来向毛主席肖像请罪三次再坐下吃饭。吃完饭开始“学习”时,值班学生们就开始拿黑帮们取乐了。有点不同寻常的是,在这十名黑帮中,学生们最感兴趣的既不是校内走资派孙玉生,也不是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轶东,而是朱文渊。朱文渊的脸是斜歪的,前额秃着,舌头大说话不清楚,而且还是一口湖南腔。在高中 57 班男生值班的这七个晚上,黑帮们都要奉命组织对朱文渊的批斗会,尤其是逼他交代他在一贯道里都干了些什么。高中 57 班的学生们还命令朱文渊作出各种奇怪的姿势来逗他们笑。

下一期是高中 58 班学生负责看管黑帮,他们似乎比高中 57 班学生要来得温和一些。但是当高中 59 班来看管黑帮时,这一班有一个名叫王大义的学生却盯上了我。王大义并没有组织对我的批斗会,而是单独把我叫到一间空房里。他先让我报告自己的“罪行”,然后往一个小本子里作记录。最后他命令我面对墙站着,他脱下自己裤子上的皮带往我的背上打了几下。我感到自己背上因一阵疼痛而火辣辣的,但是没有吱声。我不知道王大义为什么要这样打我。

即使在晚上当黑帮们都已在上铺睡觉时,值班的男生们如果自己睡不着,也可能把某一个黑帮叫下来折腾一番以供消遣。一天夜里大约在 11 点时,王培明突然被叫到地上。学生们将一个凳子四足朝天地倒放在地面上,他们先命令王培明报告一遍自己

的“罪行”，然后命令王培明两脚站在倒放凳子的两条脚底上，两手则抓住另外的两条凳腿。在这种情况下，王培明当然不可能保持身体的平衡。他三次摔倒在地，又三次被喝令重新那样站到倒放的凳子上去。最后摔得鼻青脸肿的，才被命令爬回上铺睡觉。这时躺在上铺的其他黑帮们都被惊醒了，但是都屏着呼吸不敢出声。我听见学生在低声商量下一个整谁，接着就听见有人喊道：“张轶东，下来！”我心知不好，也不能不下来。在我报告一遍自己的“罪行”以后，一个学生对喊道：“上去！”我以为是命令我回去睡觉，就走向大板铺的梯子。学生们笑起来了，一个学生指着倒放在地上的凳子喝道：“不是的，上这个！”正当我瞅着倒立板凳并试图站上去时，突然一个学生对我喊道：“行了，回去睡觉吧！”即使是在后来，我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使我避免了这一次残害。

这些值班的男生们在夜间还互相取乐。高 57 班的班长名叫伦福胜，他自封为“司令”，意指现代京剧“沙家浜”中“忠义救国军”的司令胡传揆。另有一名戴眼镜的学生自称“参谋长”，意指“忠义救国军”的参谋长刁德一。但是这些“司令”和“参谋长”却不尊重他们自封的官衔。在夜间当 they 要小便时，他们并不去厕所，而是冲着黑帮室的内墙壁撒尿，一面撒尿还一面说：“反正我们也不在这里住一辈子！”

11 月全校师生一度参加了绥化县城西北面“五七公路”秦家段的修建。所有 9 个男黑帮在初中 33 班女学生的押解之中参加了一个星期的劳动，晚上就睡在一间生产队的办公室里。因为初 33 班的男生在白天也参加修路劳动而晚间需要睡觉，晚上黑帮睡觉时也是由初 33 班的女生们看管。这些女生也没有忘记拿黑帮取乐。一天夜里我睡着时，一个女生把一块土豆皮贴到我的脸上。脸上的冰凉感觉把我弄醒了，我忍不住对那个女生说：“这

样作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这以后女生们不再往我的脸上贴土豆皮了。但是在修路劳动中，初 33 班的男生们折腾黑帮们更厉害了。所谓修路就是拿掉隆起地段多余的土并把它填到凹下的路段。这时已经天寒地冻，冻土很硬，需要用镐刨或用锤子打。有时打下的冻土块很大而沉重。一次，初 33 班的一个学生命令石俊杰将一大块冻土抱到凹陷地段去。这块冻土太大了，石俊杰走不了几步冻土块就从他的手上滑脱到地面。一个长得像猴似的头戴着一项狗皮帽的学生冲过去就给石俊杰几拳头。石俊杰的儿子石利民恰好是新升入初 33 班的学生，这时也在这工地上劳动。石利民亲眼看见同班同学殴打自己的父亲，但是却毫无办法，因为他是一个“狗崽子”。

在五七公路劳动完回校之后，黑帮们劳动的主要内容就是给各教室烧炉子，他们中的某一人可能随时会被一些班级找去批斗。这时即使是新学生，对这种批斗也不感兴趣了，他们并不关心某一个黑帮过去犯什么“罪行”，只不过要用这种批斗会起哄作消遣而已。一次刘明新被叫到高中 60 班的批斗会上，学生们问他说：

“你的三反都是哪三反？”

刘明新是瓦匠，没有文化，他喃喃地说：

“我反了社会（他的意思是说反社会主义），反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好家伙，你他妈的，都四反了！”学生们打了刘明新几拳头，把他从教室里赶了出来。

一天我被叫到初中 37 班教室挨批斗。最初我被命令自报自己的“罪恶”。我才说几句话，学生们，尤其女生们就开始七嘴八舌气势汹汹地质问我了：

“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

“你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

“你为什么吹捧苏修？”

“你为什么同情刘少奇？”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解释自己的思想。我要求说：

“能不能让我一个一个问题回答呢？”

女生们七嘴八舌地起哄了。一个男生对我说：“张轶东，你所建议的方式群众不喜欢”。

“是的”，我回答说。

“滚蛋！”这学生往我的鼻子上打了一拳。我的眼镜从脸上掉到地上，两块镜片从镜框上掉下来。这学生弯腰拾起两块镜片，却不知何故往镜框踏上一脚，将它踩坏，然后将两个镜片递给我，说：“给你”！

我不知道踩坏镜框的学生姓甚名谁。即使知道，难道我这个黑帮还能要那学生赔偿吗？但是没有眼镜我在生活上和劳动上是寸步难行的。于是我通过值班女生向校革委会申请获准，由两女生陪我上一趟街，在一家眼镜店里另买一副镜框并将那两块镜片装上去。我为此花了两元钱，这可是我每月 20 元生活费的十分之一啊！

一天傍晚值班的男生把炉盖子烧得通红，又把炉钩子的把手放在炉盖子上烧烫，然后再把炉钩放回炉盖上使把手悬在炉子外面。接着一个学生命令我说：“张轶东，把炉子捅一捅”！

但是我看到他们把炉钩把手烧烫了，于是用一块抹布包着炉钩把手再去捅炉子。这个学生说：“不用抹布！”

“但是这炉钩把烫手！”我回答说，并接着捅炉子。

虽然学生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残害我，我第二天早晨还是没有逃过整。这一天是阴天，黑帮们起床后打扫完院内西宿舍周围回到黑帮室。一个值班学生正好起来，他问我说：

“今天的天气怎么样？”

“今天是阴天，太阳……”我的意思是太阳出不来。

那学生勃然大怒，大喝一声：

“你好大的胆！蹶着！”

我立刻发觉自己失言了。太阳始终意味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太阳出不来不就是对于伟大领袖的恶毒攻击吗？于是我蹶着，作为一个“极端反动的反革命分子”而挨了一次现场批斗。

不过临近年末时校内多少建立起了一点秩序，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成为单一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是由绥化县北门外综合机械厂的工人所组成。由于所有老学生都已被动员下乡，工人宣传队的人数也减少到五个人。这也意味着现在绥化一中在一定程度上是处于绥化县综合机械厂的领导之下。在校革委会之下还建立起了一个专门清查黑帮问题的办公室，简称清查办。清查办的负责人就是我来本校第一年同住一屋的政治教师孙永桢。有时晚上当黑帮们正在学习时，孙永桢或某一位工宣队员到黑帮室来巡视一番。他们通常先把黑帮们训斥一通，然后在步出黑帮室时向值班的学生们交代一句：“要注意政策！”这样一来，学生们的确收敛了一些。但是这种相对平静的主要原因还是学生们自己对这种“阶级斗争”也感到厌倦了。有的学生不喜欢漫长的冬夜，干脆不来值班。很少有值班学生手上带有表，于是他们早晨总是一再向有表的黑帮们问“几点了！”这反映出他们盼望早晨七点钟早些来到，接班的女生们一来，他们就可以回家了。同时校革委会还规定，要批斗黑帮，必先经过清查办的批准。在几次批斗会上我又被迫重述了“罪恶”和“反动观点”等。不久以后清查办就通知说不要再开张轶东的批斗会了，因为张轶东老是在批斗会上“放毒”。这倒使我少了不少折磨。我不知道这的确是清查办的意图呢？还是那个过去同屋的孙永桢用

这种方式来为我解脱。

关于调查黑帮们的“问题”的工作倒是真的开始了。这方面的一个征候是：往往一个黑帮被叫到清查办，在那里与来自县内、省内或更远处某一单位的人员相遇，交代他对该单位某人（通常也是黑帮）的了解和他自己与该人的关系。我也被找到清查办去见来自哈尔滨商业局的外调人员，因为我的朋友沈大纶是属于那个单位的，还见了来自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外调人员，因为沈大纶的爱人冯宾属于那个单位。这两个单位的人对待我还是比较和气的，谈完话让我在谈话记录上按上手印就走了。但是从孙礼煌所在的安达市五金公司来的外调人员则对我很粗暴，谈话中总是伴随着对于我的斥责。不论态度和善还是粗暴，我知道沈大纶、冯宾和孙礼煌也都是黑帮了。

经常被叫到清查办去会见外单位的外调人员也等于是告诉我，绥化一中自身也在派人出去调查我的“问题”了。终于一件事情证实了我的这一猜想。

离除夕只有几天了，一天晚饭后一名值班学生告诉我说：“清查办叫你去！”

孙永桢坐在清查办一张办公桌的后面，他先是打官腔式地问了一下我现在反省得怎么样了，然后告诉我说：

“我们收到你母亲的一封来信，她宣布和你断绝关系，还把你最近寄给她们的 15 元钱退回来了。你看吧！”他向我展示出一个信封，但是却没有把里面的信纸给我读。不过我能看清楚信封上的确是我母亲的笔迹。接着孙永桢又把 15 元钱交还给我，这是母亲 12 月生活费中我应拿出的那一份。

我将 15 元放入衣袋，脑子里一片空白地走回黑帮室。整整一夜我躺在床上回忆着 14 岁父亲死后整个张家的历史。母亲拉扯大五个孩子多不容易啊！我张轶东只不过是兄弟姐妹五个人中

的五分之一，总不能让我断送另外四个人的前途呀！因此和我断绝关系的确是张家的唯一出路。只是在 11 年后我才得知，我的兄弟张轴材这时正从清华大学毕业等待分配工作。如果张家不和我断绝关系，毛弟还能分配到什么好工作呢？

于是到 1968 年底，我成为一个举目无亲的人了。

第十四章 1969 年 社会学习班

(1)

新年后 9 个男黑帮被迁到西面最靠北的一间学生寝室去住。北面的一间小屋里住着三位男工宣队员。从这间小屋再往北则是位于西宿舍西面最北端的校医室了，它相当于两间小屋或一间学生宿舍的三分之二那么大。西宿舍东面的最北端则是宿舍的东北门和过道。过道的南面是两间教师住的小屋，我在绥化一中工作的前两年就是先后住在这两间屋里的。自从 1967 年两派之间发生武斗之后，这两间小屋就空了起来。然而在新年后，林木匠却被找去修理这两间小屋的门窗。这两间小屋之间的下半部是一道空心的火墙，一端连着走廊上的炉子，另一端连着烟囱。火墙大约为 1.5 米高，火墙上面直到天花板则是一道木板墙。不知为何林木匠在木板墙的中央离地面约二米处锯开了一个约半平方米的洞。黑帮们路过西宿舍的这一段时，都看到了这一情况，但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一次钟琳悄悄地告诉我说，他曾听到一个学生站在北面的那间小屋里说：“可也别把他冻坏了。”“是不是要把我们中间的谁关进去呢？”钟琳猜想道。

果不其然，在一月中旬的一天晚饭后，一名值班学生来到黑帮室对我说：“你来一下！”

我被领进黑帮室斜对面西宿舍东北角的那间小屋，也就是在绥化一中工作第一年和 1966 年末当上黑帮初期住过的那间小屋里。学校革委会委员王忠厚正站在小屋的中央。他向我宣布说：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你现在还是很很不老实的。因此从现

在起你就一个人住在这间房间里。你不用参加劳动了，一日三餐将由值班学生替你买。这里有一个尿桶，每天早晨值班学生将陪你去一趟厕所。你就在这间屋里反省，学习和写检查交代材料。”王忠厚走出这间小屋后，值班学生把我的卧具从黑帮室搬进这间小屋，然后就从外面把这间小屋反锁上了。

小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课桌，一个凳子和一个炉子。床是顺着火墙放着的，桌子正好放在那个木板墙的方孔之下。显然这方孔的作用是让在另一小屋值班的学生监视我的举止和向我送饭的。东墙上的窗户已经被木板钉死了，墙下有一堆供我烧炉子用的煤和木柴。总之，我现在是住在“校内拘留所”里了。

春节以前我在这校内拘留所里过得倒是比较平静。值班学生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家里过年的事，不注意我，也不怎么找我的麻烦。去年8月份妈妈寄给我的那20斤粮票已经吃光了，现在不参加劳动倒是帮助我缓解粮票紧张的问题。初中32班一个名叫周炳岗的学生得知我缺乏粮票，就利用这一点来骗我的钱。一次当另一屋里没有值班学生时，他从那个方孔伸过头来说，如果我交给他两元钱，他就能为我从街上买来不要粮票的烧饼。我真的交给了周炳岗二元钱。然而那以后周炳岗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时食堂把煮黄豆作为副食卖，不要粮票。我就请值班学生给我买来整整一饭盒的煮黄豆。春节前的一天晚上，我在用煮黄豆填满了自己的胃以后，突然感到自己也需要在精神上轻松一下。

“如果现在能听听俄罗斯歌曲该有多好啊！”我暗中想道。我又想起了克拉娃。“她现在在哪里呢？”她还不想我呢？她或许以为我已经被整死了吧！“不，我不能死，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继续为反对个人迷信而斗争，直到胜利为止！”我想道。你这个校内囚徒，你还谈得上什么“胜利”吗？然而我还是为我自己的“胜利”下了一个定义：只要我能活着，这就是我的胜利。

春节后学生们就重新向我以及住在斜对面黑帮室的其他黑帮们找麻烦了。这时正召开三级（县级，公社级和生产大队级）干部会议，从农村来开会的人在西宿舍的其它学生寝室里大约住了十天。这时值班学生们几乎每天夜里都召开批斗会，那些从农村来的住客则成为了观众。我有几次也被弄出来挨斗，我注意到去年 11 月修“五七路”时打过石俊杰的那个初中 33 班的像猴一样的学生又起劲地整起我们来了。当我在小屋里坐在桌前吃饭时，一个男生故意从那个方孔往这边抖动大衣，好让大衣上的灰尘落在我的饭盆里。一次一个男生干脆从那个方孔往我的桌子上撒尿。在白天，当一个值班女生感觉闲得无聊，随时可能从那个方孔伸过头来向我大喊一声：“老修！”一次一名女生甚至对我喊道：“你比郝文英还严重！”既然郝文英在 1968 年已经被处决了，那么下一个就是我了！我感觉这不会是一个初中女生个人的想法，大概是校革委会中某些人的意见传入了她的耳朵吧！

这些男女学生之间也互相打闹。例如有一名初中 37 班的男生名叫王希奇，女生们就为他编了一个顺口溜：

“说稀奇，道稀奇，
我们班来了个王希奇，
王希奇，真稀奇，
.....”

这个王希奇的行为也真够稀奇的：他可以偷偷地把一个女生饭盒里的大米饭吃掉，然后往饭盒里装上一个窝头。有一次在看管我时，他向我要了一元钱，也说是为我买不要粮票的烧饼。不过他的确给了我一块烧饼，其它的几块则是他自己吃了。

始终没有一个革委会或清查办的成员向我指出我有什么“不老实”之处。2 月末的一天下午，几个学生押着我去旁听了绥化地区机关的“政策兑现大会”。会上有几名绥地区机关的黑帮因

为“交代坦白和检查深刻”而被“解放”了，另有一名绥化地区前水利局长则因为“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而在会上被绥化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当场拘留。说不定校革委会要我去旁听这次“政策兑现大会”的意图是要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有多么严重吧！

珍宝岛事件给我的“罪行”又增添了新的色彩，因为我被认为是一个纯粹苏联牌的修正主义分子呀。有的班级把我找去批斗，会上还喊出“血债要用血来还！”这样的口号。“或者我该进监狱了吧！”我想道。但是我以为在目前情况下，蹲在县看守所说不定比呆在学校的这间小屋里还更安全一些呢？

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4月1日晚8点半，在收听完新闻之后又有一个通知：“今晚9时，本台将有重要广播！”我猜想这一定是九大开幕了。的确如此！随着九大召开，在绥化一中气氛也趋于缓和。其他9名黑帮一个接一个地逐渐被解放了。我的“老难友”孙玉生和刘明新是最后被解放的。他们都领回了全部受审查期间被冻结的工资，因此也都享受了一段短期的“经济繁荣”。

我虽然已经是绥化一中唯一的黑帮分子，但处境也大大改善了。不知道为什么和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所住小屋门外的那个门锁消失了。值班学生也不陪我去厕所，不替我买饭了，我只得“自我服务”了。最后白天值班的女生们也不见了，晚上来值班的也不是男生，而是食堂做饭的李师傅。这是由于现在学校食堂吃饭的人不多而导致炊事员超编的原故。我和这位李师傅之间本来就很熟，现在正好每晚在一块儿聊天。但最后这位李师傅感觉这样“看管”我没有意思，干脆也不来了。我就独自在这间小屋里生活着。

5月13日早晨8点钟上班后，当我独自坐在小屋里时，校革

委会副主任崔宝治推开了小屋的门。崔宝治看见我有点惊奇并问道：“你还住在这里吗？”“是的！”我回答说。崔宝治走出小屋并喃喃地说：“为什么没有告诉他呢？”大约过 10 分钟后，校革委会成员许成学走进小屋。坐在凳子上，和坐在床上的我面对面地谈话。许成学向我介绍九大以后的“大好形势”。他说九大以后党对所有犯过错误的人实行宽大政策。例如，绥化县粮食局有一个名叫程方的干部，因为反对文化大革命而写信给毛主席。这种罪行和去年被处决的郝文英是一样的。但这一次程方没有被处死，而是只判了有期徒刑 20 年监外执行。现在程方每天在县煤木站劳动，晚上还可以回家。许成学最后宣布说：“我来是为了通知你：已解除对你的看管！”

“感谢九大！”我说。

许成学说：“其他黑帮在被通知解放时，都喊了毛主席万岁，但是你却没有喊。”

我没有吱声，但是心里想道：“这句口号从我的嘴里是喊不出来的！”

(2)

从 5 月 13 日到 9 月 23 日的四个多月里，我享受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道遥生活。

我仍然住在西宿舍东北角与北过道相邻的那间小屋里。虽然这时校园里空房挺多，但是换房间对我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每天上班时我必需到温室来。现在经常在温室的总共只有五个人：炊事员老路，赶大车的刘尚有，喂马的李洪升，解放了的前黑帮瓦匠刘明新，最后就是这全校唯一的黑帮我了。

我在干活中通常是刘明新的帮手。干的活儿是各种各样的：

打扫校园、修理破桌凳，卸刘尚有从校外拉来的大车的货等等。一次我和刘明新受命爬到东宿舍的屋顶上去换下几块破瓦。我和刘明新发现在这宿舍的屋顶和天花板之间的棚里散放着许多书。这些书都是学校图书馆的，因为图书馆就是东宿舍的两间屋子。在 1966 年和 1967 年图书馆被捣毁，许多书籍被造反的学生抢走，剩下的书籍就被一些人转移到这天棚里。现在我和刘明清又奉命把这些书搬到校园东北角上的一个仓库里。在这搬运过程中我又挑选出了一些对我有用的书带回自己所住的小屋。在所有书都搬进这仓库后，我因为自己有这仓库的钥匙，拿书更方便了。这一下我感觉到这次文化大革命还是给我带来“好处”的。不知道为什么和从什么时候开始，西宿舍所有的房间，包括我所住小屋斜对面工宣队员住的那间小屋，都被腾空了，而且整个西宿舍都没有电了。不过我可以向学校总务处要蜡烛。总务处管这事的老王对我很好，每次都给了我足够数量的蜡烛。于是我每天晚上就在床头后面的桌上点上两支蜡烛，躺在床上看书到 10 点钟。我看得最多的是西方古典文学名著、苏联小说，还有一些历史和地理方面的书籍。我把这些书的大部分读完后又送回那个仓库，只把几本书留在自己住的小屋内，企图据为己有。这些书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纲要》、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苏联历史学家塔尔列的《拿破仑传》等。然而由于我自己后来失去自由，我也就没有保住这几本书。

一般来说，每月 20 元的生活费是能够维持我的生存的，因为我除了吃饭以外什么也不买。有时上一趟街，从储蓄所里取出一点存款，然后进饭馆改善一次生活。现在在学校食堂里吃饭的人很少，卖饭的全福林师傅也不管我是不是黑帮了，也敢把肉菜甚至啤酒卖给我。有的造反派看见了这一情况，没有挑我的毛病，而是乘机勒索他。有一名初中生几次到食堂来吃饭，却要我

为他付钱票。还有那个在 1968 年打过我的王大义，也两次到学校食堂来吃饭并向我要钱票付费。第二次王大义要的还是一元钱，说是还要喝一瓶啤酒。当然不论王大义还是那个初中生都不会把钱票还给我的。赶大车的刘尚有得知这一情况后气愤地对我说：“王大义打了你，你还向他付手工钱吗？”我懂得刘尚有说的在理，但是更懂得如果不给这两个造反派食堂钱票，他们还会给我找更大的麻烦。另一方面，我也找出办法来补偿自己被勒索走的钱：8 月份刘尚有、刘明新和我奉命起出在校园墙内所种的那一公顷土豆。起出的土豆需要送到食堂的储藏室。有几次我在送土豆的路上干脆把两篮土豆挑到自己所住的小屋，把土豆倒到屋角里。这样在一段时间里我干脆不去食堂吃饭，而是在温室对面老路房间的炕炉上熬土豆吃。这样我不但省了一些钱，还省了一些粮票。

我并没有注意在九大结束后的头几个月里，学校里都在干什么。有时学生们和教工们到学校里来搞一点什么活动，有时候校园内则是一片寂静。反正学生们现在是没有在学习。不过现在学生和教工们总没有召开批斗我的会了。在 6 月末我连着几个下午被校清查办找到一间小屋。一个由三四个人组成的调查组找我谈话。这些调查组成员都是绥化县各中学的教师，但是没有一个人是来自一中的。这似乎是一个由县级机关组成的专门调查我问题的小组。这个小组要求我详细叙述自己从小时起直至今天的历史。在我叙述时他们只作记录，偶尔也提一些问题，但是并没有对我进行批判。在这次口述自传之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任何回应。

逗人的是，在 7 月份所有高中（57 至 62 班）和初中（32—37 班）的学生都从学校“毕业”了。当然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是注定了要下乡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运气留在县城。学校饲养员李洪升虽然是工人，他在初中 34 班的独生子李成喜也没有能进

入留城学生的名单。李洪升的老婆跑到学校来找校革委会和工宣队吵了好几架，最后总算是把李成喜安排到县啤酒厂去了。

七八月份又是“暑假”了。整个学校荒凉得就像一片沙漠一样。整个西宿舍除去我住的那间小屋以外都是空荡荡的。西宿舍或许一块完整的玻璃也没有了。在东宿舍的几间小屋里因为住着工宣队成员和一些单身的校革委会成员，所以还保存着几扇完整的玻璃。校园里长满了草，于是就有些邻近的居民，主要是女人和女孩，到这里来打猪草。一天下午我正在小屋里看书，突然听见一个女孩的哭声。我走出西宿舍，看见墙外聚集着一群人。两三个工宣队员拽住一个 18—19 岁的男孩，旁边一个才 13—14 岁的女孩一面哭一面穿衣服。后来我得知这个男孩姓齐，是刚从初中 36 班毕业的学生。他的父亲就是学校南面工农大队的齐队长，他的家也就住在学校校园南边。这个学生今天下午在校园里游荡时，看见这个女孩正弯腰在西宿舍西墙外采猪草，就过来摁倒她意欲强奸。但是他来不及干这事就被工宣队员抓住了。这男孩被交给了“军管”，即县革委会人民保卫部，听候处理。“什么样的学生啊！现在又是什么样的社会秩序啊！”我想道。

报纸用很低的调门报导了美国宇宙飞行员登上月球的消息，还报导了胡志明之死，以及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见。大喇叭广播说中苏双方为了在黑龙江还是乌苏里江上的一个八叉岛的归属又发生了冲突。人们议论说苏联是否会入侵中国。我想苏联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出动了六十万大军，中国的领土和人口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上百倍，苏联要占领中国就得出动成千万的大军，这怎么可能呢？

一天下午当大车回到学校时，跟车的刘明新告诉我说：“聂维被送到军营去了！”我并不认识聂维，只知道聂维是绥化二中的一位音乐教师。不知道为什么他被怀疑成为苏修特务！第二

天早晨我来温室“上班”时，看见刘明新和刘尚有站在温室门口，一面瞅着我一面嘀嘀咕咕地说些什么。然后刘明新对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校革委会谈一谈，让他们把你解放得了！”我回答说：“哪里有这么简单呢？”我并不知道，一次“升级”已经在等待着我了，关于这方面的消息已经传到刘明新和刘尚有的耳朵里了。

9月23日是星期天，正午我正坐在小屋里看书时，校革委会成员王忠厚漫步来到西宿舍走廊。他推开门，伸进脑袋环顾了一下整个房间并问道。“你还住在这里？”“是的！”我回答说。

夜里11点时，我被走廊上的一阵脚步声惊醒了。然后有人敲门，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醒一醒开开门吧！”“你们是谁？”我躺在床上问道。“我们是从县里来的”，那个男声回答说，“你们如果有事，请去找革委会的王忠厚吧，他住在对面的东宿舍里。”脚步声远去了，我继续睡觉。

但是我没睡多久走廊上的脚步声又重新响起来了。门上又响起了敲门声，还是那个男声：“醒醒开门吧！”“怎么回事呢？”我只好起来打开了门。我刚一开门，就有四五个人拿着手电筒冲了进来。其中一人用手电筒直照我的脸并嚷道：“站住”！

这伙人的头头，即两次要我开门的，是一个中年人。他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张轶东”我回答说。

“我们是来搜查你住处的，请你在搜查证上签字！”

我就在手电筒光下在搜查证上签了字。这些人就开始仔细搜查小屋的每一个角落。有一个人甚至从火墙上拆下一块砖，看看我是否把什么东西藏到火墙里了。搜查结束后这伙人的头头说：

“这里只有一些书，你的其它东西呢？”

“我还有一口箱子，在发生武斗时，我把它寄存在喂马的李洪升家里去了。”

这头头对一个人说了些什么，那个人就走了。这就是说派他到李洪升家拿我的箱子去了。最后这个头头对我说：“你穿上衣服到学习班去学习，学习完了再回来！”

我不懂得什么是“学习班”。我懵懵懂懂地穿上衣服，和这帮人走出房门，把房门反锁上，出了西宿舍。

这伙人的头头轻轻地拽住我的衣袖防止我逃跑。但是他又似乎并不相信我真会逃跑或有处可逃。我们在夜色中穿过篮球场和主平房的中厅来到校门口。在校门口停着一辆敞篷大卡车，几个拿枪的士兵们帮助我登上敞篷车并围绕我坐在车上。车一开动，我就离开了我曾经生活过七年的绥化一中校园。当我再回这里时，已经是接近整10年之后了。

许多年后我才得知：作为备战的一部分，1969年9月23—24日之夜，当局在全国开展的是一次大搜捕行动。那个后来在1975年在辽宁省被处决的张志新，也是在这天晚上被捕的。

(3)

敞篷车在夜色中拐了两三个弯，最后进入一个大院并停在一栋中等规模的平房面前。我被告知下车。我要求进入平房之前先小便一次。那个陪我去厕所的头头还逗我说：“你真熊，冻出尿来了！”这时已是9月下旬，夜间的气温的确是比较低的。

这栋平房是东西向的，长约30米，房间都在南侧，北侧是一条走廊。我被领进这栋房西段的一间办公室。办公室里灯光很亮，有一个长头发倒立三角形脸的人坐在办公桌后面。他让我面

对着他坐在门旁的椅子上，在记下我的名字和职业后他问道：

“你知道政府为什么把你找来吗？”

“政府！”我想起 1965 年 3 月绥化县公安局找我谈话的那件事，那时公安人员对我也自称“政府”。那么受询问的人就是“囚犯”了。不过现在对于我来说，这已经算不得是什么刺激了。我只是回答说：

“我有一些言论被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好吧！现在太晚了，你先去睡觉，我们以后再谈！”

这趟房的东半截是被用门锁与西半截隔开的。我被领到这半截的第一间小屋，这间小屋的门也是被从外面反锁着的。这间房与我在绥化一中住的那间小屋几乎一样大小，不过沿着西墙三分之二的面积都被一条长火炕占据了，只有沿着东墙的三分之一是一条宽约一米的过道。在大火炕上有大约十个人排成一排头朝西墙在睡觉，屋里的电灯是通夜亮着的。将我领进屋的那个工作人员唤醒睡在大墙最南端的两个人，让他们腾出从南数的第二个位置，约 80 公分宽的一个地方给我躺下。这时已经是 9 月 24 日早晨大约一点钟。那个工作人员再把这间小屋以及整个平房东半截反锁上走了。我也朦朦胧胧地感到困了，就和衣（再说我现在也没有被褥）倒在腾给我的那一条火炕上睡着了。

一阵电铃声唤醒了这趟平房东半截屋里所有人。这是早晨 5 点钟。于是屋里人声嘈杂，人们纷纷起来穿衣服。我继续躺在炕上，也没有人来叫醒我。有一个人在外面喊：“快点！集合！”于是就有了从屋里走出的脚步声和院里传出报数声：

“一、二、三、四……”。然后就是走步声和口令声：“一二一、一二一……”。这样延续了约 15 分钟，然后又是人们冲进屋子的脚步声。住在这间小屋里的人轮流在屋子中央连结火炕的炉子盖上抓紧时间洗脸刷牙。他们看到了我躺在大炕从南数的第

二个位置上，但是对此并不感到惊奇。有一个人说：“昨夜又来了一个！”接着各屋的人都去吃早饭，然后又集合，不知道往哪里去了。

现在平房的东半截完全肃静了。我起来单独地无所事事地坐在大炕上。我听见这趟房最东端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8点钟以后一个人打开了门锁并喊，“张轶东，出来”！

我被领进与平房东半部相邻的一间小屋，这间屋的大小与我所待的那间小屋完全一样。房间里有四张床，两张沿着东墙，两张沿着西墙。紧挨着窗户台南北向放着一张桌子。一个瘦瘦的穿着军服的中年人坐在桌子西面的床上。这个人的脸呈竖立长方形，戴着副金丝眼镜。他让我坐在靠东墙北边的一张床上。他也自称“政府”，但是和我谈话挺温和。这次谈话只延续了10分钟。从他所说的话中我理解到，我来到这个“学习班”就意味着我的“案件”已经被绥化一中革委会上交到县革委会人民保卫部，也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军管”的来处理了。这个瘦瘦的中年人督促我“彻底交代问题”，以便能作出一个较好的结论。他要求我把自己的问题写出一份材料。最后他问我说：

“你吃早饭了吗？”

“还没有”，我回答说。

“为什么呢？”

“我昨晚才到这里来，不知道这里的生活日程，我连自己的行李和生活用品都没有带来！”

于是他告诉我说所有的生活用品都会被送到这里来的。我可以先住在这里，不用像这里其他的“学员”一样参加劳动。这里有人为我做饭、烧炕。我需要作的事只不过是反省自己的问题和写检查材料。最后他告诫我一定要遵守这里的一切规定。对这里的生活条件，我适应就适应，不适应也得适应。

谈完话之后，一名住在这间小屋里的名叫张超的“学员”（后来我得知他是学员中的“班长”）领着我到食堂去吃早饭。食堂位于这个大院的西南角上，大约有 40 平方米那么大，饭厅里放着四张圆桌。一个年纪大约 35 岁的“女学员”正坐在饭厅门前的一个小凳上用一个大盆洗菜。我后来得知这个女学员姓徐，是因弃夫随情人私奔被抓回送到这里的。由于几乎全体“学员”都吃完早饭劳动去了，现在饭厅里空无一人。张超通过饭厅北墙上与厨房连接的窗口给我拿来上尖的一碗高粱米饭和一碗土豆炖窝瓜。土豆炖窝瓜几乎一点油星也没有。饭桌上还有一碟公用的咸菜。我虽然并不感觉饿，还是把那碗高粱米饭和那碗土豆炖窝瓜都吃下去了。这顿饭吃了半个小时。

张超把我送进我的那间小屋里，但是过不大一会儿他又来到这屋，递给我几张纸说：“这是孙预审员给你写材料用的。你有笔吗？”

“是的，我有笔。”我回答说。现在我明白了那个刚才和我谈过话的穿军服的中年人是一名预审员。我后来得知这个人的全名是孙庆生。从现在起我就得和他打交道了。

张超反锁上小屋门以及整个平房东段的门走了。我手拿着笔在炕上面对南窗户台坐着，把纸放在当桌子用的窗户台上。有啥可写的呢？我只好简单重复地写了一些自己的“罪行”，例如偷听苏联广播和在 1968 年学生批斗我时说了一些什么等。当我写材料时，我听见这趟房的最东端又发出了那个女人的喊声，接着张超就打开平房东段的门跑过去和那个女人嗡嗡地说了些什么。我感觉这个女人的声音对我有点熟悉似的，但是说不出到底是谁。

大约下午两点钟时，张超又打开房门，再次把我领到平房西段与东段相邻的那间小屋里。还是孙庆生坐在桌子后面靠西墙的

床上。对面的床上也坐着两个人，一个人胖胖的，40多岁，一脸的络腮胡子，另一个则是年青人。我把自己所写的材料交给孙庆生后，孙庆生就把材料递给那个络腮胡子看。然后孙庆生突然问我：

“你和宋兰芬是什么关系？”

“她是第三中学的俄语教师，我们曾经交流教学经验”，我回答说。

“你们之间常常交换情报吗？”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

“但是我有证据证明你们之间有过这方面的事情！”孙庆生递给我一张用俄文写的字条，上面写的是：

“张轶东同志：请在星期6晚上6点半来到绥化电影院门口，我们一谈一谈。宋兰芬（日期）”

我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并且几乎笑了出来。这是1965年春天的事。当时绥化县几乎所有的中学教师都知道我和苏联爱人离婚了。宋兰芬与我年龄相仿，曾因在1957年有过言论问题当过右派，至今未婚。她用俄文写了这张纸条，让一名学生给我送来。但是那学生不懂得那纸上的俄文写的是什麼，就耽误了递送。当我收到纸条时，已经是星期一早晨了，因此也就没能去和宋兰芬见面。此外，我也不能就此断定宋兰芬对我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思，只不过把此事作一个插曲而已。我把这张俄文纸条放进所有从苏联寄来的信件堆里。1968年，造反派没收了克拉娃以及从苏联寄给我的一切信件，这张纸也夹在里面被拿走了。显然这些信件连同这张纸条都被送到县人民保卫部了。于是这张纸条被发现，并被看成为两名中学俄语教师之间“传递情报”的证据！

我解释之后，孙庆生自己似乎对此事也感到可笑。他和气地让我回到我所待的小屋。突然间我明白了，从平房东端发出喊声

的那个女人就是宋兰芬！几天之后张超告诉我说，宋兰芬也是在9月23—24日之间的那个晚上被抓进学习班来的，不过第二天下午就放回家了。这大约是因为我作了解释的缘故。

大约在3点钟时张超又领我去吃晚饭。这就是说，不劳动的学员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饭是6两高粱米饭，晚饭是4两苞米楂子粥。晚饭没有菜，只是在饭桌中央放着一盘公用的咸菜。从事劳动的学员的午饭则有专人给他们送到劳动地点。因此这时在食堂吃晚饭的只有8名不劳动的学员，3个女的和5个男的。3个女学员之一就是那个姓徐的，我吃早饭时曾在饭厅门口看见过她。另外两个女学员则似乎是年龄都不到18岁的两姐妹。据说这姐儿俩都是“马子”（暗娼之意）。这时还有一种俗话，即称嫖娼为“挂马子”。

5名不劳动的男学员是：我、聂维、张超和县人民医院的王大夫和赵大夫。除去我以外的这四人个就是住在平房西段东端与平房东段相临那间小屋里的四个人，预审员孙庆生今天就是在这小屋里两次和我谈话的。

我在来到这里前几天，在一中已听到刘明新告诉我说聂维因为“苏修特嫌”而被送到“军管”去了，因此我对聂维这个名字已经熟悉。聂维至少45岁，中等身材，穿一身黑色中山服。他剃的是平头，一部分头发已经呈灰白色。后来我得知：聂维是绥化县本地人，早在1946年当苏联军队从中国东北撤退时，聂维被苏军带到东西伯利亚的赤塔市，在那里呆了半年并“接受了某种训练”。聂维回到绥化县后就当上了绥化二中的教员，但教的不是俄语，而是音乐。聂维在从教20多年中并没有出过任何言论或行为方面的问题，但是他到过西伯利亚和“接受过某种训练”仍然招来当局的巨大猜疑。聂维始终沉默寡言，预审员也很少提审他。当预审员提审那些新来的破坏治安的学员时，聂维往

往充当记录员，并负责事后将记录整理好送交预审员。在白天聂维往往得把那些不劳动的学员（主要是女学员和有病的学员）聚集到平房东段中间的大屋里“学习”，聂维扮演教师的角色，读报给这些学员听或教他们唱颂扬毛泽东的歌曲。聂维在县城有家，他的女儿常常来看他或送点什么东西。我心中虽然同情聂维，但是明白这两个“苏修特嫌”之间的任何接触都会是不得了的事，因此始终和他之间保持距离。聂维当然懂得这一点，也自觉躲避我。于是我在社会学习班呆过的五个月中，我和聂维之间没有说过一句话，我们甚至在走廊上相遇时互相也不点头。聂维在社会学习班待的时间很长，我被捕和判刑后他还在那里。1979年，当我平反出狱回到绥化县时，得知聂维已病故几年了。

张超是绥化县太平公社的干部，因为盗窃而被抓来，年约30岁。他和两名大夫算是学员中的三个班长，他是第一班长。

王大夫和赵大夫是在7月份时因为医疗事故到这里来接受隔离审查的。王大夫身材高大，是县医院的外科主任大夫。赵大夫中等身材，是一名内科大夫。他们两都微胖。王大夫是辽宁人，有东北人的直率性格。赵大夫是上海人，似乎有点善于看风使舵。二人中我和王大夫的关系比较密切。赵王两大夫加上张超三位学员班长负责管理平房东段的监狱区。这监狱区共有三间房，最东面的一个小屋是女监，中间是一间大屋，西端就是我所在的这间小屋，这两间都是关男学员的。这三间监房房门的上半截都是一个十字形的玻璃窗，但这十字形的四格中只有三格镶上了玻璃，一格没有玻璃，为的是让班长们不时伸进头来看看这屋里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三位班长轮流值班，拿着三个监房以及整个东段门的钥匙。此外，还有一名劳动班长，每天带领学员劳动队外出，监督他们劳动。

还有一名不劳动的男学员，他今天吃晚饭时没有到饭厅来，

但中午当我在小屋里写材料时他曾来取他的东西。这是一个大约还不满 18 岁的男孩，名叫王敏。当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刚爆发时，王敏是绥化二中初二级的学生。王敏生母早死，父亲再婚，他和继母之间的关系很坏，这可能导致了他非常任性。1968 年王敏不知道为什么拿起气枪往毛泽东肖像射击，为此被判了五年刑。县人民保卫部考虑到他年龄幼小，就没有把他往劳改队送，而是把他留在社会学习班当作一个小杂役使用。王敏的主要任务是每天中午给劳动的学员们往劳动地点送饭，有时也跑跑街上为某一位管教员买一包烟卷什么的。王敏占据了这间屋大炕的最南端，因为那里挨着窗户、明亮，窗户台还可以当作桌子用。没有活时王敏可以上街溜达，偶然遇到好吃的东西时他就不到食堂来吃学习班的饭了。这几天正值国庆 20 周年前夕，王敏幻想当局会不会像 1959 年国庆 10 周年时那样也来一个大赦，那他也能被赦出去了。但是国庆前后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发生，王敏始终为此嘟嘟囔囔的。

下午 5 点钟时，学习班的主体，即劳动的学员们回来了。当他们排着队在街上走时，市民们简单地指称他们为劳改队。我先听到整齐的脚步声进入大院，还伴随着“一二一！一二一！……”，“立正！”“稍息！”“解散！”的口令声。接着就是 30 多人拥进东段。这都是年龄在 18 至 55 岁之间的男人。他们大多数住在中间的那大屋里，但也有八九个人住在我所住的这间小屋里。他们今天早晨就知道我的到来，但只是到现在才有工夫和我说话。看来张轶东这个名字对他们也是耳熟的。他们几乎都是因为破坏社会秩序而来的，例如打架斗殴、赌博、诈骗、盗窃和两性关系等。劳动队的领队班长辛连城是一个流氓头子兼大赌家。可以说住在这小屋里的几个男学员较之住大屋的那些人算是一等学员了。这间小屋的居住者，除我、王敏和辛连成以

外，都或是在县城里有工作单位，或者是由于某种原因和学习班的行政管理认识，因而被安排进这间小屋的。

使我大为惊奇的是：有两次从小屋门上方无玻璃的窗格伸进一个脑袋，并大叫了一声：“张老师”！这是两名绥化一中过去的学生。第一个学生叫银铁民，是高中 40 班的学生。我并没有教过银铁民，不过在 1963 年一次校园劳动时曾经领着他劳动了一上午，那天下午银铁民不知为何不经请假就不来劳动了。我后来把这情况告诉高 40 班的班主任冯博文，冯博文笑着说：“这个学生一贯很滑！”银铁民学习并不差，但是 1965 年从绥化一中高中毕业后并未能考进大学，就回他的老家绥化县四方台公社务农。据说他是因为盗窃而进来的。另一个学生就是初中 36 班那个姓齐的学生，今年秋天在校园内因为企图强奸一个小姑娘未遂而被送到这里来的。这两名过去的学生看见我一点都没有显出羞愧之意，而我却为他们和绥化一中感到很沉重。

傍晚 6 点时有一次集体放风，所有学员排队前往大院西墙旁的厕所。这以后大家就集中在中间的大屋里进行“晚间学习”了。我作为一个“特殊学员”倒是不用参加这种学习。我一人坐在大炕上，听见从大屋传来赞颂毛主席的歌声和聂维读报的声音。这时张超又走进小屋说：“张轶东，来取你的行李！”

我跟着张超走进平房西段的办公室，昨天夜里就是在这间屋里一个倒三角形脸长发的中年人讯问过我的。但是那个人现在不在这里，而是一个矮矮的年约 30 岁的女人站在屋子中间。后来我得知这个女人名叫刘淑珍，是绥化县尚志小学的教师，被借调到这里担任会计、储藏室保管员并管理女学员事务。我的大皮箱这时正立放在屋门旁，箱子旁边一堆被褥，衣服和日用品，连我的大洗衣盆也拿来了。刘淑珍指着那一堆东西说：“这些东西你可以拿回你的房间去。箱子必需放进储藏室。现在你往存物单

上签字吧！”

存物单上印着的标头是：“犯人存物单”！这意味着从现在起我的确是一个犯人了！

但是算是哪一种犯人呢？几天之后，我对这个“社会学习班”才算是有了一个概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政府、法院和检察院是相互独立的，公安局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部门而已。但是早在 1967 年，全国的公检法都被砸烂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人民保卫部实际上是把过去的公检法溶为一体，它对人民可以没有任何限制，为所欲为了。

绥化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的主任叫尚学昆。还有两个副主任。一个叫江东雪，就是 9 月 23 日晚上领人去绥化一中把我领来的那一位。另一位副主任叫陈有，就是当我来到这里以后在办公室里讯问我的那个倒三角形脸长头发的中年人。

所谓“社会学习班”就是现在绥化县的第二拘留所。这显然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秩序恶化所引起的，在全国每一城市可能都有这么一个玩意儿。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愈来愈多，县拘留所已经容纳不下了，所谓的“社会学习班”就应运而生。现在扰乱社会秩序者被分为两等。明显犯法的人被送进拘留所，那就是正式的犯人了。那些违法行为比较轻微，或其家庭在县里有什么背景，或者与县人民保卫部的某人认识的，则可以送到这个“社会学习班”。进拘留所的人与“社会学习班”的学员之间还有一点不同：一个人哪怕在拘留所里只呆了一天，这件事就要写进他的个人档案；但是一个人不论在“社会学习班”呆了多久，也不会记载入个人档案的。这对于一个人的前途显然是影响不小的。

但无论如何，“社会学习班”的建立总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一种不合法的限制。实际上限制公民权不是文化大革命

才开始的，而是早在反右派斗争时就开始了。1957 年劳动教养制度的建立其实就是侵犯人权的。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不经判刑把他（她）送去强迫劳动，劳动单位可以随便说你被教育好没有而决定这个人的劳动期限，这符合公民权吗？至于拘留制度，法律规定只能拘留 24 小时，然后或是无罪释放，或是正式逮捕听候审讯和判决。但是在 1957 年以后，将人拘留到 48 小时以后，甚至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情况是很多的。但是这些侵犯人权的事，较之文化大革命以来全面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行为，毕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现在再谈谈这个所谓的“社会学习班”吧！它位于绥化县城南二道街的南侧，面对县第三百货公司的背面。这是绥化县农田机械厂的大院，现在该厂把大院的南半截，实际上只是一趟平房和西南角上的食堂，借给了“社会学习班”使用。正如前面已经说过，这趟平房的东段是监房区，由两端的两间小屋和中间的一间大屋组成。平房东段也是由两端的两间小屋和中间的一间大屋组成，是行政管理区。东端的小屋住着三位学员班长和聂维，中间的一间大屋是办公室，最西端的一间小屋是储藏室，存放学员们的物品或赃物。

虽然学员的人数一般不超过 40 人，行政管理方面却有 10 人之多。行政头目名魏晓序，大约 35 岁，个子矮矮的，说话的声音很尖。他一度当过绥化县看守所的所长。魏晓序嗜酒，常常在学习班食堂吃晚饭时喝醉，然后兴冲冲地来到平房东段中间的大监房，向正在进行“晚间学习”的几十名学员“训话”。除去会计刘淑珍以外，还有六名管教员参与管理这些学员。这六名管教员都是中年男子。其中王管教员和郭管教员负责每天押送学员们外出劳动，收工后把劳动队领回大院他俩就可以回家，不管学习班里的事了。另外的四位、田管教员、梁管教员，何管教员和关

管教员则是在学习班里昼夜值班的。看来他们中间田管教员是仅次于魏晓序的第二把手。我感觉田管教员、梁管教员和何管教员都是比较和善的人。关管教员是一个矮个子，一脸严肃，沉默寡言，似乎显出他的阶级斗争觉悟特别高似的。

最后的两人则是两名炊事员。根据国家规定，每 30 名就餐者配备一名炊事员。学习班的学员加管理人员约 50 名，配备两名炊事员倒也说得过去。不过为学员们做饭的确是太简单了：一成不变的高粱米饭，白水煮菜，苞米楂子粥和大咸菜。此外，女学员们常常被派到厨房清扫或洗菜等。这两名炊事员似乎没有多少事情可干了吧！其实不然，他们的工作还有另一个不太简单的方面，即伺候好行政人员或来自县人民保卫部的某些人的吃喝。不仅学习班的当家人魏晓序好酒，其他管教员也是食不厌精的。县人民保卫部的江东雪、陈有、孙庆生等人还常常到这里来提审学员或“视察工作”，接着就留在这里吃饭，当然不是吃高粱米饭或喝大楂子粥了。这么一来，这两名炊事员就有事情可干了。

学员们的伙食费，尤其是行政管理人员的吃喝费用从哪里出呢？像我，两位大夫和聂维等有工作单位的人，每月必需向学习班交出全部粮票（30 斤）和 12 元伙食费（每天四角）。其实这时高粱米和苞米楂子每斤价格不超过七分钱，土豆和白菜每斤价格不超过两角钱，每人每天的伙食费不可能超出两角钱。那么剩下的两角钱到哪里去了呢？此外，每人每月的口粮里应该有 8 斤大米或白面，但是直到新年为止，我没有在饭碗里看到一点细粮。白水煮菜里当然没有一滴油，可是每人每月的口粮里应该是有半斤豆油的呀！一次一名学员悄悄地告诉我说：“我们的油和细粮都被管教们吃了！”

从农村抓来的学员必需从家里带粮食来，是否交钱则不得而知。城镇居民学员则必需向学习班交出他们全部的粮票。但还有

一些学员是在绥化县境内犯案被抓的外地人，身上既无粮票又无钱。怎么填补学习班伙食和其它开支的缺口呢？其实很简单，学员们的劳动嘛！每天总有大约 30 人的劳动队到某一工厂或工地干活。尤其到了秋天，到处都需要人手帮助秋收和防寒。劳动收入当然进不了劳动者的口袋，而是归学习班所有了。这劳动收入不仅弥补了伙食费的缺口，还能供行政人员吃喝。

从苏联回国 10 年有余和在一个中学校园生活 7 年之后，我掉进社会渣滓堆里了。仅仅现在我才懂得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是怎么回事。这些学员们因为不同的“专业”而有不同的称谓。前面已经说过暗娼被称为“马子”，现在还有掏兜儿的被称为“提篓”，偷自行车的被称为“蹬小轮的”，专门在火车上掏兜的被称为“蹬大轮儿的”，专门在商店偷商品的称“高买”，专门在医院门口等卖血的被称为“挑线儿的”。“挑线儿的”人卖完血就拿钱去饭馆喝啤酒“充血”，然后再上医院门口卖血。这些人有时在医院门口为了争着卖血而互相大打出手。他们中间有些人还因此认识现在也在学习班的王大夫和赵大夫。这些社会渣滓们搞到钱在一块儿吃喝抽烟时就称之为“吃票”，谁犯案当场被捉就称之为“掉脚”。有一首顺口溜是专门描写这些人的：

“毛蓝裤子海军衫，
翻毛皮鞋白鞋带，
不是马子也是破烂，
不是提篓也沾点边！”

还有一道顺口溜描写这些人集合起来时的生动情景：

“辛班长，把哨吹，
提篓，马子一大堆，
立正，稍息站好了队……”

在学员们的“晚间学习”中有时也搞学员斗学员，也想出一

些整人的花招。例如夏天把炉子烧热了，让你坐在炉盖子上，或让你喝糖水，盖上两层被躺着。或者点上 100 瓦的大灯泡，命令你瞪着两眼望着灯泡不许闭眼等。不过这些整人方式较之各中学里学生整黑帮，还是缓和一些。

社会学习班的主体是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的：老学员离开，新学员进来。老学员离开这里有两个方向：“毕业”，即释放回家，或“升级”，即被送进拘留所或劳教单位。

“毕业”意味着你的“问题”弄清楚了，你在学习班的“学习”结束了，因此你就可以回家了。在 10 月初时那个姓徐的中年妇女和那两个小女孩都“毕业”了。在她们走的前一天晚上，学习班甚至举办了晚会，大家唱颂扬毛泽东的歌曲，赠送《毛主席语录》欢送他们。

那两名绥化一中过去的学生都“升级”了，而且级别不同。银铁民和另外几名年轻学员被送到绥棱县的一个劳教队。在离开的前一天他们不需要参加劳动，于是整天坐在中间大监房的大炕上大声唱歌以发泄他们胸中的悲哀。第二天一早一个管教员就来把他们领走了。那个在绥化一中校园内企图强奸小女孩未遂的姓齐的初中生则被送进拘留所，接着就判了五年刑，监外执行，于是又回到家，在他父亲当队长的那个工农大队劳动改造。

虽然原来的三名女学员都走了，最东端的那一间小女监并没有空出来。后继有人嘛！新来的三名女学员年龄都在 30 岁上下。第一位是一名新来的男学员的妻子。这对夫妻是本县某公社的社员，据说是偷了生产队场院里新收的粮食而被送进来的。第二名女学员犯的事则和那位姓徐的中年妇女相同：她是一个生产大队队长的妻子，因弃夫随情人私奔而被抓回来。第三名女学员则更有意思，她是一名暗娼，而且有一定的价钱，即：干一次五块钱。为此她有一个绰号，叫做“老五块”。有时从东端小屋爆

出女学员们之间的叫骂声：

“你这个老五块，不要脸！”

“你是个老十块，你更不要脸！”

另外两个房间的男学员们则以“收听”她们叫骂为消遣了。

11月初的一天晚上所有学员们都就寝了，张超和两位大夫却来到我的小屋在炕沿上坐下。据说又抓来一名暗娼，田管教员和关管教员正在他们住的那间小屋里审讯这名“小马子”，聂维作记录，他们三人必需暂时腾出小屋到这里待一会儿了。既然那间小屋和我住的屋中间只隔一堵墙，我这间屋里的人都能清楚地听到在那间小屋内发生的一切。在管教员们叫喊声的威逼下，这个小女孩承认说她15岁时就和她的姑父之间发生过性关系，然后又一茬一茬地交代她与“顾客们”之间作过的“买卖”。我小屋这边的人们躺在炕上一边听一边乐。第二天吃早饭时我见到了这小女孩。短发，又黑又瘦，她的身材是如此之矮，用张超的话说就是“还没有三块豆腐高！”

我所住这间房走了三个而又来了三人。一名新学员姓郭，曾是绥化铁路机务段的一名火车司机，外号“郭大车”。他因为赌博被绥化铁路部门开除，开除后还继续赌，就被“请”到这里来了。另外的两名学员则是外地人。一个是山西人，是一个“高买”。另一名是广东人，是一个惯偷，人们记不住他的名字，就称他为“老广”。这两个人都是四海为家，他二人之间也常常交流自己的“光荣历史”。

新学员中又出现了两名绥化一中过去的学生。一个就是初中35班的周炳岗，他在春节期间曾诡称能买到不要粮票的烧饼而骗去我两元钱。我不知道周炳岗是因为犯什么事而被送来学习班的，我认为像他这样的学生被送到这里来是早晚的事。后来从街道上批斗周炳岗大会的大喇叭中我听见说周炳岗已经是绥化县城

里的“南霸天”了。另一名学生叫郑宪民，初中 26 班的学生，是从绥化二中转到一中来的，我也不知道他被送到这里来的具体原因。他们两人都对自己的行为毫无羞耻之感，反而不断地炫耀自己。周炳岗吹牛说他读过不少书。郑宪民则老是说 1967 年上海“一月风暴”时他正在上海串连，他在造中共上海旧市委的反时有过些什么“英雄事迹”等等。周炳岗后来被送进了劳教队。郑宪民则在社会学习班里呆了很长的时间，几年后成为了我在黑龙江省第三监狱的“同犯”。我们在监狱俱乐部看电影时见了面，但两人分属不同的大队，这是后话。

所有的学员都是社会渣滓。一次我对王大夫说：“准确地说这个地方不应叫作社会学习班，而应当叫作社会油子学习班！”

只有聂维和我两人是因为政治问题而到这里来的。我们不是正式学员，而是被“寄存”在这里的。我在这里不用参加劳动和学习，只是“反省”。每个月的 8 号或 9 号那天绥化一中的王会计来这里给我送来当月的 20 元生活费和全部粮票。刘淑珍扣下 12 元钱和全部粮票作为我当月的伙食费，余下的 8 元给了我。除去买肥皂、牙刷、牙膏等以外，我身上还剩 6 元左右的零花钱。由于整月地只吃高粱米，大楂子，白水煮菜和大咸菜，我感到身体缺乏营养，就想用这 6 元买点好吃的东西。但是我不能出监房，就得请有条件上街的别的学员为我办这件事。这样一来，又给了一些人骗我的机会。有的人真的为我从街上买来了一些糕点，但是另一些人拿了我的钱却什么也没有买回来，说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等等，一直到他们离开学习班为止。有一个瓦匠老曾头是因为两性关系问题而进来的，常常被派到管教员家去修火炕。他从我那里拿了两元钱和饭盒，说是要给我带一些好吃的东西回来。但是他只在饭盒带回来一点点大米饭和几片肉，估计超过不了五角钱。老曾头说那肉是猪头肉，但是我吃了一块感觉不

是味儿，就请同屋的另一位学员也尝了一块。那人咬了一口就说这是牛下水。我是不吃牛羊肉的，因为受不了那种膻味。我连忙跑到厕所，把自己刚吃下的东西吐出来，把饭盒里的东西都倒进粪坑。还有一个外号叫“李大牙”的，是新华公社的农民，因为打架斗殴而来，在学习班呆了几天就“毕业”了。他在“毕业”前从我那里拿走5元钱，说是可以给我送一些大米和鱼来，我可以在这间屋里炕炉子上煮吃。但是“李大牙”“毕业”之后就无影无踪了。

到11月末时有两个学员班长也离开了学习班。第一个是张超，他“升级”去了拘留所，几天之后就被判处盗窃罪有期徒刑5年监外执行，于是就回到了自己所属的太平公社。张超回家后不久来过一趟学习班，看样子还很高兴似的。第二个是劳动班长辛连城“毕业”回家了。但是在他“毕业”之后不几天，传来信息说，他在离绥化县城不远的的一个农村聚赌，县人民保卫部的工作人员闻讯后骑马去抓他，却不知辛连城从哪里得到消息提前逃跑了。这时又抓来一个名叫冯金贵的流氓头子代替辛连城当劳动班长。冯金贵年龄大约40岁，个子矮矮的，满嘴不离脏话。

孙庆生大约每个月来审讯我一次。他通常先问我在这段时期中写出了什么交代材料没有。我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写，每次只能交出两三页的思想汇报。孙庆生对此不感兴趣，有一次他问道：

“我听说：你对人说过，你有一次到过苏联的一个机构”。

“我到过苏联的许多机构嘛！”我回答说。

“当然你到过苏联的许多机构。你如果要买一张火车票，你就得去火车站，这也是苏联的一个机构吧！但是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对于这些捕风捉影的事无言可对。

11 月末时，孙庆生给了我一些白纸并说道：“拿去写吧！”

“但是我应该写什么呢？”我问道。

“两件事：第一，你整个在苏联时期的经历；第二，和你有过来往的苏联人，尤其是你回国之后继续与之保持过联系的苏联人的情况。”

这的确是两份大材料，我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写成了这两份系统性的大材料。当我把这两份材料交给孙庆生后，他说：

“现在你的问题已经清楚了。政府将要怎么处分你，到时候是会告诉你的。”

我还没有意识到我自己现在已经处于一种多么严峻的形势之中。我被定为一个反革命分子是早已确定的了，仅仅 1968 年我所说过的那些话就足够了。现在孙庆生让我写这份材料只不过是最后地鉴定一下我到底是不是一个苏修特务而已。现在在林彪发出第一号作战命令之后，全国各地，尤其是在与苏联交界的黑龙江省，火药味很浓。据王大夫告诉我说，国庆 20 周年时，北朝鲜对派不派代表团来中国始终犹豫不决。最后崔庸健率领的北朝鲜代表团是在中国的国庆宴会结束后才到北京的，周恩来不得不为他们又举办了一次国宴。这说明中苏之间战和未定，国际形势微妙。许多年后我被释放回绥化时，有人告诉我说：那时黑龙江各县都得拟“危险可疑人物”的黑名单，一旦苏联军队过境，黑名单上的人就将被立即处决。当然在绥化县的黑名单中是有我的。学习班里还搞过一次防空演习，管教员们逼着学员们进菜窖里躲空袭，叫道“都往里跳，摔死一个少一个！”

而整个 12 月份，我在社会学习班里却是过得很平和。现在我和学习班的行政人员之间已互相比较熟悉，和两位大夫之间更是比较密切。在白天时他这间小屋甚至平房东段的门往往不上锁，我可以自己去厕所。在冬天谁都希望把炕烧得热一些，但是

学习班的煤发热量不大。学习班只是农田机械厂大院的一部分，在从学习班平房到厕所之间的路旁正好有一堆该厂生产用的焦炭。许多学习班学员往往去厕所时带着一个空盆子，回来就装上一盆焦炭。工厂看院的老头发现时大声喊叫，他们就端着一盆焦炭快跑回学习班平房。把焦炭倒入炕炉之后，大炕和整个房间就热乎起来了。时间长了，我发现在这个农田机械厂里也有绥化一中过去的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初中 37 班的王希奇。王希奇因为家庭出身好，就没有下乡，而是到这个工厂当工人来了。王希奇发现我在社会学习班后，就常常在工作时间跑到我的小监房来找我聊天。这使我感到现在农田机械厂的劳动纪律也是乱糟糟的。说不定现在全国到处都是这样吧！

我是一个单身汉，对学习班的环境又已经熟悉，我已不感觉自己现在在这里是一个“寄存犯人”，而是一个“居民”了。每逢星期六我就把炕炉子烧热，把我的大洗衣盆盛满水放炕炉上烧热，然后洗澡洗衣服。我不在乎我还得在这“社会学习班”呆多久，我将以“毕业”还是“升级”的形式离开这里等等。我不知道：一个重大的“升级”的确已经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大门口恭候着我了！

第十五章 1970 年 新肇监狱集训队

(1)

元旦早晨，我在社会学习班食堂吃到的是三个白面馒头，每个二两，共六两面，菜则是有几片猪肉的菠菜汤。晚饭是四两大米饭和一盘白菜炒猪肉。春节初一我吃到的两顿饭也和这完全一样。因此我呆在社会学习班的四个月里总共也就吃到这么四顿好饭。有些在小号（即看守所）待过的学员说，看守所里的犯人们节日期间比社会学习班的学员们吃得好。我不知道这是否属实，不过我亲自验证这一点的时间快来到了。

春节前的一天晚上，学习班在中间的那间大屋里举行了忆苦会。学习班主管魏晓序在食堂喝醉了酒，来到会上向全体训话大叫说，“如果没有毛主席我早他妈的完蛋了！”

二月份春节后，气氛变得紧张了。有些出外工回来的学员说，他们看见大街上贴出了这样的大字块：“打一场一打三反的人民战争！”，“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坚决反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我心中感到有些紧张，但是还没有将这情况和自己联系起来。

包括“老广”和“高买”在内的几名学员“升级”到小号去了。同时我感到学习班的管教员们开始对我不那么和气了。梁管教员被调出，新来的管教员是那位在 1965 年曾经传讯过我的前公安局冯科长。据说冯科长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因工作中的错误被打成黑帮，九大之后被解放，现在被调到学习班工作来了。一个星期六我正在屋里洗衣服时，冯科长走进来拉长脸对我说：

“你在这里不能什么都搞，你应该好好反省，每周写一篇思想报告！”这是什么意思呢？

学习班主管魏晓序平常只对那些社会渣滓们吹胡子瞪眼睛，和我之间有时还开点玩笑。但现在他对我也变脸了。有一次我在和赵大夫谈话时说：“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究竟算一个什么玩艺儿，说不定魏所长也说不清楚。”不想第二天晚上那个负责烧炉子的学员来到我跟前说：“魏所长找你！”我来到平房东段与西段监房相邻的班长室，看见魏晓序躺在西南角的床上，一身酒气。魏晓序一看见我就叫道：

“站住”！

我站住，魏晓序问道：

“张轶东，你最近说了我的什么坏话吗？”

“没有呀！”我回答说。

“没有！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要知道你就是反革命。你不许再搞反革命活动了，回去吧！”

我莫名其妙地回到我所的小屋。我不懂得魏晓序这么对我嚷嚷是什么意思。第二天王大夫对我暗示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过了两天王大夫干脆直接对我说：“赵大夫！”哦，为了改善自己在这里的境遇，赵大夫就向魏晓序汇报了我说过话。黑帮互相汇报言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常见现象。我还没有意识到，魏晓序这是告诉我说，我已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不久就要对我采取措施了。

2月24日晚上的学习被变成了对学员们的训斥会。关管教员对学员们大喊道：“你们不要以为人民政府对你们这些流氓歹徒就没有办法了！”我怀疑这是否是因为学习班对学员们管教宽松而受到了上峰的批评。突然我也被叫到中间的那间大屋去参加学习。魏晓序宣布说：“从今天起你也得参加学习。”这又是什么

意思呢？

第二天早饭时，我刚领完自己的一份饭后，有一个人喊道：“张轶东，郭师傅给你两块窝头！”我就回到取饭窗口，从炊事员郭师傅手上拿来两块窝头。我不明白，在管教员在场众目睽睽之下，郭师傅给我两块窝头是什么意思呢？我吃完饭把这两块窝头带回小屋还没有开始吃时，冯科长走了进来并对我说：

“穿上衣服吧！学校要你回去一趟。”

有两名学生在学习班办公室里等着我。我不认识这两名学生，因为他们已经是 1969 年秋后入学的了。又使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两名学生把我领出农田机械厂的大院以后，并没有领我向南走向绥化一中，而是向北穿过一个胡同走向县城中心区，然后稍微往西拐一拐来到绥化电影院。电影院里人声嘈杂，看样子来的可能不只是绥化一中的师生，可能还有本县一些其它学校的师生。我被领到后台等了一会儿，胸前被挂上写有“反革命分子”这样的一块木牌，我的名字被故意倒写并打上了红叉。接着就听见主持会议的人宣布：“批斗反革命分子张轶东大会开始！现在把反革命分子张轶东带上来！”我听出这是绥化一中语文教师张树田的声音。两个学生就把我领到会场，命令我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腰手往后翘，面对群众站着。发言的人都是绥化一中的教师，他们揭发我一贯反动，偷听苏修广播并散布其观点，文化大革命中我疯狂攻击毛主席。与这些发言同时，会场上经常响起群众的口号声：“打倒反革命分子张轶东！”，“强烈要求绥化县人民保卫部逮捕反革命分子张轶东！”我倒是早已习惯于这种气氛了。但是最后主持会议的张树田宣布说：

“现在，由绥化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主任尚学昆同志讲话！”

“革命群众已经揭发出反革命分子张轶东大量的犯罪行为，

我们也掌握了许多有关张轶东反革命言行的证据。现在我宣布：对反革命分子张轶东依法拘留！”

早在会前就有两名人民保卫部的工作人员站在会场内，于是他们拿出手铐走向我。把我的手铐起来很容易，因为在挨斗状态中这两只手就是在背后向上翘着的。我听见会场上起了哄哄声，这是因为有的人从座位上站起来观看我被铐的情景。坐在后排的与会者对他们叫嚷道：“坐下！坐下！”

会场外的天空是晴朗的。从电影院到看守所只需要走大约十分钟就到了。两个人民保卫部的工作人员在押送中并不担心我会逃跑，因为我的手是被背铐着的。他们甚至在路上遇见熟人时还站下来聊天。看守所的大门这是第二次“欢迎”我了。1965年3月我曾经作为“客人”来到这里，现在则是作为“居民”来到了！

看守所的接待室位于大门里的一侧。人民保卫部的两名工作人员从我的背上摘下手铐后就走了。在接待室办公桌的后面坐着一位管教员，1965年我来这里时就见过这位管教员。他年约35年，体态稍高，说话为河南省口音。后来我得知这位管教员姓向。向管教员在登记我的姓名之后问道：

“你犯了什么罪呀！”

“说我是反对毛泽东思想了，”我回答说。

“那你就是反革命了！”

向管教员命令我举起双手，对我进行了搜身。他收走了我的眼镜、手表、一点钱、粮票和裤腰带，我只好一只手提着裤子站着了。向管教员递给我一块4×5公分的小木牌，木牌上烙上“134”这个号码，并穿着一根长约一米的麻绳。向管教员命令我把这块木牌挂在自己的胸前，然后说：“走吧！”

看守所是一座东西向大约20×50米的大院，包括两趟平

房。外面的一趟平房是管理区，里面的一趟平房是监禁区。两趟平房之间有一块宽约十米的空地。院墙高约十米，上面有电网，四个角的岗楼上都有卫兵。监禁区南墙的中间有一道门，进门后沿着北墙是走廊。沿着墙的是监房，东西两段各有三或四个监号。一名解放军战士沿着走廊来回地巡逻。

向管教员对我说：“你在这里必须遵守监规，不然的话我就给你戴上手铐脚镣！”接着他打开东段从西数的第二个监房的门，把我往里一推说：“进去吧！”

(2)

我进入的这个监房大约为 3×6 米大小，即和我在绥化一中以及社会学习班所住的屋一样大。屋里没有炕，而是此屋和西面邻近的那间屋之间有一道火墙，火墙南端连结烟道，在这两屋北墙与走廊联结处有一个炉子。南墙上有两个带铁栅栏的大窗户。南墙跟前两个窗户之间约一米高处有一个小便池。小便池西侧立着一根水管，水管是从地板下接过来的，水龙头也在离地板约一米高处，从南墙处往里拐约 30 公分长。不过在冬天水管冻了不出水，犯人们只能靠炊事员给的那点水来维持生存。窗户下小便池旁还有一个大便桶。我后来得知每天放两次风，厕所就在行政区与监禁区之间空地东端的墙根下。通常每天是值日负责在放风时倒大便桶并将其刷净，但如果谁不等放风就往便桶里拉过尿，那就得由他自己来倒和洗刷便桶了。监房的地上铺的是木质地板，据说下面有一空层通风，以便于保持室内干燥。监房的门位于北墙西侧。在北墙东侧离地一米半处有一个约 30 公分见方的小窗户，卫兵和看守所人员可以从外面打开窗户观察监房内犯人们的动作。

监房内有 14 个犯人，七个人靠东墙，七个人靠西墙。他们都是盘腿坐着，行李卷在身后。我被安排坐在东墙从北数的第三位。我刚坐下，就发现“老广”正好在对面向我点头哩！每名犯人胸前都挂着一块印着号数的小木牌，这是因为不能让犯人互相知道名字，他们之间只能以号数相称呼。我看见在尿池的上方有一块大木板，上面写着所有犯人必须遵守的八条监规。监规的第一条是所有犯人都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接着就是犯人们必须认罪服法。然后而就是必须保持监房的肃静和清洁。犯人之间严禁互通案情和传授犯罪手段。有一条监规是我没有立马理解过来的：犯人之间不许计较生活小事。这是什么意思呢？不过过几天就明白了。

下午三点钟，北墙东侧的小窗打开了。值日的 87 号，正好是靠东墙最北面的那个犯人，连忙站起靠向窗户。一名炊事员递给他一叠搪瓷碗和一把筷子。最上面的一个碗里盛满了咸萝卜条。87 号发给每人一个碗，碗里有二或三根指头大小的咸萝卜条，以及一双筷子。接着监房门打开了，一桶玉米面粥带一把勺放在北墙里门旁。这就是晚饭了。87 号按顺时针方向给每个犯人往碗里盛了一勺玉米面粥，一勺正好一碗。桶里的粥够给每人盛三勺，略有余。每个犯人在接到第一碗粥后必须赶紧吃完，以便腾空了碗接第二勺粥，第二勺粥也必须赶紧吃完以便腾空碗接第三勺粥。最后 87 号就把桶里剩的那点粥分给每人一小口。新来的我因为自己情况突变并不感觉饿，就申明自己放弃最后的那一口粥，这点倒是很受众人欢迎。饭后所有的碗和筷子以及那把勺都被放入空桶，放到北墙里边靠门处。

接着小窗户又打开了，炊事员拎着一个大水壶站在那里。犯人们挨个儿地拿着自己的茶缸到小窗户跟前领取开水。他们的茶缸大小不一，茶缸愈大能得到的开水就愈多。新来的我没有茶

缸，就赶紧从门旁的空饭桶里抓了一只空搪瓷碗接了一碗开水。水很烫嘴，我也得连忙喝下把碗放回空桶，炊事员送完水，打开各屋的门就把空桶拎出去了。

在走廊西段不断地有开门声和脚步声，有的还带有铁镣子的声音。靠西墙坐的人看见有人头从外面空地上向东移动，就说：“放风了！”接着这些人头又向西移动，脚步声、西走廊上开门和关门的声音传来，由西向东。最后我所在的监房门打开了，向管教员站在门口，手中拿着钥匙。犯人们站起来成一行走向厕所。刚走出监舍区平房时，我看到四个角塔楼上的哨兵都在注视着走动中的犯人们。向管教员向我喊了一声：“低头！”我赶紧低头。因为监房内有尿池，多数犯人放风中是无事可作的，但也得在厕所旁低头站成一排等那两个蹲着大便的人完事。然后他们又排成一行走向监房。向管教员锁上门又去给东面各屋的人放风去了。这是每天的第二次放风。

不久监房的门又打开了，门口站着的是一个穿着黑色中山服年纪约 50 岁的矮小老头。后来我从别的犯人处得知他就是本看守所的孟所长。孟所长指着我说：“你来！”我就一只手提着裤子跟着他又来到接待室。接待室的地上放着从社会学习班拿来的我的东西，唯独没有看见那一个大洗衣盆。孟所长让我在犯人存物单上签了字，然后拿着自己的卧具，换洗衣服、牙刷牙膏和毛巾肥皂等回到了监房。

直到晚八点半为止，监房内的 15 个犯人都得盘腿坐着。监规不许他们互相说话，只能听到走廊上卫兵有规律的脚步声。但是坐在西面墙前的 53 号和 110 号似乎不懂得自己的身份，二人之间总是在嘀嘀咕咕地交谈。从他们的嘀咕声中我听出他们认识我并知道我的案情。后来我得知第 53 号是四方台公社的一个农民，因为打架斗殴而被抓进来。第 110 号是绥化县城里的一个赌

徒，名叫王玉熹。这两人的事估计都不足以判刑，他们表现得满不在乎。他们其实是本监房的“狱头”。

看守所的东面是县人民保卫部（即前公安局），人民保卫部的再东边就是县革命委员会，即前中共绥化县委和人民委员会的大院了。那个大院里有一个大广播喇叭，看守所里的犯人们都能通过它清楚地听到广播。晚上八点半钟听完新闻广播后，走廊上的哨兵就大叫一声：就寝！于是犯人们就把他们的被卷从墙头那边打开向房中间铺过来成一条，头冲墙躺下睡觉。当然监房里的灯是整夜亮着的。

犯人们至少有一种享受，即足够的睡眠，从晚八点三十分到早上六点整，共九个半小时。早六点钟时，东面县革委会的大喇叭开始响，走廊上的值班哨兵也就大喊一声：“起床！”于是所有犯人们都起来，把自己的被卷起来靠墙放好。接着炊事员就打开小窗，送来洗脸水和漱口水。每个监房只有一个面盆，即 15 个人共用一盆水洗脸。今天值日的是第 28 号，即我东北面的邻居。他先把洗脸水端到自己的座位前，然后犯人们依次拿着茶缸到小窗跟前接漱口水。第 28 号最先洗脸，然后把面盆递给我洗，面盆按顺时针方向转，最后仍回到第 28 号跟前。同时犯人们轮流到尿池跟前刷牙，把漱口水吐入尿池。面盆中的水即使洗了 15 个人的脸也不太脏，因为犯人整天坐在屋里，脸上没有挂多少灰尘。洗完脸后任何人可以用这盆水洗手帕之类的东西。最后第 28 号再用这水擦地板，最后搓完抹布再将脏水倒入尿池。这盆水可真是被利用到极限了！

大约早晨八点钟时，小窗又打开，炊事员又出现了。第 28 号走向小窗，取回一叠搪瓷碗和一把筷子，发给每人一个碗和一双筷子。然后他又走向小窗，接过窝头递给每人两个。接着监房门打开了，一桶熬冻白菜放在北墙里边门旁，桶里也有一把勺。

第 28 号就开始往每人的碗里盛冻白菜，也是按顺时针方向每人三勺，最后添一口。每个犯人都忙着吃完自己碗里的冻白菜，腾出碗来盛下一勺。窝头不需要容器，可以放在地板上，以后慢慢吃。冻白菜里有一些黄豆粒，据说这是为预防犯人浮肿而给吃的。但是黄豆粒在冻白菜中分布不匀，要平均分到每个犯人的碗里就不可能了。这也是导致犯人之间争吵的原因之一。冻白菜吃完了，所有的碗筷连同那把勺又都放进空桶放到门旁。这时小窗又打开了，拎着大水壶的炊事员又出现了，犯人又都拿着茶缸到小窗跟前去看开水。这回我有自己的茶缸，不用忙了。犯人们就慢慢地喝开水吃窝头。接着向管教员就来放风。这样我度过了在看守所里的第一个 24 小时，对这里的日常生活有一个概念了。

第三天就是我值日了。经过前两天的观察，我已经知道怎么干了：大家洗完脸后擦地板，分发碗筷、窝头、咸萝卜条、冻白菜和玉米面粥，在放风时拎大便桶，倒净并洗刷净等。这一切看起来似乎简单，干起来却不然。最麻烦的是如何给大家往碗里盛冻白菜或玉米面粥而不引起争吵。早饭后那两个狱头——第 53 号和第 110 号就责怪我，说他们碗里的黄豆粒太少了，但是菜桶里和每个人碗里的黄豆粒怎么可能数清呢？晚饭在分玉米面粥之前，两个狱头又要我把桶上面凝固了的一层硬皮盛给他们，因为这层硬皮又干又凉。我却没有理解到这一点，先把硬皮打碎，用勺一直搅到桶底，把粥搅匀了再盛给大家。两个狱头就对我大为震怒了。我听见第 53 号一边吃一边对第 110 号说：“我们有办法收拾他！”我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不过我懂得监规中的“不许计较生活小事”是怎么回事了。可是如果狱头们违犯监规，你也没有办法！

不过和社会学习班相似的是，监房内的人员也是处于不断变更之中的。犯人离开监房的情况有三种。第一种是“教育释

放”。我来后十天第 53 号被释放了，我来后第 15 天第 110 号被释放了。因此他们没有来得及“收拾”我。第二种情况是某一犯人被调到另一监房，例如为了防止串供，同一案件的几个犯人是不能放在同一监房的。我室有两个人就因此被调到别的监房去了。第三种情况则是“升级”，即这个犯人被判刑，将被判刑的犯人总是先调往最西面的一间监房去集中。三月初为了加强“一打三反”的声势，这监狱就组织了一个宣判大会，“老广”和坐在我斜对面的一个姓韩的年轻的反革命犯就被调到最西面的监房去了。在他们被判决后的一天清晨，我躺在地板上就听见向管教员领着他们离开看守所的脚步声。

本监房新来的犯人中，有一个贪污犯和两个投机倒把犯，那个贪污犯是第 77 号，年约 40 多岁，后来我得知他的名字叫孙喜宗，是绥化铁路分局的。他的贪污案是一个老案子，他本人也是一个“老运动员”，对于挨斗已经习惯了，满不在乎。他剃了一个光头，解释说这是防止造反派在斗争会上揪他的头发的原故。他对看守所的日常生活很熟悉。看来不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了。他带来的那个大茶缸能装三公升开水，所以吃饭时他连搪瓷碗都不需要，用大茶缸装上三勺冻白菜或玉米面粥慢慢地吃，然后又用这大茶缸接到比谁都多得多的开水。他很健谈，完全不顾监规而不断喃喃地叙述自己的“光荣历史”和社会上的奇闻轶事。第一个投机倒把犯是第 46 号，年约三十一二岁，后来得知他的名字叫作贾云库。第二个投机倒把犯是第 100 号，年约二十六七岁，名叫吕有。这两个人都好说话，整天和孙喜宗一起嘟嘟囔囔的。

三月末时，进来一个年约 27 岁的年轻的反革命犯，第 21 号。后来得知他的名字叫杨松斌，据说也是来自绥化铁路分局的。他的案子也很老，还是发生在 1962 年“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前。他组织了一个“人民党”，甚至跑

到北京去要找中共中央“商谈合作事宜”，于是被送去劳教了。现在他是为了算清这笔老债而被送到这看守所来的。在监房中他因为分粥的事和别的犯人发生几次争吵。一次我忍不住低声对他说：“你这个知识分子难道不感到害臊吗？”于是不吱声了。几年后我在黑龙江省第三监狱里遇见过杨松斌，不过那时我们分属不同的劳动大队。

一天下午饭前送来了另一名反革命犯，第 35 号。这人中等身材，微胖，年约 50 岁。他说他姓董，是双河公社的一个农民。他说在 40 年代日本占领期间，他曾在北京铁路局工作过。那么，他就是一个“历史反革命”了。这次据说是因为他在农村密谋组织反革命集团，被泄露后被抓来的。抓他时他还在生产队里挑玉米种子呢。第二天提审后他的脚上被箍上了 15 公斤的铁镣子。他说审讯他的预审员姓孙，戴一副金丝眼镜。这应该就是孙庆生了。显然在人民保卫部人员中孙庆生是专门负责审讯政治案件的。

孙庆生也在看守所的办公室里审讯过一次我。这是我来到这里两天之后的事。他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只是劝告我认罪服法。他对我说：“你还有可能回到人民中间来！”我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孟所长也曾把我领到办公室进行过一次谈话，内容也就是劝我好好反省。可能孙庆生和孟所长的谈话只不过是对于新来犯人的一次例行公事而已。通过县革委会大院里的大广播喇叭我能够知道国家的形势。4 月 24 日晚上，我听到中国发射人造卫星的消息，我注意到中共中央向有关人员表示祝贺的顺序，首先是工人，其次是工程技术人员，最后才是科学家。这说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还在坚持贬低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5 月 20 日，我又通过那个大喇叭听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群众集会的实况和毛泽东的 520 声明。那以后看守所外面的街道上多次出现群众游行和喊

口号的声音。有一次孟所长站在走廊中央，打开各监房的小窗，大声朗读毛泽东的 520 声明，并命令各监房犯人组织讨论。人民保卫部还从各屋提几个犯人到办公室组织讨论，我也被提去了。有一个犯人在赞扬柬埔寨反美时说：“诺罗敦和西哈努克这两个人真了不起！”我心中暗笑。

犯人家属可以往看守所给犯人送生活必需品，但是不能和犯人见面。东西由管教员送交犯人，食物不允许送。不过如果犯人家属和看守所的管理人员认识的话，该犯人会被提到办公室，当场迅速地把食品（一般是糕点或猪头肉之类的）吞咽下去。我在社会上已无亲属，没有任何人送东西来。天气愈来愈热了，到三月末时我的牙膏和肥皂都用完了。我只好刷牙不用牙膏，洗脸不用肥皂了。另一问题是无法洗澡、换衣服、剪头发、刮脸等。于是和其他犯人一样，我的身上出现了虱子。不过这倒是让闲得难忍的犯人们有事可做了。第 77 号的孙熹宗善于捉虱子，他不但捉自己衣服上的虱子，还要我脱下衣服交给他来办这件事。我的手脚指甲愈来愈长了，手指甲可以用牙齿咬短，脚指甲就没有办法了，只好随它们长到离开这里的那天再说吧！到六月初时地板下的水管才化冻，水龙头出水了，犯人们可以随使用水了。我这才擦身，换衣服和洗衣服。

一次孟所长在走廊中央教训各室的犯人们说，绥化县看守所对待犯人比本省其它地方的看守所好，因为这里的犯人一天的口粮是一斤，而别处则是九两。其实社会学习班学员的每天口粮也是一斤，不过那里是以高粱米为主而这里是以玉米面为主而已。这里也是每天两顿饭，早饭在早晨七点半（夏天）或八点（冬天），每人两个窝头和冻白菜，晚饭在下午两点半（冬天）或三点（夏天），每人三碗玉米面粥和咸萝卜条。犯人们整天坐在室内啥也不干，吃这么一点饭倒也能维持生存。但是时间长了每个

人都会感到缺乏营养。社会学习班的学员能和外界保持一定联系，有办法另外搞到一些食品，在这里犯人们就只能靠每天的那两顿饭生存了。因此他们之间时常为分饭的事发生争吵。有时一个犯人能突然在他粥碗里遇到一块窝头（这是早饭窝头碎块被倒入粥锅的），他就算是交好运了。一次贾云库因为犯监规手被背铐上了，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吃饭。开饭时值班犯人把他的饭放在窗户台上，贾云库就猫着腰舐食或啃食，其情景和猫狗吃食差不多。最有趣的是贾云库吃玉米粥的情况：他把手巾平铺在窗户台上，值日犯人把他的那一份玉米粥倒在手巾上，玉米粥凝成一团。贾云库低头吃完玉米粥后，手巾虽然湿了但上面却一点玉米粥也没有剩下！五一节那天我早饭吃的是七两大米饭和一碗白菜炒猪肉片，晚上吃的是四个白面馒头（八两面）和两碗菠菜汤，汤里也是几片猪肉。我不知道社会学习班的学员们今天吃什么，也比较不出哪一边吃得更好。不过我并不认为五一节的两顿饭是在看守所七个月中所享受到的最好的美味。最好的美味是七月份一天早饭中我突然吃到的一份熬茄子。这时看守所里储存的冻白菜已经吃完了，水萝卜取而代之。但是这天早晨拎进门的这一桶熬茄子却使众犯人喜出望外。熬茄子里几乎没有油但有一点辣椒。我过去在绥化街上的饭馆中常常吃烧茄子这道菜，但是1970年7月在绥化县看守所中吃过的这份熬茄子却是我从未享受过的美味！

在看守所的几个月中，曾经有过三次宣判大会：三月初、五一前和七月末，通常都是在星期天。宣判大会前，将被判刑的犯人总是从原住监房被提出，送到最西面的那间监房里集中起来。这些犯人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看守所的生活即将结束，将被送到监狱或劳改队去，在那里过比较正常的生活。开宣判大会这一天，看守所里的犯人可以听见县中心广场上的大喇叭

在响，但听不清说的是什麼。我們只能聽見被判決的犯人們出去赴會和回來的腳步聲。幾天之後又響起了他們離開看守所去監獄或勞改隊時的腳步聲。據說向管教員回家探親去了，現在代替他的是一位王管教員。王管教員年約 30 歲，个子高高的，可能是黑龍江本省人，復員軍人。現在是由他負責把被判決的犯人送到勞改單位去了。

我並不幻想自己可能被“教育釋放”。我的概念是現在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大監獄，而這個看守所只不過是這個大監獄之中的一個小監獄而已。從這個小監獄移到一個大監獄有什麼意思呢？我並不急於被判決。直到現在我還是被“拘留”而不是被“逮捕”，可能這裡的其他犯人都是處於這一狀態。然而，每一次的宣判會都不可避免地引起我考慮自己離開這個看守所的方式。我知道判刑有不同的等級：死刑、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無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從幾個月到 20 年不等）。我在監房裡不知不覺地胡思亂想了起來。我知道有一個傳統是：死刑犯在被處死前可以吃到一頓好飯，有時是他們想吃什么就給買什麼。我想如果我被判死刑我要什麼東西吃呢？我轉念一想：“光吃點好東西有什麼意思呢？那怕吃一只雞也不過如此吧！為什麼不要求聽聽音樂呢？”於是我就選擇聽什麼音樂了。當然，如果我要求聽“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或“山楂樹”的話，那是不可能被批准的。但是如果我要求聽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或約翰·斯特勞斯的“藝術家的生活”，或許他們還是會同意的吧！

啊，還是不行，即使他們同意我聽貝多芬和斯特勞斯，在綏化這地方上哪里去找這種唱片或錄音帶呢。就算在綏化過去有這種東西，“掃四舊”時還不把它們都摧毀了！算了吧。給我什麼我就吃什么吧！

然而，經驗告訴我說我被判處死刑的可能性很小。根據一般

惯例，将被判处死刑、死缓和无期徒刑的人在监房里是要被戴上脚镣子的，而我却始终未曾“享受”到这种“待遇”。于是，我逐渐放弃了听什么贝多芬和斯特劳斯的想法。不过另一种更坏的可能性又侵袭进了我的头脑。这是由一个被单独关在最东面监房里的一位老靳太的情况所引起的。这个老靳太被关在这里都已经四年了，几乎全绥化的人都知道她的案情：靳家是绥化县的老户，老靳太的大儿子靳国君还是 50 年代时绥化记者站的站长，因此老靳家在绥化县可算是一个世家了。然而，在 1966 年夏天文革刚爆发时，有一个邻居才 12-13 岁的小女孩揭发说老靳家是地主成份。这一点即使后来也弄不清是否属实。老靳太（又有人说她患有精神病）一怒之下用菜刀砍死了那个女孩。老靳太被送进这看守所之后始终没有被判刑，因为无法确定她的犯罪性质。被拘留在这里的人总想愈快宣判愈好，哪怕判死刑也行，为的是结束看守所里这种无法忍受的生活。老靳太对于召开宣判大会的一切征候都熟悉了，她也想快点被挪动到最西面的那间监房去等候宣判，但始终没有人来挪动她。于是每次召开宣判大会时，监房里的犯人们一方面听到县城中心广场上大喇叭的嘈杂声，另一方面也听到最东面监房传来老靳太的哭声。老靳太的哭声使我感到很揪心。我不觉自问道：“如果我也将在这监房里无限期地被囚禁下去，我将怎么办呢？”

被处决是死，被没完没了地囚禁在这里最后也得是死。如果我死在毛泽东之前，也就看不到对抗个人迷信的胜利了，但我毕竟是死于这种斗争中的。那么还得留下一个问题：如何处理我的尸体呢？当然尸体将被变成骨灰。骨灰又怎么办呢？每个犯人都有权写遗嘱，犯人家属也有权来收尸。我的亲属早在 1968 年就和我断绝了关系，看守所是不会向他们通知我的死讯的。那么看守所人员不用告诉谁，把我的骨灰随便往那里一扬就拉倒了。对

此我是不能甘心的。“从 1958 年起，这个暴君已经折磨我 12 年了，我怎么能容忍死后还让法西斯分子们到处乱扬我的骨灰呢！”我想道。即便是最倒霉的人，一生也会有一个最后的愿望，我最后的愿望是见到克拉娃一面。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总可以到近一点的地方去吧！于是我想出了一个实现这一愿望的办法：我还有一些衣物，尤其是一块手表寄存在这个看守所里。这块手表值好几十块钱，相当于一个职工半月以上的工资。我有权写遗嘱把自己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如果我能在同室难友中找到一个可靠的人，就写遗嘱把自己的一切遗物都送给他。交换条件是这个“同室难友”在被释放后把我的骨灰带到中苏边境，例如黑河这样的地方，把我的骨灰洒入黑龙江里。黑龙江从哈巴罗夫斯克到鞑靼海峡的那一大段在苏联境内。我的骨灰在这一江段中漂流，就离克拉娃最近了，而且不需要办理任何护照。这样我就能实现我这一生最后的愿望了。

然而，一直到被判刑为止，我也没能从自己的“同室难友”中物色出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手表等都给他，让他把自己的骨灰扔入黑龙江中。像第 21 号杨松斌或第 35 号老董这样的反革命犯，即使被释放后也不可能被允许到中苏边境地区去的。刑事犯都不可靠，他们可能满口许愿，拿走你的东西后什么也不给你干。我就这样地在监房中盘脚坐着，整天处于胡想乱想之中。

(3)

9 月 10 日晚上，我从东面县革委会大院的大广播喇叭中听到了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公报。我当然不知道在这次全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还以为这象征着毛泽东——林彪统治体系进一步正

规化了呢？9月22日那天，孟所长打开了监房门，指着我、第77号孙熹宗和第46号贾云库说：“拿上你们的行李跟我来！”于是，我们就来到监禁区最西面的那间监房。从别的监房也领来了一些人，总共是十四个人。大家都马上明白了这是什么意思：在这个星期天要举行宣判大会，我们将要被判刑了。大家看到自己在看守所里的生活即将结束，心情都轻松多了。大家互相之间都很和气，也没有了为分饭而争吵的事情。贾云库还让我用他的牙膏刷牙，用他的肥皂洗脸。

9月25日星期天，从早8点开始，县中心广场上的大喇叭就响个不停。早饭后约8点45分时，孟所长打开监房门说道：“走吧！”于是，众犯人站起来成一行走向看守所大院的大门。院内站着几个人民保卫部的工作人员，他们命令犯人们向后举起双手，熟练地用绳子把他们捆起来，又给每个犯人胸前挂上约0.3×0.5米的一块木牌，再命令他们走出看守所大院。看守所大门前的街上停着两辆敞篷大卡车，每车旁有几个士兵，士兵们把犯人们举到车上，命令他们在车边沿面向外跪着，左边三人，右边三人，车尾一人。这时我才看见自己胸前挂着的那块牌子上面写的是：

“反革命犯

张轶东

判处.....-

“张轶东”这三个字倒写并打上了红叉，而在“判处”这两个字之后有一条白纸被用订书钉钉着以遮盖下面的字。于是，两辆敞篷车开向中心广场。所有的犯人都被领到主席台前面向群众站着，宣判的顺序是由轻（因扰乱社会治安而被拘留十五天）及重，宣判一个犯人后，一个工作人员就撕下他胸前木牌上的那张小纸条。我是倒数第三名被宣判的，那倒数的两个都是被判无期

徒刑。我这时头脑浑浑噩噩的,只记得我“思想极端反动”,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偷听敌台,预谋投修等。于是,我被判处反革命罪有期徒刑 20 年。

宣判结束后,所有的 14 个犯人都被抬回大敞篷车,各就原位。于是,这两辆车就拉着我们游街示众了。先是向东去绥化火车站,回到中心广场后又向南,直到南大街尽头与东西向大道交叉处,离绥化一中已经不远。经过几年的文化大革命,市民们已经熟悉了这一套,对此已经不感兴趣了,因此到汽车跟前来围观的人并不多。大约上午 11 时,这两辆大敞篷车又回到了看守所。14 名犯人被抬下车送进大门,解开了背后手上的绳索。

但奇怪的是:当这些犯人们回到最西面自己的监房时,他们被命令立刻拿着行李搬到此屋东西相邻的那间监房去住,把这间最西面的监房腾出来。但是最西面的这间监房并没有空闲多久。下午,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大约有 8-10 个人搬进了那间屋,这些脚步声似乎还夹杂着铁镣子的声音。三天之后中心广场上大广播喇叭又响了,接着最西面监房的那些犯人都被领了出去。

“我们刚被判刑,怎么又开宣判大会呢?”——这个监房里所有的犯人们都感到奇怪。而最奇怪的还是:上午 11 点以后,并没有听到这些犯人回来的脚步声。大约在 12 点整时,孟所长打开这边监房的门,指着一个年轻犯人说:“来把你父亲的行李拿回去!”啊,父子两人都是犯人。这个年轻犯人去到最西面的那个监房,抱回一卷行李,然后坐在地板上流泪。接着从窗户犯人们看见孟所长,王管教员和别的一些人从最西面的那间监房抱出所有的行李。“哦!”——我这下明白了!——“这些人都被枪毙了!”这是一个规律,却每逢重大节日之前总是要处决一批犯人的。因此 9 月 28 日的宣判大会是国庆节前的主要行动,而我们在 9 月 25 日被宣判的大会只具有次要意义。另外,据说这些被处死

的犯人死前只给了一顿管饱的白面馒头和白菜炒猪肉，死刑犯想吃什么就给买什么的那种作法已被作为“四旧”取消了！此外，我还知道在被处决的犯人中有一个我在“社会学习班”的“同学”赵某。赵某是一个汽车司机。他曾说：“如果苏联军队打过来，我就把车开到他们那一面去！”但这不过是说说而已。

这 14 名被判了刑的犯人中，孙熹忠被原单位领回监外服刑。那个因扰乱秩序被判处十五天拘留的人被移到了其它监房。包括我在内的这 12 名已判决犯人就得老老实实地在这监房里过几天了，因为要等过完国庆节才能把我们送走。国庆节的两顿饭和五一节完全一样，即早饭是七两大米饭和一盘白菜炒猪肉，晚饭是四个白面馒头（八两）和两碗菠菜猪肉片汤，没有因为分饭菜发生任何争吵。

在领到判决书后，我晚上躺在地板上想着我的那 20 年徒刑。现在一切死去的可能对我都已经不存在了，我要到 1990 年 59 岁时才能获释。现在中国是一个大监狱，我孤身一人住在监狱里或社会上都无所谓。然而，我问道：“这个暴政已经持续十二三年了，难道还能再维持二十年吗？”如果这种暴政要维持到 1990 年的话，那么不仅我张轶东一人，整个中国都要完蛋了。物极必反，毛泽东总不会活到 1990 年 97 岁时才死吧！毛泽东死后的中国将是一个什么样子呢？不会的，不用等 20 年形势就会发生变化。判我 20 年不等于我要在监狱里呆上 20 年！

判刑使我不再去想死，吃小鸡、听斯特劳斯或找难友往黑龙江扔自己的骨灰等等了。这判刑甚至向我显示出了隧道末端的微光。“20 年内形势会变化的”成为了今后我监狱生活中的指导方针。这想法应该是深深地保留在我的脑子里而不能说出口的。可是后来我正好是因为没有封住口而在监狱里更下了一层地狱。

国庆后的 10 月 3 日那天，所有 12 名被判了刑的犯人都被叫

到看守所办公室接判决书。我的判决书是这样的：

绥化县革命委员会

刑事判决书

(70) 刑字第 52 号

张轶东，男，39 岁，汉族，家庭出身职员，本人成份学生，大学文化，原籍南京市，捕前为绥化县第一中学俄语教员。

现查明：张轶东思想一贯反动，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动言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到边境地区了解警戒情况，企图叛国投敌。以上行为，已构成反革命犯罪。现判决如下：

判处张轶东反革命罪有期徒刑 20 年。

刑期从 1970 年 2 月 25 日起至 1990 年 2 月 24 日止。

绥化县革命委员会

人民保卫部

1970 年 9 月 25 日 “

九年之后，我回到绥化县时，有人告诉我说，当“革命群众”讨论给我量刑时，有的积极分子（估计是绥化一中的教师）提出要处决我，有的提出要判我无期徒刑。判处有期徒刑 20 年是最后决定。

10 月 4 日，即拿到判决书后的第二天，包括我在内的 12 名已判决犯人被提到院内进行体格检查。一些医务工作者量了我的身高和体重，命令我张开嘴检查口腔，对我身体的某些部分敲打了一翻。这是把我们送往劳改单位之前的一道必经手续。

10月5日白天，王管教员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告诉我说，去年9月23日起社会学习班代管的我的200元的存折，已经过人民保卫部交给他。他现在要取出这些钱，交给我将归属的劳改单位。然后，他又还给我13元5角钱和3斤粮票，这是2月25日那天我被送来看守所时搜身被搜走的。10月5日当晚，我又被提到看守所办公室进行最后一次谈话。办公室坐着几个人民保卫部的工作人员，除了孟所长我一个也不认识。我一走进办公室就看见房门边立着我的大皮箱。人民保卫部的工作人员和我谈话时倒是很和气，谈话内容是我必需认罪服法。被判处20年只是对于我过去的结论。如果我认罪服法，好好改造的话是可以得到减刑的。我听着不吱声，有时点点头。其实我也在设想我被监禁的时间可能被缩短，不过将不是由于我改造得好，而是由于形势变化而已。最后他们问我在绥化县的财物还有什么事要办理的，我说我只有这么一口大皮箱。于是，他们就打开大皮箱进行检查，他们从大皮箱中取出所有的书籍，笔记本和证件，包括我得自列宁格勒大学的毕业文凭和鉴定书，而其它的衣服则没有动。他们对我说：“你可以把箱子连衣服带到监狱去，但是书籍和证件等则必须留在这里，等你从监狱回来时再还给你。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我还有一个大洗衣盆留在社会学习班了，可能到那里会有用的。”我说。

“好的，我们给社会学习班打电话，让他们还给你！”他们回答说。

奇怪的是这些工作人员在检查我的东西时，好像是有兴趣于寻找一种什么东西似的。最后孟所长问我说：“你苏联爱人的照片在哪里呢？”“早在1968年时，学校造反派就从我这里，把来自苏联的所有信件和照片等都收走了！”——我回答说。这些

人看来有点失望似的，看来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作人员，对于人间的情爱也不是无动于衷的。

10月6日清晨，王管教早早地叫醒了这12名已判决的犯人，要各人捆上自己的行李卷。我们不吃早饭就被命令扛着自己的行李卷来到看守所的大门口。一走出大门，就看见门前停着一辆敞篷大卡车，车下有四名士兵背着枪站着。有趣的是一名士兵手里拿着我的大皮箱，另一名士兵手里拿着我的大洗衣盆。

“啊，还有两个当兵的侍候着我呢！”我心中自嘲道。12名犯人登车以后，4个士兵各把住车篷的一个角，车就开走了。从看守所到火车站，汽车开了大约五分钟就到了，当犯人从汽车上下来进站要登车时，我听见一个年轻女人尖声叫道：“啊，这不是张铁东吗？”可能这是绥化一中过去的一个学生。

一行17人（12名犯人、4名士兵和一位王管教员）占据了一个车厢的末端，为的是能和广大旅客之间隔离开来。这行人的两端各由两名士兵持枪把住，每两名犯人“享用”一副手铐，一人戴一只。火车开动后，王管教员发给每人五个面包（一斤），说这是一天的口粮。我口袋里还有13.5元钱和3斤粮票。贾云库和一些犯人就向我要零钱，我就给了贾云库两块钱，然后又给这个犯人一块钱，那个犯人伍角钱的。王管教员看见这情况就批评我说：“你如果把钱都给出去了，将来会有困难的。”我这时兜里只剩下五块钱，再也不敢往外给了。

我不知道这次“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但从火车运行的情况知道火车走的是“绥化——北安——齐齐哈尔”这条线。每次一个犯人上厕所时都有管教员或一名士兵跟着。

大约在下午5点列车到达齐齐哈尔车站。犯人都被押送到齐齐哈尔站公安段的看守所借宿，3名重刑犯人岳明海、阚国富和我被放进一间小屋。这间小屋里原有一个老头，是被齐齐哈尔铁

路公安段关押的，我不知这老头犯的是什么罪，给了他一个自己在车上吃剩的面包，使这老头喜形于色。在齐齐哈尔铁路看守所监房的这一夜里，在与自己的两名“旅伴”闲谈中，我得知岳明海是一个老贼，而阚国富是一名抢劫犯，不过他们又因为言论问题而在自己的“专业”之上又加上了“反革命”的帽子。



作者被解送往新肇监狱的路线图

岳明海大约 40 岁，阚国富不到 30 岁，他们都是孤身一人，在社会上没有任何亲属。他们两人都来自牡丹江地区而非绥化地区，但因为是在绥化县界内犯的罪，就在绥化县被判刑了。他们根本没有行李，在地板上和衣而卧。他们俩人都是“二进宫”，对自己被判处无期徒刑满不在乎，就像是去哪里串门儿似的。

第二天早晨，还不到 6 点，王管教员就把我等三人叫醒，押着走向齐齐哈尔车站。奇怪的是今天的这一行只有六个人了：三

名犯人、两名士兵和一位王管教员。另外的 9 名犯人和两名士兵到哪里去了呢？岳明海和阚国富看明白了：另外的 9 名犯人留在这里等着的，要把他们送到另一个劳改单位去。

由于岳明海和阚国富俩人没有自己的行李卷可扛，王管教就命令岳明海拎着我的大洗衣盆，阚国富则扛着我的大皮箱。上火车后王管教员给了我和岳明海每人两个面包（四两）而给了阚国富三个面包（六两），说这是因为阚国富扛的大皮箱比较重。两个面包也好，三个面包也好，反正不是五个面包。这应是半天而不是一天的口粮，这说明今天就只坐半天火车，而不是一整天。

火车运行中最初的几站我还是熟悉的，因为在 1960-1961 年时我曾走过这条路线。“榆树屯”和“泰康”等站的站名告诉我列车是朝东往哈尔滨方向运行。然而，尚未到达 1961-1962 年间我所住过的安达时，火车就在一个名叫让胡路的站上停了比较长的时间。这时正值上班时间，有许多穿石油工人服装的人登上火车，把车厢弄得很挤。列车再开动时，我看到的已经是一些不熟悉的站名。这就是说，列车已不是东去哈尔滨，而是向南在大庆油田的地界上运行了。穿着石油工人服装的人们在小站上上下下，他们之间随意交谈，对三名犯人和押送他们的士兵并不注意。这意味着这附近一定有监狱，这里的人对于往这一带押送犯人已经习以为常了。大约到 11 点时，王管教员问我说：“你还有钱在我这里，要不要给你买点什么东西？”——“那就请给我买点食品吧！”我回答说。王管教员就从列车售货员那里买了六小包饼干，把它们塞进我的行李卷里。

大约在 11 点半时，我们在一个小站下车。后来我得知这个小站名叫新肇。我们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土路上走了大约两公里后来到一处土平房前。三名犯人被命令在走廊里面面对墙站着，两名士兵持枪站在门外，王管教员则走进一间小屋（显然是办公

室)。大约 15 分钟之后，王管教从那间屋走出，直接走向大门。他在大门旁和气地对三名犯人说：“好好改造啊！”

“是！”我们齐声回答。我们突然对王管教员和绥化县产生了一种留恋之情，向窗口探头目送王管教员和那两名士兵离开这里。21 世纪初，我在绥化市的公共汽车上遇到过这位王管教员。那时他已经退休了。

正好这时，从我们背后发出一声大吼：“站好！低头！”这是来自办公室人员的声音。于是我们又靠墙站着，低下了头。

大约又过了十分钟，一位大约 40 岁的办公室人员（后来我得知这是监狱管教科的张管教员）夹着一个大公文包走了出来。他走向三名犯人说：“拿着你们的行李跟着我走吧！”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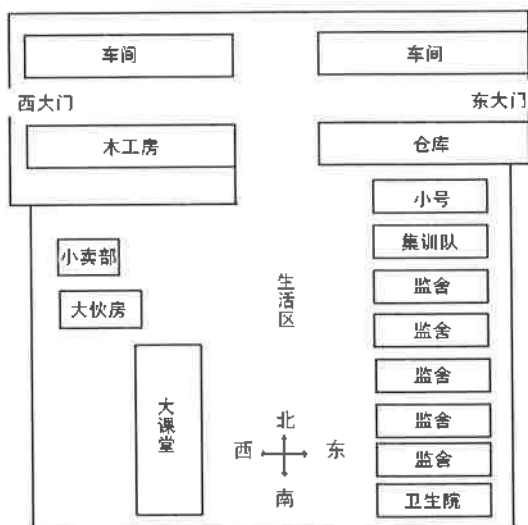
恰好是在 1970 年我在黑龙江省第三监狱（即新肇监狱）开始劳改生活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因那些揭露苏联监狱制度的作品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许多年之后，我从新肇监狱释放出来后，阅读了索尔仁尼琴的《依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古拉格群岛》，我经过对照中苏监狱制度，发现这二者之间是大同小异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与西方“帝国主义”斗争中，黑龙江省是一个大后方，也是全中国的一个主要监狱基地。这里的劳改单位不仅接收本省的犯人，还接收许多外省的犯人。那时在靠近苏联的例如嫩江地区，有不少的劳改农场。但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黑龙江省成为了“反修前哨”，也就不便于充当全国的监狱基地了。嫩江地区的所有劳改农场都被移交给了军队，黑龙江省的劳改单位只接受来自本省的犯人了。现在共有三种劳改单

位：1) 监狱，主要接受 10-15 年以上的重刑犯人；2) 劳改农场，主要接受短期轻刑犯人；3) 劳教队，接受“犯了错误”，但未被判刑的犯人。

众所周知，犯人是分两大类的。即政治犯和刑事犯。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四十年中，政治犯人都被叫做“反革命犯”，而且判刑较重，绝大多数都被送往监狱。黑龙江省共有三处监狱，第一监狱在齐齐哈尔，第二监狱在北安，第三监狱在哈尔滨。

1969 年末，由于面对苏联大规模入侵的威胁，就决定了第一监狱和第三监狱迁往黑龙江省最南部与吉林省大安县隔第二松花江相望的肇源县。这两所监狱都被迁到铁路平齐线（四平——齐齐哈尔）



1970年的新肇监狱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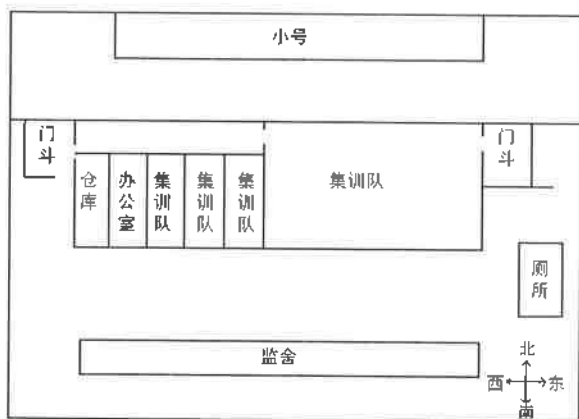
上，与滨洲线（哈尔滨——满洲里）在让胡路站相交。第一监狱位于肇源北面一站的革志站。据说在革志监狱服刑的犯人达五千名之多，而且全省的女犯都在那里服刑。因此从革志监狱也传来不少犯人在监狱中“重新犯罪”的笑谈。

三个监狱都是县团级单位。监狱的第一把手是政委，行政首脑是典狱长。1970 年新肇监狱的政委姓董，典狱长姓贾。全监二千多名犯人按劳动性质分属几个营级的大队，每个大队派去一名教导员和一名大队长。每个大队又分成几个连级的中队，各有一

名指导员和管教员，管理约一百名犯人。除去监狱当局派来的管理人员以外，犯人们的日常事务则由政府人员指定的狱头们来管理。这些狱头被称为“杂工”。被送来的新犯人一般不先和政府人员打交道，而是和“杂工”们打交道。

于是，跟着管教科那位拎着大公文包的胖张管教员，我扛着自己的行李，岳明海拎着我的大洗衣盆，阚国富扛起我的大皮箱，重新走上了土路。我们走了大约半公里就来到一处大院的大门前。这是监狱的西大门，正大门的两边还有两道小门。在正大门与南边小门之间的砖柱前挂着一块木排，上面写的是：“黑龙江省高压开关厂”。后来我得知高压开关是黑龙江省第三监狱的主要产品。进门往东走约 200 米之后，张管教员领着这三个新犯向南走，来到一个“院中之院”的北大门前。这个“院中之院”大约南北向长 150 米，东西向宽 100 米。院子的东半部是大约十趟平房，从北朝南地排列着。

每趟平房大约东西长约 50 米，南北宽约 6 米。张管教员和三名新犯人进入第二道门后，就领着我们沿东南方向朝从北往南数的第二趟平房走去。我们通过这些平房西北角上延伸出的矮小门斗的南门进入平房。沿着平房的北墙按老规矩也是一条走廊。但这条走廊延伸到平房的中央就



集训队的位置

结束了，接着又是一道门把平房的東西两部分分开。沿着平房西

半部的南墙是五间小屋，在走廊上西面二间屋与东西三间屋之间又是一道隔门。在进入这道隔门之后张管教员又命令我们面对北墙站着，他自己走进西面的第二间小屋（后来我得知这是集训队的管教员室）。我面对北墙站着时，就听见这三间屋内人声嘈杂，人来人往的。大约 15 分钟之后，张管教员从那间小房出来，没有对我们说什么就走了。接着一名穿着囚服的犯人走向我们三人说：“跟我来吧！”后来我得知他是集训队的一名杂工，名叫刘文有。刘文有叫我把大皮箱送到管教员室西面的储藏室，给了我一张收条。刘文有让我把自己的行李卷和大洗衣盆带进宿舍。刘文有看见行李卷中王管教员为我买的那六小包饼干时问道：

“这是什么？”

阚国富赶紧回答说：

“这是绥化的管教员在路上买给我们的，每人二包。”

这下我就处于被动地位了。我不便于也无必要再解释这六小包饼干是王管教员在路上用我一个人的钱为我一个人买的了。于是刘文有就给了岳明海、阚国富和我每人两包饼干，我睁眼失去了四包饼干。

于是，刘文有领着这三名新犯人走进里面三间小屋的中间一间。我不久就弄明白，这里边的三间小屋是给新到犯人暂住的。较之这平房东半截正式的集训队还有不同。这三间小屋大约是南北长 5 米，东西宽 6 米。每间房沿着东墙和西墙都是双层的木板床。木板床每层东西向躺着能睡五至七人。在两个大双层木板床之间的过道上是一个约一米高的火墙，炉子在火墙的北端。火墙的两侧各放着几条长木凳。因此这火墙就是犯人们的饭桌和课桌。我和阚国富被安排住在西木板床的上铺，而岳明海则被安排住在这木板床的下铺。然后，我得知所有住在西木板床上的都是

反革命犯人，被编为待训队第二组。而所有住在对面东木板铺上的都是刑事犯人，被编为待训队第四组。

这时已是约下午 1 点，所有监内的犯人都吃过午饭了。于是，刘文有就派三名犯人去大伙房给我们端来午饭。我吃到的是四两高粱米饭和土豆熬白菜。在绥化看守所的七个月里我一次土豆也没有吃着，现在我感觉生活水平的确提高了。

午饭后一名拿着剃刀的犯人过来把我们的头发剃了个精光。接着刘文有给我们发放了囚服。囚服的上衣和裤子都是蓝花旗布作的，还有一顶囚帽和一双胶底鞋。帽子是六块 V 字形的碎片拼成一个半圆球，前面再加上一个帽舌而形成的。然后又来了一名犯人，手上拿着一大块硬纸板，纸板上有一个挖空的“犯”字。我们被命令脱下自己的背心和衬衣平铺在木凳上。那个犯人又把这纸板平铺在每一件衬衣和背心上，往木板的空“犯”字处抹白漆。于是，在每件衬衣和背心上都有一个大的白“犯”字。这就是说，如果你能逃出监狱，人们也能从你衣服上的“犯”字识别出你是一个逃犯。刘文有警告说任何犯人，如果私藏便服都会受到严惩。我因为自己带来行李，就没有发给我卧具。而岳明海和阚国富则领到了监狱的卧具。所有被褥的面和里都是用白花旗布做的。被子有四至五斤旧棉花，褥子很薄只有约二斤旧棉花，枕头里面是锯末。

下午 1 点半时，刘文有在走廊里喊了一声：“方便！”于是，三个小屋里的犯人都走了出来，从我等三人一个小时前进屋的那三道门走出平房。我们三人也跟在后面，沿着平房南墙往东走，直到大院东墙前的厕所。当洒完尿站在监房东南角等候其它人“完事”时，我环顾了一下四周。有一个犯人告诉我说北面的那一趟平房是小号，是禁闭监内重新犯罪或严重违犯监规的人的。从这集训队往南的那些平房都是各个劳动大队的宿舍。我感

觉这个监狱大院的全景就像是一座南北倒立的北京城似的。北京城也是分为内（北城）和外（南城），而外（南）城则是东西两端各延伸出一块的。另外，我还看到监狱大院的砖墙高约 3 米，再加上墙顶的电网，就和中南海的墙差不多一样高了！不过在砖墙两侧各 2 米处都有一层铁丝网。监狱警告：如果任何犯人胆敢走进和接触铁丝网，岗楼上的士兵就可以开枪打死他。尽管如此严峻，我却有了一种宽松感，因为这一切证实了我不过是生活在一所大监狱之内的一所小监狱而已！

放便结束回到小屋后，有些犯人开始抽烟。但不等他们抽完一支烟刘文有又喊了：“掐烟，学习了！”于是，抽烟的犯人们赶紧掐烟，住在木板床上铺的犯人们从铺上下来坐到大墙前的长木凳上，而住在下铺的犯人就各自坐在自己的铺头上。通常住在火墙西边的第二组犯人（反革命犯）和住在火墙东边的第四组犯人（刑事犯）是分开学习的。不过今天学习的内容是监规，于是，两组犯人就合在一起，在第二组组长石山麟的主持下一块儿学习了。

刘文有通过石山麟给岳明海、阚国富和我三人各发了一份监规。呆在绥化县看守所的那七个月里，我对于监房南墙上挂着的那八条监规就已经很熟悉了。我想这里的监规估计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吧。但奇怪的是发给我们的不是一张小纸片，而是整整一本包括二十条的小册子。绥化看守所的那八条监规倒是都包括在这二十条中。当然，最前面的几条还是罪犯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认罪服法。但接着还有对于犯人们生活中的许多限制：犯人不得穿便服；男犯必须剃光头，女犯（这里没有）必须剪短发；在监房外活动（主要是在非放便时间去厕所）必须以三人小组为单位，现在岳明海、阚国富和我已被编为第二组内一个新的三人小组了；犯人之间只许叫姓名，严禁乱取外号等。有一条引

起了我注意的规定是犯人不许阅读外文书。啊，如果我在这里把俄语和英语忘记了，那对我将是多大的损失！——我想道。

在学习过程中我得知，制定这二十条监规的原因在于新肇监狱并不是普通监狱，而是由于 1969 年的形势而建的“战备监狱”。这里收押的一般是十年以上的重刑犯人。犯人来此后首先必须经过入监集训，然后才被分配到各劳动大队去。现在在平房东段正式接受集训的犯人们都是 10 月 1 日国庆节前送来的。他们是本监狱的“候补居民”。而在平房西段这三间小屋里住的犯人们都是 10 月 1 日以后送来的。他们要等到平房东段集训队的犯人们学习结束分配走了，腾出地方来才能搬过去接受正式的集训。所以我还只能算是这所监狱的“候补居民的候补居民”！

第三监狱（即新肇监狱）是一个团级单位，一个大队是一个营级单位。集训队和待训队各有约一百名犯人，各队又分为几个包括 10-15 名犯人的小组。每个小组有一名组长和一名记录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副组长了），这都是由政府管教员来指定的。不过看来监狱领导把集训队和待训队都加在一起，只看作是一个连级单位，即中队。即使那样也应该往这里派一名指导员和一名管教员才对。但我待在这趟房的四个月中，我知道这里只有一名张管教员（不是那位 10 月 7 日那天把岳明海、阚国富和我三人领到这里来的那位监狱管教科的胖管教员），没有指导员。这位张管教员年龄和身材均属中等，说话为河南口音。他每天只是在上班时间来监房西端他的办公室里坐着，有时在走廊里漫步对犯人们作一些简短的训话，这里的日常事务则由他指定的七名杂工处理。杂工中的第一把手叫陈代生，第二把手叫樊文举。这两个人文化大革命前都是科级干部，因为贪污被判 15 年而进来的。他们俩人主管监房东段集训队的事务，主要是组织犯人们的学习和向管教员汇报每名犯人在集训中的表现等。刘文有则主

管平房西段三间小屋中待训犯人们的各项事务。这三位杂工对集训和待训犯人们都很凶恶。刘文有常常站在三间小屋之一的门前训斥新犯，告诉他们这里是备战监狱，这里实行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在监狱里也有阶级斗争，其表现就是接受改造与反改造之间的斗争等等。其他的四名杂工蔡祥、齐光、张书诚和赵俊清则是负责烧炉子和值夜班的。据说蔡祥是一个“五进宫”的老贼。他很滑头，但对新犯却很和善，常常来到某间小屋坐在铺头和新犯人聊天，劝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等。张书诚曾经是海伦县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师。我后来的妻子郭静珍说，当她五十年代在海伦念书时，张书诚曾经教过她。张书诚是因为两性关系问题被判八年进来的。因此蔡祥、张书诚和赵俊清三人都是刑事犯。据说最后的一名犯人齐光曾是《黑龙江日报》的摄影记者，是一名反革命犯。他身材瘦小，戴眼镜，始终沉默无语。

学习监规的方式很简单：大家在一起集体反复大声朗读这二十条监规，直到每个人都能熟背为止。有时穿插唱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或让某一罪犯谈一谈自己对监规的认识，到下午 5 点吃晚饭为止。晚饭是每人三两高粱米粥和几根咸萝卜条，我喝完粥后把那两小包饼干也吃了，心想再留下这两包饼干只会引起麻烦。如果有人向我要呢？如果有人从我这里偷呢？

从晚 6 点到 8 点还是“学习”，然后一直到第二天早晨 5 点就是睡觉了。在门的西北角有一个公用的大尿桶，旁边还有一个便桶。每星期有一组犯人轮值负责在起床后放风时将大尿桶和便桶带出，倒尽和冲刷干净。6 点钟吃早饭，早饭是每人三两高粱米干饭和一碗土豆炖白菜。犯人们领饭的方式是很有趣的：监狱里没有饭厅，只有大伙房。所有犯人都在监舍里吃饭，每人学习时的座位在哪儿吃饭也就在哪儿。每名犯人的粮食定量以他的劳动工种为准，一般是每月 48 斤粮。不过细粮中的半斤油和 3-8

斤细粮则是不论工种都一样的。主食以高粱米为主，有时也有苞米渣子或苞米面。集训犯人和待训犯人都属于非劳动犯人，因此每月的粮食定量只是 30 斤，即每天一斤。这每天一斤的粮食分配到三顿是：早晚各三两，午饭四两。星期天则吃两顿饭，早饭在 8 点钟，四两，晚饭在下午 3 点钟，六两。如果主食是窝头则论个分发，高粱米饭则是按重量分发。考虑到焖高粱米饭得加水，因此给高粱米饭的办法是：生高粱米的本身重量加一倍半的水，如果是粥则以勺为准。领饭的过程很复杂：每组犯人可以选择（请注意，不是政府指定，而是选举，这是犯人们唯一的选举权）三个人来处理本组的吃饭事务。第一个人负责到厨房去领饭，第二个人负责给大家分饭，第三个人负责给大家分菜。每顿开饭前每中队有一名杂工，领着本中队各组的领饭人来到大厨房，每名领饭人挑着两个空桶，一个装饭另一个装菜，炊事班犯人则根据每组人数（事前已办好饭票）向各组发放饭食。如果主食是窝头（每周能有一两次是馒头），数个儿放进桶里就是了。如果主食是高粱米干饭，那就得先把空桶放到饭锅前的一个磅秤上，然后炊事员用一把大锅铲将高粱米干饭铲入桶内。磅秤上的重量必须是：应给的高粱米重量 $\times 2.5$ +空桶重量，少了就往桶里添一点，多了就从桶里铲出一点。副食通常都是菜汤，用大勺按人数往桶里盛一定的勺数就行了。领饭人把饭菜挑回监舍后，另外的两名当选者就要开始忙了。分菜人简单地把菜汤用勺盛进每人的饭盆就行了，最后桶里还剩一点则给每人添一小口。主食如果是窝头，分饭人按数递给每个人就得了。但绝大多数情况下主食是高粱米干饭，分饭人执行任务的方式就比较复杂了：他必须准备一个圆梯形的水舀子或钉制一个木头的四方形小饭斗，这个水舀子或小饭斗要正好能装下一斤高粱米干饭，饭桶旁还应该放一桶水，分饭人每次在往水舀子或饭斗装饭之前，得先把它往

水桶里浸一浸，往水舀子或饭斗盛饭用的是一个细长的木板板，盛满后用饭板两面光的前部把水舀子或饭斗的上面刮平，最后才把这团高粱米饭倒入某一犯人的饭盆里。最后如果桶里有剩余，再给每个犯人补一小口。这种分饭的方式看起来是公平的，但干起来却常常出现麻烦。其一，从水舀子或饭斗里倒给每个犯人的饭团，虽然看起来大小一样，但是密度则是不一样的。分饭人可以给某一个人很紧的饭团（可能这是他的铁哥儿们），而给另一人的则是一个很松的饭团（可能这人和他关系不好）。有时一个犯人在领到一个松散的饭团之后，就抢过一个犯人压实了的饭团，把两个饭团展示在“公众”之前，大叫分饭的不公平。其二，有时分饭到最后时，桶里的高粱米干饭已经光了，但本小组还有一两个人没有领到饭。这时已领到饭的人已经吃饭，而分饭人还不得不从本组每名犯人的饭团里抠回一点高粱米饭给那名没有领到饭的人。这样每一个“给饭人”都是不高兴的，因为这是从他们的口中夺食。而最后那个领饭人也不高兴，因为他感觉这样来的饭无论如何也是不干净的。

秋天里因为准备过冬而显得忙碌：抹墙，修理门窗并用纸条糊住窗户缝，最主要的还是储藏秋菜。这些活儿需要人手，于是待训队的六个组犯人每天有一个组轮流被派去干这些活儿。这倒是该组犯人们乐意做的事，因为干点活儿总比坐在小屋子里搞那种味同嚼蜡的“学习”要有意思一些，更重要的是干活当日就可以吃“劳动粮”（每天一斤六两）。但是到十月末时，所有备冬的活儿都已干完了。犯人们都领到了冬装，包括棉袄棉裤各一件，棉鞋一双和带有狗皮护耳的棉帽子一顶。现在大家都得整天坐在小屋子里靠“学习”来打发时光了。只有在星期日他们才能洗衣服，写信（当然信件都是要经过政府干部审阅后才能寄出的），玩扑克或下象棋等。我无处可写信，也不玩扑克象棋等，

我洗完衣服只能在铺上闲坐，或与石山麟聊聊天。

如果学习的内容只是监规、读报、毛主席著作、唱毛主席语录或诗词的歌曲，那还是比较好混的。麻烦的是每个人要谈对自己罪行的认识。刑事犯和戴有“反革命”帽子的刑事犯也比较容易过关，因为他们犯的罪是比较具体的，其他犯人对他们的认识也不太吹毛求疵。通过犯人自己的陈述和犯人间交谈，我得知我们这间小屋的犯人中许多是来自哈尔滨的，有的人还是犯罪团伙的成员。使我感到惊骇的是，第四组的记录员贺继祥，一个约50岁的老头儿，是因为强奸亲生女儿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另外，在刑事犯中间还流行着这么一种“自我评价”：“我们吃着了，操着了，到这里来也值个儿！”他们瞧不起反革命犯，说：“你们没有吃着，没有操着，只说几句话就进来了，真是窝囊！”

反革命犯的“犯罪行为”的确比较困难。讨论中你不能不发言，沉默被认为是抗拒无产阶级专政。但你一谈自己的犯罪行为，任何一个犯人都可以挑毛病，说你犯罪根源挖得不够深等。有时不认罪的犯人就被揪出来站在屋子中央，作为“反改造”的典型接受批斗。

待训队第二组共有十二名反革命犯，在其它九名犯人中，我与三个人接触较多，就是组长石山麟，记录员李春元和徐钺。石山麟是一个才26岁的年青人，朝鲜族。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爆发时，他是哈尔滨工业大学三年级的一名学生，成为了炮轰派的头头之一。红色造反团击败炮轰派后，石山麟就成为了一名“反革命犯”，被犯判处有期徒刑15年。有一次一齐在菜窖里劳动时，石山麟对我自豪地说：“我是地地道道的从政治舞台上被打下来的！”李春元40岁，比我大一岁。他曾经是哈尔滨电工学院的保卫科长。他告诉我说他是因为讲过江青就是30年代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苹，而被打成反革命判处有期徒刑15年的。李春元

愿意和知识分子犯人接近，瞧不起农民犯人，说他们不讲卫生，口臭等。然而，李春元主要的倾向还是揣测管事的政府干部的意图，考虑怎么说话才能迎合政府干部的意愿等。如果干部要求他停止与知识分子犯人和睦接触的话，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的“高雅”了。我虽然有时和李春元聊天，但不太喜欢这个人，觉得他其实也不够格当“反革命犯”。不过与我的意愿相反，在后来的几年中，我不得不在李春元的“领导”之下进行改造。

“反革命犯”中与我相似之点最多的是徐钺。徐钺是在我之后几天被送到这里来的。徐钺年约 45 岁，身材瘦高，大家对于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的身体非常虚弱。十月中旬时天气还不很冷，但是徐钺却戴上了棉帽子，把两旁的护耳放下并将护耳末端的小绳子系在下颚上防寒。他在看守所里已经蹲了快三年，因此走路显然也很吃力。吃饭时大家都觉得吃不饱，而徐钺却每顿都吃不完自己的那一份饭。首先使我感到徐钺与自己属于同类的是他是佳木斯市第一中学的物理教员。徐钺的履历是他自己在“学习”中谈出来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时，徐钺参加了国民党空军，在成都市当飞机工程师。在 1949 年春季，出于对于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徐钺和几名同事离开成都，在陕西省东渡黄河投奔了解放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钺被分配到长春市的一所空军学校当教员。但不久徐钺和单位党组织之间就格格不入了。有一次徐钺说：“东方红”中唱道：“他（指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这和“国际歌”的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是互相矛盾的。这就犯了共产党的禁忌。于是在五十年代中，徐钺就被调到佳木斯，成为该市第一中学的一名物理教员。徐钺在佳木斯市成了家，但是没有孩子，当然徐钺对于 1957 年以后国家的情况是不会满意的。对于他来说，不被划为右派分子就算是够客气的了。然而到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对他的这种“客气”不

复存在，于是徐钲就成为了一个黑帮。由于对于自己在 1949 年作出的选择感到后悔，对未来失望，他就和妻子一起触电自杀。最后妻子不治而死徐钲获救，被关往佳木斯看守所，几个月后被放回佳木斯一中。但是在 1968 年“深挖三特一叛”开始时，徐钲又被送进了佳木斯市看守所。在监房里徐钲遇到一个越境去苏联又被苏方遣送回国的犯人，徐钲出于好奇心就和他谈论起如何去苏联的路线等。这一来徐钲没有罪也变得有罪了，成为“反革命犯”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期从 1968 年 3 月起。当徐钲被送到这新肇监狱时，他的刑期已经只剩下五年半了。

我和徐钲都是中学教员，两个人都孜然一身，在社会上没有任何亲属，两个人都是因为言论而被打成“反革命犯”。不过不同的是徐钲即便是在监狱里也很健谈。我只是当学习中轮到发言或情况迫使我说点什么时才说话。我这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感觉现在说啥也没有意义。而徐钲则不论关于自己的事或关于别的犯人的问题，都滔滔不绝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他忘记了自己“反革命犯”的这个身份，还说要将自己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整理成一本哲学小册子。这一切当然就被杂工犯人汇报给张管教员了。监狱当局按惯例在每期集训犯人中均要找出一个“反改造”的典型来作为批斗对象，徐钲也就自然而然地被选出来担此重任了。于是在 11 月份里，在中间那间小屋里待训队第二组和第四组学习时，批判徐钲就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学习内容了。

到 12 月初时，平房东半部集训队的犯人们系统学习结束，被分配到了各个劳动大队。于是平房东半边就被腾了出来，让西面三间小屋里的待训犯人搬进去，组织成新一期的集训队。这以后被送来的新犯则又住进西南的那三间小屋，算是新的待训队了。平房的东半部是一大间东西向 25 米长南北向六米宽的大房。房间的布局很像绥化一中的学生寝室：沿南北墙各为一趟双

层的大木板铺，中间则为一道东西向的火墙。新的集训队被分为七个小组，其排列顺序是：先是北双层木板从东往西，接着是南双层木板铺从西向东。所有七名杂工犯人都住在南木板铺东端靠门处。他们那里有两张桌子，可以吃饭和写字。

第一二三组是由刑事犯人组成，从第四到第七组则是由反革命犯人组成。我在第五组，共有 14 名犯人，组长仍然是石山麟。我在待训时期的其他“同组难友”都被编到了其它组。徐钲被编到我东面的第六组，学习中我常常听到从那边传来批判徐钲的发言。在我所在的第五组里，有一个名叫洪兴学的犯人的情况的确突出：洪兴学原来是驻守在黑龙江边的边防军士兵，但是他却带着枪跑到苏联一方，又被苏方送了回来。他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被送到这里来改造。通常“缓二”犯在两年之后都不会死的，只要“改造得好”就可以改判成无期徒刑甚至有期徒刑。然而，洪兴学却没有享受到这种机会，两年以后，据说是由于殴打管教员，洪兴学被枪毙在监狱东南面的土豆地里。

现在集训队的犯人可以用自己的钱从监狱的小卖店买东西了。买货的程序是：当你被送来时，押送你的本县管教员就把你的钱交给监狱管理部门。监狱不会把现金给你，而是为你立上一个账户。而且，每名犯人每月有两元伍角的零用钱，也入账。因此，当我 10 月 7 日被送到这里时，绥化县的王管教员就把代我从绥化储蓄所取出的 200 元存款（扣除在路上买六小包饼干的钱）交给了监狱。现在我的小账就在杂工刘文有的手上，我来后把自己身上还剩下的五毛钱和三斤粮票也交给了他。12 月 10 日那天，刘文有宣读了监狱小卖店的供货单，各组记录员记下了本组每个犯人要买的货，然后报交刘文有。订货很快地就被送来并被分发给买主。我一下子花 12 元钱买了十斤苹果和二斤糖块。我已经一年多没有吃到这些东西了！

这一期的集训与全监狱犯人一年一度的“冬训”正好同步。集训共分为四个单元：1) 国际形势；2) 国内形势；3) 认罪服法和交待余罪；4) 给每名犯人作鉴定。

12月10日，在集训队的这间大宿舍里，张管教员给全队犯人宣讲了第一课，即1970年的国际形势。他报告中的要点也就是毛泽东520声明中的那些要点：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今后世界不外乎两种可能：或者是战争引起革命，或者是革命制止战争。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张管教员讲完课后还留下了一道思考题：为什么说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呢？讨论三天之后接着上第二堂课，即国内形势，还是张管教员讲课，当然说的是国内形势大好了。只有到第三课，认罪服法和交代余罪时，才接触到犯人的具体情况。犯人们总是可以从别人的认罪发言中挑毛病的。而每个犯人的认罪态度又将直接影响到学习的最后阶段，即给他作的那个鉴定。鉴定的好坏就会直接影响到下一阶段在监狱里的生活和劳动条件，这个阶段或许是到下一个冬训为止。

鉴定结束时也正好到1970年末了。通过每名犯人集训鉴定的程序是：先由犯人写出（不识字的犯人可请人代笔）写出自我鉴定，在小组会上宣读，经过大家挑毛病修改通过送交管教员审批。多数犯人的鉴定是能被通过的。但是往往有的组总有这么一两犯人的鉴定总是通不过或者被“挂起来”，这样的犯人就有成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危险了。

通过鉴定的情况使我回想起自己五十年代在苏联学习时的一些情况。那时也有一年一度的“政治学习”（不过不是在冬天，而是在夏秋每一学年结束之后），末了也得作一次年度鉴定。通过鉴定的方式也是：先由每个学生写自我鉴定，在小组会上宣读，经过他人的挑剔修改后通过。可能有的人的鉴定通不过，接

着就是麻烦。我在 1958 年就是“向党交心”通不过后被遣送回国的。哦，何其相似：留苏学生是中国知识青年中比较优秀的一部分，犯人则是中国社会中的渣滓，但是他们却有同样的“学习”方式，同样为自己的鉴定能否被通过而惶惶不安。看来这就是中共平常控制个人言行的传统而又通用的方式吧！

集训的最后一台压轴戏就是全队召开的系统批判徐钺大会。这一点其实早在待训时期众犯人都心知肚明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犯人都奉命在会上宣读自己的批判发言。我说徐钺总是只看到自己的“光荣历史”，其实没有他，新中国不也建起了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吗？徐钺对人民政府不满导致他走向了反革命等等。徐钺当然在会上被迫面对众犯低头弯腰，让那些流氓歹徒把他折腾得够呛。

在我和徐钺都被释放回家几年后，徐钺告诉我说：张管教员曾把他作为不认罪不服法，在监内散布反动言论的典型上报给监狱领导，请示给他加刑。但是监狱领导没有批准，说他就是那么一个花岗岩脑袋，加几年刑也没有用，限制他在犯人中的影响范围就是了。

批判徐钺是监狱控制犯人的一种手段，即它必须定期地找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犯人作为批判对象，用以扼杀所有犯人的思想。即使没有一个徐钺，他们也得另外找一个犯人（当然是在知识分子犯人中找）比如说我吧，来充当这个重点批判对象。我这一次没有扮演这个角色。但是一年以后，在 1971—1972 年之交时，这个角色终于到了我的头上。

第十六章 1971 年 砖厂

(1)

集训结束后，集训队的犯人们在这里继续待了大约 20 天，等待被分配到各个劳动队去。我们在这里每天干的事不外乎学习毛主席著作等等。元旦期间我们吃到的两顿饭菜至少要比绥化县的社会学习班和看守所多一些。

1 月 17 日早晨，包括徐铎和我在内的几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犯人被召唤到管教员办公室。张管教不在屋内，在这里的是另一位监狱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并没有对我们进行训话，只是询问了每个犯人的专业并作了笔录。他对徐铎的专业表示了注意。但当他得知我虽然曾经留苏，而其专业却是历史时，就不吱声了。

两天之后的 1 月 19 日，大约有 30 名犯人奉命离开集训队。他们中间有我的绥化“老乡”岳明海和阚国富，还有我的前组长石山麟。接着我得知这些人并不是被派往本监狱的各劳动队，而是被分到位于北安的黑龙江省第二监狱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三位“集训老同学”。在我出狱后多年的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从报纸上得知石山麟也被平反释放了。他在哈尔滨开办了一家给水设备公司，效益很好，他并且因此出了名。

1 月 20 日下午，张管教宣布其他集训队犯人的分配名单。徐铎被分往直属队下属的设计室。我、高文华以及我们待训时期的记录员李春元被分往第三大队。我不知道第三大队是干什么的，但是可以设想这个第三大队决不会比徐铎去的那个设计室好。现在我意识到，一个人如果只有人文知识而不懂技术，就不

会被分配到一个好地方去了。

晚饭后来了两名第三大队的犯人，一名来自该大队所属的第七中队，另一名来自该大队所属的第八中队。他们来的任务是领走被分往该大队的集训犯人。被分往第三大队的犯人共 12 名，6 名去第七中队，另外 6 名去第八中队。我、李春元和高文华去的都是第七中队。刘文有要求他们交回从集训队领用的被褥和饭盆，说这些东西他们将另从劳动队领得。我们的账目也将要被转过去。

第三大队位于集训队往南的第三趟平房，中间隔着第一大队。和集训队一样，这趟平房也是从中央被分隔成两半。西面的一半是第七中队，东面的一半是第八中队。平房的西北角也伸出一个小门斗，门斗的门在南面。整个第七中队的布局和集训队相似，即沿着南北墙是双层的大木板床，中间则是一道长火柜。全中队的犯人约 100 名左右，也分成七个组。七个组在室内安排的顺序与在集训队恰好相反：杂工们先占据了门与南双层铺的东端，还有一张桌子。然后是第一、二……组沿着南双层铺由西向东，接着再沿着北双层铺由东向西。

从集训队分来的这 6 名犯人中有一名叫郭同孝，是一名年约 30 岁的“反革命盗窃犯”，判的是死缓。他没有自己的被褥，刘文有就从集训队的仓库取出的我的大皮箱命令郭同孝给扛着，又命令另一犯人拎着我的大洗衣盆，我则扛着自己的被褥。这 6 名新犯人一走进第七中队监舍，就看见门旁的桌子后面坐着一名杂工。这个杂工名叫于成方，年约 40 岁。虽然监规不许乱取外号，但这个中队的犯人们都叫他“于大头”，因为他的脑袋很大。于大头先让每名新来的犯人填了一份表格，然后留下我的大皮箱，以后送到监舍顶棚的储藏室里。这 6 名犯人被分入本中队不同的组里。我和郭同孝都被分配到第三组，住到南双层铺中段

的上铺。郭同孝从中队仓库领到被褥，两人都领到临时使用的饭盆，但被告知说以后用自己的钱从监狱小卖店买得饭盆后，还需将此饭盆归还。

现在我终于成为新肇监狱的正式居民了。作为第三大队的一员较之作为集训队的一员，其主要不同在于我现在吃的是劳动口粮，即每月 48 斤，每天 1 斤 6 两了。这 1.6 斤口粮分到三顿是：早午饭各 6 两，晚饭 4 两。许多年后在读到索尔仁尼琴所著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时，我不由得把自己的口粮与舒霍夫在苏联监狱里的口粮标准作了比较。舒霍夫每天的早饭是 350 克面包和 50 克粥，晚饭是 400 克面包。每天共 800 克，即 1.6 公斤。二者一样啊！我们来到第三大队之后不几天就赶上了过春节。所有的犯人吃了三天即六顿好饭。而且春节前监狱小卖店供应给犯人们的货物品种也比较多。我帐上还有将近 200 元钱，是大家羡慕的对象。我买了不少食品和两个饭盆，美美地过了一个春节。

现在我才弄明白第三大队是一个砖厂，负责为建设整个监狱供应红砖。砖厂通常每年只能在春天到秋天进行生产，冬天则是为来年生产做准备，并对犯人进行冬训。春节前几天第三大队的犯人已经不出工，坐在监舍内“冬训”了。劳动队冬训的进度比在集训队要慢一些，因为在 12 月和 1 月份上半月时，劳动队的犯人们还在整天劳动。现在第三大队的犯人们还在学习冬训的第三课，即“认罪伏法”。虽然我在集训队时已经过了整个的集训过程，现在还得坐下来重学这个第三课。虽然这种学习很枯燥，但是也有一件好事：第三大队在砖厂里有一个澡堂，春节前所有犯人都在那里洗了一个澡。我几乎一年没有洗澡了。在集训队里只是能用自己的指甲刀把脚指甲剪短而已。过去我的习惯是每周末洗一个澡，现在因为有大洗衣盆，基本上每周末能洗一次。从

此我感觉自己重新生活得像一个人，而不像是一个什么动物了。

大年初一、初二和初三是既不出工也不学习的。犯人们可以做自己的事情，例如洗缝衣物和写家信等。但是多数犯人是将多数的时间用于打扑克和下象棋。我需洗缝的衣物不多，无处可写信，也不打扑克不下象棋。我将大部分的空闲时间用于躺在上铺自己的铺头上和邻铺的人聊天。通过这些聊天我才获得了一个关于本监狱各劳动队，关于第三大队、关于第七中队和关于我自己所属的第三小组的情况的概念。虽然黑龙江省第三监狱对外称是一所高压开关厂，但现在它仅仅是处于初创阶段。现在只有处于第三大队南面的第二大队是从事本厂的专业产品生产的，其它大队都是为建厂而服务的。位于第三大队和集训队之间的第一大队是基建大队。第四大队则是农业大队，负责向全监犯人、行政人员和家属提供副食品。最后还有一个直属队，属下有徐钺去的设计室，大库、小卖店、食堂和卫生所等。

基建用砖量很大，砖厂即第三大队就是为此而建立起来的，是全监各队中劳动强度最大的大队。第三大队本身又分成两个中队：第七中队是半成品中队，负责制坯；第八中队是成品中队，负责烧砖。第三大队的所有政府干部都来自前哈尔滨监狱。教导员张百发约 35 岁，戴一副眼镜。大队长姓潘，个子中等，脸宽宽的。第七、八两个中队都暂时只有管教员而没有指导员。第八中队的金管教员是一个小个子，约 30 岁。第七中队的马管教员也是约 30 岁，瘦高的个子，戴眼镜。此外还有一位约 50 岁的于管教员，他似乎只管砖厂的生产事务而不管犯人的日常事务。我感觉这些政府干部还是比较和善的，没有看见过他们打骂犯人。

现在再说第七中队的犯人杂工们吧！总的说来所有不直接劳动的犯人都是杂工。主要杂工是干部指定的“带队”。“带队”是全中队 100 多名犯人中的第一把手，他主持全中队的生产和学

习事务。现在中队的“带队”孙百福正好和我同在第三组。孙百福是个历史反革命犯，年纪应该在 50 岁以上了。他个子略微矮胖，戴着眼镜。另有三名犯人负责监舍内日常事务，叫着“站道”。三名“站道”中于成方（即于大头）负责犯人的伙食和从小卖店买货等事务。于成方来自肇州县，因贪污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年。另外的两名“站道”都是年老的历史反革命犯人。他们负责打扫监舍和挑水供犯人们喝水、洗漱和洗碗等用。在夜里犯人们睡觉时他们二人值班看屋，一人值上半夜，另一人值下半夜。

我所属第三组的构成也很有趣。全组共有犯人 15 名，其中刑事犯两名、现行反革命犯两名，其他的 11 人则全都是历史反革命犯人。“历史反革命”是指他的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犯下的。因此这些人在 1949 年 10 月 1 月以前就进了监狱，在里面至少过上 22 年了。这样就可以设想第三小组犯人的平均年龄是很高的，因为历史反革命犯占绝大多数嘛！他们在中共建国前是为伪满洲国或国民党服务的。“带队”孙百福、砖厂统计员胡永春和小组记录员邓振声都曾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军官。据说邓振声还是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团级干部。在其他历史反革命犯人中有一个名叫郭忠林的引起我的一些注意。郭忠林人高马大，年纪在 60 岁以上，脸上有麻子。他曾经是满洲国时期海伦县的警察局长，该县被苏联军队解放后他即被送进监狱。他曾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后又改判为无期。因此他在监狱里已经待了 25 年以上了。

第三组仅有的两名现行反革命犯就是新分来的我和郭同孝，也是本组犯人中年纪最轻的了。本组的两名刑事犯人刘鸣湘和苏景新年纪都在 40 岁左右。刘鸣湘过去是一个和尚，他被指定为第三组的组长。但是因为带队孙百福就在本组，刘鸣湘事事都去和他商量，他自己这个组长的地位也就不明显了。苏景新是一个

理发师，据说是哈尔滨市有名的大赌徒，判的是 8 年。

春节后就是 2 月份了。第三大队的犯人生活日程改为每天上午学习下午出工。这时冬训已进到最后一课，即给每名犯人作评审（即鉴定）。虽然仅仅在一个多月前我已经在集训队通过了一次评审，现在还不得不在这里再搞一次。评审程序还是在集训队时一样的：每名罪犯写出自我评审（不识字的罪犯可以找识字的代写），在小组会上宣读，经过大家挑毛病和修改后，由小组会通过再呈交干部审核。我以为自己的评审既然在集训队已经通过了，那末在这个第三小组里只不过是重复走一次过场而已。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小组里历史反革命犯占多数，他们自以为在监狱里的时间长，在改造中思想水平就高，总想教教“新毛头”们怎样认罪服法，以自己的“监龄”作为资本给新毛头们下马威。他们的评审都很轻易地被通过了，组长刘鸣湘和赌博犯苏景新的评审也顺利通过。但是不知为何他们对于我和郭同孝这两名现行反革命犯的评审都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两人的评审都是经过两三次修改才得以通过的。另外那个伪满洲国海伦县的警察局长郭忠林在批判我和郭同孝时还特别积极。郭忠林揭发我曾说过“党曾经培养我许多年，我现在劳改 20 年是欠债还钱！”郭忠林说我的“欠债还钱论”是放毒！

每天下午出工劳动的任务是为将从新肇火车站通往监狱的一条专用铁路线垫路基。这个活儿不轻，尤其现在土还是冻着的。取土必需用大镐，铁钎和大锤。把取下的土用独轮车或双轮车运到路基上也很费劲。这活儿使我想起 1968 年冬天在绥化一中当黑帮时修“五七公路”的那一次劳动。不过那次劳动是临时的，而今后我就得是整年地干重活了。

半年前我走进监狱西大门，现在因为干活我每天又得在犯人队列中走出这道大门了。所有犯人出入二门（即生活区与车间区

之间的那道门)都得有本大队的政府干部领着。出入前必需列队向二门警卫室的值班管教员报告,经允许后才能出入。过门时必需是五人一列,负责报告的犯人必需站在警卫室的窗前数着:“一五、一十、十五、二十……”最后说:“报告管教,人数正确!”如果报告的人数与实际人数不符,队伍就得撤回门外边,重走重数,直到弄清楚为止。如果走时队列不齐,值班管教员发怒了,队伍也得撤回重走。但这些还只是牵涉监狱内部规定的事。而如果犯人要出工到监狱大门之外时,就得有武装部队押送了。驻扎在新肇监狱地带的解放军部队估计至少是一个营。每次一批犯人出监狱大门劳动就得有一定数量的士兵押送队伍才能行进。行进中两名带枪的士兵走在队伍前端的两侧,另两名则走在队伍末端的两侧。如果犯人队伍很长,则在一定长度时两侧加上带枪的士兵,犯人劳动时只能在划定的区域内活动。任何犯人如果超越警戒线就可能被疑为企图逃跑而被击毙。干完活犯人们重新站好队,带队的向押送士兵报告,经允许后即往回返。犯人队伍完成进入监狱大门的程序之后,押送士兵即可返回自己的营房,犯人们则要完成通过二门的程序才能回到监舍。许多年后在读到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时,我发现每天出入监门的程序与舒霍夫每次出入监门是相似的。不过舒霍夫们每次出入都要搜身,而我出入监门倒是没有这一道手续。我猜想黑龙江省第三监狱的这一套制度可是从前苏联搬过来的吧!

到3月份时,所有犯人的评审都搞完了,冬训也就结束了。犯人们开始了全日劳动,但不是去修铁路专用线,而是回砖厂去准备今年的红砖生产了。这时又从集训队往第三大队分配来了一批新犯人。他们的幸运之处在于没有在集训队那儿搞那么长的乏味学习,也没有到劳动队来再通过一次评审。在这些新犯人中,有一名叫刘自珊的被分到了第三组。我在与他谈话中得知他来自

绥化县四方台公社，因为盗窃被判 10 年。刘自珊告诉我说那个老靳太已于去年底死了。这个杀死一个小姑娘的老太太，在拘留所里折腾几年之后，就没有任何结论地死去了。

从绥化一中被抓到社会学习班之后，我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不能看报了。在这段时间中，我只能通过大喇叭或在集体学习听别人读报中得知国家的形势，但是自己却摸不着报纸。这是使我感到别扭的。现在来到第三大队，我有可能恢复自己的每日读报习惯了。监狱订有报纸供犯人们学习用。第七中队分得七份《黑龙江日报》和一份《人民日报》。每个小组能分得一份《黑龙江日报》，而那份《人民日报》则是在各小组轮流，每个小组一个月。我感觉亲眼看报并未使我比从大喇叭听来的多知道多少。但是 3 月 18 日那天的报纸却使我有些感到困惑：1971 年的 3 月 18 日应该是巴黎公社 100 周年，但是报纸并没有怎么提及这点，而是大肆祝贺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来华一周年。“哪一件事更重要呢？你中国共产党不自以为是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吗？为什么不好好地纪念巴黎公社 100 周年，而是大肆宣传什么西哈努克亲王来华一周年呢？”此外，我特别注意读报的这一表现后来也成为了证明我“反改造”和“幻想变天”的一个因素。

从 3 月份起全监犯人全日劳动的日程是这样的：早晨 5 点起床，6 点早饭，7 点在二门里集合排队。队伍进入监舍大门和二门的程序前面已经说过了。犯人们回到监舍后 6 点吃饭，7 点到 8 点学习。8 点 30 分听完新闻广播和经过晚间点名之后就寝。

在《伊丸·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索尔仁尼琴说舒霍夫每天的劳动时间是 11 小时（可能所有前苏联监狱里的犯人都是这样的）。现在，在黑龙江省第三监狱，犯人们的劳动日则是 10 小时（从早 7 点至晚 5 点）。当然二者都有一小时的午饭和午休

时间。虽然我的劳动日较之舒霍夫的要短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并不是给我的，因为我每天晚上（除去周六和周日）必须必坐在监舍里“学习”，而舒霍夫却无需如此。舒霍夫可以一个人在监狱的生活区（相当于新肇监狱的内院）到处溜达，而我在监舍之外则必需以三人小组为单位而行动，即使是在放风时间之外上厕所也得是这样。现在我这个三人小组的另外两人是刘鸣湘和郭同孝。冬训学习是按照一定程序进行的，而常年的学习一般是读报，讨论生产问题或批斗当日犯了错误的犯人。

舒霍夫每天晚上在躺下睡觉前还得经受一次折腾，即晚间点名。所有犯人都得走出监舍按五人一排站好点数。数目对了就可以躺下睡觉，否则又得出屋重新点数。因此舒霍夫通常要到晚上10点左右才能躺下睡觉。我倒是不用经受这种折腾。这里晚间点名不要求所有的犯人都走出监舍。晚8点半，在最后一次放风之后，二门值班管教员就开始查点每一处监舍的犯人人数的了。他先是从北向南检查所有平房西半部的监舍，因此第三大队第八中队是他所查的第三处监舍。管教员一走进监舍，负责上半夜值班的“站道”就喊叫：“坐在自己铺上点名了！”报数是从南双层铺上铺从西向东“一、二、三……”，接着从北双层铺上铺由东向西，然后再南双层铺下铺从西向东，最后是从北双层铺的下铺从东向西。如果人数正确，值班管教员就说一声：“睡觉”，走出监舍从外面反锁监舍门，往南去查点下一监舍的人数去了。在查完最南面一趟平房监舍（这应该是狱内卫生院），管教员就从南往北查点所有平房东半段监舍的犯人人数的了。当他检查完所有监舍的犯人人数的时，大约就是晚上9点钟了，因此我所属的第七中队的犯人们能占到的一点便宜是，我们较之住在最东北端的那间监舍（这应该是集训队）的犯人，起码能早半个小时躺下睡觉。

把我在黑龙江省第三监狱的生活与舒霍夫在前苏联古拉格群

岛的生活作一比较，可以说二者是各有得失的。舒霍夫的劳动日较长，很难得到休息的机会。但是在古拉格群岛上舒霍夫们受到的思想控制似乎比较少。他们不用每天在营房里学习一小时的斯大林著作，互相批判或斗争反改造分子等。舒霍夫们可以互相谈论自己的案情。我们虽然劳动日较短，却是经常处于严密的思想控制之下，我们得每晚上坐在监舍里学习毛泽东思想。我们互相谈话时得处处小心，以防哪一句不小心说出的话被汇报到干部那里，那就是反改造或重新犯罪了。在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上是没有所谓“思想改造”（即“洗脑筋”）的这个概念的，而在毛泽东的统治术中，这却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并且被解释为“毛主席的人道主义教育政策！”

舒霍夫的刑期是 3653 天（从 1942 年 2 月到 1952 年 2 月）。当索尔仁尼琴描写他 1951 年初在古拉格群岛上一天的生活时，他的刑期只剩大约 300 天了。我的刑期是 $365 \times 20 + 5 = 7305$ 天（从 1970 年 2 月 25 日到 1990 年 2 月 24 日，其中 1972、1976、1980、1984、1988 年是闰年）。而且这 7305 天中我只度过了零头（305 天）稍多一点，整数还在前面哩！我注意到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自己的刑期，拈起手指一天一天地数。只是有家庭的犯人和即将出监的犯人比较关心自己的刑期。多数犯人待在这里就像过日子一样。我孑然一身也把这里当作长期旅馆。此外，我觉得自己不见得在这里还要待上 7000 天。说不定不用 7000 天，国家形势发生变化，我又得到什么别的地方去了呢！

（2）

3 月末气温达到零上，泥土不再冻结，作为半成品中队的第七中队就开始制坯了，而作为成品中队的第八中队则晚 15—20

天才开始生产，因为必需等有足够数量的砖坯生产出来干燥好，可供连续入窑后才能点火。

于是在3月末，第7中队的这100多名犯人，又被重新编成七个组。这七个组是根据生产砖坯的五道工序而编定的：1) 第一道工序，第六组和七组，或供土组，负责向制坯机的井口供土；2) 第二道工序，第一组，管理机器房，负责切砖坯；3) 第三道工序，第二和第三组，或拉坯组，把新切出的砖坯用双轮车运往架棚；4) 第四道工序，第四组，或叉坯组，把砖坯从双轮车上卸下，用叉子把新坯叉放到架棚地面上，放成长台形，每列坯约五层高，每层10—12块，每层组成多列坯。每列中每块坯之间相距约一指宽，各层之间交叉互压或互顶着；5) 第五道工序，第五组或划架组，主要是老年犯人，负责把台形的半干的砖坯垛重新摆成架棚两边上的两道长长的单列坯墙，是网状似的花墙，以加快晾干砖坯。这两道单行的砖坯墙为10—12层高，每块砖坯之间相距约一指宽，各层之间交叉互压互顶着，关键是不能让其倒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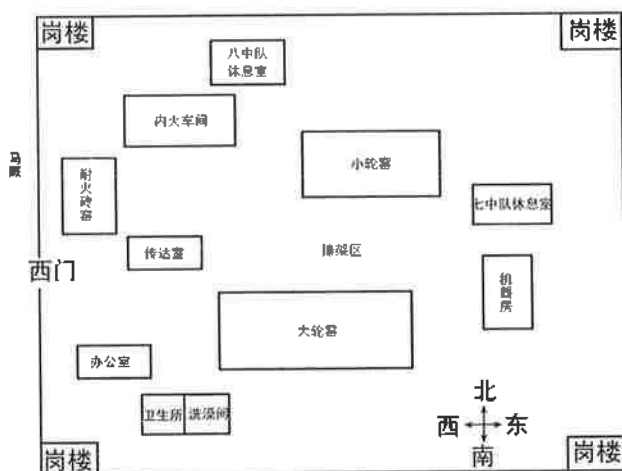
第二道工序（机器房），第四道工序（叉坯）和第五道工序（划架）都不算很累，但是要求操作有一定的熟练程度。第一道工序（往制坯机井供土）和第三道工序（往架棚拉坯）则是紧张的重活。我被编到第七组即供土组，这说明我要干整整一年的重活了。

第一组（机器房）的犯人们都得是懂得一点技术的（机工或电工），不在于他是刑事犯还是反革命犯人。第二、三、四组的成员都是刑事犯。第五组的成员是以刑事犯为主体的老年犯人，但是也有几个历史反革命犯，因为他们善于划架。最后所有的反革命犯人都被编入了第六组和第七组即供土组。所有的历史反革命犯人都编入第六组，他们中间的多数人都与我同在原第三组待

过，不过对于该组的组长李季我并不熟悉。包括我在内的 17 名现行反革命犯人都被编进了第七组。第七组的组长是李春元，我集训时期的“同学”，不过我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高兴。我的另外两名集训“同学”郭同孝和高文华也在这一组。接着我又和同组一名叫高积学的犯人混得很熟。高积学是山东省人，年约 40 岁，捕前是一个跑单帮搞买卖的，因此到过许多地方。我在与他聊天中得知他还到过四川省。他是一名“反革命盗窃集团销赃犯”。这项“反革命”帽子是怎么戴上的呢？“真有意思”，我想道：“反革命犯真是各种各样啊：反革命盗窃犯、反革命抢劫犯，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盗窃集团销赃犯。但是为什么唯独没有反革命强奸犯呢？”

前一段时期的带队孙百福被调到第四大队去了，新被指定的带队是一名叫黄忠政的刑事犯。黄忠政的刑期是 10 年，他是一个中等个子的中年人，是一个来自肇州县的农民，小有文化。这人看来还比较忠厚，言谈不多，不怎么咋乎。

每天早晨 7 点钟各劳动队都集中到二门里边等候出工，出二门还得经过向警卫室报告人数等。但是当所有劳动犯人走出二门之后，就只有第三大队是从监狱的东大门走出



新肇监狱砖厂

监狱大院了，因为第二大队是留在院内车间区干活，而第一大队

和第四大队通常是从西大门出监狱大院干活的。第三大队（第七和第八中队）走出东大门之后，押送的解放军士兵已经在东大门外“恭候”着了。在带队犯人向解放军士兵报告并获得允许之后，队伍才能继续前进。仍然是两名持枪士兵走在队伍前端的两侧，另两名士兵走在队尾的两侧。从监狱大院东门到砖厂西大门之间的大路长约一公里，队伍走入砖厂区西门之后，四名解放军士兵就分别登上砖厂区四个角上的四个岗楼。如果与犯人们同来上班的干部没有要说的话，带队犯人喊一声“解散”！各组犯人就各奔自己的劳动岗位去了。

砖厂区东西长约 500 米，南北宽约 400 米，因此可能有监狱大院的两倍大。砖厂周围没有院墙，而是三层铁丝网，中间的一层是电网，电网两侧各一米处是带刺的铁丝网。砖厂的东半部主要是制坯区，以机器房为中心；砖厂的西半部则主要是烧砖区，以一座大轮窑为中心。今年的计划是生产红砖 1500 万块，为此就得至少生产出砖坯 1600 万块，因为得考虑到在砖坯干燥和焙烧过程中必然要有一定数量的损耗。这 1600 万块砖坯必需在 10 月末以前生产出来，因为入冬土上冻，制坯机就得停止运转了。这样从 4 月 1 日到 10 月 30 日只有大约 200 天的时间。抛去“大礼拜”，停电和下雨等因素，真正的制坯时间只有 160—170 天了。这就是说，每天必需生产出约 10 万块砖坯来。

除去第四组（叉坯组）和第五组（划架组）是在架棚区干活以外，几乎所有第七中队的犯人都围着机器房转转。第一组的犯人们在机器房忙着开动制坯机。切坯口每切出 16 块砖坯（每块重约 3 公斤）被传送到一块木板上，两名犯人将木板抬到一台长柄的双轮车平板棚上横放。这样连续放 6 或 7 板坯后，车的平板棚就放满了，于是拉车的犯人就这一车坯拉往某一架棚。拉车的第二和第三组犯人们是轮流端着车把，以车棚尾对着切坯口旁

等着装坯板的。每车坯的重量都得在 400 公斤左右。从机器房到架棚的距离一般是 50 米到 100 米不等。当你把车拉到某一架棚，卸下砖坯再拉空车和坯板回到机器房卸下坯板后，可能又轮到你的车在切坯口装载新砖坯了。因此这拉坯的活儿的确是紧张而累人的。

然而，干最紧张和最累的活儿的，还得是处于机器旁东侧供土口旁的第六组和第七组。供土口较机器房低约 2 米，有一条宽约一米的传送带连接着供土口和制坯口。只要是传送带不停地转动，第六组和第七组的这 30 多名犯人就不断地用单轮车推制坯土倒入井口。在这些犯人的身后是一座约 5-6 万平方米的制坯土山，是去冬第三大队全体犯人从砖厂南区取出运到这里来的。第六组和第七组的每名犯人各有一台单轮车和一把铁锹。他必需从小土山挖土装到自己的单轮车上，然后将这一车土推到井口前倒入井口，再将空车推回土山前接着装车，如此反复，无休无止。对于我来说，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怎么能掌握好这台单轮车，因为这种车是很容易一边倒的。单轮车的车棚很小，每次只能装 100-200 公斤土，车柄是朝后伸的。这种车的优点在于不用怎么选择道路。如果你推的这车土倒在去井口的路上，你就得用铁锹把土重新装上车。我经过两个星期的时间才掌握好怎样推这种单轮车而使其不倒。在土山前往单轮车上装土时，你还得注意避免装上冻土块或苇根子，以免它们损坏机器。

每天 10 万块砖坯的产量就是要求每天倒入井口至少 200 立方米土，也就是至少 1000 个单轮车的土，因为至少要 5 车才能够一立方米。这也就是说，每名供土组的犯人每天至少要推 30 多车的土倒入井口。这显然是很紧张而繁重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土山脚下的土逐渐用尽，井口和土源之间的距离就愈来愈远。有时往上升的传送带上土量很小，机器房里的犯人们就出来喊

道：“上土！上土！”这时第6和第7组的犯人不仅体力上，而且精神上都感到很紧张。

午休时间按理是从12点到1点，事实上并非如此准确。每当饭车出现在监狱大院东大门和砖厂之间的大道上时，午休的钟声就敲响了。饭车是一头毛驴拉的大车，大车和毛驴都是属于砖厂的。马厩就在砖厂的北侧，有一名刑满释放名叫王德茂的就业农工住在这里喂这头驴，每天负责给在砖厂干活的犯人们送午饭。饭车上有30多个装满饭菜的桶，是第七中队和第八中队各组犯人们的；每组两个桶，一桶是饭而另一桶是菜。每天早晨在监舍里犯人们吃完早饭后，各中队的“站道”就把各组的两个空桶收集起来，上午约八点时站道就将这些桶带到大伙房与王德茂从砖厂赶来的毛驴车相遇，根据事先作好的饭票将各组的饭菜盛入桶内，把这些桶装上饭车，王德茂就驾着饭车奔砖厂而去了。砖厂的地势稍高于监狱大院，饭车一出监狱大院的东大门，从砖厂就能看见了。在砖厂大门内北侧与管教员办公室相对处有一间小的传达室，有一名叫孙昆的老历史反革命犯人传达员待在这里。在传达室东面的一棵树枝上挂着一小截钢轨是作钟用的。大约11点时孙昆就站在传达室前往西张望，每当看见饭车出现，他就拿一把铁锤去敲打钢轨。犯人们听见钟声就撂下活计奔向各中队的休息室。第七中队的所谓休息室其实就是机器房旁一个长长的空架棚。每个小组在这个架棚内占有一段地方，每名犯人也会有一个用几块砖搭成的凳子，把自己装饭具的小口袋放在那里。每组都准备一个盛了水的桶，桶里泡着分高粱米饭用的饭槽饭板等。各组有一名值日的奔向停在办公室前的饭车，取下本组的两个饭菜桶拎回休息架棚。午饭总是每人6两的粮，主要是高粱米饭，偶然也可能是苞米面窝头。不过今年（1971年）情况较好，每人每月有8斤白面，分10顿吃，每顿每人8两。这10顿白面

是：4 个星期二和四个星期五的午饭和两个“大礼拜”的晚饭。砖厂的统计员胡永春因为不干体力活，可以晚一些吃午饭，就在众犯人吃午饭时读报给大家听。我注意到胡永春在读报中把“钓鱼岛”误念成“钩鱼岛”了。

第二次敲钟声总是在第一次钟声之后正好一小时响起，这就是说午休结束了，犯人们得回原地干活了。下午的劳动时间似乎比上午更长。夏天是制坯的关键季节，有时收工钟要在下午 6 点之后才敲响。于是犯人们涌向大门里边办公室前集合，互相等待和互相催促，一直等到最后一名犯人干完活（因为传送带上最后的土得切成坯，拉到架棚卸下）。在收工回监舍的路上，犯人队列又得经过那一道道报告人数等的程序，通常要晚上 7 点左右才能回到监舍。接着是吃晚饭、放便、学习、最后一次放便，晚间点名、就寝。天天如此。

对于第三大队的犯人们来说，主要问题还是如何能够吃饱。每月 48 斤粮食是根据砖厂劳动的工种决定的。在我待在新肇监狱时，我的确没有听说过监狱管理人员克扣囚粮的事，就像过去在国民党监狱常常发生的那样。但是每天 1.6 斤粮、油水又很少，是维持不住干重活的。社会上的砖厂工人有许多办法取得补充的食物，那么一个犯人又如何能取得补充的食物呢？有三条渠道：1) 通过监狱内的小卖店。小卖店每月卖两次货（1 日和 15 日）。站道向大家宣读商品目录，各组的记录员（或是经过选举产生的买货员）记录下每名犯人买的货，汇总后再交给站道。所订货物很快就能从小卖店领回来，分发给每一位订货人。当然大家订的货绝大部分是食品，只有一小部分是日用品；2) 有的犯人可能收到亲属寄来的邮包，这些邮包需经政府人员拆开检查后才能给收件人。当然邮包中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食品。当犯人家属来探监（会见谈话时必须有干部在场）时，通常也给有关犯人带

来一些食品。这些犯人也就被看作是高级犯人了；3）监规不允许犯人把从小卖店买得的、邮包中的、或亲属探亲时留下的食品赠送给其他犯人，其实违犯这一监规的事还是常有的，狱中统称之为“捅毛蛋”。另外，“高级犯人”们因为有较好的食品，往往就把一部分自己的高粱米饭或白菜土豆汤等让给和他较好的其他犯人。这就缓和了一些犯人的饥饿感，也从总体上缓和了犯人群体中的吃不饱问题。

在整个 1971 年中，虽然供土活使我饭量大增了，我还没有感到挨过饿，这是因为我的帐上还有不到 200 元钱。每次购货时我都要花去 10 块钱买苹果和糖块之类的东西。7 月份我买了一个猪肉罐头，一顿就吃光了，接着就拉了两天肚子。这以后我每次买到一个猪肉罐头就分成三顿吃了。然而，200 元钱毕竟是一个有限的数。监狱每个月发给每名犯人的 2.5 元零花计入小账，即使这名犯人一分钱不花，一年也只有 30 元钱。这样我的 200+30 元钱也够 1971 年用。那么 1972 年直到 1990 年 2 月 24 日，我用什么来购买补充食品呢？但是我已经不考虑这个了。于是到 1971 年底，我的这 200 元就全部花光了。我也不再是众犯人的羡慕对象了，而我这种对待自己存款的态度也被看作是不安心改造甚至“反改造”的表现。这后来给我带来了麻烦。

而我的“集训同学”李春元这时却变成了一个红人。李春元的老婆经常来探监，给他留下不少食品，因此李春元倒是不用花钱也不缺吃的。在成为第七组的组长之后李春元变得更积极了。在工地上他总是跑上跑下的，不断地嚷嚷说：“上土！上土！”有时他传达说：“管教员指示我们一定要如何如何，尽量的如何如何”等等。这时第七中队的管教员有了变动，原来的马管教员被调往别的劳动队，新来的管教员名叫谢常青。谢管教员年约 40 岁，个子矮胖，带眼镜。和马管教员不同的是谢管教员比较健

谈，有些好显示自己。晚间学习时他也常常来对犯人们训话。李春元似乎成了谢管教员的得力助手。

5 月份发生的一件事成为对我很不利的因素：一天下午，我所在的第七组有三名犯人突然被送进小号，即禁闭室。这三个人中间的头头叫张兴武，是一个 27 岁的回民，判的是无期徒刑。他说他的家庭在哈尔滨开过武术馆，他自己在劳动中也显得身强力壮。另外两个进小号的都是来自明水县的小男孩，而且都是“反革命盗窃犯”。其中一个男孩也是回民，叫张文良，才 17 岁，判 15 年。另一个男孩 19 岁，叫阚忠会，判 10 年。令人不解的是阚中会的父亲是明水县革命委员会的武装部长，他的母亲还常常来探监并给他带来不少食品。为什么从这样的家庭里还出了一个“反革命盗窃犯”呢？这三名犯人总是凑合在一起。每天晚上学习后张文良和阚忠会躺在张兴武的两旁，三个人之间总像是有说不完的话似的。在劳动中张兴武的单轮车有时停在我的单轮车旁边，因此我和张兴武在同时往自己的单轮车上装土时也会聊聊天。有一次张兴武问我说：“香港是怎么回事？”我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历史知识问题，就告诉他说：“香港是离广州不远的一小块土地，1842 年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领的。不过根据条约，香港在 1997 年应该归还中国。”当这三个人被送进小号后众犯人才知道他们是在预谋逃跑。于是根据监狱当局的指令，第三组的每名犯人都得交代自己和这三名犯人之间有过什么交往，知道他们作过什么和说过什么等等。我也就不得不说及张兴武问过有关香港情况的事。小组长李春元对于这一点非常注意，就立即向监狱当局汇报了。于是监狱当局指令我写了一份交代我和张兴武的关系，尤其是谈过香港问题的材料。两个星期之后阚中会和张文良被从小号放了回来，接着张文良就被调往第四大队，而阚中会则被他的家人接回明水县监外服刑去了。张兴武直到 1975 年才被

放回本大队，接着就被转到革志监狱去了。这一事件对我造成了不利影响，在下一年里给我带来了麻烦。

在阅读报纸中我不知不觉地发现，监狱外的形势有些变化了。7月里，诺贝尔物理学奖金的获得者美籍华人杨振宁回国探亲，并受到周恩来接见。“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呀！但是现在却发生了。”我想道。接着我又读到了基辛格访问北京和尼克松即将访华的事。在一个大礼拜天我又听到赫鲁晓夫去世的消息。我口头上说：“他怎么现在才死呢？”心里却有些惋惜。赫鲁晓夫毕竟结束了斯大林在苏联的残暴统治，而这种残暴统治现在在中国还继续实行着哩！总之，这些事件都给我一个感觉，即中国的国际关系正在结束一个时代而开始一个新时代了。

(3)

在6月份里，有一次第七组组长李春元问我说：“你曾经找过管教员要求谈话吗？”我回答说：“我也没有什么事要找他呀！”“你这不对，你应该争取靠近人民政府！”李春元强调说。应该承认，李春元这样说还是为我好的，但是这不合乎我的性格。1957年以来，我就对那种所谓的“但丁派”（但知盯着领导党员的人）们很反感。另一方面，每个单位党支部的头头们也在单位中观察每一名非党员的表现，看他们是否积极主动靠近党组织。1957年以后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时期，我一次也没有主动找杨光远和程西筠之流的人谈话，于是就挨了整。在宣布说我的问题将被呈报到大使馆听候处理之后，有人劝我说如果我能主动找杨光远、程西筠等人谈谈，或许可以免于被遣送回国。但是我就是不作声，结果被遣送回国了。在1969年，我的“黑帮难

友”刘明新对我说：“你还是去找学校革委会谈谈话，让他们把你解放掉得了！”或许这样做可以使我免于被送往绥化县社会学习班。但是我还是不吱声，结果不但被送进了社会学习班，还进了看守所。在看守所里预审员孙庆生也曾对我说：“你还有机会回到人民中间来！”这意思是如果我主动找人民保卫部的工作人员谈话并大声宣布放弃“修正主义观点”的话，或许就可以免于判刑了。但是这种表演是我做不出来的，于是我被判 20 年刑并送到新肇监狱来了。

监狱当局也是比较注意知识分子犯人的表现的。在第七中队的 100 多名犯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只有那么三五个。政府干部比较注意这些人的“改造态度”。我被分配到第七中队来已经半年多了，却一次都没主动找干部谈话，这意味着我是在坚持自己原有的思想，即“反改造”。可能在第三大队的干部中，已经普遍持这种看法看我了。从 9 月份开始我就感觉干部们好像在看我。一次当犯人们下午聚集在砖厂大门里等待收工排队时，潘大队长就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我。一次由于下雨天不开机，包括我在内的几名犯人被派去维修监狱大院的一道墙，监督我们干活的是第八中队的金管教员。我对这活比较生疏，动作稍微慢些。收工时金管教员在犯人队列前说：“有的知识分子犯人劳动很消极，也很反动”。这不就是说我吗？“我怎么啦！我也没有消极呀！”我想道。我感觉一些不好的征兆正在降临到我的头上。

国庆节休息三天，吃了六顿好饭。对于我来说，主要还是我能仔细地看一看《人民日报》和《黑龙江日报》。每年国庆节，《人民日报》都要刊登外国领导人贺电的全文。这些贺电开头的称呼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然而，今年报纸却只刊登了贺电的摘要，既没有称呼也没有落款。

几天之后报纸报导了毛泽东接见埃塞俄比亚皇帝的消息，在场的既没有林彪，也没有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和吴法宪等人。

“这些人都跑哪里去了呢？”我感到困惑。几乎同时，报纸发表一篇关于人民解放军的文章说：“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亲手缔造和直接指挥的。”啊，这以前说的可是“人民解放军是我们的伟大领袖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更改呀！再过几天报纸上又出现了批判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的论述。哦！“刘少奇一类”就不会是刘少奇本人，而是另一个在政治地位上与刘少奇处于同一水平的人。这样的人在刘少奇之后只有林彪呀！

“林彪问题意味深长。”这个想法始终盘桓在我的头脑里。

11 月末中国领导人为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 27 周年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的贺电实际上是通报了林彪的垮台。这份贺电的落款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 11 月中旬还有一件非常明显的事：在砖厂管教员办公室正面墙的额上有一排林彪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突然一天早晨当犯人们出工来到砖厂时，却发现林彪的题词消失了。现在任何有头脑的人都会理解到：林彪已经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这时又有一批新犯人从集训队分配到第七中队。有一个名叫刘永富的我认识。这是一个年约 50 岁的老头，从安达县来，因为奸污幼女被判刑 10 年。1961-62 年间我在安达市工业器材采购供应站工作时和刘永富是同事。我在和刘永富谈话中得知孙礼煌现在还在原单位，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我为此感到有些宽慰，因为孙礼煌毕竟没有被判刑送进监狱。

据说第三大队的干部曾经召集本大队的所有新犯开了一个会，在会上告诫他们不要把他们在社会上听到的一些“流言”拿

到这里乱说。“什么流言呢？”我感到奇怪，“是关于林彪吗？”有一次高积学问我说：“为什么现在不提林彪了？”我不敢明说，只是回答道“可能是出了点什么事吧！”

10 月份天气愈来愈冷，制坯机停止了运转。而大轮窑则继续烧着，要到 11 月初把所有生产出来的砖坯都烧完才闭火。据说今年生产 1500 万块红砖的任务并没有完成。从现在起到明年 3 月，第三大队即第七和第八中队的犯人的主要任务是取制坯土运到机器房东侧，再堆起一座 50,000-60,000 立方米的土山以供明年制坯用。土源主要在砖厂的西南区。但是有几个小组，包括我所在的第七组，则被安排取出机器房西北方向的土。从这里取出约三米厚的黄土后，将在这里再建起一座小轮窑，明年也开始烧砖。这个备土活倒是没有像给制坯机井口供土那样紧张，但是也相当的累。表面上的一层土已经冻结了，只有用镐才能刨开。随着三九天的来到，冻层愈来愈厚，只有用大锤和钎子才能打下土来。用大锤和钎子打下的土块大而沉重（从 10 公斤到 100 公斤不等），得用力将它们抱到平板双轮车上。双轮车前沿和两侧都钉得有立着的档板，只是尾沿没有档板，为的是倒土方便。每一双轮车能装 200-500 公斤的土不等，由两个人拉着，一个人架辕，另一人用钩绳拉套。从取土地到新土山的距离大约是 200 米远。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土处的地势愈来愈低，而新土山的地势则愈来愈高，因此运土的道路也就愈来愈陡。劳动中倒是有两段休息和抽烟的时间，上午是 9 点半，下午是 3 点。这活不像夏天供土中有传送带催逼着，所以犯人都会偷懒多歇一会儿。犯人要多休息的名义就是大便，把工具一扔，找一个僻静的地方脱下裤子一蹲，多蹲一会儿也行，还可以偷偷地抽烟。如果有人到这里来察看，他可能发现这里的地面上其实并没有多少粪便。反之，如果一个犯人在午饭前尤其是晚饭前感觉有了大便，他反而憋住

不便了。因为一便，肚子就会饿，干不动活了。

12 月份开始了冬训，这时监狱内部又有了一些变动。一些老历反犯人和刑事犯人，包括第七中队原来的带队黄忠政，都被调到第四大队去。也有一些犯人从其它大队调到第三大队来。于是第七中队的 100 多名犯人又被重新编成七个组，每组平均 16-17 人。这次编组是根据冬训的需要而不是根据生产的需要。“人事变动”中最大的一件事是李春元当上了带队。我被编到第三组，组长贾凤鸣是一个年约 35 岁的刑事犯，农民出身。他是一个 20 世纪中国的“奥瑟罗”，即因怀疑妻子不忠将她杀死而被判无期徒刑的。我所在第三组的犯人“品种”齐全：历史反革命罪犯、现行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都有。在这第三组中，我在每类罪犯中都有一个老相识：历史反革命罪犯郭忠林，现行“反革命盗窃集团销赃犯”高积学和刑事犯刘永富。

这时在吃饭问题上发生了一件使第三组犯人们感到既可恨又可笑的事：那个伪满洲国海伦县的警察局长郭忠林现在是本组的领饭员。他在执行这项任务时也没有忘记剥削本组犯人。每次从食堂挑回本组饭菜时，他总要在途中因为“小便”停一下。这时他就偷偷迅速地将手伸进高粱米饭桶，抓出一把高粱米饭装进藏在棉袄口袋里的塑料布包上，再把饭菜桶挑回监舍。这样几次之后，他的行为被其它组的领饭员发现并告诉了第三组的组长贾凤鸣。于是这天傍晚当郭忠林将晚饭挑回监舍时，贾凤鸣仔细地查看了他和饭桶，并问道：“为什么你的棉袄上有高粱米饭粒呢？为什么饭桶里饭的表面上有手指印呢？”然后一下子从郭忠林棉袄内袋中抽出了包着高粱米饭的塑料布。郭忠林的丑行在第三组众犯人中引起公愤，他那领饭员的职务当然也就被撤掉了。

李春元高升之后就变得更积极了。每天晚上学习时他都要到某个小组甚至全中队犯人面前来一点小训话，重复或强调谢管教

员说过什么等等。不过最使我感到惊奇的一点还是：每天晚上学习前，在众犯人唱完颂扬毛主席的歌曲或集体背诵几条毛主席语录之后，李春元就从他的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打开宣读：“林副主席教导说：……”。啊，你李春元竟还是一个知识分子嘛！怎么看不出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是不是一切心思都用到揣测政府干部的意图上去了？

冬训正式开始是在 12 月 10 日下午。全监 2000 多名犯人都不出工，列队进入监狱生活区西南部监舍群对面的大课堂。每名犯人都带有一个小板凳或马扎子，以便坐着听讲。还是老规矩，冬训第一课是关于 1971 年的国际形势。讲课的，其实即是念讲稿的，是监狱当局的第一把手董政委。报告持续了两个小时。既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已经恢复，中国在 1971 年的国际形势当然就是极其大好的了。基辛格来访和尼克松的即将来访几乎被描述成了美国向中国投降。与去年冬训中听集训队张管教员作的国际形势报告相比，这一次董政委作的国际形势报告没有再提“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了。然而报告中却有两个论点是互相矛盾的：1) 美苏争夺的重点在欧洲；2)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最危险和最凶恶的敌人。

报告结束了，犯人们以为可以站起来离开大课堂回自己的监舍了。突然董政委说道：“现在宣布一件事！”于是众犯人又重新坐好。董政委说：“现在宣布：林彪是叛徒，卖国贼！”犯人中震动了一下。董政委接着说：“规定三条纪律：1) 不许议论此事；2) 不许再称林副主席；3) 任何犯人，如果持有林彪语录或讲话的，必需上交人民政府，继续持有者严惩。”

从大课堂回监舍的路上，高积学不吱声地瞅着我。第七中队的犯人们回到监舍后，带队的李春元大声叫喊：“谁有林彪语录的，马上交上来！”

第十七章 1972 年 严管犯人

(1)

1948 年我初进北大并参加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时，在大学生中曾经流行过这样一首歌：

“天快亮，更黑暗，
路难行，
跌倒是常事情，
常事情！”

1972 年初，因林彪垮台而全国政治生活出现松宽之际，我却一下子摔至我一生中的最低点。

冬训已经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即每名犯人写自我评审并等候通过的那一阶段。这一天我和郭忠林拉的那一台双轮车出了点毛病，我在午饭前把它送砖厂的修车点进行维修，午饭后又去把修好的车推回。在推回车时，我看见一名叫吴国军的年轻盗窃犯将一辆独轮车反扣在地上，用手反转车轮给车轴上油，我就对吴国军开玩笑说：“你在倒转历史车轮啊！”

不料第二天早晨，当郭忠林驾辕，我拉套的这台土车正要上山时，带队的李春元过来对我说：“谢管教找你！”

这是我被劳改后一年来首次被叫到办公室，谢常青管教员和负责管理第五大队犯人事务的王干事坐在办公桌后面。谢常青让我站着，面色诡诈地要我交代一年来有过些什么反改造言行，我承认去年曾经和张兴武谈过香港的事，谢常青对此嘲讽式地说：

“这不过是你必须用自己的嘴承认的事。不过昨天你还说了

点什么。”

“昨天！”我感觉摸不着头脑，这时王干事提示说：

“你不是说历史车轮可以倒转吗？”

我恍然大悟，解释说：

“我那是和吴国军开玩笑。”

谢管教员和王干事都不相信我是开玩笑。他们让我回去劳动并写一份检查材料。我收工回监舍后写了一份检查材料，通过李春元交给谢管教员。但是事情才刚刚开始。这天晚上正开着全中队批斗反改造分子的大会。几名这几天里曾经吵架斗殴的犯人被揪出，面对谢常青所坐的桌子蹶着。但是谢常青却说：“这只不过是浮在表面的反改造分子，还有更阴险的反改造分子躲在后面，嘲笑他们干得太愚蠢了呢！我这里就有这样的一份检查材料。”于是，他拿出我写的检查材料并从中念了几句。这时带队李春元就走到我跟前并叫道：“张轶东，出来！”于是我就被作为“最阴险的”反改造分子揪出来了。

又过了几天，这天的晚间学习是犯人们各自写自己的评审材料。谢管教员在中队监舍里来回走动，有时俯下身来看一些犯人在怎么写。突然间他提高了嗓门大声说：“你们要彻底检查自己的犯罪根源。这不是小学生写作文。有的犯人是大学生，却说什么历史车轮可以倒转。这个犯人的评审是绝对不能通过的！”

既然自己的评审材料通过无望，我也就不再写那玩意儿了。我现在是“最阴险的反改造分子”的典型。在通过其他犯人评审的小组会中，也穿插了几次对我的批斗会。在这些批斗会中表现得最积极的，就是那个伪满国海伦县警察局长，去年年底又偷过本小组高粱米饭的郭忠林。郭忠林说我肯定是计划着要逃跑的，其证据是我在一年中就把我从监外带来的 200 多元钱都花光了。1961 年和我在安达时做过同事的刘永富则说我早在 10 年前就是

很反动的了。有一名犯人揭发说，有一次我在报上看见中央某一领导人接待罗马尼亚客人时，有一名在座的对外文委工作人员是我当年在北京大学的同学时，我曾说：“他（指我的同学）现在是座上客，而我却是阶下囚了。”这反映出我不甘心自己失去的天堂。这回我懂得了，“墙倒众人推”这条规律在监狱犯人中也是适用的。最后我被要求交出一份彻底的思想交代材料，承认自己是“等待时机，幻想变天！”

3月初的一天，举行了冬训总结大会。作总结报告的董政委专门提到了一些犯人在“幻想变天”，我“榜上有名”（而且董政委把我的名字念成了“张铁东”）。董政委还朗诵了一名反改造分子评论林彪事件的诗句：

“有钱就有米，
有权就有理，
胜者王侯败者贼！
林彪就成了林贼！”

多年后徐征告诉我说，当时关于我反改造言论的大字报，也贴到他所属的直属队设计室的墙上。也有人告诉我：我跟吴国军开玩笑说历史车轮倒转，吴国军马上就向谢管教员汇报了。在一段时间里我以为这是因为谢管教员好表现自己，就要抓出我这么一个“幻想变天”的反改造分子来立功。最后我认识到这是出于监狱管理工作的需要。林彪事件之后可能在犯人中刮起一阵要求翻案之风，给监狱管理造成困难。因此，须要抓几个敏感的知识分子犯人出来当作小鸡杀给猴子看。于是我就充当这只小鸡了！

（2）

3月末，正当生产红砖的季节即将来到时，犯人又被重新编

队。原来的四个大队现在改编成了六个大队：第一大队还是基建队，第二、第三和第四大队都是在北面院子里生产高压开关的不同车间。我所属的原第三大队则改称第五大队，仍负责制砖。原第四大队改称第六大队，仍为农业队。直属队则一切照常。

现在基建规模大大地扩大了：要修建犯人大课堂（俱乐部）、办公楼和家属房等。这样对砖的要求也大大地增加了，于是第五大队就扩大成了三个中队，并对全体犯人（包括从集训队新分来或从其它大队调来的）进行了彻底的改编。第七中队仍然是半成品（制坯）中队，其 100 名犯人全是刑事犯，这样我这个反革命犯就不能继续待在这里了。第八中队是成品（烧砖）中队，其 100 多犯人全是现行反革命罪犯，于是这里就成为我的新劳动单位了。此外还有一个第九中队，全部由历史反革命犯人组成。这个中队规模较小，只有大约 80 人，而且全部是老年犯人。第九中队被称为砖厂的杂务中队，而最主要的杂务就是在砖厂内外的土地上种些窝瓜土豆之类的蔬菜。这些蔬菜对又累又饿的制砖犯人们来说可真算是一根救命稻草哩！

第五大队的领导仍然是张百发教导员和潘大队长。第八中队的指导员名叫胡树牛，是一个瘦黑的高个子，浙江口音。他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右肩受过伤。他虽然名为指导员，但是似乎并不关心犯人们的思想情况，而是更关心烧砖的情况，经常到轮窑顶上去观察火情。与此相反，第八中队配备了两名管教员（这可能对现行反革命犯人要加强管理的缘故吧），他们是谢常青和刘喜胜。刘喜胜也是年约 40 岁，比谢常青略胖一些也略高一些，和谢常青一样好摆乎，好对犯人们训话。谢常青和刘喜胜对待犯人较之胡树牛总是更严厉一些。似乎在监狱中，管教员们的“阶级斗争觉悟”总是较指导员们高一些。逐渐地我才弄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指导员必需是中共党员，“党票”在手，不用显示

什么阶级斗争觉悟，而是可以根据政策对待犯人了。管教员们中绝大多数不是党员，前途考虑迫使他们显示出自己有某种阶级斗争觉悟，而这只能通过他们更严厉地对待犯人才能表现出来。

第七中队和第八中队的犯人们，搬到院内从北往南数的第三趟平房居住。北面是集训队，其南面那一趟的平房的西半截是第九中队，东半截是第一大队的某一中队。在自己的这趟平房是第七中队住东半截，第八中队住西半截。每个监舍的内部安排都是一样的：中间是一道桌子式的长火柜，南北两面是双层大木床。我这时还不知道将在这间屋子里一住七年，一直到出监为止。

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第八中队的犯人经历了三次编组。第一次编组是分成七个组，这时轮窑尚未点火，大家干的活都是为点火做准备。第八中队有两名带队犯人：付邦栋和李春元。付邦栋是一个 30 岁刚出头的人，脸红红的，眼睛有神，人长得英俊并显得有活力。他过去是一名解放军军官，1967 年被派出支左，不知为何和某一造反派别搞在一起，被卷入一起“革命干部”被杀害事件。于是他被判处反革命罪有期徒刑 18 年。1968 年被送来本监狱后，立刻当上了原第八中队（烧砖中队）的带队犯人。不知为何付邦栋在犯人中间人缘比较好，甚至有一定的威信。大家对于李春元则总有些感到厌烦。

我被分到第三组，每天干的活儿就是给大轮窑北面、低地上新建的小轮窑供泥供砖。今年的计划是生产红砖两千万块，只靠一座大轮窑是烧不出来的。修小轮窑的活儿是不轻巧的，这时我的储蓄已经用完，每天只能靠 1.6 斤的粮食定量活着，到下午 4 点钟时就感觉没有劲儿了。此外，我这个全监水平上的反改造分子的身份带给我的压力也不小。我总是一再被要求交出思想检查材料。有一次在干活时我看见刘喜胜管教员正向着小组走来，就跑过去要把材料交给他。但是我忘记了监规中有一条规定：犯人

有事找干部时必需离该干部两米远站立，并先喊一声“报告”！于是刘喜胜就冲着我的胸前打了一拳，骂道：“你想对我行凶吗！站到两米以外去！”几天之后又是开批斗我的中队会了。为了防止在批斗中挨打，我事前从自己的棉裤（这时天气已渐暖、棉衣棉裤快收走了）剪下两片棉花绑在自己的双膝前防挨踢。但是在批斗会上一名叫王维家的犯人，在批判我时一只手把我的头往下按，同时另一只拳头又打在我的下颚上，这样人们还看不出王维家打人。

大轮窑将于4月10日点火。这座窑的窑道共分20个窑室，各有一门通往窑外。窑道的顶呈半圆形。每间窑室可装12,000—14,000块砖坯备烧。点火后火就沿窑道不停地转。于是烧好的红砖就得及时出窑，以便腾空窑室装上新坯备烧。

于是第八中队的全部犯人又根据生产过程重新编成五个组。这是第二次编组。第一组是烧窑组，这一组的活儿技术性比较强。土坯烧成红砖需要摄氏1,050度的温度，超过这个温度，砖就会熔连成一大块，不够这个温度烧出的就是半砖半坯的玩艺儿。何时给某一窑室闭火是最需要掌握好的问题。

第二组是码窑组，这个组的活儿也要求熟练。每个窑室的12,000—14,000块土坯必须放得整齐有序，任何两块土坯之间都必需有一定的空隙让火能通过。每一窑室（从此一窑门到下一窑门）约能装25列土坯，每列约20层高，地面一层长约能放30块坯，而塞到窑顶的一层则只有几块坯。这个码窑组的活和第七（半成品）中队的划架组性质更相似。但是码窑者的责任更重大，因为一旦发生倒窑，那就是生产事故了。

第三组是拉坯组。这个组的每名犯人都有一台双轮车，干的是把土坯从架棚拉进窑里。这是不轻松的活儿。每车坯子至少200块，即600公斤以上。架棚分散在砖厂各处，距离轮窑远近

不一。拉坯人在架棚里主要靠自己把晾干了的土坯装上自己的双轮车，要注意不能装上湿坯子，否则就会受到申斥。坯车进入窑室后，拉车人得一块一块地将自己车上的坯子递给码窑者，由他放到坯列中适当的地方。车上的坯子递完后，你就得快拉车子赶回架棚继续装车，直到要装的几个窑室都装满了坯为止。在阴雨天时干坯紧缺，拉坯的人就要遭罪了。

但是最遭罪的还是第四组，即出窑组的犯人。砖烧的窑室（一般每天为三间）温度总是在摄氏 50-80 度之间。而且出窑者与装窑者之间只有三间窑室，即三道门空着，供出窑和运砖的双轮车进出用。因此第四组的犯人必需尽快把窑室的砖取出，腾出地方使装窑一方能往你的方向推进，不论窑里怎么热都快干。由此可以想象出窑组忍受的高温、紧张和沉重的程度有多大。

第五组主要是由年老体弱的犯人组成。他们干的是杂务，如给窑门供水供饮料，给装上新坯待烧的窑室用泥浆和砖把窑门封上，修补窑道某些被损坏的部分。有时往外面建设工地来的大汽车上装砖等。

和搞半成品的第七中队不同的是：除第五组犯人以外，第八中队的犯人都能享受到两种待遇。第一种待遇是劳动时间较短，尤其出窑组，这是由于工作性质而决定的，因为必需尽快地把窑里已烧好的砖出尽，腾出窑室，才能装进土坯备烧。因此经常每天在下午约一点半时就干完活了。这以后他们首先享受的权利是去洗澡。洗完澡后还有 3-4 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因为下午五点半以前一般是不会敲收工钟的。于是这些犯人们就各自来到一个架棚，铺上一张帘子，躺上去睡一觉。

第二种待遇就更吸引人了。这是物质方面的：每名干高温活的犯人能够每两年领到一套作业服，每年一双棉鞋，每月一副皮手套。棉鞋是非穿不可的，因为窑室地面烫脚，鞋里还得塞些棉

花才行。皮手套根本不顶用，拿两块窑顶的红砖就烫透到手指上了，因此出窑犯人们都是用废旧的机器皮带做成手垫皮来拿砖。至于作业服，因为出窑犯人们都是光膀子穿一条裤衩干活，这样大家都把作业服和皮手套省下，用来和别的犯人换食物或烟叶。然而最吸引人的还是，从第一组到第四组的犯人都享有保健食品。在社会上，这个工种的工人们每月保健食品的标准是 9 元钱，而犯人则折半为 4.5 元。这也是令人垂涎的：2 斤猪肉，3 斤白糖，少许茶叶和豆油。要知道，每名犯人每月只有 2.5 元的零花钱呀！

虽然有前述的两种待遇，但愿意到出窑组来的犯人也不是很多，原因就是这活儿太艰苦了。在大轮窑点火后的一天下午，刘喜胜管教员把包括我在内的十多名犯人叫到窑门外，围成一圈席地而坐。刘喜胜说首批红砖即将烧出，因此出窑组就必需建立了。他问被找来的每一个人：“你能出窑吗？”我对此其实没有任何概念，却也表态说：“我没有问题！”我心想哪一种劳动都是艰苦的。再说我又是一名反改造犯人，还能回答说“我不行”吗？于是以常德文为组长的出窑组就建立起来了。

4 月 13 日，第 4 组的犯人开始出窑。每天的任务是出空三个窑室约 4 万块砖。于是第四组的全体犯人又分成三伙，每伙 4-5 人，负责出一个窑室。第一伙出与空窑相联的第一个窑室，称为“大道”。“大道”因为已经熄火一段时间而不太热，而且有空窑道的门供车进出，在这里出砖并不太遭罪。但是“大道”是必需尽快出空的，因为空窑道另一端码窑的那一伙正在向你这方面推进。第二伙出的窑室叫“二道”，第三伙出的窑室叫“热窑”。这两个窑室闭火不久，而且窑门内侧也是码满烧好的砖的，不拿清窑门内侧的砖，车就进不去。于是第二伙和第三伙干活就不可能太快了。但是在“大道”窑室的砖出尽后，码窑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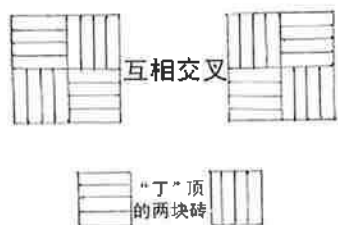
也紧接着向你推进过来了。这三伙人干活的顺序是这样的：今天出“热窑”的一伙明天出“大道”，今天出“大道”的一伙明天出“二道”，今天出“二道”的一伙明天出“热窑”。如此循环不已。

每一伙有 2-3 台双轮车供从窑里往窑室外拉砖用。通常干活的办法是这样的：一个人以拉车为主。他先把空车尾顶着“大道”的第一列砖或“二道”，“热窑”的门压着车把，另一或二人站到车棚尾部，摘取近处几列顶层的砖往车的前端放。当这几列砖下缩到可以从地面拿取时，他们就下车来继续装车。这样干活要求快，还忌讳单一地把一列砖从顶层拿到底，因为那样的话下一列砖就有可能倒过来砸着你。砖装满在车上时有三至四层高，200 多块，拉车的人就把它拉出窑门，奔向窑外的大砖垛。每伙有一或两个人拿着砖卡子（砖卡子每次能卡住 4 块砖）在那里将车上的砖靠砖垛卸下，拉车人将砖车交给卸砖的人就推另一台空的双轮车进窑装砖去了。窑外卸砖的人必需在下一台砖车出来之前将这一车砖卸完，把车腾空，否则就被动了。出完一个窑室的砖大约需要 60 车次，最后把窑里地面上的炉灰清理装车拉出来才算完活。这样每天的劳动时间大约为六个小时（早上 7 点半到下午 1 点半），午休约一小时包括吃饭在内。但是每逢“大礼拜”或节假日之后需出砖的窑室，同时也就是要装坯的窑室，就攒多了。于是这以后第一二天都需要出清四至五个窑室，这两天第八中队几乎所有犯人干活都是很紧张的。

我所属的这一伙共有五个人，领头的是徐传贵，是肇州县一个公社的社员。他没什么文化，却吹嘘自己读过《资本论》。既然我是一名全监点名的反改造分子，他在干活中也就老挑我的毛病。徐传贵先让我出窑门，窑门挤挤岔岔的，其实谁也不可能干得快，他就骂我笨。过了两天他们这一伙该出大道，窑里不热砖

出来得快，而卸砖却很紧张，徐传贵就派我去卸砖。有时第二甚至第三车砖从窑里拉出来时，第一车砖还没有卸完，这样就没有空车了。窑里的人干挨热而不能拿砖，急眼了就骂娘。这时徐传贵就会跑出窑门来骂我。正是这种压力促使我去捉摸卸砖的门道，我发觉在数学方面动动脑筋就能解决这一问题。砖垛由一行靠一行的“砖丁”组成，每一“丁”砖（因此卸砖又称为“丁”砖）为 200 块，其堆放方式为：12 层每层 16 块砖上下交叉摆着，顶上再加两卡子（即置于之上），即 $16 \times 12 + 2 \times 4 = 200$ 块砖。从窑中拉出的车每车也是大约载 200 块砖，即一个“丁”。

因此卸砖速度取决于将车停在哪里。我一反砖“丁”由窑门近处及远，而是从远向窑门近处移动。每次出来的砖车棚的前端正好和最后一个未码好的砖丁的上部一齐。这样我就先卸下车棚尾部的砖在地面上打



好下一个砖“丁”的底，然后站到车棚尾部（车棚前的砖正好支撑我的体重）将车棚前部的砖码出前一个砖丁的上部。如此一车一丁地向窑门近处推，然后再从远处另起一行。这一“发明”的确大大地加快了卸砖的速度，有时我卸完一车砖，下一车砖还没有从窑里拉出来，我还自己进窑里拉车，为的是让砖车在砖垛旁停靠得更理想一些。这样一来，我就成了一名“丁砖快手”，这也符合在窑室内那些摘砖人的利益。因此从这时起直到 1979 年 4 月我出监为止，我每逢干出窑活就是“丁砖”，在窑室里摘砖的情况较少。

沉重的高温活使所有出窑犯人饭量大增，每天干完活洗完澡就感觉饿。我每天只能吃到自己的那 1.6 斤口粮，另外中午还有

一两白糖。4 月末我领到了该月的保健食品：一个猪肉罐头，一点茶叶和豆油。这些其实只能补充一两天而已。有时犯人就在洗澡后到砖厂各处寻找野菜（猪毛菜和线菜等），然后，拿到窑顶的火眼上煮着吃。有时有的犯人还能收集到水鳖，烘干后吃，有土腥味。偶尔有野狗野猫闯到砖厂的电网上死了，好的肉被干部吃掉，剩下的零碎也就被犯人捡走吃了。一次一名犯人给我一团煮烂了的线菜，我给菜团上洒一点盐吃起来，感觉像是吃菠菜一样。这时，第六大队犯人们种的水萝卜也出来了，可以连叶子吃，这样肚子问题总算是缓和了一些。

大约干十多天活之后这些犯人们就对出窑活比较适应了。每天下午两点钟时，他们都出完了窑洗完澡。有的人去弄吃的，有的人跑到架棚去睡觉。这种空余时间又引起了我的想法：“一天 3-4 个小时，一年至少一千个小时。如果我真要在这里呆到 1990 年 2 月 24 日，那可将是两万个小时了。这么多的时间决不能浪费掉！”我想起历史上有些伟大作品就是在监狱里写出来的。

“我也应当利用这种时间来写点东西！”写什么呢？当然在监狱的条件里，没有参考资料，是不可能写出纯粹的历史著作，像我当年的学位论文“地理大发现与中国”那样，但是我可以把历史观点系统地表达出来，1969 年在阅读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纲要》之后我就有过这种想法。于是我就用我帐上还剩的几块零花钱从小卖店买了两本小学生练习本和钢笔墨水，将钢笔抽足墨水，把它连同小练习本带到砖厂。每天出完窑洗完澡并在架棚睡一觉之后，我就坐在这架棚里写将起来。我给自己要写的书命名为“中国与世界文明”。到 5 月初时，我把第一个练习本写完了，也正好写完对于罗马帝国衰亡的论述。于是我开始在第二个练习本上论述阿拉伯征服和阿拉伯文化。一天，徐传贵经过架棚看见我正在写东西就问我写什么。我回答说：“写思想汇报材料！”几天

之后，我的“著书梦”被打断了。

(3)

在4月份里，第八中队的犯人们并不感到劳动任务很重，因为100多名犯人只不过是围着一个大轮窑转着。但是只靠一个大轮窑烧不出今年计划的2千万块红砖，为达成指标还得靠北面低地上新建起的小轮窑参战。在5月初小轮窑也点上了火。于是第八中队的犯人们就面临两线（大轮窑和小轮窑）作战的问题了。

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谁去出小轮窑呢？小轮窑的窑道共分为18个窑室，每间窑室能装进7,000-9,000块土坯备烧。窑火在小窑道里转动得快，散热不易。因此出小窑的砖比出大窑的砖要遭罪得多了。

一天晚上学习时，刘喜胜管教员在一次训话中宣称：“我们要将一些特殊人物编成一个特殊的小组！”根据监狱里的惯例，这就是要成立一个“严管组”了。这天天气很好，很适合砖厂的各项劳动。但不知为何全大队都奉命回监舍吃午饭，并睡了一个午觉。在下午两点时大家被叫起，放风后开中队会。谢常青管教员面对全中队犯人，坐在桌子后面宣读了“严管条例”：

1、严管犯人必需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罪服法；

2、20条监规仍为基础，对严管犯人继续有效；

3、严管犯人必须绝对服从严管组长的管理，无条件执行被分派给的劳动任务；

4、严管犯人在放风和其它活动中，必需全组统一行动（因此20条监规中关于三人小组的那一条在这里就无效了）；

5、严管犯人早起洗漱时间为8分钟；

6、严管犯人不许抽烟；

7、严管犯人不能从监狱小卖店购买食品；

8、周末和休息日，严管犯人无下棋打牌等娱乐活动，必需在铺上学习毛主席著作。

念完“严管条例”之后，谢常青管教员就宣布了 13 名严管犯人的名单。我是第三名。然后他又宣布指定常德文和殷富这两名犯人担任严管组组长。所有严管犯人都被安排在北边大木板床的下铺，两名严管组长常德文和殷富分别把住东端和西端。不让严管犯人睡在上铺的原因是防止他们有“反改造活动”。在指定每一名严管犯人的铺头之前，常德文和殷富对我的所物品都进行了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我写有“中国与世界文明”的那两个小学生作业本就被没收走了。

这 13 名严管犯人中，多数是平常好吵架斗殴的那一种，有几个人是被认为装疯卖傻的，有两个人是搞鸡奸的。有一个名叫邹云祥的，一贯在监舍内偷其他犯人的东西，有一次甚至夜里起来小便时，看见站道桌上放着的一些犯人写的、上交管教员检查的家信，竟把这些信上贴着的邮票也撕下来占为己有。不过归根到底，大约只有一个我是“幻想变天”的。使我感到有意思的是：4 月份批斗我时往我下颚打了一拳的那个王维家也进了严管组。至于两名严管组长，常德文是鸡西煤矿的一名矿工，年龄将过 30 岁，有劲而粗鲁。殷富曾是哈尔滨师范学院的学生，因为言论问题被判 15 年反革命罪而进来的。

严管组被定为第八中队第七组，负责出小轮窑。在严管组成立之后带队的付邦栋又宣布了本中队其它各小组的划分：第一组仍然是烧窑组，大小轮窑都烧；第二组仍然是码窑组，也是大小轮窑都码；第三组负责往大轮窑运坯；第四组负责往小轮窑运坯；第五组负责出大轮窑；第六组仍是杂务组。这已经是两个月来第三次编组了。

从第二天早晨开始，严管组的犯人们就出小轮窑了。也是每天出三个窑室，也是分成三伙干。虽然是严管犯人，我们也可以领到作业服，棉鞋，皮手套和保健食品等。常德文和殷富这两名严管组长是不用参加干活的，他们的任务是监督严管犯人们干活，以防“出问题”。但是他们却一样能够得到一份保健物资。

我干活的这一伙还有王维家，富作田和于连有三人。富作田和于连有都是小有文化的公社社员，两人都被认为是装疯卖傻的。不过我认为他们两可能神经的确有点问题。去年 11 月在院里开全监犯人奖惩大会时正值下雪，富作田突然从地上站起来大叫：“最高指示：北国风光，千里……”，当即就被送进小号，他倒因此全监闻名了。于连有则不承认他是反改造，说这不过是犯人中“大鱼吃小鱼而已”。

这一伙的头头是王维家，他仍然分配我丁砖，但有时我也进窑里拉车和拉砖。我感觉小轮窑的确比大轮窑热多了。窑门口放有两只桶，一只盛满凉水供出窑犯人洗脸用，另一桶满清凉饮料带一个杯子。一次我在摘砖前将自己的帽子浸入凉水桶后戴到头上解热，当我和王维家他们摘满一车砖时，头上的帽子就已经干了。窑门边的一桶清凉饮料刚出完半个窑就喝完了，还得再来一桶茶水。一天下午刚出完窑，时间是 1 点，正好从外面来了一辆大车要拉基建用砖，常德文独出心裁要全体犯人集中往前，再摘出一个窑室的砖直接装上这大车，这不就省去了丁砖的人工，又为明天减少工作量了吗？但是前面窑室的砖是刚烧成闭火的，其热可以想见。另一个因为装疯卖傻而来的严管犯人钟殿臣说：

“这不合乎操作规程，不合乎国际法！”常德文大怒，命令钟殿臣在热窑道中蹶着，其他十多名严管犯人一齐七手八脚地往前摘砖，用双轮车拉出窑外直接装上那台大车。但是刚烧成的砖太热了，还没有拉出砖厂大门，那台大车的车棚就烧着了，还得赶紧

往车棚上浇水。我因为参加这次摘砖，脚被烫坏了，眼镜片也被热得掉出了眼镜框。但是我只得到一天病休，第三天又得出工了。常德文说我只是在窑外丁砖，脚上有点烫伤不要紧。

7 月份的一天中午，常德文突然死于一次事故。原来上头通知了这天要停电，砖厂四周的三道铁丝网中间的电网当然就不会有电了。午饭后在网外值班的一名解放军战士向小窑跟前的犯人喊话，要他们给他送点饮用水去。常德文提了一壶水走向铁丝网将它送给这个当兵，水壶碰上了电网。不知何故这时电已经来了而未事前通知，常德文立即摔倒在地。虽然通过电话告知犯人医生乘大卡车前来抢救，但击倒常德文的是 3000 伏的高压电，无法使其生还。常德文死后，带队的李春元被派来兼任严管组长，和殷富一起干。李春元的架式就像他也是一个政府干部式的，嘴碎并对严管犯人百般挑剔，大家都不喜欢他。

随着时间流逝，严管犯人们对自己这种犯人中的犯人的身份也就习以为常了。在 8 条“严管条例”中，多数严管犯人感到别扭的只不过是不能抽烟而已。我不抽烟，就更无所谓了。不让买食品，我的零花到年底又攒到 20 元钱了。入夏之后，本大队第九中队以及第六大队所种的窝瓜土豆等就不断供应给犯人们。饿的问题不大了。

当半年多严管犯人是生涯中的最低点，是 1957 年以来我生活下降线的终点。这以后就发生了转折，我以后的生涯就要沿着上升线运行了。

(4)

10 月 1 日、2 日和 3 日这三天因为国庆节而不出工。由于新近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访和中日建交，监狱里的气氛比较宽松，

这几天的伙食也比较好。10月3日下午约两点钟时，李春元对我说：“有人找你！”他把我领出监舍门外，指着站在那里的一名我并不认识的犯人说：“你跟着他去吧！”

那名犯人领着我向西南方向走了几十步来到大课堂。大课堂是今年春夏期间用砖重新盖起来的。大课堂的主体在南部，是一个大厅，可以容纳全监二千多名犯人开会，听报告、看电影或在节日期间观看犯人们自编自演的节目等。大课堂北端与主席台同高并在主席台之北有几间小屋，分别为政府干部办公室，劳改报编辑室、电影器材室和后台化妆室等。在这里工作的犯人们都属于徐征所属的直属队。

我被领到干部办公室，并让我在靠墙的一张长凳上坐下。我看见屋里坐着的犯人也就是10名左右，而且似乎只有我一人是来自第五大队。在办公桌后坐着两名干部。我认得其中之一是管理大课堂的肖干事，因为每次在大课堂活动时都是他组织各大队的犯人队伍出入大厅。肖干事宣布开会，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一次座谈会，为的是了解犯人们对于最近日本首相田中访华，也包括2月份尼克松的访华有些什么反应。与会犯人都是挑选出来的，每大队只来了一两名。当然所有与会犯人都高度赞扬了我国的外交成就，我也说我是很为这些成就所鼓舞的。虽然没有任何一名犯人发问，另一名干部却主动解释说，中日联合公报中关于中国放弃要求日本为过去侵华赔偿，是我们的伟大领袖高瞻远瞩，为了长远的中日友好关系着想的。其实我知道，有些老犯人，尤其是曾为伪满洲国服务的历史反革命犯，对这一点却是想不通的。最后肖干事说：今天是政府给你们吃了“小灶”（即给了较高的政治待遇），希望你们加速改造，并在其他犯人中多作宣传。

是峰回路转，还是时来运转呢？我此次参加全监“特邀犯人”座谈会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在犯人中的地位。总的说来，犯

人可以分为三等：第一等是直属队犯人、带队、站道、组长，记录和其他杂工。他们中间有的人可能是狱霸。这些犯人约占全体犯人的百分之十。第二等是犯人的主要部分即一般犯人。第三等是反改造分子，即“犯人中的犯人”，约占全体犯人的 10%-15% 之间。但是今天我却代表五大队的全体犯人出席了全监级的座谈会。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可能即将解除严管，而且从第三等犯人一下子跳到第一等犯人堆里去了。于是从现在起第八中队的许多犯人就对我另眼看待了。那个在 4 月间在劳动中经常挑我毛病的徐传贵，现在却是不断地找机会和我搭话了。

但是李春元对于我在犯人堆中的地位上升似乎不太高兴。

“我也是一名知识分子犯人，为什么让他去参加座谈会而不让我去呢？”他可能是这样想的。然而，他毕竟是带队兼严管组长。国庆之后的一天晚间学习时，他眯着一双眼睛朝着我说：“有的犯人可能又要抱幻想了，以为可以和帝国主义搞和平，甚至帝国主义会帮助我们！”李春元的这一套表演使我对他评价更低。

“你这个李春元，去年林彪都垮台了，你还大念林彪语录，现在又看不出形势的变化，你算是个什么知识分子犯人呢？”此外不知何故，谢常青和刘喜胜两名管教员也更频繁地来旁听严管组犯人的晚间学习会，但并没有像李春元那样训斥我们。又过了几天，在中队晚间学习会上，胡树牛指导员向全体犯人说：“现在是可能通过联合国建立和平的！”

大约 10 月 10 日左右，带队的付邦栋根据政府批示，宣布李春元和殷富都不担任严管组长了，另调侯汉钊和张世辰两名罪犯来当严管组长。侯汉钊和张世辰都是知识分子犯人，年纪都在 35 岁左右，不过侯汉钊瘦而张世辰略胖。文革前张世辰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名干部，1967 年因为反对发动文革上书中央被捕，判处反革命罪有期徒刑 8 年。侯汉钊原来是一名技术员，因言论问

题也是在 1967 年被判反革命罪有期徒刑 8 年。他们两人都将在明年出监，因此，受到政府干部信任，被派来当严管组长。

国庆后因为天气转凉，出窑活就不像过去那么艰苦了。不好的是现在已经不是每天吃到额外给的窝瓜土豆，而是每周只给两次了。不过常常有第六大队和直属队的犯人把他们吃不了的饭菜送到第五大队来，严管组的犯人们也能分到一些。逐渐地我得知，这时黑龙江省第三监狱的犯人们的生存水准其实比附近公社的社员们还高。许多年后徐钺告诉我说，就是在这 1972 年底，他们直属队电工组的犯人到监狱附近去埋电线杆时，遇到公社社员们称呼他们为“犯大哥”，向他们要棉衣穿，因为他们没有穿的。这样两个煮鸡蛋就能换一条棉裤。有的农妇干脆向刑满就业的农工卖淫，而这些就业农工则不断地从监狱里偷点什么给她们作为嫖宿费用！

与李春元和殷富不同的是，侯汉钊和张世辰与严管犯人们一样参加出窑劳动。他们一般也不斥责严管犯人，只是在谁的言行有所出格的时候才说点什么。现在这已经不太像是一个严管组了。虽然严管条例规定严管犯人不许抽烟，但是如果你不是公开抽烟，而是在你摘砖的窑里偷偷地抽，张世辰和侯汉钊看到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到 11 月末时大小轮窑已将今年制出的土坯全部烧光，第八中队完成了今年的红砖生产任务。全中队就转入为明年的制砖生产备土了。我去冬已干过一冬备土活，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不同在于今冬第八中队全部都是从砖厂西南角取土，用双轮车拉往第七中队机器房东侧堆成土山。这个距离比去冬要长得多。我和富作田两人拉一车，富作田架辕，我拉套，整天的在新土山和土源之间来回跑。

1972 年的冬训又要开始了。12 月的一天，全大队奉命回监舍吃午饭，下午就宣布重编冬训学习组。虽然没有宣布解散严管

组，但这 13 名严管犯人却被分散到重组的七个组里去了。在每组给每人重新分配铺位之后，有的严管犯人就坐在自己的新铺位上公开抽起烟来。不大一会儿一名站道把 13 名前严管犯人都叫到监舍门里侧旁的站道写字桌边上。李春元严肃地对我们说：“严管组解散了，但是‘严管条例’还没有废除，因此你们还不能抽烟。”但是这些前严管犯人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还是继续公开抽烟，他们的新组长也没有制止，李春元也没敢再管此事。

我被分配到第三组，组长就是前严管组长张世辰和刘书林。刘书林年龄刚过 30 岁，据说是吉林某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就是说和我同行。张世辰和刘书林两人对待我的态度很正常，不把我当作一个严管犯人对待。

12 月 10 日下午，又是冬训的第一课，即关于 1972 年国际形势的报告。2000 多名犯人拿着褥垫或马扎坐在俱乐部里听贾典狱长作报告。当然今年的国际形势极好，尼克松与田中的来访已经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贾典狱长的报告中还有一段动人的插曲：他念了在《参考消息》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美籍华人赵浩生写的。赵浩生是一名记者，1948 年离开中国大陆前往日本，后来又定居美国。尼克松访华后他想办法回国探亲，终于在老家河南省信阳市看到了自己的母亲和其他亲属。他高度赞扬故国 24 年来的变化，并问他的母亲说：“这不是做梦吧？”他母亲回答说：“比做梦还好！”这篇文章使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犯人都为之动容。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问题：赵浩生知不知道或者他的母亲以及其他亲属敢不敢告诉他说，就是在他的老家河南省信阳专区，在 1960 年曾经饿死了一百万人呢？

讨论国际形势我发言并不困难。我无意炫耀自己关于国际形势的知识，只是顾虑自己不发言或说得少又被认为是隐瞒思想。但是当我放开大谈尼克松和田中访华的意义后，仍然有人说我是

“乱摆乎”而汇报给了政府干部。

这时还出现了一个“险情”：大约是 12 月 20 日左右一个“大礼拜日”的下午，第六大队的犯人们送来了一桶剩饭——高粱米粥，我也分得了一饭盆。这高粱米粥是凉的，许多犯人就把自己的饭盆放到炉盖上去热粥。最初我的饭盆只能放在炉盖的边缘上，后来有一个犯人的粥热好饭盆拿走。我就把饭盆往炉盖中央推一推，并无意地开玩笑说：“逐渐向中央推进！”我刚说完这句话，就听见张世辰在我后面大喝一声：“张轶东，你说什么呀！”

好家伙，这下可闯下滔天大祸了。要知道“中央=中共中央”呀！现在任何解释都不起作用了，我只能等待惩罚了。

张世辰并不是一个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那种人，但是我说的这句话过于严重，他不敢不向政府干部汇报。

第二天晚间学习时，我被叫到监舍西面的政府干部办公室。坐在办公室里的有大队教导员张百发，中队指导员胡树牛和管教员谢常青。刘喜胜管教员则是在冬训之初就被调到第七中队去了。张百发和谢常青和蔼地问了我 1972 年的改造情况，关键之处则是胡树牛说的：“你这一年来在改造中是有一定成绩的。你在讨论国际形势时也能积极发言。不过要注意的是，一个小组有十多个人，大家都需要发言，因此你发言时不应占用太长的时间。另外你的嘴有时不太好，这是应该注意的！”这以后他们就让我回小组学习，从昨天下午以来悬在我头上的“险情”就无形中消失了。

年初时只因说了一句“倒转历史车轮”就使我当了一年反改造分子。而“逐渐向中央推进”这句话其实是更“反革命”的，我却平安无事。我在内心里是很感谢胡树牛指导员的，我对于谢常青管教员也并不怀恨在心。但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决定性

的因素还是形势变了。对于监狱当局来说，它已经不需要用我作为一个反改造分子的典型，而是要用我作为一个经过教育，思想发生转变，走向“接受改造”的犯人典型了。

当一个人处于一条隧道的中心点时，他会感到很黑暗，一不小心摔了一跟头。但是当他站起来再往前跨一步时，他会发现前面的光线突然加倍地放亮了。我回想起 1948 年进入北京大学时曾唱过的那首歌的另一段：

“跌倒算什么？

我们骨头硬，

爬起来再前进！”

第十八章 1973 年绥化法院来人复查了

(1)

和去年冬训中我遇到的情况相反，这一次我的年终评审很快就通过了，而且是在我组里第五名被通过的。这以后我就根据组长刘书林的提示，向行政干部交送了一份思想汇报。从这时起直到我离开监狱的这六年多（1973-1974 年 4 月）我就在黑龙江省第三监狱作为一名“一等犯人”而存在了：我当过犯人小组记录员、组长、站道、中队学帮小组成员、全监犯人大队第五大队发言代表、全监犯人严管队队长等。我也因此从监狱行政方面得到一些好处，例如几乎在每年的犯人奖惩大会上都得一个二等奖，捞着一个茶缸或日记本什么的，又如曾经有机会两次外出参观。然而我始终没有当过带队或得过减刑。

在这些年中我对待这一切的态度就是随遇而安。在毛泽东的专制统治下我没有资格当一个“顺民”，而只有资格当一个“顺犯”。我被释放后，得知张志新在狱中坚持斗争直至被处死，我为此而自觉惭愧。我自问道：“我在监狱中后期的表现是光荣呢？还是可耻？”

当一个人被打倒在地并被踏上一只脚后，前面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就地躺着睡一觉恢复体力，要么是反抗直至被打死。只有张志新这样极少数的选择了后者。而多数的，包括那位“党内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都选择了前者。如果邓小平不对毛泽东说“永不翻案”，他后来也就当不上那“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了。我反思的结论是：张志新的斗争精神值得学习，但方法却不

可取。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没有意义。被打倒的人应该保存住自己，等待新时期的到来，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贡献力量。

但是这也不是说我应该向李春元那种我不喜欢的犯人学习。在这段时期中迫害同类、告密之类的事在犯人堆中屡见不鲜。甚至有人一方面吃了别的犯人送的食品，然后又向政府干部汇报说送食品者“捅毛蛋”“拉拢他”等。我当然不会干这种事。我只是在可能范围内帮助一下本小组或本中队的一些犯人。政府干部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我也不主动去揣测政府干部的意图。即使这样，我后来也还是作了一些不光彩的事。

3 月末，当制砖季节即将来临时，第八中队又重新编组了。付邦栋是唯一的带队，李春元则成了三名站道之一。张世辰与侯汉钊刑满出狱。张世辰留厂就业，后来在放牛时被牛顶死了。侯汉钊就业不久后去安达大庆石油学院工作，20 世纪 80 年代我去大庆石油学院看望孙礼煌时曾见到他。我被分到第三组，而且是记录员即副组长。组长路奎是一个中年人，被捕前为工人，我与他合作得很好。这一组的任务是负责往小轮窑运送坯子。这活儿不像出砖那么艰难，但也要求一定的速度，因为是流水式地往窑内运送干坯，保证装窑顺利进行。每天大约在下午 2 时半时就干完活。大家都去洗澡和休息了，我作为记录员却还有一项任务，即具体统计今天共往小轮窑运进了多少坯子，并向付邦栋上报。然后我还得到全砖厂的架棚转转，考虑哪些砖坯子已经晾干了，明天可以往窑里拉（大约 25,000 至 30,000 块）。这样我就得比本组的其他犯人们少休息一些，担着点“任劳任怨”了。

(2)

4 月 13 日晚间学习之后，挂在监舍内壁西墙门上与大课堂收

音机相联的传声筒，在晚 8 点的新闻联播中报道一条惊人的消息：昨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接待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力的宴会上，出席者中有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啊，这不是党内第二大走资派吗？我感到现在不仅是中国的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国内也有变化。不过我还想象不到这些变化对于我自己的命运会有什么影响。

又过了一个星期。一天全体犯人奉命回监舍吃午饭，下午不出工，召开全监犯人大会。会前又被告诉说小板凳一律不用带入会场，因为不需要。全监犯人排队列站在大课堂里听监狱管教科王科长传达：最近毛主席和周总理很关心监狱管理工作。他们要求以人道主义精神对待犯人和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如果你们受到了法西斯式的对待，允许你们控诉。这个传达连续宣读了三遍，宣读完就散会了。整个会议不到半小时。犯人们回到监舍后也没有组织任何讨论。

几天后据说在第七中队的犯人中，的确有人向监狱领导控告刘喜胜管教员殴打过他们。

更显著的一件事是：有几个现行反革命犯被原判单位领回，据说其中有的人还是被无罪释放了。第一个是殷富，他回到哈尔滨师范学院继续读书，毕业后留校工作，23 年后他作为哈师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出差来绥化时，还到我家里看我。4 月末时，我前一年冬训中的组长刘书林和一名叫刘长山的，也被原判单位领回。5 月初的一天，我所在第三组的组长路奎也被原单位领回了。谢常青管教员另外指定了一名叫李海滨的犯人来担任第三组的组长。

现在每个中队有了三份《人民日报》，即每个小组除经常有一份《黑龙江日报》外，每两个月还能有一份《人民日报》。这对于好读报的我是一个方便。另外，犯人现在的学习已经不只是

政治学习了，还穿插有与所从事工种有关的业务学习，例如上制砖课和优选法（9.0.618）课。5 月份监狱里的活动还真的比较多。首先是召开了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我被指定在第八中队的讲用会上发言。我在发言中说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我国去年的外交成就，使我从反改造转向了接受改造。接着又召开了全监犯人奖惩大会。第八中队的付邦栋在大会上被宣布减刑二年。我当年在集训队时的同组犯人洪兴学，即那身为边防军人却携带武器投奔苏联，被苏方遣送回，经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送来这里的那位，因为一次在和管教员发生冲突时殴打了管教员，在这次大会上就被作为反改造的典型，押送到监狱院外东南方的土豆地里枪毙了。在这奖惩大会上还有一个新花样，即一些犯人家属被邀请与会并向犯人们讲话，劝他们“改邪归正”。

最与犯人们切身利益有关的一项措施就是伙房分家，即将全监的大伙房分为各大队自办的伙房。这样可以改进管理，并引起各大队伙房之间一定的竞争。第五大队有一些地，还有一些犯人专门种菜，这也有助于改善第五大队犯人们的伙食。

从这 1973 年开始，每年大约 5 月末或 6 月初举行一次全监犯人的运动会。运动场正好位于监狱内院东面各监舍与西面的各大队伙房以及大课堂之间。此项目仅限于田径类。各大队的犯人运动员由各大队的行政干部选拔，并以 50 岁为线划分为老年和青年两组。运动会为期两天，这两天犯人们不出工，而是各大队犯人分段围着运动场坐着观看比赛。这对于第八中队的犯人来说并不完全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两天中窑里的火还得继续往前烧，运动会后他们又得忙乎几天了。然而这两天中压倒一切的好事是伙食，不但增加了量，而且质也好。犯人们普遍认为运动会这两天的伙食比春节期间还好。我记得在监内几年中仅有几次吃到鸡蛋和豆腐的情况都是出现在运动会的那几天。运动员们在会前好

几天就不劳动了，而是专门从事练习，运动会期间他们都能领到额外的食品。这期间一些有特殊任务的犯人，如啦啦队队长和犯人通讯员等，也能得到一些额外的食品。我作为第五大队的现场通讯员，也捞着了几块烧饼或几根麻花什么的。

据说在 20 世纪 70 年代黑龙江省第三监狱是全国的模范监狱之一，有次一位副省长也来这里视察过。我待在这里就算是捡着了吧！不过我不知道那时全国其它监狱中犯人们的生活情况是否也一样。

8 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大约 3 点钟时，我已经拉完坯子，洗过澡，在架棚里查点明天要拉的坯子时，砖厂的犯人传达员孙昆找到了我说：“管教员找你！”

我来到砖厂的行政人员办公室。在办公桌后面坐着两位我不认识的人。这两个人都是 40 岁左右和中等身材。坐在中间的那一位剪的是平头，另一人似乎是记录员，拿着纸和笔坐在桌子一端。谢常青管教员则坐在桌子另一端的一把椅子上，手里拿着两个第九中队犯人们种出的香瓜准备招待客人。他们让我在门旁靠墙的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那位平头的说：

“我们是从绥化县人民法院来的，要了解你在这里的改造情况。你对自己在 1970 年的被判刑是怎么认识的，你现在又怎么想的呢？”

全国的人民法院早在 1967 年就都被砸烂了，1970 年给我判刑的是绥化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那时的人民保卫部是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三者合而为一的。现在绥化县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又出现在了 my 面前，我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含义。

在谈话中我得知这位剃平头的人是王审判员。他和我谈话时显得很和气，但似乎是对我想说点什么却又不便于说出。他问我对于绥化县人民法院有什么要求，我说：

“我有一些书（这其实不对，这是我从被砸烂的绥化一中图书馆书堆中捡出的）被人民保卫部没收了，我希望能还给我”。

“一些什么书呢？”

“例如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纲要》”。

这时谢常青管教员插话说：

“在监狱里读黑格尔的书是不允许的！”

王审判员低声地自言自语说了一句：“怎么整呢？”然后他抬头对我说道：

“这样吧！你可以给绥化县人民法院写信！”

两天之后我的确给绥化县人民法院写了一封信，从监狱小卖店买了一张 8 分钱的邮票和一个信封。我将信放入信封而不封口（这是监内规定），贴上邮票交给谢常青管教员烦他代寄出。我在这封信中只是汇报了自己在黑龙江省第三监狱里的生活情况和劳动情况。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被释放回绥化（已经是市了），并在黑龙江省绥化师专工作时，一个我当年在绥化一中时的学生，现在是绥化师专党委会的干部告诉我说：在 1973 年绥化县人民法院恢复工作之后，对过去化绥化县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部曾经作过的所有判决进行了复查。这时有人提意见说对我判处反革命罪有期徒刑 20 年是不正确的。于是王审判员等二人就被派到新肇监狱来看我了。如果那时候我提出申诉，我就有可能被释放！

一个人可能预见到形势发展的趋势，甚至这趋势会给他带来什么。通常如果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件坏事，他就会感到这坏事来得太快了。但如在他面前出现的是一个好的机会，他往往会意识不到或失之交臂。这一下我可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失去了一个什么机会。在我的概念里只要毛泽东还活着，我这种人就不会得好的。中国现在是一所大监狱，我不过是生活在大监狱中的一个

小监狱里而已。而且当我初入监时，还听说过上诉不仅不能导致减刑，可能反之会导致加刑。从 1969 年进入绥化县社会学习班算起，我已经和外界隔离四年了，其中约有一年还是处于被严管状态。这就使我变得有些麻木和迟钝了。我一方面“幻想变天”，另一方面当“天”已部分地有所改变并向我提供机会时我却没有觉察到。殷富、刘书林、刘长山和路奎等人出狱也没有对我起到提示作用。绥化法院王审判员找我也没有使我明白过来。当然，这种局部的变天是不稳定的，连邓小平回到北京之后也发生过反复哩！但如果我被领回绥化，即使并不是完全平反，即使生活上有麻烦，即使在某些方面比在监狱里还别扭，我总能赢得 5-6 年的时间（1973—1979 年）。我不是就可以提前复习英语，恢复研究历史并开始写作，以后也就可以作更多的事情了吗？

(3)

9 月里，又是一天下午大约 3 点钟的时候，又是当我干完了活在架棚里查看坯子时，还是那名犯人传达员孙昆找到我说：“叫你呢！”

但是这次被叫到砖厂行政办公室的共有 15 名犯人，第五大队的三个中队的每个中队来了五个人。来自第八中队的有带队付邦栋、张轶东、秦贯中（前《光明日报》记者，右派分子升级成反革命罪犯）和其他两人。犯人都面对办公桌席地而坐。坐在办公桌后的是负责全大队犯人日常事务的王干事，第八中队的管教员谢常青以及第七和第九中队的管教员。王干事宣布：

“为了加速对你们的改造，监狱领导决定组织一次外出参观。参观的地点是肇东县涝洲公社，为期三天，明天早上 6 点钟出发。你们要自带毛巾，牙具和碗筷，还有纸笔以便记下你们看

到的东西，回来向其他犯人作介绍”。

所有犯人都对这些被挑选出的外出参观者表示羡慕。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得比平时更早，吃的早饭是馒头。车队共由六台车组成：第一台是贾典狱长的小轿车，第二台是大客车，里面坐的是几个行政干部和解放军战士，看不出他们携带武器没有，第三、四和五台是敞篷大卡车，每车上挤站着约 30 名犯人，最后的第六台还是大客车，坐着行政干部和解放军战士，仍然看不出携带武器没有。金秋时节站在奔驰于田野之间的大卡车上可真有点心旷神怡了。大约正午 12 点时车队到达肇东县涝洲公社。

毛泽东在 1964 年提出“农业学大寨”。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农业生产队，曾战天斗地取得一定的好收成。于是毛泽东就把大寨树立为全国农业单位的样板了。这就是说所有农民都要单纯依靠自身努力，无需政府和外来援助从事农业生产和建设农村（其实大寨作为样板并没少从全国得到援助）。这种精神是可以学习的，但是全国所有农业单位不问条件之不同都要模仿大寨那样办事就不科学了。然而在毛泽东的强求之下，各省都不得不搞出几个自己的“大寨”，于是肇东县涝洲公社就成为黑龙江省的“大寨”了。“涝洲”之名来源于该公社位于松花江畔，因此经常遇涝之故。今年涝洲公社的社员们通过抗涝斗争取得了较好的收成。涝洲公社于是闻名于全省，经常有人来此参观。

我看到涝洲公社的房屋很少是用红砖建成的，多数是用土坯或拉合辨砌墙。众犯人在一处估计是公社办公地点的平房里吃了面条作为午饭。我一下子吃了四大碗，大概有二斤面粉吧！当然谁也没少吃。下午众犯人被领到一块据说正好是一亩的土地上，地中央堆着据说正好是从这一亩地上连带穗拔出的谷子。年约 27-28 岁的生产队长向众犯人讲述今年社员们是如何抗涝的，从这堆谷子能打出大约 800 斤小米来。如果真正如此，那的确是一

种成绩，因为谷子（小米）是被视为低产作物的。但是人们都记得在 1958 时，许多农村把一大片土地上的收成都堆在一起，说那是“亩产”，乃至有“亩产万斤”的事。因此我也不敢相信滂洲公社的谷子确实是亩产 800 斤。接着众犯人又被领去看了生产队集肥的大粪堆和几户农家。我感觉这几户农家和我 1969 年与世隔绝前所见绥化一中校园外的农家相比，也不像有什么进步。那天晚上我们听了公社书记关于滂洲公社历史与未来规划的报告，夜里就睡在公社办公室地上，铺着谷草和衣而卧。第二天早饭后车队驰向肇东县城，在一处大车店歇息片刻后，犯人就被领去参观玻璃制品厂。回大车店吃过午饭后，众犯人又被领去参观一处丝绸织品厂。在这两个厂里，我们都听到了工厂党委书记所作的关于该厂历史和未来规划的报告。那天晚上我们就睡在大车店里的大统炕上，这回可是有被褥了。

第三天早晨，参观者们踏上回程，正午时回到监狱。当天晚上在贾典狱长的主持下召开了全监犯人大会，有包括付邦栋在内的几名经指定的犯人向群犯讲述了他们亲眼看见的国内大好形势。接着几天各中队或小组的晚间学习也都是这个内容。每名参观者，包括我，都在本中队或本组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监狱《劳改报》也以此次参观为题专出了一期，并要求每名参观者写稿谈自己的收获和感受。我心想这次参观的主要“收获”就是吃了三天饱饭，而且是馒头和面条。虽然没有吃到肉，炒白菜和土豆片的油也比监内伙房多一些嘛！但是为了交差，我还是填了一首“菩萨蛮”交出：

“人人都说江南好，
我道三肇亦多姣，
舜尧一万伍，
种地两万亩，

革命加科学，
洼塘变粮仓，
松江大寨花，
今岁更芬芳？”

这里的“三肇”指肇东、肇州和肇源三县，均属黑龙江省绥化地区。“舜尧一万伍‘指涝洲公社共人口一万五千’，舜尧系取自毛泽东诗：“闻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中“六亿神州尽舜尧一句”。

恰好是参观回来的第二天早上，当众犯人在监舍门外集合等待出工时，院内大喇叭在早晨广播中传出了重要新闻：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啊，林彪垮台不是全世界早已知道的吗？为什么中共十大不是在开幕时就宣布，而是在闭幕后许多天才宣布呢？中共九大可是在1969年4月1日晚上开幕后仅几个小时就对外宣布了的呀！”我自问道。

(4)

12月初冬训之前，黑龙江省第三监狱的犯人又重新编队。原有负责基建的第一大队缩编为一个中队且合并入第五大队。这是因为监内和厂内的基建任务已基本完成，今后只剩下经常的维修工作了。新的第一大队是监狱北部外大院的翻砂车间。第五大队自身则将原第九（历反）中队解散而接受了一个新的第九（维修）中队。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宋振德当了新第五大队的大队长，这是一个矮胖的约45岁的人。大队教导员仍然是张百发。原第九中队的那些历反犯人大多数（约50人）编入第六（农业）大队，一小部分（约30人）则编入了第八中队。因此第八中

队还是一个反革命犯（历史加现行）中队，仍负责烧砖。第七中队，则仍刑事犯中队，负责生产砖坯。第七中队的指导员和管教员都换了。指导员姓张，管教员姓王，都是年约 35 岁的人。

第八中队的指导员仍然是胡树牛，管教员仍然是谢常青。原来的第八中队现在只剩下大约 90 名现反犯人了，这一方面是由于殷富、刘书林、刘长山和路奎等被原判单位领回，另一方面有张世辰、侯汉钊等刑满出狱的原故。现在加上原第九中队合并过来的约 30 名历反犯人，新的第八中队现在有 120 多名犯人了。这 120 多名犯人编成了七个组。中队带队的仍是付邦栋，李春元仍然是三名站道之一。那 30 多名历反犯人构成第三组和第七组的主要部分。这是因为第三组将负责从事生产一些新产品：白灰、耐火砖、地面砖、瓦和花盆等。第七组是杂务组，因此主要是老年（历反）和体弱的犯人。其它的五个组则这一冬都是为明年的制砖生产备土了。

然而我却被放进了第三组。在第三组的 20 名犯人中，只有四名现反犯人，其他的则全是历反犯人。有两名组长，张学孟是历反犯，年约 55 岁，河南省人，原国民党军官，判的是无期徒刑；肖云龙是现反犯人，年约 45 岁，瘦高个儿，原鹤岗煤矿矿工，因言论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我又被指定为小组记录员。

编入第三组之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出工来到砖厂后就随着本组犯人来到耐火砖车间。这是位于砖厂西北部一趟东西走向的平房，内部又分为几间。这趟平房外的西南方向有一座专门烧白灰和耐火砖的窑。这不是一个轮窑，而是一个单窑室单通道的小窑。窑室内每次可装进约 1500 块耐火砖坯（煅烧要求温度为约摄氏 1700 度）或 15 吨石灰石（要求温度约为摄氏 1300 度）。出窑和装窑也是用双轮车从那单一的门道通行。因此窑内并非经常有火，而是烧一次点一次。冬季里基本不点窑，第三组犯人们

主要是从事打制耐火砖坯。

在这些新产品中，生石灰石并不需要任何加工，烧前堆入窑室内即可。地面砖、瓦和花盆的坯子是用纯黄黏土在模子里压的。这和制砖土不一样，因为制砖土中是允许含有约百分之二十的地表黑土的。于是这一冬就有两个小组的犯人负责往砖厂办公室北面（即南面）堆上约 4000 平方米的纯黄黏土以备制瓦等用。因为煅烧地面砖、瓦和花盆要求的温度和煅烧红砖一样，即为 1050 度，于是这些产品是应该和砖坯一起放到轮窑里煅烧的。现在两个轮窑都已闭火，也就不必忙于压制这几种产品的坯子了，明春再开始吧！因此这个冬天第三组的犯人们主要是从事打制耐火砖坯。制作耐火砖的原料是 80% 的耐火材料和 20% 的耐火黏土。打制前得先把它们碾成粉末。打制坯子是手工式的：在一个铁板面的长台桌上放着几副模子，每个模子由四块从侧面立放着的木板用摺叶联成，木板的长和宽相当于一块耐火砖平放时的四边那样大小（即有两块是 8×16 公分而另两块是 8×32 公分。这四边木板末端的两块之间有插销备开启或闭合上模子用。每一名犯人站在一个模子前，先用插销封上模子，给模子底和内四边抹上机油，填入原料，然后用一块长方形两面平的本锤不断击打模子，边打边往里边加料。最后模子里的料变成了一个坚硬平滑的整块，他就拔出销子、打开模子、取出整块，这就是一块耐火砖坯了。平均每个犯人每天能打制出约 20 块砖坯，这些砖坯被送去晾干和存放，最后送入窑室煅烧。

第三组大约一半的犯人专门从事打制耐火砖坯，其他人则是干辅助性的活儿。例如有一个名叫商玉华的犯人还是耐火砖车间的技术员。商玉华是第八中队唯一的刑事犯人，他之所以被编在第八中队而不是第七中队，就是因为他懂得生产耐火砖的技术。他在车间里自己有一间小小的实验室，整天待在那里，连午

饭也是一个人在那小实验室里吃。其他的犯人则是从事拌料（将耐火材料耐火黏土按比例拌匀）、供料（将拌好的材料不断放上铁板台桌供打坯人用），干燥和存放砖坯等。我被分配和一名年约五十的历反犯人赵相明一起负责在一个大碾盘上碾料（耐火材料和耐火粘土）。大碾盘位于从车间东部向北伸延的一间房子里。碾盘是一个电磨，碾盘直径约二米，磨石重约四吨。耐火材料呈米粒状，每粒约有两粒大米那么大小。材料被压碎后得在筛子上筛，未过筛子的材料就需要重压和重筛。有时一碾盘的耐火材料要经过压和筛五六次才能全部变成粉末。碾耐火黏土时倒是省力一些，不过压黏土时黏土粉末总是不断地往你的嘴、鼻、眼、耳和衣缝中灌进。有时有些行政干部还从自己家里拿一些东西（小米或玉米等）到这里来让你磨成面，那你就得先把碾子彻底打扫干净才能开磨了。

于是这个冬天我就被安排干室内劳动，而且是生着炉子的。生炉子绝不是出于对第三组犯人的关心，而是防止拌好的原料粉末和尚未阴干的耐火砖坯受冻。第三组的犯人们不过因此借光而已。不过我被放入第三组，显然是行政干部出于对我的照顾而安排的，否则我就得天寒地冻中去干那沉重的备土活儿了。而在冬训学习中，我则和张学孟和肖云龙两名组长一样，扮演一点“领导”学习的角色。我对于监狱生活已经习以为常了。

第十九章 1974 年 批林批孔

(1)

通常每逢春节前，每家人都得进行一次大扫除。大扫除的重点是扒一次炕和打通烟筒，以便于烧春节饭菜。这活儿虽然不累却比较埋汰。不过监狱工作人员却有一点方便，即找几个犯人到自己家去干这种活儿。这活儿虽然在监狱大墙外，但是属于私人性质的，因此没有解放军士兵跟着监视。为了保证不出问题，政府工作人员就得选择“可靠的”犯人来干私活。

春节前一个星期，谢常青管教员找了我、高积学和富作田三人去他家干私活。谢常青把我们三名犯人带到他家，自己就骑车回砖厂办公室上班去了。谢常青的家属都在另一间房间聊天，关上门以防三名犯人在另一间屋干活时烟灰漫过来。为了扒开炕面检查烟道，三名犯人首先得移走炕席，扫去炕面上的灰尘和碎碴。突然高积学碰了一下我说：“你看！”

这是一份《参考消息》摺两折之后成 16 开，面上有不少灰尘，但从日期上看是一个星期以前的。我赶紧把这份“参考消息”放入衣袋，我们干完活回监舍时不用干部跟随，自己在过两道门时报告一下就行了。我们回到监舍时，整个第八中队还在砖厂干活，监舍里空空的。我洗完脸就爬到上铺，躺在自己的铺头上，从衣袋里掏出那份《参考消息》读起来。虽然《参考消息》“属于内部刊物，不许犯人阅读”，我也看不出它与《人民日报》之间有多大的差别。不过那里有外国媒体关于中国批林批孔的报导和评论。一篇评论说：批林批孔意味着在中国即将开始一

轮新的恐怖！

什么新的恐怖呢？刘少奇和林彪都完蛋了！谁又将是这一轮新恐怖的对象呢？我得出的答案是：管他是谁呢？反正与我无关了，因为我“早就进来了”！

今年春节，犯人们五天不出工。这时我作为一名“一等犯人”，已经不太受到监规中关于犯人在院内必需以三人小组为单位活动的规定限制了，我有时一个人在二院内走动，站道的也不问。这时我和秦贯中（即那个前《光明日报》记者）去了几次大课堂找《劳改报》的那几名犯人编辑聊天。编辑室里有一些书，于是我有幸借到一本郭沫若的新著《李白与杜甫》。这样春节这几天我就躺在铺头上读了这本书。这本书出版于1971年，那么就应该是在1971年以前写成的了。那可是大动乱的年月啊！我对郭沫若在那些年月里还能搞学术研究感到奇怪。而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使我不理解的事就越来越多了：人们都知道李白和杜甫是唐朝的两个大诗人，李白是浪漫主义的而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二人各有其长。没有必要在他们之间作什么比较，更没有必要说谁优谁劣了。然而，郭沫若在这本书中却拼命抬高李白而贬低杜甫，甚至说杜甫是一个比李白还要大的酒鬼！1966年文革火爆前，郭沫若不是说过自己写过的所有东西只值得“一烧”吗？那么为什么又写起来了？而且是这么一种写法呢？只有在几年后出了监狱，有条件阅读到更多的东西时，我才懂得郭沫若这不过是迎合毛泽东“喜李厌杜”的心理而已。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一些著名学者，如杨荣国、冯友兰和周一良批林批孔的文章。我只知道杨荣国是广州中山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而关于冯友兰和周一良这两位北京大学的教授，我就知道得比较多了。冯友兰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我在重庆清华中学念书

时，校方就指定冯友兰的《贞元六书》为课外读物。我念北京大学时，还读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因此知道冯友兰是一位尊儒的学者，可是他现在却批孔了。周一良出生于日本，20 世纪 40 年代时曾就学于哈佛大学，而且在 20 世纪 50 年代入了党。他熟知日本历史和中国隋唐史，1956 年夏天我回国度假时，曾就自己的论文讨教于周一良并和他进行过短暂的谈话。最近周一良发表了一篇题为“读柳宗元的‘封建论’”的文章，文中大大地赞扬秦始皇。当然每个人都有权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可为什么现在这些学者都这么众口一词地批评孔夫子而赞扬秦始皇呢？再说文革初期许多著名学者受难（我被释放之后得知，仅一所北京大学就约有 40 名教授自杀），为什么杨荣国、冯友兰和周一良平安无事呢？

4 月份，从报上读到邓小平从第六次联大特别会议讲坛上宣布的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之后，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困惑：毛泽东不是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现在为什么又把世界一分为三了呢？毛泽东真是一台随心所欲地制造理论的机器啊！

当我还在困惑这困惑那的时候，形势却正在把我自己也推上了监狱内批林批孔的舞台上去哩！

(2)

到春天时，根据制砖的需要，第八中队又重新分组。干部没有变化。付邦栋仍然是带队，李春元仍然是三名站道之一。第三组基本上没有变动，专门从事生产耐大砖和白灰等特殊产品。我仍然是第三组的记录员，两名组长仍然是张学孟和肖云龙。我的主要活儿仍然是和赵相明在一起碾压耐火砖材料。这座小单间窑有时也得点火烧白灰和耐火砖了，我和另外几名犯人也得干一点

装窑和出窑的活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按干高温活儿的天数领到一点保健食品，即一点白糖、豆油和茶叶之类的东西。

根据上级指示黑龙江省第三监狱也得搞批林批孔，作为对全体犯人的一次“教育”。监狱领导选择第五大队第八中队作为在全监开展运动的试点。5月初的一天晚上，谢常青管教员召集付邦栋、我、秦贯中、孙世昌和王维家到中队监舍办公室商议此事。这时其实有文化的犯人们都已知道监外社会上正在开展批林批孔，大家决定先在监舍内外制造一点声势以吸引第八中队犯人们的注意，我将是宣传材料的主要执笔人。

我并不精通哲学，关于儒家和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其实也说不出什么之吾卯有。但我是专学历史的，对于中国古代史也确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对于秦始皇统一中国的看法倒是和毛泽东相近。1959-1961年间我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时，郭沫若还兼作历史研究所的所长，所里为他专设有一间研究室，不过我在所里的那些年里他只来过一次。有一次由于看郭沫若新编历史剧《蔡文姬》的演出后同事们也评论到郭沫若的另外三个历史剧，即《屈原》、《虎符》和《棠棣之花》。我不顾郭沫若是我们的所长，说这三个历史剧是歌颂将亡于秦的六国之中的侠义精神。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因此郭沫若同情六国是反历史的。关于焚书坑儒的历史事实是：秦始皇收集天下图书之后，只烧掉一小部分，而是把绝大部分的书放在阿房宫的夹墙里。秦亡后项羽起兵攻入咸阳，焚烧阿房宫才把所有的书都烧了。因此，焚书的是项羽而不是秦始皇。秦始皇的确下令活埋了四百多名儒生，这是一种处死犯人的方式。这种作法是残酷的。但当时全国人口已经以千万计，处死400人不算多。

在谢常青管教员做出指示后的一天下午，当八中队的犯人们收工回来时，他们看见监舍西墙外门边横着一块黑板，上面是我

所写的一篇短文：

焚书坑儒好得很！

革命的专政万岁！

公元前三世纪，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为了建立新兴的封建地主政权，对反动保守的奴隶主势力，采取了坚决的镇压措施。秦始皇下令收集全国所有宣扬奴隶制度的书籍一火而焚之，又坑杀了四百多名宣扬旧奴隶制度的儒生。这一行动大大打击了反动的奴隶社会的残余势力，稳固了当时进步的封建制度和统一的秦帝国。这一坚决措施为二千年统一的中国封建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真是好得很！

历史上一切革命政权一经建立，必需坚决打击批判落后倒退的残余势力来保证新生事物的发展。我们罪犯在当前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也应努力学习，弃旧图新，加速改造！

常常有一些其它中队和大队的犯人到这里来看这块黑板报，这也叫作“奇文共欣赏”吧！于是在监狱院内批林批孔的气氛也就形成了。下一步就是召开一次批林批孔的中队会。蔡会斌、秦贯中、孙世昌和我这四名犯人指定作重点发言。中队会是在五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召开的。在监舍内西端放着的那几张桌子后面坐着的是董政委、贾典狱长、管教科王科长以及第五大队的全体政府工作人员。谢常青管教员念完开幕词后，四名犯人先后宣读自己的发言稿。我是第二名，宣读的是我的第二篇“奇文”：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蓬勃

展开，气势磅礴，涤荡着孔老二三千多年遗留在中国大地上的污泥浊水，也给我们罪犯的改造带来了新的动力。

孔丘出身于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社会的春秋时代。他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为维护当时的奴隶社会服务的。后来他的徒孙孟轲以及汉朝的董仲舒等人发展了他的学说，几千年来始终为维护旧制度，反对变革而服务。直到不久以前，林彪反革命集团还从孔老二的破烂堆里搜出什么“克己复礼”和“韬光养晦”之类的玩艺儿来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苏修新沙皇对中国哲学史一窍不通，连一个中国字都不认识，最近也搞起了尊孔。这就说明孔孟之道完全是为反动倒退的势力服务的。只有彻底批判林彪和孔老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胜利前进。

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在宣扬孔孟之道时，却对中国古代完成统一大业的秦始皇大肆挞伐，说他是违背了孔孟之道，行暴政而不行仁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同文同轨，修长城以防匈奴，为巩固我国二千多年来的统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秦始皇焚书是破当时的四旧，为建立新的当时是先进的封建社会思想体系扫清障碍。秦始皇是坑杀了四百多名散布反革命言论，攻击革命政权的儒生。秦朝共分36郡，每郡略大于今天的一个专区。36个郡共坑杀儒生400余名，即平均每郡只镇压了十多名反革命分子。这甚至在今天看来也是宽大的。这与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三千，不能漏过一个共产党人”能够同日而语吗？中国的统一局面因为秦始皇的坚决措施而巩固，当时欧洲的罗马帝国却瓦解了。直到今日。欧洲共同市场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还是困难重重。相比之下，我们还不能感到秦始皇的伟大历史功绩吗？

孔老二宣扬“杀身成仁”，他的徒孙孟轲则宣扬什么“舍生取义”。随着这个“义”字在我们罪犯中，什么专诸、要离、“桃园三结义”、“薛刚反唐”、“大八义”、“小八义”、流氓阿飞之

类的江湖义气，一个一个的都跳了出来。根据这种反动逻辑，偷摸盗窃是“义”，拉帮结伙是“义”，坑蒙拐骗是“义”，打架斗殴是“义”，知情不举、互相包庇、对抗人民政府也是“义”。诸如此类的反动言行，难道只是发生在少数几个罪犯身上？难道不足以促使每一名罪犯认真查找孔老二洒在自己身上的毒素吗？

今天我们伟大祖国是空前统一的，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更是无比巩固，国内外形势一派大好。这一切都在促使每一名罪犯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罪服法，通过投入批林批孔运动加速将自己改造成成为新人。

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四名犯人发完言后，贾典狱长说这个中队会开得很好。他没有提及另外三名犯人的发言（基本上都是摘自报纸的材料），而说我这名犯人“喝了不少墨水”。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贾典狱长和另外几名政府工作人员，又来到第八中队监舍管教员办公室。把那几名在中队会上作过发言的犯人找去谈话。他要这几名犯人告诉他，孔孟之道在犯人的言行中都有哪些表现。我说据看到的有“为朋友两肋插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多一道墙”等等。接着在5月末的一天下午召开了全监犯人批林批孔大会。每个大队有一名发言人，我代表第五大队发言。有趣的是在贾典狱长所作的动员报告中，前几天我所说的那几点现象都被作为孔孟之道在犯人思想言行中的表现而提了出来。我这个第五大队的发言人只不过是重新念了一遍几天前我在第八中队会上的发言稿而已。从此，我就在全监变得有点名，有一点像杨荣国了。

在全监批林批孔大会后，又要求全体犯人学习儒法斗争史。我的新任务是向第八中队的犯人们讲课。我把整个儒法斗争史分成两堂课来讲，以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为界。于是在 6 月份两个星期三的晚间学习时，我就讲了这么两堂课。在第一讲里我把孔丘、孟诃、汉武帝、董仲舒、司马光、朱熹和王阳明等人放入儒家一边，是反动的；把韩非、商鞅、秦始皇、桑弘羊、柳宗元、王安石和李卓吾等人放入法家一边，是进步的。于是从春秋时代直到 19 世纪中叶的中国历史就是这两派之间的斗争史了。在第二讲里我把曾国藩、慈禧太后、袁世凯、蒋介石、刘少奇和林彪都纳入儒家，是反动的；又把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鲁迅以及伟大领袖毛主席都纳入法家，是进步的。于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就被描绘成为这两者之间的斗争史，而中国革命的胜利也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法家们的胜利了。后人可能嘲笑说这样讲历史真是荒谬绝伦，可是在那个时候就是那么干的。在我讲完课之后在第八中队犯人中还进行了一次关于批林批孔和儒法斗争史的考试。试卷上共有四道题，付邦栋、我、秦贯中和孙世昌四人各判一道题并给分，四道题的分数加在一起就是该犯人的卷面总分。这四道题都很容易，不过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常识问题而已，因此，只有少数没有文化的犯人不及格。

在 8 月份里上面又批示说，每一中队得挑出几名犯人组成所谓的“学帮小组”，使批林批孔与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日常改造联系起来。一天晚上，谢常青管教员宣布了第八中队学帮小组成员名单：张轶东（第一个被提名的）、付邦栋、秦贯中、孙世昌和王维家。实际上这个小组只不过是负责全中队犯人日常的学习和宣传事务而已。付邦栋作为带队主要忙于生产事务，我就成为了主要负责全中队宣传和学习事务的犯人了。但是不知何故，从 9 月份起，报纸上和监狱内关于批林批孔提得愈来愈少了，谢常青

管教员也不再问学帮小组在干些什么。于是这个学帮小组也就不知不觉地消失了。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我被监狱放出几年后，我才知道批林批孔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周恩来。这就使我有一点负罪感了，这大概是我在这些年中做过的一件最不光彩的事。1973 年时我错过了向绥化法院提出申诉的机会，但那只是我个人的失误。而 1974 年批林批孔中我在黑龙江省第三监狱中做出的“表演”，至少在两千多名犯人中造成了影响。我在监狱里也为四人帮服务了，我曾经对杨荣国、冯友兰和周一良等人在批林批孔中的作为感到可疑，但我这个犯人在这个运动中干的却和那些人是相类似的。

只有两名硬骨头知识分子是公开抵制批林批孔的。一个是早在 1953 年就和毛泽东吵翻了的那个梁漱溟。这一次梁漱溟公开宣称：“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另一位是四川省著名的吴宓教授，因为反对批林批孔而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但是这种人实在是太少了。

在监狱的条件里我当然不知道批林批孔的目的是打倒周恩来。我自己对于秦始皇的看法也有一些和毛泽东的看法相吻合。这些因素的确使我易于接受和执行监狱当局方面交给我的任务。但是这些并不能为我在这次运动中的积极表演辩护，强调这些就是自欺欺人了。我积极参加批林批孔有自身的得失关系在起作用。最直接的好处是：有这种任务（例如准备大会发言材料等）时，我就可以不去砖厂出工，而是坐在监舍写东西。然而，在有装或出窑活时我还是去砖厂出工，因为干那种活劳动时间短而且有一点劳保食品。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好处算不得什么，但它对一个犯人来说却是现实的。我承认这时我不仅积极接受监狱当局交给我的有关批林批孔方面的任务，而且盼望接着还会有其它这方面的任务，为的就是不去砖厂出工。当然，我并没有从监狱当局方

面得到最大的好处，就是减刑。监狱给犯人的减刑一次不超过二年，而且是三年以上才考察一次。监狱只根据犯人的改造表现考虑他的减刑问题，而不管他入监之罪为何，那是原判单位的事。

某些学者辩解说他在批林批孔中的作为的根源在于他“毕竟是书生”，我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否定了这种辩解。一个人的某种重大错误行为是不可能仅仅建立在“错误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必然有利益关系的考虑在起决定作用。有些情况的确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无可奈何：1973年7月17日在陪同杨振宁接见毛泽东时，著名物理学家、堂堂的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竟然也对毛泽东说：“祝毛主席万寿无疆！”郭沫若亦步亦趋地追随了毛泽东许多年，当毛泽东需要用他作为一个稻草人，先打他再打站在他身后的周恩来时，郭沫若也就毫不犹豫地屈服了。中国共产党的后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地为郭沫若开脱，说他是太崇拜毛泽东了等等，这其实是在哄小孩。郭沫若不仅是一个文人，还有好几十年政治斗争的经验。但是他毕竟是一个人，是一个父亲。他的一家有十几口人，文革初期他已经失去了两个儿子了。除了揣测毛泽东的意图之外，他没有别的办法保护自己的家庭。为此他顾不得受到同时代人和后人的笑话了。在这些年里中国知识分子中被认为骨头最硬的人是顾准。但是就在这1974年，顾准为了摘去右派帽子以改善子女的处境，也在“认错书”上签了字，并死于当年。保护幼仔不仅是人类，也是一些动物的本能啊！因此，对郭沫若还应该保留一些理解，不必过于谴责他。不过郭沫若的辩护士们总想故弄玄虚地单纯从认识方面来寻找郭沫若晚年作为的原因，还想把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保持在与鲁迅的同等位置上，那就是徒劳无益的了。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可能由他的拥护者或反对者来确定，而只能是由历史本身来确定的。伟大的俄罗斯诗人普希金给自己在历史上定了很高的地位，但是后人

中并没有人批评普希金狂妄自大，因为历史证明了普希金的确是堪当此位的。普希金在他的“纪念碑”一诗中是这么说的：

多年后人们仍将喜爱我，
因为我鼓舞了善良的感情，
因为在那残酷的世纪里我歌颂了自由，
因为我呼吁了以仁爱去对待倒下的人们！

可悲啊，就是没有一个中国的普希金！

(3)

批林批孔的闹剧过去之后，制砖季节也快结束了。我还得照常去砖厂出工。而且与去年不同的还在于：去年冬天我是在有炉子的耐火砖车间干活，今年冬天我得在天寒地冻的露天里备明年的制砖土了，而且作为一名组长还得起带头作用。因此，这是我在监狱里最艰苦的一个冬天。

监狱内的基本建筑工程是结束了，而红砖作为建筑上的基本原料则是畅销的。新肇离大庆油田近，销路更好，从1973年起就常常有外面的大卡车开到这里来买砖。这当然也增加了监狱的经济效益。于是即使监内的基建工程基本结束了，红砖也不减产，现有的生产水平必需保持。

另一方面，监狱内部（主要是翻砂车间）和社会上对于耐火砖的需求有限，积压大量的耐火砖坯没有意义。于是政府干部决定暂停生产耐火砖，在冬训和为明年备制砖土期间，不设耐火砖组。在冬训前第八中队重新编组时，我被编入第五组，成员多为

原耐火砖组成员。两名组长是我和张学孟。我“升官”了。

生产 2 千万块红砖要求至少备出 6 万立方米土。所以，不但第七和第八中队全部，连第九中队也调出几个小组到砖厂来参加备土。第八中队和第九中队的那几个组都被安排在砖厂西南部的那一片取土。这一片的土已经被取过三年，地势很低，今冬则将更低了。取出的土用双轮车拉到第七中队机器房旁东面新垒的土山上，运距约 400-500 米，而且东端愈来愈高，西端愈来愈低。我对此是熟悉的，因为 1971-1972 年和 1972-1973 年之间的那两个冬天已经干过这活儿了。为了防止犯人偷懒和保证产量，监狱“发明”出了一种新的计工制度：在正垒着的土山脚前有一名犯人拿着一支粉笔坐在凳子上，旁边立着一块黑板。各组的每台双轮车拉到土山前准备爬坡时，这名犯人就用粉笔在该组名下划一道杠，五道杠正好构成一个“正”字。每个“正”字表明该组送来五车土，即一立方米（每车土按 200 公斤估算）。这样到收工时，各组今天备了多少立方米土（即多少个“正”字）就显示出来了。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各组今天备土的总量还得除以你组今天参加劳动的人数。这个商数就是你组今天的劳动工效。这个工效要排顺序，每天晚上学习前由带队的付邦栋向全中队宣布。这样对于每个小组尤其是组长们的压力就不小了。

我被释放回绥化后，得知张志新在辽宁省的一个监狱时，在一个缝纫车间劳动。她每天在完成自己的定额后，那怕尚未到收工时间，她就不干了。我自认自己真不如她。在我的脑子里还有传统观念，即不管我有罪无罪，劳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对于备土劳动的态度是积极的。不过我对于备土积极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在于我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小组，即是被那“工效排队”逼出来的。如果今天你们小组在工效排队中上了末榜，你这个组长就不仅要受到来自政府干部和带队付邦栋的批评，还要招致本

组组员的不满。在这种压力下我就必需在劳动中起带头作用了。

因为第五组组员多来自原耐火砖组，老年和体弱的犯人就比较多。为了带动他们卖力气干，我就脱下棉裤，穿着单裤拉着双轮车在土山和取土场之间来回快跑。这样大家的劲头倒是上来了。这样在第八中队的七个组中，第五组每天的工效通常是排在第四或第五位。这样大家也就满足了，因为并没有人想去占那第一二名。有一次在中队会上，批评某些犯人劳动消极时，有人把我穿单裤拉车跑作为积极劳动的榜样来赞扬。谢常青管教员却说：“我们不提倡这个，这样作以后会落病的！”这以后我还是穿着棉裤干活了。然而，谢常青管教员的确是对的：我出狱后感到左腿不灵活，经检查是左腿关节风湿！

艰苦的劳动还引出另一个问题：吃！每天 1.6 斤粮食，加上缺油的蔬菜根本维持不了身体的需要。中队储存的土豆、窝瓜干和茄子干也只能每周给大家糊一次吃。第六大队等送剩饭的事也不是经常有的。我夏天攒下的那 20 元监狱发的零花钱，买两次食品就花光了，例如买二斤糖块一顿就能吃光。除去少数有外部家庭援助的犯人外，多数犯人经常感到饥饿。有趣的是，在我的这一组有一名叫陈方吉的犯人，年约 45 岁，原是一个瓦匠，因为猥亵养女和言论问题被判了 15 年。陈方吉有一次买来二斤奶粉，坐在铺头上用匙子把干奶粉送进嘴里，就像吃一碗高粱米饭似的，不大一会儿就吃光了，吃完之后还说不清这奶粉是什么味儿。又一次陈方吉在监舍外马葫芦旁捡着半个窝头，可能已经被尿冲过，却毫不犹豫地立即吃了。另一名犯人将此情况告诉我，我也没有对陈方吉说什么，因为我自己这时也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有一次一名叫张宝德的犯人捡到政府干部们喝酒后扔下的狗骨头，拿过来就啃。

在砖厂还存在着人鼠之间争夺粮食的斗争。有一个名叫姚洪

涛的犯人，在夏天时就预见到冬天会发生粮食短缺，于是开始储备。他把口罩拆回成纱布，缝成口袋，把高粱米饭和小米饭倒进口袋，再用绳把口袋挂在小轮窑西面第八中队休息室外的晾衣竿上。可是第二天早晨姚洪涛来到中队休息室外时，他看见他的饭口袋都掉落在地上。原来是夜里老鼠爬上晾衣竿，咬断系口袋的绳子，使口袋落到地上。有趣的是老鼠把口袋里的小米饭吃掉，却把高粱米饭留下了。原来老鼠也是“食不厌精”的。这一情况使犯人们认识到了老鼠的确是人类可恨的敌人。然而犯人们在取土时也遇到了对老鼠进行报复的机会：一次犯人们在土层深处挖出了一个老鼠的粮仓。那里面全是大花生。有的一个花生壳包着四粒肥大的花生仁。我也分得了约四两花生仁。据说吃耗子粮食是有中毒危险的，可是这些“发现者”们吃完花生后却平安无事。另外，甚至有的犯人不怕得病，抓住耗子就剥了皮拿到轮窑火眼上炖吃！

一天午饭后，我拉土车在土山上把土倒掉拉空车下来时，第七中队的犯人袁电工向我招手说：“你来一下！”我走进他的机器房里的电工室。袁电工指着桌上放着高粱米饭和熬白菜的两个饭盆对我说：“今天我家里来人接见，带来了吃的，这饭菜我不要了，你把它吃了吧！”午饭后我只感到半饱，于是十几口就把这两个饭盆的饭菜都吞进了肚里。那天下午我干活也感觉比较有力。还有一次砖厂医务站的犯人医生尹大夫也对我这么“援助”过一次。但是这些都是偶然情况，不能根本解决我的肚皮问题。我估计差不多要吃双份的口粮，即差不多一天三斤粮，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这怎么办呢？然而，后来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解决办法。

一天晚饭后，我这个小组负责去第五大队食堂领饭的犯人对我说，在厨房处通往监舍的路旁倒掉了不少作粉条之后的土豆渣

子。这些粉渣子已经冻在地上，可以用镐把它刨起来。我真的这么干了。我刨一次可以装回一口袋粉渣子块。用茶缸（二斤容量）装冻粉渣子块放到炉子盖上，熟后拌上盐就可以吃了。这粉渣子实际上是以土豆皮为主，还混合了一些冻在地上的黑稀泥。但是我吃起来就像是当年在绥化一中教书时从商店买回的油茶面似的。这样每天我就吃两茶缸粉渣子，早饭前一茶缸晚饭前一茶缸。我真的不感觉饿了，干活也有劲了。有趣的是在砖厂野地大便以后，我注意到我的粪便是黑色的，原来是和粉渣子混在一起的黑稀泥都被排泄出来了，而其它成份都被吸收了。有的犯人还笑话我，说我吃粉渣子吃胖了。

第二十章 1975 年 严管队长

(1)

从新年到春节是完成备土量的关键时期，因为春节后就得准备生产季节的到来了。然而这时取土最为困难，劳动强度也最大。气温往往降到零下 30 度以下，土冻的有二米多厚。取土只能用铁钎和大锤，铁镐只够用于剖开大冻土块以便往车上装而已。现在每个组取土的程序是：各组派出两个最有劲的人站在取土处，该处比装车处高约 5 米。两人中一人拿着铁钎尖朝地下，另一人则拿一把至少重约 20 公斤的大锤不停地往铁钎的另一端上打。这两人得定期互换角色。在铁钎尖下露出裂纹时就得移动铁钎的尖。有时这土的确很难打，但也可能一个大土块突然被打掉，从高处堕落到装车场上。在过去三年里每台双轮车是由两个人拉，一人架车把，另一人则拿一根带钩的绳挂在车上拉套，每车的两人自己往车上装土。但是自从实行“工效排队”以后，各组组长认为这样分工太浪费人力，于是改了办法：每组由两个人打土，两个人在装车场刨大冻土块并帮助装车，然后帮着把土车从装土场往上推到大轮窑西端的大道上；而在远处东端的土山脚前，各组都安排一个人拿着钩链帮着把你组的土车拉上土山。这样作的道理很简单：一个组出车愈多，它的工效就愈高。但这里有一个危险是：当你正在装车场上装土时，可能一个大土块正好被打下，砸向你或你的那一台车。

1 月 11 日下午，当我拉着空车从土山回到装土场时，看见地上有一些零散的土，就拿着一把铁锹把它归拢起来准备铲上车。

正当我低头干这事时，突然身后有人尖声大喊：“张轶东，往后退！”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并抬起了头。一个大的正方形的冻土块正好从土源处冲着我和我的车掉下来，这土块每边约二米长，即约四吨重！我被惊呆而拔不动腿了。万幸的是这土块只翻腾了两个面就停在面前，它的上平面比我还要高出约半米。如果这不是一个正方形的土块而是一个圆形的土块，它就会有更大的滚动惯性，那么我也就完了！

上帝保佑了我，但是上帝没有保佑另外一名犯人姚洪涛。这场惨剧正好发生在第二天，即 1 月 12 日的下午。这天中午在第八中队休息室吃饭时我还听见姚洪涛对另外一名犯人说：“这土很难打！”下午 4 点半即收工前约一个小时，我又是在装车场上给自己的车装土。突然装车场上一片喊声，大家都向南往姚洪涛所属的第二组地段跑去。姚洪涛躺在地上，身上压着一块和昨天立在我面前几乎一般大小的冻土块。姚洪涛在打土，没有注意到在自己的脚下已经出现了裂缝。大冻土块下坠时他自己也跟着坠下，而且被压在土块之下。犯人们好不容易把大冻土块撬翻到一旁，看见姚洪涛的脑袋已被砸碎，人已经死了。血、脑浆和碎脑骨和地上的灰土混溅在一起。他的尸体被送到大轮窑上存放。收工时还得向押送兵以及监狱两道门的警卫报告说：“今日收工比出工时少一人，因为有一人在工地上被砸死了！”

姚洪涛年近 30 年，是肇州县的一名公社社员，小有文化，因犯“反革命盗窃罪”被判有期徒刑 10 年。说起他的犯罪也很可笑：他没家没业的和自己的侄儿以及侄儿媳妇一起在农村贫困度日。1968 年末时，这三口人犯馋了。他们得知附近有一家人最近杀了年猪，把猪肉埋在院内的雪堆里。于是他们就去把肉偷出来，煮熟了大吃一番。这事被揭发出来了，再加上姚洪涛说过一些什么话，他就成了“反革命盗窃犯”。在第八中队里姚洪涛始

终在拉坯组。1973 年我是拉坯组的记录员时，姚洪涛也在拉坯组，因此我和姚洪涛之间混得比较熟。姚洪涛这人比较随和，大家爱和他开玩笑。有的犯人称他为“他大舅！”意思是我是你的妹夫，其实他根本没有任何姐妹。有的犯人则说姚洪涛和他的侄儿媳妇之间有点什么事情，这时姚洪涛就急眼了，说：“人家根本没有的事儿你们为什么乱说！”因此姚洪涛可算是劳改犯们生活中的盐。不知道监狱当局是怎么处理姚洪涛的善后的，因为他没有直系亲属。

姚洪涛出事故在犯人们中造成一段时期的神经过敏。2 月 4 日晚当全中队犯人正在监舍晚间学习时，突然监舍房震动了一下，屋棚上的灰往下落。一些老年犯人不顾一切地往监舍外跑。几天之后，得知这时在辽宁的海城县发生了地震。

从表面上说姚洪涛出事故的原因是他自己不小心，但实质上的原因还应该是：他饿了。姚洪涛人缘很好，常常有人将剩饭送给他，因此如前面提到的，他在夏天时就把高粱米饭晾干贮存起来。但这时已是冬末，他的储备可能已经用光了。而且事故发生在下午 4 点半时，即午饭后将近五个小时，肚子饿了难免头昏眼花，看不见脚下的土已出现裂缝并不能及时收回脚，于是就跟着大冻土块掉了下去，并被压在土块下面了！

我靠吃粉渣子维持体能，直到春节。春节前我还弄到两个“品种”的食物，而且都来自厨房。第一个品种是在厨房与监舍之间的道旁，除了粉渣子还有一些豆腐渣。不过我把豆腐渣热熟了吃时，也没有感觉它比粉渣子强多少。第二个品种是用黄米面做成的浆糊，是用扫面粉口袋扫出的黄米面作的。除夕前我和另一名犯人被派去厨房端回了两洗脸盆这样的玩艺儿。我把较小的一盆交给站道作装饰监舍用，较大的一盆留给自己“食用”。据说这浆糊里可能有玻璃碴子，吃它有危险。我每一口浆糊都用舌

头慢慢地舔，最后才敢咽下。这一大盆浆糊帮助我维持到大年初十不感觉饿。

春节后备土任务已基本完成，“工效排队”也不再提了。犯人们干活松弛了，饿的感觉也缓和了一些。我再去刨取粉渣子时，发现那里还有别人的镐头的痕迹。看来还有别的犯人，或许还不止一个，也在吃这玩艺儿。于是粉渣子的来源也就大大地缩小了。另外随着天气变暖，厨房倒出的粉渣子不再冻结，很快会变质，吃它会有危险了。于是我只好停止吃粉渣子了。

有一个名叫刘丕刚的犯人，是我的同乡，年约 35 年。他在 1967 年被判反革命罪有期徒刑 8 年。他的案情也很可笑：作为绥化铁路机务段的一名工作人员，他得向列车上的乘客们宣传毛泽东思想。于是他就领着乘客们齐喊：“毛主席，万岁！蒋介石，败类！”然而重复的次数太多了，刘丕刚的脑袋变得糊涂了。最后他居然喊反了，成为：“毛主席，败类！蒋介石，万岁！”这当然是反革命罪行了。不过刘丕刚今年年底即将刑满释放，于是就从第八中队转到出监队（直属队的一部分）去了。出监队的犯人们经常有剩饭。于是刘丕刚就常常回第八中队监舍看我，并给我带来一饭盆高粱米饭等。不过刘丕刚也有自己的打算。一次他对我说：“你有一个帆布旅行袋，在这里没有用。我就要出去了，那东西对我会有用的。你是不是把它给我得了。”我一想也有道理，就把这帆布旅行袋给了刘丕刚。但这事属于“捅毛蛋”，违犯监规的。组里有一名叫汪羽的犯人，曾经在劳动中去“大便”了很长时间，被我说过几句，他就在晚间学习时大喊我“捅毛蛋”。第二天晚上，我被叫到监舍西面的管教员办公室。胡树牛指导员问道：

“张轶东，我听说你最近违犯了监规，是真的吗？”

我承认了和刘丕刚“捅毛蛋”的事。胡指导员说：

“这的确不好，你如果有困难应该找政府。另外，你还得当好组长，不要感到抬不起头来！”

两天以后带队的付邦栋对我说：“你写一份申请，说你有浮肿，要求政府补助给你一些黄豆！”

我感到奇怪地说：“可是我并没有浮肿呀！”

“你真傻！这是补助给你黄豆的理由！”

可能是有人把我吃粉渣子的事也汇报给胡指导员了。于是我就写了这么一份申请报告交给付邦栋。第二天我拿着一个口袋到砖厂大门外侧的马厩去找赶毛驴车和喂毛驴的就业农工单于庭。单于庭原来也是第八中队的犯人，去年刑满释放留厂就业，被安排在这里代替了以前在这里的王德茂。单于庭已经得到胡指导员的指示，就让我打开口袋，用一个茶缸从装马料的黄豆袋子里盛出黄豆倒入口袋。八下子！那茶缸每次至少能盛一斤黄豆，这样我实际上领得至少八斤黄豆。单于庭这样办显然是因为相信胡指导员是不会见怪他的。

于是，我每天用大茶缸装大约半斤黄豆，放在监舍炉盖上煮熟了吃，这又大约支持了十多天的时间。很少有人知道这黄豆是从哪里来的，可能还引起了一些人的妒忌。陈方吉和我之间其实从来没有过任何矛盾，一天，不知为何在砖厂站在胡指导员前面说：“报告指导员，张轶东偷政府的黄豆！”胡指导员却喝他说：“你给我回去！”一天早晨，我与同组的另一名组长张学孟，为当天小组劳动分工时有一点分歧。张学孟突然叫道：“你这个组长也违反监规，你天天煮黄豆，黄豆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没有吱声。但是张学孟的这一喊却给他自己带来了一点损失：有些抽烟的犯人在砖厂空地上偷偷种烟，张学孟去年也种了几棵，因此，在他铺头的下箱里也有一些干烟叶。在他对我喊叫之后不几天，不知为何站道就来把他的烟叶没收走了，因为私种烟

是违犯监规的。我其实有点同情他，因为我理解一个抽烟的人弄到一点烟叶是不容易的。我不知道是谁下令没收张学孟的烟叶。

补助给我的这几斤黄豆，不仅有一定的经济意义，而且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看来我像是有点什么特殊身份似的，这样送给我高粱米饭和菜的人就更多了。一天晚上就寝后付邦栋把我叫到站道的服务桌前，李春元和另一名站道老何头也在这里。老何头是一名历史反革命犯。李春元对我说老何头即将刑满释放，但是他没有便服也没有钱买。李春元看见我寄存在监舍天棚里的大皮箱中有两条呢裤子。我是否可以把这两条呢裤子送给老何头，老何头也可以为我买些食品。我同意了，也没有说要什么食品，要多少和何时买等。实际上老何头6月份出监时什么也没有给我买。这事只不过说明“捅毛蛋”在犯人中盛行，带队（付邦栋）、站道（李春元）和我这个组长也不例外，我们只不过受到的限制少一些而已。我还听说过下述的情况：某一犯人刑满出监前，另一在监犯人烦他出监后去他家取一些钱和物，再回监狱给他送来，因为这些犯人回监狱送东西更熟悉方便一些。这个出监犯人满口答应。他出监后的确去了这个在监犯人家，吃了，拿了钱物（说是给那位在监犯人送去），还“睡”了那个在监犯人的媳妇。以后就杳无音信了。

3月末时备土停下来了。第八中队各组被派去干各种迎接生产季节的活儿。我的这一组被派去翻砖厂东北部的一块地，以便在这里再种蔬菜以作为第八中队犯人们今年的补充食品。这可是一件肥活儿，因为在这块地上去年种的是土豆。地一翻起就出来了许多冻干的土豆。我这一组的组员们每天收工回到监舍时，每人的衣袋里都装满了这种干冻土豆。把这种土豆洗净，装入茶缸或饭盆放在炉盖上煮熟了吃，就像是吃黑面馒头似的。总之在夏天到来之前，我不用太担忧肚皮问题了。

在我解决了吃饭问题时，4月4日在辽宁省沈阳监狱，女“反革命犯”张志新被处决了，处决的方式是这样的：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上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咙以防她喊口号，然后枪毙。据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报刊透露，在张志新之前就有过30多例这种先割喉咙然后枪毙的情况。另外还传说，张志新在被处决前还曾被轮奸，轮奸者说这是“废物利用！”张志新是在1969年9月24日被捕的，同一天我被带到绥化县人民保卫部的社会学习班。1970年5月张志新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973年11月16日在一次监内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张志新突然站起来喊道：“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于是辽宁省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的侄儿毛远新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活动，杀了算了。”张志新死后她的儿女不敢领回她的尸体和她留在监狱里的东西，因此始终不知她的尸体何处去了。而那个双手沾满张志新鲜血的毛远新，则在半年后被调到北京担任毛泽东与中共中央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去了。

(2)

到1975年春天时，黑龙江省第三监狱犯人的构成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从1973年起，有的现行反革命犯人被原判单位领回，最近李春元也被原判单位领回哈尔滨了。许多历史反革命犯人刑满释放。于是反革命犯的比例下降了。现在也不说新肇监狱是一个备战监狱了。新送来的犯人主要是刑事犯，刑期也不一定必需10年以上，有的只有5年刑期。那20条监规也废除了，新换的是8条监规与我1971年在绥化县看守所时的那8条监规几乎完全一样。因此我现在是一所普通监狱里的一名普通犯人（即

不是一个危险分子)了。

反革命犯减少使得第八中队不可能再是一个纯粹的反革命犯中队了。现在从集训队分配来了许多刑事犯。当制砖季节来到重新编组时，我被指派为第四组即出窑组的组长，全组共 13 人，其中有几个新分来的刑事犯。另一位组长是肖云龙，前耐火砖组组长。这一组负责出小轮窑的砖。

那么大轮窑的砖谁来出呢？这就不是第八中队或第五大队而是全监的事了：成立了由全监各车间 21 名反改造分子组成的严管队。这个严管队被安排在第八中队睡觉，负责出大轮窑的砖。监舍内南面大板床的下铺被腾出一大段来安置他们。有两名犯人，即第八中队的孙世昌和第二大队的张性悦被指定为严管队长，分别把两端睡。这使我回想起 1972 年我作为一名严管犯人时的情况。不过这严管队现在还有一间供学习和吃饭用的房屋，是在监舍外以东厕北靠大院东墙处。每天早晨起床后，严管犯人们排队前往那间小屋去洗漱和吃早饭，然后跟在第五大队的队列之后去砖厂劳动。下午收工回来，他们又排队回自己的小屋洗脸，吃晚饭和学习，就寝前才排队回第八中队的监舍睡觉。

严管队既然有 21 名犯人之多，所以出大轮窑的砖绰绰有余，于是有时一些小轮窑的砖也安排他们来出了。这样一来，我和肖云龙当组长的这个出窑组的正活就少了，组员们往往被安排去干各种杂务，例如给耐火砖窑出窑或去菜地干活等。于是这一组的人常常处于分散状态，只有吃中饭时才能在第八中队的休息室聚齐。一天中午分完饭后，第四小组的饭桶里却多出了两个窝头，组员们以为这是他们的运气，就分而食之了。不料接着来了一名叫着范洪有的组员，是新从集训队被分来的刑事犯，他吃饭来晚了。范洪有看见他的窝头被吃掉，也没有生气，掉头就走了。我这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误：作为小组长，我应该检查一下

人数，看谁没有来。如果某一组员在这时逃跑了，我这个组长的责任可就不轻了。但是为什么范洪有在得知自己的窝头被吃后并不生气，掉头就走了呢？几天之后真相大白了：这天范洪有被安排到耐火砖组给犯人技术员商玉华当帮工。商玉华午间看见实验室里只有他和范洪有两人，就强迫范洪有和他搞鸡奸。因此范洪有吃饭来晚后，即使看见他的窝头被人吃了也不敢生气，掉过头就走了。虽然这不是一个逃跑事件，我的疏忽却是明显的，受到了带队付邦栋的批评。按理说商玉华和范洪有应该被送往严管队的，何况严管队就设在第八中队内部。不过他们两人谁也没有进严管队，因为范洪有是被动的一方，而商玉华是一名有用处的技术人员。批评他们一下也就拉倒了。

然而几天之后，在4月末，可真正发生了一起逃跑事件，而且是发生于严管队。这天早晨约9点钟时，砖厂传达室旁树枝上挂着的那半截钢轨突然被敲得又响又急促。这不可能是吃午饭，更不会收工。全体犯人被命令在办公室前紧急集合，各组清点人数看是不是少了谁。检查之后队伍奉命站在原地不动。我从一些犯人的窃窃私语中才得知发生了的事情：这一天严管队应从大轮窑出四个窑室的砖。有一名叫刘金声的严管犯人说最后那一个窑室太热了，应该留到明天再出，于是就和严管队长张性悦吵了起来。最后刘金声还得服从队长的命令勉强地去出这个热窑了。不料当刘金声正在热窑室内干活而张性悦站在窑门口监督时，刘金声突然拿起一块砖往张性悦的脑袋砸去，张性悦倒在了窑门旁。刘金声拿着一根大棒跑向砖厂东南角，用这根大棒打下三层铁丝网（包括中间的电网）的一段，就从那里逃了出去。砖厂行政人员得到报警后，通知解放军乘坐大卡车开往东南方向追捕，同时命令所有犯人在砖厂办公室前面集合清点人数。大约站个把小时后，大卡车带着被抓获的刘金声回到砖厂办公室门前。刘金

声的右腿上中了一弹。他被从卡车上直接扔到犯人队前的地上，意思是让我们看看逃跑的下场是什么。

刘金声年约 30 岁，去年从革志监狱转过来，是一个死缓犯。他在革志监狱也是干出砖。我不知道他是犯什么罪判刑的。这事件发生后几名与刘金声接近的严管犯人被送进了小号。据他们的交代，刘金声早在几天前就准备逃跑了。有一名严管犯人还劝刘金声说：“你要跑就跑吧，打张性悦干什么呢？”刘金声回答说：“现在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你不斗他，他就斗你！”看来刘金声还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一个信徒哩！

几天之后刘金声被送回了革志监狱。和他一起被送往革志监狱的还有张兴武，即 1971 年时在前第三大队第七中队因为预谋逃跑而被关入小号的那个曾经和我同组的犯人。现在张兴武才从那里被放回第八中队，几天之后也就和刘金声一起被转到革志监狱去了。在 1975 年以前也发生过几起死缓犯人逃走事件，这些犯人在被抓回后，总是在一次奖惩大会后被处决掉。但是刘金声和张兴武被送往革志监狱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如果刘金声被处决了，这消息是会传入新肇监狱犯人们的耳中的。可能把刘金声送回革志监狱是饶他一命的一种方式。

张性悦挨一砖头之后得了脑震荡，被批准长期休息。这样严管队就需要增补一名队长。一天带队的付邦栋对我说：“政府决定派你到严管队去当队长，和孙世昌一块儿干。”他特别强调说：“你在那里不用干活，主要是监督他们劳动别出问题！”我对此事心中无底，因为严管犯人都是调皮捣蛋的。但是我还得去，于是把自己的被褥移到了木板床南下铺东端原张性悦的铺头上。从第二天起我就和孙世昌一样，和严管犯人们一齐行动。这个三年前第八中队的严管犯人，现在成为全监严管队的队长了。

虽然我不参加劳动，我仍然领得那些从事高温劳动的衣

服、用品和食品。刘金声逃跑事件之后，严管队只有 17 名犯人了（另有三人进了小号）。为了便于监督他们，他们现在全都集中出大轮窑的砖而不管小轮窑了，小轮窑还是由肖云龙当组长的第四组负责出砖。17 个人出大轮窑的砖应该是不成问题的。除去大礼拜和节日后那几天之外，一般每天也就是出三个窑室的砖，即每一窑室是五六个人干活。但是这些严管犯人主要来自各车间，对出窑活儿不熟悉。此外，他们不像别的犯人可以干完活后在砖厂范围内自由行动，而是必需集体去洗澡，然后在一个架棚里集体休息和学习。这样他们也就没有赶早干完活的积极性。可是在空窑道的另一端，装窑的工序正在压过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得伸伸手了。由于自己是一个丁砖快手，我总是帮着卸从窑里拉出的砖车。哪一个分组出现了压车情况我就到哪一个分组去帮助丁砖。可能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严管犯人们对于我多少有点好感。我与另一严管队长孙世昌之间合作得也很好。孙世昌也是第八中队少数几名有文化的犯人之一。去年批林批孔时我们也曾常在一起执行干部交给的任务。据说孙世昌原来是齐齐哈尔市公安局的一名文书，因为“泄密”而被判 15 年刑的。

经过一段时间，尤其通过晚间学习，我也得知了这些严管犯人的情况。他们中间一个反革命犯也没有，即全是刑事犯。他们被严管主要还是由于违犯监规，如打架斗殴等。有的人似乎只是由于在本车间和带队或组长没有处好就被弄过来了。在刘金声事件之后他们已被镇慑住，有时他们之间在生活上或劳动中有些争吵也容易被平息下去。因此我管理他们并不像来当队长之前预想的那么难。不过我对于那几名搞鸡奸的严管犯人总是感到有点恶心。在我的概念中还有那种“万恶淫为首”的传统观念，以为犯男女关系错误就是一切错误中最丑恶的了。我过去阅读航海史时，曾得知在长途航行中在海员之间可能发生鸡奸行为。但是我

还没有遇到过这种人。进监狱之后，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比乱搞男女关系更为丑恶的事。入监第一年，我就看见有搞鸡奸被抓住的犯人，被带往各监舍游斗。1973年我睡在下铺，这天夜里突然被吵醒，原来是站道的单于庭（即现在在砖厂赶毛驴车并付给过我黄豆的那个就业工人）不知为何正在叫睡在他上铺的两个犯人来。第二天晚间学习时，带队的付邦栋宣布批斗昨天晚上搞鸡奸的这两人。1974年，我的组有个犯人因病住犯人医院，才几天未经治疗好就给送回来了。原来，他在住院时和另一犯人搞鸡奸。总之监狱也扩大了我的眼界，知道世界上还有更多污七八糟的东西。我虽然是严管队长，却不愿意和这几个搞鸡奸的严管犯人说话。这种人在犯人中乃至严管犯人中也是抬不起头的。我也估计这可能是一种性变态现象。我在被释放出监以后，得知在西方国家还有一种同性恋活动，不过我搞不清楚同性恋与鸡奸行为之间有什么不同。

我当上严管队长之后就挨不着累了，干不干活可以根据情况而定。吃饱不成问题，夏天土豆窝瓜都上来了。只要不出问题，我就算是能享一点清福了。

(3)

12月初时，大小轮窑把今年生产出的砖坯都烧光了。严管队解散了，严管犯人们各自回到原来的车间。我和孙世昌回第八中队。我回到第四组和肖云龙一起当组长，孙世昌则被派往第七组即杂务组当组长。整个中队又开始了为明年的制砖备土，不过还没有实行“工效排队，”所以犯人们干活也比较轻松。

12月8日晚间学习时，付邦栋，我，孙世昌和另外两名犯人被叫到监舍西面的办公室，谢常青管教员向我们宣布说，监狱领

导决定再组织一次外出参观，你们被选出代表本中队。参观地点是哈尔滨和阿城继电器厂，大约需要 3-4 天。你们应带上牙具、饭具和纸笔等。

于是我在 1973 年以后又再次得到了这种机会，不同在于现在是冬天夜长白天短，都快早上 10 点钟了才起程。车队还是由六辆车组成：第一辆是贾典狱长的小汽车，第二辆是行政人员和几名解放军战士坐的大客车，第三、四和五辆是装犯人的带篷大卡车，最后一辆还是行政人员和几名解放军战士乘坐的大客车。这次坐在车上可不舒服，犯人们都感到脚冻。而且卡车上的篷布又使他们不能欣赏道路两旁的景色。正午时车队停留在肇州县的丰乐镇，在一个小饭店吃的午饭。每名犯人给了四个馒头（8 两）和一碗白菜土豆汤，行政人员和解放军战士可以点菜吃饭，饭后继续行程。当下午 4 点半进入哈尔滨市时天已黑了。车队停在道里区靠近松花江南岸过去的哈尔滨监狱大院内。文革前我没少从这监狱院墙外走过并仰望过院墙上的铁丝网，因为在监狱旁正好有家外文书店。不想现在自己进入这监狱大院做客来了。

来参观的犯人们被安排住进了哈尔滨监狱的几个小监舍。我看见有一位以前砖厂的于管教员在忙于安排这些来参观的犯人住宿。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见这位于管教员了。我设想可能是现在哈尔滨监狱重建，有的行政人员因此有幸调回哈尔滨，于管教员也是其中之一吧！既然住的还是监房，吃的也就还是监狱饭了：高粱米或包米渣子饭，土豆白菜汤。不同的是不用分饭，饭菜都在地上的桶里，需要多少自己盛多少就是了。因此虽然吃的东西质量没有提高，数量上还是管饱了的。

第二天早晨犯人们前往农业机械厂参观，回哈尔滨吃完午饭下午又去化学纤维厂参观。在两个工厂里犯人们都是走马观花地穿过一个一个的车间，看见机器在转，听了工厂党委书记关于该

厂革命和前景的介绍。在两个工厂的院墙上，贴着“翻案不得人心！”的大字块。工人们干活很沉默，工厂里的气氛很沉闷。

原定计划第三天去参观阿城继电器厂，但不知何故突然又说不能去了，改为参观哈尔滨第一百货商店。这实际上不过是逛商店而已！其实文革前我来哈尔滨时，几乎每次都来过这哈尔滨第一百货商店。这一次不是犯人参观商店，而是顾客们“参观”犯人了。因为当犯人们列成单行在一个一个的柜台前走过时，顾客们都在外线围观我们。有趣的是有一个来参观的犯人原来就是这商店的一名工作人员，因为贪污被判处有期徒刑 15 年。他在走过一个柜台前时，柜台后站着的正好是他过去的同事。他感到很尴尬，但是他们互相之间还是问了好。

在哈尔滨监狱吃完午饭后车队就登上回程了。越走天越黑，我干脆在车上打起了盹。当回到监狱时，我所乘的那一辆卡车正好停在第八中队的监舍门外。我进入监舍时，全监舍的犯人们正在吃晚饭。和 1973 年的那一次参观一样，所有去参观的犯人都必需谈他们这次外出参观的“收获，”或者为《劳改报》写点什么。我心里认为这次参观的收获还不如 1973 年的那一次，至少在“吃”的方面是这样的。但是为了交差，我还是写了两首诗歌颂我去参观过的那两家工厂。第一首诗是关于农业机械厂的：

机声隆隆吊车悬，工人师傅胜鲁班，
请看七六年春天，铁牛遍布大寨田！”

第二首诗是关于化学纤维厂的：

都说江南花争妍，北国也有百花园，
羊毛人纤成锦绣，织得春色满人间！

参观回来，接着又是冬训前的重新编组。这回宣布的是：我哪一组也不去，而是留在监舍当站道。现在胡树牛指导员被派到浙江省出差，为的是联系一批浙江籍的刑满释放犯人的回家就业问题。这个冬天第八中队的指导员姓周。当周指导员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此事后，我说：“我不太熟悉站道的事，我是否还是干活去吧？”

“这是政府对你的照顾！”周指导员直截了当地说。于是我就当上了站道。站道总共三人，主要的马新掌管犯人的日常生活，如饭票，在小卖店为犯人买东西等。我是值上半夜（晚 8 时—晨 2 时）的班，而第三名站道是值下半夜（晨 2 时至众犯人起床），兼备大家的洗脸水。三个站道都得负责把炉子烧好。这活儿和在砖厂备土比较起来真是轻得不可比拟。而且吃饱不成问题，站道们都和厨房混得很熟，打回来的饭总是比规定的三个的份量多得多。

周指导员是监狱近几年来录用的那一批上海知青之一，这以前他们可能已经在农村里呆过几年了。不过指导员对犯人比较和善而管教员比较刻薄的这一条规律在上海知青中也一样反映出来。周指导员可能是因为兜中有“党票”，对第八中队的犯人们比较和善，和胡树牛指导员一样。但有另一位沈管教员，虽然也是上海知青，可能是因为没有“党票”，对待犯人们却非常刻薄。他经常在第二道大门值班，负责检查各大队进出犯人队列和人数，每天晚上到各监舍去检查晚点名。他就利用这一点权力来折磨犯人。一次在大礼拜日前星期六下午，他说第六大队进院时队伍不齐，就命令该队在大门里来回走步，不让他们回监舍休息。直到就寝前放风时，我看见第六大队的犯人还在黑暗中在院里练队列。几天之后，第八中队的犯人们也领教到了这位沈管教

员的厉害。这天晚上 8 点半，钟沈管教员来到第八中队监舍检查人数。我看见他来了就向众犯人们大喊一声：“坐好，点名了！”点名总是从南上铺从西向东，各犯人坐在自己的铺头上报：“一、二、三……”然后从北上铺从东向西，然后再从南下铺由西向东，最后再从北下铺由东向西。但是有一名叫刘国福的犯人舌头有点毛病，没有吐清楚“92”这个数字，导致重新报数。但是最后人数还是对的。然而沈管教员却挑毛病说：“什么玩艺儿！”也不命令犯人躺下睡觉，从外面锁上门走了。没有他的命令犯人们不敢躺下睡觉，只好在铺头上坐着，以为他过一会儿就会来再命令睡觉。但是一直坐到 10 点钟，沈管教员也没有来。我考虑到大家明天还有沉重的备土劳动，只好冒一点险了。我对大家说：“睡吧！如果沈管教员来了我再作解释。”第二天我向周指导员汇报了这件事。周指导员生气地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们睡你们的，不要管他！”这使我认识到周指导员和沈管教员之间的不同。这也可能是一般指导员和管教员之间的不同。

我从绥化带来的那一口大箱子放在监舍的天棚里。箱子里多数的衣物在监狱里是用不上的。本中队犯人们的箱包和不用的物品都寄存在这天棚里，只有在被释放时才能随身拿走。不过当站道的有权检查这些东西。过去李春元就是因此知道我的箱子里有两条呢裤子而建议我以之与老何头换食品的。在当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现在李春元和老何头都走了，而我自己则成了站道。一天白天我想起了这件事就到天棚里去看看自己的箱子。可当我打开箱子一看时，发现那两条呢裤子都不翼而飞了。显然这是李春元用我的东西向老何头作人情了。我倒不再乎这点，因为我知道老何头是个老好人。不过这使我又想起今年春天的一件事：为了整齐内务，管教员命令每一犯人买一块枕巾盖在他褶好的被上。

这天犯人们从砖厂收工回监舍，每人都领得为他买的一块枕巾。我听到一名犯人和一名站道争吵，说是他领到的枕巾上有一些黑油迹。这争吵后来平静下去了。然而第二天收工回来时，我发现覆盖在我被子上的枕巾不是昨天发给我的那一块，而是上面有一些黑油迹的。这显然是当我在砖厂劳动时，有人偷偷地把那块枕巾换给我了。谁能干这事呢？虽然白天监舍里有几个病号，他们只能老实呆在自己的铺头上，不能随便爬到别人的铺头上去。三名站道中有两名晚上值班白天睡觉，只有李春元是主管众犯人生活事务的，有权检查每一个犯人的行李和物品的。在 1973 年有一个叫李忠海的犯人和李春元争吵，原因是李春元在检查监舍时把李忠海家人送来的烧饼拿出来扔了，说是坏了不能吃。你可以告诉李忠海自己扔，何必越俎代庖呢？李忠海找李春元讲理，李春元却用绳索把李忠海绑了起来，说是李忠海吵监闹狱。但这一次为什么偏偏把带有黑油迹的枕巾偷偷换给我呢？我几年来给人的印象是大大咧咧，不计较生活小事，可能容易唬弄甚至欺负吧！我当时没有说什么。现在什么都加在一起，我对这个已经走了的李春元可真是有一点印象了。

当上站道之后，我就有更多的时间读书读报了。我能常常去大课堂借书看。上半夜众犯人就寝后夜深人静，我这个值班的看书更方便了。我看见报上最近不提周恩来了，几个月前报上却多次提到他在医院接待外宾，显然是病了。现在报上又常常出现讨论《水浒传》的文章。我曾读过《水浒传》近 20 遍，对书中的人物都很熟悉。在念北京大学时，我还选修过中文系开设的，由著名学者郑振铎主讲的《水浒传》这一专门课程，并写过专题报告。现在说宋江是投降派，这倒也是对的，我对书中宋江老盼招安这一点也很不欣赏。但对于宋江架空晁盖这一点我过去可真是没有注意到，更没有和当前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最后报纸上又

出了“不肯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名词。这和文革初期“死不悔改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比较起来，还有点程度上的差别。但是这种走资派又会是谁呢？这应该是一些老干部，被打倒过，又被解放而重新工作，现在又出问题了。我想起最近报上又不提邓小平了。是否指他呢？

在国际方面，我注意到毛泽东最近不断接见外宾：爱德华·希思，亨利·基辛格、杰拉德·福特等。报纸上还批评西方国家对于苏联的绥靖立场。这使我想起了中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作风：那时中美关系很紧张，而苏联对美国则有自己的策略，于是中国共产党就指责赫鲁晓夫对美国有幻想，接着就是“修正主义”了，连日本共产党也成了“日修”，朝鲜劳动党也变成了“朝修。”现在毛泽东特别仇视苏联，他可以使整个中国的外交政策根据他的意愿行事。现在他却要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也和他一样激烈地对付苏联，不然就要给他们扣上一顶“绥靖主义”的帽子。看来毛泽东的蛮横是一贯的，不过矛头掉过 180 度了。

上面有指示说要释放一切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级以上的干部。在黑龙江省第三监狱这样的犯人共有 9 名，第八中队有一名，是邓振声。1971 年我刚从集训队分到前第三大队第七中队时，邓振声是这个组的记录员。邓振声在除夕前穿上便服走出了监狱。他被释放在众犯人中间也营造了一种松宽的气氛。

第二十一章 1976 年 一个时代在一瞬间就结束了

(1)

冬去春来，我在第八中队的监舍里呆了一冬，没挨饿受冻。

白天犯人们都出工了，监舍里很安静。有时有几个病号，他们只被允许呆在自己的铺头上，不许到处乱跑。如果他们要去厕所，那就得有一个站道陪着。3月8日下午大约3点钟时，有两个病号要上厕所，我就跟着他们沿着监舍南墙外向东走向监狱大院东墙里侧的厕所。有一名犯人完事后和我一起站在这趟监房东半截（即第七中队监舍）前等候另一名病号完事。突然间这名犯人喊道：“啊，你看！”我抬头一看，只见天空中许多闪光的小点正朝西南方向飞去，但是没有声音。今天天空多云，所以我能看清这一切。过去我在节日期间常常看见放焰火。但是在新肇这荒凉的地方，既非节日也非晚上，谁能放焰火呢？再说也没有声音。于是根据自己仅有的一点天文学知识，我设想或许这是陨石雨，我知道在1908年曾经有一块大陨石降落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森林中。这是很有趣而罕见的现象，我能看见它也是一种幸运。但是陨石落下来也可能伤及人或物，这就要看它落在哪里了。我是学历史的，读过许多历史小说。在这些历史小说中往往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变动或军事失利之前总是要显示一些怪异的自然现象。即便是现在，报纸在报导某一大人物去世时也说：“巨星陨落”。不久前周恩来死了，现在又来了陨石雨，这倒也真是巧合。不过我这时还意识不到这陨石雨还有什么别的含义。

关于周恩来去世，犯人们知道得并不比外面社会上的人晚，

是通过监狱大院内的大喇叭得知的。犯人们对此并不关心。只是报上登载的那些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材料使他们感到气氛又不那么松宽了，对他们不很有利了。4月8日的晚间学习时，全中队犯人奉命听《人民日报》所刊载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由我，付邦栋和孙世昌三人轮流宣读。第二天晚间学习时，包括我在内的10名有文化的犯人被叫到监舍西面的办公室。谢常青管教员命令我们席地坐下开一个座谈会，问我们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以及中共中央的两项决定是怎么想的。我说：“这当然不是一件好事。但据我所知，北京有一千多万人口，有几万人闹一点事没有什么可怕的！”我的确已经完全不懂得这一事件的意义，我脱离外界的时间已经很长了。

(2)

第八中队迎接制砖季节的重新编组是在4月初进行的。表面上如何编组由政府干部决定，实际上一般分组名单是由犯人带队制定的，干部只不过作一些个别的改动而已。尤其是在第八中队，付邦栋已经是多年的带队了，干部信任他。因此一个犯人一年之内的利或弊，即他被编入某一愿意或不愿意去的小组的问题，完全取决于付邦栋。我已经和付邦栋共事四年，和他关系很好。在闲谈时我就向付邦栋表示说愿意回出窑组去。

为什么我不想留在监舍当站道，而是要回出窑组去挨累呢？当然在出窑组有一些明显的利益：劳动时间短、洗澡、作业服和保健食品等，但是这些并不是我考虑的主要因素。现在我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即我将来出监后自己的生活了。

据说在社会上一个出砖工每个月至少能挣150元。这比过去我在绥化一中当教师的月工资（68.5元另加0.78元的粮煤补

助)的两倍还多。现在到处都在搞基建,每个县都有一两座砖厂,出砖工当然好找工作了。此外,在社会上出砖工能自由活动。可以自己找适合的时间干活。他们一般是在早晨三点左右开始出砖,太阳出来时活已干完了。如果我保持熟练的出砖能力(我已经是丁砖快手了),我的生活方式就会是很理想的了:我每天早晨 3-9 点干活,然后一天的时间都是我自己的了。我每个月能挣至少 150 元。不过砖窑每年只点火半年(从 4 月到 10 月),往往冬天被用于制糖。我只当那半年的出砖工就够了,不用去管那制糖的事。那在干半年活以后我至少能挣到 900 元。这 900 元将能维持我的全年生活甚至有余的(每月衣食住有 50 元就够了)那末整个冬天和全年的白天时间就都是我的了。我就可以读书和写东西了。

我的刑期应该是到 1990 年 2 月 24 日为止,还有 14 年哩!不过我总以为随着形势的改变,我是会提前出监的。我现在的确朦胧地感到了形势的一些变化,不过说不清楚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即便到 1990 年 59 年岁,也得为自己挣饭吃。我对于那时绥化一中要不要我回去已经不感兴趣,保持出窑熟练倒是我的第一选择。

这并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心理状态。许多犯人,尤其是所谓的现反,都在考虑自己未来的生活。付邦栋应该是 1984 年出监,即还有 8 年,却在对政府干部使劲,要求将他调到第九中队(即基建维修中队)去干木工活。据说即将出监的干木工活的犯人们往往有这么一手:他们常被派到院外干维修和其它活儿。有的犯人每次干完活儿总是“忘了”或“丢了”一件工具(刨子、斧子或锯等),其实是藏起或寄存到某处。他一出监,把这一套工具收集拢来,就成了一个游方的木匠,走街串巷找活儿挣钱。因此付邦栋以为自己在第九中队干木匠活儿比在第八中队当带队还有

希望。在 1976 年（毛泽东死后）他的确达到此目的，被调往第九中队去了。

于是在第八中队重新编组时，我又被指定为第三组出窑组的组长。这是一个大组，共有 17 名犯人，负责统一出大小轮窑的砖。这样编组是为了便于在大小轮窑之间统一调配劳力。另一名组长是我的老搭档肖云龙。组员们多数已经是出窑老手了。

劳动进行得很平稳。现在已经不像过去几年，晚间学习时批斗反改造分子的事也不那么频繁了。现在的晚间学习主要是读报纸上有关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材料。包括我在内的几名有文化的犯人轮流朗读，其他人听。也很少组织讨论。看来现在不仅是社会上的人，连犯人们，还有监狱的政府干部们，对于这些玩艺儿也感到厌倦了。一次我从大课堂借到一本今年 6 月号的《诗刊》杂志。我看见这杂志上刊登了一首郭沫若为“五一六通知”发布十周年而写的“水调歌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风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功。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

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我读这诗时感到很别扭。这能算是“水调歌头”吗？这不过是口号的堆砌，最多是顺口溜而已。著名学者，堂堂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写出这样的玩艺儿不感觉害臊吗？

我从报纸上读到一篇“奇文”。这篇文章叙述的是世界资产

阶级的历史。作者将这一历史分为三个阶段：1）自由资产阶级；2）垄断资产阶级；3）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啊，这真是马列主义的一大发展了：马克思写出《资本论》，分析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本质。列宁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现在在这篇“奇文”里，这位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又把“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推到了历史舞台上。而根据这位“理论家”的论述，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尚未处于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阶段，而是有一个“更高的阶段”，即“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那一阶段在等待着它哩！

晚间学习还有一个内容就是学唱颂扬文化大革命的歌曲。主要的一道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歌中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野火遍地烧，万里江山传捷报等。但是这道歌有一半是充满“就是好！就是好！”的叫嚷。这使我想起在 1962 年我刚到绥化县时，看见绥化一中旁工农大队办公室外的墙上贴的大字块：“人民公社就是好！”。那时历史已经宣告了大跃进的失败。因此“人民公社就是好！”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都不过是显示当局的蛮横不讲理而已。然后在 5 月末那一年一度的犯人运动会中，犯人们正在运动场外围观看比赛时，也被一再命令唱这些歌曲。运动会第二天上午突然一度天降大雨，不得不暂停一会儿。但是第五大队的大队长宋振德却不允许本大队的犯人们回监舍躲雨，而是坐在原地大喊大唱“文化革命就是好！就是好！”他这样作的目的是要为本大队争得几分风格和纪律评分，从而也为本大队在这次运动会上的总分增加几分。

因为连年干高温活而领到作业服，我就有多余的服装了。不过我仍然注意节约，因为多余的衣服可以用来交换食物和送给那些送高粱米饭给我的人。通常裤子比上衣坏得快。裤子往往是坏在膝部，而且常常只是一只膝部坏了，另一条腿还是好好的。只

因为一个膝部坏了就扔掉整条裤子很可惜，于是我想出了一个节约的办法：在有两条裤子各坏一条膝时，我把两条“好腿”合并成一条不破的裤子穿上。但这样一条“新裤子”两条腿的颜色深度往往不一样。这时经常有一些妇女（监狱工作人员的家属）跟随大卡车到砖厂来装砖，为的是挣一点钱。她们看见我穿着一条两腿颜色深度不同的裤子在窑外丁砖，感觉很好笑。那个在 1975 年揭发我“捅毛蛋”的汪羽又攻击我“丑化劳改”，不过并没有引起付邦栋或干部对我的批评。

我省下来的衣服也不是全部用来交换食物，有时也用于平息犯人们之间的纷争。不干高温活的犯人每年只发一套单衣（从 4 月到 10 月），没有换洗的。有时政府给一点补助。有一次第八中队领得五个被套，但申请补助的是六个人。于是包括我在内的几名组长鉴别摊在大柜上的这六个旧被套，看谁的被套还能继续使用就暂时不给他新的了。当然谁领不到新被套都会不高兴。我不愿意作这个恶人，就推说我的眼睛近视，无法鉴定这些旧被套。同时第八中队还领得 10 套补助的单衣，但是申请补助的却有 11 个人。我就对申请者之一张宝德，即在 1974 年冬天捡狗肉骨头啃的那名犯人说：“你不用申请了，我给你一套”，就把自己节约下的一套单衣给了张宝德。分配补助单衣的问题就顺利地解决了。

今年夏天西红柿大丰收。有几天第八中队每名犯人几乎每天都可以分到一洗脸盆本中队种的西红柿。但是同时第六大队种的西红柿也来了。第六大队种的柿子是要钱的，每人五斤，每斤二分钱，即每人得扣一角钱当月的零花钱。这是监内“计划经济”的一项，不买不行。于是在犯人中有了争吵，有的犯人坚持不买第六大队种的西红柿，但是又退不回去。西红柿不像土豆，基本上是水，不能解饿，还没有办法贮存。我用自己包下来的办法在

第三组内部解决了这一问题。我把本组 17 个人的 85 斤西红柿都算到了自己的帐上，扣去 1.7 元，约为自己当月零花钱的三分之二。然后第三组把这些西红柿用双轮车运到砖厂第八中队休息室，堆到一个屋角上，谁吃谁拿，坏了就扔。我就是用这一类“和稀泥”的办法来平息犯人之间的纷争。

劳保食品发放往往不按时，尤其是猪肉（每人每月二斤）。7 月中旬一天晚饭后突然一次发下了六、七两个月的“劳保猪肉”，即一人 4 斤。这猪肉是按 4 斤一份称好（这时还没有克扣现象），用麻绳系上放入蒸笼蒸熟的。我领得自己的一份猪肉后再称一遍，只有 2.4 斤了，原因是蒸时油都流到锅里去了。我把肉上的骨头和皮扔掉，就一气都吃完了，也不觉得胀。这还是刚刚喝了四两苞米楂子粥之后哩！我在出狱后还常常吹嘘说自己一次吃过四斤猪肉！

我在一次吃 4 斤猪肉时，却不知道这新肇监狱附近的农民们生活得还不如我们。有一次出完窑洗完澡之后，我和另外几名犯人派到砖厂外，在铁丝网外的地上采摘本中队种的柿子以便分给众犯人。突然有一个当地的老农民来到我们跟前，向我们要几个柿子，还说他们没有菜吃。我给了他一些柿子，但却感到不理解：农民就是种地的，怎么会没有菜吃呢？多年后我遇见 1976 年出监留厂当工人的徐钲，谈及此事，徐钲告诉我说当时农民的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得多。例如新肇监狱附近有一个兴禾第八生产队，农妇们找“二劳改”（即刑满释放留厂就业者）卖淫，每次仅要一元钱！

7 月 28 日早晨约 3 点钟时，犯人们还在睡觉，突然监房震动了一下。有个犯人嘟囔说：“棚顶上的灰都掉下来了！”我不管这些接着睡，因为天亮出工后活很累，得抓紧休息。但接着我听见一些老年的历反犯人在和值班的站道争吵。这些老犯人都穿好

了衣服，坚持说发生了地震，他们必需出屋去。站道的则说他没
有权力也没有办法让他们出去，因为监舍门是由二大门值班管教
员从外面反锁上的。这争吵一直持续到起床时间为止。不料两天
之后，广播和报纸传来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七点五级地震的消
息。我这时还不知道，这时在府右街后胡同 13 号，即与中南海
对街相望，与毛泽东所住的游泳池之间直线距离仅为 200 米之
处，我那 71 岁的老母亲也正经历着这一危情。母亲在屋外的防
震棚里住了几天，后来我在兰州工作的小兄弟轴材从兰州赶来北
京，把她接到兰州去了。

唐山地震造成了一种草木皆兵的气氛。8 月中旬一天晚上约
11 点时，突然所有的犯人都被叫醒，奉命穿上衣服、鞋、帽，坐
在自己的铺头上不许躺下。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在二大门值班的沈
管教员来了。他问大家说：“你们知道为什么要你们这样吗？因
为可能发生地震！”他说完走了，再也没有来。犯人们又在铺上
坐了约两个小时，后来就一个接着一个地躺下了，但是并没有人
敢脱下衣服和鞋帽。结果那一夜和以后什么事情没有发生。

一些犯人在窃窃私语，为什么今年净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
情：陨石雨，周恩来和朱德去世，唐山地震？我心里也有这一问
号，但是我还没有意识到，大约不出一个月之内，1976 年最重大
的事件就要发生了！

(3)

8 月 31 日，第八中队进行了局部改组，成立了一个临时的基
建小组，共 12 人，以我为组长。这个临时小组将和第九中队在
一起干活，任务是抢盖家属房。

作为一个关押 2000 多名犯人的监狱，至少得有 100 多名政
府干部。当 1969 年这所监狱刚从哈尔滨搬来新肇时，政府干部

多半是单身过来的。那时监狱紧迫的基建任务很多：监房、车间、大墙、办公楼和医院等。那时盖家属房的问题只能分批解决，一年盖若干户。这几年监狱又吸收了一些新人，包括上海知青。在这些中间，例如那位在二大门值班的沈管教员，据说最近也结婚了。这么一来，全监狱就得有好几十户人家要求住房。如果继续分批解决的话，那么又得拖上好几年。

唐山地震之后的重建工程需要大量用砖。新肇虽然离唐山较远，但是在齐齐哈尔——通辽这条铁路线上，不像京哈线那么繁忙。把砖从这里装车运往唐山是很方便的。但是这么一来，盖家属房的砖就难保证了，这事又得拖下去。于是根据需房户的要求，监狱决定在今年冬天到来之前一气全部建好家属房。

但是 8 月份已经结束了。从 10 月初起随时可能上冻。实际上就是要求在一个月之内，把几十户家属房都盖出来。早在 1973 年冬天，原来的基建大队就缩编成了第五大队下属的第九中队，即基建和维修中队。在正常情况下，单独第九中队是能完成全监的基建和维修任务的。现在出现了大量而紧迫的基建活儿，单靠第九中队就不行了。于是就从第八中队抽出 12 名犯人编成一组前来支援。这 12 个人应该是可靠的，可靠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不会逃跑，而且干这活儿会接触到包括干部家属的外界人，说不定会出别的问题。例如在 1974 年，就发生过一件犯人医生外出治病猥亵干部女性家属的事。因此，我等 12 名犯人就算是信得过的了。

于是从 9 月 1 日开始，以我为首的这 12 名犯人就随着第九中队从西大门出，来到计划中的家属房区干活。这 12 个人分为两个分组，每分组 6 人，负责盖一处住房。每分组的 6 个人中，两个人是瓦工，一个人负责泥和灰，余下的三人都是力工，负责给瓦工供应砖瓦，泥和灰浆等。我不会砌砖，也只能当力工。这

些家属房全是平房，每户约 50 平方米，由两间带火炕的居室，厨房和过道组成。屋前有一个 10×30 米大的小院落，用矮矮的砖墙围上。干这活较之在砖厂出砖轻松多了。但是我内心却不愿意到这里来，而宁愿留在砖厂出砖。因为这里的劳动时间太长，一般要到下午 7 点才收工。午饭是厨房的人送到这里来。午休时间不一定能有一个小时，往往是不到点就被催促去干活。另一个不同是，在建筑工地上有个大喇叭不时播送新闻和革命歌曲。

今年的农历是闰八月。阳历 9 月 8 日是前一年农历 8 月 15 日，即中秋节。这天晚饭后每名犯人领得了四块月饼（一斤），而且不扣零花钱，是由食堂从犯人的伙食尾子中支付的。我领到四块月饼之后就一气吃光了。第二天天气很好，干活也很顺利。下午 3 点钟是给犯人们 15 分钟歇气和吸烟的时间，我就躺在一台双轮车的车棚上享受秋日的阳光。这时听见那个大喇叭说：“各位听众，本台今天下午 4 点钟有重要广播，请注意收听”。我对此并没有在意，因为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重要广播”还少了吗？再说，不管是什么“重要广播”，和我这么一个犯人有什么关系呢？然而 4 点钟刚过不久就通知收工了。我感到奇怪：“为什么呢？这么早哩！天气也很好嘛！”在等待站队收工时，我听见那大喇叭老是重复：“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我还是没有加以注意。不过这一次的声音不是高昂的，而是低沉，缓慢而平和的。突然间那个神经有点不正常的富作田来到我跟前笑嘻嘻地说：“毛主席死了！”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对富作田说：“不要瞎说！”这时收工的队伍已排好，犯人们上路回监舍。那大喇叭还在不停地“毛泽东主席……”，不过声音愈来愈远了。众犯人还有押送他们的政府干部们走路时都沉默无语。刹那之间我突然明白过来了：“啊，想不到一个历史时代说结束就结束了！”

尾 声

1989年10月末，我因搞对苏联的边贸而外出，当我回到任教的黑龙省绥化师专家中时，我的妻子，同校数学系副教授郭静珍给我一封我不在家时收到的信。这封信是从苏联海参崴寄来的，寄信人是我在列宁格勒大学学习时期的一位苏联同学埃里克·弗拉基米诺维奇·萨夫孔诺夫。他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沙爱计，他现在在海参崴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部工作，是一位著名的苏联远东考古学家。信上说：

亲爱的张铁东：

请原谅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你的前妻克拉芙迪娅·巴夫诺夫娜已经不在人世了……。

去年我写信给在列宁格勒冬宫博物馆工作的一个熟人，历史学副博士尼娜·弗拉基米诺夫娜·伊沃什金娜，请她用一切办法寻找你的前妻。尼娜·弗拉基米诺夫娜一年来没少使劲。昨天我收到了她的来信。她写道：你离婚几年后，克拉芙迪娅再婚改姓德鲁日宁。后来她参与盖房得一套间，与德鲁日宁离了婚但还保持这个姓氏。1985年她因为要消除一个胎痣而在背上动了一个手术，手术后第三天感到身体不适，透视显示出肺部有黑点。但进一步的治疗并没有证实这一诊断。同年夏天克拉芙迪娅到南方去休养。秋天当她过五十周岁生日时，被证实是得了癌症。1985年10月对她进行了第二次手术，12月出院。1986年1月20日克拉芙迪娅·巴

夫诺夫娜去世，死时神志清醒。她葬于瓦尔节米亚基村的墓地。……

1989年9月25日

毛泽东死后，我在新肇监狱还呆了两年多，夏天当出窑组长，冬天当站道，生活过得比较平静。我是在1979年被平反的。当年4月24日我从新肇监狱被放出。最初我被绥化（现在已经是市了）第一中学接回作英语教师。1981年我被调往新建立的绥化师专外语系当教员，后提升为讲师和副教授，兼教英语和俄语。在这里我遇着了现在的妻子，数学系教师（后提升为讲师和副教授）郭静珍，成了家，有一女一子。1985年我收到国家教委发的一份文件，上面承认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1958年把我从列宁格勒大学遣送回国一事是作得不对的。因此我在这件事情上也得到平反了。我的科研范围是将英美文学和俄国文学作对比研究，为此曾出席过一些国内外的学术会议。1991年我年满60岁时退休了。看来我的一切苦难都已成为过去，但是在我心里始终牵挂着一个问题：克拉娃现在在哪里？她现在怎么样了？

20世纪80和90年代之交时，在黑龙江省和苏联远东地区之间兴起了一股边境贸易的热潮，省内新的边境贸易公司如雨后春笋。有一个文革前我在绥化一中教学时的学生王连祥，还有我在新肇监狱时的狱友付邦栋和徐钺都办起了公司。懂俄语的人是极受欢迎的，于是在1988-1992年间，我就常常参与这类公司的贸易活动，多次前往苏联（后去俄罗斯）。在1988年第一次去海参崴时，我遇到了老同学沙爱计，就留下有关材料请他代为打听克拉娃的下落。一年之后，这个不幸的结果终于出来了。

从理智上我懂得在巨大的历史运动中，一个人的命运是微不足道的。我可以把自己二十多年来受过的不公正待遇和苦难放在

一边。可是虽然暴君死得比克拉娃早十年，我毕竟无法忘怀究竟是谁使我此生未能再见到克拉娃。

1986-1987 年间，我在南京大学——美国霍浦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作访问学者时，曾接触到一些有关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材料。当时我估计苏联可能在 21 世纪初瓦解。1988-1992 年间，我的足迹曾遍及俄罗斯远东、西伯利亚、莫斯科和乌克兰，但可惜始终没有机会去列宁格勒（又重新叫圣彼得堡了）到瓦尔节米亚基村的墓地去看看克拉娃的墓。我在离开苏联 30 年后故地重游时对它的印象是经济停滞，宾馆里的食品供应情况似乎还不如 20 世纪 50 年代我在苏联作学生时那样。社会秩序也不好，一次在火车上，我有两个行李包竟然被一个由青年人组成的犯罪团伙公开抢走了。1991 年除夕我在海参崴沙爱计的家里与他一起共迎新年，这时宣布了苏联解体。因此苏联的瓦解比我预料的还要早十年！我看见苏联老百姓对苏联解体的反应是不冷不热，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似的。我在俄罗斯漫游中，不断听到人们诉说生活的困苦，但是没有遇到一个人说应该回到斯大林或勃列日涅夫的时代去。也很少有人追忆苏维埃帝国的辉煌。我作为一个学历史的人，也有自己的看法：从巴比伦帝国算起，世界历史上多少强大的军事帝国瓦解了？13 世纪的蒙古帝国可算是世界历史上最巨大的军事帝国了。但是到今天蒙古文化在世界文明中根本排不上号。超级大国苏联是不存在了，但俄罗斯有普希金和柴可夫斯基，难道这还不够吗？

我和克拉娃的故事结束了，但是我和府右街的故事还有下文，要在 21 世纪初才结束。

我在 1979 年回到绥化一中之后两个月，就和在北京的家庭恢复了联系。10 月末，我终于有机会回北京去看看。全家大约有十个人到车站接我，雇了一辆中巴回家。使我有点巧合感的是：

现在张家的门牌号码已经不是府右街后胡同 13 号,而是府右街西巷 8 号了。从“13”这个不吉利数字变为“8”(发!)这个吉利的数字,这是不是意味着老张家将要时来运转了?

张家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是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除去三弟化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作以外,大哥、妹妹辉楠和毛弟轴材都在北京工作,各有自己的家。他们分别在军事、外交、文艺和科技部门工作。我的叔叔张计舒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一家兽医药厂的厂长,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走资派兼国民党残渣余孽,现在也被平反并恢复了厂长职务。我还有一位堂兄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工作。我的侄儿侄女们也都有出息。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北京,总有一些人家和亲属该去探望。

我出监后最大的欢乐是还能看到自己的母亲。在监狱里我是不敢想到这一点的。妈妈在 1979 年是 74 岁。她左腿不便,视力很差,但总的健康情况是良好的。母亲是在 2001 年 3 月 15 日 96 岁时去世的。这时我自己也 70 岁了,我出监后还享受过 22 年有母亲的生活。很少有人能享受到这么多天伦之乐的。我设想或许这是上帝因为我没有见到克拉娃而给予我的补偿吧!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我平均每年去两次北京,而且通常是在 4 月(春天)和 9 月(秋天),是一年中北京天气最好的时候。并不是每一次我的母亲都在府右街西巷 8 号的房子里和我住在一起,因为她有时住到某一兄弟或妹妹家里,那里的条件比较好些。我住在府右街时,每天早上都带着一本英文书到北海公园去大声朗读,然后几乎整个白天都待在公园旁边北京图书馆里。我和同一杂院以及胡同里的邻居们也处得很好。我常常帮助邻居的孩子学习英语。西巷 9 号一位老太太比我的母亲还年长两岁,常常坐在胡同口的低栏上晒太阳。我对待她就像对待自己的母亲一样亲切,每见到她时总要寒暄几句。这种乡里乡亲的感

情也使我感到了人间的温暖。但是府右街给予我最主要的还不是享受生活。我亲眼见到的在府右街及其一带发生的事，使我获得了很大的教益，促使我更深刻地了解历史中的一些事物。

在毛泽东死后和四人帮垮台后的两年半中，我在新肇监狱里曾反复考虑 20 多年来中国人民包括自己遭受了那么多灾难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时我的认识是停留在批判个人迷信上的，集中谴责毛泽东。在出狱前的一段时间里我作为第八中队的站道，在值上半夜班时，偷偷地写了几篇批判毛泽东的文章。在被释放时，我成功地把这几篇文章带出了监狱。我在绥化师专工作的第一年里，我写那几篇文章的事被学校党委知道了，为此我几乎没有被评上讲师职称。但是在那些年里，我还是相信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

然而，从在外界生活的头几天起，我就感觉社会风气不佳。有一位同事对我说：“如果你需要解决自己的什么问题，你就得给单位领导送礼，你买得起礼物得送，买不起也得送！”我有时从北京回绥化时，也带着一些礼物（烟酒之类的）送给单位领导，为的是“解决”自己的某一“问题”。社会风气实在是江河日下，发展成为公开的腐败。1986 年底，我作为南京大学——霍浦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的访问学者待在南京时，适逢南京大学学生抗议腐败的运动。我从宿舍的窗户看见示威学生们高喊：“打倒贪官污吏”！这时离文化大革命结束仅仅 10 年。

1989 年 4 月中旬，我从海参崴回到中国边境城市绥芬河，得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胡耀邦是一个清官，在 1987 年初因为同情学生的反腐败运动而辞职。4 月末我来到北京住在府右街时，已有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了。天安门四周的街道上挤满了人。我曾经两次去天安门广场上看望绝食的学生们。第一次是在白天，当时我把自己衣袋里的 5.3 元都捐给学生买饮料

了，自己回家的公交车票钱也没有留。其实也不用留车票钱，因为那时北京市中心的街道上车辆已很难通行。当我步行回到府右街自己家跟前时，正遇见一队中学生奔向天安门。许多女学生手拿一根绳子，绳子末端有一个小瓶子（指邓小平）在地上拖着。姑娘们一面走一面高呼：“小平，小平，退休吧！退休吧！”我第二次去天安门广场是在晚上，是和一位当年在列宁格勒大学时的同学一块儿去的。那位同学用小轿车拉了整整一车的饮料给绝食学生们送去。我在天安门广场上看见了这么一幅漫画：李鹏站在画上方的一个台子上，周恩来在画下方站着向他招手说：“鹏儿呀鹏儿（按：李鹏是周恩来的养子）快下来吧！别给我丢脸了！”那几天大约有二百万人挤满了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自行车根本无处存放。我看见墙边和路边到处都是自行车，却没有听说谁丢车的事。我因为有对苏边贸的事缠身而不能在北京久留。5月20日晨在抵达哈尔滨之前，我从火车上的广播中得知北京宣布了戒严。但是哈尔滨的学生也在示威抗议腐败。我在一辆出租汽车上对那位司机谈起在北京虽然混乱却无人丢自行车的情况，那位司机则对我说：“现在为了支持学生们抗议腐败，全国的小偷们已经宣布罢工了！”

在半个月之后的6月5日那天，我在从大庆到哈尔滨的火车上得知了前一天发生于北京的屠杀。1989年的六四事件促使我重新考虑自己过去的观念：“难道仅仅个人崇拜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吗？有没有更深的根源呢？当我在监狱里的时候，我是同情老干部的。但是当他们和他们的子女（李鹏还是一个留苏学生哩！）们掌权后又干出什么来了呢？我自己的苦难是过去了，我这几年也没有受到过多少不公正待遇。我有家，生活也不错。我是一个平民，不会像毛泽东那样奢望死后去见马克思。但我心中总有一点愿望，即将来到“那边”以后，我想去看看遇罗克、林昭、张

志新和吴小彦（现在还加上六四的死难者们）等人。但如果我现在在只顾自己安享晚年，无所事事，那时我拿什么脸去见他们呢？他们能接见我吗？我的脑袋本来就是拣回来的，有什么可惜的呢？我是否应该想想我还能作一点什么呢？”

10 年过去了。1999 年 4 月 25 日星期天，我在早晨 8 点钟从府右街西荃巷北口出来要去图书馆。我在胡同口看见许多人沿着府右街西侧的人行道站着。我感到奇怪：“怎么这么多人都在等第 14 路公共汽车呢？”（第 14 路公共汽车的站牌正好在西巷北口和府右街西侧人行道的交叉外）。这些人排成三列或四列顺着府右街西侧站着。面对着他们，每隔约 10 米远站立着一个警察。这些人站立有序，没有嘈杂声，地面上也没有垃圾。当我走出府右街北口时，我看见在与府右街交叉的文津街北侧也站满了人，从北海公园的大门直至西安门都是如此。这里的人们也是排成三列或四列，井井有条，没有嘈杂声，地面上也没有垃圾。也是面对着他们每隔 10 米远站立着一个警察。我以为这大概是下岗职工们向政府要求点什么来了。当我在图书馆里看完报回到府右街自己家时，这些人还在那里。那天是一个艳阳天，我担心这些人会渴着或饿着，就向一些站在胡同口的人是否需要喝水或吃点粥，我可以为他们服务。但是这些人客气地谢绝了，举起饮料瓶子表示他们是有准备的。有一位老年妇女从我的一位邻居那里要了一点开水，但是却坚持付款。于是从这些人的嘴里我才得知他们是法轮功信徒，因听说在天津有几名法轮功信徒被捕，就到这里向政府要说法来了。一宿无话，第二天早晨我再从家里出来去图书馆时，西巷北口一个人也没有了。可是下午当我从图书馆回家时，府右街北口却被警察封锁住了。虽然我解释说我就住在街内的西巷，但也过不去，我最后是拐弯抹角地经过几个小胡同才回到家的。1999 年 7 月末当我已经从北京回到绥化以后，我听到

政府宣布取缔法轮功！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起，在中国出现了许多种气功，法轮功是其中最庞大的一支。我自己是不懂气功的，但是我以为人们也不妨利用气功作为一种特殊的体操来强身健体。现在医疗费用愈来愈贵，在多数地方公费医疗已不复存在，人们怎么能不另找出路呢？关于自己的健康还是依靠医学和医生的。如果在科学与气功之间辨别轻重缓急，我肯定是以医学为首选的。但是我对于镇压法轮功却非常反感。法轮功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观点，被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尤其是那腐败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信仰的人所接受。这种信仰真空是中国共产党自己造成的。中国共产党被法轮功吓坏了正好证明它自身的脆弱。数年之间用尽九牛二虎之力来镇压法轮功，结果法轮功的信徒大为增加。还不知道下一个占领中国信仰真空的将是谁，但是肯定不会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三个代表”就是了。

到 21 世纪初时，我所在的黑龙江省，前省委书记和省长都因为腐败被捕判刑。在我作为其市民的绥化市，市委书记兼市长也因腐败被捕判刑。在我工作过的绥化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也因腐败被捕判刑。一次我在车上和人谈话中说：“有些要入党的人入党动机不纯。”于是有另一个乘客纠正我的话说：“你说的不对。他们的入党动机非常的纯：纯粹是为了升官发财！”这说明现在的和未来的共产党员们自己也是不信仰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普通老百姓一般不相信报纸和电视上的新闻，因为那是报喜不报忧或干脆撒谎。另一次我在大庆和一个我过去的学生谈起当前农村的情况时，这个学生说：“现在农村什么也不缺，只缺陈胜吴广了！”这使我大为惊讶！如果说的是关内的河南省或安徽省，我倒也能明白。但是大庆是一个富庶地区呀！为什么也这样呢！看来中国社会内部的矛盾是非常普遍而尖锐的。这样下去，会不会

在什么时候发生总爆发呢？

建国后曾经有过不少要拓宽府右街的说法，就是要拆掉府右街西侧的房屋，把街面向西扩展 30—50 米并沿街建立几个大草坪。于是府右街西侧的居民们就老是不肯好好维修自己的破旧住房，等着有哪一天北京市政府会因拆掉他们的旧房而在新楼（或者就在府右街西侧往后再退 30-50 米处）里提供套间。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时，因为北京申办 2000 年奥运，这种希望曾经一度很强烈。但那一次申办失败了，府右街拓宽的事也就被搁置了。然而在 2001 年 7 月 13 日，北京申办 2008 年奥运会成功，拓宽府右街的事也就必将付诸实施了。那么包括张家所属的西巷的所有旧民屋都将被拆除。

为了改善北京市容，府右街西侧的居民们同意拆掉他们的旧房屋。但是在府右街的东侧即中南海，难道什么改变都不应有吗？在 600 年（明清两朝）的时间里，中南海是皇家的御花园。辛亥革命之后，中南海就应该还给人民，和北海公园一样。但是在整个 20 世纪里，除去很少几年以外，中南海都被政府或政治机关占领了，先是北洋军阀政府，然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政机关。尤其不合理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只作为一个政党的机关却把中南海占据了半个多世纪。这是非法割据（另外还有各级党务工作者的工资由国家财政支付等不合理的事）！即使是在前苏联，苏共中央也没有长期而全部地占领过克里姆林宫。1958 年我就亲眼看到在莫斯科的一条大街上矗立着苏共中央的办公大楼。在 1955 年，1956 年和 1989 年，我曾三次浏览过克里姆林宫。21 世纪初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自觉地从原北京大学的红楼撤出，恢复它为 1919 年五·四运动的纪念物。中国共产党应该遵循这一范例，把中南海归还于民，作为还政于民的第一步。中共中央应该用自己的党费盖自己的办公大楼。至于国务

院，人民是会同意由财政部拨款给它盖自己的办公大楼的。

如果府右街拓宽了，草坪出现了，在它东侧的中南海也还给人民了。那么。若干年后当人们来到北京（那时北京也可能因为缺水或其它原因而不再是首都了）府右街时，就会看到一种美好的情景：在府右街东侧的中南海里游人如织，在府右街的西侧人民安居乐业。

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

黑色文库 第十八集

作者/张轶东

出版者/ 劳改基金会黑色文库编辑部

主编/ 廖天琪

封面设计/ 古原

华盛顿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 作者 张轶东

本书版权为作者所有，劳改基金会拥有中文发行权。非经作者及基金会同意，不得翻印、复制或转载文字与图片。

本书由劳改基金会设计、编辑及出版。若获盈利，仅用作《黑色文库》的出版费用。

My Fall from Leningrad University to Xinzhaio Prison

By Zhang Yidong

Black Series Volume 18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7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13-1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价: U.S. \$ 25.00

一个人的遭遇 同代人的命运

从列宁格勒大学到新肇监狱

张轶东 著

作者简介

张轶东，1931年生于南京。父亲留日归国任上海第三炼钢厂厂长。1937年因日军侵华，全家随炼钢厂迁居重庆。1948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1年因学业优异被选送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继续在该校读研究生。1958年受反右运动波及，因“只专不红”而被提前召回中国，论文和学业全部中断。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他的处境每况愈下，并被下放到黑龙江绥化县，连母亲也被迫与他断绝母子关系。他与苏联妻子团聚无望，不得已只好离婚。从此天各一方，生死两茫茫。1970年以“反革命罪”判20年。1979年改判无罪释放。1981年任绥化师专外语系教员、讲师和副教授，兼教英语和俄语。退休后仍经常参与学术活动。

黑色文库 第十八集
劳改基金会

My Fall from Leningrad University to Xinzha Prison
By Zhang Yidong

Black Series, Volume 18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Washington, DC 2007
www.laogai.org

ISBN 1-931550-13-1
Printed in Hong Kong
U.S. \$ 25.00

